

「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 中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

中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1988年10月·北京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印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共十四册（序号19—32）。本书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上<25>、中<26>、下<27>三册）。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汇编时，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本资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

为反映历史发展的逻辑，便于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上研究问题，所有资料都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张天荣、何理、肖甡、胡庆云、林蕴晖、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编审。

本书由王年一选编。

刘星星负责编辑工作。

徐胜华、郑又晨、刘星星具体经办承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一九六八年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1)
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	
通知(1968年1月2日)	(4)
论派性的反动性(1968年1月12日)	《文汇报》社论(4)
《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的编者	
按语(1968年1月16日)	(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	
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1968年1月18日)	(6)
中央军委批转军委政工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	
报告(1968年1月19日)	(8)
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1月23日)	(11)
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1月25日)	(11)
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1968年1月28日)	《解放军报》社论(1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的报告(1968年1月29日)	(1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的批示(1968年2月1日)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1968年2月5日)	(16)
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1968年2月10日)	任立新(1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	
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1968年2月18日)	(1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的批示(1968年2月20日)	(1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2月22日)	(20)
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 (1968年2月25日)	任立新(21)
《人民日报》刊登《把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出去!》的前言 (1968年3月1日)	(23)
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七”指示光芒万丈 (节录) (1968年3月7日)	(2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3月18日)	(2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3月20日)	(26)
革命大批判要坚持开展下去 (1968年3月21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2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 (1968年3月22日)	(28)
〔附〕“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张万来(28)
揭露江青的丑恶嘴脸 (节录)	周海婴(31)
大树参天护英华	傅崇碧(32)
杨余傅蒙难记	董保存(3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黄永胜、温玉成任职命令 (1968年3月22日)	(85)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1968年3月23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86)
林彪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8年3月24日)	(87)
毛主席和林彪接见军队干部 (1968年3月24日—25日)	(94)
革命委员会好 (1968年3月30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9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4月4日)	(97)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两条路线斗争 (1968年4月5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9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4月6日)	(103)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通知 (1968年4月11日)	(10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4月14日)	(10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援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1968年4月16日)	(106)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1968年4月27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10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4月30日)	(109)
乘胜前进 (1968年5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110)
毛主席和林彪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节录)	(112)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知 (1968年5月5日)	(11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5月8日)	(11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令 (1968年5月12日)	(115)
〔附〕推倒“五一”命令，团结战斗向前进	《体育报》社论(116)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1968年5月15日)	(117)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讲话 (1968年5月15日)	(119)
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 (1968年5月17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120)
《人民日报》刊登《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划时代的文献〉重要文章 的发表》的编者按语 (1968年5月18日)	(125)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重要通知 (1968年5月18日)	(126)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 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 (1968年5月25日)	(12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 会的批示 (1968年5月28日)	(130)
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1968年5月28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131)
江青培育和率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艺的样板团在“七一”公演样板戏 (1968年6月29日)	(132)
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 (1968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134)
毛主席和林彪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晚会 (1968年7月1日)	(13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1968年7月3日)	(13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 的档案的规定 (1968年7月9日)	(139)
“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1968年7月9日)	国家经委无产阶级革命派(140)
《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 精兵简政， 密切联系群众》的编者批语 (1968年7月11日)	(143)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1968年7月18日)	《人民日报》社论(14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 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 (1968年7月19日)	(144)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1968年7月22日)	《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145)
〔附〕上海机床厂党委决定彻底否定“文革”产物《七·二一调查报告》	(149)
清除七·二一调查报告恶劣影响，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何光远(15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1968年7月24日)	(152)
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 (1968年7月28日)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15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 (1968年8月4日)	(154)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1968年8月5日)	《人民日报》社论(15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8月10日)	(157)
《人民日报》转载《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编者按语 (1968年8月13日)	(15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8月14日)	(15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8月20日)	(16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1968年8月25日)	(161)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1968年8月25日)	姚文元(162)
〔附〕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申涛声(165)
北京上海产业工人大军开进大专院校 (1968年8月26日)	(170)
李作鹏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的讲话 (1968年8月26日)	(17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8月28日)	(17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年9月1日)	(175)
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8年9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176)
〔附〕新闻战线上的革命和反革命	《新闻战线》评论员(187)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 (1968年9月2日)	(193)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1968年9月5日)	(194)
《红旗》杂志发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编者按语 (1968年9月5日)	(195)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1968年9月6日)	(195)
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8年9月7日)	(197)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8年9月7日)	(199)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1968年9月7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200)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1968年9月12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202)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前言 (1968年9月14日)	(204)

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胜利 (1968年9月25日) ……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205)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1968年9月29日) ……	(206)
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 (节录) (1968年10月1日) ……	(208)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8年10月1日) ……	(210)
《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的编者按语 (1968年10月5日) ……	(211)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市《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校的情况报告》	
(1968年10月7日) ……	(212)
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 (1968年10月14日) ……	《红旗》杂志社论(213)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 (草案)》的决定	
(1968年10月31日) ……	(217)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1968年10月31日) ……	(221)
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224)
(附)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李耐因(227)
少奇同志之死	王阑西(232)
最后的二十七天	朱可先 卞 卡(233)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刘平平 刘 源 刘亭亭(237)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1968年11月2日) ……	(259)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有关传达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 (1968年11月12日) ……	(260)
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1968年11月25日)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262)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1968年12月3日) ……	(266)
《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	
(1968年12月22日) ……	(269)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	
(1968年12月26日) ……	(270)

一九六九年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9年元旦社论(271)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节录) (1969年1月28日) ……	(274)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 (1969年1月29日) ……	(275)
(附) 清华大学推翻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欺上压下的假报告	(281)
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1969年2月) ……	(285)

苏联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我	
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1969年3月2日） (290)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通知（1969年3月4日） (291)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吸收部分干部参加加工宣	
队的情况报告》的通知（1969年3月4日） (291)
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迅速改变南口厂“老大难”面貌的经验	
（1969年3月10日） (293)
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1969年3月12日） (299)
苏联边防军又一再严重侵犯我国领土进行一系列军事挑衅活动 我国	
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69年3月13日） (305)
苏联政府出动武装部队又一次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	
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紧急强烈抗议（1969年3月15日） (306)
苏修再次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我边防部队英勇反击	
胜利保卫了祖国神圣领土（节录）（1969年3月15日） (306)
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1969年3月17日） 《北京日报》社论(307)
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热情帮助革命师生坚决落实毛主席对	
知识分子的政策（1969年3月18日） (309)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 (310)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林彪(31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1969年4月1日） (327)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1969年4月14日） (328)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14日通过） (329)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1969年4月24日） (332)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69年4月28日） (335)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1969年4月28日） (338)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的各项政策》（1969年5月8日） (339)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1969年5月31日） (343)
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在八三四一部队驻厂宣传队帮助下认真落实干部	
政策（1969年6月28日） (346)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69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349)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1969年7月1日） (35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1969年7月23日） (356)
工人阶级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一周年（1969年7月26日） (357)
抓紧革命大批判	
（1969年8月25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36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1969年8月28日） (365)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促进革命和生产不断发展——北京针织总厂	
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经验（1969年9月13日）	(367)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1969年9月17日）	(370)
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1969年9月27日）	(372)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节录）（1969年9月27日）	(373)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1969年9月30日）	(373)
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69年10月1日）	(379)
上海革命大批判专栏发挥出强大战斗力（1969年11月2日）	(381)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认真落实党的对敌斗争政策（1969年12月8日）	(383)
北京新华印刷厂整党建党调查报告（1969年12月16日）	(386)
着重思想整顿 多做教育工作——清华大学在整党建党工作中用毛主席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党员头脑（1969年12月17日）	(389)
坚持无产阶级党性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	
快斗批改步伐（1969年12月19日）	(392)
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在首都普遍开花结果（1969年12月20日）	(396)

一九七〇年

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0年元旦社论(398)
沿着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前进	
（1970年1月1日）	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01)
清华大学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节录）（1970年2月24日）	(405)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委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	
总结的三个报告（1970年3月15日）	(406)
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0年3月27日）	(420)
毛泽东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稿的批改（1970年4月3日）	(421)
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记录稿） （1970年4月18日）	(422)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1970年5月20日）	毛泽东(434)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	
两个报告（1970年5月29日）	(435)
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九周年	
（1970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444)
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1970年7月9日）	《人民日报》社论(446)
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1970年7月21日）	(447)
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1970年7月22日）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57)
〔附〕一个毁灭教育的黑纲领——评大毒草《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	

大学而奋斗》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467)
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 (1970年7月24日)	任群(472)
我的一点意见 (1970年8月31日)	毛泽东(476)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1970年9月6日)	(477)
农业学大寨 (1970年9月23日)	《人民日报》社论(479)
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70年10月1日)	…… (481)
继续革命 乘胜前进 (1970年10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482)
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方向 (1970年10月19日)	商业部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485)
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1970年11月6日)	…… (491)
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1970年11月16日)	…… (492)
毛主席关于中国共产党陆军三十八军委员会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 的报告的批示 (1970年12月16日)	…… (493)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1970年12月18日)	…… (493)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1970年12月29日)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501)

一九七一年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1年元旦社论(505)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 批示的通知 (1971年1月11日)	…… (508)
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 (1971年1月31日)	《人民日报》社论(511)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1971年2月8日)	…… (512)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1971年2月23日)	…… (513)
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 (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	…… (513)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 (1971年3月15日)	…… (520)
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的批示 (1971年3月30日)	…… (520)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1971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521)
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 (1971年7月30日)	…… (535)
“电子中心论”批判 (1971年8月12日)	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536)
中共中央批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971年8月13日)	…… (540)
〔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 (547)
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 (1971年8月27日)	《人民日报》社论(551)
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 (554)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1971年9月18日)	…… (557)

(附) 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	刘回平等(559)
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	许文益(570)
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	伊 白(580)
“九·一三”事件补遗	符 浩(597)
扭曲的虹	张 宁(602)
中共中央通知 (1971年9月29日)	(642)
中共中央通知 (1971年10月3日)	(642)
中共中央通知 (1971年10月3日)	(642)
中共中央通知 (1971年10月6日)	(643)
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驱逐蒋帮的阿尔巴 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 (1971年10月25日)	(645)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全文和联合国大会表决结果 (1971年10月25日)	(64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1971年10月29日)	(648)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 (1971年11月14日)	(649)
(附)“571工程”纪要 (1971年3月22—24日)	(650)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 的通知 (1971年12月11日)	(658)

一九七二年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2年元旦社论	(668)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1972年1月10日)	(672)
周恩来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的悼词 (1972年1月10日)	(673)
(附) 霜重色愈浓——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同志	董怀周(674)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二) 的通知 (1972年1月10日)	(690)
中美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8日)	(697)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1972年4月24日)	《人民日报》社论(699)
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年5月1日)	(700)
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 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 (1972年7月)	(701)
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 (1972年7月23日)	周恩来(706)
毛泽东对邓小平八月三日信的批语 (1972年8月14日)	(707)
(附) 在江西的日子里	毛 毛(708)
邓小平在1969—1972	袁之伟(712)
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 (1972年9月11日)	周恩来(7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	(748)
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1972年10月6日）	周培源(750)
〔附〕“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	周培源(754)
我国对外关系和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又有很大发展（1972年10月11日）	(757)
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1972年10月14日）	龙 岩(759)
〔附〕围绕批判极“左”思潮的一场激烈	
斗争	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人民日报理论部(761)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1972年10月14日）	周恩来(767)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

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了。

东方红，太阳升。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空前广泛和深入的革命群众运动，正沿着毛主席指出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革命的大批判正在各条战线上进一步展开，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罪行，大量地被人民群众揭露出来，使人们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有了更具体、更清楚的认识。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教育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正在逐步出现新的面貌。文化大革命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我国导弹、氢弹的试验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农业生产获得空前的大丰收。全国热气腾腾，到处是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

形势大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以后，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有力地提高了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江河奔泻，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在视察时所指出的“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的科学预见。

在新的一年中，全党、全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摆在我面前的战斗任务是：

第一、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正象林彪副主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新的一年，将是几万万革命人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去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各级领导同志、各革命组织，要大抓狠抓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首先就要学好用好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要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使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各项具体政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直接掌握，变成亿万革命人民自觉的革命行动。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最根本的保证。物质变精神，

精神变物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要继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风。对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要用，要深刻领会，坚决照办，经常检查，及时总结。什么人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自作聪明，正路不走走歪路，就一定会迷失方向，就一定要犯错误。各革命组织，都要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指南。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一切言行，无论来自右的方面，或是来自极“左”方面，都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应该成为学习最新指示、执行最新指示、宣传最新指示、捍卫最新指示的模范。

第二、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

新的一年中，我们将进一步揭露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和阴谋活动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一切复辟的妄想彻底破产。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采取多种形式，在各个领域中狠批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革命的大批判，要结合各项任务，持久地开展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在新的一年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努力帮助更多的革命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勇敢地站出来革命。要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团结对敌，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克服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大力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维护它的革命权威，帮助它的完善和发展，使它在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发挥强大的威力。

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这种改革中，要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抵抗，继续依靠广大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力支持革命的积极分子，支持革命群众中的新生事物。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党的领导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抓好全面规划、典型试验这两件事，把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使各条战线的斗、批、改能顺利地向前发展。

第三、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整党运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学习几十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要吸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清除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出党。犯过严重错误的少数党员，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坚强。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为领袖的、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整顿党的组织的同时，共青团、红卫兵、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提高觉悟，纯洁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以及其他党、政工作部门，要把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当作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

第四，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新的一年中，他们将担负起更多更重要的任务。广大革命群众要更加相信和依靠解放军，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警惕坏人挑拨军民团结。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贯彻执行林彪副主席提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等一系列着重政治建军的方针原则，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的建设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要热烈响应林彪副主席发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战斗号召，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爱民工作。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群众学习，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进行深入、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全军指战员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巩固国防，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争挑衅，保卫伟大的祖国，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一九六八年的工农业生产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各级领导都要政治挂帅，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入手，抓好生产工作，把它当作夺取全面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广大革命群众要节约闹革命，爱护国家财产，自觉地加强劳动纪律，坚决批判和抑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歪风。要大力抓好交通运输。要健全和加强各级生产领导班子，重要的生产和科研部门，要迅速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保证一九六八年的工农业生产有更大的发展。

以上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完成这些光荣的任务，要经过艰巨的斗争和努力。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混在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绝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一定还会采取各种形式，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大好形势下，也会有某些阴暗的角落，扫帚不到，灰尘不走，需要继续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小撮在幕后或幕前猖狂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扰乱社会治安的阶级敌人，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处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解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革命越向前发展，越是深刻地触及到人们的灵魂，无产阶级的“公”字和资产阶级的“私”字的冲突就越突出。只有

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中大用“老五篇”，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紧跟毛主席，真正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就，给世界上一切革命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他们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造谣诽谤，已被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东风完全压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让那些老爷们去绝望地叫喊吧！我们将继续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紧紧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中的伟大成就，必将进一步激醒全世界。

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祖国、为人民创建新的功勋，去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一文，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各项光荣的战斗任务，是一个重要的社论。望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部队，各革命群众组织，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参照这个社论中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对当前的工作作出规划和安排。

论派性的反动性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

《文汇报》社论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条大毒蛇，被它缠上了身就不得了。有的同志身上已缠上了这条毒蛇，中毒很深。为此，必须历数派性的十大罪状，以引起一切革命同志的警

觉。

对待最高指示，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是句句照办，条条落实，而是各取所需、干扰斗争大方向，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战略部署。这是第一条。

为了一派的私利，什么人民的利益，什么党的利益，什么国家的利益，什么全局的利益，统统抛在一边。这是第二条。

混淆敌我界限，包庇阶级敌人。同意“我”的观点，不管是特务、叛徒，都是“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即使是同志，统统成了“敌人”。这是第三条。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眼睛只盯着对方组织，一旦从中揪出了几个坏人，就以偏概全，幸灾乐祸，乘机否定兄弟革命组织的大方向。为此不惜武斗，大开“内战”。这是第四条。

凡是争“席位”、争“核心”之日，正是派性恶性发作之时。“以我为核心”，就是他们的错误口号。革命大联合可以不要，但“席位”非争不可。这是第五条。

解放干部一律以是否利于“我”这一派为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忽而大声疾呼“全部解放”，忽而翻脸宣布“一律靠边”，“左”右摇摆，变化无常。这是第六条。

大吹大擂，自我标榜，贪天之功，占为己有。这是第七条。

用派性反派性。借反对别人的派性为名，行扩展自己的派性是实。当他们在高呼“打倒派性”的同时，还要带上派性的尾巴“××（本组织大名）必胜！”即是一例。这是第八条。

派性严重的人，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要资产阶级政客作风。这是第九条。

派性严重的人，什么都是为派性服务，推行反动的实用主义。他们甚至断章取义地用毛主席语录去攻击对方。学风恶劣，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这是第十条。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实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一个十分危险的敌人。它制造分裂，影响团结，瓦解斗志，危害革命，破坏生产，包庇坏人，助纣为虐，干尽坏事。大敌当前，我们必须打倒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到今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疯狂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武器。这决不是偶然的。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手已破产了，经济上用反革命经济主义发动进攻也早已被识破了，于是，他们只能乞助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个幽灵。他们召唤出这个幽灵，打入到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来。列宁指出：“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起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别动队的作用。我们有的同志头脑里有“私”字，里外呼应，一拍即合。这些同志一旦作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俘虏，被阶级敌人牵着鼻子走，还自以为“大方向正确”哩！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一种反动性。逆革命潮流而动，叫做反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却妄图阻碍革命洪流前进，这不是反动吗？“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一切反动的东西都将被革命的洪流所冲走。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在一定的时候，能够蒙蔽一些人。一切受派性蒙蔽的同志，现在再也不能继续糊涂下去了，应该赶快醒悟过来，擦亮眼睛，反戈一击，完全彻底搞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统帅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只有一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一性，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只有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去指导自己的全部行动，才能永

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打倒派性！斩断黑手！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搞派性，就是搞个人主义。”“派性的老根是资产阶级‘私’字，闹派性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

北京针织总厂的同志们这几句话讲得多么深刻！它把派性的丑恶灵魂揭露无遗。

要打倒派性，就非斗私不可，就非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搞臭不可。

要打倒派性，还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历数派性罪状，大揭派性危害，人人批判，个个抑制，使它在群众中象“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自觉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决裂，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保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 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发布《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以来，全国广大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击退了阶级敌人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取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很大胜利。当前，全国形势空前大好。但是，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的。最近，在有些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互相勾结，利用各种借口，重新煽动少数人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并且市场上又出现一些投机倒把的活动，妄图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

中央认为，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开展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的斗争。为此，特作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部门、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和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等有关文件，必须继续坚决贯彻执行。不允许任何人对这些文件进行歪曲和攻击。

二、关于工资、福利、资金、附加工资、补贴、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等制度的改革，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依靠广大群众，结合斗批改，经过调查研究，在运动后期统一处理。

对上述制度，目前，没有实行改革的单位，暂不实行；擅自提高标准或扩大范围的，必须严格纠正。

关于职工的转正、定级工作，应在实现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的胜利基础上，按照国务院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关于职工转正、定级问题通知的规定办理。凡不符合规定擅自进行转正、定级和抬高工资水平的，一律无效。

三、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中央准备经过调查研究，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一律不得转为固定工。现在是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不得强行要求转为全民所有制职工。所有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都不许成立单独的组织，不要互相串连和组织人员上访，有问题应向当地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或军区反映。

原来由生产队供应口粮的，一律不许改由国家供应。上山下乡支边的青年，不要回城市要求落户。

四、绝对不许分掉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流动资金、公积金、公益金；凡已私分的，应即主动缴回。

手工业合作社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年终劳动分红办法，必须停止执行。

五、各种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及分配工作后的工资待遇，在中央、国务院未作出新规定之前，一律仍按现有的规定（包括省、市、自治区的规定）执行。

六、对于有些群众和群众组织提出来的经济要求，有些干部因不坚持原则，而签字答应的条件，必须重新进行审查，凡不符合中央、国务院规定的，应立即收回，宣布无效。并由原签字的干部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擅自扣用现金或向银行强行提款，应立即自动交回。否则，要追查责任。

七、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坚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发动群众搞臭反革命经济主义。

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识破阶级敌人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阴谋，坚决把那些隐藏在背后进行挑动和破坏的坏人清查出来，交由革命群众组织和专政机关严肃处理，情节特别恶劣的，必须依法惩办。

各级宣传机关，要组织批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文章，要宣传好人好事，要教育群众，不要离开生产岗位、外出串连上访，影响生产。

八、切实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对于投机倒把分子，要发动广大群众，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对他们进行揭发斗争。要把他们从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并依法给予惩处。

九、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

合作商店（组）、手工业合作社（组）、个体商贩、个体手工业户，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接受国营经济领导，服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企业、事业、机关、学校、团体，非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

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行政管理机关。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们的职权，服从他们在市场上的管理，更不允许冲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税收人员和市场管理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革不合理规定，不断改进工作。如有执法犯法、利用职权、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要特别加重处分。

本通知应向城乡群众宣读并张贴。

中央军委批转军委政工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

林副主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在接见军委政工小组、文艺组、军报组时，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极为重要。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作了最精辟、最透彻的阐述，最深刻、最明确地指出搞好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是我军建设的根本。这是对我军几十年来建军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最好总结，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方向，也是其他各项工作的根本方向。对于推动我军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我军的革命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具有十分重大、十分深远的意义。

全军同志必须坚决贯彻林副主席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军队而奋斗。

军委同意军委政工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现转发全军团以上单位，望各级党委立即在全体干部中组织传达，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最 高 指 示

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等同志，于十二月八日接见了军委政工小组、文艺组、军报组的全体同志。在接见时，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使我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林副主席说：我军历来是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毛泽东思想，是吸取了外国的先进思想，即马、恩、列、斯的学说及其他先进思想，也吸取了中国古代的先进思想，是批判的吸取的。所以是很典型的集中了人类的优秀思想，并且是在新的条件下大大发展了这些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优秀思想。军队有今天，国家有今天，主要靠毛泽东思想。离开这个，解放军就不成其为解放军，就成了压迫军，不是马列主义的军队，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资产阶级的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我军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突出军事，一条是突出政治，我们要坚定地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政治工作做好了，训练也搞得好，生产、施工、内部团结、组织纪律、军民关系也搞得好、打仗也打得好。事情千头万绪，必须抓住主要的。抓住了这一点，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要把政治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第一位，不能摆在第二位、第三位，也不能和其他工作摆在同等的地位。政治工作是管思想、管灵魂、管革命化的，是各行各业的总管。林副主席特别强调思想革命化的重要性。林副主席说：我军打仗主要靠人的觉悟，靠勇敢，不怕死。不然，平时其他工作搞得再好，拿到战场上就垮下来了，问题就大啦！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党的存亡，政权的存亡，是人民得到一切或丧失一切的头等重大问题。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

林副主席对政工小组的任务作了极为重要、极为明确的指示。林副主席说：政工小组的根本任务，一是管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是管好干部，实际上一个是解决思想问题，搞好思想革命化，一个是解决组织问题，搞好组织革命化。事情千头万绪，处理不完，你们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林副主席的指示是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最深刻、最精辟、最透彻的阐述，是运用毛泽东思想，对我军革命化建设经验的最新、最好总结，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对我军政治工作任务最明确、最高度的概括。这是林副主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林副主席的指示是政治工作小组的工作方向，也是全军政治工作的方向，对于加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加速我军革命化建设，都具有极其深远的重大意义。

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执行林副主席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抓狠抓部队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对今后的工作作了讨论研究，提出如下的建议。

一、以最大的决心、最强的毅力、最主要的精力，狠抓活学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在一切领域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我军建设之本，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我们一定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林副主席最全面、最深刻地阐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进一步提高部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继续贯彻林副主席提出的一整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强调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对毛主席的指示要迅速传达，努力

紧跟，坚决照办，经常检查，及时总结。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改造世界观，把我军的思想革命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好学风，认真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好用好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保证胜利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二、认真考察和熟悉了解干部，正确使用干部，配好各级领导班子。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林副主席说：“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组成。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政治立场、政治历史、政治思想的状况要作全面考察，首先是深入熟悉了解军以上领导干部的情况。以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为标准去衡量干部。按照林副主席对选拔干部的三条指示：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三、有革命干劲。把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干部，大胆地选拔到各级领导工作岗位上来。

三、加强对解放军报社的政治思想领导，帮助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报社的建设。

四、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加强对文艺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树立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

五、指导总政治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帮助总政治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坚决斗倒斗臭总政治部机关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根据林副主席指示，政工小组的主要精力是抓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熟悉了解干部这两项中心工作，为此，部队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业务工作，主要由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各总部的政治机关负责进行。

为了完成以上任务，我们坚决遵照林副主席大抓两头的指示，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加强请示报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贯彻群众路线，加强调查研究，了解下情。依据上面提出的任务和下面的情况布置工作，狠抓落实。抓住工作中的关键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且注意不断的总结经验，改进方法，提高工作质量。

我们充分认识到政工小组所担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而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水平很低很低，工作能力很弱很弱，与工作对我们的要求差距很大很大。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榜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反对折中主义、调和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与一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行为作拼死的斗争，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我们一定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领导机关学习，下定最大决心，鼓足革命干劲，排除万难，坚决地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以上报告妥否，请予指示。

军委政治工作小组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

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兰州军区党委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洗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荫、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生、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洗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祝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认为，甘肃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召开了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推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甘肃代理人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革命大批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兰州地区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南五千万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

时指导。特别是去年九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新局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驻河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克服了省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加强了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五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一至二人担任副主任，由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忠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过老、张宗海、吕书墨、文香兰、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素琴、王传玉、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铁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四十一名同志担任常委。

河南省有五千万人口，有许多现代化工业，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认 真 执 行 支 左 不 支 派 的 原 则

——纪念伟大统帅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
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周年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解放军报》社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怀着对伟大统帅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热烈纪念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一周年。

一年来，我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得落花流水，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各单位的斗、批、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我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指战员经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锻炼和考验，涌现出以李文忠同志、英雄四排和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为代表的大量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部队的思想革命化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措施，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新发展。

当前，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就要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这是我军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的关键。

支左不支派，就是要切切实实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凡是革命的群众组织，都要支持，不能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也不能“你是左派我就什么都支持”，而是要支持他们的一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对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就决不能支持，就要用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克服和纠正。要努力促进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坚决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的新形势下，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混在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死亡，正在千方百计地煽动和利用反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挑拨离间，妄图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扰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在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支柱。我们一定要认清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特点，提高革命警惕，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是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战胜阶级敌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迫切需要。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核心，是支左不支派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应该坚决相信，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对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对于他们推行的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即使过去曾经受蒙蔽的某些群众，大多数也已经觉醒，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决不能无视广大群众的觉悟，看不到群众运动的新发展，看不到“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决不能因为有些人犯了一时的错误，或者一个革命组织中混进了几个坏头头，就把他们全部否定，把他们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战斗在“三支”“两军”前线的我军广大指战员，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斗私批修，加强思想革命化，坚决抵制这种思潮的影响。这是支左不支派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听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侵袭到我们

头脑中来，不加抵制，那就会把“三支”“两军”工作引上邪路，并反过来助长某些革命群众组织派性的膨胀，加深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损害军民之间的团结，妨碍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实现。

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起来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人民军队。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每一个地区支左部队的思想和行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勇前进，发现了缺点、错误，就坚决改正。人民解放军的每个指战员，都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做支左不支派的模范，努力把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军民团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立新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央同意郑维山、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二十一名委员组成，并由李雪峰同志任主任，刘子厚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刘殿臣、耿长锁五同志为副主任。同意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河北四千多万人民表示极热烈的祝贺。

河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毛主席亲临河北视察时，对河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英明指示。河北省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彻底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在河北的代理人林铁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河北省革命同志最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十个专区，有九个专区和大多数县、市都成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认真地执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河北省的形势大好，革命和生产取得了双丰收。农业获得了全面丰收，工业、交通战线上也取得很大的胜利。

中央希望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驻河北省的人民解放军、河北各地、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极大关怀和及时指导，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对湖北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胜利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的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了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各方面的干扰，经受了严峻考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 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

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踞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很好。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以引起你们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做好这一工作。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1）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2）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一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3）认真清查敌伪档案，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清查，狠挖深挖，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希望你们参照黑龙江的做法，加强敌情观念，采取调集一批军队中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的代表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定出规划，抓住重点，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以根除隐患，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请将你们目前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及今后部署电告中央。

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

任立新

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的重要保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社会主义生产是按计划进行的，是一环紧扣一环的有机整体。如果没有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的劳动纪律，就不可能使生产有秩序地进行，也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工人阶级，不仅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而且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职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革命和生产中，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的伟大作用。他们坚守生产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他们积极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向一切违犯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人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生产劳动中不遵守纪律，不服从指挥，工作吊儿郎当，想不干就不干，谁也管不了，还美其名曰这是什么“造反精神”，什么“自己教育自己”，甚至给遵守劳动纪律的同志，扣上“奴隶主义”的帽子。这是完全错误的。

能不能自觉地遵守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是衡量我们每个同志是不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伟大方针的重要标志，是衡量每个同志是不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国家主人翁态度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衡量我们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遵守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绝对不是什么“奴隶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绝对谈不上什么“造反精神”。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搞无政府主义，不仅对生产有严重的危害，而且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种手段。

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又“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心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

现在，被打垮的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正在妄图利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使革命队伍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使工人阶级丧失严密的组织纪律，从而达到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严重警惕。

对于那些煽动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破坏生产建设的一小撮坏人，必须彻底揭露，依法制裁。

革命干部要积极领导生产，和广大革命职工一起，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纪律，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该管的就管。

广大革命职工，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斗私批修，加强纪律性，搞臭无政府主义，表扬好人好事，批评错误倾向，把资产阶级歪风坚决打下去，把无产阶级正气进一步树起来。

(原载 1968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 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和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勤俭建国”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抵制资产阶级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严格财政、金融管理，节约开支，除了继续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的指示、通知、规定以外，特作如下紧急通知：

(一) 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九六七年年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年终结余存款（包括预算外资金），除去未完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流动资金、大修理基金、设备更新资金、农田水利、优抚救济、安置移民经费以外，一律按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银行存款帐面数字，实行冻结，不再动用。

(二) 基本建设、大修理和设备更新要按计划积极进行，同时要按照工程的进度和修理、更新的情况严格控制用款。由于物资不足或者其他原因，没有施工的基本建设单位和建筑企业，除了必要的工资、备料和设备到货以外，不许动用基本建设投资结余，国家也不给予新的拨款；当前不能进行大修理和设备更新的单位，不许动用这两项资金的结余，也不许使用新提取的资金。

(三) 一九六八年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行政经费、事业费，除去应发的工资以外，一律按一九六七年度的预算指标总额，减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所属单位的不同情况，具体核定节减比例。企业的管理费用也按上述原则执行。

各地区、各部门对于所属单位的开支，实行分季核定，按月拨款的办法。凡是不进行业务活动的单位，没有复课闹革命的学校，一律只发工资（助学金）和少量的取暖、照明等维持费用，不发业务费。

凡是不进行生产活动和业务活动的，不许开动汽车。群众组织占用的汽车，要立刻交回原单位。

(四) 今后，出省上访和参观，必须从严控制，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组小组）、军管会或军区制定批准办法。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借支和报销各种费用。有关单位不予接待。过去串连、上访、参观人员借支的现金、粮票和物品，凡能归还的，要主动归还。借出单位和有关单位要认真清理，应当收回的，要限期收回。

职工、学生和机关干部，都不得擅自离职离校。已经外出的，要按当地实际情况规定限期，动员他们回来，过期不回来的，一律停发工资和助学金。

(五) 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流通周转的需要，不准用作其它开支。坚决制止各单位之间相互拖欠，相互借用资金。没有进行生产劳动的，一律停发劳保用品。反对商品“走后门”。

(六) 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帐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文到一个月内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否则，即由上级派军管人员或由上级革委会（筹组小组）、军管会

派人来掌握生产和业务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

(七) 各级财政、银行部门，要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努力组织收入，保证各项财政收入按时缴入库。

一切应纳税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照章纳税。偷税漏税和抗拒不交的，要严加处理。

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必须按时缴库，不准挪用，不准拖欠。

企业、事业单位的现金收入，必须按照规定，及时送存银行。各单位自己留存备用的现金，不准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

(八) 各单位的财务收支，除了属于国家机密部分以外，都应当实行财务公开，经济民主，接受各派革命群众监督。

(九) 各单位向财政部门、银行提领款项，必须按规定的签署手续办理。凡是沒有实行革命大联合又沒有实行军管的单位，必须由各革命群众组织、主持业务工作的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和会计联合签署。否则，财政部门拒绝拨款，银行拒绝付款。

(十) 最近发现有些坏人利用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进行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为了切断他们进行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的这个经济来源，对于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那些人的存款应当冻结，由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军代表或革命大联筹（革命大联筹）确定名单，在既沒有军管又沒有联合的单位，可由各派革命组织分别提出名单，报请上一级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或军区、军分区、驻军支左机构批准，通知银行按照执行。

(十一) 财政、银行人员和财务人员，要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社会主义建设。要坚守工作岗位，坚决按政策和制度办事，坚决反对浪费国家资财和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财政、银行单位的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本单位以外的群众联合组织，不许利用职权，干预外单位的两派斗争。其他单位的群众组织也不许干预财政、银行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根本的根本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又教导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必须以革命化带动节约运动，发动广大群众，自觉地遵守制度，把各项节约措施条条落实，坚持下去。

(这个文件，可以在一切基层单位宣读，在内部张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八十名委员组成；由黄永胜、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陈德、林李明、罗天、赵卓云、寇庆延、袁德良、孙正乾、白平、向民、舒光才、范希贤、王世琳、刘继发、丘学科、莫超海、梁锦棠、刘均益、程定章、田华贵、钟荣欢、黄育英（女）、梁秀珍（女）、高翔、武传斌、林昌文、易作才和六名待选代表共三十九位同志担任常委；并由黄永胜同志任主任，孔石泉同志任第一副主任，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黄荣海、刘继发、黄育英（女）七同志和待补一人至二人任副主任。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向广东全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一年多来，广东省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陶铸、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了地方主义小集团企图翻案的阴谋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驻广东部队，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广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来，狠抓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大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积极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广东是祖国南方的大门，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依靠和相信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二月十四日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五名委员组成；由王淮湘、阮治生、郑季翹、肖道生、何友发、徐仲禹、苏俊禄、蒋克诚、王振华、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邹明友、吴招弟、耿志才、边仲科、徐飚、李树、陈贵、赵桂兰（女）、张振标、邬孟庄、王维宾、孙凤岐、尹嘉英、姚美玲（女）、许肇昌、朱文贵、都淑珍（女）和四名革命领导干部、两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暂缺）共三十五个同志担任常委；并由王淮湘同志任主任，阮治生、郑季翹、肖道生、何友发同志和地方革命干部二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一至二人（暂缺）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吉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年多来，吉林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出了以赵林为首的吉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吉林的代理人的大批判；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八个地、市已有七个地、市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一批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吉林省的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工业得到了发展。长白山麓、松辽平原一片大好形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驻吉林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吉林省地处反帝、反修前线，搞好这个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希望，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把刘、邓及其在吉林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加强各民族的革命团结，以“斗私、批修”为纲，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各项工作，夺取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任立新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一股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正在侵袭着无产阶级队伍中某些人的健康肌体。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唯恐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不乱，他们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制造混乱，混水摸鱼。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阻挠我们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我们队伍中的某些同志，由于“私”字作祟，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侵袭面前，顶不住眼前利益的诱惑，认不清无政府主义的丑恶嘴脸，看不到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本质。有些人不但不

去反对无政府主义，看到别人搞无政府主义，觉得有“油水”，也身不由主地去捞一把，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摸不着这个店”，好象不捞点什么，就吃了大亏似的。我们要向这些人大喝一声：同志，应该猛醒了！这样下去，将会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你自己又将走到哪里去呢？

无政府主义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它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反对的是无产阶级的纪律；它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反对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它要的是个人的为所欲为，反对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这那里是什么不要政府？分明是要他一家的政府，要资产阶级的政府，反对无产阶级的政府。一句话，无政府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反动思潮在今天膨胀起来不是偶然的。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反映；是阶级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的阴谋伎俩；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的恶性发作。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

列宁说：“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流氓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心理状态。”这对无政府主义卑鄙的个人主义灵魂，剖析得多么深刻啊！

搞无政府主义的人，为了掩饰这种反动思潮的资产阶级本质，往往接过了革命的口号。什么“我这是造反”啊；什么“我自己解放自己”啊；什么“反对新奴隶主义”啊；别人一提出批评，就暴跳如雷，大嚷什么“你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白卫匪帮生死搏斗的时候，列宁就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还有各种阶级存在，不能忘记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反革命性是通向白卫匪帮的政治桥梁。”

有极少数人，正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这座危险的政治桥梁，滚到了反革命的一边。他们或者“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丧心病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或者肆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危害国计民生；或者目无国法，为非作歹，堕落成刑事犯罪分子。对这样的人，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给予制裁。

无政府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强烈的腐蚀剂。它会使我们的革命队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斗志消沉；它会使我们的同志在政治上丧失警惕，忘记阶级敌人，忘记斗争的大方向。这样，不但不能对敌人进行战斗，反而起了保护敌人的作用。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对无政府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们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他们以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发扬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的组织纪律，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战士。

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人，绝大多数还是思想认识问题，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就会坚决抛弃无政府主义，和我们一起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革命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彻底打倒无政府主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立新功！

（原载 1968 年 2 月 25 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刊登《把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出去!》的前言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主义思潮真是害人不浅啊！工人看到痛在心头，敌人看到喜于眉尖。不打倒无政府主义，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性，就不能更好地同敌人战斗，就不能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不能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挥起钢铁的拳头，把无政府主义打倒，搞臭，把它从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彻底铲除！

无政府主义坏透了。它在政治上否定一切，生产上随心所欲，组织上分裂队伍，思想上涣散斗志。一些正路不走走歪路的人，闹无政府主义不觉丑，还美其名曰“造反精神”、“自己教育自己”，等等。咱们老工人一听，把肺都要气炸了！

我们决不能忘记，在旧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鞍钢是怎样悲惨的情景，多少阶级兄弟为了一家老小糊口，被沉重的劳动压弯了腰；多少阶级兄弟被日寇的皮鞭子抽打得遍体鳞伤，变成终生残废，全家妻离子散；多少阶级兄弟被折磨迫害，惨死在工厂、矿山。那时，要吃鞍钢的饭，就得拿命换。

红太阳从东方升起，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把我们工人从苦难的万丈深渊里解放出来，我们工人由当牛做马的地位变成了国家主人。这一切，我们工人怎能忘记！我们日夜战斗在祖国钢铁工业基地鞍钢，肩负着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的重担，大家都感到十分光荣。但是，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却妄图利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阻碍革命，破坏生产。我们工人阶级万万不能松懈警惕啊！

现在，我们鞍钢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了围剿，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阶级兄弟纷纷起来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鞍钢工人阶级决心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以国家利益为重，发扬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勇敢地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把革命和生产推向新高潮。

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七” 指示光芒万丈（节录）

(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

在首都执行军政训练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一年来，坚定不移地沿着伟大领袖毛

主席“三·七”指示开辟的航道胜利前进，为首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建了卓越的功勋，使首都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空前大好的形势。

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和北京部队，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伟大战斗号召，派出大批指战员，在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统一组织领导下，对首都三百八十五所中学、八百三十四所小学和部分大学共一百多万人进行了军政训练。一年来，军训部队遵照毛主席的“三·七”指示，积极“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使首都学校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确实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广大革命师生经过军政训练，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更加无限热爱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自觉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所训练的中小学，已经全部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合，解放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革命干部，百分之九十八的学校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掀起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高潮。

坚决贯彻、英勇捍卫“三·七”指示

军训部队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团结和带领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战胜重重阻力，排除了来自右的或极“左”方面的干扰，贯彻执行和英勇捍卫了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去年三月，正当军训部队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帮助广大革命师生掀起革命大联合的高潮时，受到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思潮的冲击，刮起了一阵“拆台风”，使中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分裂成为两派。八月，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阶级敌人蒙蔽和煽动下，又去阻挠军政训练。

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军训部队全体指战员带着斗争中的问题，反复地认真学习“三·七”指示，热情宣传“三·七”指示，不管风吹浪打，誓死完成毛主席交给的军政训练任务。石景山中学军训团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向毛主席宣誓：“天可塌，地可崩，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三·七’指示不可丢”，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实际行动捍卫了“三·七”指示。

帮助师生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合

军训部队进入学校后，遵照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教导，带领广大革命师生展开了对中国赫鲁晓夫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揭发、大批判，提高了革命师生员工的无产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激发了他们对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仇恨。

军训部队对各校出现的两大派对立情况，作了全面的、深入的科学分析。他们认为，中学的两派，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冲杀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派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军训部队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对两派广大群众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遵照毛主席“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教导，以“斗私、批修”为纲，帮助两派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斗私心，横扫派性，增强党性，铲除了大大小小的山头，使全市中学全部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

合。军训部队也帮助小学广大革命师生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实现了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另外，帮助大专院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动围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民战争”。目前，已经有一批大专院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他的大专院校在军训部队帮助下，也正在急起直追。

(据《北京日报》报道，载1968年3月7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五十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倚、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露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革命干部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斗私、批修，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经中央批准的两派在京表达成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应认真执行。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大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国防要地，所有革命群众都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严防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动活动，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号令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千一百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

江苏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江苏是我国东南的重镇。江苏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把江苏省会南京作为他们进行血腥的反革命统治的巢穴，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被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所摧毁。这就是像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当时所说的那样：“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江苏省人民群众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江苏省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利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互相配合，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苏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对这些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英勇的斗争。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特别应当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卓越的新功。人民解放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江苏的胜利，起了很巨大的作用。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本单位的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革命大批判要坚持开展下去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今天，本报报道了西向第二大队和木城涧煤矿开展群众性革命大批判的情况和经验。请同志们好好读一读。

发动广大工农兵群众，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展开深入的革命大批判，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地、牢牢地掌握这个大方向。任何放松革命大批判的偏向，都必须防止和纠正。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早已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了。但是，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里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还没有彻底批判；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彻底清算；他们在群众中所散布的流毒，还没有彻底肃清。他们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所能达到的社会影响，采取各种各样的阴谋手段，不断地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扑。

毛主席教导我们：“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犹如两军对垒，决无调和的余地。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吃掉他，他就吃掉你；你不把他彻底打倒，他就要爬起来反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把革命大批判持久地坚持下去，主动地、不停地向敌人展开进攻、再进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们必须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加强路线斗争教育，发扬鲁迅所提倡的“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结合各项工作任务，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狠狠地把这一小撮走资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个个都是批判家。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

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人人口诛笔伐，就一定能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 傅崇碧职务的命令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 (一) 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 (二) 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 (三) 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附)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人民日报》记者 张万来

人们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春天，北京发生了所谓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现在，经党中央批准，已经正式平反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从二十三日凌晨到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林彪宣布：“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江青叫嚷：“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进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她煽动说：“冲击中央文革，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抓什么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当场宣布撤了傅崇碧同志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又当众讲了这样的鬼话。江青一伙为了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对这一骗局又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指责北京卫戍区对“冲击中央文革的事情至今还没查清”，甚至说什么冲中央文革时，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车里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

这真是千古奇闻。事实究竟怎样呢？

原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是鲁迅书信手稿丢失了。三月五日夜，江青要傅崇碧等同志过去问此事。他们把调查的情况当面向江青、陈伯达报告，江青不相信，要傅崇碧同志派人继续查找。傅崇碧同志和当时北京卫戍区的几位

负责同志查来查去，结果还是这样：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来转移到文化部；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间，江青已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并且开具了收条。这些手稿已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保管。

傅崇碧同志为了当面汇报清楚这件事，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然后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传达室代为联系，得到允许后才驱车进入。路上遇到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江青一进来，就气势汹汹地吼叫：“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姚文元在一旁帮腔：“傅崇碧，你是没有请示。”傅崇碧同志想进一步说明情况，但根本不容他开口。真象林冲被骗入白虎堂，一场预谋的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江青的淫威，傅崇碧同志坚持说明了这些手稿和管理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江青却说不可能。傅崇碧同志把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条子交给她，并指出手稿存放的地点。这时，江青只好要姚文元把人叫来。保密员一来，江青不问情由，劈头就骂：“你是个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装着书信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来了。江青说：“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搬开，看看到底是不是。”箱子打开了，正是鲁迅书信手稿。江青随手翻阅一会，突然脸色大变，“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封存起来！”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天后，江青又对傅崇碧同志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我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关心，我们都是老同志嘛！”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即三月二十三日凌晨，林彪突然宣布傅崇碧同志调动工作，而且限令即刻离京。第二天，又升级了，宣布傅崇碧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撤职审查。此后，接连四次抄傅的家，并将家属、子女赶出北京。

第三天，江青写了一封亲笔信送给新任命的卫戍区司令员。收发室的同志不了解傅崇碧同志被撤职的情况，说，我们只有傅司令，没有别的司令，把信退了回去。江青闻言大怒，下令当天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她要亲自传达有关决定。接着，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同志的秘书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三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姚文元又下令逮捕傅崇碧同志的前任秘书，并要“询问傅崇碧和他们冲钓鱼台的情况以及他带进的厚皮包内藏的是什么”。其实，他携带的皮包装的完全是文件和办公用品，哪里有什么枪枝、子弹？

显然，这是江青一伙预谋的一个圈套，一场卑劣的政治暗算！

在上一个预谋的圈套正在演用的时候，另一个圈套已布置就绪了。那就是所谓傅崇碧派哈斯到北京大学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问题。

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北京大学两个群众组织写给中央的一份材料。三月八日晚上，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同志，带了两个同志到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员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同志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

这就是所谓到北大“强行索取材料”的全部经过。

谁能想到，就在哈斯同志奉命去要材料的同时，聂元梓这个反革命分子连夜向她的主子江青告急，造谣攻击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三月十一日，在一次干部会上，陈伯达与江青一唱一和，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准卫戍区的领导同志申辩。她还

逼迫哈斯等同志去北大当面道歉，同时要卫戍区的领导同志写书面检讨。

半个月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把这件事又端出来，并且捏造了许多谎言。明明是她派人去北大，却硬说是“傅崇碧派去的”；明明是要材料，却硬说是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明明是三个人坐一辆小汽车去的，却说成“几卡车全副武装的部队”；明明通过军训团的同志向群众组织商量要材料，却说成“强行搜查”，“使用了公安手段”。这样，傅崇碧同志就成了对上“冲击中央文革”，对下“镇压北大学生”的“罪人”，哈斯同志成了傅崇碧同志的“黑干将”。

三月二十八日，哈斯一到办公室，即被隔离审查。四月二日，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在中央党校的一份材料上，给江青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其中说：“我前几天就说过，我记得哈斯有问题，但一时记不起是什么问题。现在党校来信，揭露哈斯问题，使我想起此人是叛徒杨献珍、孙定国反对主席的黑干将。”“他们同杨、孙一起疯狂地反对主席的‘一分为二’和‘思维存在的同一性’。哈斯还写了文章。不知是谁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到卫戍区，对此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至少要监护起来隔离审查。”真是满纸谎言，恶毒诬陷。

人们不禁要问：林彪、陈伯达、江青和那个“理论家”为什么挖空心思，制造如此卑鄙的骗局，必欲置傅崇碧同志于死地呢？

这是因为，傅崇碧同志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地掌握着保卫首都的军事大权，深得周总理、叶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多少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少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他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当时社会动荡和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极大地障碍着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起初，他们妄图用谣言、恐吓、利诱的手段拉傅崇碧同志。这一着未能得逞，他们就罗织罪名，阴谋除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北京卫戍区八十多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等候开会。参加那次会议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在林彪讲话的时候，陈伯达、江青一伙象狼一样，恶狠狠地盯着周总理。他们喊的口号多是反对一年前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大声插话：“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会议结束，傅崇碧即刻启程，周总理送他到门口，语重心长，叮咛再三：“要保重身体，要经得住考验。”总理叮嘱有关人员好好照顾傅崇碧同志。

傅崇碧同志被撤掉职务，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七年。七年里，他受尽折磨，多次被审。在他被放逐的第二天，那个“理论家”就指使人要傅崇碧同志承认，他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同志。审问人甚至提出这样离奇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把贺龙送到苏联去？你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这些问话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老帅们包括贺龙同志，是开国奠基的勋臣宿将，对于他们，他只有尊敬和爱戴，哪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他跟着党和毛主席出生入死打江山，身上被敌人的子弹穿了七个窟窿，怎么说要反对毛主席？七年里，尽管扣发了工资，他每个月还是如数留出党费，在票面的一角注明月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竟没有人敢收他的党费。七年后回到北京，他才把积下的党费交给组织。七年里，周总理一直关怀着他，为他的问题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一九七四年八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怀下，傅崇碧同志回到首都，终于见到了周总理。身患重病的总理心情激动地说：“见到你太高兴了。”傅崇碧同志握着总理的手，哭了，总理的眼睛也湿润了。总理问他身体怎么样，嘱咐他先检查身体、看文件，好好学习，再谈工作。

回顾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非常明白：这是江青和林彪狼狈为奸，进行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他们为了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制造了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又炮制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老同志，然后把他们的死党、爪牙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位。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他们阴谋策划出来的。

现在，沉冤昭雪，林彪、“四人帮”也成为历史的沉渣。但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我们要牢牢记住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历史教训，这是值得深思的。

(原载 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

(附) 揭露江青的丑恶嘴脸 (节录)

——对《“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的一点说明

周海婴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原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通过北京市委、北京市文化局文革小组和鲁迅博物馆工作组，将鲁迅博物馆保存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以及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十五页手稿一齐调走，存文化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人帮”与林彪相勾结，在全国范围制造混乱，妄图进行反革命夺权。江青利用这一时机，指使戚本禹用中央文革的名义从文化部盗走了鲁迅书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全部手稿。当时，我们毫无所知。事后，鲁迅博物馆多次向我母亲反映这一情况。为了查实鲁迅书信手稿的下落，鲁迅博物馆曾经分别函询中央文革和戚本禹，均渺无回音。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的反革命原形败露。我母亲担心这批手稿遭到破坏，十分焦虑。同年二月十七日，鲁迅博物馆革命大联合勤务组再次写信给中央文革，要求追查这批手稿的下落，并请我母亲转交此信。三月二日，我母亲决定给中央写信，信中写道：“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十五页，书信手稿一〇五四封一五二四页（大部未印），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一九六七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拿走。现在我不知这些手稿究竟落于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佚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这是我母亲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口授完毕。三月三日上午，母亲由于深受刺激，心脏病急性发作，不幸逝世。当晚，我守在北京医院母亲的灵床前，沉浸于悲痛之中。敬爱的周总理来了，向我母亲的遗体告别后，又亲切地慰问我们全家。总理说：“我和许广平同志初次见面，大概在一九四六年。那时我们跟国民党谈判，我在上海的一家饭店里见到了她。”我把母亲的遗信直接交给总理。总理接过信，跟我们一一握别，这时已是深夜十一时半。半小时后，我们从医院回家。不久，周总理到我们家来了，从三月三日午夜到四日凌晨一时半，跟我们全家相聚了一个半小时。那时，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的反革命面目尚未暴露，他们也来了。周总理当场阅读了母亲的遗信，并指出要查清戚本禹盗信事件，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江青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嘴脸，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

要翻案。”周总理离开我家以后，召开中央碰头会，决定追查鲁迅书信手稿。根据中央碰头会的精神，派傅崇碧等同志提审了戚本禹。戚交代：是江青亲自让他去文化部取走鲁迅书信手稿，现放在中央文革的所在地。根据这一线索，又经过周密调查，终于从江青住处的保密室里查出了这批手稿。

(原载 1979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

〔附〕 大 树 参 天 护 英 华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

傅 崇 碧

周总理离开我们三年了！我常常以深深怀念的心情，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总理领导我们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革命逆流作斗争的日日夜夜。那时我负责首都卫戍工作，是同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两年。那些日子，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浪。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看到受过周总理关心保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带领群众斗志昂扬地迈进在新的长征路上时，怎能不深切地怀念周总理！

“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掀起打砸抢和抄家抓人的恶浪。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于林彪、“四人帮”煽起的这股邪风恶浪，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把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万里等几个负责人抓走了。总理得知，焦虑不安。叛徒江青得意洋洋，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败下风了吧？”周总理立即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卫戍区立即把人找回，要保护好被抓的人。我们很快找到了被抓走的人，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抓人的群众组织，给他们耐心地做工作，让他们把抓去的人交给卫戍区。我们按照总理的要求，制订好方案，报总理批准，把人送到总理指示的安全的地方。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利令智昏，他们哪里会听从总理的严肃劝告！他们煽起的打砸抢和抄抓之风有增无已。在他们的指使、蛊惑下，有一些人竟要把重病住院的罗瑞卿同志抓走。总理知道了，让我告诉这些人：“绝不能乱抓人！”为此，陈伯达、江青一伙对我施加很大压力，质问我为什么不让抓？为什么阻挠和压制“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你对罗瑞卿是什么感情，为什么保护他？为什么“开红灯不开绿灯”？等等。话是对着我讲的，实际上矛头指向

周总理，当时我回答他们：要是允许随便抓人，警卫部队就没法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警卫规定执行任务了！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总理的劝阻，还是想方设法把罗瑞卿同志抓走了。后来，经过总理反复做工作，才把瑞卿同志交给卫戍区。

从此，周总理更加注意指示我们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性。有一段时间，宋任穷同志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在辽宁的支持者带领一群人去抓他。他们事先进行侦察和预谋活动，在夜间突然闯入宾馆，直奔宋任穷同志住室。我们的警卫部队闻警赶去，那一伙人知道从楼道抓不走，便企图把宋任穷同志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楼房那样高，宋任穷同志年龄又大了，万一有点闪失，就会粉身碎骨！此刻，我们的警卫战士迅速赶到，才把宋任穷同志解救下来，把那伙人赶走。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非常关切地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受伤了没有？要求我们继续做好对宋任穷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不久，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毛主席、周总理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来北京谈问题，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把他们保护了起来。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又是蒙蔽群众开大会，又是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泄他们对在“七二〇事件”中支持群众的陈再道等同志的仇恨，并煽动一些人冲击京西宾馆。有一天，七千多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总理要我和卫戍区另一位领导同志先后赶到现场，并指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按事先制订好并经总理同意的方案，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讯号才能出来。同时，反复地给冲击宾馆的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去。但是，由于有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仍然不走。总理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总理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保证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打破了林彪、江青一伙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置于死地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在一次批斗会上，林彪的一个死党目无党纪国法，打了陈再道同志两个耳光。这一罪恶行径得到江青一伙的赏识，江青说他是造反派，有气魄。周总理当即严肃地指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不能这样干嘛！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打人、挂黑牌子等歪风，苦口婆心地给群众做工作，讲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和光荣传统，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

我终生难忘周总理对陈毅同志的保护。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林彪、江青一伙要剪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煽起了一股又一股打倒陈毅同志的妖风。周总理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他们策动一些人批斗陈毅同志，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同志揪走。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边，把陈毅同志保护起来。周总理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为了表明他的态度，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他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也离开会场。但有一伙人居然把陈毅同志抢走了，总理立即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救护出来。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一伙人围攻总理，扬言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同志，致使总理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总理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

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总理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揪斗陈毅同志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有一次，由陈毅副总理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正煽动一些人抓陈毅同志，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陈毅副总理对我们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到了饭店，我们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我们便把陈毅同志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我们用另外准备的车，从另外的门，把陈毅同志接回中南海。陈毅同志笑着说：谢谢你们了！这时，总理又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同志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

当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罗瑞卿同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折磨的时候，周总理要求我们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那股歪风，总理规定，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要挂黑牌子，不准游斗，不准抢走。后来还指示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要保障生命安全，等等。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提出的这些保护罗瑞卿等同志的措施和要求，这就再一次触动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经。他们在一次会上对我横加指责，说什么“群众要求”斗罗瑞卿，这是出于“义愤”，你为什么搞条条框框？江青破口大骂罗瑞卿同志是什么“反革命”，质问我：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懂吗？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罗瑞卿是十九兵团的，当过你的政委嘛！我说：我们是按中央指示办的，不遵守中央指示，我们怎样完成任务？以后，罗瑞卿同志几次住院做手术，林彪、江青一伙残酷地摧残折磨他，伤口还没愈合，就要他参加批斗会。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动大手术，我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手术期间不宜批斗的请示，很快得到周总理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的批准。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早就想把罗瑞卿同志置于死地。他们根本不顾总理一再指示，也不顾罗瑞卿同志病重身残，操纵一伙人，强行抢走，频繁地批斗，使罗瑞卿同志备受折磨。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

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工作，许多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代，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操劳。他常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有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我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总理对许多受到林彪、“四人帮”凶暴批斗的老干部、老同志，总是竭尽可能加以保护。他领导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交任务，还教方法。听说一位老干部被批斗，他告诉我们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万一发生危及被批斗人安全的事态，立即把人抢救走。有一次，他亲自指示我们要准备好一架直升飞机，当被批斗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运走。

周总理和聂荣致同志曾经指示我们，给科学家们增加警卫力量。但是，江青却说：为什么要保护“反动学术权威”？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策动一些人批斗一位对我国国防现代化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被接出家门时，总理要求我们向他报告情况。随后，在到达会场时、在大会进行中、在把人送回后，又多次要我们报告情况，直到这位科学家安全地回了家，周总理才放了心。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我们把徐帅护送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一九六七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那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同志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以后又亲自参与研究，给他选定一处隐蔽、清静、保密的住所，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保护起来。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和生活问题。但是，尽管有总理的极力关怀和保护，林彪、江青一伙还是加紧了对贺龙同志的迫害，设立专案对他进行审查，有关贺龙同志的事都改由专案组负责。他们多方刁难、折磨贺龙同志，经林彪的死党批准，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派了一个脑系科护士，冒充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同志的医生换走。在他们的折磨摧残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老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万万没有想到，我按照总理指示，保护毛主席领导下的大批老干部、老同志，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眼中钉，他们对我也下了毒手。我个人也亲身领受了周总理充满阶级深情的保护和关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假案，我遭受政治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的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仍然与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分别时，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他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我的生活。一九七四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我平反冤案，我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总理。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见到你太高兴了！我这个在炮火硝烟中长大的人，很少哭过，这时也禁不住流下热泪。我后来才知道，为了昭雪我的冤案，那几年，总理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这是多么令人铭心刻骨的关怀啊！

我回忆的仅仅是若干往事中的几件。对于总理的关怀和保护，许多老同志都有各自的亲身感受。我们的周总理真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啊！想起这一切，就牵动我对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特别是当我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或者一些重要活动，看到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们聚集一堂，共商党和国家大事的时候，就想起了总理的亲切教诲，想起了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当时如果没有周总理顶着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逆流，保护了这些老同志，他们今天会是怎样呢？真是不堪设想啊！

我们铭记着周总理的巨大关怀，就要学习他那伟大品格和崇高革命精神，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原载 1979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

〔附〕 杨 余 傅 蒙 难 记

董 保 存

引 子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首都东郊的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

坐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上的，有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叶群、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还有周恩来总理。

就是在这个会上，宣布了经毛泽东、林彪批准的中央文件：

- (1) 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 (2) 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 (3) 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就是在这个会上，江青宣布说：杨成武背后搞阴谋，搞小山头，搞极小极小的一个山头，而不是搞中国的大山头，世界革命的大山头。他招降纳叛。三月八日傅崇碧不经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什么问题！……他们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

就是在这个会上，康生说：杨成武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两面派、两面三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阴谋家。正如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所讲的，他反对罗瑞卿是假的，他本身就是罗瑞卿分子，他反对彭罗陆杨是假的，他本质就是彭真的亲信分子，彭真的黑帮分子。他反对贺龙是假的，他实质上是依靠贺龙，继续贺龙的路线，去夺取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夺取空军的大权……。

就是在这个会上，陈伯达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所谓

“五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击退去年的“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第五个回合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阴谋，把他们打倒了。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的前后，他们声称，打完这五个回合，便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了。

现在看，他们的“第五个回合”，纯粹是为了把要害部位的军权，夺到他们手中。总参谋长的位置自不必说。空军的机动能力强，又是林彪的小舰队所在地，不把空军政委搞掉，就不能把空军实权抓到手。卫戍司令的位置更为重要，对傅崇碧，他们很不放心。只有将这三个要害部位拿到手，他们搞政变、篡党夺权才会有重要的依托——“九·一三”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们的“第五个回合”，还有一个罪恶目的。就是想借此把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杨余傅”有后台，后台就是“聂、叶、陈、谭”。这些人在周恩来、毛泽东同志的保护下，还没有被他们彻底打倒。以反“山头主义”为名，先将“杨余傅”搞掉，看谁还听这些老家伙的！看谁还保护这些“老反革命”！

他们的“第五个回合”，是一个大骗局。既骗了当时不明真相的群众，又骗了深居简出的毛泽东主席。即使在十八年后的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知这个阴谋的真相，不知这个冤案的始末。

让我们将历史的日程，翻回到一九六八年三月，重新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气氛，重新看看林彪、“四人帮”的卑劣行径吧！

第一章 诡秘的“3·22”之夜

(1) 宫廷政变式的逮捕

一阵急促尖利的电话铃声，把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吵醒。他下意识地看看桌上的闹钟，时针已经指到一点钟。是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了。

他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空军司令吴法宪的秘书的声音：

“余政委休息了吗？”

“休息了。”

“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好吧。”

秘书答应着，赶忙穿好衣服，跑上楼去请余立金。

最近一段时间，余立金同志忙得不可开交，当晚十一点钟，还在听取空军所属院校学习两报一刊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情况报告。这会儿他刚刚睡熟。秘书知道，余政委之所以忙，是因为司令员吴法宪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空军的事情顾不过来。

两天前的夜晚，吴法宪曾打电话请余立金到他的客厅内，向他交底：

“空军的事情，你要多管。我在那边（军委办事组）忙得很哩。有些事情，你不用请示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余立金同志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说：“你是第一书记，应该报告的，一定报告，这不能含糊。”

吴法宪做出很真诚的样子，说：“你该做的，就做主吧，不必请示。”

余立金被叫了起来，他披着睡衣问：

“什么事？”

“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

余立金说：“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象。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说：“也是。”

走下楼梯，秘书问：“首长，还要不要叫上警卫员？”

“不要了，这么近。”余立金说着，走出楼门口。

秘书想，余政委和吴司令住的房子距离最多只有五十米，都是在首长住区内，住区的门口有岗哨，这里的安全是不会出问题的。也就没有再叫醒睡意正浓的警卫员。他年纪小，正是要多睡的时候。

走出余政委家的后门，门枢发出一声吱嘎声，秘书说：“明天跟他们讲一讲，把门修一下。”

余政委没有说话，大步向前走去。

北国初春的夜，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候。寒风吹在脸上，冰凉冰凉，更显得寒气逼人。

吴法宪家院门敞开着，两层小楼除了楼下客厅里有灯光，别处都是黑乎乎一片。客厅的窗帘很厚，透出微弱的灯光。

从院门口到屋门口有二十多米，院里种满了花草和果树。黑暗中显出灰蒙蒙一片。

快到屋门口时，冷不丁从黑暗中窜出四条汉子，为首的一个问：

“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回答他们。

这四个人忽一下扑来，其中两个扭住余政委的胳膊，咔嚓一下，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同志挥动着被铐住的手，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进屋去说！”

一支枪口顶在了他的背后。另外几个人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吴法宪的客厅。

这位红军老战士怒火满腔，对已经坐在那里的吴法宪说：“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凭什么铐我？”

吴法宪的五短身材从沙发上弹起来：

“铐你？铐你是好的！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的政委！你们要干什么！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2) 前来探病的吉姆车

余立金被非法逮捕的时候，杨成武一家人正在梦乡之中。只是他的秘书张庆忠同志接到空军余立金的秘书打来的电话：

“张秘书吗？我是单秘书。刚才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空军政委怎么能叫司令员带人铐起来？听到这特殊情况，张秘书觉得非同小可。他的反应是：要立刻报告生病在家的杨成武。

他站起身，又迟疑起来，猛然想起了今晚来探病的三位不速之客。

第一个是吴法宪。

吃过晚饭不久，吴法宪的黑色吉姆车来到杨成武的家。

秘书见吴法宪来了，正准备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嘿嘿一笑：

“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

吴法宪走后，秘书觉得空军司令员来汇报工作，还是需要向代总参谋长报告一下的。

秘书走进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将这一情况做了报告。杨成武说：“你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身体不好，不要让他来了。”

秘书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找到了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问：

“吴司令员现在哪里？”

“正在开会。”

“能不能找他一下？”

“恐怕不行。首长交代过，不能找人。”

“请你转告吴司令，开完会给杨代总长这里来个电话。”

……

第二个，第三个是林彪的秘书。

十二时三十分左右。门卫报告说：“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张秘书忙出来迎接他们。

两位来者单刀直入地说：“101（林彪代号）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他的病情如何？”

张秘书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我们来了，总得要见一见。”

林彪派人来探病，并且执意要见，秘书只好领他们走进杨成武的卧室。

杨成武在安眠的作用下，已经睡熟了。秘书把他叫醒。

林彪的两个秘书走到杨成武床边，一个说：“101对首长的病情很是关心，特让我们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他们又说了几句安心养病之类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他们，杨成武的秘书回到办公室。

刚刚打个盹儿，空军的电话就来了。这三个不速之客与吴法宪铐走余立金有什么联系吗？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杨成武的卧室。

接电话的是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听完秘书的报告，她很吃惊，说：“是吗？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哪里知道，林彪一伙的黑手，正在越来越近地向他们伸来。

凌晨二时许，驻杨成武家附近的卫戍部队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不许开灯，不许喧哗，由来人带领，一口气被拉到了景山。

与此同时，新来的部队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了楼里。咚咚咚的敲门声、喊叫声、喝斥声乱作一团。“出来！不许动！”“跟我走！”杨成武的家人象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赶进了楼下的客厅里。门口站了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人到了楼上，敲开了杨成武的门。

杨成武穿一身睡衣，站起来看了看他们。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李作鹏站在后边，眼睛被那副变色的镜子挡了个严严实实。他们身后的战士手执短枪，如临大敌。

杨成武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想问问总理是怎么回事。电话线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

“怎么回事？”他火了。

邱会作很有几分得意地笑着。

李作鹏仍旧在一旁不动声色。

“走吧。”随他们来的人催促着。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搞的？他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抬脚迈出屋门。邱会作带来的“警卫”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进厕所。

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外面发生了大的变故。他怒火满腔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的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几个人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

杨成武的这几句话，震慑了邱会作。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审判邱会作时，他还说：“想起杨成武的那句话，至今我还心惊肉跳。”

杨成武走下楼梯的时候，心情很不平静。两天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去世，刚刚火化。由于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将生父送去火化场，只能在父亲的遗体前肃立默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七十七岁的老母，此刻也被他们关在了客厅里。此去凶多吉少，需要和老母亲说两句话。母亲失去老伴，身体又多病，儿子若再有个三长两短，她能承受得了吗？

“我要跟我的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一个粗暴的小头目毫不客气地拒绝。

杨成武气得脸色青紫，他晃动着魁梧的身躯，用肩膀把讲话的人抗到一边——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大的劲头，竟把那人撞了个趔趄。

他走进客厅，望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坐在冰冷的乒乓球台上，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老人受苦受难一辈子，到晚年只希望儿子为她养老送终啊！

杨成武毕竟是久经考验的战将，他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这是吴法宪搞的！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

老妈妈点了点头。她听懂了儿子的话。

杨成武又对家人和秘书、警卫员说：“要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事情会搞清楚的。”

“快走，快走！”

杨成武走出屋门，见有辆黑色的吉姆车停在楼门口。车门打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邱会作捷足先登，钻了进去。李作鹏伸伸手，示意要杨成武进去。等杨坐了进去，他也紧跟着钻了进去。邱会作和李作鹏一左一右给他“保驾”。

车子在京城的小胡同里钻来钻去。杨成武警惕起来，问：“去哪里？”

“人民大会堂。”

“为什么往西走？”

“为了安全。”

这次，他们并没有骗他。车到西四后，转弯向东，经西安门，府右街直朝正南，到六部口往东，车的左侧出现了中南海新华门的卫兵，右侧很快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灯光。

杨成武的神经异常紧张。他不知道在这座雄伟的建筑物里面会发生什么。不过，这位有着五十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将军，自信地抿紧了嘴角，准备着迎接突然袭来的一切。

(3) 凌晨二时的突然任命

电报大楼的时钟，响亮地敲过了十二下，已是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十三日。

此刻，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楼里，第六层会议室里灯光通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及报社的负责人，正在讨论一篇即将见报的、号召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社论。

这里的气氛，显然不象外面红卫兵小将开会时那样热烈，那样激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可能是由于连续工作造成的疲劳，与会者不住地吸烟，扯几句与社论无关的话题。

忽然，会议室的黑色电话铃响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站起来接电话。电话是公安部长、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

“傅司令员，请通知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一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我们。”

傅崇碧答应着，心想，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间接见团以上干部呢？旋即又想通了，毛主席老人家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总理、中央文革的同志也经常是工作到凌晨，这会儿接见，又有什么奇怪的？

他马上让秘书通知司令部值班室，并且关照一位副司令，立即赶到大会堂，做接见的安排。

随后，他拿起电话，通知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又向开会的同志请了假，而后驱车直奔人民大会堂。

夜里一点多钟，是北京最宁静的时候。十里长街，华灯闪亮，路边偶而能见到一两个行人。西南风吹得撕落的大字报沿街飞舞。不知什么单位的广播喇叭，还在哇哇响着，断断续续地传来：“……与人民对抗……血战到底……决不收兵……”司令员靠在座位上，长舒了一口气，把眼前的情景和一年前的情景做了对比。那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红卫兵，挤在北京街头，乱哄哄的令人烦躁。现在毕竟安静多了。做为卫戍司令的他，希望这座大都市宁静，而不是混乱。

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卫戍区的干部已经齐刷刷地坐在那里。几位当时军队总部的负责人，站在队伍前面，小声说着什么。傅崇碧一问，才知道林彪正在同“中央文革”成员开会。

他问一位副司令：“他们（指团以上干部）吃饭没有？”

“现在，”副司令看着手表，“什么时候的饭？”

傅崇碧知道，等待接见，时间是没有准的，有时要等两三个小时。他转身去找人。

正好，汪东兴从对面走过来。“汪主任，这会儿他们都饿了，你能不能给搞点吃的？”

汪东兴看看表，说：“可以拿些点心来吃。”

不一会儿，服务员抬来了四箱点心。傅崇碧笑着对干部们说：“快来吃，不吃白不吃哟！”

他和李天佑，王新亭副总长以及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聊起天来。傅崇碧对刚来的温玉成说：“有总部的人参加接见，你把他们安排在前面，争取让所有的同志都能看得清。”

温玉成说：“行，今天人不多，好办。”

正说着，郑维山从小会议厅走出来，他的脸色很不好，象是同谁吵过架。

“刚才，我到小会议室去，他们……”

“怎么了？”傅崇碧问。

“林××问我：‘谁叫你来的？’”

傅崇碧想得出，他当时一定很窘。忙问：“他发火了？”

“嗯。”

“看来我不该通知你来，可你是首都工作组的，应该来的。”

郑维山摇摇头。

这时，叶群来了。她本来就有些发胖，今晚显得更臃肿。她把傅崇碧叫到一边，问：“谁让你通知郑维山来这里的？”

“没有谁叫我通知。谢富治说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卫戍区的团以上干部，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告诉首都工作组的人。”

“没叫你通知，你就别通知。”叶群气呼呼的。

“叶群同志，我通知他来，有什么错吗？”

叶群不回答，转身走了。

这时，傅司令员已经感到这里的气氛不对头。接见这里的团以上干部，为什么不能让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来？更不要说他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了。即使是不应该来，也不值得为这种事情发脾气呀。

事情，并不象傅崇碧想得那么简单。他正在沉思，周恩来在叫他的名字：傅崇碧——

他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到里面谈。

走到小会议室门口，周恩来站住，深沉地说：崇碧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不要激动。

傅崇碧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将有严重的情况发生。他知道周恩来这几句话的分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突然情况不断出现，这次，又会是什么？

小会议厅内摆了一圈沙发，沙发上坐着“中央文革”的全体人马。周恩来领着傅崇碧，径直走到靠近窗户的沙发。见他们进来，别人都不再说话。

林彪从外面走进来，占了周恩来本应该坐的沙发，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开始和傅崇碧讲话：

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主要负责北京卫戍区，接任你的工作。

这个调动的命令来得太突然。傅崇碧司令员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决定。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块空白。

没等他做出反应，林彪站起来，对“中央文革”的全体说：走，我们去接见团以上干部。周恩来对傅崇碧说：你可以和沈阳来的陈锡联同志谈谈。

林彪带头往外走。“中央文革”的人都跟在他的身后，走出小会议厅。

会议厅内，只剩下傅崇碧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

总理让他们谈一谈，谈什么呢？

沉默了一会儿，傅崇碧找到服务员说：“给拿点水果来吃吧。”

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端来一盘桔子，转身走了。空荡荡的会议室里，仍旧只有他俩。他们一人拿了一个桔子，慢慢地剥着。剥呀剥呀，剥了十五分钟还没剥完。

“这桔子不错？”

“嗯，味道还可以。”

……

过了好半天，周恩来和谢富治带着秘书走进来。周恩来看着手表，然后对秘书说：通知他们弄夜餐。

秘书走后，四个人又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向健谈的周恩来，今天也变得沉默寡言了。傅崇碧心里很不痛快，就问：

“总理，这调动工作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不是跟你谈过了吗。

“那算什么谈话，宣布了命令，别的什么都不跟我讲。”卫戍司令心中有火，在当时的情况下，居然敢直陈不满。

周恩来正要说什么，有人进来，说：“总理的电话。”

周恩来起身到外面接电话。留在屋里的三个人，依旧默默地坐着。

等周恩来回来，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傅崇碧想着：这样调动工作，太不正常。

周恩来回来，刚坐下，又有人来请：“总理，您的电话。”

周恩来又出去了。

看来是谈不成了。

等周恩来进来，服务员已经将夜餐摆好。

餐桌上，一盘点心，三碗面条，香味扑鼻而来。傅崇碧一点食欲都没有。这个十五岁就参加红军的将军，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调动，对这次调动，他实在想不通，哪里还有心思吃饭？

周恩来一定让他多吃一点。“吃饱了饭，才能有革命的本钱嘛。”

傅崇碧强咽下去几口面条，说：“吃好了。”无论别人怎样说，他再不肯吃了。

周恩来看着他，他看着周恩来，周恩来似有难言之隐。自从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以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了些工作，他知道当总理这个角色，难啊！

周恩来站起来，说：崇碧同志，飞机准备好了，上任去吧。

上任去？就这样走？他又看看周恩来，周恩来的表情极为复杂。他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往调动工作，要办交接手续，要做动身准备。除非有紧急情况是不会连夜派飞机去的。从他们谈话的情况看，绝不是东北方向出了问题，需要我傅崇碧解决。那么，为什么呢？

“就这样走？”

“嗯。”

“我想不通！哪有这样调动工作的！”傅崇碧的声音在小会议室里回荡。

周恩来不劝他，也没有批评他，而是问：你要不要回家拿点东西？

“不要！”傅崇碧发起火来，是不管不顾的。

“要不要给家里写几个字？”

“不写！”

周恩来拿来一张纸，对傅崇碧说：你给家里写几个字。

“崇碧同志，叫你写，你就写。”

陈锡联也劝说：“写几个字吧，要不家里人着急。”

傅崇碧想了想，接过秘书递过来的纸笔，飞笔写下两行字：“黎虹：我调沈阳工作，到那里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写信。傅 3月22日”

写好，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对秘书说：要卫戍区的同志一定送到。

周恩来送他们走出会议室，来到北大厅。

周恩来来说：我不送了，锡联同志送你到机场。

说罢，他伸出手，与傅崇碧重重地握了握，又说：革命工作有的是。现在，你身体不好，先把身体搞好。你要经得住考验。

傅崇碧感到，周总理的手握得特别有力量，很有点诀别的味道。傅崇碧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周恩来又对陈锡联说：锡联同志，他身体不好，你要照顾他。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你给解决。

锡联说：“总理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周恩来走了。傅崇碧和陈锡联走出人民大会堂。外面的华灯还是那样明亮，广播喇叭的声音仍旧时断时续。

三辆黑色轿车，刷刷刷地开到了门口。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大个子军人。

傅崇碧一看，秘书不在，警卫员也不在，车子也换了。

大个子说：“请上车。”

从车的另一个门，又下来两个一米八〇以上的高个子军人。

“这不是我的车。”傅崇碧继续寻找熟悉的车子以及秘书、警卫员。

“这就是接你的车。”大个子重复了一遍。

陈锡联走到前面一辆车前，对傅崇碧说：“这是接你的车子，坐吧。”

傅崇碧已经明白，调动很可能是个骗局，但是怎样一个骗局，他还看不透。

他迈进轿车，前面坐着一个大个子，左右各有一个大个子保驾，他被夹在中间，不能动弹。

轿车飞也似地向西开去。过新华门、西单……出西直门，直奔西郊机场。急剧的变化，使傅崇碧冷静下来，他需要认真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西郊机场休息室。

服务员端来咖啡，傅崇碧不想喝，他说：“找支烟抽抽。”

不知为什么，他特别想抽烟。

一个脸上有浅白麻子的团长，立即令人取来了香烟。

休息室内的红色电话响了，声音尖利刺耳，团长急忙去接。

“喂——中央文革？是。”

听筒里声音特别响，是谁听不清，但说什么，休息室内都能听见：

“第一架飞机走了没有？”

“已经起飞。”

“第二架呢？”

“正在发动。”

“马上起飞！”

“是！”

“嘟嘟嘟……”听得见对方扣过电话之后的急促的忙音。

团长过来，立正敬礼。

“报告首长，飞行动动了，请登机。”

陈锡联对傅崇碧说：“不要急，天冷，把咖啡喝了。”

傅崇碧站起来，说：“不喝了，走。”

他们走到停机坪，沈阳军区来接他的人正在等候。飞机的螺旋桨转个不停，显得风很大。傅崇碧打了个寒噤。

陈锡联脱下披在身上的大衣，说：“你穿上它，冷。”

“不要！”

“穿上吧。”

陈锡联已经把大衣塞到他手上。他接过大衣，心想：发火也不应该朝他发，他回身同陈锡联握手，然后登上飞机。冷风掀动着大衣的衣角，直往他身上吹。

第二章 紧锣密鼓掀“后台”

(4) 你的后台是“聂、叶、陈、谭”

杨成武被弄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地上铺着地道的和田地毯，墙壁上的装饰充满了维吾尔族的色彩。过去走进这个厅时，总有一种新鲜的边疆气息。今天，杨成武却感到这里的气氛令人窒息。

周恩来、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二十余人都坐在里面，中间有个位子，好像是留给谁的。

林彪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平时好拉腔拿调的，这次一反常态，讲话干脆，也很有力量。

江青跳了起来：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

江青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也跳了起来：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的样子挺斯文，讲起话来却恶狠狠的：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夫子”把眼镜往上抬一抬，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帐是赖不掉的！

叶群发言的声音很大很响。由于激动，她的嗓子哑了。她用沙哑的声音嘶力竭地叫喊：

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说着说着，她带头叫起口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了支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听不下去。诬蔑、造谣、栽赃……他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

“我说几句——”

江青挥着手，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嚷起来，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杨成武没有再说什么，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三辆小汽车，把杨成武押解到机场，那里一架伊尔十八型飞机在等着他。车上坐着一个班抱冲锋枪的战士。

这些战士倒很客气。他们问：你喝水吗？这里有水。”

杨成武摇头。

其中一个大个子干部说：“不要着急，能休息就休息一下。”

(5) “反戈一击，还可以出来工作！”

傅崇碧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

又来了三辆神秘的轿车，来接他们。傅崇碧对沈阳不太熟悉，再加上车上有窗帘，三拐两转，他不知转到了什么地方。

汽车在一座灰色的砖楼门口停住。事先安排好的“秘书”、“警卫员”在等待着他。在他们的簇拥下，傅崇碧上了楼。

沈阳部队的一位负责人对他说：“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不要下楼。”

傅崇碧发现，这里有两道岗，屋门一道，楼下还有一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对沈阳军区的人说：“是叫我来这里工作的。这怎么工作？”

“这是上头的安排。”

“谁安排的？”

“上头。你不要问了。”

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在看着他。什么调动工作，纯粹是骗局！天大的骗局！

他马上联想到内蒙军区的几位副司令、副政委。他们不就是因为得罪了“中央文革”的几个人。要求和总理谈话，就被抓起来了吗？

他又联想到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康生“接见”他的时候，不等赵永夫同志说完，康生就板着个脸说：“我一看你就象个特务！抓起来！”

……

他明白自己是被关押了，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了“阶下囚”。昨日还是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兼卫戍区司令，今天被关在了这里，失去了自由。这一切，太令人猝不及防。

“专机不能走，我对他们有话说！我要给中央写信！”他对“秘书”说，“给我纸、笔！”

他铺开纸笔，信手写道：

主席、总理并中央文革：

现在，我被关在沈阳军区，不明白为什么把我看出来。我是个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老战士，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就坚决照办，绝不会有二话。如果我犯了错误，主席、中央都可以处分我，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我不会有怨言。我希望你们派人来同我谈一谈。如果是我有错误，我自然接受处分，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向中央说清楚。有些事情，我可以为调查提供线索……

信送走后，他在房子里踱起步来。他怀着一个老战士的良好愿望，期待着中央派员来。

然而，时间是最无情的。它依旧是黑了明，明了黑，一分一秒也不停留。傅崇碧等了六七天，仍旧没有消息。

他烦躁极了，对警卫说：

“屋里太闷，我要出去走一走。”

“不行。为了你的安全，上级命令我们不许你出去。”

跟战士发火吗？不，不应该！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

他忍住火气，请求把窗户打开一点儿。

战士不敢打开大窗户，只把上面的一个小窗户打开。他呼吸着透进来的新鲜空气，听到外面传来的口号声：

“……打倒变色龙……”

“打倒小爬虫！……”

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莫非他也……他仄着耳朵再听下去。

“打倒杨余傅！”

杨余傅又是什么人？他意识到，傅可能是指自己，可杨是谁？余是谁？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是哪个单位的宣传车又开过来了，哇哇直响。他静等着宣传车开走，又听清了人们的喊声：

“打退二月逆流新反扑！”

“打倒傅崇碧！”

他终于听清了。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的打倒目标，已经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声讨的对象，自己还蒙在鼓里呢。

“打倒杨余傅！”

“打倒杨余傅反党集团！”

“好了，好了，该关上了！”

“秘书”走进来，要他把小窗户关上。

他厉声说：“我还没被判死刑呢，就不许透空气了？透透空气有什么关系？”

“不行，关上！”

砰一声，小窗户关了个严严实实。他又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世界。

隐隐约约，还是能听到口号声。他忽然觉得有些滑稽、外面呼口号的那些人，未必知道傅崇碧是怎样一个角色，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更不知道他们自己被人愚弄了！

这就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气愤。满肚子的气，没处往外撒，手指头攥得嘎吧嘎吧响。几天前，他还指挥着北京所有的卫戍部队；现在，却成了手无寸铁，可以任人欺凌的囚犯——这难道是正常的党内斗争吗！

关着的房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是傅崇碧认识的一位军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们就打过交道。他带了两个从北京来的人，进屋就坐在桌子前面说：

“我代表沈阳军区来看你。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运动正进一步深入，你应该看到目前的形势。”

傅崇碧沉默着，听他信口胡说。

“你近来交代得怎么样啊？”

“没什么可交代的。”

“这种态度可不好。”

“就这态度。”

“你看，这是什么？”

北京来的人举起一张放大成十二吋的照片。傅崇碧一看，这不是我办公桌玻璃板底下的照片吗！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和他的合影——

照片上几位老帅朝他微笑着，亲切、自然。

“看清楚了吧？”

“我办公桌玻璃板底下的，早就看清楚了。”

“你要站在革命一边，反戈一击，还可以出来工作。”

“反戈一击，向谁反戈一击？”

“这你明白。”

“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有什么可反戈一击的？”

“朝他们反戈一击！”对方用手拍打着桌上的照片。

“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是开国元勋！”

“事到如今，你还坚持反动立场，这样下去是没有好结果的！”

这话，如果出自一个稚童之口，或者出自一个“红卫兵小将”之口，傅崇碧都能够容忍。

但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党龄和军龄的人，他不能再忍下去了。

“我关在你们沈阳，攥在你们手心里，要杀就杀，我不在乎！叫我反戈一击，叫我诬陷别人，没门！”

啪的一声，对方拍响了桌子，吼道：“你的造反精神还很厉害！你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坏蛋！”

傅崇碧忽一下站起，怒目圆睁，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墨水瓶跳起一寸多高：

“你放屁！”

对方被骂得脸红脖子粗，嘴唇直哆嗦。

“你他妈混蛋！”

“我×你个娘！”卫戍司令用战场上骂日本鬼子，骂美国佬的语言，回敬这个败类。他存心要把这些人激火，激火了他们，就可以尽快处理了。不管怎样处理，也比闷在这小房间里强。

对方被骂得脸色发紫。“你……你……你等着！”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怒气冲天的卫戍司令，嘶啦一声解开衣服扣子，露出伤痕累累的胸膛，说：“你们有种，朝我这里开枪！日本人、美国人没能打死我，我等着你们把我打死！”

……

那伙人灰溜溜地走了。朝外走时，还说：“看你猖狂几时！”“非得给他点厉害瞧瞧！”

……

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伙人没再露面。“警卫”的面孔却愈加严厉了。晚上睡觉，要开一支二百瓦的大灯泡照着。白天上厕所，也要有人跟着。这些监视的人不同他对话。他又不能同他们发脾气。如同生活在沙漠里——这种滋味儿，没有经受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他抗议，他叫喊，可向谁抗议，向谁呼喊？真个是有怨无处诉。严酷现实迫使将军冷静下来，认真思索着，“反省”着，目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第三章 在毛泽东身边

(6) 难当的“联络员”

历史上有过很多巧合的现象。

一九六七年七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住过武汉的东湖宾馆。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又被押送到这里，所不同的是，上次住地上，是设备相当豪华的首长区。这次却是关在不住人的地下室。

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至今，不到三年的时间，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

一九六五年底，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所谓解决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会议。这个会上，林彪一伙发难，对罗瑞卿同志搞突然袭击，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在这个会议之后，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

会上杨成武很诚恳地对他们说：“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最好由叶帅兼任。”

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这样定了，主席已经同意了，不变了。”

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

他当副总长。”少奇同志表示原则上同意，命令以后再下。

回到北京后，杨成武还是觉得不适宜担任代总长，又正式给军委，中央写了报告。希望叶剑英同志兼任总参谋长，自己给叶帅当助手。

这个报告，送到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手里，便被扣住了。叶帅找他去，对他说：你的报告，我不同意送，定下叫当代总长，这是中央决定的，你就不要推辞。

刚开始，杨成武同许多同志一样，真心实意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紧跟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认为“文革”是“反修防修，使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政治行动。”因而工作是比较积极的。他认为，既然主席、中央让我当代总长，我就要尽力干好。

在那个年代，许多同志对毛主席的指示，是坚决执行坚决照办，不打折扣的。他们忠于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有时是盲目崇拜。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杨成武逐渐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林彪江青一伙同各位老帅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做为代总长的他，经常处在“夹缝”中。

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杨成武的这种感觉更为明显。

毛泽东外出巡视，是在人民大会堂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政治局大碰头会上定下的。这次碰头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毛泽东坐在靠近窗户的、处于中间位置的沙发上。不停地吸着烟。林彪坐在他的旁边，煞有介事地拿笔在纸上画着。康生板着脸，一副令人莫测高深的表情……

周恩来讲完话，毛泽东说：

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并且提出让杨成武跟他一起出去。

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理由很简单，为了他的安全。

周恩来也劝毛泽东：大家都说你不去为好，还是不要去了吧。

林彪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主席呀，你的身体是没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林彪说完，又有几个人发言劝主席不要出去。

毛泽东对参加碰头会的这班人的意见，没有简单地否定。但他要做的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都难以使他动摇。

他微笑着把烟按灭，说：没有关系的。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此刻，杨成武正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听毛泽东叫他，他忙站起来。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恩来把杨成武留下来，对他说：你的任务是当好联络员和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做为代总参谋长，跟随毛主席出去，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行程是很紧张的。

从凌晨离京开始，他请了许许多多的人来汇报情况，找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了解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似乎要对这场运动的规模、进程做出相应的决定。

一天，他把杨成武等人叫到自己办公的房内，同他们谈了对“文革”的一些意见。

针对沿途及武汉等地群众组织派仗越打越厉害的情况，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他具体谈了“文革”进程问题，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

杨成武感到，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同。毛泽东要三年结束这场运动，而那些人希望越乱越好，打倒的人越多越好。拖的时间越长越好。

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从六六年算起，到六八年就满三年，眼下已是一九六七年盛夏，各地的派仗打得正激烈，要把已经燃起的烈火压下去，有可能吗？

毛泽东的话，是最新最高指示。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在武汉，毛泽东一直想横渡长江，一九六六年七月，他“万里长江横渡”，和跟随他一块畅游的女青年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去年，他老人家七十三岁，还在锻炼自己的意志和体力，今年，他自以为并不比去年老多少，他还应该享受“极目楚天舒”的乐趣。

由于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王力扣了起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毛泽东的横渡计划只好作罢，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这期间，毛泽东的一些精辟的见解，使杨成武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当时这“四个伟大”被吹鼓手们吹得天花乱坠。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争相转载、刊印，还被制成“语录牌”到处悬挂。就连毛泽东石膏塑像的底座上，也刻上了“林体”的“四个伟大”。

谁封我四个官啊？毛泽东的谈吐富有幽默感。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他的这种幽默是比较熟悉的。几天前，他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开了个很有意思的玩笑。

记者和他的妻子同在新华社工作，“文化大革命”打派仗，两人参加了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是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大家都被毛泽东逗笑了。

现在，他说封四个官，却没有人笑。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屋子静得可怕。这恐怕是在座者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叫人们吃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没人发表任何见解。

此后，杨成武随毛泽东散步。林荫路上，很安静，没有鸟声，也没有蝉叫。

毛泽东问：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不会反对你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是指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曾组织数十万人到首都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归来。王力被捧为英雄。紧接着，“中央文革”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声讨“百万雄师”，声讨陈再道。

这消息，毛泽东是知道的。杨成武也是知道的。

他又往前面走了一段，问：

陈再道现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总理。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是保陈再道。而林彪、江青、王力、谢富治是要置陈再道于死地。

杨成武说：“好，我马上报告总理。”

毛泽东又指示说：你报告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

杨成武很快将主席的指示报告了总理，他们才被保护起来。

“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将‘八·一’做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做建军节。”

毛主席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还是由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

他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受命回到燥热的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北京，叶群见到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叶群带点讥讽的口气说：“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杨成武只好同她客套两句。

“主席最近讲到林总什么事了没有？”

杨成武马上想起“谁封我四个官啊……”也想起：“什么永远健康……”

这些话，能对叶群讲吗？不能。将军摇摇头说：“没有讲什么。”

杨成武不知道，他因此得罪了这位“林副主席”的联络员，也得罪了林副统帅本人。

此后，毛主席又几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说：一九六八年春或稍迟些开党的九大。为此，要尽快解脱老干部，象邓小平、贺龙等老同志都要当选中央委员。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 118 号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再次谈了一九六八年春天结束“文革”、开党的“九大”的想法。并且指示周恩来负责筹备工作。

这个会，“中央文革”的人和叶群一伙是参加了的。这个会对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不啻是重大的打击。

周恩来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工作，为解脱老干部的问题在怀仁堂召开了会议。具体做出了许多部署。

当时，中央下边有许多专案组。比如饶漱石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等等。这些专案组大都由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当组长。要迅速解脱一批老同志，“专案”就要搞清楚，搞清楚了才能继续当中央委员啊！

所以周恩来提出分出十个专案给杨成武，要他帮助尽快搞清这些专案的所谓“问题”。

杨成武觉得自己搞不了这种事情，就对总理说：“我没搞过这类事情，是不是请别人……”

总理说：你是不是想要我累死！帮我做点工作嘛！

杨成武看着周恩来日见消瘦的面容，只能答应了。

——这就是所谓中央专案“二办”的最初由来。

“文革”做为一场政治大浩劫，经常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二办”是想结束这场运动，尽快解脱老同志。谁能料到，杨成武接受任务以后，还没来得及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开展工作，甚至连十个专案组的情况还没完全搞清楚，就被抓了起来，于是，“二办”被林彪的死党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把持，成为了以后专整军队老干部的黑帮底。

(7) 动乱中的卫戍司令

江青一伙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这些老同志——这一点，做为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看得比较清楚。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同江青、林彪抗争，但他还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有时做得比较巧妙，有时做得不那么巧妙，因而常被江青一伙责骂。

黄克诚同志被“监护”起来后，有七八个人组成的专案组每天都在对他进行折磨。老人患有习惯性便秘，再加上吃不到蔬菜水果，常是每个星期大便一次。

他请求专案组的人给买些水果，专案组置之不理。他悄悄写了条子，叫同情他的警卫战士送给傅崇碧。傅崇碧看到条子，说：

“给他买些苹果，用他的钱嘛，谁也没有规定受监护不许吃水果。”有了司令员的指示，警卫战士买了一兜苹果，准备给他送去。

“不能叫专案组的人知道。”他叮嘱那个战士，“吃了苹果，要把苹果核藏起来。”

不知怎么搞的，专案组发现了黄老屋里有苹果核，立即顺藤摸瓜，查出了苹果。问题反映到“中央文革”，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

江青、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的脸色都很难看。江青质问他：

你们卫戍区是怎么搞监护的？

傅崇碧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的纰漏，只好低头不语。

“谁给黄克诚买了苹果？”

“他自己的钱，让战士买的。”傅崇碧说，“监护，又没规定不许为他代买东西。”

陈伯达说：“有人反映，你让彭德怀的亲属给他送了东西，这你怎么解释？送进去的是什么？很可能是攻守同盟！”

彭德怀同志的侄女，的确给彭总送过衣服等生活用品。这事，傅崇碧也知道。

江青又说：你的胆子好大，敢叫刘志坚的老婆给他送药，让他们在一起过夜。

傅崇碧解释说：“刘志坚病了，他老婆送药去，很晚了，住了一夜。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是夫妻嘛。”

“夫妻，夫妻，一对老反革命！”

傅崇碧说：“上头规定的监护纪律，并没有说不允许这样。再说，旧社会的监狱也还许可探监的……”

“你胡说！你把我们比成旧社会！”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其火。

傅崇碧赶忙说：“我不是把现在比成旧社会，我是说……”

“我不听！我不听！”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象疯子一样，又是跺脚，又是尖叫。若是第一次见到她这个样子，谁都要吓一跳。

“你要检讨。这样下去不行的！人家反映，你把监护对象当成上宾来招待！”

在座的周恩来见江青没完没了，故意把话题转向别处。这样才使得傅崇碧躲了过去。

他们朝傅崇碧发脾气，不仅是因为上述这几件事情。还有一些事情也让他们坐卧不宁，十分恼火。

有一天，聂荣臻元帅把傅崇碧叫了去。

聂荣臻很是难过地对他说：“现在，造反派什么都冲，揪斗搞原子弹、导弹的专家。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没有他们，我们的原子弹能爆炸吗？”

“聂总，你的意思是……”

“能不能把他们保护起来，叫他们继续搞科研……”

“能。我加一个连的兵力，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派了一个加强连，把这些人“看”了起来。

这事情传到“中央文革”那里，傅崇碧被诬为“接受聂荣臻旨意，保护反动学术权威”。

贺龙元帅的家被红卫兵冲了之后，曾一度在中南海住着。有天晚上，周恩来把杨成武找去，对他说：“贺龙同志住在这里不是个办法，你要找个地方，叫贺龙同志住进去。”

杨成武提议，把贺龙转移到京郊某地的一个战备指挥所。

周恩来说：“可以。外面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你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事情定下后，杨成武找到傅崇碧，叫他想法转移贺龙。

傅崇碧连夜派人将贺龙隐蔽起来……

没多久，贺龙发起高烧，警卫人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傅崇碧。他又急忙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说：要送 301。可是……

周恩来似有难言之隐。停顿了一会儿，他说：这样吧，在钓鱼台开会的时候，你把这个情况讲一下。

傅崇碧说：“我讲不合适吧？”

“你讲好一些。”周恩来苦笑了一下。

周恩来总理叫讲，那就讲。

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正在开会。会议要结束时，傅崇碧把贺龙生病的情况通报了，并且建议把贺龙送到 301 治疗。

江青一听就发火：他是什么东西？一个大土匪，还能住 301？他没那个资格！

康生说：“不行，不行。他不就是发发烧吗，还值得进 301？301 可不是给这样的大土匪开的。”

他们一致反对，301 是住不成了。怎么办呢？

散会后，周恩来叫住傅崇碧，说：你想个办法，北京军区的医院能不能住？

“军区总院也造反了。”

“还有什么地方？”

“五棵松那儿有我们警卫一师的医院，比较安静，估计能行。”

周恩来说：好。你亲自去落实。药品不够，找我的保健医生。

接受了周恩来下达的任务，傅崇碧火速赶到警卫一师的医院，看好房子，派了一个炊事员，又对医院和师里的负责人专门交代了保密注意事项。

贺龙住进医院后，经过精心治疗，很快退了烧……

这消息，也传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耳朵里。

没多久，发生了红卫兵冲京西宾馆的事件。

那天清晨，数以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把京西宾馆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口号声震耳欲聋：“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不揪出陈再道决不收兵！”

傅崇碧和卫戍区的其他领导同志赶到那里，很是惊异：陈再道等同志刚刚来到北京，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警卫战士在门口挽起胳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耐心向红卫兵解释，都无济于事。第一道防线快被冲垮，红卫兵已经涌到楼前。情况万分紧急。

傅崇碧等人驱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说：我写个条子，黄作珍，你去宣布，要他们马上退下去。

周总理说着，挥动毛笔，写了三条意见。

第一，冲京西宾馆是错误的。

第二，必须马上退回去。

第三，我可接见他们。

黄作珍拿了周恩来的指示，赶到京西宾馆，用广播喇叭喊了半天，找红卫兵头头苦口婆心谈了好一会儿，仍旧不解决问题。红卫兵的拳头已经开始向卫兵打去。

傅崇碧当即命令卫戍一师副师长：“把冲进楼里的人赶出去！把陈再道等人锁进电梯里，切断电梯电源。出了问题，拿你是问！”

这时，红卫兵已经冲进楼里搜人了。

卫戍区的负责同志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傅崇碧说：“要解围，必须请戚本禹、谢富治不可，他们和这些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密切。”

“是这样？”周恩来顿时明白了什么，立即叫秘书把谢富治、戚本禹等人“请”来。

周恩来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现在，红卫兵冲进了京西宾馆，我写了意见，叫卫戍区的同志去做工作，他们根本不听。好了，这事情我不管了！京西宾馆冲坏了。你们要负责！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周恩来气得双手抱在胸前，口气异常严厉。谢富治、戚本禹本来就心中有鬼，见周恩来真的生了气，连忙答应，马上去京西宾馆做学生的工作。

.....

他们走后，总理问傅崇碧：陈再道同志现在哪里？

“锁在电梯里，电梯断了电。”

总理忍不住笑了，说：你这个办法好。

为了保护老同志，周恩来可谓绞尽脑汁，同“中央文革”的人进行巧妙的斗争，有时甚至是周旋。

一天深夜，傅崇碧又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

周恩来的脸上满是倦容。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把一张纸递给傅崇碧。说：这些同志正受到冲击，造反派中的坏人要抓他们，揪斗他们，要想个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傅崇碧看看总理开列的名单上，有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多位国务院部长以上的干部，他已掂量出手上这张纸的份量。

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要斗倒、斗垮、斗臭、斗死的人。把这些人保护起来，会扣什么罪名，傅崇碧清楚。然而，这些人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傅崇碧心里也清楚。他们当中，有的人傅崇碧熟悉，有的人傅崇碧并不熟悉。他凭着一种老同志的感情，本能地觉得他们不是坏人。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

“东高地的营房比较安静，也安全。先把他们转移到那里行吗？”

他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并且指着地图上这片营房的位置请周恩来看。

“我看可以，要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要快办。”

傅崇碧点点头。他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让他们吃干部灶，安排他们打好扑克。”周恩来又叮嘱一句。

傅崇碧接受任务后，很快调了三辆汽车和几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亲自给他们交代任务，要他们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把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内小胡同里的三十几位老同志接走。

突如其来敲门声，把这些同志惊醒之后，很多人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警卫战士无法跟他们做详细的解释，就把他们拉上了汽车。

三辆汽车开着的雪亮雪亮的灯，在黑暗中映出一条亮堂堂的路，载着几十名受冲击的老同志，进了东高地卫戍区某部的营房。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到这时候才明白了怎么回事。两天之后，傅崇碧又到东高地营区内，对这里的负责同志说：“第一是要保证安全，第二是要搞好伙食。搞不好，就找你们！”

东高地的事情刚刚安顿好，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通知，立即到钓鱼台开会。

轿车飞驰着进了钓鱼台东门，停在那座灰色的小楼前。

走进会议室，他就察觉到气氛不对头。屋里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人。他们似有什么急事，等着他的到来。

傅崇碧进屋敬了个礼，就听陈伯达叫了一声。他说什么，傅崇碧没有听清，这个人的话极难懂，和他说话，必须全神贯注。即使全神贯注，有时还是不能全听清楚。

“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

他又重复了一遍，傅崇碧才听明白。

看他咄咄逼人的样子，傅崇碧反问一句：“哪些人？”

江青马上站起来，说：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江青说起话来象打机关枪，唯恐别人打断她的话。

傅崇碧偷偷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对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傅崇碧不敢过多猜想。但他们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感情上，他是站在周恩来一边的。

“我不知道。”傅崇碧沉思了片刻后，大声说。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也来质问他。两只金鱼似的眼睛，象是生了气的蛤蟆，一鼓一鼓的。

“我的确不知道。”

康生的眼镜下面，一双眼睛闪着凶光。他把手往茶几上重重地一拍，说：“他们到哪里去，你应该知道。”

陈伯达连唬带诈地说：“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晓的，我们早知道了。你说，是谁让你把他们转移的？是谁？”

傅崇碧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点上支烟。让他们去吼吧。让他们去诈吧。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斗争方式。

康生更恼火，说：“你必须把他们交给革命群众！交给红卫兵小将！”

“你必须说出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江青走到了与他只有一步远的地方，指着他的鼻子叫：

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

“上边。”

他被逼急了，说了这样两个字。

“哪个上边？中央文革？天大的笑话！”康生阴险地冷笑着。

傅崇碧又燃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心里有些紧张，既不能供出周恩来，又要向这些张牙舞爪的人交帐，可真难为他。

江青象泼妇一样喊起来：

傅崇碧，我看你就象个死硬的保皇派，保那些老反革命，你保他们，绝没有好下场！

他打定主意，任你们怎样批，怎样骂，怎样吵，决不把周恩来抬出来。大不了这个卫戍区司令不干了。当初就沒想干，要不是毛泽东亲自批准，我还真不干这角色哩！

周恩来抖着一迭文件，说：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们讨论，先讨论文件吧。

……

第一天江青他们没问出结果，第二天开会，江青他们继续对傅崇碧进行围攻。还没讲几句，毛泽东办公室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找傅崇碧问个情况。

“中央文革”的一帮人对毛泽东还是不敢硬顶的。只能中断变相的审讯。

傅崇碧走出门的时候，江青还在说：不要以为这就沒事儿了，回来后还是要讲清楚，讲不清楚不行！

走出 16 号楼，傅崇碧才发觉自己头上出了汗。多亏毛泽东办公室来电话，否则，僵持下去，真不知是个什么结果。

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秘书说，主席正在游泳，马上就出来。

傅崇碧静静地等候的时候，心中颇不平静。“中央文革”逼问他，使他对那伙人更加反感。这种反感情绪，不是现在才有的。他对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就很不理解。那些老同志，开国元勋们，在会上提了些意见，就是“二月逆流”？他们并不反对毛泽东，只是对“中央文革”看不惯，提点意见，于是就成了反革命，这样下去，谁还敢说话？

他狠狠地吸了口烟，想不通先不想它了！等会儿看老人家有什么最新指示吧！

毛泽东在休息室内接见了他。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到这幅图时，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学生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开，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叉叉。”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关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回到住处，已是凌晨三点钟。傅崇碧躺在床上，衣服没脱就睡着了。他睡得很香，直到早晨七点多秘书把他叫醒。

第二天晚上，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

——傅司令员，江青同志请您到她这里来一趟。

傅崇碧想：去就去，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讲，还有什么火要发。

江青没有发火，而是很亲热地招呼他：崇碧同志，快来坐。

——这个女人反复无常，象阴历六月的天气，一会儿旭日当空，一会儿暴雨狂风。高兴时挽起你的胳膊，一口一个老同志；发起脾气来捶胸顿足骂娘骂祖宗，开口闭口以“老娘”自居。

“昨晚主席找你去，都谈了些什么？”

“没谈什么。”傅崇碧轻描淡写地答一句。

“总不能啥也不谈吧？”

“主席问你现在北京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情况。”

“哪有什么武斗？”江青对这个字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主席还问了问游街的情况。我都如实向主席做了汇报。”

“没有说别的？”

“没有。”

傅崇碧已经有了些对付这伙人的经验。

“那好，走吧，到八号楼。他们可能在等了。”江青说着走出门。

中央文革的全体人马早已在会议室内等候了。周恩来正和什么人通电话，当江青和他走进来时，周恩来把电话挂了。

康生本不是打头阵的角色，今天，他破例先朝傅崇碧发问：

“昨天的事情没讲完，今天你要讲个清楚、明白！”

傅崇碧心中有底，一点也不着急，坐在沙发上，摘下头顶的军帽，没有立即回答“康老”的问话。

江青的脾气好了许多，语调也不象往常那样高，说：康老问你，你就把情况讲出来，讲出来就是好同志。

傅崇碧把全场的人都看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有什么不清楚的？”

“不要搞这一套，你想当死硬的保皇派是不是？”陈伯达又来威胁他。

傅崇碧端起茶杯，品了口泡好的香片，不理他的话茬。

“是谁让你这么搞的？”

又是严厉的质问。

“上边让搞的。”

“上边？哪个上边？”

傅崇碧只顾自己喝茶。

康生气急败坏地吼道：“你讲，你必须讲！不讲不算完！”

傅崇碧也火了。他把茶杯重重地一放，说：“我讲？我讲什么？你们问主席去！”

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陈伯达问：“问主席？为什么问主席？”

“主席叫弄的！我讲上面，你们非要我说，你们问主席去吧！”

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同志，都不要激动嘛，慢慢说。

江青看看情况不对头，急急忙忙改变议题，宣布：“开会开会。”她指指傅崇碧，“坐下，你也听。”

傅崇碧看看“中央文革”的几位，无一不象泄了气的皮球，有的瘫坐在沙发上，有的低头装做看东西，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傅崇碧走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周恩来跟了上来，说：坐我的车走。

上了汽车，周恩来的神色很严肃。等汽车开出钓鱼台，周恩来问：你今天是怎么搞的？

傅崇碧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他：“主席表扬你，说你做得好！”

周恩来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身体。傅崇碧听到周恩来深深地出了口气，看到他脸上露出过去常见的微笑。

事后，傅崇碧想：这件事，等于在毛泽东那里告了江青一伙的状。他们要彻底“清君侧”，不许一切人和毛泽东接近，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向毛泽东大胆直陈，江青一伙岂能不恨之人骨。

(8) 深夜三请余立金

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余立金是随行者之一。

余立金随毛泽东出去，是杨成武向周总理建议的。主席说不定要乘飞机、乘船，所以要空军的余立金、海军的李作鹏随行，总理认为这个建议可行，就这样决定下来。

如果不是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下令，余立金想去也去不成的。但余立金没想到会因此得罪吴法宪。

毛泽东在党内有其特殊地位。不要说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人，即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他单独接触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更何况，江青、林彪一伙阴谋家唯恐毛泽东对他们的阴谋有所察觉，因而谁接触毛泽东多一些，谁就可能成为被嫉妒、被打击的对象。

余立金不只一次与人讲过如下的事情：

一九六七年八一节前夕，余立金从上海飞回北京，向周恩来报告有关毛泽东的行止。

余立金刚刚到家，拿起毛巾擦把脸，就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余政委，回来啦！”

这是吴法宪。他个子不高，嗓门却是一向很高的。

刚到家，司令员就来看望。以往吴法宪从没这样热情过，特别是当了军委办事组负责人之后，处处时时不忘摆出军委首长的架子。再加上余立金调任空军政委时间不长，他经常对余立金指手划脚。余立金对吴法宪是比较尊重的，他是司令员，是第一书记，按组织观念，也应该主动向他请示报告。

“吴司令，我刚到家。”

“好，好。”吴法宪的眼睛不看余立金，东张西望。一种心神不定的样子。

余立金请他到客厅里去坐。

“不坐了，不坐了。你休息一下，咱们去司令部会议室吧。”

余立金转不过弯来，问：“吴司令，有事情吗？”

“也没啥大事情。你跟随毛主席出去视察，有什么最新最高指示，给我们传达传达。”

余立金这才明白吴法宪的来意。可是，自己没有任何传达任务，这是周恩来关照过的。

余立金说话不会拐弯的：“我回来，只是向总理报告有关情况，没有传达任务。再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很快就要传达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吴法宪装模做样地说：“是这样吗？那就算了。”

余立金说：“我过完‘八·一’还要出去，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吧。”

吴法宪站起来，不自然地笑一笑。说：“你先休息，先休息。”

说着，摇头晃脑，东看西瞧，走出余立金住的小楼。

余立金送他出去，这时，外面已经黑黢黢的了，路灯已经点亮。

多日不回家，孩子们见父亲归来，都围在余立金身边，问长问短。余立金给他们讲了不少沿途见闻，逗得他们笑个不停。他对孩子们说：“现在不少学校停课了，你们在家还是要好好学习、看书。”

电话铃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儿子去接。然后跑过来喊：“爸爸，是你的电话。”

余立金回北京知道的人不多，电话会不会是总理来的？

他赶快去接。

红色听筒里，传出吴法宪的声音：

“余政委，我从你那里回来，见到几个常委，他们说：‘一定得请余政委给我们传达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余政委是从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这点要求是可以满足我们的。’”

还是这件事。余立金觉察出这事情不对头，常委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已明确地向他讲了，没有传达任务，他应该懂得这是纪律，也应该向党委常委做些解释。为什么还执意要自己去讲呢？余立金在电话中说：

“吴司令，你跟常委同志们解释解释，我实在是没法汇报。不能汇报。”

“那你可叫常委们失望啰！”

“我去和常委们解释解释。”

“不用了，我给他们解释吧。”吴法宪说，“我看你还是汇报一下好，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嘛！”

这叫什么话！余立金有些恼火：“我不是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要守纪律的！”

“我没叫你破坏纪律！是常委要你汇报的！”

吴法宪的态度强硬起来。

余立金见他发火，又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吴司令，的确没有汇报任务。”

“没有就算了！”

吴法宪说完，把电话挂断。

余立金放下电话，心里想：吴法宪这个人越来越不象话了！

余立金心里有些不快，但还是不愿被这种心情冲淡家人的喜兴。他和孩子们聊了一会儿，看看时间不早，就说：“明天爸爸还有会，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余立金刚刚躺下，电话又来了。

还是吴法宪的声音。

“余政委，你还是要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谈一谈。”

余立金没办法，只好起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空军首长住的小院。远远看见路灯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走到近前，才看见吴法宪站在车子的旁边。

“走吧。”吴法宪说。

“去哪里？”他问。

“你不给空军党委常委汇报，给林副主席汇报总是应该的吧。”

给林副主席汇报？这叫余立金更加为难。周总理指示不向任何人汇报。可林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的副主席，排在周恩来之前的人物。

吴法宪见余立金迟疑，说：“刚才我和叶主任（叶群）通过电话，她说要我陪你去给林副主席汇报。”

吴法宪这一招很厉害，他把林彪拉出来，用以辖制余立金。

余立金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

吴法宪口气变了：“你对林副主席是什么态度！叶主任要你去汇报都不去。”

余立金只好说：“毛主席那里不让汇报，我们得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去办。还是不汇报为好。”

吴法宪看余立金把毛泽东、周恩来抬了出来，就说：“你看着办。反正叶主任叫你去。”

余立金说：“你不能给叶主任解释解释？”

“我反正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看着办。”

“我见到叶主任时，再向她解释。”没等余立金说完，吴法宪就转身钻进车里，一溜烟跑了。

有人说，吴法宪到了叶群那里。

又有人说吴法宪绕了个弯儿，又回到他的家里，他不过是虚晃一枪，吓唬吓唬余立金而已。

还有人说，吴法宪回家就给叶群打了电话，告了余立金一状。

谈到“杨余傅事件”时，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感慨万端。她和余立金同一天被抓起来，她坐了六年零四个月的牢。

她说：“余立金是个最本分最守原则的人，他不会左右逢源，只知道干工作。他得罪林彪‘四人帮’的事情还有很多，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他要还在世，能给你们提供很多的材料，他的记忆力可好呢！”

说完，她望着挂在屋里的余立金的遗像摇头。

我们也只能留下遗憾了。

第四章 政治旋涡中的将军

(9) 隔离审查“王、关、戚”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很象活报剧的舞台。各种各样的演员都上台表演了一番。有人盲目地挥刀舞枪，有人象小丑一样上窜下跳，也有人为了真理而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表演，或长或短，或多或少都能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

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许算不上了不起的人物。但在“文革”的舞台上，他们可是不能忽视的角色。虽有点来去匆匆，却也演出过“波澜壮阔”的闹剧。

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波及全国，一时间，“江城上妖风呼啸，扬子江面黑浪滔滔”的传单小报，飘至天山南北、大河上下。这出闹剧的主角，是王力、谢富治。

“中央文革”认为，武汉的军民整了王力、谢富治，他们要反击。他们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远不能解心头之恨，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九六七年八月，他们把持《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

在这篇社论中，他们着实发泄了一下对广大军民的刻骨仇恨，使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概念——“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发表在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印出清样之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

新华社向全中国、全世界发了通稿。

“红色”的电波，荡漾在喧噪的中国国土上空：

“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空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跟在《红旗》社论的后面，发表了署名“红尖兵”的文章，声言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紧接着，王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到北京外语学院，发表了颇具名气的“王八·七”讲话。

八月七日的北京，正值酷暑。外语学院的校园内，花草树木都被晒得耷拉着脑袋。唯有树上的蝉，吱喳吱喳叫个不停。天热，太阳毒，气温高，都没有革命造反派的热情高。他们不顾汗流浃背，挤在大饭堂里，听“中央文革”来人讲话。

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王力。他的嘴巴对着扩音器，吼声压倒了外面一阵紧似一阵的蝉鸣：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革’来看望你们！你们辛苦了！”

他喊，台下也喊：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同志们、战友们，我今天来，是为你们撑腰打气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唯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

好一个“王八·七讲话”，把外交部系统的夺权之火，煽了起来。一个星期之后，陈毅在六国饭店的外交部小礼堂接受“批判”时，外语学院的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了外交部抓人。大喇叭吼叫着：“不揪出陈毅决不收兵！”“陈毅必须到外语学院去低头认罪！”

陈毅被周恩来派来的人藏进了一间盥洗室。后来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由北京卫戍区的吉普车将他接回中南海。可以说，要不是周恩来事先有防备，事后有安排，陈毅非落入外语学院的狂热分子手中不可。

造反派没有捉到陈毅，当然不肯甘心。他们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一起，于八月十六日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印，并且宣布：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造反派管理。

当天晚上，外交部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待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评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了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的脸，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找他们找回来……

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交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拖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付之一炬，造成极恶劣的国际影响……

“王八·七讲话”和外交部造反派的行动，影响到外贸部和国务院的其他部。北京的形势日趋混乱。

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着了火”。红墙里面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串通一气，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

面对复杂的形势，周恩来不能吃、不能睡。他心急如焚，为整个国家的局势担忧。他看得很清楚，造反派的这些举动，与“中央文革”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有的纯粹是他们幕后操纵的！

怎么办？

要想稳定北京的局势，就必须对“中央文革”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跳得最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一定的措施。然而，对他们采取措施绝非易事。

周恩来令工作人员找到了“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其他有关材料，叫杨成武带上去向毛泽东汇报。请毛泽东定夺。

杨成武心急火燎地赶回上海。来到毛泽东身边。

“主席，北京最近出了些事情……”

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毛泽东汇报了王关戚的种种劣行。

毛泽东听完，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叫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

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象是想起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以后又隔离了戚本禹。

这三个人先后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那里也许引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央文革”的内部，在林彪一伙人那里，则如同发生了十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的干将。康生、陈伯达、江青不便说的话，他们敢说；康生、陈伯达、江青不便干的事，他们敢干。关锋同林彪的关系极为密切；林彪已经拟定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王、关、戚”消失之时，林彪正在外地休养。周恩来从尊重他的角度出发，令杨成武去向他汇报毛泽东的决定。

这时的北戴河海滨，正是旅游旺季。不过那时人们都在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哪还有心思旅游？林彪以休养为名，独霸了一座很大的楼房，这里环境幽静，气候宜人，躲在这里策划阴谋，恐怕要比喧闹的北京更有利。

下了飞机，他们把杨成武安排在北戴河首长住区的礼堂旁边的一间房内。叶群说：“我去找 101，你们等一会儿再汇报。”

这“一会儿”不是几分钟，也不是几十分钟。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过了个把小时，还是不见动静。杨成武不能不想一想，林彪为什么让他在这里“静等”。来的路上叶群曾再次问杨成武：

“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

杨成武只能告诉她，主席没讲过。

她反复问毛泽东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他们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望着海水冲击着岸边的礁石，沉思着，静静等候。

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林彪的居室内，拉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亮着灯。林彪光着头，坐在沙发里面，象一具僵尸。不知他为何惧怕阳光。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你想象不出，同一个他，在天安门广场讲话时会那样富有激情。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声音依旧是冷冰冰的。

杨成武从林彪卧室出来，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

这足以证明林彪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处理的态度了。

林彪“四人帮”一向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今天，他们和王、关、戚亲如兄弟，明天见情况不妙，他们又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他们又把“杨余傅”说成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三月二十七日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当着数万人的面，他们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讲假话，欺骗广大群众。

陈伯达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很大的胜利。”

康生说：“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象在亲人家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有善于诱导的作风’……”

谁都知道，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人，他们一下又变成了“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的人”，谁都知道王、关、戚是靠着“文化大革命”整刘、邓、彭、罗、陆、杨起家的，这会儿又成了刘、邓他们的亲信。真该给康生送一个“最佳谎言奖”！

江青的话更有意思。她说：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要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成中央文革出了坏人，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

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也把杨成武说成是王关戚的同党。他说：他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这就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

(10) 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有人说红卫兵是敢于怀疑一切的，除了毛泽东的材料他们没敢整以外，其他人的材料几乎都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的材料自不必说，有人支持他们搞，有人命令他们搞，有人希望他们搞。

他们不仅搞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也搞了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的材料。

他们当中有些人专门搞江青的材料，也有人搞陈伯达的材料和叶群的材料。尽管控制很严格，这些材料还是在社会上的一定范围内流传了。搞这些材料的人，有的是出于党性，对党负责；有的则别有用意。还有人是无意中碰到了这种材料。

不管搞这些材料的人用意如何，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匿名信，确实让江青、叶群一伙惊肉跳了一阵子。为了杀人灭口，他们通过种种法西斯手段，把这些人都整死、整跑。同时，又花大力量进行“反调查”，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一个火热的夏日，天气闷得人透不过气来，没有一丝一缕的风。办公室内转动着电扇，人们还是止不住冒汗。

秘书走到傅司令员的办公桌边，递给他一包材料。

“什么东西？”

“红卫兵送来的材料。”

“什么人？”

“上海的造反派。”

傅崇碧将那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拆开一看，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这里有江青当演员时的照片，有给蒋介石祝寿演出时的剧照，有江青和某些演员的风流韵事的传闻……

傅崇碧对蓝苹的名字并不生疏。在延安时，他曾经和这位蓝苹一块搞过演唱。后来蓝苹的名字消失了，江青的形象出现了。多年来，不见这两字，猛然见到，觉得很是刺眼。再看那些照片，的的确确是今天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看着看着，傅崇碧感到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夫人的材料。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不管怎么说，这材料不能扩散，先封起来再问问周恩来。

“文革”开始以来，碰到难办的事，傅崇碧就去问周恩来。这不仅是周恩来是他的上级，还因为他打心眼里认为周恩来是可以信赖的。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见到了周恩来。他将材料的事讲了。周恩来问：

“有多少？”

“不很多，一个纸袋子。”

周恩来沉默了片刻，说：“你送给她嘛！”

事后，傅崇碧回忆说：当时，江青的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她又是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的成员，有人整她的材料，总理能怎么办？也只好送给她。

于是，傅崇碧给江青写了个便条，趁着在钓鱼台开会的机会，连同材料一起交给了她。

江青看了信，什么话都没说，拎起材料包，走开了。

一个星期后，江青在钓鱼台的寓所召见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和公安部长、北京卫戍区的政治委员谢富治、司令员傅崇碧。

江青穿一身军装，板板正正坐在那里，象一座泥塑的菩萨。她平时要么张牙舞爪、要么笑容可掬，一旦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来，总叫人觉得她是在演戏。

“告诉你们，现在有人整陈伯达、康生和我的材料。”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语调里流露出一百二十分的气愤。

一位瘦瘦的造反派领袖跟得很快，说：“谁胆敢整江青同志的材料。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和他血战到底！”

……

江青象没听到这些话，她忽地站起，眼睛突然睁大：

“今天，把公安部长、卫戍区司令叫来，就是要叫你们知道，哪个敢整康老、伯达的材料，哪个敢整老娘的黑材料，老娘就抓他！”

屋里顿时冷了场。

“我们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一个戴眼镜的“领袖”表态，也是为了洗刷自己和自己的组织，以表明她是和江青“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

别的领袖也不甘示弱，再次向江青表示“忠诚。”

江青不买他们的帐，走着走着突然停住，说：

“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你们这些人，敢整老娘的材料，胆子不小。”

听她的口气，这几个人中间肯定有谁搞了她的材料。屋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有的低头抽烟，有的眼望屋顶。每个人心里都在问：“会是谁呢？”

江青走着四六步，猛转身，说：“你们谁整过我的材料？”

没人回答，屋子里静得令人窒息。

江青在屋里转了一圈，改变口气说：没有人整就好。我正告你们，哪个整老娘的材料，我就抓你们哪个！

从江青寓所出来，谢富治和傅崇碧默默地走着。

傅崇碧想：江青不会没头没脑地来这么一通的。她大概是想镇唬镇唬这些造反派的领袖。转念一想，不对，这些人不会去整康生、陈伯达、江青的材料的。莫不是江青担心我看她的材料，故意“敲山震虎”，给我点眼色瞧瞧？

傅崇碧忍不住问谢富治：“江青同志会不会是对我们不满意？”

谢富治阴阳怪气地笑笑，说：“谁知道！”

傅崇碧心里愈加不踏实了。

惹不起，躲得起，傅崇碧尽量躲着江青。在当时，躲也不失为一种策略，谁知越是想躲着她，事情越找上门来。没过多久，又有一大包（比上次的那包多几倍）沉甸甸的材料送到了卫戍区司令手里。

上次，为材料的事，她“敲山震虎”闹了一通，这回可怎么办？傅崇碧没法，只得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正在中南海办公室里处理批件，见傅崇碧进来，笑呵呵地问：

又有什么情况，这么急急忙忙的？

“又有人送了一大包材料。”

“什么材料？”

“江的。”

他没有说出江青的名字，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

“上次我们把材料给她后，她没头没脑地发过一次脾气。”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思忖了一阵，说：你先把材料锁起来。

材料锁进保险柜，傅崇碧的心还是悬着。存着江青的材料，总不是个事。过了没多久，他见到周恩来，又问起这件事。

周恩来说：放在我们这里，总不是个办法，还是交给她。这样吧，你把材料送给我，我转给她。

“那……”傅崇碧担心会给周恩来找麻烦。他曾亲眼见过江青跟周恩来无理取闹。

“你已经转过一次，这次，我转给她。”

“那你……”

“材料开了封吗？”

“开了。锁在保险柜里。”

“你找些上好的牛皮纸，照原样封好，写我收，我收到后马上转过去。”

傅崇碧答应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将材料封好，送到周恩来那里。

江青的材料，不仅上海有，北京也有。国务院文化部也发现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吴法宪受他们的委托，查找到不少。这些材料一旦披露，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江青对此极为恼火。脾气越来越坏。找周恩来吵，找中央的其他大员。在林彪一伙的干预下，决定把江青的材料全部收缴上来，统一处理。

清理这些材料的事落在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傅崇碧几个人的头上。

周恩来对他们说：我在办公室等你们，你们去文化部将材料全部取来，我们一起加封，然后找个适当的时机销毁。

谢富治说：他的肚子痛，吃过早饭以后，就没有停止过，怕顶不住。他请假了。明眼人都知道，他肚子痛不痛无关紧要，他怕“沾边”才是真的。他说肚子痛，别人总不能再找原因来搪塞，只好硬着头皮去沙滩附近的国务院文化部保密室。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据说收材料时，有一本书丢在窗台上。“全军文革小组”的成员，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看了这本书，江青大光其火，把金敬迈的文革小组成员撤了，关起来审查了好久。

据当事者回忆，金敬迈并未看到这本书，也谈不上看到了江青的什么材料。

材料送到中南海，周总理当着他们几个人的面，说：现在将材料密封起来，你们几个都在场。

周恩来办事细致严谨，一向是滴水不漏的。他把材料加了密封印之后，叫他们请示江青何时处理。

江青恨不能把所有关于她的材料立即全部化为灰烬。但当别人请示她的时候，她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你们烧掉嘛！随即又说：谢富治、江东兴、吴法宪、杨成武、傅崇碧都要到场。

这是很阴险的一手。你们都接触了这些材料，销毁也必须经你们的手。材料是你们收集的、也是你们销毁的，谁也休想跑掉。与我江青无关。

这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江青、林彪的死党吴法宪当然除外。

销毁材料的那天，江青亲自打电话，一个一个找他们。

傅崇碧正在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江青的电话追了来：

崇碧同志，他们都已经行动，你马上去找他们。

傅崇碧只好答应说：“好的。”

他让秘书给谢富治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谢富治同志不在。”

“回来后请他给总理这里来个电话。”

傅崇碧又打电话找另外几位，也没找到。正好！他心里暗自庆幸，急忙电话报告江青：

“这几个人都找不到，不知去了哪里，我没有办法去。”

江青只好说：那就算了。

傅崇碧这才“躲开”烧江青材料的事。

躲得开初一，躲不开十五。

傅崇碧对红极一时的林彪、江青采取能躲得开就躲的策略，不失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采取的办法。但越躲他们，他们越是找上门来纠缠。

避开了江青的事，林彪、叶群找上门来。有次傅崇碧突然病倒了，尿血很厉害，到301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出肾脏有些问题。

一天，他住的病房门开了。叶群笑容可掬地走进来。后面，跟着他们的女儿林豆豆。豆豆穿件浅绿色的裙服。她手里拎着一个人网兜，里面是很难见到的南方水果。

“崇碧同志，林总让我来看看你。病情好转了吧！”

傅崇碧忙坐起来，说：“谢谢林总关心，我的身体好多了。”

“林总很忙，要不，他会亲自来看你的。现在，他要协助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情，希望你能谅解。”

傅崇碧忙说：“叶主任来和林总来一个样，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尽快养好身体出院。”

“别急，身体要紧。缺什么药，找我好了。”

林豆豆也说：“傅叔叔，可得把病治好再出去。”

她们走后，傅崇碧望着她们放下的水果动了心思。林彪是军队的副统帅，他让办公室主任来探病，的确非同一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名堂呢？他不敢往别的方面想，只觉得有一只手在拉他。

他病愈出院后，在人民大会堂碰到林彪。林彪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你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体搞好。

* 傅崇碧表示：身体可以胜任工作了，谢谢林副主席关怀。

这之后，傅碧崇先后接到过叶群的几次电话。

第一次，叶群来电话说：

“傅司令，今晚我家里放电影，你和夫人一块来看吧。”

傅崇碧回答：“叶主任，实在不巧，今天晚上我们卫戍区开会，我不到不好。谢谢你的关怀。”

……

第二次，叶群的口气比第一次还要恳切些：

“傅司令员，今晚的电影是美国的新片，刚进来的。你带着夫人、孩子们都来吧，大家一块儿看场电影。”

还是不巧，傅崇碧已和周恩来约好。到怀仁堂开会。傅崇碧又婉言谢绝了。

第三次，叶群又来电话。傅崇碧还是没有去。他觉得，上下级关系就应该是上下级关系，如果过从甚密，搞不好就要出问题的。你是副统帅，有什么指示我们会执行的。卫戍司令不能跟这一个亲，和那一个疏，一旦有了亲疏，卫戍就可能出问题。

看电影请不去，叶群又想出别的办法。她打个电话给傅崇碧：

“我这里有好几箱子毛主席像章。江青同志看过了，很满意。快把你的拿来和我交换交换。”

傅崇碧的像章不多，最多不过百八十枚，与叶群交换，显然不合适。他回答“叶主任”；“我可没有多的交换。”

“那我送你一包。”

“谢谢。”

“你来取呀。”

“好吧，我有机会一定去取。”

……

在林彪、叶群看来，傅崇碧真可谓“不识抬举”。在任何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傅崇碧在政治舞台上，太缺乏敏感，太不识时务。因而“永远不能成为‘俊杰’”！

(11) “大树特树”出笼前后

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致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

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东、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

“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了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

“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

“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象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 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 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做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写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

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总长，我对不起你！”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三十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毛泽东又在他的老家，湖南韶山铁路通车，要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三月二十三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一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在三月二十四日，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

第五章 面对正在实现的阴谋

(12) 钓鱼台，三月八日

钓鱼台，是个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门口岗哨林立，墙边还有来回走动的流动哨兵，只要你在墙边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就会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警卫来干涉。人们只能在它的东门口，望一眼里面的假山，喷泉。

这等神秘、高贵的地方，傅崇碧却带兵、带车、带枪去冲击、去抓人。傅崇碧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然而，“冲钓鱼台”事件的真相，人们却不甚清楚。钓鱼台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其详情，恐怕只有几个当事人心中明白。

钓鱼台事件，既是偶发的，又是必然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三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象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三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四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待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互相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

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一个卫戍区司令，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他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了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

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象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

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周树青赶忙解释说：“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扯扯周树青，对江青说：“我们来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江青大发脾气。姚文元变成了帮腔的：“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

这时，扑通一声，有人摔倒了。他是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冯秘书。这几天，他几乎是连轴转，太疲劳，也太紧张，再加上肚子里空空的，一时虚脱晕倒了。他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笔记本、文件也甩了出来。

江青被吓了一跳。她一边躲闪着，一边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傅崇碧了解冯秘书，忙说：“不要紧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同行的几个人，扶的扶，抬的抬，把冯秘书弄到一边。

傅崇碧又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

“手稿在哪里？”江青的口气缓和了些。

“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什么？”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气，又发作了。

“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把保密员叫来！”

保密员是一位空军的干部，衣着很整洁，模样也很文静，进门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首长找我有事？”

他很恭敬地看着江青。

傅崇碧问他：“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

“在，就在楼上保密室。”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着屋里的人，好似在说：问这干什么？

他又补充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四个箱子。”

江青两眼冒火，伸手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

保密员愣了，这是何故？怎么会使“文化革命的旗手”发这么大的火？周围的人再次愣了，这是怎么回事？

傅崇碧倒不觉得奇怪。一是江青像这样的时候很多，见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二是他知道江青是迁怒于人，把火气撒在别人身上。她叫人查鲁迅的手稿，查了个遍，手稿就在她的身边，而且戚本禹还跟别人讲，她江青知道，她岂能不火？

江青见没人去抓保密员，又气又恨，跺着脚喊：抓起来！

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员的胳膊。

保密员急得满脸通红，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把我放开！我冤枉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恶狠狠地下命令。

保密员被人扭着，消失在门外。

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人们怕她再发火，急匆匆上楼抬下来四个樟木箱子。打开来看，鲁迅手稿一扎扎，一束束地放在里面。

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阵，扔下，再拿一本翻看。

别人站在箱子旁边，等着她发话。谁都不敢动一动。她要再次发怒，说不定哪个又被抓起来。

看着看着，江青突然说：不看了，封起来！

瞧她骤变的脸色，人们不知她又看到了什么令她不快的文字。

“你们看着，封好。”

江青让别人封鲁迅的手稿，她站在窗前，挺胸抬头，不知在想什么。

箱子封好后，她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对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就在我这里吃饭。

“不用了，我们回去了。”

“叫你在这里吃饭，你就在这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是不是？”

江青很执拗。

吃就吃吧，这样也可缓和一下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

江青对饭菜是很挑剔的。今天却好象没怎么挑剔。她说：你们几位，这两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点吧，干革命嘛！

傅崇碧心里明白，留他们吃饭，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江青说：吃完饭，你们还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个坏蛋盗走了。你们去审问他，手稿藏在什么地方。

手稿、又是手稿！在座的诸位都明白，江青可能要报复戚本禹一下，戚本禹说，鲁迅的手稿江青知道，江青却让人们去找，江青不成了贼喊捉贼的贼了吗？

吃完饭，江青擦擦嘴说：

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盗，比鲁迅的更重要。你们一定要完成这重要的工作。

卫戍区的几位主要干部答应着，乘车离开了可怕的江青住宅。

坐在车上，傅崇碧的思绪飞了很远很远。江青发火，绝不仅仅是因为手稿。他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时的几件事情。

毛泽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火，便到外地去了。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今天这里成立一个总部，明天那里冒出一个造反司令部……从那时起，江青就开始指挥起卫戍区来了。

一天江青找到傅崇碧，说：

你们要支持首都红卫兵第一造反司令部，要帮助他们解决车辆。

傅司令员有碍于她是主席夫人，不好不答应，就说：“好吧。我请示一下。”

事后一想，傅崇碧觉得不对头，江青没有在军内任职，又不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她怎么能指挥军队，调动军队的车辆呢？

傅崇碧接通了周恩来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军队的事情，请军委的同志定。

……

第二次，江青又来指挥卫戍区，要他们支持“三司井岗山”，给他们派车上街游行。

这回，傅司令员又请示了军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得到的回答是，要慎重，搞不好要出乱子。

那么，对江青的“指示”怎么办呢？傅崇碧能拖就拖，拖不过去就应付。

江青是相当敏感的。她的话，有人当作圣旨，有人却拖着不办。有的人恨不得叫她亲娘，有人却对她正眼不看……谁亲谁疏，谁远、谁近，她心里很清楚的！

有一次开会，江青和北京军区、卫戍区的领导同志见面了。她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来了，你们都是老同志，看不起我这个新兵。”

她指指自己一身簇新军装，扯扯衣肩，做个亮相的姿势。

别人不知她是什么意思，当然不好搭话。

她又说：我讲话，你们从来是不爱听的呀！

听话听音，这弦外之音，分明是说，你们不肯听我的。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并不是对江青的话置若罔闻。他们也不敢时时事事和江青作对。只是有时觉得江青这个人太过分，太泼。而且要按她的指示办就必然要坑害老一辈的元帅、将军。

因此，他们对江青的指示总要打那么点折扣……

毛主席第一、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许多老帅也还是被请来参加了。毛泽东未到之前，老帅们来了，聚在一个休息室内，聊天、发牢骚，“中央文革”的人来了，聚在另一个休息室内。阵营格外分明。

毛泽东一到，“中央文革”的人总是急急忙忙把他引到他们所在的休息室。

杨成武、傅崇碧等做具体工作的人都觉察出不很对头，即使党内有不同意见，也不能这样壁垒分明。他们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毛主席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希望毛主席多和老同志们接触。

有一次，傅崇碧见毛泽东又被他们引进休息室，便急忙向具体负责接见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报告：

“主席来了，在那边休息室。”

他又对徐向前元帅说：“请老帅们那边去坐吧。”

这一行“老家伙”由叶剑英引着，走进了毛泽东所在的休息室。

“主席您好！”叶剑英元帅给毛泽东敬了礼。其他各位也——同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样啊？

元帅们一个一个谈起自己的处境来。

江青很生气，她走到傅崇碧身边，问：天安门上好了没有？

傅崇碧答：“还没有好。”

“你去看看，好了就开始接见。”

“是。”

傅崇碧答应着走出会议室。心中暗想，她不愿让毛泽东和这些老同志接触，想割断他们同毛泽东的联系，这怎么行！

他走上城楼，看着正陆续走到指定位置的红卫兵队伍，看着下面旗的洋，人的海，越发感到毛泽东的重任。这样多的人都等着他的接见，等候着他的最高指示，他那里绝不能出偏差，一出了偏差，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让他和老战友们多聊一会儿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傅崇碧到广场上转了一圈，又回到城楼上，点燃一支烟。

他刚刚抽了两口，江青跑到城楼上来找他：“好了没有？好了就开始。”

傅崇碧回答：“还要稍等一会儿。”

“还要等！你的准备工作怎么做的？”

“时间还不到。”

“我要你提前。”

“他们不是正忙活吗！”卫戍司令指指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军人。

“准备好了，马上开始！”

江青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傅崇碧估计毛泽东和老帅的谈话差不多了，才走进休息室向他们报告：

“一切准备就绪，请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各位首长接见红卫兵小将。”

……

秦城监狱到了。他们再次把戚本禹提了出来。

“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眨巴着眼睛，说：“我，我，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

“你敢抵赖！你写文章没用过毛主席的手稿？”

“没，没有，绝对没有。”

又是一个对不上。江青到底搞什么鬼名堂？她真的要报复戚本禹吗？

“真的没有？”

“没有，没有。”戚本禹虽有些惊慌，但还是不肯承认这无中生有的事情，“我借过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没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想，不妨打个电话问一下，不要再受骗了。

电话挂通了。听筒里传来汪东兴的声音：“他没借过手稿，是清样。”

……

他们赶回北京，立即给江青写了报告。

——这是钓鱼台事件的前半部分，后面，还有戏唱。

傅崇碧去了秦城，江青又发起疯来。她先找了周恩来，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

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本来知道此事，应该出来证明一下，他不光不出来证明，反而火上浇油：

“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象话！”

越说越气愤，越说越升级。

“不行！这得叫傅崇碧做检查！”

“要他检查冲钓鱼台的动机！”

江青对吴法宪说：

你马上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命令傅崇碧做检查！要他去批傅崇碧。

吴法宪赶快立正，忙不迭地说：“我马上就打，马上就打。”

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悄声说：“吴法宪来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了。”

“什么？”

秘书又重复了一句。杨成武这才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电话。

“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的指示。”

“干什么？我正开会。”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总理在不在？”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只能放下这边的会议，到钓鱼台去。

果然，“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都在，等杨成武进了屋，江青先发制人：

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叶群说：“他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成武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得了！”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要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杨成武好不生气，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卫戍区，就批傅崇碧？不让别人说话。他没好气地说：

“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

江青哪能吃这一套，她听惯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哪能容得顶撞她。

她瞪起眼睛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跟着指责杨成武：“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杨成武很是气愤，他说：“我负责？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可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

说着，杨成武就站起身要走。

周恩来赶快拦住他，说：成武，你别走，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你陪谢富治同志去一趟，把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找来，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杨成武从周恩来用力握着的手上，领会到了周恩来的暗示。杨成武止步，说：“陪他去可以。”

周恩来又对谢富治说：富治同志，你和成武同志去卫戍区一趟，批评批评他们。

北京卫戍区的师以上干部，被叫到了京西宾馆的第二会议室。

谢富治到第二会议室找到杨成武，说：“人都来齐了，你去讲吧。”

杨成武很不客气地对谢富治说：“我是陪你来的，你是北京卫戍区政委，总理要你去讲。”

“你讲吧！”

“我不讲。”

谢富治自我解嘲地说：“我讲就我讲，那你主持一下吧。”

“我主持一下倒可以。”

事后，谢富治怎样汇报的，杨成武不得而知。

(13) 毛家湾，一纸证明

一九六八年三月初的一天夜晚，杨成武的秘书接到叶群的电话：

“请杨代总长到我家来一下，有要紧的事情。”

秘书马上报告了杨成武。

杨成武有点怵头去林彪那里。特别是最近，听说有几件事，林彪很不高兴。

青海省发生“赵永夫事件”之后，林彪一伙借此发难整叶剑英元帅。林彪气呼呼地对杨成武说：

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

杨看林彪的语气很强硬，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给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拖着湖北腔，甩着手走了。

杨成武只好点头。

林彪虽然是党的副主席，国防部长，但他不经党的会议决定，随便停发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的文件，是错误的。然而，林彪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不执行他的指示也是不行的。

杨成武左右为难。

夜晚，他坐车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见他闷闷不乐，先开口问：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杨成武把林彪的指示告诉了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说这叫我怎么办？”

周恩来思忖了一阵，说：这样吧，你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比如五一节卫生工作之类东西扣下来，重要的文件还要送。

杨成武一下明白了，文件照送，但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林彪查问起来，也好有条退路。还是总理有应付他们的策略。

事情就这么办了。过了些时候，杨成武又将这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叶剑英。

叶帅当然很气愤，但还是说：“好，好，就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不知怎么搞的，这事情被林彪察觉了，虽然没有兴师问罪，也叫杨成武心里打了一阵小鼓。

今晚林彪“召见”，不知又有何“指示”。

不管有什么指示，一定要小心谨慎。前些天因为开会呼口号，已经惹得他们很不高兴了。

总参谋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结束的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会讲话了。

杨成武是总参的党委书记，当然也要讲话，他讲完话，也要照例呼口号。那个年代是口号的年代，谁的口号呼得最响，谁就最革命。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老百姓。

他呼了八个口号，比别人少那么几个，这倒没惹谁不高兴，只是当他呼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只呼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缺少了关键的“永远”两个字。因为他听毛主席讲过，什么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吗？

叶群是个十分敏感的女性。有时敏感到了脆弱的地步。散会后，叶群快步走到杨成武跟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

杨成武这才意识到，她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很看重的。他想对叶群解释几句，叶群已经愤愤然走下楼梯。

杨成武追到楼梯口，说：“叶群同志，请在这里吃完饭再走。”

她头都不回一下，说：“走了。不吃！”

……

杨成武惴惴不安地来到毛家湾林彪的家。

走进林彪的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是让坐，又是请喝茶。

杨成武感觉到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林彪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挺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

他看了叶群一眼，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军委办公厅主任，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

早在“文革”前，就有人写信揭发叶群的历史问题，叶群曾派人到上海、江苏、湖南等地找人写了很多证明材料，来洗刷自己。

现在让杨成武写证明，杨成武真不知怎么说才好，解放前他根本不认识叶群。一九六〇年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叫他写证明叶群一九三六年情况的材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杨成武沉吟了一阵，指指叶群，对林彪说：“林总，我和她，认识得很晚，这你是知道的。三六年我们都在‘红大’，这个你知道，叶在天津、北京，我写不好。别人写了证明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两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这完全是摊牌。杨成武一时不知怎么说才好。答应林彪吧，那完全是昧着良心，为人出假证。他决不能干。不答应吧，林彪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罪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冷静了一下，决定来个缓兵之计。他说：“林总，别人说叶群什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先看看材料再说。”

杨成武说完，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这场面太尴尬了，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客厅里，空气凝固了，一切都是死的。

总不能这样呆下去，杨成武问：“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林彪一摆手，这摆手是逐客令。杨成武站起来告辞。

林彪再没有杨刚进来时的热情。握手还是有力的。但这有力，决不是亲切的表示。

汽车开出林彪的高墙深院，杨成武不禁回头望了一眼，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街上没有行人，路灯也疲倦地眨着眼。

将军哪里知道，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考验”。

(14) Self—Criticism

屋外的杨树叶子青了，绿了，黄了，落了。又青，又绿，又黄，又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杨成武夫妇坐在窗前，望着再次发青的树枝树叶，心急如焚。

六年多了！

六年，多么宝贵的六年，将军可以打两个解放战争，现在却被囚禁了六年。

从东湖宾馆的地下室，被转移到山坡机场的一间单房里，后又到了河南洛阳、龙门和开封。在洛阳龙门的日子里，他们全家又被分成几个“学习班”，由林彪的死党对他们进行逼供审讯，七十多岁的老母被冻饿而死……

在开封，曾关押刘少奇的房子，成了他们夫妇的居室，再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了临汾。

这六年里，没有一个象样的当时领导人找杨成武谈过话。他曾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写过信，都没有丝毫的回音。

更使他想不通的是，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起，他的家属都因为自己而被囚禁起来，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他们有什么罪？凭什么也把他们关起来？

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自己曾经想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啊！

今天，院门开了，进来两个陌生的军人，他们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

“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说话的态度也比较客气。不象那些监视他的人。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们。别又是什么新的圈套吧！他问：

“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这时，杨成武已经知道林彪出事了（但不知道他已经摔死在温都尔汗）。他也估计到自己的事情会有所转机。

喜鹊在院子里喳喳叫个不停，杨成武对夫人说：“好事，好事啊！”

他们整理了一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跟着来人上了路。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来了，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热血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的事情。

杨成武说：“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那一阵子，杨成武的身体恢复很快，与其说是治病的良药起作用，不如说是愉快心情起作用。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中央军委的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以及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

王尚荣见到杨成武进来，跑过去，叫了一声：“杨代总长！”

杨成武握住他的手，说：“八年没见了！”

他们都是总参的人，都曾被打倒，被关了起来。现在相见，分外亲切。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不久前召开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党政军的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发表了讲话。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谈话，一向是说古论今，不拘一格。

谈开去，有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收拢来，又有当今发生的政治事件。他自然也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谈到贺龙同志，毛泽东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子，我保你，我是保他们的。

谈到此处，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周恩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辞，所以犯了错误。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

一九七四年的九月三十日夜晚，“杨余傅”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二十五年的国庆招待会。

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怎能不感触万端。六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了。

这是三个人被“解放”的第一次相见，该说点什么呢？该从哪里说起呢？

看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在台上谈笑风生，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笑了，也只能笑笑而已。

这笑，是辛酸的笑，是苦涩的笑，是微妙的笑，也是一种压抑的笑。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出来了，还是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傅崇碧说：“一场恶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

(原载《东方纪事》1988年第1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黄永胜、温玉成任职命令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 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 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决不会死心，决不会睡大觉。他们的黑心眼，总是在谋算着翻案，每日每时企图复辟。如果我们只听到欢庆胜利的锣鼓声，看不到这种锣鼓声背后的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我们就会吃大亏，胜利的果实就有丧失的危险。

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明火执仗地反对革命委员会，是越来越困难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常常改变自己的策略：或者削尖脑袋，钻进新生的革命政权里面来；或者施放糖衣炮弹，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等手段，把我们的人拉下水；或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接过革命的口号，到处招摇撞骗，搅乱阶级阵线；或者收罗心腹，安插在革命队伍内部，充当他们的代理人；或者挑起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斗争，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或者大刮黑风，否定革命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等等。但是，不管这些阶级敌人变换什么花样，“左”的还是右的，矛头都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人民解放军，对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同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革命委员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它又是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战斗指挥部。革命委员会应当领导广大革命群众，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持久地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始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主要敌人，不停顿地对阶级敌人展开进攻。只有这样，革命委员会才能不断地得到巩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权威。

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

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决定。

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矛盾。这就是说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口号）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口号）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口号）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口号）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口号）

同志们，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斗争。发展总是通过矛盾的斗争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不是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当然希望没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过去、存在、将来永远也不能消除矛盾，永远也躲不开矛盾的，而矛盾是要通过斗争来解决。另方面我们当然尽量地尽量地使之能够不变为严重的那种矛盾，使它不成为严重的情况，尽量希望我们同志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希望我们的同志更多地、好好地工作，这个愿望过去、现在都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是毛主席一贯的对干部的关心。我们大家都是这么一种心情的，希望不要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的事，这是我们的心情，是我们的愿望。可是，客观的规律，总是矛盾的，它总是要出事情的，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只有面对着客观，面对着现实，不隐藏矛盾，揭露矛盾，来解决矛盾。脓包只好让它穿头，纸里面的火总是包不住的，因此，我们只有面对现实来解决它。

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派性，这些是属于同类的东西，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它是同类。名词不同，意思也略有出入，范围也略有差别，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同共产党的党性是不相容的，同党的团结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产主义的、反党的、破坏团结的。这种思想增长一分，共产主义就减少一分，党的团结就减少一分，我们的力量就瓦解一分。而我们要想加强共产主义、加强党性、加强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的团结，就一定要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派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姚文元：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野心家！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共产主义同这些落后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这些落后的思想是尖锐地直接地对立的。这种落后思想多一分，进步的思想就少一分；这种落后思想多一分，对我们事业的损害就大一分。

整个的共产主义，可以概括为破私立公。共产主义的理论很多很多。但基本上概括为就是立公破私。而这些落后思想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根本相反的。这种思想就一定引起各种各样落后的行为，叛党的行为，叛变的行为，损害革命的行为。有的这种可能性已变为现实，有的这种可能性隐藏着还没有变为现实。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这个同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是违背的。整个的战争的胜利，是最后的这个时期，是几个野战军嘛，一、二、三、四野嘛！晋察冀也是这个解放军的一部分，可是他仅仅是晋察冀里面的一部分，第一分区这一部分，其它的还有三个分区，在那个老底子下，晋察冀这个地区，是一一五师的这些干部，可是一一五师的干部在这个地区只放下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在这个地区。所以来四个野战军有的有晋察冀的人，有的没有晋察冀的人，有的有一分区的人，有的没有一分区的人。他只用他的一个伙子，而对其他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这一套，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逐渐发展起来，和他相同的地位的一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所以我们选择了不能采取他的做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做法。

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等。在历史上历来就是对我们党的事业起破坏作用的，凡是这种东西泛滥的时候，抬头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受损失。凡是毛主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优势的时候，那我们的战斗力就加强，我们的力量就大。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党的利益，所以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思潮，反对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垮了，王明这个教条主义宗派垮了，刘少奇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水也泼不进的北京市这一摊子也垮了。贺龙在前年八月以后展开全军的大夺权，想打倒一切，就是用他们那一伙子或者被他们拉过去的人，结果他也垮了。邓小平把特书记处想搞独立王国，主席一再批评、点他的名，他不改正，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头一条不利于公，其次对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因为共产主义、大公、党性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特有的，而为任何阶级所没有的，独特的一种政治品质，别的阶级恰恰同这个原则相反。而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不能够采取任何落后的思想形态。所以，我们毛主席历来都反对这个东西。这种山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表面上他顾他那一伙，实际上是个人主义利用那一伙。山头主义就可以把我们党的政权、阶级的政权、变成个人的政权，变成一个宗派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警惕地避免这种错误。（江青：打倒个人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阴谋家！）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这种山头主义，反对杨成武的这种山头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杨成武而变成反杨成武底下的一切的人，认识他的人，同他工作过的人和拥护他的人。这种一起工作、认识、拥护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由个人选择的。并且他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毛主席的招牌，人家也不容易认识他这种个人主义的野心，是很容易蒙蔽人的。所以，我们继续相信那些参加革命、过去在他底下工作过的所有的同志，除非他的问题已经讲清楚了，还不同他划清界限，还跟他走，只有这种人我们不能信任。经过打了招呼之后，能够摆脱和他的关系，站到毛主席的旗帜下，站到毛主席的司令部来，这种人我们是一百个放心来信任他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打击这些与他同

过事，或拥护过他的人；而来观察他今后是不是思想上还不能接受中央这个决定，还拥护他、那这种人我们就不能信任。（江青：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第二点，就是过去在总参或者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比如象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这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贺龙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以及还有其他地方，夺工程兵的权。反正那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个篡军反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揭露了很多严重事实。这些人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来翻天的。也正如批判了、撤销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决不等于说二月逆流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这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江青：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谢富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姚文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再一个就是，杨成武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就是这种人。（姚文元：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打倒阴谋家！）刚才这一段语录是开会之前大家念过的，关于两面派的。现在我补充念一下毛主席关于山头主义的语录：“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杨成武，大家是知道的，以前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他当面好像反对罗瑞卿，实际上是站在罗瑞卿一边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也是拥护彭真的。所以这种行为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做了事情不承认。比如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付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三次给傅崇碧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做这个事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方面表现了他的两面派。（叶群：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为了一个问题跟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他事后赖账，他说没有讲。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表面上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却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了余立金来夺权，同余立金搞得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出来告，这个秘书就要求离婚，为这事空军采取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了。这本来是一个好心好意，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个好意，反而乘这个机会反对吴法宪同志。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

个接触了这个问题的人，接触了控告把情况向吴法宪汇报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这种做法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负人的。目的就是要把吴法宪打倒。

本来中央规定，不能在党内搞侦察的，这是一种对待敌人的办法。可是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察，吴法宪的一举一动，比如几点钟出去，到什么地方去，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他甚至还侦察中央文革的同志的行动、总理的行动。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许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表面上看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的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的以后，他要求撤回他的讲话。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分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所以他是很标准的一种政治品质很坏，阳一套、阴一套的人。

表面上杨成武对毛主席、对毛主席司令部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叶群：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江青同志的迫害！）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戚（当时是王、关）的问题，因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经过主席再三的催促才去的。所以不要看他表面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江青：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吴法宪：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姚文元：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过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很幸福，引了句俗话，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人反对这句话。杨成武认为反对这句话的人没有什么，采取包庇的态度。他说，这个不算什么。这可以看出他对于毛主席的作用，对毛主席在全世界、全中国、全党、整个阶级与人民的伟大作用是估计不够的。（姚文元：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一个专案迫害江青同志。（吴法宪：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同志们致敬！）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叶群：江青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整江青同志的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江青：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杨成武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那个“代”字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做做看。行不行，当时实在没有把握。现在看来，主席看对了。可是他对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代”字不舒服，还

想去掉这个“代”字。在总参、向下布置要树立他的绝对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就对这个人实行隔离反省，派三个人来盯梢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得厉害，不该他出名的事情他也争一份。就在最近不久，山西搞了一些材料，他没有出过力，他也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还有，什么大树特树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还不满意。第一版上当天登的什么？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他的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下命令全国的军队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被吴法宪同志扣了。虽然扣了，还用电话通知全军学习他的东西。

杨成武的事实可以说很多，山头主义的表现，两面派的表现以及其他还有许多坏的表现。这里讲的只是在会议中间零碎的、听到的一些，不全，也不准确，也还有很多事实没揭露出来。讲这一部份事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他的道德品质是很坏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毛主席今天同我讲了，他说要讲点马克思主义。他讲除了山头主义，两面派以外，还要讲点马克思主义。指什么问题呢？是指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本来是普通战士提的，《人民日报》宣传开了，大家宣传开了。这种宣传，作为对主席信任的态度，象一个战士的想法是犹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科学的语言、作为哲学上的语言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

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指示是这样说的：“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这是毛主席去年十二月的一个批示。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这样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这就是毛主席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

相对和绝对这是真理问题上一对经常用的范畴，一对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是不承认有孤立的绝对，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总是同相对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认识的过程，就是绝对和相对的矛盾过程，这种矛盾的解决就使我们认识前进一步，就向绝对真理前进一步。绝对的东西它不能孤立地存在，如同任何抽象的概括离开了具体不能单独存在一样，如同一般不能离开个别一样，如同无限不能离开有限一样，如同共性不能离开个性一样，它是不能自成一体独立存在的。我们承认有绝对，但是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我们每个时候的认识都是相对的，这是主要的一面。由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我们所知道的事实的情况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候的认识，无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是对社会领域里面的认识，无论是思想上对某一个原则的认识，都是处在这种相对的状态中。只有通过无数的相对，才能一步一步地来接近绝对。可是我们永远只能接近，我们永远也不能完成。只有认为事物停止了、不变了、不发展了，那么，我们反映客观的这种观念才能成为绝对。可是事物永远在发展着。辩证法也可以说是发展法，是运动法，是变化法。因此我们不能有一种绝对，如果是绝对，就把事物看死了，把我们的观念看死了。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范畴、我们的一切原则，是随着事物的变化来变化的，它不是不变的。当然，事

物在一定条件下这种认识具有可靠性的，这是不能否认的。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就变成相对主义。如果我们把绝对的东西、把事物看成绝对，把真理看成绝对，则把事物的运动停止了，把我们观念的运动停止了、僵化了，我们的思想再不会前进了，事物再不会向前发展了。如果我们凭着这个观念，思想上就会僵化，我们就会把事物看成死的、把概念、把原则、把范畴、把定律都看成死的。

不仅政治上如此，社会如此，就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比如说水，在零度以上是液体，百度以上变气体，零度以下是固体，也是有条件的。如把水拿到最高的山上去，它不到一百度就开了，因为在上边的气压小，空气稀薄，所以是有条件的。水也不一定在零度就开始结冰的，也许零度不能结冰。至于自然科学上一切其他定律、规律，无论是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都是处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这种自然科学，只是现在发展阶段，而不是永久如此。事物的发展不仅如此，就是事物还没有什么基本变化，可是，我们的认识的水平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原来没有认识的事物，我们以后会认识的，而原来认识的东西中包含很多是错误的，因为经过向前的认识而克服了。所以，自然科学现在这一切教科书上的所列的规律，都不是绝对的，将来还有很大的修改，很大的补充，其中包含很多错误。现在大学、中学所教的东西，就是全世界上公认的东西，现在还包含着很多没有认识的东西，已经认识的东西还包含很多的错误，将会纠正，将会发展的。而这种自然科学的定律，不论那一个科学部门的、仅仅是由于它在地球上这种条件。各种数据、各种定律假如拿到另外的环境中去，比如放到月球上去，有很多东西要被推翻的。放在太阳里去，高温达一万多度以上，很多冰点、沸点统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这些真理一方面是真理，但不是绝对的真理，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死的。

所以我们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不停滞的，不保守的，是进步的，发展的。正因为我们是依靠着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否认这些定律的绝对性，否认这些定律的僵化，使得我们对科学的发展才觉得大有可为。还有很多没有认识到的、而业已作过的结论有些要被推翻的。我们每一个认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任何时候都是二重性、而不是一重性的，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单纯的相对的，它总是具备二重性的。所以列宁说：相对和绝对，也是相对的，相对不是简单的相对、而是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绝对之中包含着相对。只有这种思想作指导，我们才看出万物在变化，我们一切政策、一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应该相信它还会变化，还会发展的。这一对范畴是在认识论里面经常用的一对范畴，是真理论中经常用的一对范畴。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我们就容易变成教条主义，使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客观，成为不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正确的，可是，进入列宁的阶段的时候，不是大大地丰富发展了吗！并且把马克思原来提出的某些在当时条件可用的准则，而到后来条件变了不能用了吗！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没有错的，而且他提出的问题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正如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毛主席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大地丰富了吗！不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所没有讲到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把马克思、列宁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出来了吗！毛主席不是现在还继续在发展着自己的思想吗！这就证明了我们的思想是不能被它用绝对的概念来限定的。绝对事实上是错误的反映了客观，客观上永远也不会有孤立的绝对。如同桌子、茶杯、扩音机，这只有具体的桌子，具体的茶杯，具体的扩音机，而这种抽象的桌子，抽象的茶杯，抽象的扩音机是只能存在于具体之中，它是不能

单独存在的。房子的概念是很多房子的抽象，而离开了具体的房子的抽象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解剖麻雀，解剖麻雀就是从具体中间来找抽象，从个别中间找一般，也就是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割裂开，而不是把它孤立起来。而杨成武这种说法，说是有哲学的根据，说是合乎哲学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不但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就是在政治上、绝对权威只有在奴隶社会里面才有这种情况。奴隶主可以自由支配他的奴隶，可以杀，可以当牲口来用，而奴隶就成为哑巴工具。把工具分为能说话的工具和不能说话的工具，人就变成能说话的工具。而奴隶在法律上不是人，法律上不承认奴隶是人而是作为牲口。这种情况只有在那个社会里才有的，进入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更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政治上是不符合事实，也是不通的。我们大家作为一种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主席的尊重，一种文学语言来讲，一个战士的语言来讲，还说得过去，如果真正提到作为科学的语言，作为哲学上的范畴，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实际上的害处是使我们对事物的运动否定了，对于各种原则的发展，概念的变化，发展都否定了，我们的思想就会僵化起来。所以，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想法，而必然导致到我们行动上的错误做法。因此，毛主席提到，要把这个问题讲一讲。

(吴法宪：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讲话，材料很零碎，东听一点，西听一点，可能不准确、不全，又没有很好整理，只是把中央的决定告诉大家。

我讲的三个问题，山头主义、两面派、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就这三个问题。现在我来喊几句口号结束我的讲话。

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肖华！

打倒二月逆流毛将谭震林！

反对为反动的二月逆流翻案！

打倒山头主义！

打倒宗派主义！

打倒两面派！

打倒野心家！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

思想伟大红旗！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和林彪接见军队干部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最近接见了军队干部。这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

被接见的有：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的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在京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等，共一万余人。

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同志。

接见以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向被接见的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神焕发，健步来到接见会场，长时间地向被接见的军队干部亲切地、热烈地鼓掌。

当毛主席出席时，整个会场立即沸腾起来。这些在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教育下的军队干部，他们在长期的战斗岁月中，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主席怀有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现在，在这个最幸福的时刻，他们无比激动，热泪盈眶，对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革命激情，高举红彤彤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接见结束时，全场同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高唱《国际歌》。全场再一次长时间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华社 1968 年 3 月 26 日讯，载 3 月 27 日《人民日报》)

革 命 委 员 会 好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联翩出现的革命委员会，象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现在，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在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了一个重要标志，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壮丽一幕。

一年前，当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天才，高瞻远瞩地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总结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一年多来，它在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中，已经显示出朝气勃勃的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深深地扎根于群众。毛主席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群众的代表，特别是工农劳动群众的代表，是有实践经验的革命战士。他们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的利益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就使得各级革命委员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这对于保证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血肉相联，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革命的“三结合”，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军民团结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多来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受到很大的锻炼。由于解放军代表直接参加了各级临时权力机构的

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更能够经受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就更能够粉碎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

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革命的领导干部起着骨干的作用。他们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帮助，深刻地触及了他们的灵魂，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在革命委员会中，革命领导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好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正确地组织和带领群众前进。同时，在革命委员会中，有老干部同青年的新干部一道工作，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做到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这就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组织上有了保证。

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同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它有着自己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象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在做那样，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滋生。这样，就能够发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要真正成为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革命司令部，就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断地巩固起来的。

革命委员会千好万好，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战员，是广大群众在斗争中识别和选拔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他们正在把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对自己的最高要求。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员，要继续把学习毛主席指示、执行毛主席指示、宣传毛主席指示、捍卫毛主席指示，当做自己最神圣的职责。革命委员会要保证毛主席的各项指示能够最迅速最准确地传下去，使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它还在发展。一切革命的同志，应该爱护它，支持它。对于它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提出批评，帮助它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一切参加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模范地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严格要求自己，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十分注意扫除脱离群众的灰尘。

星罗棋布在祖国各地的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将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树立起无产阶级权威，发挥出巨大的革命作用。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 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 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兴无灭资，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增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加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我国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怎样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创造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功经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一场革命，不仅遭到资本家的种种反抗，而且遭到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总代表中国赫鲁晓夫的拼死反对。事实上，围绕着这个问题，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路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路线，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两条路线，随着斗争的发展，围绕下面三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搏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猖狂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路线，坚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政策。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斗争的焦点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真改造还是假改造？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使用阴险的手法，妄图“换汤不换药”，使资本家仍然牢牢掌握企业的实际领导权，从而“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要不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更是拼死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大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阴谋以此为烟幕，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妄图把公私合营企业办成“形社实资”的企业，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十八年来，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正是这样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历史，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节节胜利、不断前进的历史，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抵抗而遭到失败的历史。

要不要进行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伟大导师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情况，把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区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官僚资本是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对于它，我们必须采取没收的办法，把它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于民族资本必须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最后把它消灭。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还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是，必须对民族资本加以限制，并且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在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指出：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且明确提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随后，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公然跳出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认为对于民族资本不应采取限制政策，而应欢迎资本家剥削，并竭力制造资本主义“剥削有功”的反革命舆论。他到处叫嚷什么“搞社会主义，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一再宣称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就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使中国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

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国赫鲁晓夫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一文中就鼓吹：对私营企业实行“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即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的好”。一九四九年北京、天津解放以后，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反动主张。他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还说什么“也许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发展生产，并不反对那样生产发展得多”。

所谓“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平行发展”，所谓“并不反对那样生产发展得多”，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和改造，一心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吗？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关于使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领导成分的指示吗？说穿了，这实际上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中国赫鲁晓夫提出的这条反动路线，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他

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在这里暴露得多么清楚啊！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尽管有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拼命干扰和阻挠，尽管遭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复的反抗和破坏，但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依然一浪高一浪地向前胜利发展。

是真改造，还是假改造？

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它象一阵强劲的东风驱散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乌云。在我国广大农村，一个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以万马奔腾之势，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地实现了。毛主席又适时地发出了伟大号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立刻传遍了全国。广大革命职工积极响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在滚滚向前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面前，中国赫鲁晓夫眼看公开阻挡是不行了，于是又赶忙变换反革命手法，利用他窃取的党政大权，有时在台前，有时在幕后，向社会主义改造发射一支又一支的毒箭，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妄图把这场震动世界的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他一面故意抹煞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大造“合二而一”的反革命舆论，极力美化资产阶级，说什么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本家自己要这样作的”；一面又拚命为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阴谋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办法，使资本家继续掌握企业的领导大权，以达到保存资本主义的目的。

中国赫鲁晓夫早在建国之初，就曾经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底”的话：“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这样，“资产阶级”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期，中国赫鲁晓夫唱的仍然是这个调子。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否！

我国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严重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所以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逼出来的：第一，我们连续进行了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第二，我们没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样，国家就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就更便于对其余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加以改造。第三，我们逐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从而切断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农村的联系，使他们处于从长期革命斗争和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工农联盟的夹击之中。第四，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和斗争，例如建国初期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的斗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三反”、“五反”斗争等等，通过这些斗争，无产阶级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第五，我们控制了原料、信贷和市场，使私营企业从生产到销售离开国营经济就

寸步难行，这使我们有可能经过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互相衔接的步骤，一步一步地逼他们不能不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赎买的政策。经济上从分配一定的利润到实行定息制度，宪法上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使他们看到接受改造比抗拒改造较为有利。同时，对他们本人及其子女进行了必要的政治教育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系列重要条件下，经过反复的斗争，才使我们胜利地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赫鲁晓夫把工人阶级经过严重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所夺取的这一伟大胜利，说成是资本家“开明”、“进步”的结果，其目的就在于继续为资产阶级捞取骗人的政治资本，为资产阶级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实质上就是基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企业的领导权，决不是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企业中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更不允许由资产阶级继续掌握企业的领导权。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千方百计地要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企业的领导大权，实行“合公营私”“化公为私”。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他大肆丑化在企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同时美化和吹捧资产阶级分子。他一面咬牙切齿地咒骂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说：“当了共产党员，就蠢得很”，“吃了公家饭就没有商人聪明”，一面又说：“资本家的财产都交了，已不是资本家了，……不要以为那些人提拔起来一定比你们差”。他叫嚷要工商部门把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当作“先生”、“财富”、“宝贝”加以重用，不能担任实职工作的，又要请他们“作顾问，作参议，当先生”。如果谁不听他这一套，他就给谁戴上“保守主义”、“宗派主义”的帽子。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让资产阶级掌握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大权，为了把公私合营企业变成“形社实资”的企业，还竭力丑化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制度和作风，吹捧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制度和作风，力图把资本主义企业的一整套组织形式和制度、方法统统保留下来。他一方面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商业存在着不灵活性、愚蠢性”，一方面宣扬资本主义“怎么利润多，就怎么办”的生意经，甚至公开提出“社会主义要照资本主义的样子办”。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要对社会主义进行资本主义改造？中国赫鲁晓夫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难道还不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然而，历史的潮流奔腾向前，势不可挡。正如毛主席所说：“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还是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发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这是在中国最后地、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保证国家永不变色的伟大战略措施，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标志着工人阶级在对资本家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还要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因此，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特别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解决。

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因此，在实现公私合营以后，还必须以企业为基地，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下，对资本家个人进行长期的认真的思想改造，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最后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彻底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完成这个任务，比实现企业的公私合营，要艰巨得多，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贼心不死，他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久，他就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今天的资本家已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资本家了”，“他们百分之九十几政治上是可靠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公方和私方已经变成单纯的‘共事关系’了，可以用妥协的办法来解决”等等。他画龙点睛地把他的意思概括为一句话：“中国资产阶级还要香一个时期。”

要资产阶级“香”，无产阶级“臭”；资本主义“香”，社会主义“臭”——这就是他大肆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真正用意。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发动了猖狂进攻；一九五九年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发动了猖狂进攻；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再次发动了更猖狂的进攻。而中国赫鲁晓夫本人正是资产阶级屡次猖狂进攻的总后台。这样一些铁的事实，不是清楚地说明“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敌人掩护进攻的一个烟幕吗？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国赫鲁晓夫在给工商联一个负责人的信中公然说什么，资产阶级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经过了几个认识阶段，最后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随后，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悦服也者，包括感情和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一改变，感情也就变了，对国家的进步就会感到高兴。”

好一个“信服、悦服”！好一个“世界观”的改变！照他这么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没有两面性，不需要再改造了，不仅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了，而且简直可以“和平长入共产党”了！怪不得中国赫鲁晓夫公然要把一些资本家拉入共产党内来了。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掩人耳目，也假惺惺地说过一些对资产阶级继续“改造”的话。但是，他是怎样说的呢？请看一九六〇年他对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讲的这段妙论：“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工：你们包一头，叫所有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走，思想进步，改造世界观，为国家做事，这一头你们包了。对工商业者照顾，我们包了。那一头做得不够，可以互相提意见。我们来一个口头协定。”妙得很！工商联管改造，共产党管照顾。这到底是要谁改造谁？按照这种荒谬绝伦的“分工论”，党对资本家岂不只有照顾的义务，而没有改造的权力吗？中国赫鲁晓夫又要资本家掌握企业领导权，又不准党对资本家进行思想改造，这不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中国赫鲁晓夫不仅要保护旧的资产阶级，而且要培植新生的资产阶级。一九六一年和

一九六二年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相呼应，他竭力鼓吹扩大自由市场，宣扬“可以考虑允许一批商人出来，开放一批，给他合法化”，“有的开地下工厂也好”，“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甚至公然叫嚷“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是何等狂妄！不仅如此，他还妄图把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也“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为此，他疯狂地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总结的“鞍钢宪法”大唱反调，要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推行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阴谋在国营企业中也培植起新生的资产阶级。这除了说明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就在中国赫鲁晓夫进行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达到空前猖狂程度的关键时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一声春雷，横扫了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的反革命谬论，粉碎了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的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中国赫鲁晓夫的丧钟敲响了！这个几十年来一心要搞资本主义的老反革命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头来，这个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小丑，不但没有把资产阶级搞“香”，反而连他自己也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堆。

（原载 1968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分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湖南省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和推广“在革命的

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获得的经验，要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经常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的运动，民拥军，军爱民，继续巩固军民之间的团结。巩固各部队之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通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

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在军队干部会议上的重要指示、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的重要讲话；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在北京群众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央办公厅已将录音复制发到各地。望你们普遍地播放这两次录音，使每一个战士、每一个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能直接从这些重要指示和讲话中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决策，以便广大军、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

中央同意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四月十日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李德生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安徽省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开始就积极投入运动，同刘邓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展开尖锐的斗争。毛主席对安徽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关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对安徽驻军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英明指示。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和五条批示。九月前后，康生同志多次接见了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并作了讲话。九

月五日，江青同志对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仅引导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且指导了全国的革命斗争。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辉煌成果，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隐藏在安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于他们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和破坏。这一伙阶级敌人或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散布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此等等，充分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英勇的搏斗。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李荷华、黄岩等的反革命罪行，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揭穿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各项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狠抓阶级斗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各项工作的革命化。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

安徽是我国煤炭、钢铁、粮食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省份，是我国东南水陆交通运输的要道，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工农业生产，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把安徽省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原载 1968 年 4 月 17 日《人民日报》)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

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级。在各个阶级内部，又存在不同的阶层。各个阶级和阶层，在政治斗争中，都会有左、中、右各派的区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作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列宁说：“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它归根到底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的。”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并以党派斗争的形式最充分地展开。政党和政治派别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资产阶级有不同的党派，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两派。工人运动内部也有不同的党派。在第一国际内部，有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派别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二国际有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同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派别的斗争，考茨基曾经在一定时候是中派，大战中变成了右派。在第三国际的斗争中，列宁、斯大林是真正的左派，布哈林是右派，托洛茨基是形“左”实右派，后来变成赤裸裸的反革命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是工人运动中的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别动队，它的基础就是工人贵族，它的思想，实际上是反映在工人阶级内部、企图腐蚀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指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这是真理。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只有无产阶级中最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部队，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完整地、真正地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才能有最强烈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党性。我们一般所说的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党性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派别，就其世界观来说，基本上就是两大家，就是这两大阶级的党派性。

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说，不仅要看他们的口号和言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实际上站在那个阶级一边，执行的是那个阶级的路线，他们的行动对那个阶级有利。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无产阶级先锋队历来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正如毛主席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必须遵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使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胜利地前进。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就容易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加强无产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团结，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对于资产阶级的派性，必须坚决给以揭露。谁如果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而又坚持不改，那是很危险的，那就有可能站错队，甚至被坏人利用。对于小资产阶级要加强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

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是为了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列宁曾经说过：“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我们要进一步发展严格的无产阶级党性，做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形“左”实右的极“左”派，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原载 1968 年 4 月 27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一年多来，陕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了西北和陕西地区以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反革命老巢，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和陕西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起了促进的作用。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对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陕西地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习仲勋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地区的代理人大叛徒刘澜涛等批倒批臭。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揭露并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推广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经验。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

“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乘 胜 前 进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在欢庆自己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快两年了。这场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中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步地被人们觉察出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的形势。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遍及全国城乡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推动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把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结合起来，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猛烈的进攻。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带动了生产，工农业战线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是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总结丰富的阶级斗争实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那些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利令智昏，竟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把这样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从阴暗的角落里冲刷了出来，使他们的丑恶面目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敌人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用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作垂死的斗争。

正因为这样，处在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决不能因为胜利，就骄傲和麻痹，懈怠起来，放松对敌斗争。必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流毒，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要善于识别反革命分子的卑鄙手段，要善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粉碎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和分裂我们的革命队伍的一切阴谋诡计，粉碎他们一切复辟、变天的痴心妄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作为无产阶级的左翼，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新形势下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切实地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永远保持革命的朝气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原则性，同阶级敌人那些从右的方面来的或者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进行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我们永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同广大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无产阶级要彻底战胜自己的敌人，必须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必须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加强工农联盟，团结绝大多数人。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广大群众和混入其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团结对敌，始终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而绝不能把矛头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和革命群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劳动群众的子弟兵，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运动，大力加强军民团结。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正呈现出新的高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伟大的新风暴，亚非拉地区人民革命

武装斗争蓬勃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各国反动派法西斯暴行的正义斗争的新发展，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团体革命斗争的新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苏修叛徒集团等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加速分崩离析，就是当前国际形势大好的突出标志。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给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我们一定不辜负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的期望，坚定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一定要更有力地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外动派的斗争，更好地完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乘胜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 1968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和林彪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 “五一”国际劳动节（节录）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

在我国亿万军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今天晚上同首都革命群众一起，欢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汪东兴等同志。

在天安门城楼参加晚会的还有：

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蔡畅、徐特立、邓颖超、滕代远、萧劲光、粟裕、王维舟、张云逸、萧克、王震、曾山、刘格平、王树声、王恩茂、杨得志、罗贵波、谢觉哉、李大章、陈锡联、李涛、陈奇涵、吴德、范文澜、赛福鼎、方毅、韩先楚；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兵种、院校的负责同志和英雄模范代表李天佑、王新亭、温玉成、胡炳云、吴保山、张池明、张令彬、张贤约、张天云、肖力、罗舜

初、钟赤兵、刘华清、蔡顺礼、张震寰、王宏坤、赵启民、周希汉、张秀川、王秉璋、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曾国华、江腾蛟、陈仁麒、匡裕民、吴烈、黄志勇、谭甫仁、胡奇才、罗华生、江文、黄文明、李真、阎揆要、刘忠、宋维栻、郭天民、张福全、年四旺、陈金元、欧庆伟、刘振成、乔喜增、石福田、郑定富、张夙岐、时龙昌、丁秀珍；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委员贝时璋、邓初民、卢汉、叶渚沛、史良、庄希泉、朱良才、华罗庚、严济慈、吴有训、张梁、陈其尤、陈垣、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竺可桢、季方、周纯全、孟继懋、施复亮、赵九章、赵忠尧、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龚饮冰、童第周、谢南光；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同志谭冠三、石有玉；

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黄火星、黄庆祥；

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王良恩、袁任远、曹轶欧、罗青长、郭玉峰、任允中、尹忠尉、蔡传云、李少初、唐平铸、舒世俊、郝德青、韩念龙、余秋里、苏静、李良汉、李震、曾威、于桑、施义之、万海峰、庞坦直、郝建刚、刘文辉、王云、胡鹏飞、朱互宁、兰文兆、严庆提、袁学凯、朱光亚、周洪波、彭林、张明远、刘世雄、钱学森、张翼翔、周特夫、王素、宋承志、陈德三、王乐天、张国传、李大同、钱之光、毛洪祥、杨卫群、徐之文、杨杰、张瑞基、陈挽澜、刘忍、龙振彪、殷承祺、沙千里、樊省轩、范子瑜、林海云、李东野、张奚若、刘崇仁、樊九思、郭世荣、沈敏、孟子皿、刘路明、张纪之、刘锦平、丁江；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李四光、傅作义、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

知名人士李宗仁先生；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刘锡昌、鲁文阁、苗永昆、邓万田、罗瑞华、张桂福、聂元梓、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丁国钰、王大宾、李冬民，以及北京矿务局革委会主任赵光、首都钢铁公司军代表曲昆、北京针织总厂军代表古远兴；

北京军区负责同志郑维山、陈先瑞、吴先恩、萧文玖、黄振棠、陈正湘、董其武；

北京卫戍区负责同志温玉成（兼）、黄作珍、刘绍文、刘福、曾绍东、李钟奇、钟辉琨、马兆民、潘永堤、白儒生、范普权；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组小组）和各军区、部队来京负责同志滕海清、马力、张英辉、王效禹、王竹泉、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李伯秋、杨弃、何友发、潘焱、张廷秀、李布德、刘浩天、周仁杰、王学勤、刘培善、邓克明、朱绍清、廖海光、周世忠、严政、杨思禄、朱耀华、刘健挺、郑国、王直、尹明亮、张雍耿、丁盛、龙道权、桂绍彬、罗文华、杨焕民、郭鹏、张希钦、何家产、裴周玉、孔瑞云、曾如清、陈康、田维扬、崔建功、吴效岗、段思英、梁中玉、刘环、陈明义、曾雍雅、王诚汉、余致泉、任茱、廖步云、吕义山、阴法唐、肖前、邓少东、谢家祥、曲竞济、韦统泰、兰亦农、丁钊、曾美、李光军、王猛、张百春、聂济峰。

在北京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反帝革命战士和其他国际友人，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应邀参加了晚会。

（新华社 1968 年 5 月 1 日讯，载 5 月 2 日《人民日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

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庆祝湖南、安徽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五一”社论《乘胜前进》，传达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望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以及一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最新指示，继续胜利前进。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五月七日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同意设四十五名常委；同意由陈锡联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田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光荣诞生的。两年来，辽宁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帮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他们在东北和辽宁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联盟的残余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隐藏在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辽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央热烈祝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

权问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遵照林副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讲话中所说：“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使自己成为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的比例。中央希望，辽宁的工人阶级应充分认识自己的领导责任，在完成省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中起着带头的模范作用。

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辽宁省至今还存在着跨行业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希望，辽宁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应积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必然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辽宁处在反帝反修的第一线，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需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警惕，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苏修、美帝、日本、蒋匪的特务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为了一致对敌，必须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极“左”思潮，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利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和驻辽宁部队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断加强军民之间在革命原则下的团结。沈阳军区和人民解放军要巩固国防，严防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在边防上的军事挑衅。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省革委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协同东北的兄弟省份，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整个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铁路交通运输计划。

中央希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吸取他省先进经验，把辽宁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命 令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为了彻底揭开体育系统阶

级斗争的盖子，把坏人揪出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一、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机关，及所属运动系（队），由所在地区的大军区、省军区接管。

二、各航空俱乐部（包括飞机、器材）和滑翔机制造厂由各军区空军接管。

三、各航海、潜水俱乐部（包括船只及航海器材）由海军各舰队接管。

四、各无线电俱乐部（包括通信设备、器材）由各军区通信部门接管。

五、各射击、摩托俱乐部（包括射击场、武器、弹药、摩托运动器材）由各大军区、省军区指派军训、军械部门分别接管。

接管国家体育系统的工作，由各大军区统一组织实施。根据实际需要由陆军、海军、空军分别派出军管小组或军代表。

各单位接此命令后，立即遵照执行，并将接管情况及时上报。

〔附〕 推倒“五·一二命令”，团结战斗向前进

《体育报》社论

经党中央批准，“五·一二命令”撤销了。纸船明烛，体育战线共送瘟神。这件事实在值得大庆贺。

“五·一二命令”制造了全国体育系统的最大冤案。国家体委是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从它成立以来，坚持的是马列主义路线，执行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广大干部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工作成绩卓著。但是，“命令”却把国家体委系统说成是“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正确路线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忠诚党的体育事业的负责同志被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成了“独立王国”的“公民”，成绩被指为“罪证”，是非颠倒，人妖混淆，思想搞乱了，队伍搞散了，正确变成了谬误，革命成了反革命，多少干部和运动员、教练员横遭迫害。这个大冤案如不平反，体育战线的同志就得不到彻底解放，体育工作就不能顺利前进。今天，党中央决定撤销“五·一二命令”，为国家体委系统“独立王国”彻底平反，正义得以伸张，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体育战线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林彪、“四人帮”同那个窃据高位、心怀诡计的“理论家”，为了篡党夺权，精心设置了“五·一二命令”这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本来，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对体育工作不闻不问，对体育战线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为什么突然要向体育战线开刀呢？问题很清楚，贺龙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篡权窃国、反党乱军的一大障碍。早在“命令”出笼之前，他们就对贺龙同志横加罪名，蓄意陷害。炮制“五·一二命令”是他们妄图打倒贺龙同志的严重步骤，也是他们借此发难、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的险恶信号。

“五·一二命令”是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维护毛泽东思想为名，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推行一条“左”得不能再“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口里高喊“最、最、最”，到处大搞“斗、斗、斗”，否定一切，打倒一切。这条路

线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和祸害，把党和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他们全盘否定马列主义路线在体育战线的主导地位，否定党对体育工作的正确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全部成绩。他们从上到下，到打倒贺龙同志和各级体委的领导干部，把大批忠诚党的体育事业的干部和群众赶出体育战线。体育事业遭受到的这场浩劫，最清楚地说明，林彪、“四人帮”等一伙高喊的“革命”，正是革正确路线的命，革社会主义的命，革马列主义的命。他们的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具有极大的反动性、欺骗性和破坏性。直到今天，在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宁‘左’勿右”，“只能反右，不能反‘左’”，明明是“左”还只能说右等等流毒和影响。不彻底清算这条路线，不批左倾，党的各项政策就不能落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不能贯彻，体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就不能迅速实现。

“五·一二命令”的撤销，是真理对邪恶的胜利，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胜利，是党和人民的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是最顽强、最有说服力的。一切骗局和反革命阴谋，统统都要被打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任何在人民群众头上鸣鞭的野心家、阴谋家可以逞凶肆虐于一时，决不能得意于永久。体育战线十七年的功罪，只有人民才能作出最权威、最公允的评说！党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推倒了“五·一二命令”，去掉了我们政治上、精神上的“紧箍咒”，体育战线的同志们，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吧！我们要认真总结体育工作三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敢于冲破一切“禁区”，理直气壮、大刀阔斧地把一切被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恢复和发扬起来。我们要为一切因“命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和假案彻底平反昭雪，所有受到迫害、株连的同志，所谓“独立王国”的全体“公民”，统统都要恢复名誉。我们要彻底破除迷信，大胆解放思想，把各种余孽一扫而光，让革命的积极性、创造力充分地喷发出来。我们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促进体育事业大于快上。

“五·一二命令”撤销了。我们迎来的是体育战线一派明媚春光。埋葬了林彪、“四人帮”等这伙恶贼，雄姿英发的体育大军一定会随着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开创出体育事业大发展的新局面，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成绩、新纪录，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原载 1979 年 2 月 14 日《体育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经市革命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指引下，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更加深入的开展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揪出一批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清理了阶级队伍，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更充分的发动群众，乘胜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现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单位的军管会，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群众反

复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和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认识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思想上深入发动群众，克服一切阻力。要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同时也要警惕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扩大打击面，制造混乱。要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树立一支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揪斗坏人，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和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揭露走资派包庇坏人、坏人勾结走资派的罪恶勾当。进一步提高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斗争水平，更有力、更准确地把深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并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恶联系起来进行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三、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掌握准、狠、稳的原则。要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跟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的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绝不允许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要团结和争取多数，把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于那些作恶较轻、主动认罪、接受改造的次要分子，对于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一般群众也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派一起干过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加以区别对待，以利分化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坏的分子。

四、要注重调查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六·六”通令。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私自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严禁打人和其它形式的体罚，打死人是犯法的。严禁逼、供、信，要反复地交代政策，给予出路，防止发生自杀。要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掌握确凿的证据和材料，不要轻信口供，谨防阶级敌人陷害好人，搞阶级报复。要把群众揭发同专案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一般定案处理要放在运动后期。

五、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揪斗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两派组织不要借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相互揪斗，进行宗派斗争。有些群众组织自己清查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别的群众组织不要借此打击这些群众组织。要进一步清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粉碎阶级敌人分裂革命群众队伍的阴谋。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

五月十五日下午召开了市革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在讨论文件的过程中，谢副总理、吴德同志询问了农大、师大、北航和其它单位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并结合文件精神，谢副总理作了重要指示：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项很严肃、很复杂、很重要的工作，必须很好的掌握。目前，全市各单位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最新指示精神，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都在进行这一项工作。中央文革的同志去年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和北京工人座谈会上对此就作了明确地指示，要很好的学习，按照这些指示精神进行工作。这一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样，就需要定出几条来作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意见，有的同志说文件应该写得具体，政策界线分明。我看这个意见也是有道理的。以后可以将一些单位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转发下去，这样，就会使这些具体政策更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更符合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符合群众路线。市革委会现在发这一通知是很必要的。这个通知上有一些话看起来是说过多次的了，但是真正作到不容易，还有距离。如果大家认为这一条正确，就应该坚决去执行。

下面我讲几点具体意见：

第一条：关于组织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指示，这是首要的，必须狠抓、抓好。当前，要反右防“左”，以反右为中心，要注意防止扩大打击面。

第二条：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这个工作，必须持续下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在北京市的代理人彭真、刘仁一伙叛徒、特务，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坏人，许多单位的坏人就是在他们的包庇下隐藏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要搞彻底，必须紧紧结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们的代理人。不要光看着本单位几个坏人，这样就可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对准被这些家伙包庇下来的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些听起来是老一套了，但是作到这一点的单位就很不容易。我是有调查研究的，前几天我到几个工厂作过调查。

第三条：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清理工作必须正确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制定的政策。文件中说：“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跟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的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这几个区别一定要掌握好，这一条是很重要的一条，特别是对于学生中的问题的处理要特别谨

慎。当然学生中也可能有个别坏人要处理。但是，处理学生中的问题一定要慎重一些，这一条我今天特别强调一下。

第四条：要注意调查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场肃反运动；这一工作我们党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定要注意调查研究，分析和掌握材料，以及确凿的证据，一定要反对逼供信。什么叫逼供信呢？就是我们一逼他就供，供了我们就信，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不足之处的，一定要有可靠的旁证材料，不能轻信口供。另外就是公安机关抓人的问题，除了十六条上规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公安六条上规定的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证据确凿的可以抓起来，不要多抓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说的，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关于自杀的问题，特别是农村，还有学校、工厂都存在，我建议农村要停止一个星期的清理工作，把自杀的风刹下去以后，再进行。当然，这么大的运动个别坏人自杀也是难免的，但是多了对我们的工作开展不利，很多问题就不好查了。自杀的原因一方面是坏人畏罪自杀，另一方面我们革命群众可能交代政策、指明出路不够，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要杀嘛，只要他愿意接受改造要给予出路，至于活活把人打死，那就更不对了。当然，这些事情都是由于没有经验所造成的，不要去追查责任，主要的是总结经验，要认真贯彻、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只准文斗，不准武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功受奖，这里还应该加上：“严禁个别打死人的现象”，“要交代政策，严防自杀”。“严禁私设公堂”。

打死人这件事一定要引起重视：中国因为封建关系，老子死了儿子难改造。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关于到运动后期处理一条，这是指一般而言，要求把工作做细致，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有些证据确凿的坏人你们现在也可以定案，按党的政策办嘛！

第五条：是说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没有权力机构，清理工作不成熟的，暂不要自流的去搞，这一工作必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

如果你们认为这个文件是对的，就要坚决执行。

(根据讲话精神整理)

划时代的文献

——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两年前，一个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诞生了。

这个《通知》，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划时代的文献，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军的战斗号令。

两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这两年发生的革命变化是多么巨大啊”毛主席在《通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抵抗，武装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发挥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威力，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年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主席在《通知》中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于无产阶级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充分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造性的发展，它对于我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

在这两年中规模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象大海的怒涛，把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冲垮了，把那些反共、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冲刷出来了，粉碎了他们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现在，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的确凿事实，已经查明，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利益的反革命黑帮。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党内头号的走资派，就是多次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脚下的可耻叛徒。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以及陶铸、彭德怀、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等，都是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家伙，钻到了我们党里，窃据了不少重要的岗位。他们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埋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中国就会重演苏联和一些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统治的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悲剧，就会回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

我们同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正如毛主席最新指示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

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段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我们党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又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继续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象那些极端狡猾，极端阴险毒辣，藏了那么久，钻得那么深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正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动起几万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才把他们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亿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在这场大革命中对这些阶级敌人进行惊心动魄斗争的伟大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战斗的光辉。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以从来没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在《通知》的鼓舞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涨。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斗争中涌现出来。

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进一步取得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

在政治思想领域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无产阶级压倒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压倒无产阶级。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对毒草，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是要坚决斗争，坚决批判。无产阶级就是要压倒资产阶级，对他们决不能讲什么“平等”。正如毛主席在《通知》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两年来，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进行革命大批判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各种不同的思想，都还会登台表演。那些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还会采取不同的

伪装，采取两面派手法，进行欺骗。我们必须继续执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指示，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对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继续进行批判。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性，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想，批判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流派，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从思想上扫清道路。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各条战线上高高飘扬。

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正如毛主席指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主席最新指示说：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这种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由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的丰硕果实。它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这种权力机构，代表着工农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更好地帮助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权力机构。这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力量（革命群众代表）、坚强柱石（人民解放军代表）、领导骨干（革命干部代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军民的团结，军政的团结，干群的团结，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民群众最充分地发动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都在关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大问题，积极参加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这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的专政，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专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取得全面胜利，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越来越发挥出巨大的革命威力。

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是灿烂辉煌的，不可磨灭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

那些面临末日而又不甘心自己死亡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疯狂地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他们怎样进行罪恶的阴谋破坏活动，不管他们怎样掀起右倾翻案的妖风，到头来，只能在革命群众运动的面前撞得粉身碎骨。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年来巨大胜利的影响，广阔地波及到全世界，鼓舞了各国革命人民的战斗意志。无论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国家，在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统治的国家，我们都看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推动革命的群众运动方面所起的一定作用。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全世界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们的热情支持。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极大的恐惧、仇恨和惊慌。这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夭折”，寄托在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垮台”。他们象巫婆那样，恶毒地诅咒“文化革命前景暗淡”。但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前进的步伐，踏碎了这些老爷们的痴心妄想。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正在冲决一切障碍，汹涌澎湃、奔腾向前。

我们正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的斗争任务仍然是艰巨的。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乘胜前进。我们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要经常深入地注意调查研究，善于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要坚决维护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纯洁和巩固自己的阶级队伍，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向阶级敌人继续发动进攻。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必须坚持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方针。

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

我们要掀起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的热潮，继续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力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抓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的功勋。我们要继续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军民团结。

我们要爱护和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使它不断地巩固和完善，使它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战斗指挥部。革命委员会应当领导千百万群众去夺取新的

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全面地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坚持不懈地战斗吧！新的胜利在前面召唤我们，让我们奋勇前进！

(原载 1968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刊登《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划时代的文献〉重要文章的发表》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

在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发表两周年的時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了《划时代的文献》这篇重要文章。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亿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满怀革命的激情，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欢呼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两年来，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在《通知》的鼓舞和指引下，向无产阶级的敌人发动了持续的猛烈的进攻，摧毁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两面派，粉碎了他们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这是政治上的大胜利。

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革命的大批判，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进一步取得统治地位。这是思想上的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使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权力机构。这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力量（革命群众代表）、坚强柱石（人民解放军代表）、领导骨干（革命干部代表）紧密结合起来的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军民的团结，军政的团结，干群的团结，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在组织上的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在这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当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戒骄戒躁，乘胜前进，为巩固和发展这场政治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坚持不懈地战斗！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重 要 通 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

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的批评，应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应坚决贯彻执行。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呈主席参阅。

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一些政策性问题。

姚文元

五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 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 经验》的批示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毛主席五月十九日的批示，中央决定将此件转发全国，参照执行。

毛主席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望你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学习、掌握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 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革命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

这个厂在北洋军阀时代，是一个印刷钞票的工厂，后来又变成日本人手下的印刷厂。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成为国民党伪中宣部的正中书局，当时所有成员都加入了国民党。现在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就是由伪正中书局和由国民党投资的上海华厦书局、东北的几个小印刷厂以及我们的冀中平原日报印刷厂合并而成的，现在已变成有三千多职工的大厂。解放后虽然吸收了大批工农青年入厂，但是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尤其是彭真反革命集团的直接把持和控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仍然受到重用，其中许多人还篡夺了我们的各级领导权，变成了“三开”干部。据统计，在这个厂的二十六个加入过国民党的工段长一级干部中，有二十二个已经混入了共产党。因此，建国十八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是极其复杂、尖锐、激烈的。针对这种情况，军管人员今年二月二十一日进厂后，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不论是搞革命大联合还是促进革命三结合，不论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还是进行本厂的斗批改，他们都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

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中，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

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 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

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和紧密依靠群众。他们进厂后，首先引导两派革命群众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接着，他们一方面组织广大革命职工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指示，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本厂的代理人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不断地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遵照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教导，对厂内的阶级斗争情况展开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的调查研究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四月十一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厂的对敌斗

争大会，对四个隐藏在群众中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在这个大会上，军管人员历数本厂建国以来出现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和检举，进一步揭开厂内阶级斗争的盖子。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军管会的调查核实，接着又在四月十六日全厂的对敌斗争大会上，斗批了六个公然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这两次大会，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正象有些工人形容的那样，“大好形势，大快人心，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使这个厂的对敌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两次大会开过之后，全厂革命群众情绪激昂。他们说：“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一些人就觉得坏人很多，这个也该揪，那个也该斗，想把与这两次大会上被斗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人都揪出来。再加上第二次大会上斗争的反革命分子，大都是革命大联合前原“大联总”这个群众组织中的人，原来另一个群众组织“革联委”中的一些人，就想在各车间、科室中来个“割韭菜”，把原“大联总”中当过头头的人，一层层地加以揪斗，而原“大联总”内部的一些人也觉得问题严重，自己决心大揪一场。于是在大字报上、学习班上、大小会上就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乱点名、乱揪斗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原“大联总”当过头头的人都有些惶惶不安，一般群众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好象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似的。

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军管会的面前。他们觉得，这时正是需要他们在爱护群众革命热情的同时，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以便做到对敌斗争稳、准、狠的时候了。因此，他们便及时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方针政策“一竿子插到底”。同时，他们又下到各工段、车间、学习班，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反复宣传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伟大教导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的英明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一再强调指出，必须把原“大联总”中的坏人与广大群众区分开，广大革命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

军管人员这样做，开始有一些人认为是手软、右倾，但实践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群众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厂的解放军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看到我们有一点拐弯的地方，就把我们扭过来，引上正道。”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

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

从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情况来看，所谓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主要是指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占全厂总人数三分之二的“大联总”一派的一些骨干成员，跟着坏头头艾善泉、冯学志（已被专政机关逮捕）干过许多坏事，但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但还不是叛徒、特务。按群众的说法，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在全厂少说也有百人以上，数量相当大。特别是第一种人，他们的问题同原来本组织中的一般群众大都有联系，处理好坏对全厂的运动影响极大。军管人员认为，对敌斗争，能不能掌握好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的也就是看能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些人的问题。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军管人员首先是从严要求。这些人必须坦白交代自己干过的坏事和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划清界限，革命群众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否则，他们本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审查和受到深刻的教育，广大群众也不会谅解他们。但同时，也要根据党的政策、一方面教育群众正确对待他们的问题，尽量争取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去；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本人交代政策，教育他们主动地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启发他们的自觉革命精神，让他们争取主动，通过斗私、批修会的形式，向群众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对个别问题极为严重的人，他们采取小会追、个别谈（交代政策）的办法，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彻底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由于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做法，结果一些原来准备“破罐子破摔”的人，也消除了抵触情绪，主动积极向革命群众交代自己的问题，在群众会上做触及灵魂的检查或写书面检查。一个时期，干过坏事和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的人，争先恐后地纷纷向军管人员交代问题。这样，就扩大了教育面，团结了大多数，有力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真正的阶级敌人。

凹印车间有五个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群众很气愤，要求揪斗。军管人员经过认真研究，注意到这几个工人是因为觉悟不高和缺乏经验受了坏人的蒙蔽和利用，真正的阶级敌人不是他们，而是蒙蔽、利用他们的人。因此他们说服群众不要揪斗这五个人，同时反复向这五个工人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和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胆的揭发。经过了这样一番工作之后，有一次在召开全厂对敌斗争大会的时候，五个工人中的三个主动地跑到台上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误，沉痛地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与此同时，他们又当场向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指使他们干坏事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于冬海。这时，五个工人中的另外两个，已经守候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后，等台上的三个工人一声招呼，他俩就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坏家伙揪到台上，交给群众批斗。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 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但是，在斗争中对阶级敌人是不是就不用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了呢？这个厂军管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一小撮阶级敌人（特别是其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常常是合谋的、互有牵连的。向他们交代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展开攻心战，指明出路，有利于分化瓦解他们，可以把极少数顽固不化的首恶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同时，这样做，可以把阶级敌人揭露得更彻底，使广大群众更加认清他们的反动嘴脸，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使反面教员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

根据这样的认识，军管人员在对敌斗争中，总是把发动群众狠揭狠批，同政策攻心战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具体做法上他们有时拿到大会批斗，有时放到小会深追，有时展开个别攻心战，交代党的政策，必要时打出几发“炮弹”，施加些压力。对个别坦白交代好，确实服罪的人，加以适当肯定，使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发挥强大威力。

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现行反革命分子尹铭召，一九六七年曾经写

了一条恶毒的反动标语。但由于这个家伙很狡猾、在字迹上耍花样，因此当时虽然有人怀疑他，经过公安机关检验却被否定了。军管人员进厂后，群众又一次揭发，开始的时候他矢口否认。这时，他们就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越来越感到尹做案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他们就对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一方面摆事实、讲道理，说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和悔改，还是可以宽大处理，还是有出路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曾经被公安机关否定了的反革命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并且当场交代了他当时改变笔迹写反动标语的罪行。还有个反革命分子常国良，原来只知道他有妄图杀人行凶、进行阶级报复的罪行。后来他主动交代出许多其他的严重罪行，也是在革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对他交代政策、进行攻心战的结果。

在这个厂已经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中，现在既有坦白自首、表示悔罪的典型，又有抗拒交代、死不服罪的典型。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军管会打算在最近开一次大会，把这两方面的典型有选择地同时拿出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争取扩大坦白面，把那些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更好地揭露和孤立起来，更加深入地开展对敌斗争。

这个厂军管人员说，“坦白从宽”并不是“宽大无边”，不是说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得好就可以没事了。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该捉的不提交给群众专政，都可以算做从宽处理。坦白后从宽处理到底如何掌握，要服从对敌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体利益的需要，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他们认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他们还准备进一步挖掘埋藏得更深的特务分子。

(原载新华社《文化革命动态》1220期)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四川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后方，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解放以来，阶级斗争仍然是特别尖锐。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他们曾经千方百计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招降纳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想把四川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

经过两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露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四川省的胜利，是得之不易的。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四川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复较量的结果，这是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巨大成就。我们向四川省七千万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央同意：由张国华同志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女）、徐驰、邓兴国、江海云（女）、王恒霖、彭家治、张泗洲、冯玉德、蔡文彬、场志诚、但坤蓉（女）同志担任副主任。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所提的常委和委员名单。

中央希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广大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要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其他公开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希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继续巩固、继续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必须遵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要继续努力建立革命委员会。

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揭露那些挑拨军民关系的坏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方面。四川省的工人阶级、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把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工农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当作是自己的光荣责任，对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罪恶行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各项指示。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意见。要顾革命大局。在斗争中，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战斗指挥部。

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是我们正确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解放以来，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充分说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忠实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锻炼，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深刻地触及了自己的灵魂，世界观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已经和正在改正自己的错误。而那些混入干部队伍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只是一小撮。这就是我们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是我们看待干部问题必须具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只有从这种基本估计出发，我们才能够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看主流，看大节，对干部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把那些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考验的优秀革命干部，放在关键性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在革命“三结合”中的骨干作用。

只有从这种基本估计出发，我们才能够扩大教育面，正确地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对他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方针，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使他们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只有从这种基本估计出发，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绝大多数，集中力量，把矛头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准那些混入干部队伍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两面派，稳、准、狠地打击无产阶级的敌人。

因此，也只有从这种基本估计出发，我们才能够在干部问题上，避免犯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既不忽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干部统统都是好的，给右倾翻案黑风以可乘之隙；又不把干部队伍看得一团漆黑，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有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一切革命的干部，都不要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

江青培育和率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艺的 样板团在“七一”公演样板戏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由江青同志亲自培育和率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艺的样板团——北京京剧一团、中国京剧院、工农兵芭蕾舞剧团和中央乐团，将在“七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的喜日子里，举行一九六八年首次公演，再度向首都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演出六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芒的革命样板戏。

这次上演的革命样板戏，有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革命现代交响音乐《沙家浜》，还有他们向上海京剧院、山东京剧团学习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奇袭白虎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

次演出的六个革命样板戏和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一起，早就以它们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鲜明的政治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向全中国、全世界革命人民展示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在当前我国亿万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次公演，就是革命文艺战士用革命样板戏这个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进一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进一步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革命文艺战士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发起的新进攻。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照耀下，革命样板戏这个无产阶级文艺宝库中的明珠几年以前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以后，立即轰动了全中国，震惊了全世界，在人类文艺史上揭开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但是，在中外革命人民高度赞扬、热烈欢呼的同时，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早在江青同志率领革命文艺战士创作革命样板戏的时候，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反对和破坏，妄图把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些革命现代京剧、革命现代芭蕾舞剧、革命现代交响音乐已经彻底打倒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舞台上的统治地位，中国赫鲁晓夫和以他为总后台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仍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妄图否定革命样板戏。但是，战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线的广大革命文艺战士，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识破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认识到这一场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围绕着革命样板戏而展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他们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通过清理队伍的工作，把那些混入革命队伍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个个揪了出来。并且对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两年多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各个革命样板团的革命文艺战士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热爱，为工农兵服务一辈子的革命决心更加坚定，同时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更加痛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大军正在逐步形成。这样，就从根本上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反对和破坏革命样板戏的阴谋诡计，使革命样板戏更加牢固地占领了我国文艺舞台，永放光芒！

最近，首都各样板团的革命文艺战士，普遍重新学习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教导。他们认为，搞好这次公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同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一场政治仗。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把舞台当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把剧场当作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战场，把演出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革命战斗精神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充分表现出来。北京京剧一团和中国京剧院的革命群众，还专门安排了在演出期间坚持狠抓阶级斗争、坚持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活动，努力做到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从抓革命入手，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保证这次公演取得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1968 年 6 月 29 日讯，载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征途中，生气蓬勃地迎接自己四十七周年的光辉节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的风暴中，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剧烈斗争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显示出改造世界的空前巨大的革命威力。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中国赫鲁晓夫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广大的革命群众所掌握。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的大地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国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但是，阶级斗争还是尖锐而复杂的。一小撮失败了的阶级敌人已经穷途末路，仍然要作垂死的挣扎。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能不经历十分剧烈的反复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对复辟的斗争，会经历一个很长时期。革命委员会逐步巩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地认识。当前，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离间和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联系。他们或者大刮右倾翻案黑风，妄图扰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施放糖衣炮弹，妄图欺骗或腐蚀我们的同志，使革命委员会某些成员脱离群众。针对这种特点，革命委员会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主动地带领革命群众，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同时，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不论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不论是清理阶级队伍，其阶级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极少数阶级敌人。要紧紧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斗、批、改，继续有力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对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并歪曲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对于敌人那种种的卑鄙手段，必须善于识破，勇于揭露。各派革命群众要注意团结对敌，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善于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又要善于识别敌我矛盾。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又说：“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毛主席这些极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于我们当前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如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有多么重大的指导意义啊！

毛主席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权力量的源泉。坚决依靠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权区别于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权的根本标志。许多地方革命委员会的丰富经验说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诞生的，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本身就具有联系群众的优越条件。我们一定要充分运用和发挥这种优越性，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侵袭，坚决改革旧的脱离群众的陈规旧习，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使革命委员会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革命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普通劳动者，要深入群众之中，不要搞特殊化。遇事多和群众商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广大革命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要实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永远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职务变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

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不管来自那个方面，都应当是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代表，都应当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办事。决不能只代表某个小山头，而不代表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团结少数人，而置绝大多数群众于不顾。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我们必须经常地用毛泽东思想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不断巩固革命大联合，巩固革命委员会。

革命群众要爱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要主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那里的群众能够经常地踊跃地以爱护的态度对改进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就说明那里的民主空气好，那里的工作有生气，那里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关系密切。毛主席指出：“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至于一小撮敌人借“批评”为名而兴风作浪，恶毒攻击，企图动摇革命委员会的阴谋，则必须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现在读着毛主席这句名言，感觉是多么深刻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教育了我们，进行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彻底的革命，必须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必须依靠人民解放军，必须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以及地、富、反、坏、右在我党内的一小撮代理人，他们长期以来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的一套国民党的作风，都是制造党和群众的分离，制造无产阶级政权和群众的分离，以达到他们隐藏自己反动面目、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党、政权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从而保证我们国家永远不变颜色。

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集中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时地准确地全面地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任务和方针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革命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在努力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革命委员会才能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为了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深入地推行这个任务，必须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增加新的内容，不断提高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为促进各项工作胜利的巨大力量。

在夺取伟大胜利的历史关头，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在提出革命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同时，总是号召全党提起警觉，十分注意作风问题，把保持和发扬党的传统作风，看作是团结全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巩固胜利，发展胜利的重要保证。

现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付出巨大的努力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动亿万革命群众进行整党的一次伟大运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指引下，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展开了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经过这场群众运动风暴的洗炼和考验，我们的党，和群众的联系极大地加强了，正在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们广大的共产党员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经得起阶级斗争的各种严峻的考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和林彪出席 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晚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今天出席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而举办的文艺晚会，观看和聆听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创作出来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

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来到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全场起立，高举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

录》，热烈地长时间地欢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非常高兴地不断向全场同志亲切招手、鼓掌。

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观看演出的，还有党和国家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

晚会上，由中央乐团和中国京剧团革命文艺战士联合演出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贯彻执行毛主席“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新近创作出来的，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崭新的成果。

革命文艺战士们的演出，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近万人的热烈欢迎。

参加晚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粟裕、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王树声、王新亭、温玉成、张池明、张令彬、张贤约、张天云、聂济峰、肖力、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负责同志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赵启民、周希汉、王秉璋、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常乾坤、谭家述、陈仁麒、吴烈、黄志勇、陈士渠、张翼翔、罗华生、江文、黄文明、李真；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组小组）和各地区部队负责同志袁升平、韦国清、刘兴元、孔石泉、邱国光、黄荣海、魏佑铸、焦红光、张达志、洗恒汉、郑维山、刘格平、陈先瑞、张日清、黄作珍、杨俊生、吴忠、曾绍山、韩先楚、谭甫仁、陈康、王恩茂、赛福鼎、任荣、曾雍雅。还有余秋里同志。

参加晚会的还有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萧克、王震、曾山、罗贵波同志。

演出结束，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在全场热烈的欢呼声中，走上舞台，同参加演出的全体革命文艺战士亲切见面，祝贺他们演出成功。这时候，全场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纵情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新华社 1968 年 7 月 1 日讯，载 7 月 2 日《人民日报》）

照 办。

毛 泽 东

中共中央、国 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布 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后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

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

档案的管理和使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忠实地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为了加强领导，严格管理，确保中央管理干部档案的安全，防止遗失、盗窃、篡改，对查阅中央管理的干部档案特作如下规定：

(一) 凡查阅原中央机关正、副局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正、副省(市)长及相当职务的干部档案时，须由中央机关各部(委)、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报经中央组织部业务组郭玉峰同志审查，再呈恩来、伯达、康生、江青、永胜同志批准后方可查阅。

(二)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要借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材料时，须经谢富治、汪东兴同志批准后方可查阅。

(三) 凡查阅原中央机关司(局)长及相当职务的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时，须由中央机关各部(委)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审查报请中央组织部业务组批准后方可查阅。

凡查阅省(市)、自治区厅(局)长、地委书记及相当职务的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材料时，须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审报中央组织部业务组批准后方可查阅。

(四) 中央管理的大、专院校、工矿企业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需要查阅各该单位领导人员的档案时，应分别按(一)、(三)两项规定办理。

(五) 军委管理的干部档案须要查阅时，应经军委办事组批准后方可查阅。

各单位派出查阅档案的人员，必须是党员干部，政治上可靠。

“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

国家经委无产阶级革命派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捣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目前，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乘胜追击，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清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

建国以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工业交通战线上的代理人，疯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肆鼓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谬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国赫鲁晓夫所鼓吹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谬论，流毒甚广，危害甚大，必须彻底批判。

(一)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坚持政治统帅经济，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还是实行“利润挂帅”，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原则，这是我们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工业交通战线上的代理人的一个根本分歧。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实行政治统帅经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因此，经济建设项目的安排，生产方案的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必须首先服从党的政治任务，服从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服从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国家计划。

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极力宣扬“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鼓吹“利润挂帅”，“赚钱第一”，大叫大嚷：“有利就生产”，“无利就关厂”。他们按照“三自一包”和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的办法，搞什么国家对企业实行所谓“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根据多超多得的原则”，“提取奖励基金”。他们把追逐利润，追逐企业和个人“经济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他们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利润原则”当成金科玉律。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利润挂帅”，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南斯拉夫和苏联在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下，通过“利润挂帅”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最现实的教训。

实行“利润挂帅”，必然是价值规律主宰一切，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投资多，“见效慢”，但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实行“利润挂帅”，在各经济部门、各企业之间就会出现自由竞争，就会出现投机倒把，

偷工减料，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我国企业间现行的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就要为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代替；社会生产就必然陷于无政府状态。

实行“利润挂帅”，企业为了追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就会任意改变产品方向，粗制滥造。社会主义生产原则就会被抛弃，我国七亿人口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就会得不到保障，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就要遭到破坏。

实行“利润挂帅”，必然导致企业的某些领导人操纵一切大权，有些人甚至会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劳动成果，变成新的剥削者、特权阶层，成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工矿企业里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必然变成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反对政治统帅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推行“利润挂帅”，其目的就是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改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我国工业、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使我国工业永远处于畸形布局、残缺不全的落后状态，永远成为外国资本的原料市场和附庸，把我国经济拴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老牛破车上爬行。一句话，他们就是要瓦解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形“公”实“私”，形“社”实“资”的经济，使我国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坚持政治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大搞物质刺激，推行“钞票挂帅”，这是我们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工业交通战线上的代理人的另一个根本分歧。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调动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中国赫鲁晓夫之流极力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物质刺激，把物质刺激作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重要手段。他们是物质刺激的鼓吹者。他们狂叫：“物质刺激是必要的”，“我就赞成物质刺激”！他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内，肆无忌惮地推行物质刺激，大搞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的“三高”政策，极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在我国制造高薪阶层，为他们篡党窃国、复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

林彪同志指出：“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

政治挂帅同物质刺激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东西：一个是无产阶级的“公”，一个是资产阶级的“私”；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政治挂帅调动的是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物质刺激调动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物质刺激越多，离社会主义越远。

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大搞物质刺激，就是利用残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思想上来毒害工人阶级，涣散革命斗志；从组织上瓦解工人阶级队伍，复辟资本主义。

大家知道，从井冈山到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革命

战士，出生入死，前赴后继，战胜了人间罕有的困难，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这难道是依靠物质刺激吗？完全不是！我们靠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妄图用腐朽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原则，代替我党历来坚持的政治挂帅、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要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如此疯狂地推行物质刺激，完全是由他灵魂深处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的。中国赫鲁晓夫之流是一群极端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他们总是从钱眼里看待一切。他们胡说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对优秀共产党员讲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需要物质刺激的。”在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尽是只管个人生活、只顾眼前利益，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的芸芸众生，尽是任他们驱使的“群氓”。这是对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莫大污辱！

我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过去，他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自己的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自己的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使我们伟大祖国一天天繁荣富强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进一步摆脱几千年来旧思想的束缚，从根本上荡涤旧世界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的崇高品质，正在成为我们国家普遍的社会风尚。

* * *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工业交通战线上的代理人，疯狂推行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是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其目的就是妄图用反革命经济主义，引诱人们追求眼前经济利益，抛开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任凭他们搞反革命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

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坚决地彻底地把中国赫鲁晓夫之流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把工业交通战线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原载 1968年7月9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

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

领导班子革命化，办事人员少，走上第一线，这是革命委员会紧密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对敌斗争，粉碎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克服官僚主义旧习气，促进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意义。

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新的革命机构，同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旧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旧的习惯势力，必然要从多方面干扰和冲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勇敢地跳出原来旧机构的圈子。必须采取坚决态度，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政权建设方面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保守主义，击破剥削阶级旧势力的抵抗。

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象灵宝县那样，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如果大多数的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精兵简政这两件工作抓好了，就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短评

北京第一机床厂革命委员会，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励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战斗意志，稳、准、狠地打击了无产阶级的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重视政治上、思想上的对敌的斗争，向群众进行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开好小型批判会，这些经验都是好的。

革命的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阶级敌人进攻的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两个重要侧面。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可以使广大革命群众更加认清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提高对敌斗争的自觉性；可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可以教育广大革命群众，认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提高对敌斗争的水平，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得更深入、更彻底。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可以使革命大批判同各单位的实际斗争联系得更加紧密，同各单位的斗、批、改联系得更加紧密。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了极少数埋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为革命的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活材料。这样，就能使广大革命群众更深刻地理解这场政治大革命的阶级内容和重大意义，从而更积极地投入革命的大批判，使之更深入、更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才能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肃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毒害，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清理阶级队伍的成果。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必将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地为广大革命人民所掌握。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必将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 《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现将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造成浩大的声势，是分清敌我、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彻底孤立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

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

此种宣传，应当同拥军爱民联系起来，同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同清理本地本单位的阶级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等项工作结合起来，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新华社及各分社，应及时把各地宣传“七·三”布告情况及问题发展，登内部的《文化革命动向》，不登报。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院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的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册成，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的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〇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〇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新的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具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人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

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很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后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人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际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新华社上海 1968 年 7 月 21 日电，载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

〔附〕 上海机床厂党委决定 彻底否定《文革》产物 《七·二一调查报告》

《光明日报》编者按：上海机床厂是“四人帮”插手炮制所谓《七·二一调查报

告》的地方。这个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是这个调查报告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正如这则消息所揭示的那样，要在该厂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否定《七·二一调查报告》。“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早就应该平反昭雪了，但是歪曲事实，影响极坏的《七·二一调查报告》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否定，这就严重妨碍了该厂肃清“左”的流毒，使得该厂广大知识分子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上海机床厂党委决定在全厂范围内否定《七·二一调查报告》。它的意义将不仅仅限于推动该厂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于全国知识界、教育界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将起促进作用。

上海机床厂党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最近作出决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谓《七·二一调查报告》，认真清除这个报告给该厂造成的恶劣影响，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全厂工程技术人员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上海机床厂是我国生产各种精密磨床的大厂，现有职工六千余人，其中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近八百名。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全国报刊曾普遍刊载了一篇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即《七·二一调查报告》。一九八〇年该厂党委对这个调查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复查，确认它是“四人帮”插手炮制的歪曲和篡改客观事实的极左思想的产物。比如，调查报告说，培养工人技术人员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实际上，该厂培养工人技术人员是建国十七年来工厂教育的成果。五十年代初，该厂就开始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一九五四年选拔过七十名工人到技术科室培养，一九五八年又开办了业余大学，招收七十多名工人学员。以后，又举办过多种学习班培养工人技术人员，到一九六五年，全厂技术人员由原来的六十二人发展到五百八十人。调查报告中，给许多老的技术人员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科研权威”、“叛徒”、“重大特务嫌疑”等帽子，这些都已被证实为不实之词。

调查报告还把知识分子与工人技术人员对立起来作对比，把老的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说得一无成就，同时夸大工人技术员的成绩。例如把一位到国外留过学的副博士曹婉倩说成是读了二十多年书，工作无成就的知识分子，说一位工人技术员设计的平面磨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事实上，这位工人技术员设计的平面磨床，其轴承恰恰是采用曹婉倩试验所获得的成果，而这个平面磨床，既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也并非什么“填补空白点”。类似这种张冠李戴、随意编造事实的例子，在调查报告中还有不少。

调查报告发表后，该厂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工程技术人员再次遭到批斗和迫害。许多人被下放车间劳动，有的甚至被“劳动改造”长达十年之久。事实充分证明，这个调查报告是“四人帮”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成果，搞乱教育战线，打击知识分子的武器，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一九八〇年，当时的上海机床厂党委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关于撤销《七·二一调查报告》的请示报告。但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由于《七·二一调查报告》没有被彻底否定，所以它仍然是强加在该厂工程技术人员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也成了该厂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的严重障碍。许多中老年知识分子仍然心有余悸，有的提出调离，有的借故长期休息，有的不敢申请加入党的组织。部分干部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仍不能正确看待正规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许多中老年工程技术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提拔和使用，不少工程技术人员说：“不彻底否定《七·二一调查

报告》，就谈不上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最近在贯彻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通知的工作中，上机厂党委认识到彻底否定《七·二一调查报告》是该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同时决定成立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对全厂知识分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连日来，厂党委书记张乃生主持召开了三次党委扩大会议，厂党委副书记周玉清代表党委作了“扎实实地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搞好”的讲话。厂党委还在全厂范围内公布了关于撤销《七·二一调查报告》的请示报告的全文，组织干部党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原载 1984年4月14日《光明日报》)

〔附〕清除《七·二一调查报告》的恶劣影响 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何光远

四月中旬，机械工业部主管教育工作的副部长何光远，就上海机床厂党委决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七·二一调查报告》一事，向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大好事。

不久前，上海机床厂党委在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作出决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谓《七·二一调查报告》，认真清除这个报告造成的恶劣影响，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全厂工程技术人员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这个事传到机械部机关后，机关干部十分重视。副部长何光远对记者说，“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谓《七·二一调查报告》，是“四人帮”插手上海机床厂炮制出来的，是歪曲、篡改客观事实和极左思想的产物。上海机床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是这个产物的直接受害者。

何光远指出：现在，上海机床厂党委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彻底否定《七·二一调查报告》，认真清除这个报告造成的恶劣影响，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全厂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进一步端正职工教育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大好事。

他接着说：但是，应当看到，在当时，这个调查报告被全国报刊普遍刊载，成了“四人帮”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成果，搞乱教育战线，打击知识分子的武器。在包括机械工业系统在内的广泛范围，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流毒甚广，后果严重。

何光远说：现在，上海机床厂党委决定彻底否定《七·二一调查报告》，其意义超出了该厂范围，特别是对整个机械工业系统，意义重大，对于机械工业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据《中国机械报》报道，载1984年4月25日《光明日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布 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的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陕西省同全国一样，正显示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 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 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 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 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 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 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 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启发他们自觉地起来揭发检举坏人。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在处理这类事件时，要注意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

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在发生反革命事件时，要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革命秩序。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干部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了我们五个人。陪同接见的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参加接见的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法犯罪，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极亲切的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愧疚，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 京 大 学	聂元梓
清 华 大 学	蒯大富
北 师 大	谭厚兰
北 京 航 空 学 院	韩爱晶
北 京 地 质 学 院	王大宾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关于转发安徽省
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
《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现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安徽芜湖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和绝望挣扎，挑动一部分群众，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十二军党委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分析了形势，采取了有力措施，特别是他们抓住了“七·三”布告作为强大武器，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七·三”布告、声讨芜湖地

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政治攻势，团结、教育和保护了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揭露和孤立了阶级敌人，迅速稳定了该地区的革命局势。

安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是推动各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的有力武器，对全国各地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只要把“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宣传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同拥军爱民结合起来，持续地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使“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两年前的今天，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下了光辉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毛主席在大字报中尖锐地指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的大字报一声炮响，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以雷霆万钧之力，粉碎了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帅下，在空前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波澜壮阔地发动了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揭露、大斗争、大批判。经过多次反复的较量，彻底揭穿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代表美帝、苏修、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反革命面目，胜利地摧毁了这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了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攻下了他们盘踞的一个又一个反动堡垒，普遍地成立了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了回来。

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往往是要通过隐藏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活动来实现。毛主席的大字报和一系列英明决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靠了亿万革命人

民的巨大威力，宣判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刑，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根本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风暴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亲身参加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斗争实践，极大地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最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斗争到底；同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斗争到底；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阴谋复辟资本主义，镇压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妄图使广大人民重新沦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牛马。经过了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极其仇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更加热爱无产阶级司令部，更加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更加坚定不移地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战略部署。

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我们要把亿万革命人民，都紧紧团结在这个领导中心的周围。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必须批判“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及时识破阶级敌人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的阴谋，粉碎穷途末路的一小撮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垂死挣扎。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特别需要我们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彻底执行。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要真正做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胜利前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学好用好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最新指示。第一是要学，第二是要用。学了要用，学是为了用。有极少数“以我为中心”的人不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认真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头脑膨胀，离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甚至歪曲最高指示。这种人如果不痛下决心，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会滑到危险的泥坑里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在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的時候，各级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对敌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清除干净，完成各条战线上的斗、批、改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批示：照办。

· 中共中央、国 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

中央同意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曾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一人），待以后增补。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是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胜利宣告了云南地区阶级敌人复辟活动和垂死挣扎的彻底破产。

中央希望，从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做到：

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充分认识到云南地处祖国边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缅甸、印度和泰国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屏障，是援越抗美斗争的前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巩固边防。

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毛主席的“七·一八”批示，大造声势，坚决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迅速猛省过来，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对于犯有中央指出的那些反革命罪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依法惩办，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动员广大革命群众，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遵守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大力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彻底粉碎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科技路线，坚决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知识分子要坚决走同工农兵

相结合的道路。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防止阶级敌人从中破坏捣乱，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云南省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人民日报》转载《统一意志、 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下面转载的这篇题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社论，原载八月七日上海《解放日报》。自本报八月五日社论提出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以来，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重视，但也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不理解。这篇社论进一步分析了批判“多中心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这是一篇有战斗性的好文章，故转载于此。我们一定要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一定要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坏作风。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全党、全军、全国各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抛到垃圾堆里去！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

中央热烈地庆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福建省是处在祖国国防的最前线，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些凶恶的敌人，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叶飞、范式人、候振亚之流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在福建的代理人，长期以来，招降纳叛，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在福建复辟资本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经过激烈的斗争，充分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叶飞这些福建走资派的丑恶面貌，把叶飞之流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中央批准福州军区党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名单，同意韩先楚同志担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皮定均等十一个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央希望：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应该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使整个福建的面貌为之一新。

要抓好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一个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认真清理阶级队伍。

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斗私、批修”，让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更普及，更深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进一步地展开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叶飞之流的“独立王国”和反动的“多中心论”，批倒批臭。

要进一步地引导群众组织，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要认真地做好“精兵简政”、“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工作。

要进一步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福建全体革命群众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继续高度地警惕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继续高度地警惕美蒋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的各种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加强战备，解放台湾。对于那些敢于来侵犯我国前线的美蒋匪帮，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总之，中央相信：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必将大大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福建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因而必将在各个战线上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 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中央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是援越抗美的前哨，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曾经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特务、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广西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面目，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韦国清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三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大造革命声势，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要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要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内团结和军政团结。认真落实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指示。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作好援越抗美工作。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歼灭敢于来犯的美蒋匪帮，巩固边防，保卫祖国。

中央相信：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现革命化、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接到通知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并将你们的部署或计划电告中央。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先创造条件。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姚文元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亿万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令，工农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汲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小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

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隐藏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小撮坏人，只有在工人、解放军的干预下，才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彻底揭发出来。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

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工人阶级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他们不是住三、五天，而要长期工作下去，要永远占领学校和领导学校。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工人阶级将会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要深刻地认识世界，并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历来教导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加强革命的纪律性，不断批判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侵蚀及影响。在文化教育单位，资产阶级有它的传统势力。在工人阶级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时，资产阶级总是力图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工人队伍包括其领导干部中的薄弱部分。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必须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或其它形式的手段对工人队伍的袭击。还要认真地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企业的斗、批、改。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

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们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 1968年第2期)

〔附〕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中 涛 声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写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力量，是由它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林彪、“四人帮”接过这个革命口号肆意进行歪曲，在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上制造混乱，煽动和组织向党全面夺权，以图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他们以帮代党、推行法西斯统治的罪恶阴谋。这也就是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反动宗旨。

—

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绝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一伙已经一手伸向政权，一手伸向党权，开始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们在鼓吹“改朝换代”，煽动彻底砸烂现有的国家机器的同时，还制造了大量舆论，攻击党的领导。一九六六年七月，陈伯达在一次讲话中就诬蔑“党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表明党的组织有缺点，或者有错误，或者是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一九六七年张春桥几次三番地叫嚣：“现在，党组织不能恢复，又

不能依靠，还得去改造它”，“省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以精简”、“现在省委垮了，农业还是很好，生产力可能得到解放”。姚文元也不甘落后，公然声称：“现在优秀的革命派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按照他们的说法，领导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变质，已经失去了领导作用，甚至已经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是在这种反动思潮的鼓动下，开始了所谓“全面夺权”，上自省、市、下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农村人民公社，无一幸免。而在这些“夺权”的单位中，党的组织、党的领导首先被排斥，被取消。就拿张春桥、姚文元一手策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来说，当时他们就提出：“公社管理委员会”由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参加就行了。对于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提出了批评。“四人帮”迫于形势，不得不把“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改了，但骨子里仍然坚持他们的反动立场，继续策划反党活动。

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同志决定以整党为中心，逐步恢复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以加强党的领导。而“四人帮”却借整党之机，叫嚣党要改造，要重建，要改名，掀起了又一个反党浪潮。一月中旬，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狂妄地提出：“党的名称不一定叫共产党，可以改为别的名称。”“现在提整顿、改造，有的就是重新建设一个党。”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张春桥更露骨地宣布，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他说：“造反联络总站取代市委”，“造反队就是党支部，队委就是支委。不是原来那个党支部了，让造反派来起党的作用。”当时上海的一些报刊也跟着起哄，《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他们虽然不是党员，但实际上起了党员的作用。”《支部生活》也借讨论“怎样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之名，大批所谓“好人党”、“生产党”、“老好人党员”等等，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千百万党员糟蹋得不成样子。

正是在这个时候，姚文元这篇文章应“运”而出，它为林彪、“四人帮”的篡党阴谋编造“理论根据”，成为他们发起向党全面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文章发表不久，当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报》就得意忘形地在一篇社论中狂呼：这“是‘一月革命’夺权斗争的发展和继续，而且是一场比‘一月革命’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夺权斗争！”

二

姚文元的文章炮制了一些什么“理论”来蛊惑人心呢？总起来说，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学说搞得一团混乱。而他采用的手段也特别卑劣。

首先，姚文元借口“工人阶级领导”，搞乱党和阶级的关系。他既把工人阶级和党对立起来，又把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从而否定党的领导。

姚文元在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和其他一系列任务也“必须有工人……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工人阶级究竟怎样来实现“坚强领导”呢？照姚文元的说法，只要派些工人去“占领”学校等阵地，到那里去“掌握”领导权就行了。那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呢？文章中却矢口不提。这种排斥党的领导，把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调，难道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发现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但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并不等于说它可以自发地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它才能真正把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变成自觉的

斗争，才能在同资产阶级斗争中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在工人阶级斗争史上，曾有过不少由于缺乏或排斥党的领导使斗争陷于失败的痛苦经历。它告诉我们，没有党的领导，工人运动必定是软弱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自发的、盲目的状态，而且往往由于机会主义思想的侵袭、腐蚀而陷入歧途，完全丧失自己的战斗力和领导作用。姚文元鼓吹“工人阶级领导”，否定党的领导，正是沿袭了历史上机会主义的老谱。他鼓动工人阶级对自发性的崇拜，助长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中泛滥，就是要把工人阶级引向脱离党的领导的邪路。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搜罗了许多美好的字句来“颂扬”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只要有“工人阶级群众”的参与，就“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这种论调也是颇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其实，联系“四人帮”百般丑化我们的党和千百万党员的反动言行，就不难看出，这也是姚文元否定党的领导的一个诡计。它借着“颂扬”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抹煞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列宁早已批判过的把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取消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观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革命的阶级，但是，从整个工人阶级的组成来说，则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工人群众的觉悟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先进分子也还是只占整个工人阶级的少数。如果象姚文元所鼓吹的，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那么党的存在，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不是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了吗？

此外，虽然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说工人就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是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的”。这就需要由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政党，不断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否则，正象列宁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只能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和奴役。前几年，正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取消党的领导，取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不少人被他们那一套假左真右的东西所欺骗，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泛滥一时。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由此可见，绝不能把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对立起来，也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混淆起来。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只有坚决贯彻这一原则，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真正实现。姚文元在他的文章中侈谈什么：“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然而，事实业已证明，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多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反动思潮严重泛滥，其根源不是别的，恰恰是由于削弱甚至取消了党的领导的结果。

其次，姚文元把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说成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把党的领袖和党的组织对立起来，否定党的领导。姚文元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各项指示，……体现了无产阶级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坚强领导”，因此，只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迅速畅通地贯彻执行”，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了。其实，这种似乎十分推崇领袖领导作用的论调，同样是极其虚伪的欺人之谈。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卓越的领袖人物的作用。列宁的一段名言是众所周知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

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领袖和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领袖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善于集中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和智慧，制定出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路线，然后再贯彻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朝既定的目标前进。然而，领袖的领导作用必须通过党的组织来实现。否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就无法落实，还谈得上什么党的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呢？按照姚文元的说法，仿佛只要上有毛泽东，下有工人群众就行了。事实说明，这只不过是他们破坏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的反革命伎俩而已。正是在姚文元这种谬论的煽动下，什么“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造反派’对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得最深，因此不是党员也能领导”等等反动舆论就到处泛滥。“四人帮”也就是以歪曲、捏造毛泽东同志的话，“畅通”地推行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用“帮中央”取代党中央，以帮派势力取代各级党委。

第三，姚文元在他的文章里侈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那套“工人阶级领导”的谬论寻找支柱。姚文元说：“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早在一百二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就提出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他的意思无非是要人们相信：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末他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理论还能有错吗？当然，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但是，问题在于工人阶级是通过谁的领导来实现这个专政呢？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关于工会作用问题的错误观点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他一方面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另方面，列宁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直接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指工人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如此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没有党的领导，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说得好：“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这都说明了，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鼓吹什么“工人阶级领导”，实际上是用这种貌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烟幕，把党的领导偷偷地抽去。他们要“创造”一种没有共产党领导，或以“造反派”代替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法西斯专政。

总之，姚文元这篇文章，从它的前提到它所提出的每一条“理论根据”，都是为了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然而，事实很清楚，否定了党的领导，空谈什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是自欺欺人。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们一伙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幌子下，可谓坏事做绝，他们的胡作非为，充分地暴露了他们所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领域。他们的黑手伸向那里，那里的党的领导权就被篡夺，党的组织被破坏，党的成份被改

变，党的性质被篡改。

张春桥曾叫嚣：“工人到上层建筑只能当领导，不能当办事员”。姚文元的文章也提出，要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去”。而他们所窥视的首先是党的领导权。在他们“进驻”的单位中，“四人帮”的几个爪牙就可以一手独揽党、政、财、文大权，出现了许多怪现象：他们竟然可以指派党的核心成员，可以砸烂一个党组织，可以“改组”一个党组织，可以对党员的政治生命生死予夺之大权，不是党员却可以坐镇党的会议，可以领导整党建党，等等。张春桥公然叫嚷：“工代会下的命令，支部要执行，不执行是错误的”。

在他们控制的单位中，“四人帮”的爪牙利用篡夺的“清队”和“整党”大权，借“吐故纳新”之名，大“吐”大“纳”。大批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被清除出党。一大批流氓、文痞、“老造反”、“老头头”，则被戴上“优秀工人”、“工人代表”的桂冠，“点名入党”、“限期入党”、“飞过海入党”。在一些基层、地方和中央部门中，党的领导权旁落到这批“寿”“洪”帮手里，党的领导名存实亡。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群众实行法西斯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把学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盘踞的“世袭领地”，把一些地方和单位说成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煽动说：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文章一发表，“四人帮”的喽罗们就狂叫：“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们都要去”。于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统统成了他们全面专政的对象，遭到残酷的镇压，法西斯的残暴手段令人发指。

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下，他们名为拥护工人阶级，却给工人阶级本身带来极大的灾难。

人们清楚地记得，正是王洪文这个所谓“工人阶级的代表”，自任工宣团长，率领大批人马，窜进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血腥镇压。为了镇压工人群众，他们动辄把某个工厂宣布为“老大难”单位，当作“马蜂窝”大捅特捅；对不跟他们跑的工人群众组织一概“格‘碰’勿论”，置于死地；他们恣意分裂工人队伍，制造事端，挑动武斗；他们用棍棒、长矛对付广大工人群众。这种法西斯暴行，竟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中进行的，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精神上来瓦解工人阶级队伍。他们一方面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一方面又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腐蚀工人阶级。在他们煽动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毒素严重地侵入工人阶级的肌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亿万人民获得最后解放的唯一保证，它已经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里，是谁都否定不了的。谁妄想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想把我国工人阶级引向邪路，必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原载 1979 年 1 月 15 日《人民日报》)

北京上海产业工人大军开进大专院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北京】首都工人阶级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伟大教导，同解放军战士一起，组成数十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的昂首阔步开进首都各大专院校。他们决心发扬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在大专院校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参加斗、批、改，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和一切工作，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在教育阵地上高高飘扬。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高等学校，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伟大的革命创举。七月下旬，一支坚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先开进清华园，宣传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使清华大学长期以来严重对立的两派迅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全校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充分显示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威力。接着，首都工人阶级又组成了数十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开进首都各大专院校。工人宣传队所到之处，受到广大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许多学校里，充满了一片喜气洋洋的革命气氛。北京钢铁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机械学院等一些院校，原来严重对立的两派群众，在一起敲锣打鼓，热情欢迎宣传队。不少院校两派群众一起召开了欢迎大会。他们说，欢迎工人同志和解放军同志来领导我们，帮助我们，教育我们。我们决心迅速跟上亿万工农兵群众的雄伟步伐，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进学校就热情地不辞辛苦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师生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迅速化为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自觉行动。他们对于革命师生中一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都给予大力支持，对于那些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则坚决抵制和斗争。驻清华大学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十分注意做耐心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组成小分队，深入师生宿舍和家属区，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和家属一起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促膝谈心。他们大抓阶级教育，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许多工人同志还以切身的体验以及清华大学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事实，和革命师生员工一起控诉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滔天罪行，狠批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深受教育，他们激动地说：“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先锋，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模范，是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表率。”

进驻各院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十分注意发挥学校内的工人的作用。清华大学的革命工人，在宣传队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首先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他们的革命行动为广大师生树立了榜样，大大推动了全校的革命大联合。北京大学的革命工人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也首先带头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许多大专院校的革命工人纷纷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工人学习，争当革命大联合的促进派和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

驻各大专院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循毛主席“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伟大教导，在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过程中，狠抓自身的思想革命化。一支坚强的革命化的战斗化的工人阶级的宣传队伍正在斗争中形成。驻清华大学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解放军为榜样，大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用。驻北京大学、北京机械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宣传队，工人和解放军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大大促进了宣传队的思想革命化。

驻各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在促进各学校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今后还必将在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斗、批、改等各项工作中，在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人同志们豪迈地表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给毛主席争气。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革命的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并肩战斗，把大专院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上海】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组织大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上海的高等学校，同这些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一起，认真搞好学校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到二十六日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入上海二十三所高等学校。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巨大功勋的上海一百几十万产业工人，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无比兴奋，万分激动。他们热烈响应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人大学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学校认真搞好斗、批、改。工人们激动地说，毛主席最信任我们工人阶级，我们就要把千斤重担挑起来。毛主席派我们进大学、进文艺单位、进科学研究院部门，进一切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我们坚决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一位老工人高兴地说：“几千年来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毛主席派我们工人进大学，把被颠倒的历史彻底颠倒过来了！”许多工厂挑选了具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经验的老工人，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英勇斗争的工人，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进入大专院校以前，这些宣传队普遍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杨树浦发电厂，有八十名优秀的工人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老工人姜林根，四十多年前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他说，毛主席向我们工人阶级发出了伟大号召，我们工人阶级不去掌握文权谁来掌握文权？难道还能让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霸占文权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工人掌握了文权才能使政权更巩固，才能保证我国无产阶级江山水不变色！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这样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教育革命的胜利！

上海吴泾化工厂有一百多名工人参加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学习中，工人们议论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工人文化水平低，能不能肩负这一重任？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人们齐声回答说：能！因为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撑腰，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有全上海工人的有力支持！我们既然能够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打胜仗，也完全有能力在

这场占领大学阵地、摧毁资产阶级顽固堡垒的战斗中打胜仗!

许多继续留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岗位上的工人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厂里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顶下来，以更加出色的革命和生产成绩，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做好工作，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最大信任和殷切期望。

上海许多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这几天正展开各种活动，热烈欢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同济大学的革命师生专门排演节目，写诗歌，订“拥工公约”，欢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上海水产学院水产加工系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邀请工人一道举行批判会，批判学校里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轻视工农，破坏革命师生和工农相结合的罪行。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表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一定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他们还表示，要彻底批判轻视工农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虚心拜工人师，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新华社、新华社上海 1968 年 8 月 26 日讯，载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

李作鹏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的讲话 (记录摘要)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清理阶级队伍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已有多次指示，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系统的讲了，我讲一讲军队怎么办？成立革委会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进展很快，如北京、内蒙、黑龙江、上海、贵州。

军委办事组准备发一个文件。

主席在五月指示：清理坏人是时候了。清理阶级队伍方向是正确的，要坚持延安老规矩“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以后，多次有指示，讲到历次经验，讲到江西打 A、B 团，福建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打改组派，反映当时错误路线的领导，现在要吸取经验教训。林副主席多次指示，要搞一个文件，强调执行主席指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思想上从严，组织上从宽。政治问题，不再为敌人效劳为历史问题。为敌人效劳为现行问题。江青同志讲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性、必要性。走资派有他的社会、阶级基础，把走资派揪出来了，不把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摧垮不行。清理阶级队伍是部队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整党建党、审查干部的重大措施。军队把坏分子清理出去，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军队必须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的手里，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如何搞法？要发动群众把坏人揪出来，保证军队的纯洁，军队的稳定，保证军队统一集中。

一、清理重点是军以上首脑机关、要害部门、国防科研单位、院校、文艺团体、医疗卫生单位。师以下正面教育，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正确对待运动，划清界限，对坏

人揭发，有问题的人集中到军以上机关学习班进行检查。

二、开展四大单位的在党委、文革领导下，深入进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没有联合的单位困难一些。

三、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学习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有关指示和文件，培养骨干，充分掌握材料，作好思想、组织、材料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

2、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坦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3、组织讨论，处理定案。

四、清理阶级队伍政策性很强，要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要放走一个坏人。

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清理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把一般的历史问题和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区别开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讲过一些错话的人区别开来；把出身不好的人和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区别开来；把受蒙蔽被利用的人和混进来的坏分子区别开来。集中打击一小撮最坏的阶级敌人。

加强调查研究，不能搞逼、供、信，不能轻信口供。防止敌人陷害好人。不能随便抄家、抓人、体罚，有问题的人百分之九十不抓，办学习班群众专政。

五、要加强党委领导，党委要有专人负责。

领导思想，一方面要反对右倾思想，一方面要防止极左思潮，扩大打击面，造成混乱。要有审干、专案、清理阶级队伍的班子，最好要统一起来。

部队有的开始了一个时期，有的还没有开始。有的清出坏人百分之二、三，有的百分之十。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西藏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它长期受反动的农奴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英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的掠夺，美帝、苏修、蒋匪帮也派遣了许多特务，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勾结达赖、班禅叛国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

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引导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要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对某些尚未完善的县革命委员会，应当通过两派革命群众的充分协商，予以调整、充实和加强。

继续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内团结，军民团结，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防止阶级敌人挑拨离间。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防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印度特务的破坏活动。加强战备，巩固边防，保卫祖国。如果印度反动派胆敢侵犯我国神圣领土，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把祖国的西南边疆建设成为伟大的钢铁长城。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迅速恢复交通运输，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中央相信：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更快地传达、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指示和战斗号令，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西藏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中央同意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名单，批准由龙书金同志任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缺副主任三人待补。

中央热烈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境外，有苏修、蒙修、美帝和印度反动派的挑衅，在境内，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阶级斗争极其复杂和尖锐。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北和新疆的代理人习仲勋、刘澜涛和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等，同这些内外敌人相勾结，妄图把新疆变为修正主义的基地，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疆各族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罪恶阴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下，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起了“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教导，加强敌情观念，高度警惕内外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深入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和“七·二四”布告，紧密团结各族人民，一致对敌。

要更广泛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批倒批臭。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要继续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巩固边防，保卫祖国。帝、修、反如敢于来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要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方针，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新疆有五十万左右的产业工人，应该充分认识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在正在到来的新的斗、批、改高潮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切实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中央相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只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依靠各族革命人民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把新疆建设成为各族人民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战线经历了和经历着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

新闻事业，包括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们的宣传，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早在二十年前，毛主席就指出：办好报纸，“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¹⁾在中国革命的长期阶级斗争中，毛主席提出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按照这条路线，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

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一贯仇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他们代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在急风暴雨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报纸是各地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之一，几乎无一例外。经过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的代理人被揪出来了。他们所推行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遭到了可耻的破产。然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报纸领导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社会主义革命大喊大叫， 还是为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象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民主革命基本结束，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

还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毛主席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就已经指出：“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因此，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必须为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中国赫鲁晓夫极力反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他胡说什么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²⁾。他要求报纸为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就在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表半年之后，中国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抛出了大毒草《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公然同毛主席的办报思想相对抗。

在这篇讲话中，他提出一个“为读者服务”的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口号。他胡说道：“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为看报的人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作好了。”⁽³⁾

“读者”是划分为阶级的。不同阶级的读者，决没有相同的爱憎。中国赫鲁晓夫要为之“服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读者”呢？翻一翻他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的几次“讲演”，就十分清楚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他立刻跑到天津去为资产阶级大声疾呼：“现在我们的报纸，在宣传上对自由资产阶级连第四位也没有，重点不是团结，而是打击，这也是不妥当的”⁽⁴⁾他大声疾呼：“在宣传上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地位”⁽⁵⁾！

五月，他在北京又愤愤不平地说：报纸上“每天都是工人们的好消息，但和资本家就不好，没有登他们的好消息。”⁽⁶⁾他卖力地替资本家“请命”：“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我们的报纸是有一点偏向的，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⁷⁾！

八月，他又跑到东北操着资本家的腔调说：“资本家感觉到平时说对我们很好，但是报上就说我们坏，工人的好事登报，资本家的坏事登报。”⁽⁸⁾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卖力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资产阶级的地位而拚命叫喊啊！这个资产阶级的头号代理人，他所谓的“读者”，不是别的，正是他的主子资产阶级！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有了资本主义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地位。中国赫鲁晓夫为资本家在报纸上争“地位”，正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果然，电台里播出了美化中

国赫鲁晓夫的好朋友、天津大资本家宋棐卿的通讯《我的梦实现了!》报纸上登出了公开叫嚣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黑社论《为华北农民生活的富裕而奋斗》，登出了“勤劳发家，生产致富”，“要发家，种棉花”等鼓吹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口号。

资本家得意忘形了，地主富农眉开眼笑了：他们的代理人给他们送来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好消息”！

中国赫鲁晓夫的“是非”、“好坏”，是很鲜明的。他看到我们的报纸“偏向”无产阶级，“偏向”社会主义，就大为不满；资本家皱了一下眉头，他就赶忙去承认“错误”，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真是一条资本家的忠实走狗！而那些走狗的走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还居然提出“我们党的报刊应适应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的需要”，并且下令各级党报“都不必公开宣传是中共机关报，也不必说是政府机关报，只称某地某报即可。”⁽⁹⁾为了讨资本家的喜欢，为了顺顺利利地把党的新闻事业变成实行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干得是何等的彻底，连共产党的牌子都不要了。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毛主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¹⁰⁾中国赫鲁晓夫反其道而行之，极力要使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开倒车，把它变成阻挡社会主义潮流、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工具。但是，“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¹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冲破走资派的重重阻拦而迅猛前进了。

中国赫鲁晓夫的自由化方针和 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六年，正当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趁着苏共“二十大”以后现代修正主义大出笼、大泛滥的机会，妄图从政治上反攻倒算，重新夺回他们已失去的阵地。这时候，中国赫鲁晓夫以为“变天”的气候已到，在五、六月间的短短二十几天内，连续三次召集新闻界一小撮走资派，下达黑指示，制定黑纲领，以便控制新闻工具，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

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又臭又长，谬论百出，驳不胜驳。总其一点，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赤裸裸地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全国右派的猖狂进攻鸣锣开道。这里，只把其中的主要三条拿来示众：

一曰：“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¹²⁾。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为什么呢？他气急败坏地嚷道：“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为官办，连农业合作社也成为官办的”，新华社应该“民办”，“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¹³⁾“官办”者，即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使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受到“束缚”，要求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的“自由”。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¹⁴⁾新闻事业必定要受一定阶级的领导或曰“束缚”，所谓不受“束缚”的新闻事业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受无产阶级的束缚，就受资产阶级的束缚，二者必居其一，当今世界上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报纸呢？

资产阶级早就标榜他们的报纸是“民间”的，是“从党派中摆脱出来”，“不受党派关系的约

束”⁽¹⁵⁾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挂着“民”字招牌的报纸，仍旧只能充当某一党派、某一财团的工具。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什么“民办”，什么“当老百姓”，也统统不过是幌子，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自由”，夺“权利”，要求解除“束缚”的一种手段。可见，所谓“民办”，就是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办。

二曰：“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末，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¹⁶⁾看，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十足的洋奴，对“外国”资产阶级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竟然要无产阶级报纸全盘照搬“他们的口号”。

新闻是有阶级性、党派性的，超阶级的“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资产阶级报纸为了欺骗人民，维持本阶级的罪恶统治，一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客观事实任意歪曲，对革命人民横加诬蔑，哪有什么“客观”“真实”“公正”可言！那些“客观”“真实”“公正”之类动听的言词，不过是用来掩盖它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几片肮脏的遮羞布！

无产阶级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新闻就是要反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要求，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记者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不但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敢于在新闻报道中揭示这种本质和规律。只有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中国赫鲁晓夫妄图以资产阶级的“客观”“真实”“公正”的口号取代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胡说什么：“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要把（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人家说我们好的和骂我们的东西都加以报道”⁽¹⁷⁾，“不仅对帝国主义讲真话，而且对共产党的错误也讲真话”⁽¹⁸⁾，这一番貌似“不偏不倚”的说教，恰恰是符合一小撮反动派的利益，只能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欢迎。嘴上说不要立场，实际上自己的屁股却同无产阶级的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所谓“客观”“公正”云云，原来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三曰：报纸上“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这个地方就是‘百家争鸣’。”⁽¹⁹⁾应当指出，在人民内部，我们是允许不同的意见在报纸上进行自由讨论的，“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²⁰⁾但是，对于一切反动派，则必须实行舆论一律，不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不给他们一点自由。列宁说得好：“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²¹⁾。无产阶级的报纸，必须旗帜鲜明地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阶级、反动流派、反动思潮作斗争，不进行这种斗争，无产阶级报纸就会丧失自己革命的灵魂。

中国赫鲁晓夫以偷天换日的手法，抹杀“百家争鸣”的革命方针的阶级内容，妄图用什么“几种不同的意见”取而代之。正如毛主席一再指出的，所谓“百家”，实为两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一家。一张报纸的政治倾向，归根到底，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见；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宣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中国赫鲁晓夫甚至扬言：新华社“以开放为好”，“我主张开放”⁽²²⁾；“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²³⁾。很清楚，他所鼓吹的“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正是为了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开放”出来，自由泛滥，不许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发言权。

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所制定的一整套向资产阶级“开放”的、自由化的修正主义办报方针，对于这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妖风，毛主席屡次给予迎头痛击。一九五七年五月间，毛主席对党内这种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作了一次集中的揭露和批判。毛主席指出：“他们否

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²⁴⁾

正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一整套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成了新闻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篡夺无产阶级新闻阵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总行动纲领，成了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动员令。

中国赫鲁晓夫三次讲话不久，经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吴冷西、梅益之流的具体策划，报纸、广播、通讯社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改版”或“改革”。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改成“公共的武器”、“社会的言论机关”⁽²⁵⁾，以便“让不同见解的人”都能“发表不同的意见”⁽²⁶⁾。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也一个个如同疯狗一般地狂吠。他们咒骂党报是“官报”，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处”；他们要“增办非党报纸”，说什么“应该把同人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甚至叫嚷“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可以小骂大帮忙”⁽²⁷⁾。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新闻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资产阶级右派结成了同盟军，他们篡夺某些报纸的领导权，利用新闻阵地向社会主义举行猖狂进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那位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徐铸成把持的旧《文汇报》。这家很合乎中国赫鲁晓夫口味的，自称是“文人论政”、“论政而不参政”的“超然”的“民办”的报纸，一九五七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它挂起中国赫鲁晓夫那个“客观”“公正”的招牌，大量报道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反动言论，大量采用反动编排，呼风唤雨，推波作浪，妄图造成天下大乱，以便整垮共产党，由资产阶级右派取而代之。无数事实说明，一九五七年新闻界乌云乱翻，其源盖出于一九五六年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

毛主席从一开始就看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七年初，毛主席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提出了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革命方针。毛主席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坚定地指出：“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²⁸⁾“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²⁹⁾可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邓拓，竟然在党报上封销毛主席的声音，拒不宣传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但却听任某些被资产阶级右派把持的非党报纸作歪曲宣传，以保护毒草不在报上暴露，干拢和破坏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斗争。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指出：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派，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³⁰⁾

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终究是徒劳的。这年七月一日，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重要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主席在这篇光辉文献及

一系列有关的指示中，高度概括了一九五七年我国政治思想战线（特别是新闻界）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尖锐而深刻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一整套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横扫了新闻界的妖氛迷雾，那些嚣张一时的右派鬼蜮，在毛泽东思想强大的革命威力下遭到了覆灭。

一个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 舆论的反革命策略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上，中国赫鲁晓夫羽翼下的彭德怀反党集团，跳出来疯狂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了官。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再一次肯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并尖锐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

时刻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中国赫鲁晓夫，又一次把黑手伸向新闻界。在这个时期，中国赫鲁晓夫豢养起来的一小撮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新闻单位。八届九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国赫鲁晓夫就对他新闻界的代理人说：“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着目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³¹⁾

一面要“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一面要“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这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的形势下所采取的更阴险、更狡猾的新策略。这个策略，用他的走狗们的话来说，叫做“打迂回战”，就是“不强调直接配合”，而是用“所言者小，所见者大”的手法，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题”“含蓄”在“宛转”的笔调之中，间接“配合”⁽³²⁾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这是一个极其毒辣的反革命策略！中国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代理人对此心领神会，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搞游记、搞知识，这是政治的需要！”那个臭名昭著的大叛徒邓拓，甚至在北京市四家报刊举行的“神仙会”上，欣喜若狂地叫嚣：要凭着这个策略“努力打开一条新路”⁽³³⁾！

他们打开的是一条什么“新路”呢？吴冷西亲自动手，在党报上开辟了以所谓“匡正时弊”为宗旨的《长短录》专栏；继《燕山夜话》出笼之后，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经营的“三家村”黑店也开张营业；广播电台开设了《历史故事》、《阅读与欣赏》等专题节目；许多地方报纸相继出现了《滇云漫谭》、《历下漫话》之类的“知识性”专栏，如此等等。

正是沿着这条“新路”，那些叛徒、特务、“三教九流”、牛鬼蛇神、封建阶级的遗老遗少、资产阶级的“学者”“权威”，先是探头探脑、继而大摇大摆地踏进新闻界，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打手。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为了共同的“政治上的需要”，使尽了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大干其反革命勾当。

什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请看：他们抬出海瑞、于谦、李三才之类的封建僵尸，露骨地为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一伙鸣冤叫屈，撑腰打气，这与实际“保持距离”吗？他们利用各种“故事”、“寓言”、“比喻”，不择手段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与实际“保持距离”吗？他们在

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的知识”这个幌子的掩护下，拼命地推销腐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人们的灵魂，瓦解人们的斗志，全面地推行“和平演变”，这与实际“保持距离”吗？事实上，当时正是反革命大毒草在“实际”中疯狂出笼的时期。中国赫鲁晓夫们的所作所为，与“实际”的联系紧得很，曾经卖力推行“保持距离”论的梅益，一语道破了这个“理论”的实质。他说：“看来好象与实际脱节，其实这是最好的联系实际的做法。不联系也是联系，联系了大的实际。”⁽³⁴⁾这个所谓“大的实际”，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实际”么！

什么“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不对。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他们躲在“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背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使用的是“软刀子割肉”的办法，他们是一伙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平地一声春雷。正在这群吃人魔鬼张牙舞爪的时候，伟大统帅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凡是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给中国赫鲁晓夫利用舆论阵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以粉碎性打击。

中国赫鲁晓夫是反对宣传

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

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倡导下，全国出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林彪同志多次指示报纸，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办报”⁽³⁵⁾。正是这个时候，一九六四年，中国赫鲁晓夫按捺不住他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无比仇恨，跳出来大骂报纸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太多了”，胡说什么“太多了，就有一定的危险性”⁽³⁶⁾。主子一呼，奴才百应。中国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代理人，立即挥舞起“形式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三根大棒，竭力阻挠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阻挠报道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嚷：“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不能立竿见影的”⁽³⁷⁾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起哄”。他们公然下令：“学习解放军，学习毛选，有一个时期宣传很多，现在不必那样集中突出了”⁽³⁸⁾“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提‘高潮’”⁽³⁹⁾。这一伙窃取我国新闻界领导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把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稿件中一出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等字眼，他们就提笔涂掉。对于报道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稿件，他们不是无端扣压，就是采用反动的编排手法加以贬低。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代理人，一看到报纸上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就心惊肉跳，一看到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典范就拼命攻击，这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们看到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枚毛主席像章，就惶惶然调来大批武装军警，进行搜捕和殴打，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因此，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宣传还是不宣传或反宣传，这是区别无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的分水岭，也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试金石。

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这是无产阶级报纸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好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报纸就能帮助广大群众摆脱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束缚，抵制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捍卫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重演，有着极大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在一切宣传中突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报纸就能正确地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组织和鼓舞亿万革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灵魂。宣传好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报纸才能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长期斗争中，充分发挥“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⁴⁰⁾。宣传好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办好报纸的最高标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代理人，疯狂破坏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妄图阻挡毛泽东思想的大传播、大普及，完全是枉费心机。广大革命人民大学大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伟大潮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中国赫鲁晓夫 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破产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如千钧霹雳，猛烈地炸开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新闻界的反革命独立王国，震撼了中国的大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狐群狗党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之流顿时乱了阵脚。为了挽救最后灭亡的命运，他们慌张张炮制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革命、包庇坏人的反革命《二月提纲》。他们施出一连串的阴谋诡计，继续控制报刊，妄图扑灭革命烈火，转移目标，掩护退却。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划时代的文献——五月十六日《通知》，给中国赫鲁晓夫们以毁灭性打击。毛主席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领导权，首先从新闻界掀起了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毛主席对《文汇报》的夺权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新闻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国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统治势力，全面崩溃了。那些什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之类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一个一个被封了，被冲了，被革命派夺了权。好得很！好得很！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新闻战线十八年来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坚定一移地、始终一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报纸、广播、通讯社的根本任务。无产阶级报纸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最神圣的职责。要努力把报纸办成一个学习、传播和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新闻报道的一切方面，最迅速最准确地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使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成为自觉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准确。对于歪曲、篡改或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一切言行，特别对于那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鄙做法，无论是来自右的方面，或是来自极“左”方面，都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彻底批判。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这是所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共同的卑鄙手段，我们的报纸，必须坚决反其道而行之。这样，报纸就能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各个时期十分鲜明地为广大革命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

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同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前，我们要继续展开对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揭露、大批判。要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批判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反动论点。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毛泽东思想就是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⁴¹⁾这是毛主席对于报纸工作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要把报纸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资产阶级也力图夺取报纸的领导权，使之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十八年来我国新闻战线上两个阶级斗争的焦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然会以种种卑劣手段，阴谋同无产阶级争夺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因此，认真地清理阶级队伍，清除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文人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当前新闻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新闻队伍，才能在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各级新闻单位，都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朝气蓬勃的、战斗的领导班子，要大胆提拔一批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以保证我国新闻事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注意人是会变化的，必须经常清洗那些腐化分子，不让他们掌握报纸、新闻的工具。

第三，必须深入地持久地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全面地肃清其毒害，把新闻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当前，除了从历史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外，要特别注意批判那种把新闻工具当作只为某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服务的极端错误的作法。各地报纸、电台等等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为首、林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不择手段地造谣诬蔑，制造“小道消息”，散布种种流言蜚语，妄图以假乱真，把水搅浑，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这种反革命活动，我们要坚决揭露，坚决打击。广大的革命群众，要善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辨别真伪，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队伍中也还有一些同志，从小山头的私利出发，或者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和图片，以制造某种舆论；或者不顾大局，不顾无产阶级的利益，肆意发表各

种资料、文件，严重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流毒在文化大革命中恶劣表现，必须坚决加以纠正。毛主席告诫我们：“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⁴²⁾“说话、写文章都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这是欺骗群众，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而自己的阶级被蒙蔽了。”奉劝那些中了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毒而至今尚不觉悟的人们，好好读读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

毛主席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主席历来对新闻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是我们无产阶级办报纸、办广播、办通讯社、办一切新闻事业的唯一正确的指针，也是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强大武器。我们要在行动上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新闻路线，树立无产阶级严肃的科学的战斗的作风。

第四，新闻机关要走精兵简政的道路，要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问题。⁽⁴³⁾“报社的人应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下去的人，又做工作，又当记者。”⁽⁴⁴⁾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⁴⁵⁾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一切新闻机关，都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勇敢地从各种旧框框、旧习惯的圈子里跳出来，面向群众，实行精兵简政。

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必须精兵简政，必须加强新闻工作者同群众的联系，必须来一个大革命，彻底改变那种轻视工农、关门办报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群众办报路线。精兵简政是当前办好无产阶级报纸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组织保证。应当吸收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到报社中来，大量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工农通讯员，打破知识分子成堆的状况。

做新闻工作的人，一定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一定要同劳动人民结合，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一定要善于及时反映革命群众中的先进的典型事物，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前进的呼声，一定要贯彻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路线。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办不好无产阶级报纸的，是很容易丧失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解决。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把新闻战线上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 1968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

注：

- (1) (45)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 (2)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3) 《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 (4) 《对天津工作的初次意见》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

- (5)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 (6) 《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 (7) 《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 (8) 《在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 (9) 旧中宣部《关于今后各级党报名义不要公开宣传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 (10)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 (11) 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 (12)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 (13)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 (14) 《接见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 (15) 约斯特：《新闻学原理》。
- (16)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 (17)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 (18)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 (19)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 (20)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
- (21)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一九〇〇年九月。
- (22)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 (23)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 (24)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
- (25) 《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改版社论《致读者》。
- (26) 梅益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在第四次全国广播会议上的发言。
- (27) 以上均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 (28)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 (29)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 (30) 一九五七年四月对《人民日报》的批评。
- (31) 《对人民日报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
- (32) 以上引语见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编委会讨论〈长短录〉专栏的意见》。
- (33) 邓拓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 (34) 梅益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的讲话。
- (35) 《关于办好报纸的指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 (36) 一九六四年的一次讲话。
- (37) 吴冷西一九六四年对《人民日报》记者部和理论部的讲话。
- (38) 吴冷西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的一次讲话。
- (39) 吴冷西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各新闻单位负责人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 (40) 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 (41) 摘自《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 (42)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

- (43) 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次谈话。
(44) 一九五八年一月关于《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
(45)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附〕 新闻战线上的革命和反革命

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夺舆论大权的黑纲领

(一九七八年一月)

《新闻战线》评论员

黑纲领出笼的背景和经过

十年前，陈伯达、姚文元合伙炮制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出笼。这篇黑文（以下简称《到底》），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篡夺新闻舆论大权的黑纲领。揭露《到底》产生的背景，批判《到底》的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斗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就鼓吹：“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这说明林彪对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视程度。陈伯达是舞文弄墨的反共老手，张春桥、姚文元也都是靠笔杆子起家的，他们都很懂得制造反革命舆论对于篡党夺权的重要性，一直苦心孤诣地夺取新闻阵地的领导权。《到底》一文，就是这两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勾结的罪证之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六十年代初，林彪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枪杆子，就大谈特谈报纸的重要性，把黑手伸向新闻界，妄图发号施令，左右全国舆论。

林彪攻击完整、系统地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费力很大，用处很小”，胡说写社论和文章，“主要是引证主席的话。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毛主席的书、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等等。总而言之，林彪竭力鼓吹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照抄照转照搬革命导师的话，完全抛弃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打着批判刘少奇的旗号，利用新闻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林彪、陈伯达蛮横地宣布，包括新闻在内的思想文化阵地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不久，就说那里有一个“反党集团”，把它比作蒋、宋、孔、陈，也叫做“四大家族”。主持报纸工作的老干部被赶下台，许多中层干部靠边站。中央一级的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也基本上被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所把持。在上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余党控制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并新办了《工人造反报》。

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煽动和策划了外交部夺权等反革命政治事件，暴露了一部分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动面目。一九六七年九月，王、关、戚垮台，林彪、“四人帮”控制

舆论阵地的阴谋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同伙的覆灭，并没有使他们有所收敛。这时，姚文元又作为小伏计，尾随陈伯达在人民日报进进出出。

这就是《到底》一文出笼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舆论阵地的一些背景情况。

为了进一步控制舆论阵地，一九六八年九月，陈伯达、姚文元合伙抛出了《到底》的黑纲领。这是林彪、“四人帮”利用报纸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篇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授意炮制的。他们又亲自动手反复作了重大的、别有用心的修改，特别是关于十七年新闻战线的估计，全部是他们塞进的黑货。摘其要点如下：

一、原稿在总论中，写了刘少奇在阶级斗争关键时刻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的干扰，还具体写了四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即建国初期、一九五六年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夕。

文章到了姚文元手里，他又作了这样的改动：第一，刘少奇一人变成“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他”改成了“他们”。第二，添了一句“他们……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既然是“各个”，就是全部，无一例外。第三，删去了“每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时间的限制取消了，刘少奇便自始至终主宰着十七年的新闻战线。

因此，文章叙述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陈伯达和姚文元挥舞大棒，用一句话全盘否定了整个新闻战线，即：文化大革命“猛烈地炸开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新闻界的反革命独立王国”。“反革命独立王国”，就是林彪、“四人帮”对解放后十七年整个新闻战线的基本估计。

二、文章中有一句话：“那些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一个一个被封了，被冲了，被革命派夺了权。好得很！好得很”这是姚文元的手笔。陈伯达仍嫌不足，在这句话中“那些”之后。特意点上了“什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之类”，以发泄他们对无产阶级报纸的刻骨仇恨。

三、既然新闻界已经成了“反革命独立王国”，报纸又都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那么整个新闻队伍也必须大换班，才足以显出他们的“革命”。于是，陈伯达在文章的末尾喊出了他们阴险的口号：“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必须来一个大革命”！

陈伯达、姚文元就是这样煞费苦心地拼凑了一个“新闻黑线专政”论。

毛主席的旗帜引导我们胜利前进

解放后十七年，新闻战线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工作的。毛主席的旗帜引导着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一生的革命实践，同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解放后十七年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创办、主编过报刊。亲自为党的报刊和通讯社撰写和修改社论、文章和通讯，对新闻工作作过许多重要的指示，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培育了无产阶级的新闻传统和作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主席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内容极其丰富，我们的体会是：

一、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防止被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所篡夺。各级党委都要把办好报纸当作

大事。

二、无产阶级的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论、辩证法，批判来自“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靠报纸。要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使报纸发挥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报纸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等各项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三、办报和办别的事情一样，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报纸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要严肃认真地做好来信、来访工作。报纸要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

四、报纸的宣传必须做到准确、鲜明、生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报纸宣传要从实际出发，对事物要有分析。要力戒虚夸，留有余地，做冷静的促进派。反对弄虚作假，防止片面性，防止一窝蜂。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毫不吞吞吐吐。报纸要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引人入胜，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写文章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要有中国气派。

五、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党的方针政策。要经常到下面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要懂得辩证法，不要绝对化。头脑要清楚、冷静，要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要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对我们党的新闻实践的科学概括。解放后十七年，广大新闻工作者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指引下努力工作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的报纸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站在运动的前头推动运动。无论是建国初期、一九五六年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夕，当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干扰破坏的时候，我们的报纸总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予以迎头痛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我们的报纸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表达了群众的愿望，保卫了革命的利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不错，十七年中，修正主义路线对新闻界是有干扰破坏的，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我们在工作中也犯过不少这样那样的错误，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林彪、“四人帮”妄图以毛主席的批评，作为他们所谓“新闻黑线专政”论的依据，这是徒劳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阶级和政党，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新闻工作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毛主席的批评，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我们前进，并不是要否定我们的优点和成绩。广大新闻工作者对毛主席的批评采取什么态度呢？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批评了宣传浮夸风，一九六一年批评宣传“有鬼无害论”，一九六四年批评不重视思想理论宣传等等。广大新闻工作者根据毛主席的批评、指示，认真检查，很快克服了浮夸风，批判了“有鬼无害论”，加强了思想理论宣传。改正了错误之后，毛主席对于我们的进步又及时予以肯定。例如，对《人民日报》，有一段时间，毛主席曾经说，我就不看《人民日报》。后来，《人民日报》改进

了宣传工作，毛主席又说，《人民日报》现在我看了。这正表明广大新闻工作者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我们的新闻队伍，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极少数混入新闻界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先后被清除出去，纯洁了新闻队伍，新闻阵地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这个判断也适用于新闻界。我们的干部，一部分来自过去各革命根据地，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武装斗争的年代，用笔同敌人进行战斗，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些同志，久经考验，立场坚定，具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闻工作经验，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新闻队伍的中坚力量。另一部分，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干部，他们热爱党，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当然，无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有一个不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广大新闻工作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参加了农村和城市的群众斗争，在世界观改造、思想革命化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广大新闻工作者挺身而出，运用各种方式，坚决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表现了很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

解放后十七年新闻战线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们的新闻队伍，是党的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彪、“四人帮”对新闻战线的两个估计，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必须坚决推倒！

推倒对新闻战线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林彪、“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新闻战线是“黑线专政”，提不出任何一点事实根据，只能求助于帽子和棍子。因此，从《到底》这篇黑文中，简直找不出一个象样的论点可以与之进行辩论。只要把他们的帽子、棍子拿来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第一、陈、姚凭空捏造说：中国赫鲁晓夫“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新闻单位”；整个新闻界则成了“反革命独立王国”。

真有那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吗？毛主席说过，我们反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而是请看事实。事实胜于雄辩。经过文化大革命长时间的内查外调，在中央和省一级新闻单位（包括中央级和省、市、自治区的报社，新华社和各地分社，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台长、副台长、社长、副社长二百九十八人中，竟连一个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没有发现。难道“安插到各个（不是一两个）新闻单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忽然间都上天入地了不成？倒是在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新闻界有那么几个卖身投靠“四人帮”，出卖灵魂的“老干部”，成了帮派人物。

由此可见，所谓“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报纸”，完全是无稽之谈。所谓需要“猛烈地炸”才能“炸开”的“反革命独立王国”，完全是耸人听闻，别有用心。

他们的用心何在？就在争夺“领导权”上。一大批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居于新闻界领导岗位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他们篡夺宣传大权的障碍。在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他们只能搞阴谋诡计，捏造“安插”、“控制”、“独立王国”之类的谎言，编织成一张法西斯主义的罗网，妄图把整个新闻界一网打尽，把革命领导干部统统赶下台去，由他们一伙取而代之，操纵宣传大权，为所欲为。十年来，他们正是这样干的。

如果说所谓“走资派控制”论、“反革命独立王国”论，也能算作一种“估计”的话，那末，这

种估计不过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一公式在新闻界的早期版本。

第二，所谓“放毒、造谣的旧报纸”，这也是林彪和“四人帮”的一种“估计”。

什么是旧？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了，二十九个省市的报纸也在此前后相继出版。十七年来，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兴旺发达，开创了中国报刊史上的新篇章。林彪、“四人帮”把这一切统统斥之为“旧”，似乎革命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在他们的“新天朝”以前，统统不算。按照这种逻辑，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老根据地的各种报纸，都一古脑儿成了“旧报纸”，这岂非咄咄怪事！

什么叫放毒、造谣？只要看看陈伯达最为痛恨、特意点名的《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的遭遇，就足以看出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段之卑劣。

《羊城晚报》是一张有鲜明特色、有自己风格的报纸。它热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以一张地方报纸而行销全国，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南方日报》也是办得好的。为什么“放毒、造谣”的大帽子突然从天而降？说来可气又可笑，原因是《羊城晚报》两次刊登了周立波同志记述毛主席一九六二年重返韶山的散文《韶山的节日》。这篇散文表达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扬开慧烈士的崇敬。这件事大大触怒了江青，在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为此，他们这一伙，竟然要挟中宣部下令全国报纸不准转载，作者周立波横遭迫害，《羊城晚报》因获“放毒、造谣”的罪名而被封闭。至于《南方日报》，则因为是《羊城晚报》的“兄弟”而受株连。

打倒了“四人帮”，十年沉冤，才得昭雪。与此同时，人们从林彪、“四人帮”篡夺宣传大权以来的种种劣迹中，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大干放毒、造谣、诬陷等可耻勾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第三，报纸既然是旧报纸，广大新闻工作者都变成了旧人员，不堪信用，请看，《人民日报》的干部是“一股邪气”，新华社的干部“是一筐烂西红柿”，《红旗》杂志社的干部都應該“用铁扫帚扫出去”，就连给报纸写稿的作者队伍，也被他们诬蔑为“踏进新闻界”的“叛徒、特务、三教九流”、牛鬼蛇神、封建阶级的遗老遗少、资产阶级的‘学者’‘权威’”，统统被陈伯达定为“反革命打手”。这就是他们对建国十七年以来新闻队伍的估计！于是，陈伯达煞有介事地叫嚷：“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必须来一个大革命”。他们真的是要精简机构吗？不对！这是他们妄图篡夺新闻舆论大权整个阴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借口精简机构，排除我们党几十年培养起来的、有丰富经验的新闻工作干部，换上他们的一帮一派。这就是林彪的所谓“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动实践。他们肆意践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他们把持下的新闻系统，如《红旗》杂志，原班人马包括工勤人员全部被下放，一去近十年，不予置理。他们操纵梁效、池恒、罗思鼎等那么几枝黑笔杆，为非作歹，人倒是不多了，但它已经不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而成了林彪、“四人帮”的“同人杂志”。《人民日报》呢？当年他们先后派人在湖北、辽宁、山西选好了“安置”地点，准备来个大换班。只是因为毛主席有话，“不要另起炉灶”，他们才未敢贸然下手。至于地方各新闻单位被撤换了的新闻干部，不可胜数。好端端的一支无产阶级新闻队伍，被他们弄得七零八落。这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大罪行。

一个严重的教训

从《到底》一文发表到“四人帮”垮台整整八年中间，林彪、“四人帮”竭尽全力，夺取新闻舆论的领导权。

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反革命策略，就是千方百计地排除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安插亲信，组织帮派体系，镇压“政治反对派”，控制宣传口径，妄图把整个舆论阵地变成“四人帮”的一统天下。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新闻单位的宣传大权，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所把持，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反革命独立王国。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伙职业反革命，为什么竟然欺骗了许多同志，把持新闻界这么久呢？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摆出一副“左”的面孔，把自己装扮成“最革命”的样子，花样翻新地施展了一套又一套阴谋诡计。他们利用报纸宣传，打着“高举”的旗号，要人们相信，似乎只有他们才真正得了毛泽东思想的真传。实际上，他们玩弄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等卑劣手法，肆无忌惮地歪曲、割裂、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践踏真理，造成思想、理论、路线上的极大混乱，用以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

但是，他们要搞反革命，就不能将其阴谋隐蔽得很彻底，广大新闻工作者越来越看清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在整个新闻战线，夺权与反夺权，控制与反控制，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他们只是凭借已经掌握的部分权力，大搞阴谋诡计，依靠帮派体系为虎作伥，才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政治反对派”镇压下去。

“四人帮”靠了欺骗和镇压的反革命两手，在一段时间里，夺取和垄断了新闻事业的领导权。他们把党报变成了帮报，把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变成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变成了他们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把我党优良的新闻工作传统和作风破坏殆尽，写下了我国报刊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把宣传大权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手中，十年间的严酷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有切肤之感：报纸的领导权实在太重要了，教训太深刻了。经验证明，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必须继续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如何保证新闻领导大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去观察、分析问题。反革命两面派的重要特点是言行不一，理论和实际脱离，说得冠冕堂皇，做得卑鄙肮脏。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仅看你讲的，更要看你实行的是不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是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不迷信权力，不怕威胁利诱；同一切违背人民群众利益，违反“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思想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报纸要接受群众监督，包括报社内外的广大群众。“四人帮”横行时期，广大群众对报纸的宣传极端不满，许多读者来信愤怒斥责，尖锐地指出报纸宣传的是假马克思主义，报纸已被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所控制。报社内部群众对于“四人帮”的心腹、亲信的倒行逆施，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反革命最害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有权管理上层建筑，实现广泛的群众监督。

党委要加强对新闻工作者的领导，第一、二把手要亲自管报纸。必须在政治思想上、组

织上，保证党对报纸的领导，防止少数人假借党的名义，利用报纸进行个人的、宗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这些问题，现在正在逐步解决，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必须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认真总结三十九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毛主席的新闻理论为武器，深入地剖析林彪、“四人帮”这些反面教员，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新闻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要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前进。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闻工作者肩负着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排除干扰，扫清道路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作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新闻战线》1978年第1期)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 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八月二十五日通知的精神，现将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的通知如下：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毛主席的伟大批示是搞好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动力，应坚决执行，坚决照办。进军事院校的工人，可由实行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并清理了阶级队伍的军事工厂或民用工厂选派。

(二) 凡尚未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院校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派领导干部之外，应派工人、解放军共同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凡成立了革委会的院校不实行军管，但要派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其任务是领导学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斗、批、改。

(三) 对军队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由院校所在地区的大军区统一组织实施；组织工人和解放军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则由院校所在地区的大军区或省军区、省、市革命委员会共同组织实施。

(四) 空军、海军不开展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的飞行学校及机要学校不实行军事管制，不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五) 北京地区的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第三工程兵学校、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等六座院校，担负着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训练任务。对这六所院校待训练任务告一段时，再进驻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现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发给你们，望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试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总结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的经验，作了如下的规定：

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

二、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

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不要选调。

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般应以二十五岁至六十岁左右的有一定工龄的较老工人和少部分青年工人为宜。

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

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如需要配备少量革命干部，也不要出头，负责做些内部工作。

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七、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锻炼，不致长期脱离生产，宣传队员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轮换，但每次轮换的人数，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以免影响工作。

八、抽调工人的人数，应根据本厂的情况，很好地安排。整个说来，大体上占全市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体到一个厂可以伸缩，以不妨碍生产为准。

九、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必须采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典型试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笼统铺开。

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随时和定期总结工作的经验，发扬成绩和优点，克服缺点，以利团结大多数，揭露坏人。市革命委员会更要随时和定期召集各宣传队交流经验的会

议，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关于政策的教育。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红旗》杂志发表《从上海机械学院 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 的教育革命》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原载 1968 年 9 月 5 日《人民日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四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现遵照毛主席指示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文革：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包括十所艺术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日我们召集驻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北工大、体育学院、人大宣传队的同志座谈了当前情况，恩来、江青同志也到会听了汇报。根据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经领导小组研究后，于八月三十一日召集五十九所大专院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深刻领会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精神实质，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要防止包办代替。学校日常行政工作仍由院校革委会去做，要求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警惕阶级敌人和别有用心的人，用烦琐的事务工作缠住宣传队。工人和解放军两个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充分发挥每个队员的作用。对重要问题的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防止坏人钻空子。加强请示报告，每个宣传队的指挥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掌握情况，及时向上反映。

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充分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中期的功绩，教育他们不要吃老本。对于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要急，不要压，不要无限上纲。宣传队要和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要善于抓活思想，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学习班要在班系、科室普遍举办。对头头和教职员、干部，可以分别集中学习，这样有利于做群众的工作。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绝不要一进校，情况还不了解，就找两派来谈大联合，这样做缺乏思想基础。对于群众组织，不提“倒旗”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不确切，而且容易被坏人利用。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铲平山头实行革命大联合。在已成立革委会的院校，主要是帮助他们调整、充实、提高。要帮助他们用整风的方法总结经验，开展自我批评，纠正错误，克服宗派主义，改变作风，清除坏人，使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今后成立革委会要慎重，要防止搞小宗派，防止坏人钻入革委会。对结合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要认真进行政治审查，选择那些真正的积极分子参加三结合。

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宣传队要组织专门的班子调查研究学校的情况，为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做好准备。

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绝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对于接管的档案，首先要清查人事档案，搞清各方面人员的政治情况。在清查档案和资料的时候，发现有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及时报告，绝不允许扩散。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卫戍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周恩来在北京革命群众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

同志们，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战斗的敬礼！（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在今天北京市庆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在今天首都庆贺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大会上，让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问你们好，向你们庆贺！（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也向全国各族人民庆贺！

大家都说，现在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自从去年一月上海工人阶级首创夺取走资派的权的“一月风暴”到现在，整整的二十个月了。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鼓掌）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同时，我们大家也要紧紧地记住，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外还有一个台湾省没有解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大家晓得国内外的敌人不会甘心他们在中国失败的，他们一定还要挣扎，还要反扑。所以，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义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我们认识，统一我们步伐，统一我们行动。各个单位都要能够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

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各单位，也就是说，譬如企业、事业单位、学校、机关也是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彻底地把那些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各地、各单位的代理人斗臭、斗倒，并且要在我们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下，清理各个单位的阶级队伍，把那些坏人揪出来。要继续地批判一切反动的思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一些反动的学术权威、技术权威，等等。要精简我们各单位的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精简的人员到基层去、到生产中去。

青年们也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鼓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应该号召全国的革命人民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所以，现在开始组织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以人民解放军为后盾，有配合地进入到各学校去，促进那个地方没有联合起来的革命大联合，同各学校、各单位的学生、教职员中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个里头的斗、批、改。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把自己逐步地、不断地锻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有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掌）

在这样进行斗、批、改当中，就可以把我们教育革命进行好。不仅对学校如此，对于各种企业、事业单位，各种机关，凡是没有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或者没有搞好斗、批、改的，我们都应该派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去帮助他们，去领导他们。（鼓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现在，从国际上看，敌人是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是一天天好起来。很清楚，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内外交困，以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为中心的修正主义国家也是互相猜疑，互相倾轧。所以追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日子也很难维持。旧的世界我们可以说走向崩溃是肯定了的。（鼓掌）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全世界胜利也是肯定了的。但是在胜利来临之前，世界的敌人一定要挣扎、反扑。所以，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要按照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鼓掌，群众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打倒党内一小撮的走资派、叛徒、内奸！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中国人民公社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红卫兵万岁！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中国各族革命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人民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鼓掌）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

今天，我是早晨才知道要开这样一个盛大的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临时告诉我，要我来说几句话。（鼓掌）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红卫兵小将们，（鼓掌）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我想不出什么好的语言来形容我心中的喜悦。（鼓掌）

回忆这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惊涛骇浪，追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终于把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粉碎了。（鼓掌，群众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鼓掌，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现在有少数个别小将犯了这种或者那种错误，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正。（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就是有个别单位，有什么武斗，那也很滑稽的。当然是坏事情，脱离了广大的群众，也脱离自己本单位的群众，这不是好事，我们反对。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革命小将，（鼓掌）暴露了敌人。（鼓掌）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七月二十七号，工人阶级主力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鼓掌，群众高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人民解放军做后盾。（鼓掌）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愿意革命的教职员应该欢迎，（鼓掌）服从领导。（鼓掌）不允许少数个别坏人刁难，要把这些坏人破坏斗、批、改的家伙揪出来。（鼓掌）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要好好地保护红卫兵小将。（鼓掌）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因此，我建议你们也要好好地学习本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这一篇按语。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斗、批、改，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很多的。我们还会

遇上许多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前进！（鼓掌）

我的话完了。（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天山南北凯歌嘹亮，西藏高原阳光灿烂。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乘胜前进的时候，地处我国西南、西北反帝反修前哨的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胜利诞生了！

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我们向西藏和新疆各族革命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和新疆部队全体指战员，以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向两年来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全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的，致以热烈的战斗的敬礼！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和新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支持下，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较量和顽强斗争，终于把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和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一小撮叛徒、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英国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挖了出来，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分裂祖国统一的迷梦。给了帝、修、反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颠覆破坏阴谋以沉重打击。

从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兴起，到西藏和新疆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经过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

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的手中，这是一场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把美帝、苏修的一切反革命谣言击得粉碎，使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痴心妄想化为泡影。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尽情地热烈欢呼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革命人民所取得的这个伟大胜利！

我们坚决地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坚持不懈的战斗，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项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同时，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使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在贯彻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每项工作中，更好地肩负起领导一切的伟大历史使命。

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抓好典型。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坚决执行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的政策。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必须亲自选择一些点，从中吸取经验，指导面的工作，并向中央作报告。要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广大群众意见，十分注意克服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

毛主席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攻，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搞乱和破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一定要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战备，加强边防、海防和空防，随时准备解放台湾，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敌人如果胆敢碰一碰我国的神圣领土，发动武装

侵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它们歼灭。

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阔步前进！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以更加雄伟的面貌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原载 1968 年 9 月 7 日《人民日报》)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

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普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已经并正在有领导、有步骤地到学校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不仅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必将加速我国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知识分子队伍的进程。

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正确掌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极其重要的编者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这个编者按，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意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编者按中提出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并且进一步指明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知识分子，建立起一支为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建立完全的统治地位所必需的。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到斗、批、改的阶段，解决这个课题的重大意义就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在人们面前。

编者按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不仅涉及学校，而且涉及我们文教战线及干部队伍中广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

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进行再教育，要充分发扬积极因素。路线问题是根本问题，什么路线培养什么样的人。应当把仇恨集中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身上，是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了青年。在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就可以推动人们更进一步地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多数或大多数从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能够逐步同工农兵结合的，其中必有动摇和反复，但只要他们能跟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批判并不断改变自己从家庭中、学校中带来的资产阶级旧思想，就能在为工农兵服务中作出贡献。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反革命分子、顽固派是有的，那是极少数。广大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改造、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广阔的前途。编者按指出：“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就是要从正面鼓励和促使广大知识分子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结合得好又有创造发明的，各地都有，应当用他们的榜样来教育已经或正要走上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途径。广大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巨大的锻炼和考验，痛切地感到了自己身上的革命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弱点，迫切地要求和工农兵结合，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进驻有关单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这种积极性，支持他们和工农兵相结合，引导他们积极投本单位的斗、批、改。今后，在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但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应该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政策，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指明出路，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采取这种政策，可以更有利于促进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交代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极少数民愤极大，需要打倒的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充分批判之后，也要给出路。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必须提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规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处理，对于思想问题，要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解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在广大的革命群众前头展现出一片壮丽的图景。我们相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我国广大革命的和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上，一定会更快地前进。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原载 1968 年 9 月 12 日《人民日报》）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前言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〇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原载 1968 年 9 月 14 日《人民日报》)

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胜利

——庆祝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一周年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满怀胜利的豪情，庆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一周年。

毛主席亲自视察三大地区，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毛主席在视察过程中所作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纲领。

回顾一年来的战斗历程，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发生的革命变化，是何等的巨大啊！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普遍地得到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取得了巨大成果。毛主席提出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变成了亿万革命群众的自觉行动。毛主席提出的要办学习班的伟大指示，已成为解决各种问题、完成各项任务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充分显示了毛主席指示的强大革命威力。

毛主席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

全国军民为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作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要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

由于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因素，出现先进和后进的差别，这是不奇怪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承认这种差别，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要对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检查、总结自己的工作，那些做了，那些还没有做，那些做得好，那些做得不够，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赶先进，比学赶帮，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新局面。

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如果不充分发动群众，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不能完成斗、批、改这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更深入、更细致、更艰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斗私批修，批判和克服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自觉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要学习毛主席的伟大实践，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亲自选择一些点，组织一些人，作好调查研究工作，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同本地的、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要善于发现典型，树立样板，运用先进单位的经验教育群众，鼓舞群众。要下决心，下力量，捕“马蜂窝”，解决“老大难”问题。通过抓两头，带中间，必将推动各个单位更快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工人群众和解放军战士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这就能够更有力地保证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自觉地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向工人阶级学习，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和组织纪律性，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来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工人群众和解放军战士要在斗争中努力学习，发挥模范作用，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敌人越是破坏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要麻痹松懈，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随时揭露和粉碎来自阶级敌人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斗、批、改的任务就一定能够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就一定能加速到来。

(原载 196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 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党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 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九月十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授权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这是对上海工人阶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经过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

现将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的规划和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审查批示。

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1、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革命委员会具有革命权威。

2、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得好，查清敌情，阶级阵线分明。

3、整党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一整套反动谬论搞得比较深；清出了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少数长期死气沉沉的和犯有严重错误尚未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党员暂缓恢复；对广大党员进行了教育，站错过队的党员多数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4、革委会中党的领导核心，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革命斗争中经过更新的，新老结合的，经过革命群众反复酝酿推选的。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初步选定国棉十七厂、上海阀门一厂（原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三个单位在十月份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其中国棉十七厂和原良工阀门厂，都是老造反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一月革命”夺权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上港七区造反派队伍坚强，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有贡献，党的核心中有老造反的党员，也有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

在总结上述三个点的经验后，年前准备再选择十几个到几十个条件成熟的工交单位开展建党工作。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进行，今后也不搞那种由上而下规定数量的“大发展”。

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发展新党员，必须坚持毛主席这一伟大建党纲领的要求。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而不是那些中间派、“老好人”或者言行不一的人。

广大革命群众一致强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我们认为这

个意见是正确的。当然也不能脱离实际。

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必须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方针。

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

接收新党员，必须本人申请，并有正式党员两人介绍。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地广泛地听取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

全市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两年多严峻的考验，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不要预备期，以便即能行使正式党员的权利。今后发展党员还是应当有预备期。

四、关于新党员的审批。

由市革命委员会授权有关单位革委会中党的核心小组或常委中的党员，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权，审查批准新党员入党。市以下各级革委会领导成员入党，则须经上一级审批。

首批新党员入党，要举行较隆重的会议，吸收革命群众参加。其他有关单位也可派代表参加。

入党宣誓的誓词，均由本人自己写。

第一批新党员入党后，拟报请中央批准予以报导。

五、凡属下列情况的单位，不得发展新党员：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没有搞好的；虽然搞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但支部的领导仍是旧班子原班人马的；阶级队伍没有清理好的；革命大批判和教育受蒙蔽的党员的工作做得差的；党群关系特别紧张的。这些单位，要做好其他工作，特别是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为建党准备条件。

六，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党员继续加强教育。现在，有的党员有保守思想；有的党员总觉得“你们非党造反派反正得归党员管”；有的怕被介绍的人以后出了问题找他“算账”，不敢做入党介绍人；在发展新党员时，有的党员可能会揪住造反派同志的某些缺点不放；有的也可能怕这怕那，为了“讨好”造反派，不敢坚持原则。这些都需要针对活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利于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 首都军民欢度国庆（节录）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今天在天安门城楼，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一起，欢庆我国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集会和检阅游行。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上的，还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国庆观礼

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上海市马天水、高志荣、王洪文、杨富珍，黑龙江省潘复生、张多树、陈俊生，山东省杨得志、韩金海、赵修德、杨保华，贵州省李再含、张明、李立，山西省谢振华、陈永贵，北京市吴德、刘锡昌、张桂福、侯桂荣，青海省达洛、隆光前，内蒙古自治区滕海清、吴涛，天津市解学恭、郑三生、蔡树梅、王凤春，江西省程世清、杨栋梁，甘肃省洗恒汉、胡继宗、陈建兰，河南省刘建勋、王新、纪登奎，河北省刘子厚、耿长锁、王金山、史春华，湖北省张体学、饶兴礼、方铭，广东省孔石泉、王首道、范希贤、黄育英，吉林省王淮湘、张士英，江苏省吴大胜、彭冲、章瑞英、顾阿桃，浙江省南萍、陈励耘、王子达，湖南省黎原、华国锋、胡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徐洪学、王志强，安徽省宋佩璋、李任之、张家云，陕西省李瑞山、胡炜、王凤琴，辽宁省陈锡联、王良、毛远新、尉凤英，四川省李大章、梁兴初、蒋崇璟、鲁大东，云南省谭甫仁、刘明辉，福建省皮定均、叶松、刘永生，广西壮族自治区欧致富、毛凤鸾，西藏自治区曾雍雅、巴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龙书金、赛福鼎。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各兵种、院校、北京卫戍区的负责同志；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粟裕、王树声、李天佑、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胡炳云、吴保山、刘西元、肖力、张池明、张令彬、张贤约、张天云、唐天际、韩振纪、周玉成、王秉璋、罗舜初、钟赤兵、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赵启民、周希汉、马冠三、来光祖、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常乾坤、谭家述、罗元发、梁璞、陈仁麒、匡裕民、吴信泉、吴烈、于敬山、廖成美、刘友光、邓波、白寿康、黄志勇、陈士渠、胡奇才、张翼翔、罗华生、江文、黄文明、李真、刘锦平、李长如、阎揆要、刘忠、宋维栻、聂济峰、黄作珍、杨俊生、吴忠、刘绍文、刘福、郭天民、朱良才、周纯全；

各地区部队的负责同志郑维山、曾绍山、刘丰等一百三十五人。

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近万名工人阶级的代表，在观礼台上参加了检阅。他们当中推出二百八十六名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有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英雄模范的代表：高桂成、王克京、王文玉、梁洪环、王家友、张洁汉、胡炳金、雷泰山、宋希全、纪瑞华、王东才、沈茂恒、张振西、王展超、邢树恩、秦南多吉、王克荣、王少怀、焦永贵、陈文乙、王海成、张伟良、王志耀、刘学保、葛家成、周述平、朱炳华、王世藩、年四旺、蔡祖泉、胡汝海、曲俊臣、石福田、房立民、张春玉、刘顺平、丁秀珍。

还有中共中央各部门的军代表、负责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委员会负责成员。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还有其他方面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张治中、周建人、王淦昌、贝时璋、邓初民、卢汉、史良、庄希泉、华罗庚、严济慈、吴有训、张锐、陈其尤、陈垣、茅以升、罗叔章、竺可桢、季方、孟继懋、施复亮、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龚饮冰、熊克武、李四光、傅作义、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军代表、负责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委员会负责成员。

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其他负责同志，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和首都工人代表一百零三人，贫下中农代表四十七人，红卫兵代表三十八人，革命文艺工作者

二十九人。

(新华社 1968 年 10 月 1 日讯，载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胜利地走过十九年了。

在庆祝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国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表示最热烈的问候！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当前，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革命文艺、欣欣向荣。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一小撮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已经彻底破产。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十九年来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锻炼得空前巩固、空前强大了。

所有这一切胜利，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亿万革命群众英勇奋斗的结果。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虽然时间还比较短，但是，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久经英勇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他的巩固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在一起，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在一起，必将创造出更加光辉的功绩！

我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不断地立新功。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一派大好。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美帝日子不好过，

苏修日子不好过，各国反动派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反革命统治不会长久了。等待着他们的是：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全面崩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全世界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打倒各国反动派！

粉碎美帝、苏修勾结瓜分世界的阴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8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 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

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

(原载 1968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

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

九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上海市《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 中、小学校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

现遵照毛主席批示，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转发各地供参考。

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九月五日到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十个区的五百一十三所中学和一千二百四十九所小学。每所中学最多一百人，平均五十人。小学按街道划分为一百一十个学区，平均每学区五十人。另外，我们还挑选了五千七百余名退休产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一起进入小学。

九月十六日，全市中、小学在工人宣传队领导下开学了。由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想深入人心，广大革命师生纷纷到校。新生到校率普遍达到百分之百，老同学一般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长宁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遵义中学，全校共有学生一千六百多名，原来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到校打“内战”，这次到校学生达一千五百多名。各校都开了“复课闹革命；迎接斗、批、改高潮誓师大会”，向毛主席献忠心，表决心，送拥工学工公约，政治气氛非常浓厚。革命师生兴奋地说，“这样的新气象是一年多来没有过的”，“这次开学是最热烈最有秩序的一次”。

开学之后，各校都在工人宣传队领导下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还把师生组织到工厂里举办抗大式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和一系列最新指示、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七·三”“七·二四”布告等。也有少数学校开始试复知识课，如南市区大同中学，已把化学和生物合并为农业基础课，数学和物理合并为工业基础课，还有一门革命文艺课。

在工人宣传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许多红卫兵小将激动地说：“我们红卫兵团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坐下来学习过，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使我们坐到一起来了。”卢湾区力进中学，二十六个班级都办起了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学习班。经过工人宣传队反复做思想工作，两派头头作了公开的斗私批修，一派从天花板中拿出各种武斗工具五十多件。开学那天，开了两千人的庆祝大会，会后敲锣打鼓把武斗工具送交区武装部。革命师生激动地说：“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进有了希

望。”有的学校还在工人宣传队帮助下，揪出了黑手，促进了革命大联合。

有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人宣传队也注意针对他们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上海市第六中学，是全市先进单位之一。工人宣传队进校那天，校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郑革命曾流露：“我们这个学校是毛主席肯定的，权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谈不上工人阶级来领导学校。”第二天宣传队同志就同解放军、学校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找小郑谈心，肯定他们的成绩，指出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宣传队同志热情而诚恳地说：“正因为这学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象火车一样，加上好的火车头，使它成为特别快车”这一席话，对小郑触动很大，她说：“工人阶级真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我要紧紧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真革命’。”之后，宣传队又组织师生到工厂参观，介绍工人是如何无限忠于毛主席，如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使革命师生找到了差距，纷纷表示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中立新功！

工人宣传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他们制订了作息制度，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开展军训活动。广大革命师生都很踊跃参加这些活动。有些学校由于长期“内战”，或流氓阿飞的破坏，搞得“灯无一盏亮，桌无一张好”。工人宣传队一方面把被破坏的国家财产集中展览，发动师生揪斗坏人，另一方面亲自动手，修理桌椅、电灯，发动师生打扫卫生、布置环境，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些师生激动地说：“工人宣传队来了以后，真是‘人换思想校变样’。”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细，有些宣传队比较急躁，急于一下子解决问题，也有的存在畏难情绪，认为中、小学生难管。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正在组织工人宣传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制订规划，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做好深入调查研究工作，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做准备，摸索教育革命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

——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

《红旗》杂志社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这次整党运动，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在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和组织整顿的彻底性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一次整党。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是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行动起来，揭露

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伟大斗争。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的两条路线的一场决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党的领导，并正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义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成为全党唯一的领导中心。现在，我们的党，是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正确路线。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从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出发，抹杀阶级斗争，镇压劳动群众，改变党的性质，使列宁缔造的党变质成为所谓“全民党”即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的党。中国赫鲁晓夫黑《修养》的核心，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科学社会主义。他所鼓吹的一套什么“自我修养”，其目的是保护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扼杀共产党员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准备“驯服工具”。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打掉了腐蚀革命意志的官气，密切了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这样，就发现了和锻炼了左派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教育了动摇的中间派，孤立了和揭露了右派即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执行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群众性的而不是关门的整党运动，才能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手里，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性，领导广大群众前进，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赋予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荣历史任务。

当前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这个生动的比喻，包含着极深刻的辩证法。毛主席教育我们：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在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着的组织，不要看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组织。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

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吸收新鲜血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广大革命群众中，首先在工农兵劳动群众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造反派战士。他们有这样一个特点：两条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站在斗争第一线，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挺身而出，特别反对修正主义很坚决。这是很可宝贵的革命品质。他们也有缺点，这是可以教育和克服的。

上海阀门一厂一位要求入党的工人同志说：“党组织应当吸收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战士入党。要求入党的造反派的同志，要有正确入党动机和目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为了达到任何个人目的）；夺权之后，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不是为‘私’掌权）；要始终如一地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积极宣传、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斗私、批修，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不能以‘老造反’居功自傲，不能革命革到一半就中途而废）；要紧密联系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它反映了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对自己先锋队的要求。应当积极地吸收符合这样要求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朝气的新鲜血液入党。要求入党的同志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已经入党的同志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经得起今后任何大风大浪的考验。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工人队伍中党的建设，重视发扬革命朝气，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主席就提出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一九五〇年六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一九五七年七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又指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中国赫鲁晓夫等钻进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完全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相对抗。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注意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而是包庇无产阶级的叛徒、工贼、特务、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帮助这些人混入党内攫取领导职位。他们不是提高工人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是向他们灌输最腐朽最黑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就是受了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毒害。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论，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并且在包括工厂、商店、人民公社、机关、学校、街道等各个方面的群众中认真清理好阶级队伍，把混在群众中的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使吸收新党员有一个可靠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有一些犯过错误而又认真改正了错误、积极工作的同志，他们与那些坚持错误或躺倒不干的人不同。他们去掉了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灵魂中增加了来自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应当支持和团结这样的干部共同工作。应当把他们犯过的错误成为人们共同记取的教训。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有的地方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存在保守思想。有这样的情况：成份、思想都不错的好同志，等了五、六年，打了多次报告，仍然不得入党。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中，有四千名左右的委员，其中大约半数左右是革命群众的代表，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工农兵的代表。这四千左右的同志，是经过了革命风暴的考验和锤炼，再经历了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干部要经过革命群众的讨论、审查和领导的批准，而且经常进行着局部的撤换和调整。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开十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隆重的群众大会，万众欢腾，家喻户晓。请问各地历届的党、政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哪一届有这样广泛的群众性呢？哪一届这样广泛地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了解，又这样广泛地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呢？决

定领导机构本质的是执行什么路线，反映什么阶级的利益，而不是采取什么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恩格斯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义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所窃取的一切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就是宣告了他们失去了党、政、财、文的一切职位，这是不言而喻的早已客观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把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内奸、工贼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他早已被革命剥夺了党内外的一切权力和职位了。

革命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是一种随着革命不断发展经常发生的过程。一个干部是否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要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的考验。现在参加工作的广大的干部也是这样。新干部参加工作，千万注意不要脱离劳动群众。但我们不要因为怕干部犯错误而不敢大胆使用。劳动群众把他们提上领导岗位，同样地会不断地教育和帮助他们，以至在必要时撤换他们。

清除反革命分子和剥削阶级分子出党，吸收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把忠实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挑选到各级党的领导机构中去工作，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干部定期下放参加劳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并且形成经常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全面地执行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就能有力地粉碎修正主义任何形式的反扑和挣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更加生龙活虎地领导无产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战胜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逐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

(原载《红旗》杂志 1968年第4期)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提议，将这个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这个草案，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比较简明扼要，基本上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全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然后，由中央根据讨论的意见，作出修改，提交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领导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讨论。这次讨论，应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结合起来，成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强大动力。

对这个草案的意见，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种分别集中整理，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底，十二月中，分两次报告中央。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第一章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全党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全国七亿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党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吐故纳新，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 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人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做到：

(一) 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 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民谋利益。

(三) 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四) 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应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必要时，在非党群众中公布。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 党的组织机构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各人民团体，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

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

第七条：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一元化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二条：厂矿企业、事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一般设支部；党员较多或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也可以设立总支部，或者基层委员会。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大作风。它的主要任务是：

- (一) 领导党员和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 (二) 对党员和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 (三) 宣传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 (四) 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 (五) 发展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 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于十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

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负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

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已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入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原载 1968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关于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伙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廉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勿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枝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枝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分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繁）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

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划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卖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〇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

要求，撤消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附〕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李 研 因

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叛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的审讯，揭露出真相——这是江青一伙采取法西斯手段逼供诱供、编造出来的。

特别法庭出示了13年前被告人江青批准的审讯计划报告，播放了在江青指挥下“突击审讯”张重一教授的录音，宣读了证人的证词。

张重一，1967年时67岁，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解放后任河北北京师范学校外语系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就这样，张就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禁起来。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末期。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疸，大量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图”，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危，而且同刘少奇、王光美毫无关系的老教授，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我们且看这些报告吧：

1967年10月24日专案组报告：“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内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江青批阅同意。

就是江青批准的这一纸计划，使张重一最后惨死在病床上。

1967年11月9日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记述了审讯张重一这一骇人听闻暴行的全部过程。报告是这样写的：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得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个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切正直的人们，请看看这篇“自供”的报告吧。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残暴凶狠难道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什么“花岗岩脑袋”？这是他们对正直人的诬陷；
什么“拒不交代具体罪行”？因为事实根本不存在；
什么“大力抢救”，“创造了多审 7 天的条件”？他们把人类救死扶伤的医学科学，变成了追逼口供的手段！

他们不惜一切，日夜逼问的所谓“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究竟是些什么呢？

记者听过两盘当时审讯张重一的实况录音。据记者了解，审讯张重一的录音共有 80 多盘。但是，后来有些被洗毁，只剩下 20 盘了。就是这 20 盘录音带，成了江青残害人民、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铁证。

把若干小时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材料，那将是冗长的。特别是，其间有许多时间是病人的哀号声，要求“把手掰一掰”、挣扎着要起来又被按倒的声音，有命令吃药的喝斥声，有“快说，快说”的逼问声，以及垂危病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呻吟，等等。我们略掉这些，只记录其中的几节，让录音带来控诉江青们的暴行吧：

录音带发出沙沙的声响，把人们带进阴森恐怖的审讯室：这里有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癌症的扩散，使他生命垂危；剧烈的疼痛使他呻吟、哀号，不断扭曲身体。床头悬吊着输液瓶，扎在他手臂上的输液针管摇荡着。几条汉子围在床前，几只粗壮的手按住病人的四肢。一个粗暴的声音在审问；一个衰弱无力，语无伦次、不时夹杂着哀号的声音在回答。

问：张重一，你把你知道的王光美的情况交代一下！

张：哎……哟……这，这是完全应该的。得让我好好想……

问：你想了好几天了！

张：我应该说，我是想王光美这个人，现在还没想得清楚。

问：王光美是特务不是？

张：（含糊不清的低语）

问：你了解什么情况！

张：跟他父亲的关系……

问：她父亲是怎么个关系？

张：嗯，哎……我怎么这么糊涂呀，现在又搞不清楚了。

问：你现在一点也不糊涂！你今天把问题交代清楚，好住院去。

张：（含糊不清的嘟囔声）……我愿意

问：她父亲叫什么？

张：唉，唉，我忘了……嗯，我感觉这里面有错了。哎，我说的可能是刘少奇，我说乱了。

（挣扎的声音，几个人叫“不要动”、“不能动”、“你一动就危险”的声音。一个长时间的混乱。）

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

张：嗯……我昨天……好象说过。

问：王光美是特务与刘少奇是什么关系？

张：与刘少奇……关系，我不知道。

问：你要端正态度，否则对你没好处！

让我们再抄录几节。还是那个粗暴的审问声。回答是混乱的，病人显然是处在神志更加

不清醒的状态中。

问：你认识袁绍英是谁吗？（注：袁是杨承祚教授的夫人）

张：认识，是杨承祚的小舅子。

问：你认识杨承祚的老婆吗？

张：认识，她叫袁振新。（注：杨承祚的夫人叫袁绍英）

问：这人是男是女？

张：男的。

问：这人在哪？

张：哎……我闹不清楚。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

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审讯者设下圈套对一个垂危病人诱供、逼供，他们急不可待地要从垂死者口里捞取诬陷材料的紧迫状；被审者在昏迷状态中受残酷折磨语无伦次的情景，都由录音带实地再现人们面前了。

就是这样一个重病老人在昏迷状态中被逼问出来的混乱语言，使江青们如获至宝了。江青、康生、谢富治就凭张重一的，以及另一个垂危病人杨承祚的这样一些“口供”，定下了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这里还要特别记述一笔：专案组原来写的《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还有些心虚，只是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没有事实根据，“基本上可以断定”，已属很荒谬了；而江青看后还不满意，在报告上划了个大“×”，批：“搞的不好，退王专案组”。后来还是康生亲自起草报告，就变成了“根据现有的材料证明”，仅就杨承祚等人口供“证明”，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而且又是“日特”、“国特”。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江青还嫌这个不够，又凭空制造出刘少奇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的神话。

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事！但是，江青们就是这样干的，有当时审问人的证词在，有医生的证词在，有录音带在。

记者有机会翻阅侥幸保留下来的张重一案的原始“讯问笔录”。21次“突击审讯”一次不少，厚厚的一大本。那上面有时间、地点、审问者和记录人的名字，也有张重一那拿不稳笔的手颤抖着写下的难以辨认的签名，后来是手印。

最后一次审问，是1967年10月31日进行的。从上午9时，一直审问到24时零分，整整15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的11月1日凌晨2时，张重一就惨死在病床上。

看一看“讯问笔录”的最后几页，张重一对审问者的回答，是对诬陷者的揭露，是对江青的控诉！据当时在场者证实，临终前的张重一，有一段时间是清醒的。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是不是？……

张重一临死前讲出的这段话，粉碎了诬陷者罗织编造的一切谎言。

在那黑云笼罩中国大地的年月，难道只有张重一一个人有如此遭遇吗？不，还有许多。王世英是另一个。

王世英，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江青为了胁迫这位老同志说刘少奇是“叛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肺癌已经扩散、半身不遂的王世英实行“监护”、“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但是，她什么也没有捞到。王世英的回答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

王世英1967年10月31日被“监护审查”，1968年3月26日3时“因肺癌皮下及肺脏腹腔转移死亡。”

为这件事，江青大发雷霆。

从江青住处查出的1968年3月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上讲话”（记录稿）记载，江青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江青的这段话，彻底暴露了她对老干部的刻骨仇恨及其腹内杀机！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指挥下，遭受刑讯逼供的还有丁觉群、孟用潜等，因为他们在1927年、1929年分别同刘少奇同志共同作过一段时间的党的地下工作。

丁觉群1967年9月3日写的材料说：“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他搞了什么黑组织？有哪些人？进行什么活动？……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无法回答！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他在另一份材料上写道：“他（指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现在刘少奇还没有死嘛，可以对质嘛。”

这样的“交代”，江青是不需要的。于是，威胁、利诱、欺骗、恐吓、千钧压力一齐降落

到丁觉群身上。

他说了违心的话。但是，第二天他就写了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9月25日，他又专门给审讯他的人写信：“老杨：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江青需要的，正是这种“打破事实框框”的伪造！

孟用潜，1929年在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同志一道被警察局拘留。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有关，他们被取保释放了。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江青、康生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不仅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而且要打成“内奸”。

孟用潜在1967年5月22日被“隔离审查”。1967年6月22日专案组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江青在另一个呈阅件上批：“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给我们看。”

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的证词说：“康生指示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整徐冰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要专案组全体出动参加小型批斗。从7月5日至13日连续进行审问，白天问，有时晚上也问，参加批斗的专案人员有十余人，围上一圈，七嘴八舌，恐吓威吓……”

原专案组副组长巫中在证词中叙述了当时在江青、康生指挥下审讯的情景：“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漫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份申诉，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5份，警告他：“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他们制造伪证所采用的手段，还有更离奇、骇人听闻的。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曾在北平作党的地下工作，介绍王光美任军调部我方翻译工作。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诬陷刘少奇、王光美，崔月犁也遭诬陷、迫害。他们审问崔月犁，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他不知道，审问他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他也不知道。于是，审问者逼他数数字，从1、2、3、4数到38，这群人扑上来就是一顿毒打：“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是？”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审问人又逼他背“百家姓”，背诵到“蒋沈韩杨”，又是一顿打。他们拿来杨承祚的像片，背面写着“杨承祚”，给他看，让他念。就这样，崔月犁就成了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也成了他自己介绍王光美“打入”我方代表团的“证据”。

刘少奇被定为“叛徒”、“特务”的伪证，就是江青、康生等人这样制造出来的；许多人被定为“叛徒”、“特务”的伪证，也是江青一伙这样制造出来的！

江青直接控制、指挥专案组迫害无辜，用法西斯手段逼取口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证据是大量的、确凿的。她的同伙谢富治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讲得清清楚楚。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江青在一次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代表时也明明白白地说，她“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

专案”。这有当时的录音为证。她说：“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1968年的9月16日，江青在他们一伙罗织编造的诬陷刘少奇同志的一本厚厚的“罪证”上批：“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9月29日，林彪看了这个所谓“罪证”材料，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所批，还特地“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反革命集团的另一个主犯张春桥，也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反革命们高兴得太早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伪造的“罪证”在历史事实面前已经化为灰烬，在庄严的人民法庭上，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江青的反革命真面目。

（原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第88—97页）

〔附〕 少 奇 同 志 之 死

王 阖 西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我和杨章武，陶一波同志回到我们青年时代活动的地方——河南开封。市委领导同志按照我们的要求，派张绛同志陪同我们访问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刘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地方——南土街金城银行旧址。

张绛同志向管理人员说明我们的来意，两位管理人员领着我们从侧门进入银行的不大的里院，穿过一个四面环绕着两层楼的小院，走进主房，屋里陈设简单，只放着一张桌子和一张单人床。张绛同志站住了，他沉痛地说，这就是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房间了。我们环顾一周，以默哀的心情肃立着，静听他的介绍。

张绛同志仔细想了想之后说：少奇同志是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九时许，在两名监护人员的监护下，被北京来的一架专机送到这里来的。他们给少奇同志的代号是“十一号”。同来的还有医生一人，护士四人。他们说少奇同志患的是烈性传染病。几天以后，又从北京来的医护人员中流露出来：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上无人照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以审查历史问题为由，将他的炊事员郝苗弄走。另一炊事员十一月份也弄走了。吃饭怎么办？吃饭到食堂去打，食堂服务员也对少奇同志歧视。有时给窝窝头吃，吃不下就只喝点汤。少奇同志手颤抖，米饭也不能完全吃下去，半身撒满米粒子。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表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六八年四月就发展到小便失禁，动作失常，甚至有时神志不清，把裤子当上衣穿，把袜子往鞋上穿。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有个大夫在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性。”监护人员对这样严重的病情，竟然认为“为了防止他行凶和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以致他病情更趋严重，神经更加错

乱，有时用肥皂刷牙。监护人员为了防止“意外”，就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示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他们两次向医护人员交待：“要尽力治疗好，护理好，留个活靶子，供批判。要拖过‘九大’，不要让他死了。”专家确诊少奇同志患肺炎、发高烧，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神经方面也有症状。大夫一致认为应送医院治疗，但被拒绝了。经过半个月的治疗，肺炎有了好转，但未完全控制住。因此，八月至十月上旬，病情又反复了五次，大夫们多次提出少奇同志年老，天气渐冷，又反复感染，今冬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应加紧治疗。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到十月七日，少奇同志突然发抖，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发烧达四十度，血压高达260，大汗淋漓，不能讲话，进食困难。到十月九日，便完全不能进食。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起对少奇同志实行“鼻食”期间，少奇同志骨瘦如柴，四肢不能动弹，大小便一直失禁。这样拖到一九六九年七月，又有几次肺炎感染，也请了几位大夫治疗，虽有好转，但大夫提出病人年老，肺炎多次反复，一次比一次重，随时可能突然死亡。这个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没有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少奇同志在重病中，仍被由北京强行押送开封监护了。

开封的医护人员说：少奇同志到开封时已处于昏迷状态。开封监护处的院墙有两层楼那么高，院内有几道铁门，窗户外面都是铁柱子，一军人负责监护，屋内有岗哨，外面有值勤的，戒备森严，医疗上还规定了种种限制。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药退回了一部分，并且不准到外地买药。这样，少奇同志在开封只生活了二十六天，十一月十二日就被迫害致死了。死后把他的遗体移至北屋钞票库内，十三日用白布包扎全身，十四日凌晨一时，将少奇同志遗体包扎好、送火葬场秘密火化。

(节自《驰骋中原》北京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附] 最后的二十七天

朱可先 卞 卡

—

一九六九年十月，“史无前例”的运动进行到第四个年头了，阴冷的雾霭越来越浓，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锣密鼓正在猛敲……

十月十七日晚九时许，一架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架飞机的乘客是谁。

接受“紧急任务”的几位医护人员爬上了舷梯，来到后舱。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只裹着一条粉红色的缎被，被子上蒙一条白色的床单。老人两眼紧闭，鼻孔里插着鼻饲管，瘦削的面庞苍白失色。他那孱弱的身体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好象一点活动的气力也没有了。从他微弱的呼吸看，他没有死，还有一息尚存。

他那熟悉的面孔，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不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吗？医护人员怔住了，禁不住一阵酸痛之情涌上心头。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向市区驶去……

二

这是原开封市人委大院。院内有一座独特的天井小院，国民党时期的金城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四座三层高楼对峙耸立，与其说雄伟，倒不如说森严。

这个小院前后左右都不临街道。

救护车开进了市人委大院，少奇同志被抬进了这个独特的小院内。从此，执行这项“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也就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指令，不准外出，不准给亲友写信，甚至连妻子、丈夫、儿女都不准有任何形式的往来，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他们事实上被软禁起来了。思想也被禁锢了。他们没有笑脸，彼此没有交谈，默默地作着自己要作的一切。

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着。那些人民的子弟兵，只知道自己在执行任务，天井院内的一切，他们全然不知道啊！

又一座特设的监狱出现在祖国大地上！里边监禁的，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弥留的少奇同志。

因为少奇同志是十月十七日到达开封的，故而被称之为“十七号任务”。

三

少奇同志病躺在西楼一层南头的里间。

安顿好之后，少奇同志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缓缓地看了看周围。他似乎是在寻思，这是什么地方？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慢慢地又把眼睛闭了起来。

少奇同志不可能知道而今他身陷囹圄之地，就是他一九五八年曾经视察过的古城开封。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少奇同志借郑州会议的间隙，曾和王光美同志一起乘车到古城汴梁视察。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群众之中的时候，他满面红光，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面容和蔼可亲；他那风尘仆仆的身影，他那慈祥的笑容，无不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无不使人们顿生敬爱之情！

少奇同志健步登上龙亭，眺望古都新貌；少奇同志仰望铁塔，胸中雄风四起，少奇同志来到工人中间，握手交谈，是那样平易近人，使工人们倍感亲切。

然而，少奇同志这次来开封，际遇竟然是这样的不同啊！

四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等许多论著中，主张解决党内的矛盾，要实事求是，不应人为地硬去“搜索”斗争对象，把同志说成是这主义那主义，而后开展无情的“斗争”。可是，这些都被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被他们以谎言、欺骗、捏造和诬陷所代替。当年曾反对盲目“搜索”斗争对象的少奇同志，恰恰被“搜索”的箭矢所命中。

那些阴谋家、野心家却平步青云。他们利用已经篡夺的权力，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少奇同志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并且“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是一个怎样的奇冤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少奇同志，怎么能忍受得了呢？然

而，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无情地批判和斗争，精神上的折磨，加上病魔缠身，他倒下了，就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在林彪“一号通令”的威逼下，又被驱逐出首都北京。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少奇同志闭上了双眼，静静地躺在病榻上。他一句话也不说，在极度的困苦中，也没有一声呻吟。他在思索些什么呢？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从口腔进食了，全靠从鼻饲管中打进的流食，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医护人员只有定时做流食，定时帮他翻身，进行简单的药物治疗。除此之外，别的有什么办法呢？

五

少奇同志的病情恶化了。

请求调拨药物，答复是：根据当地条件进行治疗。实际上是被拒绝了。

几天前组织起来的一个医疗班子，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能出现在少奇同志床前。

守护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医护人员，曾提出是否让亲属来最后见上一面？结果是谁也不敢作主，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六时四十五分，少奇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妻室儿女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能来到他的身边。何止这样，他们连少奇同志的去处，死在哪里都不知道啊！

从少奇同志十月十七日到达开封，到十一月十二日溘然长逝，共二十七天。二十七天中，祖国上空又增添了几多阴云？！面对那翻滚的云层，少奇同志在天之灵，又该思索些什么呢？

一套普通的衣服，作为寿衣穿在少奇同志骨瘦如柴的身上。

遗体搁置在西楼一层的廊檐下进行拍照。

遗体在这座银行金库的地下室过道上停放。近半尺厚的铁门锁上了。谁也猜不到，我们的国家元首在这个独特的天井院内含恨而死；作为金库地下室的过道上，却囚禁着我们的国魂！

六

按时令，十一月中旬的天气并不很冷，但是这一年却处处给人以冷的感觉：淅淅沥沥的秋雨，更增添了这种寒意。

十五日零点刚过，一辆灵车向开封市东郊火化场驶去。

少奇同志的头和面部全部用白布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少奇同志生前戴的罪恶帽子似乎还不够多，不够重，死了以后新戴的帽子是：“烈性传染病患者”！

灵车是“六九”型吉普车代替的，车身容纳不了少奇同志高大的身躯，他的两只脚露在车厢外……

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朵白花，没有一寸黑纱。有的是阴沉而漆黑的夜幕，如泣如诉的秋雨……

灵车徐徐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周围的一切都在沉默。

因为是“烈性传染病患者”，当灵车来到火化场时，有人正在那里喷洒消毒剂。

不可能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少奇同志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与此同时，他生前在开封时的遗物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了。少奇同志当年长期在白区从事革命活动，不知用了多少化名，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国家主席、去世后仍得把名字再次隐埋起来。

这是少奇同志的骨灰寄存证：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

现住址：××××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就这样从政治舞台上顿然消失，而且经年累月地沉沦冤海！

七

历史是无情的。千秋功罪，总有人评说！

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议，如春风送暖，使冰雪消融。亿万人民心头的疑云飘散了，压抑的情怀舒展了，心中的花朵绽开了，怒放了！与此同时，追思怀念的浪涛无不在每个人的胸中翻卷。

人民不会忘记少奇同志的丰功伟绩。

人民不会忘记少奇同志那高大的形象，那慈祥的眼睛，那和蔼的面容，那平易近人的风度。

人民也不会忘记，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少奇同志精神上、肉体上所遭受的种种磨难。

人民将永远把少奇同志怀念！

值得告慰少奇同志英灵的是，我们的党正在恢复她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正在改善她的领导，提高她的战斗力。一批久经考验的同志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前程似锦。这些，为的是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让野心家、阴谋家再把党、国家、民族和人民投入到空前的浩劫之中。

当少奇同志在天之灵得知这些的时候，是会得到慰藉的，他一定会站立云端，向党，向祖国，向人民，发出朗朗的笑声。

(原载 1980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

(附)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

刘平平 刘源 刘亭亭

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我们的妈妈——王光美同志结束了十二年的囚徒生活，回到了我们身边。

胜利的花，希望的花，终于盛开了！那是1979年的春节，我们簇拥着妈妈，随着欢庆的人群，走进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当人们看到妈妈就在他们身边时，都欢笑着走过来和妈妈握手，多少人和妈妈紧紧拥抱，又有多少人拉着妈妈的手失声痛哭……多少深情，多少悲喜交织在一起。妈妈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说完，妈妈向人群深深鞠了一躬。更多的人跑了过来：

“他来了吗？”

“他在哪里？”

“我们怀念他！”

一刹时，人群拥了过来，妈妈被挤到台上，又从台上被挤下来，她虽被挤得东倒西歪，但她泛红的脸上露着笑容，这是胜利的笑容。

妈妈是看到胜利的人，她看到人民心中的鲜花在向着她——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同志开放了。胜利的花朵，在血和泪的漫漫中含苞，在冰刀霜剑中吐蕊，在风和日暖的年代怒放。可惜，爸爸没有来。他的生命被夺走了，但无法把他从人民心里夺走。爸爸生生死死，都与人民同在，他以自己的生命滋润了这绚丽的春天。

多年来，爸爸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和国家日常工作，日夜为党和国家操劳着……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6月1日，康生、陈伯达一伙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爸爸和小平叔叔，背着政治局，将他们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立即在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学校党委和支部都瘫痪了。这股风暴很快波及全国。我们几个孩子那时正在中学读书，对突然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不可理解。回到家里，就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总是仔细地听着，偶尔也提出一些问题启发我们思考。当时群众的热情虽高，但谁都不知道运动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对革命的对象和目的更感到不明白。6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6月4日，由北京新市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许许多多学生听说后，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门口，都要求派工作组，希望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我们回到家，也几次代表学校师生要求爸爸批准派工作组，爸爸很慎重，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

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这一时期，毛主席远在杭州。爸爸多次给毛主席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曾得到明确的回复。运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几乎所有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出格。有的学校打死了人，也有因不理解而自杀的。形势逼人，不能再举棋不定、等待下去了。那天，我们从学校回来，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了，只留下了一封长信。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和小平叔叔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委托爸爸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爸爸乘飞机赶回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都是临时组成的，匆忙上阵，没有经验。爸爸也在摸索对运动的领导。7月中旬，爸爸曾两次提出要见见平平所在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爸爸在听取汇报后，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爸爸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还是尽力引导群众前进。爸爸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爸爸还向大家描述了他对运动的设想，他说：“文化革命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你们学生对学校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这就是斗争嘛，但不能动手打人。八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我们领导了人民几十年，让人家批评我们几个月还不行吗？到九月，就转入扎实实地‘改’的阶段，十二月底，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最后，他按照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理解，向我们讲述这次运动的目的，说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爸爸的一席话，对我们和同学们震动很大。那时，“打倒一切”的思潮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性，似乎革命就是打倒某些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根本没想到要把“黑帮”地富反坏统统改造过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爸爸的话，廓清了我们头脑中幼稚和糊涂的思想，使我们明确了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乱冲乱斗，激化矛盾，而是教育改造所有的人。爸爸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应有什么样的伟大胸怀。他对文化大革命寄托的美好的希望，多么使我们神往啊。

爸爸总想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和党的传统经验来引导。然而，他不知道，他正好踏进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圈套。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煽起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对立的两派。形势错综复杂，难以驾驭。爸爸担心地对我们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二

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7月19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批评爸爸和小平叔叔。7月29日，爸爸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

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讲到对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不要揪住工作组不放、要保护少数。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爸爸从第二降到第八位。爸爸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不利于党的事。作为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从来是按照党性原则来生活的。在之后三年多非人的折磨和极度痛苦中，爸爸始终都遵守着自己的保证，直到最后一息。

中央会议上的事情，我们几个孩子在当时是不知道的。记得在8月上旬，十四岁的亭亭从学校回家，路上碰到蔡畅妈妈。蔡妈妈亲了亲亭亭问：“你妈妈好吗？”亭亭高兴地回答：“妈妈挺好，她正在清华大学为大家卖饭呢。”“傻孩子，你什么都不懂。”蔡妈妈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摸摸亭亭的小脸蛋，扭过脸去，依依不舍地走了。

8月的一天，晚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坐在桌边等候爸爸的到来。大一点的孩子，隐隐约约地听说爸爸犯了错误，心情忐忑不安。我们注视着爸爸健步而入。他的神态是那样地安详、坦然，象往常吃饭时的情景一样，一边吃饭，一边思考着国家大事。在饭桌上谁也没讲话。爸爸吃完了饭，就站了起来，我们所有眼睛都紧紧地盯着他。爸爸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心意，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罢微微笑了笑，回办公室去了。这时，大家极力忍住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工作人员也都潸然泪下……

过去，爸爸主持中央工作时，除了召开中央生活会征求领导同志对他的意见外，也曾多次召开身边工作的同志和孩子们开会，让大家给他提批评意见。在这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爸爸几次召集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开批评会。他总是诚恳地请求大家给他提意见：“文化革命刚开始，我工作太忙，没有机会听大家的意见，现在，我希望大家坦率地谈出来，会有利于我将来更好地去工作。”一位老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很忙，但一有空就参加我们支部的活动。我们在这里好多年了，你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生活简朴，这些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也都努力工作，为了让你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说着说着，声音也哽咽了，又加上了一句：“你可不能只顾拉车，不看道儿啊！”有的同志说：“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爸爸只是耐心地倾听，从不辩解，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抽着烟，边听边思索。有一次，爸爸坦率地说：“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然而，爸爸是永远不会跟上的。刚正、善良的爸爸，怎么能知道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险恶居心呢？他又怎么能理解这个被林彪、江青之流阴谋操纵的运动，跟上它的形势呢？

三

“八·一八”林彪天安门讲话后，红卫兵的浪潮席卷北京，席卷全国，也波及到我们家里。红卫兵破“四旧”，我们回到家里也破“四旧”。红卫兵抄家，我们也跟着抄了几次家。回来还津津有味地议论着抄出什么，满以为是“革命行动”呢！爸爸这时已经“靠边站”了，但他密切关心着运动的发展。一次，在饭桌上，平平和源源又议论着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爸爸立即劝止说：“不要去。”饭后，爸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我们叫到他身

边，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爸爸的话，使我们感到宪法的神圣。我们不再去抄家了，许多同学也被我们劝阻住了。十几年来，我们最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件事。而爸爸处在那样困难的境地，还时刻关心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的尊严，爸爸教诲我们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9月到11月，我们都出外串去了。在外地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批判爸爸检查的大字报，言词激烈，使我们大为震惊。我们匆匆赶回家。回京后才知道，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爸爸作了检查。毛主席对爸爸的检查给予肯定的评价，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可是，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时，只印发爸爸的检查，却被“文革小组”删去了毛主席的批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爸爸的“检查”成了靶子，在全国掀起了“批判高潮”。调门之高，超出想象，对那些牵强附会、武断专横的指责，爸爸丝毫不以为意，因为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深知它的虚妄。爸爸曾郑重地对妈妈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他也看出孩子们的不安，要我们作好思想准备：“对我的批判要持续几个月。”

然而，爸爸又估计错了。林彪、江青之流并不进行什么严肃的原则争论，他们所擅长的不过是玩弄阴谋诡计，只要能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什么手段使得上，都是“正当”的。“批判高潮”不仅是针对他个人，而是波及全党的大阴谋。他们绝不会终止这种阴谋。

一天，爸爸象往常一样在中南海院内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使他愣住了。这张大字报以尖刻的语言攻击了蔡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因为他们看到一位阿姨被剃了阴阳头后，禁不住伤心地流下眼泪。面对大字报上的恶毒的辱骂，爸爸伫立在那里，凝视着。我们看着爸爸的眼睛，想起有位老妈妈曾对我们讲过，在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爸爸特别关心老大姐们的安全，几次专门派人去看望，落实撤退的情况。从我们记事起，就看到爸爸格外地尊重老大姐们。每逢他一看见大姐走来，总是远远地迎上去，问寒问暖。他曾对我们说过：这些老妈妈有的走过雪山、草地，有的坐过老虎凳，他们比男同志更不容易。……而眼前，有人竟连这些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大姐也不放过，对她们进行人格侮辱，这是在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啊，怎么会发生如此野蛮的事情？！爸爸双拳攥得紧紧的，仿佛在自语：“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他双脚象钉在那里似的，很久很久不肯离去，寒风吹乱了他的白发……

狂风暴雨在继续，就在中南海大院内，居然就有人胆敢贴出大字报，恶毒诬蔑朱爹爹（朱德同志）是“黑司令”、“大军阀”。爸爸愤怒了。几十年来，爸爸亲眼看到朱爹爹南征北战、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光荣，是我们军队的象征。这一伙人把我们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诬蔑为“黑司令”，究竟想把党置于何地？

局势是严重的。身为国家主席，如果容忍这种现象，那就是不可原谅的失职。可是当时爸爸所处的境地，已经无能为力。一连几天，爸爸神情严峻，忧心如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爸爸找了周伯伯说，为了尽早结束运动，使广大干部免受这么大的冲击，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总理又能说什么呢？他也是在同样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周伯伯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幼稚而年轻的我们得知爸爸的这些打算，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前，我们听说爸爸“犯了错误”，感到难受、委屈。如今，我们透过政治斗争的风雨，看到了爸爸那颗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赤热的心，爸爸在我们心目中更加高大了。在激浪翻天的日子里，最能现出人们灵魂的美与丑。

四

就在爸爸考虑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判高潮”愈演愈烈，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凭借着权力，还乞灵于诽谤，把黄浦滩上流氓无赖的惯伎也使出来了。12月底，江青窜到清华大学扬言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进一步把爸爸搞臭，还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了许多流言。大量无耻下流、造谣中伤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充斥街头。随之，又一次在全国范围掀起“批判”的恶浪。以谎言作武器，意味着政治上的堕落。他们就是这样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把水搅浑，使广大人民群众真伪难辨。在党内斗争中，爸爸一向经得起委屈、误解，但他不能容忍诽谤、诬陷。这时，爸爸已经感觉到斗争的严重性，自己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几个孩子听到一些传闻，弄不清楚，便向爸爸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开始回答我们，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象一切孩子们一样，想知道自己的父母都作了些什么。“爸爸错在哪里呢？爸爸到底为什么受到这样的诬蔑呢？”“为什么他们要造谣呢？”……爸爸讲述着，他愈讲得多，我们愈好奇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爸爸跟我们说了许多许多事情，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爸爸仍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机密，总是站在维护党和毛主席的立场上。

我们深切理解爸爸的心情，显然，使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成败荣辱，而是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爸爸对我们说：“只要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国家能富强，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组织处理。”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爸爸有什么变化，依然那样严肃而镇定，饭量也不减。他正以高度的党性来克制自己，耐心等待着。等待不是软弱的避难所，表示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暂时的现象。但他的身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了，爸爸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有一次，爸爸对我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呵……”爸爸说到这里，嘴唇都颤抖了。直到现在，我们心里一直在回响着：“人民误解了你，人民误解了你……”这是什么样的痛苦呵！

不久，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在各自的学校和单位受到批斗和围攻，我们的朋友也渐渐疏远了。那时，只要有一两个同学还跟我们说话，我们的心里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1967年1月7日，江青一句话，就把二哥毛毛（刘允若）抓到了监狱里。大哥大姐远在边疆，杳无音讯。家中只剩下我们四个小的孩子。家庭的突变，朋友的疏远，人们的怒目相视，在我们心灵上造成极大的创伤，以往神圣的信仰突然被碾成尘泥，美说成丑，真说成假，善说成恶，兢兢业业为党献身的爸爸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我们都是无法忍受的。

爸爸看出了我们的思想，意味深长地说：“群众现在认为我犯了错误，他们有权利批评

我。在我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不可避免地犯有工作错误和思想错误，处在我这样的地位，影响很大。这些年，党也犯了些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我主持中央工作，必须要承担主要责任，这叫做责任错误。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会有过火行动，你们要理解群众，决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

五

1967年1月是严寒而又阴冷的。“全面夺权”的黑风很快扫遍全国。林彪、江青一伙对爸爸的迫害，自然不会停留在“绘画绣花”的阶段。

1月6日，在江青的疯狂怂恿下，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之流以狡诈的手段，把妈妈骗出中南海，却还夸耀什么“智擒王光美”。他们声称平平在学校作检查后的归途中被车轧断了腿，马上需要截肢。妈妈听到这个消息，一口气噎在胸间，双眼直瞪瞪地看着爸爸。爸爸说：“马上到医院去。”妈妈着急地说：“总理不让我离开中南海呀！”“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爸爸、妈妈赶到医院不见平平，却看见被扣作人质的源源和亭亭。周围的清华“造反派”一见爸爸进来，都愕然不知所措。这时，源源急切地对妈妈说：“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妈妈一听，只身迎上去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自己一人留在了“造反派”中间。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爸爸和源源、亭亭及工作人员刚回到家里，只见平平气喘吁吁地先等在门口（她刚从学校赶回家）。爸爸忙问：“平平，你的腿？……”平平扑到爸爸的怀里说：“我的腿没事，他们把我扣在学校，为的是把妈妈骗出来抓走啊……”平平和亭亭抱着爸爸放声大哭。

每天深夜，爸爸、妈妈总要出来散步，把紧张了一天的头脑松弛一下。这天深夜，爸爸照例出来散步，我们三个孩子陪着爸爸。年纪较小的亭亭一见到爸爸，又呜咽起来，哭得是那样地伤心。她这几天一直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当天早上，在全市中学生联合批斗会上做了检查，下午又被押去看平平挨批斗，刚被放回家，晚饭都没吃又赶到医院，眼看着妈妈被抓走。现在，妈妈在哪里呢？他们会打妈妈的呀！会拉妈妈去游街的呀！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爸爸又何尝不难过呢。他怜爱地抚摸着亭亭的头。一边走一边还给我们讲夜空的星星……寒风呼啸，繁星闪烁，我们仿佛在荒野上漫游，无边无际的黑暗，要把我们吞没。但是，听到爸爸轻匀的脚步声，我们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爸爸步履缓慢地走着，依然是那么从容而又安详，只字不提白天发生的一切。亭亭默默捧起爸爸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紧贴在自己滚烫的小脸上，一颗赤热幼嫩的心脏与一颗同样赤热而又坚强的心脏靠在一起了，奔腾的小溪与浩浩江水汇在一起了。

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妈妈终于回来了。爸爸见到妈妈，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江青终于达到了她的目的——利用我们一家父母儿女的亲密感情，来摧残折磨爸爸、妈妈的心！

光是摧残折磨爸爸的心，他们自然是觉得不够的，江青一伙开始直接批斗爸爸了。1967年1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冲进我们的家，在院里、办公室里贴满了大标语。在批斗会上，当爸爸的答辩使质问者理屈词穷时，一个坏家伙突然蹦出来，让爸爸当场背出语录本某一页的某一条。爸爸背不出，那些人大声嘲笑。我们真想上前去提醒爸爸，

但中间隔着一层一层的人。一刹那，仿佛一团火炭卡在我们的喉咙。而爸爸却镇定自若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那个坏家伙被爸爸说得哑口无言，便叫一阵口号，斗争会一哄而散。看到这些人的狼狈相，我们感到快意。但是，爸爸却对我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

六

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爸爸去谈话。毛主席亲切热情地接待了爸爸，一见面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吗？”爸爸回答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两位几十年共同合作的老战友见面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谈工作。爸爸说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主席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主席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建议爸爸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主席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我们全家焦急、热切地等待着爸爸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爸爸回来后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我们听了，感到悬在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下来，心中暗想，情况也许会好起来的。

但是，没有安稳两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又一次冲进我们家，还要冲爸爸的办公室。他们贴大字报，批斗爸爸、妈妈，叫他们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白发苍苍的爸爸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镇定地面对着嘈杂的喊叫声，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1月16日的深夜12点以后，周总理打电话给妈妈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呀！一句话激起妈妈心中的千言万语，然而，几句言语又如何能表达呢？妈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在与毛主席谈话以后第四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爸爸的电话，爸爸一听，霍地站了起来，迎上去阻拦，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从此，断绝了爸爸和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

爸爸久久地站在那里，象座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而我们呢？一直追到门口，望着那伙人大摇大摆走去。我们头脑一阵轰响，心里痛苦极了，以后我们受了冤屈对谁说呢？以后再有人揪斗折磨爸爸、妈妈怎么办呢？我们再也听不到周伯伯同情和鼓励的话语了。

爸爸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每天清早我们几个孩子就骑上自行车出门，排着长长的队买小报，从墙上揭下传单，挤在人群中抄大字报，侧耳听着人们的议论。回到家里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

在我们买回的这些小报里，充满了对爸爸形形色色的诬蔑。其中有一张小报上无中生有地说爸爸曾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还造谣说爸爸曾自诩为“红色买办”。对于这些令人恶心的谰言，爸爸不屑作什么解释。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工人运动，站在反帝斗争前列。大革命期间，29岁的爸爸——一个共产党员，直接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英勇斗争。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些小报的造谣诬蔑，岂能改变历史？不过爸爸觉得这毕竟是一种不寻常的信号，不可等闲视之。爸爸回到办公室，立刻提笔疾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驳斥了这种造谣诽谤。这天是1967年3月28日。

历史的颠倒，不仅象我们这样的孩子不可思议，就连爸爸这样历尽人间沧桑的老革命也不能理解。而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仰，准备接受严峻的考验。可是，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考验竟来得如此猝然。

4月1日，各报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爸爸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爸爸越说越愤怒：“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爸爸的话是那样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可是，爸爸如今却处在毫无发言权的“被告席”上，哪里有人会理会他这一正义的要求呢？心里怀着鬼胎的阴谋家又哪里敢接受爸爸这一严正的挑战呢？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爸爸，竟连在党的会议上申辩的权利都没有，连在人民群众中辩明是非的权利都没有，这难道不是令人痛心的悲剧？这难道不是强加于我们党身上的耻辱吗？

就凭一个跳梁小丑的一篇滂文，就把一个国家主席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中央下达文件的依据，成为定人罪名的一纸状文，真是荒谬绝伦！这哪里是什么党内斗争，完全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大阴谋。在这场斗争中，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完全被打烂，大多数党的优秀干部被整得死去活来。什么党的政策，什么党的传统作风，统统被破坏了。一小撮坏人窃踞高位，利用群众对我们党过去的一些错误的不满情绪，窃取权力，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已经不是什么党内斗争了，而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爸爸正处在这个旋涡的最中心。一切华丽的词藻都不能掩饰血的事实。他要坚决进行斗争，到了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了。

4月6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向爸爸宣布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爸爸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上午睡觉），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爸爸回答并写出交代。爸爸按照

提出的质问，用铁的事实逐条据理驳斥。当质问到所谓 61 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爸爸一下子发了火。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爸爸激怒地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 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4月7日，爸爸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说明一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林彪、江青一伙，完全剥夺了爸爸讲话答辩的一切权利。在斗争会上，每当爸爸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爸爸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爸爸讲一句话。爸爸连一个公民的发言权都被完全剥夺了。

八

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使爸爸精神上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加上突然改变作息时间，限制安眠药量，爸爸已有几天没有睡觉，身体搞得很弱了。4月8日，通知妈妈去清华大学作检查，这对爸爸又是一个大打击。

这天晚饭后，妈妈正和我们三个孩子谈外面的情况。爸爸突然扶着墙走进来，面色铁青，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面颊淌下来。妈妈赶快搀扶爸爸回卧室，我们去叫大夫。那天晚上，爸爸几次晕厥。大夫给了几片药，转身走了。我们守候在爸爸身旁，只见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白发如雪。谁能想到，这位安详地躺着的老人，曾经肩负着八亿中国人民赋予的重任。在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从不畏缩不前。如今，中国大地上血雨腥风，他却病倒了。望着爸爸清瘦的面庞，一年以前他一次重病后和我们谈话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是 1966 年初，爸爸害了一场重病，他刚刚脱离危险，就把孩子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眼前，感慨万分地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接着，爸爸给我们描述了他的设想：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三大差别，等等。爸爸当时还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建立工业基地，这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新型的工业城市。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爸爸不仅有宏伟的设想，而且有脚踏实地的措施。他讲着讲着，两眼透过明亮的窗户，望着窗外飞舞的白雪，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蓝图正在眼前展现。“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仅仅在一年前，爸爸还是那么自信，心中充满了革命的豪情。如今，他身处逆境，不仅那些美好的愿望变得渺茫，而且还被无端地强加上种种恶名，诅咒他是千秋罪人。如果这真有益于国，有利于民，爸爸准备勇敢地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责任。然而党和国家陷入了空前的浩劫，周围是阴云惨雾，冷箭毒枪。没有一个对手敢于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进行有根有据

的指控，只能躲在阴暗的地方施展阴谋。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啊！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他这位一生从事群众工作的战士，直接面对着的竟是他热爱的群众，他却不能讲话，不能解释。他把毕生精力致力于建设一个好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可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却硬叫他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明明是党的好干部，他不能说好，因为那样反而加重了那些同志的“罪名”，明明是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他却不能说坏。爸爸呀，你心中包容了多少难言的痛楚啊。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爸爸，也许您洞若观火，心里一清二楚，我们却百思不解。我们多想大声发问：究竟为什么要剥夺您立志十年建设起富强中国的权利？您有功于人民，无愧于党，那您又有罪于何人？究竟为什么不仅在政治上把您打倒，还要在精神和肉体上无情地折磨您呢？为什么？为什么？有谁能回答我们呢？

九

爸爸继续顽强地承受着沉重如山的压力和摧心裂胆的痛苦。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说：“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三十万人大会批斗妈妈……”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象火山似地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

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这难道会是一个反对毛主席的人对亲人的遗嘱吗？对于那些信口雌黄、诬陷好人，而实际上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类，历史和人民是不会轻饶他们的！历史不是已经和正在这样做了吗？”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果然举行了三十万人批斗会。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妈妈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妈妈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妈妈又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妈妈在大会前，作了长时间的答辩。她代表爸爸向群众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搞法，但我们决不跟群众对立，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那天晚上，我们回家把批斗的情景告诉爸爸。虽然我们预料到这对爸爸是一个无情的刺激，但我们不愿意向爸爸隐瞒真相。我们必须面对严酷的事实。当我们说到彭真叔叔、薄一波叔叔、陆定一叔叔和蒋南翔叔叔也同时挨斗，还有三百人陪斗的时候，爸爸只是双眉紧蹙，仔细地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晚饭一口也未吃。

十

从爸爸作遗嘱的那天起，我们明显地感到自己变了，头脑似乎变得复杂了。我们曾经过于轻信，寄希望于幻想，但都一一破灭了。我们努力去思考，去探讨，拼命地看书，想弄明白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家里的书被封了，我们早晨五点钟就等在北京图书馆门口排队拿号。不论是经典著作，还是中外小说，我们都如饥似渴地读着。

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过来了。他们欺骗和煽动单纯幼稚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揪出刘少奇”。一时，中南海墙外，帐篷林立，车水马龙，围得水泄不通。看起来是多么矛盾：他们掌握着大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爸爸置于死地，但他们却要欺世盗名，愚弄群众，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来“吊民伐罪”，借刀杀人，使自己双手不沾一点血迹。

事实很清楚，他们围困中南海，是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撵走周总理，揪出刘少奇。他们越走越远了。

爸爸在中南海内，依旧象往常一样，坚持每天看大字报。平平、源源把他们去云南、湖南、湖北、陕西、山西、四川、青海、天津串连时看到的情况告诉爸爸和妈妈，当我们说到长沙、武汉、成都、天津等地开始大规模武斗时，爸爸仔细倾听，陷入了沉思，但他很少说话。其实，仅仅从小报上登载的“首长讲话”里，爸爸就知道全国已经沦为什么样的境地、党已经被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又被愚弄到什么地步。党被摧毁，国家受难，群众遭殃，而这一切还看不见尽头。正当他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的时候，建工学院一个群众组织突然要爸爸写检查。爸爸已是身心交瘁。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由妈妈代写。送上去后，爸爸又要了回来，加了一句：“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就因为加了这几个字，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

在这滔滔恶浪的袭击中，周总理岿然不动，作为中流砥柱，独撑危局。他看穿了江青的阴谋，就亲自到中南海北门向群众做说服工作。而江青、陈伯达竟唱对台戏，来到中南海的大、小西门外进行挑动。当总理出现在西门说服群众时，江青一伙又跑到北门。结果围攻中南海的浪潮，此起彼伏，有增无减。周总理坚定地说：“我就是呆在中南海不走。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造反派们冲不进中南海，就把不少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轮番揪到中南海门口进行批斗。与“围攻”相配合，中南海院内又一次掀起“批判”的恶浪，还出现了要揪朱爹爹、陈云叔叔的大字报。爸爸得知这一切，痛心地说：“糟糕，又要整倒一大批老干部了。”妈妈说：“你已经不工作了，这个国家主席，辞了算了，你再正式提一提，我和孩子们养活你。”

爸爸说：“没那么好受的，不会让我回乡种地，我下去了，他们还批什么？……”

妈妈也叹了口气，说：“现在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好象是林彪和江青他们搞的一次反革命政变，专打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工作的一、二把手。……”

爸爸听了未作回答。经过了一夜的思考，爸爸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语气肯定地对妈妈说：“你昨天谈的看法是对的。”

然而，这个结论使爸爸更加痛苦不安。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爸爸为救国救民，与中国的志士仁人一道赴汤蹈火，艰苦奋斗，使中国傲然屹立于全世界。而今天，爸爸是囚笼中的人，眼睁睁看着党和国家濒临一场浩劫，看着人民和广大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却无法起来维护，更无法去搏斗。只有保持缄默，抑制住自己，坚强地活下去。群众最终一定会自己觉醒的，尽管这需要时间，需要斗争。

十一

在爸爸身边工作了十八年的厨师郝苗叔叔，突然被林彪、江青一伙诬陷为“特务”抓了起来，这对爸爸身边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他们更不敢再与爸爸接近了。

爸爸自己不得不作最坏的准备。唯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一件家事，就是最小的女儿小小（潇潇）。小小当时只有六岁，天真无邪，简直可以说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一年来的狂风恶浪，她那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再有更大的风浪，她该怎么生活呢？这几天，爸爸见到小小，就格外眷恋。爸爸常叨念：“小小该上学了，该上学了。”妈妈也觉察到爸爸的心里，她何尝不为小小担忧呢。可是，现在能到哪儿去上学呢？一想到小小，妈妈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啊。

一天，妈妈内心的痛楚实在压抑不了，对爸爸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

“这怎么可能？”爸爸摇摇头。

“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进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妈妈还不死心。

“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那究竟该怎么办呢？妈妈不知所措了。

“托给阿姨吧。”爸爸思忖了一会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每逢危难之际，爸爸就从人民那里寻求救援、寻求帮助。人民从来就是他赖以生存的靠山。妈妈尊重爸爸的决定，她狠了狠心，拿了两张爸爸妈妈的像片，去找阿姨和小小。小小已躺在床上要睡觉了，正愉快地嘻笑着。

妈妈走到赵阿姨身边，把像片递给她，禁不住泪如泉涌，抽泣着对阿姨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要吃大苦……”妈妈已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了，扑到小小身上痛哭起来。小小却吓坏了，赶快挣脱出来，缩在床边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望着趴在床边向她伸出双手的妈妈。她还太小，她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的一切。

十二

沉重的打击，比爸爸预计的要来得快。

那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清早，我们去中南海职工食堂吃饭，在我们常坐的饭桌旁吊着一张大字报，上面说根据江青、戚本禹“指示”，今晚要开揪斗爸爸的大会。回到家里，我们就告诉了爸爸。爸爸意识到生死搏斗已迫在眉睫。中午，他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我们看，一是毛主席肯定爸爸检查的批语全文，一是毛主席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这是爸爸第一次让我们看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去，他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不让我们接近。如今到了最后关头，他认为不能给孩子心头留下阴影，爸爸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我们说：“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和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斗争会后，爸爸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隔离看管，加派了岗哨。妈妈被押到后院。我们子女虽然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不准我们去爸爸、妈妈被关押的地方，不准我们离开家。

爸爸不知道妈妈关在哪里，也不知道孩子们的去向。而从我们孩子住的地方，有时却能看到爸爸在屋里的活动，也能看到后院的妈妈。可是既不能见面，也不能说话，我们心里象油煎似的难熬。一家人被他们分割在一所宅院里，父母儿女，咫尺天涯。

十九日早晨，爸爸到食堂用饭，看见平平和源源正在穿堂里洗手巾，一时喜出望外。趁哨兵不注意急忙走过来，小声地问我们：“你妈妈在哪里？”

“关在后院。”我们说。

“哦，你们呢？”

源源低着头说：“他们不准我们跟你们见面、说话……”

这时，哨兵走过来，我们不敢再讲下去，爸爸也只得转过身，恋恋不舍地走了。爸爸呀，那时我们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您说，但我们不敢说，否则，就连再看您一眼的机会也会被剥夺。

从此以后，爸爸天天站在他的后窗户前望着后院。尽管其间还有一道墙隔着，根本看不到后院的一切，可是爸爸一站就是好半天。我们望着爸爸的身影，似乎听到老人胸中的波涛翻滚，我们的心碎了。我们虽然能隔窗看到爸爸妈妈，可是不准说话，真把我们憋死了。不，我们故意大声讲话，让爸爸听见，也让妈妈听见。爸爸隔窗看见我们，就微微一笑，妈

妈看见我们也是苦笑一下……这一笑包含着多少痛楚和辛酸啊！

十三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嚎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漫骂，“谁敢在这时候哭呢？”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口，原来是六岁的小小，被如此残暴的景象吓得嚎啕大哭，拼命往大门后面爬去。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木呆了，全场鸦雀无声。源源转身就向外跑。几个战士抓住他，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源源使劲挣脱开身：“你们没听见小小在哭吗？”源源一把抱起小小，亲吻着她，吮吸着她的泪水……

会场的指挥者还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他们的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漫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接着，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开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从他们颤抖的双手，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厚的情谊。在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传递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在近二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叙说。但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一往情深。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多少次看见他们一起去看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彼此间有一句怨言。而今，在这耻辱的“刑场”上，他们要诀别了，永远诀别了。有哪个儿女眼见父母在这样狂暴的蹂躏下握手告别，能不肝肠寸断呢！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爸爸的头上。在这一片漫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

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月7日，爸爸给毛主席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主席提出辞呈，并向毛主席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十四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爸爸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为了不使我们难过，一见到我们老远在望着他，他就放开双手，强伸起腰，那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爸爸每淌一滴汗，我们心上就淌一滴血啊！

妈妈仍关在后院，头破了，还被强迫劳动搬砖。一位站岗的哨兵看到妈妈背一大筐砖很吃力，就大声“训斥”说：“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语气是凶狠的，却包含着极大的同情。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调走，复员回乡了。

尽管看到爸爸、妈妈惨遭折磨，心如刀绞，我们还是要站在走廊上隔窗远望着。能看见爸爸、妈妈，毕竟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可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连这一点也不容许，他们竟采取了更恶毒、凶狠的手段。

那是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突然，通知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我们要求能在假日回家，回答说：“不行，你们给刘少奇、王光美通风报信，必须好好检查罪行！”我们要求最后看一眼爸爸、妈妈，也被无理拒绝了。怎么办？我们就暗中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能再见到爸爸一面了。我们一会儿说要找衣服，一会儿要找书，慢慢悠悠，来回磨蹭，尽量拖延时间。他们可能发觉了我们的用意，就把东西扔进卡车，硬是不准我们见最后一面。就这样，我们被赶出了中南海，赶出了我们的家。这里，我们曾度过幸福的童年；这里，也给我们留下了悲惨的记忆。我们并不留恋这里，我们只是不忍就这样撇下爸爸、妈妈。不能哭、不能喊，我们默默祝愿：“保重呀，爸爸！保重呀，妈妈！我们走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你们……”谁知，这竟是我们和亲爱的爸爸的永别！

瑟瑟秋风，抽打着我们嫩稚的脸颊；滚滚车轮，碾压着我们年轻的心……

对于这一天，我们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们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看着三个小行李卷。爸爸的嘱咐，又在我们耳边回响：“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从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要记住：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作人民的好儿女。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的叮咛一字一句地镌刻在我们心头。我们铭记着爸爸的嘱咐，离开家，走到人民之中。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同天下午小小和阿姨也被赶出中南海；晚上妈妈被正式逮捕入狱。这，就是我们生离死别的一天。

过了几天，爸爸托警卫员转告我们：“让孩子们与我和妈妈划清界限。”这句话使我们难受极了，也使我们想起年初爸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我欢迎你们严厉地批判，也允许你们跟我划清界限，但是一定要说真话。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没有欺骗你们。”那时我们也很激动，我们深信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好人，没有“造反”离家。现在虽然被迫活活拆散，天各一方，

但我们的大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爸爸懂得我们的心。是啊，爸爸是想用“划清界限”来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在人民中间顽强地活下去。

我们走了，爸爸，我们离开您了！在我们面前是飓风骤雨，危浪险涛，颠沛流离。十几年来，我们走过批斗和辱骂的夹道，我们在监狱中埋葬过自己最可宝贵的青春时光。闪亮的镣铐卡在我们的骨头上，无法叫我们屈服，却留下永久的疤痕；日夜的围攻使我们愤然剪开手指，让鲜血去流淌，点点滴滴，汇成不屈的血书。

活下去，为了将来把这一切告诉人民，我们肩负着爸爸、妈妈的希望和重托，更带着有朝一日能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渴望，一定要活下去，勇敢地闯出一条路……

十五

上小学的第一天，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是多么高兴的一天呀！然而，上学，对于小小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清晨，小小挎着新书包，跟同院较大一点的孩子兴致勃勃地去上学，刚进校门，就引起一阵混乱。街上值勤的解放军闻声赶来，看见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抱头蹲着。他把她抱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小小那充满恐惧和呆滞的目光才转了过来：“叔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说完，她哭了起来……

回忆那些令人心碎的日子，丝毫不是要责怪那些群众。当年围打小小的那些孩子们也是被毒害的无辜者。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最革命的口号下，煽动黑暗、野蛮的仇杀，采取了反动的株连九族的政策。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实际上是对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大愚弄”，是封建法西斯的“大恐怖”。

那时，小平叔叔、彭真叔叔、乌兰夫叔叔、林枫叔叔、薄一波叔叔、杨尚昆叔叔、罗瑞卿叔叔的孩子们，都因父母被关押，成了无家可归的“黑崽子”，东躲西藏，为了生存而搏斗着。社会的压力，生活的磨难，经济的拮据，使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我们之中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才几岁。孩子们患难与共，彼此提携着涉过激流。没吃的了，源源和彭真叔叔的儿子去卖血，可是没有证明，医院不收。难道“黑帮子女”的血都是黑的？多少寒冷的夜晚，为了躲避查抄，我们从窗户翻上五层楼顶，在漫长的黑暗中，大家在一起想念爸爸、妈妈，久久地等待着天明。每次遇难，大家总是首先把我们保护起来，都说：“你们家是秤砣，谁被抓起来也不能让你们出事。”孩子们的友爱，更激起那些迫害狂的毒心。不久，我们之中有的被抓，有的被斗，有的被赶出北京……

平平从监狱出来后被驱逐到山东，源源在山西雁北，亭亭和小小也在他们魔掌之下。春寒料峭，我们拉着犁走在没膝的黄河淤泥中；酷暑烈日，我们用汗水浇灌干枯的禾苗。我们曾咬着牙劳动，拼命劳动。我们也曾钻在书堆里几天、几个月，摒弃周围的一切。我们放之山水，吮吸着祖国的乳汁；我们开怀豪饮，在十月胜利的欢乐中忘情。爸爸，正象您所说的：“只要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人民会信任你们，和你们在一起的。”人民作了我们的再生父母。晨光熹微，我们发现单薄的被子上盖着大衣，温暖了我们的心；中秋月下，农民把几个月饼和鸡蛋塞在我们手里，同我们一起思念着异地的亲人。

正是在人民的关怀中，我们感到人民对爸爸潜在内心深处的真诚的热爱。从没署名的信封中，我们抽出曾被埋藏多年的爸爸的画像；从匿名的电话里，传出激动铿锵的声音：“我们怀念刘主席！”一位老红军拍着我们的肩膀：“你们要是你爸爸的好种，就要活下去。为了你爸

爸，为了人民，刀搁在脖子上也别喊。”

爸爸，在人民的哺育爱护下，在人民对您默默地怀念中，在人民为您英勇地斗争中，我们长大成人了。爸爸，在我们自己的新生活中，您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不是吗？在劳动的欢乐中您和我们一起庆贺丰收；静静的深夜中，您来睡梦里看望我们；痛苦的酒醉后，您把我们紧紧抱起。在我们漫长的行程上，您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呼喊：“孩子，我在你们的身边，就在你们的身边。”

爸爸呀，人民的爱憎，点点滴滴洒在我们的心田，在我们年轻的心中灌满了仇恨，恨得刻骨；也激起了爱情，爱得炽热。十多年风狂雨猛，冲刷了我们幼稚的头脑，教给我们怎样去思想才正确，怎样去斗争才顽强。虽然我们也曾感到过软弱、颓唐、疲惫不堪，但人民总是不断给我们增添着新的力量，激励我们去为生存、为祖国、为老一辈革命家、为爸爸、妈妈勇敢斗争。

要斗争，要找到爸爸、妈妈。我们被拆散的几个孩子，只有聚集起来才有力量。于是我们姐弟四人，不顾一切地靠拢团聚，亭亭成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人。源源为了回北京，在老乡的帮助下，深夜逃出村子，白天在野地里躲避追捕，夜晚在崎岖的小道上赶路，兜里只有一把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才赶上火车……

平平听弟弟妹妹来信说可以见妈妈了，直奔火车站。几百里路恨不得一步跨到，赶到火车站火车刚起动。平平不顾一切地揪住车门。这时，冲上好几个人把平平拉下来，他们奉命不准平平回北京。“我要见妈妈！我要见妈妈呀……”平平拼命挣扎、呼喊，把火车站上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火车开走了，平平晕倒了，被装进一辆吉普车往回拉。平平刚苏醒过来，就发疯似地往外跳，车上的人又拉又劝。“我要爸爸！我要妈妈呀！……”悲愤的哭声、喊声，震荡着黄河激浪，拍打着荒原……

十六

1972年，听说可以探望彭真叔叔了，我们的心里也燃起了希望之火，仿佛隔着铁窗看到了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用长满茧子的手给毛主席写信。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们传达毛主席批示，说：“可以见见妈妈。”我们一再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他们不敢说，就走了。

第二天，他们才又来传达毛主席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口头通知我们，爸爸已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因肺炎死于开封；他的骨灰由组织上保存，不能给我们。并且不让我们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

听到爸爸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的心被撕碎了，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三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我们齐声追问：“为什么死于开封？为什么死于肺炎？什么人去抢救的？爸爸什么时候走的？当时是否已经病了？妈妈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专案组的人瞠目结舌，神色极为慌张，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只能说这些。”就在同一天，专案组把爸爸的死讯通知了狱中的妈妈。

8月18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五年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这一天，梦中千百回的呼喊着。头天晚上，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深夜里小小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来叫着要见妈妈。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会叫，木呆着。我们也都惊呆了：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

神情麻木、迟钝……我们一下想起了在“九大”之后，林彪判了妈妈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在“判决书”上批示：刀下留人。多亏毛主席一句话，妈妈才活下来，今天能向人民控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暴行。妈妈仔细端详着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是啊，谁能想到我们会活下来呢，可活下来又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们不愿讲八十岁的外婆怎样惨死在狱中，也不敢提及爸爸早已离开人间，我们不忍提及我们每个人活下来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尽拣好一点的话来安慰妈妈，讲林彪一家摔死的喜讯来鼓励妈妈，讲我们如何在人民的抚养下长大成人，让妈妈放心……五年的离别之情啊，象滔滔江河奔流不尽，身旁的看守、专案人员的怒目相视，也无法斩断这股情流。过去的一切爱、恨、恩、仇都融化在岁月的巨变之中，埋在心底里，今天才从母女们相视的目光中迸发出来。最后分别的时候到了，看守们强拉着妈妈回去，我们哭喊着：“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呀！”妈妈回过头来，满面泪水，隔着窗户，向我们点着头……

回到我们的小窝，我们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索性敞开感情的闸门，任这些年积郁在心头的悲愤喷泄出来，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爸爸呀，您死得太惨了！……”

自有监视我们的人把这一切向上打了小报告，无非是说刘少奇的儿女们哭监，大闹宿舍。我们不怕！就是要让“四人帮”知道我们人还在，要斗争，我们要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从这天起，我们就为新的使命而斗争：我们要弄清爸爸的死情，爸爸是为党受屈、为人民而死的、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的骨灰也属于人民，我们绝不能让爸爸圣洁的骨灰落到“四人帮”的魔掌里。爸爸呀，我们就是拼掉性命，也要找到您的骨灰，夺回您的骨灰！

多年来我们访踪追影，到处打听。我们找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在爸爸去世时也都撤走了；我们托多少人到开封打听，甚至找到他最后被关押的地方，但也是人去室空。多少年，我们忍耐、等待，小心而又热切地找寻。一直到1976年，听说八宝山一室里有一个无名骨灰盒，我们想一定是爸爸的，便千方百计地混进去找。当我们看到那个万恶的“迫害狂”——康生的骨灰盒还摆在中央，仇恨之火呼地燃起胸膛。我们揭下盖在上面的党旗，见盒上早已满是唾沫和烧的烟痕，愤怒的人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头之恨呀！我们找到了那无名的骨灰盒，不管是不是爸爸的，反正都是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害死的无辜者，作为革命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安慰他在天之灵。于是，源源认真地擦净骨灰盒，抓了一把骨灰，在国庆节前一天撒到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好让我们的爸爸和一切冤屈孤魂，明天能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国庆，看到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生日的盛况。

没过几天，举国欢腾了。爸爸啊！您看到我们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了吗？人民胜利了！党胜利了！在那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您一定又加入了人民的队伍，您一定尝到了人间的胜利美酒。爸爸，请您来和您的孩子、您的人民一起欢呼这伟大的胜利吧！

多少年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忍受着时间的煎熬。经过千辛万苦，从许多有关人员那里，从当时的有关记录中，我们把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连在一起，成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清楚地看到了爸爸在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悲惨遭遇……

十七

1967年9月13日，就在我们被迫离家后的当天，妈妈也被关进了监狱。起初，爸爸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又蹭到妈妈曾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到里面的动静。然

而，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每次都是失望地蹭回来。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寂静。一天夜里，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再也不许爸爸出门到后院墙根了。接着，几个战士又奉命来搜查爸爸的房间，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爸爸厉声抗议，话音未落，就被按倒在地，强行把皮带抽去，爸爸发火了，气得浑身打颤，半天爬不起来。

爸爸完全象囚犯一样！不，比囚犯还不如。

之后，迟群跑来，代表“中央”给爸爸的警卫战士训话：“你们×中队负责警卫的人里黑帮出得最多，刘少奇就在这儿。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现在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他还恶狠狠地加了一句：“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原来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被骂为“地道的保皇兵”，下了他们的枪，没收了证件。“看守”爸爸的战士，也加了双哨，层层监视，谁要是有一点“留情”，就要立即被批斗、关押或送回农村老家。这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党中央的心脏——中南海？这里，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片封建法西斯的恐怖！爸爸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孤苦伶仃地挣扎着。他要坚持活下去，活到胜利的一天……

当知道妈妈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深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三十米距离，竟要“走”上五十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爸爸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这一切，使得爸爸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插。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爸爸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

一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怎么经受得起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爸爸的身体日益恶化，有时神志不清。可是，那些负责监视看守的人却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像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会诊医生提出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爸爸这样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爸爸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地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因为不

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了。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在室内刺眼的灯光下，爸爸呀，您可曾想到：您的妻子正被关押在阴暗、密闭的牢房里，直不起腰、毛发脱落、咳血，被林彪一伙判了死刑；您的长子刘允斌已惨死一年多了；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十九岁的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十七岁的源源，正艰难地行走在雁北的漫天风沙中；年龄更小的亭亭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苦苦争斗；您心爱的小小处处遭歧视，正忍受着痛苦和凌辱。

爸爸呀，您可曾想到多少老师、中央委员、多少党的好干部，没有死在长征路上、抗日烽火里、解放战争中和白色恐怖下，却倒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倒在他们解放的土地上。又有多少无辜者惨死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血泊里。

祖国被一次丑类践踏着。爸爸也许早有预料，早就为避免这一场浩劫斗争过：他反对搞极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他曾明确地反对“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他早就针对“一句等于一万句”的口号，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大整“彭罗陆杨”时，爸爸刚出国访问回来，就说：“难以置信”！爸爸主张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没有真理又哪来的平等呢？爸爸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维护真理的人会遭到如此打击；也没有想到，真理会遭到如此歪曲和践踏，不仅没有平等，还如此野蛮。那些在国家困难时期“袖手旁观”的人，一等经济好转，人民吃几天饱饭，就跑出来争权夺利，篡党篡国，在党和人民中制造仇杀，把人民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成果葬送得净尽。国家遭难，而“整人狂”们却青云直上，弹冠相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前门宣称同“资本主义”恶魔作战，却从后花园里召回封建主义的亡灵顶礼膜拜，妄图倒转历史车轮，把中国推向黑暗的深渊。

爸爸面对着林彪、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残酷迫害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现实，10月5日大哭了两次。他为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面对任何敌人、恐怖，面对任何流血、牺牲，面对任何委屈、误解，他从来没有大声痛哭过。今天，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他失声痛哭！他哭得是那么伤心。他把对祖国、对民族、对党、对事业、对家庭、对自己的所有的情感，一个真正的人的全部情感，从这决开的心堤里喷涌出来……

紧接着，爸爸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引起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手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十八

1968年11月24日，是爸爸七十岁的生日。爸爸从来不让我们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这一天特别加倍工作，引以为最大的欣慰和欢乐。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生日——

据说这天早上，爸爸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二十四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爸爸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

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秋风凄厉，枯木凋零。茕然一身的爸爸，独自承受着这最沉重的打击。

从入党那一天起，爸爸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整整半个世纪，他致力于党的建设和发展，出生入死，艰苦奋战；为了党，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为了党，他把个人的安危荣辱置之度外；为了党，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为了党，他承担了最大的屈辱和误解……。他相信有一天党会为他说明真相、洗清冤屈、澄清是非，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永远开除出党”！

在党纪国法已经荡然无存，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邪恶完全颠倒的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是，这“词”是什么，爸爸至死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立案审查不知道，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作出决议，从来没有人找爸爸谈过一句话，了解过一个字。既不让看有关材料，又不让说明申诉；既不让爸爸知道开他的会，又没让爸爸在开除党籍的决议上签字。直到爸爸去世，他们从没有把有关决议正式通知过爸爸。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背着爸爸搞突然袭击。在党的最庄严的代表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竟抛出一个全部是栽赃、诬陷、用“道供信”编造的假材料，欺骗全党，愚弄全国人民。谁要是提出一点不同意见，就要招致灭顶之灾。朱爹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因说过“刘少奇打不倒”，被认为“不识时务”；中央委员陈少敏妈妈也是因为不相信为党奋斗几十年的爸爸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立即惨遭迫害。张志新烈士勇敢地站出来为爸爸辩护而被残酷杀害。在那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哪里有真理可言，正义可谈，冤屈可伸呢？！这不仅是对爸爸一个人，也是对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肆意践踏和蹂躏，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奇耻大辱。

从此以后，爸爸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敬爱的周伯伯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来护理爸爸，可是这两位熟练而细心的护士也无能为力啊。

突然一天，爸爸叫起过去的卫士小贾的名字。看守把小贾找来，小贾问有什么事，爸爸只朝他微微一笑，小贾又问了一遍，爸爸仍不说话，闭上了眼睛。过了几天，爸爸又同样叫来以前的卫士小子，也是微微一笑，闭上眼睛不说话。啊——这是爸爸向他们作最后告别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身边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亲人，只有这两个在身边工作过几年的青年卫士。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真诚地热爱爸爸。爸爸熟悉他们，喜欢他们，关心他们，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爸爸常说：“不管是谁的孩子，在我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后代来教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如今，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爸爸向他们告别，不，是在向中国人民和青年一代告别！他知道留给我们青年一代的是什么，是曲折而光明的前途：是备受伤害而仍不屈不挠的心灵；是优秀而崇高的品质；是鲜明而又深沉的爱和恨。他深信我们青年一代一定会奋勇斗争，夺回真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爸爸呀，您为党和人民搏斗、操劳了一辈子了，您太劳累了，休息一下吧，您的遗愿自有我们青年一代来完成。

十九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爸爸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爸爸房门口瞧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爸爸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

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爸爸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爸爸看，爸爸又把脸扭了过去。爸爸原卫士长老李同志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爸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七点多钟，爸爸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爸爸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当时在爸爸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配合治疗。爸爸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爸爸退烧的第二天，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叔叔一回到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去。”李叔叔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

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给爸爸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爸爸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20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爸爸曾对我们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我们怎么也不曾想到，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现皇”；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他死时，只有那一尺长的白发属于自己，还有的就是那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奇耻大辱。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知，人民毫无所闻；他们自以为“胜利”地消除了他们的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但是，党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历史自有公

论，而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终于公正地落到那些炮制者自己的身上。历史是无情的，民心是不可违背的，真理之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爸爸，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敬。

我们和亲爱的爸爸分别至今，已经 13 年了。这是什么样的 13 年呀？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四位骨肉先后惨死，六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苦难，是我们祖国的满目疮痍。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爸爸平反，不仅是为爸爸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爸爸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我们的祖国受够了难，人民吃够了苦，再也不要人为地制造动乱，只需要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好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啊！

自从妈妈去年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多么幸福，多么亲呢。就在这幸福的笑声中，我们看见爸爸就在我们面前，他正在奋力挣扎，去挣脱那无情的血网，多么想回到人民的中间，多么想回到妻子儿女身边。爸爸，十年了，您的灵魂一直就这样斗争着，一直在我们心中呼喊。爸爸，您安息吧，我们就在您的身边。爸爸，您看看，党和人民终于打破了这血网，洗清了您身上的污渍；您看看，这是全国人民写来的千万封信，大家有这么多话要说给您听！您看呐，成千上万的青年抱着鲜花向您拥来；您看呐，大地回春，冰雪融化了。祖国的千山万岭回响着人民呼唤您的声音，您忍辱含愤的英灵终可得到安慰了吧！

爸爸呀，您那不安的灵魂快快回到您雪白的骨灰里来吧！让我们按照您在任国家主席时的托咐，按照您在最艰难时的遗嘱，把您的骨灰洒到祖国的大海里，洒到世界的大洋上，溶化在解冻的春水之中，您一生的奋斗和心血已变成世上最为宝贵的财富，永存在世间。

爸爸呀，亲爱的爸爸，您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人民并没有忘记您，也为了您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爸爸呀，您曾为了我们党而抛弃了个人的一切；党没有遗弃您，为了您的昭雪，奋力呐喊，不惜一切代价。今天党和人民又把那应得的光荣还给了您，对于您来说，至高无上的光荣称号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作者注：本文是应《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1980年4月完稿于北京）

（原载 1980 年 12 月 5 日—8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现已闭幕，全会公报已经发表。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

各大军区同志回到本地后，请即按公报内容进行传达。传达范围：地方传达到厂、社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党员，没有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单位，均暂不传达；人民解放军传达到团级党委会。传达方法：地方可以分省、市县两级开各单位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进行口头传达；军队传达方法自定。

全会文件不登报的有：一、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他的罪证附件。第一个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省军区自己印发，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协商会议中分发或宣读。第二、第三两个文件由中央印发，经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一直发到各地区、各部门、各部队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手中。

传达情况和反应，望陆续简报中央。

毛主席批示：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十一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有关传达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委会十一月九日“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和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所提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

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中央文革：

鉴于我们这次党员代表会议由市革委会直接向广大干部、党员传达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效果好。拟将原来确定由县、区传达到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中、小工厂、企业、事业、商店、街道和中学等约四千多个基层单位革委会中的党员干部（包括革委会中的一些非党干部），改由市革委会在本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召开一万七千人的大会直接传达。再由县、区负责组织学习、讨论。

当否，请指示。

北京市革委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

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十一月二日回到上海后，作了两次传达报告，参加了一些小组讨论会，有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传还是不传达？原来规定不传达。我在五百人的会上，只讲了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三个问题一传达，就成为讨论问题的纲。大家议论和思索问题，就有了中心，对公报开头几段，也就懂了，并且有了批判“不见得”派的思想武器。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传达了主要精神，效果也很好。看来，一点不传达是不行的，传达主要的精神，十分必要，很有好处。

二、要不要非党员参加传达会议？原来中央规定是开党员会议。在上海，市一级的会吸收了一小部分非党员，效果很好。在小组会上，凡是站出来前的干部和曾经站错队的党员占多数的，虽然讨论得也算热烈，但是，比起造反早的党员和非党员造反派占多数的小组来，就差一些。在向基层传达时，我们就多吸收了一些非党员。参加传达大会的，共一万五千人，其中地方一万二，部队近三千人。正地方代表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五，非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女同志占百分之十四。实际上，许多基层，掌权的是非党造反派、不向他们传达，他们领导讨论和落实公推有困难。这些人听了传达，也特别激动，“过去中央全会，顶多传达到十七级干部，这次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星期，就传达给这些普通工人了。”这对培养一批新干部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陈毅同志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静安区一个党员听了传达，在本单位学习小组会上通了一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自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因为社会上流传陈毅的好话很多，什么有战功、能文能武，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待帝、修、反四面进攻，头发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颠倒黑白，把他的错误、罪行说成功劳，什么陈毅揭发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请回来的，等等。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学课本的，有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念颂扬他的课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干部和群众，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揭发了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将另行整理上报）。国防科委系统原来为聂荣臻的问题打内战，是上海老大难单位最多的，现在有些单位开始联合了。郊区各县和市区部分单位，对二月逆流中解放军支左的错误，议论较多，把几个老总的问题说清楚，反而有利于军民团结。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要求将陈毅弄到上海来批判、消毒；另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为了适当保密，我们规定了不写标语、大字报，不印传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违反纪律的。

四、在传达中，我讲了“毛主席称赞上海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控制着上海的局势”，也讲了毛主席说上海也还有一些老大难单位，对工人阶级和老大难单位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动。我们决心把十二中全会的传达，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有的同志说，公报看

了五遍，觉得懂了，参加了这次市里的传达会，才感觉原来的了解很差。如何把公报和全会的各个文件认真学好，如何把传达、学习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摸索一些经验。

以上几个问题，有些省的同志打电话来问，我不便答复，不知这样做，是否妥当，请指示。

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晨

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重新发表的毛主席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它深刻地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分析了民主革命获得基本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是在整个过渡时期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这个伟大的革命纲领，照耀着十九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学习这个报告，对于贯彻执行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对于深刻理解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对于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最近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指出了我们必须在群众中反复地、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使广大革命群众都能够牢牢地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觉地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错误倾向。

党内的路线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同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经历了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反复的长期的斗争。可以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抗日战争开始，刘少奇同王明一起，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妄图帮助蒋介石反动派扑灭共产党和解放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

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宣告投降以后，刘少奇马上跳出来，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路线，胡说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妄图瓦解人民解放军，把中国送给美帝国主义，妄图继续保留蒋介石匪帮的统治，使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毛主席反对刘少奇这样一个亡国路线，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行新的人民大革命，举行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而坚决斗争。毛主席这条路线的光辉胜利，诞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人民大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极其剧烈的斗争。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科学地、深刻地分析了全国胜利后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指出了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在各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指出国内的基本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强调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要永远密切联系群众。报告指出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具体指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定了极其明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革命的转折关头，最能够识别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很快跑到天津，同资产阶级打得火热，大肆叫嚣中国资本家“太少”，工人阶级“不可靠”，主张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妄图抹杀在民主革命阶段基本结束之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鼓吹什么资本家“剥削有功”，疯狂地反对农业合作化，拼命地反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恰恰证明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忠实奴才。

毛主席指出：“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洞察力，预见到这十九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总纲。经过了这十九年的实践，再回过头去读毛主席这段指示，感到无比的亲切，就好象是针对我们当前的斗争讲的一样。十九年的历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继续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的历史。斗争的中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政权问题，而围绕着政权问题的，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承认或者否认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是支持或者镇压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

子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刘少奇这个反革命分子及其同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十多年来，在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在同帝、修、反作斗争的问题上，在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各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刘少奇及其一伙党内的走资派，都曾经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从右的方面或以形“左”实右的形式，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拚死的斗争”，刘少奇同他一伙党内的走资派，散布了整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妄图阻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妄图使我国从社会主义道路大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在城市，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依靠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鼓吹修正主义的阶级合作论，并且利用资产阶级在文化部门的优势，搜罗了一批叛徒特务，疯狂地在文化领域中向无产阶级进行反革命的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在农村，他们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路线没有得逞，随后就来一个所谓“大砍合作社”；他们的“大砍”阴谋被毛主席的路线粉碎以后，就又等待时机，制造借口，妄图扼杀社会主义的果实，瓦解集体经济，大倒退为所谓“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他们妄图实行的这种大倒退，只能是大倒退到旧中国最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很清楚，刘少奇及其同伙否认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是为了建立一个支持地主、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派残酷无情地镇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反革命理论根据的需要。

每当这种阶级斗争转折关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就象照妖镜一样照出了这群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面貌，使我们头脑清醒起来。我们需要认真重温这些斗争的历史，进一步把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批臭，批透，清除它的毒素，同时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史中吸取历史教训，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大决战。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撕下了刘少奇伪装革命的画皮，宣告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全国军民按照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指引的革命航向，经过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了，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伙挖出来了，把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了。

阶级斗争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总是要登台表演，抛出他们的反动路线。要他们不表演是不可能的。刘少奇也不例外。不管毛主席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他，不管他的阴谋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击败，他总是不死心的、总是要反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规定的路线的，总是不会违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个逻辑的。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无敌的，叛徒刘少奇终究逃脱不了彻底垮台的命运。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从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到一九六六年《炮打司令部》，这就是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贯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条红线。

回顾几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和人民群众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奠定了基础的、后来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

毛主席在当时就向广大革命干部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主席这个指示是何等英明、何等正确、对革命干部是何等爱护啊！毛主席指出要“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以后完全为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证实。在当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大家都重温毛主席这个指示，吸取极大的教益，唤起我们高度的革命警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切革命的同志们，千万不可忘记毛主席这个教导。

我们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充分利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这个反面教员，继续深入地展开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认真地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学好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进一步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起来，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应当清醒地看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现在正在进行的斗、批、改，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务必把它搞好、搞彻底。在这种学习、斗争、批为修改中，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毛主席许多其他重要著作，就是我们最好的教材、最好的指南、最好的武器。

让我们在全国更深入地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运动！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原载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 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 “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请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注语，认真研究这一经验总结，并且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两类矛盾，依靠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 “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中央文革：
送上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贯彻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请阅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 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这个厂有三千工人，连家属共一万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一九”批示的鼓舞下，在驻厂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一鼓作气，决

心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到底。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全厂已揪出的六十八名阶级敌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反复调查，反复研究，反复核实的基础上，根据阶级敌人罪恶的轻重，坦白交代的好坏和悔过自新的表现，做出恰如其分的定案处理，给予他们不同的出路。

一、拿出“样板”，扩大坦白面， 使党的政策具体化

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使更多的阶级敌人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加快清理阶级队伍的步伐，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首先将罪证确凿的阶级敌人，按其坦白交代的好坏，悔过自新的表现，作出从严处理和从宽处理的“样板”，使党的政策具体化，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他们认为这是清理阶级队伍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

今年六月十日，这个厂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全厂召开了“宽严大会”。会上对两个反革命分子分别做了处理：一个是写反动标语，并企图用“氢化钾球”毒害群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尹铭兆；另一个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反革命分子马友树。按其罪恶，这两个人都可以送交公安机关实行专政。并且尹铭兆的罪恶比起马友树还要更重。但由于尹犯能够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态度比较好，还能揭发别的坏人，有悔过自新的愿望和表现，因此决定从宽处理，只给尹犯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由群众在本厂监督劳动，以观后效。而对死不交代，负隅顽抗的反革命分子马友树，则坚决送交公安机关法办。这次大会震动了全厂。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就有二百三十六人不同程度地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虽然绝大多数是属于一般性问题，但也暴露出不少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广大群众说：“党的政策具体化，给一小撮暗藏的阶级敌人做个样子出来，他们就要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出路了。”

二、依靠群众，慎重定案，做到稳准狠

要正确执行好党的“给出路”政策，首先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内查外调，反复查证，反复核实，强调一个“准”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参加过特务外围组织“统建会”的变节分子赵升，过去革委会不掌握他的材料。运动中根据别的厂子提供的一点线索，进行反复调查，基本落实后，就给他交代政策，进行政策攻心战，但这个家伙却交代了一些别的罪行，闭口不谈他参加过“统建会”的问题。为了做到慎重定案，厂革委会又派人到外地去反复调查，进一步证明了他确实参加过“统建会”。调查确实以后，继续发动群众对赵升进行政策攻心战。但这个家伙仍不交代。经过给他摆出证据之后，他才承认自己参加过这个特务外围组织，并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为了做到稳准狠，在和阶级敌人的接触中，严格防止了逼供信。定案处理时，必须做到人证、物证、旁证俱在，防止了阶级敌人利用假口供和其他手段来搅乱我们的视线。同时，也做到了不冤枉一个好人。这个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过去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同时群众认为他是旧北京市委派来的干部，怀疑他是黑线人物，因此运动中把他当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

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他虽然是旧市委派来的干部，但与黑线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有其他的问题。而这个人出身很苦，旧社会曾经要过饭，大家认为他本质上还是好的。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各连队派代表参加的会上，他进行了检查，绝大多数同意解放他。革委会准备还在全厂范围内让他做检查。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毛注)

三、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扩大改造面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他们以出路，让他们重新作人。”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坚决执行了党的这一项政策。在慎重定案的基础上，主动地、不停顿地对阶级敌人进行了狠斗狠批狠揭，从政治上给他们以狠狠的打击；使他们在群众中没有放毒的市场。但在处理上，则本着扩大改造面的政策，酌情从宽；能不押的尽量不押，能不关的尽量不关。对于那些可戴可不戴“帽子”的人，就不给戴“帽子”，而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在群众专政下进行监督改造。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主张的不树敌过多的思想，争取教育了阶级敌人的家属和亲友；第二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有利于进一步弄清他们的问题；第三有利于改造他们，不使他们横了心，与人民顽抗到底，继续危害革命。平印连队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坦白了自己的反革命活动之后，很害怕给他戴上“帽子”关起来。这时革委会和群众就给他交代政策，向他指出：戴不戴“帽子”取决于你是否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否能悔过自新，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重新作人。并把他的家属和亲戚找来，当面指出他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把政策交给他的家属和亲戚，共同促使他坦白交代，争取不戴“帽子”。后来，这个反革命分子又交代了一些罪行，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厂革委会决定不给他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允许他在原车间参加劳动。平时群众发现他稍有不老实之外，就随时对他进行批斗，大家说：“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拿在我们手里，比戴在他的脑瓜上更厉害，只要他不老实，我们随时都可以给他戴上。”

这个厂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戴“帽子”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则坚决给戴上“帽子”，实行群众专政，用这些反面教员来教育群众。

四、就地改造、本厂“消化”，

“包袱”不上交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本着毛主席“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的教导，对一小撮阶级敌人，除那些逃亡地主、富农分子，按政策遣送原籍交当地群众专政外，其余的只要他们不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不论戴“帽子”或者没有戴“帽子”的，都留在本厂，在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事实证明，这些反革命分子最害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群众把揪出来的坏人一般的都安排在原来的连队劳动，有的还适当地、有控制地让他们参加一定的群众活动，如一些批斗会、学习会等等，把他们随时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说：“这样做，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批得上。不仅

改造了他们，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我们。”

这个厂还在一定时期，把这些阶级敌人分别集中起来，进行学习、集训，由基干民兵给他们上课，让他们坦白问题，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最后由群众给他们做出小结鉴定。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说：“现在我体会到了群众专政的威力最大，不交代不行，我看到群众的眼睛就象针扎，再不坦白，不老实，钻进死胡同里就没有出路了。”

五、深挖细找，注意策略，不停顿地打击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挖出了一些阶级敌人以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厂革委会特别注意到阶级斗争的新特点，那就是：一些阶级敌人隐藏得更深、变得更加狡猾了。但是他们坚信，阶级敌人“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因此革委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深挖细找，注意斗争策略。

为了挖掘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厂革委会发动群众，对一些有怀疑的人，大搞“四查”：查来路、查档案、查表现、查历史。在运动中，通过深挖细找，搞出了二十多个原来埋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如日伪国民党特务马春生，过去厂里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这次群众在“四查”中，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他在喝水杯子底上写着“傻马忍耐”四个字。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不是随便写下的四个字，一定有文章。再联系到他许多表现，经过内查外调，终于证实了他是一个罪恶累累的特务分子。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斗争中对掌握了材料或掌握了一定线索的阶级敌人，十分讲究斗争策略。他们采用“引而不发”的办法，使那些没有交代问题的敌人感到压力，惶惶然不安。这样做有效地分化瓦解了敌人，使革委会和群众掌握了更多的对敌斗争的“子弹”。有一个特务分子，本来革委会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这个家伙就是不坦白。在一次对敌斗争的大会上，革委会有意点出已揪出来的敌人的名，并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而没有点他。这个家伙就错误地认为革委会一点也不知道他的问题，还洋洋得意，假装正经。在第二次对敌斗争大会上，群众突然把他揪了出来，打得他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样就使那些还想蒙混过关，抱有幻想的敌人，坐卧不安。有个家伙唯恐革命群众把他揪出从严处理，就一天找革委会六次，交代自己的问题。由于革委会注意了斗争策略，这次大会后十几天内，又有五十多个人不同程度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新华印刷厂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

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毛主席批示：有一点修改。付讨论。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在最近批示中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已经下达。为了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更准确地打击敌人，请各地在对敌斗争中，注意下列各点：

一、应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在对敌斗争中采取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要把斗争的对象都看成铁板一块（上述引文见《毛泽东东选集》第二卷《论政策》）。

二、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中央文革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三、坚持群众专政。实行群众专政，在定案时必须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即由本单位的革命群众联合起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确凿的证据，提出意见，由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关或军管会审核批准。不要用“群众定案”的口号代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四、在被审查的干部中，须区别是已经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是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不要把两类人统称之为“黑帮”、“牛鬼蛇神”。对后一类尚未定性的人，须一分为二，有一部分是未查清的坏人，有一部分是属于“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

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以上各点，其精神都是积极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任务还很重，必须抓紧做好。当前在宣传工作中，特别要注意政策。只要我们进一步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就一定能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对敌斗争的最大胜利。

(这一通知可发到地方厂、矿企业、事业基层单位和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部队的团级（或独立营）党委)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七亿中国人民满怀着胜利的豪情，在热火朝天的斗批、改的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在一片大好形势下，迈步跨入了一九六九年。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宣告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垮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和发生着深刻的革命变化，社会主义的先进事物不断涌现，革命群众的创造和智慧，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各个角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的革命精神，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工农业生产热气腾腾，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不断发展，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更加巩固，更加生气勃勃，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威力更加强大。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出现新的飞跃。

最近我国成功地又爆炸了一颗氢弹，进行了一次新的热核试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丰硕成果。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发展又有了新的飞跃，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美帝、苏修的核威胁、核讹诈政策，对于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大的鼓舞和支持。

所有这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都是亿万革命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一九六九年，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将是光辉的、极其重要的一年。

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九年，全国人民将基本完成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

一九六九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为了实现一九六九年光荣和艰巨的任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用毛主席历来教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去做工作，把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决反对和克服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去夺取新的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林副主席指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各级领导就必须在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切实做到毛主席说的五个“统一”。要进一步实现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

革命委员会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他们失去的权力是决不甘心的，他们还会作垂死的挣扎。他们还会用种种手法，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上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潮，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领导班子里来，干扰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针对着这种情况，我们要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凡是毛主席已经提出的各项最新指示，应经常学习对照，切实执行，反复检查。凡是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都应坚决与之作斗争，绝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只要这样做，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必将彻底失败。

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革命队伍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必须区别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常常用幕后支持某一种错误倾向的做法，混淆两类矛盾，挑动分裂，制造混乱，以达到其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我们必须善于识破这种阴谋。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时时刻刻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如果自己做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脱离群众，就要勇于自我批评。有不同意见，要通过一定民主生活加以讨论，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战胜各种错误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紧紧团结起来。有话要当面讲，及时讲，不要背后讲，不要搞“小动作”。新老干部都要用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拜人民群众为师，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我们要执行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我们要教育和团结绝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包括犯过错误而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好人，包括一切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并且对敌人实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

我们要继续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都要十分注意顾大局。局部利益要服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任何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都会削弱和破坏毛泽东思想的一元化领导，都是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我们的心永远向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向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全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

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斗、批、改，是一个十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担负起领导斗、批、改的繁重任务，特别需要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进一步掌握毛泽东思想，紧紧依靠群众，去组织战斗。

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搞好斗、批、改，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要善于把毛主席的各项最新指示贯彻下去，化为群众的革命实践；要善于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概括和总结，抓好典型。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这些教导办事，我们就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击破阶级敌人的抵抗和破坏，取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因为只有做好了这项工作，把极少数隐藏的敌人挖了出来，才能使阶级阵线分明，才能使斗、批、改的各项任务得到顺利发展。我们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掌握确凿的罪证，使任何狡猾的反革命分子无可遁迹地现出原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一定要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包括“给出路”的这一个无产阶级政策。

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必须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革命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地、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觉悟和水平，根据毛泽东思想随时总结经验，才能够在新的形势下不掉队，并且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前进；而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自以为是地另搞一套的人，必定要犯错误。我们必须结合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结合当前斗、批、改的实际，继续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运动，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使人们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深刻地认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恶。还要结合当前的任务，选学有关的毛主席著作。要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里，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革命作风，反对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不良作风，使全党全军同志和广大革命人民，都把自己的毛泽东思想的觉悟，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觉悟，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越是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国防，随时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侵犯我国的敌人！随时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是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大论战、大搏斗，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

民族的解放斗争，正在再接再厉、蓬蓬勃勃地开展。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反帝、反修和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可以断定，在新的一年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必将取得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胜利！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已经明确规定了的任务完成得更好，用实际行动，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节录）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首都工人阶级贯彻执行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伟大指示，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巨大成果！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毛主席直接关怀下建立的我国第一支工人宣传队。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们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解放军战士的配合下，昂首阔步地开进清华大学，一举登上了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在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八月五日，敬爱的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又亲切地接见了这个工人宣传队的代表。毛主席的巨大关怀，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为他们指引了胜利的航向。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就是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结果。

一月二十五日，当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时，清华园内红旗飘舞，一片欢腾，到处都是醒目的大字标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回顾半年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清华大学的巨大变化，畅谈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收获和体会，莫不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他们和工人宣传队员一起，隆重举行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纵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新华社 1969 年 1 月 28 日讯，载 1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
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
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月二十五日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很好。这个报告是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以来，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来的，不仅对各大专学校，而且对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和单位都很有用。现在把它发给你们，供参考。

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
“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由美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筹建起来的。工人宣传队进校时，在校学生八千一百六十六人，教职员三千九百三十五人，校内工人二千一百六十二人，共计一万四千二百六十三人。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全校一百六十五名处长、部长、系主任、总支书记等中层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八十八是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七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各个教学的基本单位——教研室，几乎全部被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把持着。

我们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进校以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包括“给出路”的这一无产阶级的政策，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争取、团结、教育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在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中，一种是在解放前受资产阶级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种是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总的来看，前一种人比较复杂，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有历史问题的多，有海外关系的多（因为留学的多），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路线和有封、资、修学术思想的多，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后一种人虽然与前一种人有所不同，但长期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教育路

线的毒害，其中多数人也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世界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上建系材测教研组三十九个人，就有二十五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只有三个人家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没有多大问题，却也犯过某些错误。宣传队员扒拉来又扒拉去，觉得都不可靠，都不可信。有的甚至说：“干脆一窝端到农场劳改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的伟大教导，从思想上解决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大多数的问题。同时对他们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如根据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正确对待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本人交代清楚以后，要根据他们的现实表现加以信用；要把一般的海外关系同里通外国区分开来；对一部分学术思想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还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要团结、改造他们；等等。那个曾经被看作是“一窝黑”的材测教研组，我们这样重新考察和分析，发现三十九个人中的大多数还是革命和要革命的，从中选拔了十五名教职员积极分子。讲师刘彤，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但他历次运动中表现不错，工人宣传队进校后他带头斗私、批修，并能大胆揭露其父的罪恶。我们就把他选定为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大力培养他、使用他。与此同时，我们在全校范围内迅速建立起占师生员工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积极分子队伍，通过他们又争取、团结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但是相信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并不能代替对他们的再教育，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深入人心的伟大时代，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的形势下，改造知识分子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几个月来，我们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工作，主要是引导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狠挖隐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宣传队各连普遍组织了作忆苦报告，吃忆苦饭的阶级教育课，不少老工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痛斥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和其它反动谬论，激发师生员工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痛恨刘少奇的阶级感情。基础课讲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深有感触地说：“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工人师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做一个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从此精神振奋，在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表现积极，大胆揭露阶级敌人的罪行。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经常有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不动摇相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基本原则，二是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工作坚持下去，决不让他们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因此，每次出现反复的时候，我们都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一条纲，针对一些知识分子在反复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

一个贫农出身的教师解放前家庭很苦，解放后村子里贫下中农把他送到大学来读书，可是他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把当工程师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不问政治，埋头搞业务，因此，被蒋南翔立为“标兵”。工人宣传队进校

后，对于同工农兵相结合，理论上他说：“这是必经之路”。表现积极。但是，后来当动员知识分子下了农村劳动时、他就想不通了。说什么“十年寒窗苦，为的把名出，早知当农民，何必来读书”。宣传队又反复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使他的觉悟大大提高。他说：“现在才真正认识到我的思想境界是空虚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我一定要痛下决心，把立场转过来，要和工农兵一条心，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最近我们还组织了一部分师生到工厂、农村和工人、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斗、批、改。

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清华大学这个过去被称为有名望的高等学府，许多所谓有“地位”的人物，都把自己的子女送来深造，这样就使得这个学校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别多。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揪斗的有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这些人和其他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区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都以革干子弟自居，自称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在群众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是“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反动儿子混蛋”反动血统论的信奉者。后来老子出了问题，又觉得一落千丈，抬不起头来，有些人甚至有严重的对立情绪。如何对待这些人的问题，是在知识分子中贯彻毛主席的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新课题。

宣传队进校后，有些同志对这部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反感，称他们为“黑种子”，不敢沾边，不重视做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不重视，一小撮阶级敌人很重视，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引入歧途。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女儿——自控系学生刘涛为例，我们进校前后，阶级敌人就曾不断利用写反动信，登门拜访，以交朋友、谈恋爱等各种方式，对她进行引诱和毒害，想把她拉上反革命的道路。类似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争夺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伟大教导，认为宣传队在这场争夺战中，必须打主攻战，加强对这些人的教育工作，争取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几个月来，我们的工作是紧紧围绕着一个“拉”字进行的。我们发动和组织他们参加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帮助他们认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的老子的罪行和错误，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帮助他们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时，我们经常针对他们的问题和活思想，通过大会、小会和谈心活动，向他们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对他们进行热情、耐心、细致、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最终使他们能够做到“划”（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清”（肃清刘少奇和反动老子对自己的影响），“站”（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比如刘涛，我们进校后，及时了解她的活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启发教育她。当发现她有悲观的“宿命论”时，宣传队就给她讲明父母不能由自己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可以自己选择的道理，教育她彻底地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划清界限。当发现她因为一部分群众歧视自己而产生同群众对立的情绪时，老工人又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群众的教导，使她正确看待群众对刘少奇的革命义愤，并自觉地与群众一起批判和声讨刘少奇的罪行。当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党

时，老工人又和她一起学习全会公报，共同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在老工人的帮助下，刘涛写了八份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刘涛毕业离校时，宣传队还同她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谈话，教育、鼓励她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刘涛感动地说：“工人师傅对我的教育，使我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不仅挽救了国家，而且也挽救了我自己。我要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的滔天罪行，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事实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英明指出的，“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我们深深体会到：同敌人争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根本的一条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不论走到那里，遇到什么情况，都有“免疫力”，使敌人现在拉不动他们，将来也不能把他们拉过去。经过我们的工作，现在清华大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除极少数坚持顽固态度外，大多数都有显著进步，表现较好。工化系有六十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人宣传队刚进校时，一片消沉，如今都投入了革命的大批判、对敌斗争的革命群众运动，其中有二十人成了积极分子。如王芹珠的父亲原是一个地委干部，历史上曾叛变革命，运动中被群众揪出后畏罪自杀。王为此曾一度产生悲观情绪，经过教育后，现在不论在大批判中，还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都是敢打敢冲，并积极起来批判反动老子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后来被群众选为班长，发挥了骨干作用。

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清华大学把许多教授、讲师安排在各系的党政领导岗位上，全校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正副总支书记和正副系主任共有九十八人，其中属于“双肩挑”的（即同时担任教学任务）有九十五人。冶金系各教研组支部书记、正副主任以上共有三十四人，“双肩挑”的就有三十三人。这些人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支基本力量。正确处理这些人的问题，是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如工化系主任汪家鼎（三级教授）、基础课总支书记李卓宝，十几年来都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们还重用过一些坏人，并犯有一般右倾言论的错误。过去他们是蒋南翔重用的“红人”，同蒋南翔来往较多。他们在运动中都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斗，群众认为他们是蒋南翔等“一小撮”里的人物，因此两年来谁也没有去考虑要解放他们。

宣传队遵照毛主席“对于人的处理问题要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的伟大教导和“一二·一”“一二·二六”重要批示精神，首先，引导革命师生员工在深入批判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为他们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又都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十几年来他们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也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因此，不能算是坏人。

其次，在最后处理他们的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注意分寸，运动中革命群众起来大闹一批，上纲上线，是完全必要的，对他们是有益的。但定案落实的时候，就要慎重甄别情节的真实程度和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这里特别要区分如下四种情况：（1）把工作关系上的来往同蒋南翔等一小撮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来；（2）把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同蒋南翔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力推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恶活动区别

开来；（3）把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布的一般右倾言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区别开来；（4）把由于不突出政治，坚持业务第一而重用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少数坏人）同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区别开来。经过群众分析研究，认为他们是属于前者，即犯了走资本主义错误的人，而不属于后者，即一小撮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家。

对于这些人，态度很重要，改悔与不改悔关键在于对自己的问题和群众的批判抱什么态度。汪家鼎在工人宣传队进校后，能主动斗私批修，找宣传队和革命群众汇报活思想，找对自己意见大的师生征求意见达五十余次。能够彻底检查批判自己的问题；能够正确对待和诚恳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能够同蒋南翔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能够大胆揭发别人，在实践中确有改悔的表现。他在批判自己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因此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但是李卓宝由于抱着过关的思想，连续检查了两次，群众都没有通过，不过群众仍然坚持一方面对其错误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充分地给她留有觉悟的机会。后来，李卓宝在群众的批判、教育下，有了觉悟，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她痛哭流涕地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从泥坑中挽救过来，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今后，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对于他们两个人以及类似这样的人，群众还打算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按其专业特长，给予适当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继续考察他们，教育他们。

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

在清华大学被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大小小有一百余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十四人。

这些人不是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在学术领域内大搞封、资、修和“三脱离”的一套货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重要支柱。由于他们长期受蒋南翔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重用和吹捧，占据要位。他们人数不多，流毒很广，影响较大。其中原土建系主任、一级教授、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原副校长、一级教授、机械学反动权威刘仙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曾任副校长、一级教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被撤销一切职务，降为三级教授，一九六一年摘帽）尤其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政治上是不那么香了，但也不是那么臭。有些师生还把这些人比作臭豆腐，说“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政治上臭，业务上香”；另有一些人则主张将这些人全部来个“吹灯拔蜡”，当作“废物”处理算了。

宣传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教导，选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三个典型，发动师生员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他们的要害问题，紧紧围绕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集中批判了他们的学术是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这样就打中了要害，充分揭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肃清他们的流毒，使他们没有放毒的市场。使师生员工受到了很大教育，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伟大真理。有的人说：“现在再来看他们那一套货色，就不是‘臭豆腐’，而是‘臭狗屎’了。”

同时，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一是在批判中，要注意把他们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区别开来。可以背靠背地批，在面对面批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坐在凳

子上听，要重在触及灵魂。刘仙洲说：“虽然让我坐着，却如坐针毡。”二是在批了之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了，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个别部分上还有用，应有所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着作反面教员。对他们的生活不要太苛刻。对于准备用的人，要多给他们创造锻炼改造的条件，钱伟长要求下工厂劳动改造，十一月份开始就让他同一部分师生到特钢厂劳动，最近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旧思想同新时代的矛盾，我如果不走这样一条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从政治思想到生活习惯上同时代格格不入，好象辛亥革命后的满清遗老一样，发展下去太危险了。”他表示要一边劳动锻炼，一边研究教改问题。

宣传队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字当头、给予出路的处理，不仅使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受到了很大教育，表示要在晚年多为社会主义出把力，也使其他不少老教授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他们感到有了奔头，也活跃起来了，主动清理自己的问题，表示要争取“一批、二用”。

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

混在清华大学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有两点值得注意：

(1)历史的多，现行的少。所谓历史的，即解放前参加特务组织、反动党团和担任敌伪官员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既无联系，又无活动了（个别人也有现行问题）。所谓现行的即披着学者外衣从事特务活动和进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家伙，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两种人在教授和一部分讲师中属于前者的占多数。(2)他们多是一些搞理工科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掌握某些有用的学识和专长，如数理化知识和外语能力等。在他们“一清二批”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酌情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服务。

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和分析出发，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在发动群众狠揭狠批和搞好内查外调工作的基础上，普遍开展政策攻心战，给他们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在他们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代和决心重新做人之后，则给予从宽处理，能不捉的尽量不捉，能不戴帽子的尽量不戴，给他们以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机会，借以立功自赎。去年十二月五日以来，全校开了三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从宽处理了教职员中包括历史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叛国分子在内的五个反革命分子。这五个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要戴帽子是完全够格的。但是，在毛主席的“给出路”政策的感召和革命群众强大的政策攻心战的压力下，他们能够低头认罪，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态度较好，宣传队便决定不给他们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只是因为他们问题轻重、态度好坏还有差别，决定对其中三人仍然实行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对于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狠狠打击。如直至去年三月还为美帝国主义送情报的现行特务王振通，拒不交代罪行的历史反革命刘玉泉都经过群众路线，给予严惩。我们还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充分利用每次大会以后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矛盾、动摇心理，不失时机地展开群众性的政策攻心战，使一小撮阶级敌人迅速分化、瓦解。有的说：“现在出路给摆出来了，我要‘竹筒倒豆子’，争取从宽处理。”结果三次大会有一千零六十五人坦白交代问题，其中交代重大问题的一百四十七人，从而大大扩大了坦白面和教育面。正是：宽严了几个，争取了几百，动摇了敌人的堡垒，把极少数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驱逐到狭小

的孤立的阵地上去”。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抗拒的威力。

首都工人 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解放军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

〔附〕 清华大学推翻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欺上压下的假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清华大学党委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排除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围绕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地进行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继今年年初推翻迟群等人制造的所谓“反复辟回潮”和“清查反革命”这两起株连千人的政治迫害案之后，又于今年五月大张旗鼓地揭批了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欺骗毛主席，镇压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假报告，推翻了他们制造的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冤案、假案和错案，为受害者恢复了名誉，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拥护，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和清理，这方面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插手清华。他们通过其党羽蒯大富和迟群等人先后把持了清华的领导权。这些家伙为了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疯狂鼓吹“黑线专政”、“彻底砸烂”等谬论，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破坏毛主席的审干方针和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中，不到六千教职工的清华大学，被他们立案审查的达一千二百二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一百七十八人。加上清查“五·一六”、所谓“反复辟回潮”和所谓“清查反革命”运动中受冲击批判的两千人，全校受立案审查和冲击批判的，竟占教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粗暴破坏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的所谓“审查”，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阶级阵线被搞乱，革命队伍被分裂，党的威信受到损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制，教育革命遭到严重摧残。迟群等人为了掩人耳目，要尽了反革命的伎俩。一九六九年一月，他们炮制的那个题为《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就是弄虚作假、谎报情况、欺上压下的一个代表作。

迟群等人拼凑的那个报告，除了一段开场白之外，还分别从如何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怎样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教育工作”、如何“及时解放”所谓“走资派”，怎样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给以出路”，以及所谓“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等五个方面，煞有介事地总结了一番“经验”。其实，这都是弥天大谎。报告中用的材料，除了“可教子女”部分有一个人属于真正的“可教子女”外，其余的人和事（包括“可教子女”部分的其他材料），统统是编造的。比如，为了标榜他们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报告的

第一部分举了原土建系材测教研组教师刘彤的例子，说什么“讲师刘彤，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但她在历次运动中表现不错，……我们就把她选定为积极分子”。其实，刘彤并不是讲师，也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并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更没有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根本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假报告一宣读，刘彤哭笑不得，要求迟群等人更正。但迟群一伙不但不理，反而在清队中以“报告”上写了的为根据，硬是把刘彤的父亲定为“敌我矛盾”。又如，迟群一伙为了证明其“再教育”的“威力”，在报告中写道：“基础课讲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宣读报告的当时，赵静安立即向迟群等人申明这不是他的事。迟群怕露马脚，当即派人对他进行围攻，压他承认确有其事。他们说：“清华那么多教师，选你为教育好的典型，报告里写上了你的名字，你应该感到高兴”。赵静安不领这个情，他们就再三追问赵静安有没有成名成家这类思想，甚至“启发”他过去曾想当个什么“家”没有。赵静安只得如实回答：“在中学的时候想将来当个科学家。”他们如获至宝，说：“那就对啦，虽然话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于是，他们给赵静安规定了两条：第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这话虽未讲过，但这和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必须承认。第二，从此以后，这件事不准向任何人讲。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就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就要开除党籍。如此弄虚作假的事例，在报告的各个部分比比皆是。为了证明他们落实政策“好”，迟群等人采取栽赃诬陷、无限上纲的手法，先给干部和知识分子扣上“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然后造谣诬蔑广大群众和工宣队员不讲政策，最后把自己打扮成“唯一正确”的“救世主”。为了吹嘘自己工作的“成绩”，他们虚构编造了曲折离奇、耸人听闻的情节，丑化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欺上和压下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迟群等人向上送了假报告，对下就采取威吓压制的手段，任何人都不准说半个“不”字。被迟群等人作为典型写在报告里加以诬陷的许多同志，长期以来有口难辩，有苦难诉，有冤难伸。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不少干部群众要求推翻这个流毒全国的假报告，揭露迟群等人欺骗毛主席的罪行，但某些人以“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拒不理解。改组后的新党委，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肯定了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校党委认为，迟群等人出于反革命的需要，用许多纯属捏造和诬陷的材料拼凑起来的假报告，流毒全国，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如果再不予以澄清、纠正，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要继续受到压抑。借口上了文件，明知有错也不改正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是对党不负责任，也是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把那些虚假不实、违背群众利益因而也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正是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因此，校党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揭批迟群等人炮制假报告的罪行及其险恶用心。

编造假报告首先是为了 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投机

大家指出，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即打着他们是“毛主席的两个兵”的旗号，在清华大学胡作非为半年之后，抛出这份假报告，决不是偶然的。他们到清华大学以后，按照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无休止地搞斗争，随心所欲地审查立案、批斗关押。清队两个月，就逼死人命十多条。他们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正是其主子林彪、“四人帮”在全国捣乱破坏的缩影。针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及其所造成的恶果，毛主席及时发出

一系列正确对待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指示，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反复强调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并且严厉斥责了林彪、“四人帮”草菅人命、把人往死里整的反动政策，指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迟群等人不仅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反而把毛主席指示的发表，当作他们的政治上发迹的好时机。他们接过毛主席的指示，编造了这份假报告，把自己装扮成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英雄，掩盖自己的罪行，进行反革命政治投机、以求政治上的发迹。为此，迟群等人采取了极其卑鄙的手法。例如，假报告中反复提到的作为落实政策好的典型单位化工系，本来是迟群等人在清华大学搞清队扩大化的典型。他们在该系大搞反革命的逼、供、信，给这个系两位党总支副书记扣上所谓“三反分子”、“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致使这两个好同志在几天之内相继含恨死去。可是，迟群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样一个扩大打击面，大搞逼、供、信的典型，作为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典型，欺骗毛主席。“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政治无诚实可言”，林彪和一切阴谋家、野心家的这些信条，迟群确实是学到家了。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愤怒地说：吹牛撒谎搞欺骗，是一切阴谋家、野心家的共同手腕。野心家迟群等人正是靠了反革命的欺骗术，捞了一大笔政治资本而身价百倍、名噪一时的。但欺骗终究是纸糊的老虎，最终还是露出了原形。

假报告是为了给以后炮制反革命的 “两个估计”造舆论、作准备

大家在揭批中着重指出，迟群一伙在假报告中摘取毛主席的片言只语，加以篡改歪曲，塞进了林彪、“四人帮”的“黑线专政”、“彻底砸烂”的私货，使假报告成了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否定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代表作。假报告一开头就断言：清华大学“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像十分严重”。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他们竟说：“各个教学的基础单位——教研室，几乎全部被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把持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大小小有一百余”，“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十四人”，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校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正副总支书记和正副系主任共有九十八人，其中属于‘双肩挑’的有九十五人”，他们“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支基本力量”。这样一来，清华大学不仅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都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动权威”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所有中上层干部和大量既挑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担子，又挑业务工作担子的又红又专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成了“走资派”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力量”。清华大学简直是漆黑一团。更有甚者，假报告在讲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时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揪斗的有一千四百二十四人”，从而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们先是按照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把大批老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尔后再把这些人的子女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有这些跟事实完全相反的估计，正是两年半以后，迟群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炮制反动的“两个估计”的依据。假报告就是“两个估计”的一次预演。

炮制假报告是为了在合法外衣下，
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推行林彪、
“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

假报告出笼后，迟群等人迫不及待地炮制了一个“经验介绍材料”向全国各地兜售。在这过程中，他们强迫假报告中所提到的典型人物按照他们编造的“供词”现身说法。比如，假报告中作为“可教子女”典型的化工系教师王芹珠，她的父亲明明是被浙江的翁森鹤一伙迫害致死的革命干部，但因为迟群等人在材料中已把王芹珠定为“可教子女”，就逼迫她承认“父亲是叛徒”，王芹珠想不通，他们又强令她参加“可教子女”学习班，指使人为她改发言稿，直到改成第一句“我父亲是叛徒”才罢休。王芹珠不愿照念这违心的话。迟群一伙对她痛斥一番之后，背着她把发言稿拿去印发全国，借王芹珠之名，进一步诬陷革命干部。浙江的翁森鹤一伙拿到这份材料，又作为给王芹珠父亲定案的依据，进一步打击迫害与王芹珠的父亲有过工作关系的许多干部。

在迟群等人的假报告欺骗得逞，得势于一时的日子里，迟群等人简直成了清华园的大恶霸、教育战线的太上皇。他们横行无忌，无恶不作。很多好干部、好同志被他们强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党籍，停止工作，关进牢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所谓罗文李饶案件，原是反革命坏头头蒯大富制造的假案，后来迟群接过来大整特整，先后整了十年，迫害了二十多人，逼死三条人命。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一九五四年冲破帝国主义的禁令回国的华侨、电子系教师王振通，一九六八年四月被蒯大富加上“特务”的罪名，施以种种酷刑。后来，迟群等人接过这份诬陷材料，不由分说，把王振通投进监狱，并且在假报告中列为从严处理的典型。直至一九七一年、周总理过问此事，王振通才得释放。但迟群等人以上了“报告”为由，拒不为王振通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揭发迟群等人的这些罪行，怒不可遏地说：迟群等人开口不离毛主席语录，但他们干的是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勾当。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清华大学这次深揭狠批迟群等人的罪行，真正维护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真正高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在广大干部和群众揭发批判的基础上，校党委于五月十二日在全校范围内宣布了《关于推翻迟群等人制造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错案的决定》，明确指出，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报告，是捏造罪名，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假报告。决定明确宣布，这个假报告中制造的一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原结论和有关的调查材料以及本人所写的材料，一律不入个人档案，全部由组织统一销毁。这些同志在审查期间被查抄的私人笔记、信件、照片和其他私人物品，尽快清理，退还本人。向这些同志受株连的子女、亲友的所在单位组织说明情况，消除影响。校党委的这个决定一宣布，广大干部、群众激动地感激华主席给清华园送来了毛主席的政策，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一再表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 1978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北京市化工三厂整党调查报告

(一九六九年二月)

化工三厂是一九五六年由九十六个私营小厂合并成的，后来发展为以生产塑料助剂为主的工厂。整党前，有共产党员一百一十七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党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的帮助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于一九六八年二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三月中旬，建立了整党领导小组。

他们始终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为纲，充分发动群众，以革命的方法实行开门整风。

整党中，清除了极少数混入党内的坏人，教育了广大党员，发展了十六名新党员。经过整党，党员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党群关系空前密切，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了。

把粉碎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公私合营后，留在这个厂里的上百个资本家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时刻梦想复辟。党内走资派与他们打得火热，竟把一小撮坏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有的甚至被拉进党里。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竭力推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老工人气愤地说：化工三厂，过去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整党首先要深入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和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把粉碎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钻进党内的坏人，有的是隐瞒了政治面目混进来的，有的是被党内走资派明目张胆地拉进来的。这个厂的走资派，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胡说什么“发展工人入党，只是多一个劳动力”，叫嚷要发展所谓“能踢会咬的人”。他们喜欢发展那些所谓有“管理经验”的人、“技术尖子”。有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他的问题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走资派却说，“他管理能力强，生产上是骨干，不入党不方便”，不顾工人反对，硬把这个个人拉入党内，他们甚至吸收能为自己谋私利的人入党。有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爬上行政科的负责岗位后，对工人吹胡子瞪眼，而对走资派却逢迎讨好，走资派认为他“办事办得好”，就指定发展他人入党。这样，造成了党组织不纯的现象。

部队支左人员和整党领导小组，认识到要把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需正确掌握政策。他们注意核实工作，实事求是地多方查证。在定性处理工作时，他们开办了学习班，把政策交给群众，深入进行讨论。遵照毛主席关于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指示，他们注意以下几条界限：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看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二、看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比如，是搞反革命活动，招降纳叛，恶毒攻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还是由于世界观没改造，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作中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重用了坏人，散布了一般右倾言论。三、看悔改的态度，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还是翻然悔悟、弃旧图新。他们正在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区别对待，进行不同的处理。对犯错误的好人，一看二帮，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根据毛主席的“清除废料”的教导，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劝其退党。

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广大党员进行再教育

这个厂的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由于党内走资派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行黑《修养》，使不少党员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中了流毒，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不清，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有的同志对怎样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政治方向不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整党领导小组遵照这一教导，狠抓思想教育，举办了有党员和革命群众参加的整党学习班和业余学习班，全厂开展大学习、大批判，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员进行思想整顿。

他们在思想教育中，引导党员划清以下几条界限：

一、划清两个阶级的界限。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忆苦思甜，批判“阶级调和论”，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这个厂的走资派过去竭力模糊阶级界限，把反动的资本家封为所谓“红色老管家”，说什么“化工三厂是一家，你爱我来我爱他”，公然要工人、党员与反动的资本家结成“一帮一、一对红”。整党学习班请老工人忆苦，激发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阶级义愤，使党员认识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才能革命到底。

二、划清两条路线的界限。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驯服工具论”，肃清党员中不问政治、埋头生产的思想，肃清不分路线、“听话好就是好党员”的错误思想。引导党员反复用毛主席的“五十个字”的建党纲领对照，检查自己，深入开展“三忠于”活动，树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

三、划清公与私两种世界观的界限。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深入开展斗私批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公私溶化论”、“入党作官论”，树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四、划清对待群众的两种作风的界限。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肃清“党员高人一等”的错误思想。坚持开门整党，不搞闭门思过。让革命群众参加整党的各种会议，对党员和党组织提出批评建议；让党员到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自觉地检查错误，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这样做，深刻地触及了党员的灵魂，密切了党群关系。

经过思想整顿，党员深刻认识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纷纷表示：

无限忠于毛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一辈子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党员。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干革命的，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从此，他们积极学习、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干革命。下面是一个例子：

一个共产党员，过去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文化大革命中一度错保了走资派。整党中她深刻地认识到，千错万错就是错在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经过整党，她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发现和她原来在同一群众组织的一个人行动诡秘，立即向部队支左人员反映。经过查实，她在全厂的群众大会上挺身而出，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她还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一员闯将，最近被评为全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一个共产党员、生产组长，过去认为“只要生产好，就是好党员”，生产上不去，她只从工艺、设备、原料上找问题；现在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从思想上找差距，解决了小组长期不团结的问题。组里同志思想革命化，带动了技术革命，使二辛酯日产量由去年的四吨多，上升到十一吨多。这个组被树为全厂学习的榜样。

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是全厂有名的“老好人”，对人对事都是“好好好，是是是”，对坏事不揭发，对坏人不斗争。在整党中，经过耐心的帮助，他痛下决心，登门拜访，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现在，他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动组织大批判会，带头发言。听到错误意见，敢于抵制。群众说他“好象换了个人”，最近被评为五好工人。

一些犯有比较严重错误的同志，原来抱着消极挨整的态度。有的群众对他们也不谅解，说“你出党算了”。整党领导小组坚持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他们的错误，一方面，热情地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原供销科支部书记，脱离群众，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在整党中，经过群众的多次批评帮助，思想触动比较深，他带病多次到群众中斗私批修，深刻检查自己，终于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他激动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他热泪盈眶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经过耐心教育，这些同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重新焕发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总之，经过思想整顿，党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党员，由埋头生产，变成了阶级斗争中的闯将；由突出技术，变成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先进分子；由群众的“上司”，变成群众的小学生；由“老好人”，变成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畏战士。

吸收新鲜血液，促进党组织更加朝气蓬勃

在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的基础上，一九六八年九月，建立了全厂党的领导小组和车间党支部。他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的指示，吸收了一批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共产党员参加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在吸收新党员的过程中，克服了有的同志存在的保守思想，坚决执行“积极慎重”的方针，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第一批十名新党员，家庭出身好，政治觉悟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挺身而出。入党后，他们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处处以身作则，有七名被评为全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最近，这个厂又发展了六名新党员。

党的领导小组和车间党支部共有领导成员二十四名。有两名军代表参加全厂的领导工作，他们带来了解放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的好传统。其他二十二人中有十四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解放前入党的有两人，其余是解放后的，有六人是一九六二年后入党的，全部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平均年龄三十四岁，最年轻的二十六岁。最近从工人中选拔三名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小组。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干劲，有朝气。新的领导班子在组织上实行一元化，革委会常委会（都是正式党员）就是党的领导小组，各连（车间）指导员担任党支部书记。最根本的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实现一元化的领导。

旧的领导班子某些成员，反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新的领导成员是全厂“三忠于”、“四无限”的模范，狠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在前头，用在前头。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战斗号令。

旧的领导班子某些成员，不仅自己很少参加劳动，而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使脱产人员达到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新的领导成员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多数跟班劳动，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定期参加劳动。他们和工人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

旧的领导班子某些成员，鼓吹“压力变动力”的谬论，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新的领导班子有事同群众商量，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一位工人出身的支部书记深有体会地说：对同志是否极端热忱，是有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表现。党组织越关心群众，群众革命积极性越高。

新的领导班子，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他们已经进行了三次开门整风。

去年五月，第一次整风，着重解决领导班子中个别成员闹小团体主义造成不团结的问题。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查小团体主义的危害，挖灵魂深处的私根，批判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大家认识到，只有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的教导，才能永远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

第二次整风是在去年九月，解决有的领导成员忙于抓事务、抓生产，忽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在整风中，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伟大教导，学习了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一系列指示，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整风会上，老工人手捧毛主席的红宝书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命根子，你们可千万别忘了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啊！”大家认识到，东抓西抓，首先要抓自身的思想革命化。要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经过整风，他们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跟得更紧了，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更快了。

去年十二月，第三次整风。着重解决有的成员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和个别原来当过干部的成员有“怕”字的问题。他们反复学习了“老三篇”和毛主席关于“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教导，同时，进行忆苦思甜，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组织工人检查组，检查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工人的诚恳批评和忆苦教育，深深地触及了领导成员的灵魂。他们都沉痛地做了自我批评，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提高了集体的战斗力。一位老工人说：“过去，党总支的门，我没有进过一次；现在，把我们请上门，帮助整风，这样革命化的领导班子，我们就是拥护。”

这个厂的领导班子，已成为全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指挥部，党组织

已经成为带领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这个厂，生产蒸蒸日上，去年提前三十三天全面完成生产任务；今年一月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百分之三十八。目前，全厂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正在创造新的优异成绩，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几 点 体 会

驻这个厂的部队支左人员和党的领导小组认为：

(一)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整党工作，从始至终要狠抓两条路线斗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地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有明确的方向。

(二)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整党建党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关键是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群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样做，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保证整党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遵照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处理整党中的各种问题。整党过程中，运用斗争哲学，不搞和平整党；在斗争中，要引导党内外群众严格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威力。

(四) 把整党和建党紧密结合起来，克服保守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吸收新鲜血液”的指示，才能防止复旧，使党组织朝气蓬勃。

(五) 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经常整风，可以端正政治方向，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使党组织永远成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堡垒。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苏联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 地区制造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 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苏联政府却硬说中国领土珍宝岛是属于苏联的，反诬中国边防军侵入苏联领土，并且公布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所谓“抗议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就是根据沙俄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长期以来都一直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有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巡逻。苏联的所谓“抗议照会”，是苏修叛徒集团的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是它继承沙俄帝国主义的衣钵，推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强盗逻辑。中国政府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向苏联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揭露了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真相。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三月二日九时十七分，苏联边防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四辆装甲车和汽车，公然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对正在执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进行猖狂挑衅，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次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

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于北京

(新华社 1969 年 3 月 3 日讯，载 3 月 3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通 知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

最近发现，有的地区某些同志阻碍新华社记者向中央反映情况，甚至强行搜查新华社记者向中央写的“内参”稿件。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记者在内，都有权直接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和中央文革反映当地的情况和问题。新华社记者担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积极地准确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映情况。对他们的工作，当地革命委员会和派驻新华社分社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都应当积极支持。做错了，可以批评。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可以报告中央和中央文革，而不要阻碍他们向中央反映情况。决不允许任何人封锁中央。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各级领导同志更应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特别注意倾听工农兵广大革命群众的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决不可忽视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发出的《重要通知》中，规定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在地方工作时应遵守的原则。现在中央重申：这个规定继续有效。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转发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吸收部分干部 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

现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吸收部分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供参考。中央同意报告中采取的措施，这是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一个有效方法。你们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否这样做，以及关于整个工宣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问题，望作调查研究后报告中央。

关于上海吸收部分干部 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上海进驻各条战线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有十多万人。在这支队伍中，我们有意识地吸收了一部分解放了或结合了的，但“腰杆子还不硬”的基层干部参加。参加的人数，有的占队员总数百分之三到四，有的占百分之六到七，有的则更多些。全市有几千个干部参加了工人宣传队。

最近，我们调查了进驻一个单位工宣队的情况。这个工宣队共有队员二百三十九人，其中有干部九人，占队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八。

这九个干部中，有一个是工业公司的原党委书记，其余都是工厂车间和科室的基层干部，都是犯过错误的好人。除一个是学生出身外、都是工人出身，有七个是二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他们在旧社会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凌辱。解放后，怀着强烈的翻身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脱产当了干部，工作勤勤恳恳。但是由于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离开群众远了，架子大了，指手划脚多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

这些干部虽然已经解放，但多数未被结合，他们情绪灰溜溜，见人矮三分，抱着“只求解放，不求结合”“有了面子，不要位子”的态度，决心从此“掼掉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准时跑，省得再检讨”。有个别的虽已结合，但是“怕”字当头，劲头不足。

当他们听到要参加工宣队时，感到很兴奋，认为“毛主席支持工宣队，能参加这支队伍，是最大的光荣”，“是革命造反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

从去年九月份以来，他们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丢掉了脱离群众的官架子，换上了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武装起来的头脑子”，精神面貌起了显著变化：

第一、大大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这些干部在运动初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后又靠边劳动，考虑个人的问题多，关心国家大事少，落后于形势一大段。参加工宣队后，以一个战斗员的身份投入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接受再教育，使他们深深认识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说：“原来这套领导班子，是挂着共产党牌子的国民党班子，国民党来了，只要换块牌子，不要换班子。不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就会丢掉政权”。原化学纤维公司党委书记周彦朋，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为自己订了“约法三章”：经济上不贪污盗窃；生活上不腐化堕落；思想上不追求名利。“三不”的“关”总算“把住”了，为啥在这次运动中会犯路线错误？经过在工宣队的几个月锻炼，他认识到，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搞“三不”，离开了阶级斗争的现实去“修身养性”，就是中了刘少奇黑《修养》的毒。进入工宣队之前，他最怕处理群众中的两派问题，认为“弄得不好，就要犯路线错误，还是离得远点好。”通过解决这个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问题，深切体会到，“不管问题多么复杂，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是不难解决的。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象火车脱轨，势必走上歪路”。

第二、群众观点大大加强。过去认为自己高明，群众落后，对群众不相信，不依靠。现在同群众一起战斗，才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上海第三毛纺厂纺部车间副主任成招娣，刚当干部时，还经常在车间劳动，群众亲切地称她“成大姐”。可是，干部当长了，办公室坐久了，到群众中去少了，群众称她“成主任”了，说她“手上的厚茧退了，思想感情变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想不通，怨群众对她不谅解。参加工宣队后，当了普通队员，在群众斗争中经受锻炼，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无穷，群众运动的威力无比。她想到自己十三岁进厂当童工，吃过资本家的苦头，挨过拿摩温（工头）的拳头。但是当干部后，中了“群众落后论”的毒，

脱离了群众，忘了本，这就是犯错误的根。于是，她在工宣队中更紧密地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发挥了骨干作用，受到群众的赞扬。

第三、对革命造反派的感情从疏到亲，从怨到爱，从不服气到虚心学习、互相信任。上海第三毛纺厂原党委组织科副科长孙瑞康，在运动初期由于整群众的材料，受到群众的批斗，内心抵触，看到斗他的人就有气。经过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还是疙疙瘩瘩。参加工宣队后，目睹革命群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动事迹，不为名不为利，没日没夜地干工作，全心全意地干革命，特别是对他批判得最厉害的革命群众，现在和他一起工作，对他毫无芥蒂，热情支持、帮助，使他深受教育。他意识到自己过去错把战友当冤家，真是太不应该了。“把仇恨算在刘少奇的头上，把教训记在自己的心上，把进步归于毛泽东思想的抚育和战友的帮助下”，这是孙瑞康的深切体会。从此，他和革命群众紧紧团结、战斗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第四、最主要的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他们说，过去千错万错，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紧跟毛主席。现在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一切紧跟毛主席。国棉十七厂车间支部书记沈静珍，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情绪低沉，决心不当干部。参加工宣队后，开始时当一般队员，她很高兴，后来要她担任连队的副指导员，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这时，她带着问题活学活用“老三篇”，认识到只能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为革命，决不能因为在运动中被批判了一下就对革命三心二意。从此，积极担负连队工作，抓连队的思想建设。这个连队成为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四好连队。

这九个干部在几个月的斗争实践中，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怕”字少了，“敢”字多了。他们分别担任了工宣队团政委、副政委、连正副政治指导员、正副班长。他们已经成为工宣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广大队员说：“老干部参加工宣队，很有好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觉得有意识地吸收适当数量的干部参加工宣队，是对干部进行重新教育的一个途径，也是交流干部的一种好办法。我们打算以后逐步轮换，以扩大对干部的教育面。本市纺织工业局革委会组织工宣队进驻国棉九厂、二十二厂、二十八厂，因这些厂缺少可以结合的干部，当工宣队撤离时，就把参加工宣队的个别干部留下来，结合到厂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以后在其他单位，如果需要，我们也考虑用这种办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委会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

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迅速 改变南口厂“老大难”面貌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

八三四一部队对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实行军管三个多月以来，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已使这个“老大难”单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深入

人心；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重大胜利，阶级敌人日益孤立；革命群众空前团结。革命带动了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今年在夺得元月份“开门红”的基础上，又提前超额完成了二月份生产任务，产值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蓬勃发展，三个多月来共完成了七十八项，突破了不少过去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长期不能解决的难关。

南口厂是个具有六十三年历史的老厂，现有职工三千多人，连家属共一万人。南口镇是军事要塞，解放前反动统治很严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都先后在这里建立过各种特务组织，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一个所谓模范区。建国十九年来，这个厂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吕正操的直接控制和把持下，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务、叛徒和国民党残渣余孽仍然受到重用，其中许多人混入党内，有一些还篡夺了我们各级领导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资产阶级派性作怪，无政府主义泛滥，变成了“老大难”单位，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不能贯彻落实，阶级阵线严重不清。

对这样一个“老大难”单位怎样才能迅速改变面貌呢？军管会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狠抓一个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事情千头万绪，矛盾错综复杂，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到底抓什么？

军管会进厂后狠抓了宣传、学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这个根本，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反动的“多中心论”在南口厂很严重，广大群众不能及时地、原原本本地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有些人甚至对最高指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针对这种情况，军管会把宣传、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心的中心来抓。在具体做法上强调一个“快”字，突出一个“用”字。

（一）强调一个“快”字。

军管会对毛主席的每一条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个新的战斗号令，都做到“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漏人，贯彻不走样，紧跟不掉队”。军管会进厂时，正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开过不久，就把全会公报送给职工，人手一册。全厂连续召开八次大会，传达了全会精神。第一个星期天，军管人员全体出动，组成宣传小组，走访了二百零九户职工家属，宣传十二中全会精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二）突出一个“用”字。

军管会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做到三个结合：

1、把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学习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结合起来。在学习毛主席“一二·一”批示时，军管会就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相信大多数”的论述，以及《论政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大家认识到：“相信大多数”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其基本精神就是“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和“给出路”，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队伍和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广大革命群众领会了最高最新指示的精神实质，大大提高了执行最新指示的自觉性，人人争当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好学员，党的政策的宣传员，敌情线索的调查员，对敌斗争的战斗员。

2、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本单位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毛主席的每个最新指示一下来，

军管会就立刻把它作为镜子，找差距，挖根源，订措施，推动各项工作的完成。毛主席关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条最新指示发表后，军管会就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并联系本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广大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军管会针对南口厂革命大联合没有巩固、资产阶级派性经常表现出它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并不断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个现实，一方面选择了毛主席的有关最新指示，组织大家反复学，反复用，人人讲，天天讲，使大家养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另一方面广泛开展三忆、三看、三查活动（忆旧社会的苦，看新社会的甜，查自己的阶级立场；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正确，查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历史责任，看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关怀和信任，查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从根本上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铸工车间工人回永祥和鲁金玉，过去关系一直较好，运动中分成了两派，吵得狠，打得凶，成了“一对崩”；通过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一起忆苦思甜，一起进行革命大批判，一起谈心，最后他们两个一起向毛主席表忠心，结成了对敌斗争火线上的“一对红”。全厂大多数群众从思想上巩固了革命大联合，保证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落实。

3、学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革命大批判相结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革命大批判的有力武器，而革命大批判的过程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过程。遵照毛主席“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教导，军管会及时组织革命群众抓住本厂的“活靶子”，狠批刘少奇及其在南口厂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头脑中牢牢扎根。揪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康克（原党委书记）后，全厂立即掀起了群众性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两个多月中，仅面对面的批判会就开了五十六次。大家越批对阶级敌人越恨，越批对毛主席越亲，对毛泽东思想越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越忠。广大群众深有体会地说：过去南口厂成为“老大难”，千难万难，就难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没有得到落实，今天毛泽东思想统帅了一切，就什么都不难了。

狠抓一个核心：正确对待群众和两派群众组织

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核心，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焦点，也是“三支”“两军”工作成败的重要关键。南口厂军管会在支工中，一直把这个问题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来抓。

（一）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

军管会进厂以后，一部分群众表示高兴，态度热情，主动反映情况；而另一部分群众由于一时对成立革委会后还实行军管不理解，表示冷淡，态度消极。少数有极“左”思想的人，在一小撮坏人的煽动下，对军管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军代表曾一度出现了以热对热，以冷对冷，以感情代替政策的现象。军管会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苗头，发展下去必定要犯“支一派”、“压一派”的大错误。于是就拿出一段时间，带着这些问题，集中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进行了火线整风，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教导，军管会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南口厂原两大派“621”和“622”之间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之间是与非的矛盾。在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有成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都混进了一些坏人，

就其整个组织来说，大多数群众都是革命的，拥护毛主席的，大方向都是正确的，因此，军管会分别做工作后，明确表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在进厂三个多月的斗争中，对南口厂广大群众和两派群众组织，军管会始终坚持“三条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耐心帮助他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坚决把他揪出来，斗倒，斗臭，按照党的政策，区别对待，给予出路。为了切实贯彻这“三条原则”，军管会又坚持了“九个一样”：即对军管会热情和冷淡的都一样去谈心；对顺耳和逆耳的话都一样去听；对两派组织的群众都一样去依靠；对两派组织的积极分子都一样信任、使用；对两派组织反映的情况都一样重视；对两派组织的优点都一样去表扬；对两派组织的缺点都一样去帮助；对两派组织的家属都一样去走访；对混进两派组织的坏人都一样去清理。

在揪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康克后，两派的少数群众都曾暴露出资产阶级派性，反对康克的一派认为，两年文化大革命没白干，翘尾巴；另一派却认为，两年文化大革命白干了，不服气。对此，军管会及时进行了引导，反复宣传：“不管走资派支持那一派，都是假的，而保护他们自己则是真的”。群众深受教育，都表示：什么你的后台我的后台，凡是坏家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

（二）当宣传员，不当裁判员。

南口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反复复，有很多问题两派长期纠缠不清，有的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究竟谁对。军管会对这些问题不是当裁判员，而是作毛泽东思想传宣员，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军管会刚进厂时曾遇到一个所谓“二百人武斗暗杀集团”的难题，军管会除了自己深入调查，作到心中有数外，主要是把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澄清和处理。群众很快就弄清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工人同志们说：“你们做每件事，不是军代表说了算，而是发动群众，让人心服口服。”

（三）“帮”字当头，立足于教育，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群众。”

由于长期受反革命两面派康克等阶级敌人的挑动，南口厂两大派群众组织中都有一些人犯了错误。对这些人，军管会主要采取“多做教育工作”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

军管会进厂后，两派的群众都一度把注意力集中在看军管会如何处理“八·一六打死两个老工人事件”上，强烈要求揪凶手平民愤。军管会认为那些参加打死两个老工人的人，大多数是受了坏人的挑动和蒙蔽，是好人犯了错误，应该把矛头对准一小撮幕后操纵者。于是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把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康克揪了出来，而把那些犯了错误的人集中到学习班去学习，既严肃批评他们的错误，又热情帮助他们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自觉斗私批修。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调动了他们的积极因素。

对少数错误严重，经过学习又不觉悟的人，军管会则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办法，同他们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在对这些人进行斗争时，一定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做到“帮”字当头，立足于教育，允许反复，多次巩固。

狠抓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 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 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这个厂历史悠久，阶级队伍复杂。在全厂九十五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人是叛徒、特务、日伪军政官员、反动道会门道首等。叛徒汪明一人就身兼副厂长、党委委员、武装部代理部长和总会计师等四个重要职务，窃取了党、政、财、武大权。现在该厂“名牌”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人，也全部受到重用。更严重的是，有少数坏人已混入原厂级革委会和车间革委会。因此，这个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十分尖锐复杂。

军管会进厂以后，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注意政策，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揪出了民愤大，影响大，罪恶大，态度坏，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康克，揭开了南口厂阶级斗争盖子的序幕，广泛地动员和发动了群众，为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接着又在今年一、二月间连续开了三次宽严大会，为南口厂各种各样有问题的人树立了活的样板。军管会的体会是：对首恶分子，狠狠打击，突出一个“准”字；对敌人营垒中的动摇分子，分化瓦解，突出一个“拉”字；对犯错误的好人，从教育着手，突出一个“帮”字。

军管会主要的做法是：

第一，实行“坦白从宽”必须立足于斗争，突出一个“拉”字。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孤立敌人，军管会对可揪可不揪，可戴可不戴帽子的人，采取一定不揪、不戴帽子的方针，对于那些拉一拉就可以上来，推一推就可能下去的人，尽量拉过来。但“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军管会充分运用毛主席对敌斗争的策略思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不是把实行“坦白从宽”的政策寄托在敌人的“明智”上，而是立足于斗争，突出一个“拉”字。

(一) 内紧外松、有理、有利、有节。在跟那些证据确凿的敌人进行斗争时，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坦白从宽”的主动权交给他，交代揭发好的，从宽处理，顽固不化的严惩不贷。如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洪才，虽然军管会已掌握了他的大量罪行，但为了给他坦白从宽、重新做人机会，先后找他谈过二十一次话，向他反复交代党的政策，促使其坦白交代，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他仍坚持反动立场、死不回头。这时军管会采取从宽有限的方针，在“一二·二”宽严大会上当众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树立了抗拒从严的样板。

(二) 上拉下促，在敌人发生动摇的时候及时指明出路。对于已掌握材料，但本人又不主动交代问题者，不是消极等待其觉悟，而是积极促其交代问题。从南口厂对敌斗争的情况来看，死不交代的少；痛快快快交代的少；吞吞吐吐，动摇不定的多。而动摇不定的人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侥幸心理，“我不交代你不一定知道”，妄图混过去；另一种是害怕，怕交代了得不到从宽处理。根据不同的对象，军管会就对他们做不同的思想工作和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如本应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靳延东，他起先有侥幸心理，光打马虎眼，不肯老实交代罪行，后来采取上拉下促、一鼓作气的方法，上边军代表找他谈，下边车间工人促他，使靳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眼看不交代就有灭顶之灾的危险，思想发生了动摇。军代表针对他的活思想，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展开政策攻心，及时指明其出路，这时靳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了别人。群众深深体会到，敌人思想发生动摇之时，正是政策攻心威力最大之时。

(三) 点而不揪，适当给敌人施加压力。对于那些有问题而又不主动交代问题的人，在适当的场合，可以有领导地点他的名，促使他交代问题。如对陈友农就采取这种方法，在“一二·二”宽严大会上，只是点了他的名，陈感到压力很大，简直比揪他还难受，两天以后，基本交代了军管会所掌握的材料，并供出了后台。

(四) 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对那些组织上宽大处理的人并不是不管他们，在教育批判和改造方面要从严；对于那些本来从严处理的人，不要把弦绷得太紧，能不关的尽量不关，就是关了的，也要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针对不同时期的斗争特点作新的处理。对于反革命分子，军管会遵照毛主席“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的教导，让他们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和监督，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用劳动改造他们，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的条件下，这样做不仅有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如对揪而不戴帽子的侯旺起和从严处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洪才，根据他们最近认罪较好的现实表现，在二月二十三日宣布把他们放回车间，震动很大，效果甚好。侯旺起痛哭流涕地说：“过去揪我体现了党的政策，今天放我也是体现了党的政策，这次不给我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保证一辈子不戴这顶帽子。”

第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死不改悔的阶级敌人。

(一)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实事求是。对于历史问题已作过交代，并有结论，但发现了新问题而被群众专政的，应采取慎重的态度，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核实。确实有问题者，根据问题性质轻重，坦白程度，认罪好坏，酌情处理。如经过多方查证，所谓新问题并不存在，就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如原厂革委会某些人为了抓出一个“大个的”“震动一下”，就主观臆测，将朱子安已经搞清了的历史问题又重新抓起来，任意扩大，甚至将诱出来的所谓调查材料对朱搞逼、供、信，迫使朱承认参与了两起惨案，有四十三条人命，并宣布对朱实行群众专政。军管会和群众经多方查明，此案是假的。又鉴于朱早已坦白交代了伪警长问题，没有重大罪恶，十几年来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在二月二十三日的宽严大会上，宣布对朱解除群众专政。

(二) 严格政策界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同时，针对南口厂是个老厂，有历史问题的人多这一特点，针对南口厂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说怪话和落后话的人多这种现状，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军管会分别在大会上宣布了几项政策界限：1、对于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已作过交代，并有正确结论，又未发现新的问题，而这次运动中又被宣布为群众专政的，一律解除群众专政，不老账新算。2、对于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如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的一般成员），过去已作过交代，解放后又没做过坏事，不再追究。3、把偶而说错了话和思想一贯反动的加以区别；把有一般性错误言行同三反言行加以区别；把受蒙蔽或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参加了武斗、搞了些打、砸、抢，同坏人挑动武斗加以区别。

军管会和群众一起对照宣布的政策界限，进行分析，发现被原革委会定为群众专政的一百六十二人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六十五人，属于有政治历史问题已作交代，尚未发现新问题的二十八人，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这些人作了甄别。

目前军管会正在学先进，找差距，订措施，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认真搞好斗、批、改，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八三四一部队驻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

新华社总社记者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

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驻厂解放军宣传队的帮助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认真落实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伟大教导，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在基本材料落实的基础上，最近对厂里的一些批斗对象做了定案处理，其做法和体会是：

一、发动群众，加强领导，统一认识，统一政策

在定案工作中，要不要走群众路线和如何走群众路线，仍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关门定案，不让群众知道；另一种是放弃领导，群众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为了避免上述这两种错误倾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这一伟大教导，他们认为发动群众就是用毛主席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武装群众，加强领导就是集中群众中符合毛主席各项政策的那些正确意见，做到在领导和群众中“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厂革委会决心在定案工作中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反对任何不负责任、尾巴主义的工作态度。

北京新华印刷厂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根据毛主席“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教导，采取了层层发动，全面发动，逐步统一，全面统一的办法。他们认为如果一下子把一个人的问题拿到全厂三千多名工人群众中去对他定案，势必会造成意见分歧、难于集中的困难局面。因此必须思想先行，逐步统一才能把定案工作搞好。为此，他们首先在革委会和连队领导班子中办定案学习班，解决个别领导成员害怕群众掌握不好政策而不敢放手和怕负责任，怕别人说自己“右”倾，不敢集中正确意见的活思想。然后又抽调各连队的少数工人群众举办全厂性的群众定案学习班，在提高政策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试定。最后在今年二月底，在全厂范围，包括家属区在内，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定案运动，动员了所有的人，包括一些长期在家养病的群众，都投了这场运动。形成了人人学习党的政策，个个谈论定案工作的生动活泼局面。在这中间，全厂开办了有各种人组成的定案学习班：有领导和骨干分子组成的学习班；有工人群众组成的学习班；也有被定案的审查对象组成的学习班，甚至连过去已经定了案的一些阶级敌人，也让他们在群众的监督下组织了学习班。前两种人组成的学习班，主要任务是统一认识，统一政策，提高觉悟，对定案对象进行定案；定案审查对象组成的学习班，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对照自己的罪行，进一步交代揭发问题，认罪服罪，争取宽大处理。而定了案的阶级敌人组成的学习班，则是让他们用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自己，正确理解党的政策，给他们指明出路，同时叫他们自己争取出路，早日改造成为新人，争取把已经戴上的帽子摘掉。

在革命群众组织的定案学习班上，一开始就出现了种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的活思想：不少人出于一时气愤，一听到具体人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就气炸了肺，忘记了党的政策，甚至有个别的同志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可以宽大处理的，通通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他们实行专政算了；有的人则因为私心杂念作怪，不敢坚持党的政策，抱着“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推勿拉”的思想对待定案工作；有的因为对党的给出路政策还没有真正理解，想不通有的人已经批倒批臭了，还为什么给出路？装订连队的个别人说：“我们这样五六百人的大车间，揪了半天，按照党的政策，又给宽大了，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

厂革委会面对群众这些活思想，决心大胆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把定案工作纳入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轨道上来。在学习班上把重点放在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领会党的政策的工作上，提出一学、二议、三摆、四批、五看、六定的工作程序。一学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二议是议定案的目的和意义；三摆是摆定案对象的问题，同时摆自己的活思想；四批是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五看是看定案对象的悔改态度；六定是提出定案意见。他们把定案的过程看成是落实毛主席指示的过程；看成是锤炼每个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过程；看成是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广大工人群众翻遍了毛主席的四卷红宝书和一系列最新指示，选出了五十八条针对性很强的语录，天天学习，天天对照，天天讲用。广大群众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信任我们，我们可不能不听他老人家的话，党的政策，一字一句也马虎不得，这正是考验我们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时候。

通过学习，全厂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定案处理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定案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处理几个人的问题，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为了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的头脑，是一次最好的政策教育；对于阶级敌人来说，则是为了促使他们的改造，把他们尽可能地、尽快地由坏人变成好人，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更多的人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同时也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使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向人民投降缴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得更彻底。

二、把好人和坏人区分开，正确 解决未解放的干部问题

对于未解放的干部定案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由于采取了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最近将一部分未解放的干部做了定案处理，避免了“打不倒，放不了，定不下，管不好”的现象。大大促进了斗批改的进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个厂根据毛主席这一教导，对干部定案过程中，做到了“一清、二批、三分析”：一清是把每个未解放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问题搞清楚，做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这里要求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精神，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对每个人的历史进行反复调查核实，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考察每个干部的现实表现；二批是发动群众批判干部的错误，同时又促使教育这些未解放的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自己过去的罪行和错误，上挂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斗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狠挖思想根子，做到与错误思想彻底决裂；三分析是用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历史地去分析一个人的本质，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照党的政策，把犯错误的好人和坏人分开。

这个厂的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伟大教导，在分析每个人的问题时，注意了下面几个区别：

(一) 把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过工作关系的来往，同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不能笼统地把这些人说成是“黑线人物”、“黑爪牙”。

(二) 把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过去有不少人，由于受刘少奇《黑修养》的毒害，忠实地执行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他们还不是有意识地搞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个问题。比如这个厂原党委副书记邓国彬，过去曾忠实地执行过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集团为了反对和抑制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所推行的“四自原则”，砍掉了全厂几十个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群众认为这个副书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属于执行问题，而不是出于他本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目的。而另外一个原厂党委宣传部长，一九六二年自作主张，恶毒地将国庆游行所抬的毛主席著作模型强迫工人换成大叛徒刘少奇的《黑修养》模范，原来这个家伙是一个“三开”干部，一贯地坚持反动立场，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坏分子。

(三) 把由于阶级斗争观念不强、重才轻德而重用包庇了坏人坏事，同出于反革命目的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区别开。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过去主管全厂干部工作，而这个厂付印毛主席著作的权，却掌握在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手里，大家分析认为，这件事只能说明李同彦过去缺少阶级斗争观念，麻痹大意而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认为是他有意识地安插坏人破坏印制毛主席著作。

(四) 把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说过一些错话、散布过一些一般的右倾言论的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加以区别。说过错话的，有过一般右倾言论的人，既不能无限上纲，说成三反分子，也不能把一些恶毒攻击的言论看成一般问题。

(五) 把执行集体决议同自作主张干坏事区别开。原代理厂长姜信之，开始大家认为他是厂长，厂里的那一件坏事没有他的份？如六二年厂里走资派执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的黑指示，集体商定将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四十台机器一下子砍掉三十五台。这次定案中，革命群众把这笔账算在了刘仁身上，而认为姜信之在这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

(六) 把下面的坏人干了坏事而他不知道或未作严肃处理的，同和坏人合谋或指使坏人干坏事区别开。

(七) 把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亮相又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同在运动中有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幕前或幕后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

上述七个区别，不是说犯有这样错误的人完全没有责任，而是区别好人犯错误和坏人干坏事时必须掌握的几点原则。

例如这个厂原技术副厂长董维良，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崇洋祟美，推行资本主义经营路线，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假洋鬼子”。运动中从他家里抄出了不少反动证件，其中有蒋该死和大军阀白崇禧CC特务头子陈立夫给他签发的一些反动证件。所有这一切，解放后这个家伙不仅严加保存，而且有的还做了复制品，妄图变天。当革命群众抄出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后来一直死不承认自己的反动思想。大家认为这个家伙从骨子里是反动的，最后一致同意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专政。

另一个例子是原代理厂长姜信之，这个人主要问题是过去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

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干了一些坏事。开始大家认为他过去是厂长，运动中又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打倒是不成问题的。后来经过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了这个人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犯了走资本主义错误的人。其理由是：（一）这个人参加革命较早、历史没有问题，过去工作还较努力，历次运动中表现还不错；（二）他虽然过去忠实地执行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他不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由于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三）运动中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不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而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私心杂念过重，识别不出那些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之犯了错误；（四）过去虽然有一些抵制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但不是恶毒地攻击；（五）经过群众揭发批判，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在群众中作深刻的检查，有改悔的决心。最后全厂群众通过，作为犯了走资本主义错误的人予以解放。革命群众说：“象姜信之这样的人，如果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把他推到敌人那边，革命就少了一份力量，多了一个敌人。”

这个厂革委会认为，“一清、二批”是解放犯错误干部的前提，要教育干部认识到过去革命群众冲击批判他们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是对他们的挽救，没有七斗八斗他们本人就不能很好认识错误，接受教训。同时也要不断教育群众提高政策水平，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看问题。评价一个人，要看到这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进步，解放他们是执行毛思想的革命路线，绝不等于“干部稀里哗啦解放了，文化大革命白搞了”，过去批判他们是人情味，现在解放他们也是大方向。

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敌人，最大限度地 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 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服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厂革委会在定案工作中，始终坚持“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原则，认真执行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那些叛徒、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除了罪大恶极不重判不足以平民愤者外，其余的在“宽”与“严”之间，都存在一个“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关键是一个“拉”的问题。

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在于：符合毛主席历来所教导的不树敌过多的思想，有利于进一步分化瓦解和孤立一小撮顽固分子；有利于教育和争取这些人的亲属和子女；有利于充分利用活的反面教员来教育群众；有利于加强群众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工人群众说，党的宽大政策，正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英明和伟大。宽大一个人就能分化一大片；改造好一个坏人，为革命就增加一份力量。如果不执行“坦白从宽”的政策，分化不了敌人，那才是真正的右倾。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真正的敌人，不怕“左”，也不怕右，就怕你切切实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政策执行得越好，阶级敌人越惶惶不安，搞得他众叛亲离，阵脚零乱，最后彻底孤立，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对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对他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办学习班，继续用党的政策对他们展开攻心战，促使他们进一步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坏人，提高认识，低头认罪；另一方面对他们的“批”字当头，进一步把他们的罪行批倒批臭。工人群众说：“不批就改造不好他们，不批就谈不到对他们给出路，不批就是在政治上最大地保护了他们。不批就

不能教育群众，肃清其影响。批正是为了给他们以出路。”

在争取改造阶级敌人重新作人的过程中，做好这些人的家属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次定案过程中，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和工人群众，经常到这些人的家里去做工作，向其家属和子女交代政策，发动他们敦促这些人悔过自新，彻底交代问题。这个厂的阶级敌人的家属和子女，经常举行家庭批判会。阶级敌人在厂里、家里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有的人开始彻底与反革命思想决裂，表示愿意尽早地改造成新人。例如有一天晚上正下着大雪，后勤连的勤务员和几个群众，去到已经戴上帽子交群众专政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家里。一进门，全家人正在厨房里批判他。原来这个反革命分子和其爱人出身都很苦，其爱人就用他的家史来批判他的反革命罪行。最后这个反革命分子说：“原来我想破罐破摔，总以为戴了帽子永远没有希望了，现在革命群众这样挽救我，我一定要好好接受改造，将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帽子，改造成新人。”

在政治上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在他们低头认罪的情况下，再给他们以不同的出路，这是定案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没有这一步工作，定案就达不到真正的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在具体定案时，北京新华印刷厂认为必须做到三个区别：（一）区别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定案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弄错了会放走敌人，冤枉好人，就不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就是政治上的最大错误。（二）历史的还是现行的要加以区别。历史的问题，有其时代背景，只要交代清楚，能够认罪，一般的宽的幅度要大。例如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春华，一九四四年在哈尔滨加入一贯道，同年升为坛主。发展过四名道徒，接收过十几名道徒，并与哈尔滨总坛点师传（已镇压）等反动头目勾结，猖狂进行反共宣传。哈尔滨市解放后，仍然隐藏办道工具香炉、佛像等，并掩护反动头目逃避法律制裁。这个人一九四八年混入党，长期隐瞒罪行，并窃取了厂物资科副科长的职务。经过批斗尚能认罪，最后群众讨论，给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群众不监督，消除出党，撤销职务，放在车间劳动。（三）态度好坏的区别，态度好坏，主要是看其是否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揪出前主动交代的态度好；揪出后经过政策攻心战和批斗交代的也算态度好。总之，最后能全部交代自己的罪行，彻底缴械，向无产阶级投降，重新做人，不破坏，不捣乱的，都算态度好。

对于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厂认为在具体对待上仍然要有区别：（一）情节严重，但不是一贯的，态度好，老实，不戴帽子，也不监督，在劳动中改造。（二）情节比前一种更为严重，但态度较好的，虽然不给戴帽子，但必须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以观后效。例如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为了进行阶级报复，企图行凶杀人，并有恶毒攻击的三反言论。但他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定案时大家认为他态度还比较好、没有给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仍需群众监督一段，看其如何。

根据毛主席“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的教导，对于那些已经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厂认为仍然应当给他们指明出路，使他们有奔头，不致与人民顽抗到底。在这些人组成的学习班上，革委会、军宣队和革命群众，经常给他们讲党的政策，促使他们尽快地改造为新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进一步分化孤立他们中的顽固分子，这个厂在定案过程中，把戴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实行群众专政的孙铭光，摘掉帽子。他们认为，过去给他戴上帽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现在给他摘掉帽子，同样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革委会根据毛主席“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和“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前途。这样

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的教导，在对那些定案对象的具体处理时，这个厂的做法是：凡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一）政治待遇问题：凡戴上帽子交群众专政的，则一律剥夺其政治待遇，但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可以让他们参加一些批斗会、学习会等，以促其改造；属于敌我矛盾，但未给戴帽子者，有的可以在群众监督下参加一般的群众活动；有的则取消群众监督，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例如有的人虽然够上公安六条中所指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头衔，但过去罪恶不大，解放后一直表现比较老实，民愤不大者，则给予他们公民权，还可以称“同志”。

（二）党籍问题：是党员的，不论戴帽子与未戴帽子的，则一律予以开除。（三）工作问题：不论是戴帽子或未戴帽子的，都给予适当的工作，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增加财富，更重要的则是把他们放在群众中进行劳动，有利于改造他们。（四）工资问题：凡戴上帽子的或未戴帽子交群众监督的，如原工资高于一般工人生活水平，应适当降低，但要使他们在生活上过得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般的工资不动。

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予以解放的干部，党籍问题，按毛主席“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要求，通过整党，决定其劝退还是保留党籍。工作问题，有的可以结合到各级革命领导班子里，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被解放后在车间当了一个时期的工人，表现很好，有革命干劲，最后又通过群众，把他补选进厂革委会。有的则按其专长、技能和身体条件，安排适当工作。工资问题，有些人虽然不再做领导工作了，但工资一律暂不降低，待以后再说。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
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新华社总社记者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

苏联边防军又一再严重侵犯我国领土 进行一系列军事挑衅活动 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三月十三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苏联边防军继三月二日挑起边境武装冲突之后，又一再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挑衅活动。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三月四日十一时五十分至十五时十九分，苏联边防军装甲车八辆、满载武装人员的卡车三辆和指挥车两辆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同日十二时十七分至二十分钟，苏联直升飞机一架侵入该岛上空，并在该岛东侧我境内降落。

三月五日十一时四十分至十四时五十五分，苏联边防军装甲车六辆、满载武装人员的卡车两辆和指挥车一辆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

三月七日九时五十五分至十时零二分，苏联边防军装甲车六辆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其中三辆在上岛之前甚至深入到珍宝岛西侧的中国河道上。同日九时零四分、九时二十五分、十一时二十七分，苏联直升飞机三架次，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空。

三月十日五时二十七分至六时五十五分，苏联边防军装甲车一辆和武装人员三名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

三月十一日十五时十四分至十八时四十五分，苏联边防军装甲车一辆和武装人员十四名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

三月十二日十四时四十分至五十七分，苏联边防军装甲车三辆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和该岛西侧的中国河道上。

上述事实表明，苏联边防军继三月二日挑起边境武装冲突之后，又一再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挑衅，企图挑起新的武装冲突。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坚决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一切入侵挑衅活动，并严正警告你们，中国的领土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于北京

(新华社 1969 年 3 月 13 日讯，载 3 月 14 日《人民日报》)

苏联政府出动武装部队
又一次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地区
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紧急强烈抗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三月十五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联政府三月十五日凌晨开始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又一次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和该岛西侧的中国河道，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三月十五日凌晨开始，苏联政府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又一次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和该岛西侧的中国河道，首先向岛上的中国边防巡逻人员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苏联方面不断增加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并向中国境内纵深开炮，事态正在扩大中。

苏联政府在挑起了三月二日的严重流血事件之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不断派兵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现在又一手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苏联政府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苏联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中国政府保留进一步提出要求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于北京

(新华社 1969 年 3 月 15 日讯，载 3 月 16 日《人民日报》)

苏修再次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
流血事件 我边防部队英勇
反击胜利保卫了祖国神圣领土 (节录)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五日凌晨四时许开始，苏修叛徒集团先后出动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大批武装部队，从冰上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开到岛的中部、南端和西侧的中国河道，向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猖狂挑衅。

我边防部队向入侵苏修武装部队提出严重警告，令其立即撤出我国领土。苏修武装部队无视我边防部队的严重警告，悍然于八时许首先向我边防部队开枪开炮。我边防部队奋起自卫，给入侵挑衅者以迎头痛击。

苏修武装部队在我沉重打击下，到下午一时后，竟然从乌苏里江东岸苏联境内纵深地区，用重炮向我珍宝岛和乌苏里江我侧岸上进行疯狂的轰击，纵深达七公里之多。与此同时，苏修武装部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岛上巡逻部队进行冲击。我边防部队坚决还击，到下午七时许，把入侵者全部赶走，胜利地保卫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领土。

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三月十五日的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一手制造的。我外交部在三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半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但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竟然无理拒绝约见。事隔几小时以后，苏联政府匆匆忙忙地发表了一个所谓的“抗议声明”，一方面假惺惺地说，它“正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又一口咬定，说什么珍宝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修叛徒集团提不出任何一个根据，证明珍宝岛是它的领土。它不敢提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明确规定在这一段的中俄边界是以乌苏里江为界，而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于中国管辖，无可争议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苏修叛徒集团蛮不讲理，硬把中国领土说成是苏联领土，还装出要和平的样子，这是假和平真侵略，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坚持勾结美帝、猖狂反华，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豺狼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

(新华社 1969年3月15日讯，载3月16日《人民日报》)

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

《北京日报》社论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下，驻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的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和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六厂一校的广大革命工人、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是我们学习的好样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六厂一校先进经验的普遍推广，在全市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各单位都以六厂一校为榜样，虚心学习；以六厂一校为镜子，狠找差距；以六厂一校为目标，紧紧追赶，一个以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为中心的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正在不断深入。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毛主席各项指示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全市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大大发展了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我们向六厂一校学习，首先是要象他们那样，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

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任何时候都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水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要象他们那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最坚决、最迅速、最彻底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项战斗号令，把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前进。

我们向六厂一校学习，就是要象他们那样，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要象他们那样，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带动各项工作。

我们向六厂一校学习，就是要象他们那样，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一切工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要象他们那样，遵循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经常地主动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细心地体察群众的要求，坚持不懈地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向六厂一校学习，就是要象他们那样，严肃认真、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把党的各项政策，原原本本的交给群众，用党的政策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要象他们那样，以党的政策为准则，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工作方法，解决斗、批、改的各项问题，并注意不断总结执行政策的新经验，新问题，提高执行政策的水平。

我们向六厂一校学习，还要象他们那样，用革命挂帅，猛促生产；用人的思想革命化，来带动生产的发展。要象他们那样，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使革命不断深入，使生产蒸蒸日上。

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是多方面的，也各有特点，但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点，就是上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下靠广大革命群众靠得牢，高度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地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办事。这些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是普遍适用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虚心地、认真地把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学到手。任何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思想，任何借口本单位“情况特殊”、因而不注意向先进单位学习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他们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典范，是七面鲜艳的红旗。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的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军士人员，都要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遵循毛主席“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的伟大教导，迅速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以学习六厂一校为中心的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运动，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 宣传队热情帮助革命师生 坚决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

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知识分子队伍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推动了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

北京大学是个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大学，封、资、修的流毒比较深，知识分子队伍比较复杂，许多全国有“名气”的教授在这里任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搞意识形态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面对着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在一些师生中产生了“北大特殊”的思想。他们说：“北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别的地方能够做到，在北京大学难做到。”由于存在着这种思想，曾一度出现过不敢积极主动地落实党的政策，消极地等待上级机关定“调调”、划“杠杠”的现象。宣传队发现这种情况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认为某些同志中所以有“北大特殊”的思想，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同志还没有很好地领会和掌握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因此，必须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武装大家的头脑，破除“北大特殊”的思想，才能保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得到落实。

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到底北大“特殊”不“特殊”？为了正确地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宣传队在全校办起了一百二十多个落实党的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大家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本单位的知识分子队伍进行了具体分析。物理系理论教研室，曾被某些同志认为是“一团黑”的单位。这些同志说，在这样的单位，团结大多数的政策根本做不到。到底做得到做不到？宣传队引导大家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事实证明：“一团黑”的结论错了。为什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呢？宣传队又引导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找到了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办事；不能按照党性原则办事，而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代替党的政策。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后，都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是北大不能落实政策，而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学得不深，理解得不透。”

北京大学是个综合性大学，文科占了很大比例，许多人都是搞意识形态的，同其他理工科大学比较起来，也确实有其更加复杂的情况。在文、史、哲这三个系的新老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写过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和著作。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就说：“落实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理工科比较容易，在文科就不好办。”他们认为，在这些人的脑子里，装满了封、资、修的东西，再也教育不过来了；对这些人已经不能再寄予任何的希望。

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政策，在文科能不能落实？宣传队组织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的伟大教导，对文科的知识分子队伍情况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具体的分析。通过分析，大家发现，有些人虽然都发表过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文章和著作，但具体情况和问题性质又各有不同；其中大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文科，同样能做到团结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通过这个具体分析过程，大家深刻认识到：情况越是复杂，就是要认真注意和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宣传队又发动群众掀起了一个人人宣传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个个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工作的高潮。全校普遍办起了各种类型的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政策的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大家遵照毛主席“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教导，采取集体学、个别帮的办法，热心地帮助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对有些人，还深入到他们家里办学习班。通过这些工作，使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北京大学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少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斗、批、改运动，全校出现了一片生动活泼的崭新气象。

(原载 1969 年 3 月 18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长时间热烈鼓掌，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热烈鼓掌、欢呼）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热烈鼓掌）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

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热烈鼓掌、欢呼）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热烈鼓掌）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

林 虎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 63 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99 页）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235 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1 卷，第 6 页）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162 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1 卷，第 423 页）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

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级”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

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

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之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

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推倒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工作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

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粉碎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

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

文版，第32卷，第72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批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

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刪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

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

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82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49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

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8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

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苏修叛徒集团丑恶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兄弟党”、“兄弟国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当作可以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破坏和颠覆，而且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党，对于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都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进行镇压、破坏、颠覆，甚至出兵侵占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绑架他们的所谓“兄弟党”的成员，无所不为。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各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广阔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苏修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我们大会的代表，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鲜血液。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和女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老红军战士，也有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多的代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共同商量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标志着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的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形成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个兄弟民族，包括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好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包括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相信，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宏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一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下午五时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登上了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代表们极其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毛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接着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并且决定了主席团秘书处成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 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 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 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

林彪同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林彪同志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其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有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立了功的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根据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团结。它标志着这次代表大

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必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会自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

(原载 1969 年 4 月 2 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在四月十四日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进入主席台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不绝。

毛主席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当这两个文件一致通过的时候，全场长时间地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四月二日起，全体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

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和学习了毛主席在开幕会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示热烈拥护，坚决照办。代表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了党的历史。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个党员；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今天，我们党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代表们说，这就是历史对我们党四十八年的英勇奋斗获得伟大胜利所作的结论，也是历史对陈独秀、王明等曾经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破产所作的结论。只有懂得党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代表们一致激动地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家充满信心地说：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我们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我们这次大会，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开得很顺利，很团结，很好，它一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个夺取全国更大胜利的誓师大会。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段、逐句地反复地讨论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个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代表说，林彪同志的报告，把我们想要说的，都概括进去了，我们越读越高兴，越读越亲切。代表们还对报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章逐条地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代表们认为，这个修改草

案，是全党、全国革命群众共同起草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代表们认为，这个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在四月十四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发言的同志一致表示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拥护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拥护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他们发言过程中，全场不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大会在通过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后，决定将这两个文件委托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作文字上的校正以后发表。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各族亿万革命群众，举行了盛大游行和集会，欢庆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收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兄弟组织、许多友好国家、外国进步组织、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共一千九百七十七件。他们对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他们的祝贺和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四月十五日起，进入第三个议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代表并将继续分组讨论，结合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原载 1969 年 4 月 15 日《人民日报》)

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

第一 章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表资

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经历了长期的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满怀信心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全党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全国各民族亿万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 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 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 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 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四) 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党员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应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必要时，在非党群众中公布。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 党的组织原则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

地方、军队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党委员会的人选，都必须经上级组织批准。

第七条：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一元化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一般设支部；党员较多或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也可以设立总支部，或者基层委员会。

党的基层组织，每年改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它的主要任务是：

- (一)领导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 (二)对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常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 (三)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 (五)发展新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吐故纳新，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胜利闭幕。

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林彪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在今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的过程，充满了极其热烈的革命气氛。当大会宣布当选名单、读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们长时间地热烈欢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的胜利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大会在四月十五日进入第三项议程后，代表们认真地负责地进行了工作。根据大会主席团规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先由各代表团自由提名，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意见，提出候选人名单草案，再交给各代表团，经过充分协商，产生出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预选。经过这样几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充分地民主协商，商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由主席团提到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正式选举。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过程，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

在当选的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战士；有党、政、军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有在工厂、农村生产岗位劳动的优秀党员，有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有从事文化科学工作的共产党员，有各族的优秀的男女共产主义战士。代表们说，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有力地表现了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空前的朝气蓬勃、空前的革命团结。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还有：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志。

大会代表高兴地说：这次大会，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严肃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基本经验，确定了党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的任务和政策，今天又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这次大会，必将在我党的历史上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大会结束之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大会认为，应当进一步在全国开展一个伟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大会期间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四十八年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明确形势、任务和政策，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余毒，使全党、全军、全国民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是实现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夺取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包括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各个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进行到底，完成林副主席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斗、批、改的各项任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有

步骤地、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具体分析各地的情况，注意到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订出必要的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

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巩固工农联盟，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共同对敌。要注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动向，同妄图复辟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同违反毛主席政策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作斗争。

大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各级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要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恰当地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后面；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各级领导同志要了解全局，抓好典型，总结经验，掌握动向，把工作做深做细，克服一般化。在胜利的形势下，同志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警惕资产阶级腐蚀、分裂我们党和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在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和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向广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向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同胞，向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好事的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大会号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促进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创立新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向正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五大洲的革命人民，向坚持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的英雄越南人民，致以热烈的战斗的敬礼。大会庄严宣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团结在一起，彻底粉碎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阴谋，把反对帝、修、反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他们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种种困难和曲折，国内外反动派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敌于天下。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美帝、苏修和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切阴谋破坏和无耻侵略，都必将被有充分准备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彻底粉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伟大时代。让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

主席、奋勇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9年4月25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

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他。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那个山头或者那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

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笑声)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是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笑声)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均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笑声)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长时间热烈鼓掌)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讲话。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 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薛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 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这一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及其他大、中城市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 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是由寿材、家俱、电锯等行业的二百一十三家私营小厂，自一九五六年以來，经四次合并逐步发展成为有一千三百一十七人的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时，共有资本家二百五十二人，小手工业主七十人。十几年来由于退休、退职、调出、死亡等原因，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尚有在职资本家八十三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六点三；小手工业主三十九人（其中有独立手工业劳动者八人），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三。

解放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生产资料逐步国有化。公私合营前的赎买形式是利润分配制度，对他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公私合营后的赎买形式是定息制度，把他们“包下来”，在企业内安排适当的工作，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目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干净，通过工作和劳动，逐步把他们“化”掉，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阶级调和，胡说：“资本家的财产都交了，已不是资本家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只讲利用，不要限制和改造。在刘少奇的这条投降主义统战路线的庇护下，我厂先后有六十多个资本家当了干部，其中有七人当上了厂长、副厂长，有

二十七人担任了科室和车间的领导干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黑手也伸进了北郊木材厂，把该厂作为东城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的黑试点，对资本家百般照顾，“因人设事”，安排轻微工作，请长假工资照发；还给资本家评奖金、评“生产标兵”、评“红旗手”，有的甚至出席了区“群英会”。资本家利用把持的部分权力，对工人进行排挤、打击，对干部则拉拢腐蚀，有的干部精神状态不好、很不得力，有的在“糖弹”面前吃了败仗，鼓吹“向资本家学习，要尊重资本家的领导。”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仍有二十五个资本家混在干部队伍里。工人同志们说：“象我们这样的厂子，不清一清，整一整，可真不得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奋起夺回了被资本家把持的那一部分权利。同时，出于对剥削阶级的义愤，停止资本家和小业主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取消了资本家的定息，扣减了十八个资本家的部分工资。

我们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的伟大教导，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包括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政策和“给出路”的政策。厂革委会成立后，我们对厂里的资本家进行了普遍地内查外调，把他们开业、资本、劳动、雇工、表现等情况做了较全面地了解。

随着斗、批、改革命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毛主席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和最新指示的逐步落实，如何对待我厂八十三个资本家的问题，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说：资本家是“一窝黑”，是不可改造的，对他们都应实行专政，统统赶到农村去。有的说：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围，统统剥夺资本家的政治权利，不符合党的政策，应该让他们“归队”。我们认为，正确对待资本家，是体现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翻阅了毛主席的雄文四卷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在全厂普遍地举办了落实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述和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的经验。同时，我们给资本家、小业主分别办了有老工人参加的业余学习班。通过学习和讲用政策，广大革命群众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一定要消灭它，但对这个阶级中的分子是要改造他。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性。但他们大多数人是爱国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家中的大多数是能够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对资本家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大多数资本家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给予出路；对少数不够资本家的，则把他们划出来。对小手工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

一、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

我厂的八十三个资本家，均系手工业资本家。其中：解放后开业的多，解放前开业的少；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多，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少；参加主要劳动和辅助劳动的多，不参加劳动的少；基本守法的多，违法的少；公私合营以来接受改造的多，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少。因此，我们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包括：（1）公私合营以来，在政治上能服从工人阶级的监督和领导，努力从事生产劳动，表现比较老实的守法资本家；（2）曾经一度散布过反

动言论或不满言论而又不是一貫恶毒攻击，经批判教育有所认识，愿意改悔的资本家；（3）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已交代清楚，查证属实的资本家等，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他们继续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

我们遵照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大工贼刘少奇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论”等修正主义黑货和资本家欺压、剥削工人的罪行。资本家过去最爱听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胡说是自己养活了工人。经过革命群众的批判和老工人的控诉，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剥削有罪，是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自己。”在学习班检查交代了剥削思想和罪行，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对这些人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我们把这些资本家放到群众之中，给他们以学习的机会，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接受工人阶级的批评教育，扩大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缩小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动的一面，使他们逐步转变资产阶级立场，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在政治上，让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运动初期被扣减工资的，一般应予恢复；原是干部的，下放劳动以后，根据其劳动强度，粮食定量可与同工种的工人一样。资本家放到群众中后，精神状态有较大变化，在班内普遍表示了接受改造的决心，多数人早来晚走，努力劳动。如有的资本家放到群众中之前，顾虑重重，组内无人不敢进门，怕出了事受牵连。放到群众中后多次主动征求工人的意见，要求检查自己过去的剥削罪行，表示：“前半生剥削人民，犯了罪，后半生一定要好好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改造剥削阶级思想，为革命出力”工人同志们反映：这样做，符合“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二、对资本家中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

“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要求以反动资本家揪斗的就有十余人，我们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经反复核实后，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和不树敌过多的思想，严格掌握三个区别：（一）把一般的错误言论同进行恶毒攻击的反动言论区别开来；（二）把曾经一度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区别开来；（三）把愿意改悔的同负隅顽抗的区别开来。据此，对其中几个情节较轻，经批评教育，态度较好的资本家，没有以反动资本家论处，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对三个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恶毒攻击的反动家伙，发动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罪行。把他们批倒、批垮、批臭。同时，向他们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区别对待，以分化瓦解这一小撮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在定案处理时，对两个经群众批斗能低头认罪，愿意改悔的反动资本家，从宽处理，暂不戴反动资本家的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以观后效。有一个资本家长期隐瞒反动身份，在解放初期倒卖金银，扰乱金融；“三反”“五反”中偷税、漏税，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整风反右时猖狂向党进攻，一九五八年借“交心”为名，散布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利用职权，假公济私，拉拢腐蚀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恶毒攻击言论，至今仍不低头认罪，负隅顽抗，因此从严处理，戴上了反动资本家的帽子。这些反动分子，已“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

变。”只要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放毒，不搞破坏，就不关押他们，给他们工作，给他们出路，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让他们在群众中学习，有控制地参加一些群众性的会议，促其转变反动立场。如日后确有改悔表现，经过群众路线，可酌情摘掉反动资本家的帽子。

我厂资本家中，有三个曾作过处理的历史反革命，运动初期，被群众以“双料货”轰到一边，监督劳动。在处理这些人的问题时，注意掌握两个原则；（一）凡历史上作过结论，原结论符合政策而又未发现新问题的，一律不再追究；（二）历史上虽作过结论，而原结论属于“重罪轻判”，“宽大无边”不重新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按其罪恶大小，情节轻重，表现好坏，区别对待。如对一个曾被判处过三年半群众管制的中统分子，经查证，没有发现新问题，即按一般资本家对待；而对一个罪恶较大，未受法律惩处的历史反革命，和另一个依仗日寇势力，欺压群众，罪恶民愤较大的“内定普通反革命”，为促使他们尽可能地由坏人变成好人，根据群众要求，公布罪行，批判斗争，暂不戴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视其今后表现，酌情处理。对这些人的宽大处理，使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资本家震动较大，纷纷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

三、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参加公私合营的私营工商业者，统称私方或资本家。我厂在职的资本家中，有的人只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不雇用工人或只雇用一两个学徒或助手；有的人本小利微，自产自销，公私合营后，定息只有几包香烟钱；有的是公私合营时因父母年老，顶其父名进厂的资本家子女。如有一个“资本家”，解放初开设劈柴铺，后改为棺材铺，活忙时雇个临时工帮他拉大锯，主要依靠本人劳动维持生活。这一类人，“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两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我们把这部分人从资本家中划出来，以积极的态度，团结教育他们，引导他们斗私批修，改造思想，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个资本家被划出来按小业主对待后，含着热泪，激动地说：“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我一定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回到群众中后，向工人阶级学习，抓革命，促生产，报答毛主席的恩情。”当晚，他的全家彻夜畅谈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英明伟大，并办起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的儿子是沥青厂的汽车修理工，第二天主动来到我厂，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和今后的决心。真是划出来一个，教育了一家，影响了全厂。进一步掀起了落实政策的高潮。

四、对小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

我厂现有小手工业主三十九人，他们多数出身于贫农和中农，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十多年来，这些人在政治上处于“三不管”（工商联、工会、行政都不管）状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资本家一样，被停止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他们思想包袱很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低头干活，小心翼翼，不让子女参加运动，怕招惹是非，连累自己；有的背后喃喃咕咕表白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有的公开提出：“我们和资本家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在群众中有的认为“资本家、小业主是一路货，都是吃剥削饭的。”个别老工人想起在旧社会当学徒时的痛苦，非常气愤，说：“小业主里头，‘吃徒弟肉’的，和资本家一样可恶。”针对上述情况，我们采取一学、二清、三回的办法，引导大家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好小业主的问题。一学，是把小业主组织起来，利用工余时间

举办学习班，并派老工人领导小业主学习，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同时组织全厂广大革命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光辉著作，引导大家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友，提高政策水平。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小业主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其经济地位与中农相似，是团结的对象，把小业主排除在运动之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也不利于对小业主的思想改造。二清，是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对小业主的政治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把混进小业主内的历史反革命清理出来，作了适当处理。同时，在三十九个小业主中，有八人是本小利微，自产自销，独立劳动，不雇用工人。则把他们从小业主中划出来按独立手工业劳动者对待。三回，是经过上述工作，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让小业主回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改造思想。

小业主回到群众之中后，心情非常激动，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们表示：“一定要学好‘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革委会

八三四一部队驻厂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新华社记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 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近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落实党的政策的活动中，回顾和总结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推动了全校解放干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半年多来，这个宣传队在领导革命师生员工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成绩和经验。最近他们帮助犯走资派错误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提高觉悟，获得解放的过程，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经验。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对犯错误的好人多做教育工作

在解放犯走资派错误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的工作中，宣传队首先领导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帮助大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

第一，这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不是坏人？他们对这个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识到他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不是叛徒、特务或其他反革命分子，参加革命后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于他在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在一九五六年到清华大学以来所犯的错误，大家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他和领导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过密切来往，但属于工作关系，没有参与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在工作中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还不是出于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行罪恶活动；他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布过右倾言论，但并非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他因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业务第一，重用了少数坏人，但还不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大家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这个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属于好人犯错误。

第二，这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是不是死不改悔的？师生员工们在宣传队的教育下认识到，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中死不改悔的是有的，但是必须相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能够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能只根据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一个时期的态度和表现就做出“死不改悔”的结论。大家对这个原党委第一副书记过去态度不好的原因做了具体分析，更加提高了责任感，表示决心要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他的错误，“**多做教育工作**”，促使他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坚持破字当头 严肃批判错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员工认为，要帮助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提高觉悟，必须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办事。要促使他们接受教育改正错误，和资本主义道路完全决裂，就必须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严肃的批判。对他们的错误揭得越深，使他们受到的教育就越大。对他们的错误越是批得透，越是能促使他们猛醒回头。揭得深，批得透，正是为解放他们创造条件。否则，不揭不批，或者揭发批判得不深不透，“和平解放”，既不能使他们自己真正从错误中解放出来，广大群众也不能从中受到教育。

根据这样的认识，宣传队发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通过各种机会，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各种形式，对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的走资派错误进行广泛、深入的揭发和批判。大家以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武器，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靶子，摆事实，讲道理，集中揭发、批判他的错误，使他大为震动。过去他不认识自己的错误，甚至对革命群众运动有一种抵触情绪；现在他认识到，自己过去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被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拉上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他激动地说：“群众越是批我，我越是痛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我越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害我的是刘少奇，救我的是毛主席！群众批我一次，就是往正路上拉我一次。我要跟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个立场上，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我自己的错误，彻底批判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

的反革命罪行！”

及时肯定进步 调动积极因素

肯定进步，是为了调动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积极性。这和严肃批判，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开始的时候，有些师生员工对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在群众批判、教育下的进步，表现出一种不愿正视、不敢肯定的情绪，以为正视、肯定了这些进步就是立场不稳、界限不清；还有的人把他的某些进步和积极因素，也笼而统之地批评为是“假的”，是“不老实”。宣传队教育大家纠正了这种想法和做法。他们遵照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伟大教导，对他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表示欢迎，加以肯定，鼓励他不断努力，彻底改悔。不论是他就交自己的问题，还是揭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不论是主动向群众暴露活思想争取批判、监督，还是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检查、批判自己的错误，宣传队都是及时肯定，予以鼓励。不久前，他在学习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谈了过去在延安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的幸福情景，回忆了后来在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很感动地说：“两条路线斗争的活生生的历史擦亮了我的眼睛，我今后要走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彻底改正错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思想指引下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宣传队当即肯定了他的进步，指出他“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广大革命群众又靠近了一步”。他听了后，觉得很受教育，说：“我有一点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进步，革命群众就肯定我一点，使我从这一点看到了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一定不辜负同志们的关怀和鼓励，我要站起来彻底革命！”类似的事例使师生员工们体会到，肯定进步的做法，能够使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增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信心，这样做正是坚持而不是模糊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

依靠广大群众 让犯错误的 干部到群众中接受教育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们认为，促使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接受教育改正错误，最根本的是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因此，在解放原党委第一副书记的过程中，他们坚决反对少数人包办代替的做法，而是把他放到群众之中，发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对他进行批判、教育和监督，给他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本校、全国的大好形势，并且让他和师生员工们一起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活动，如参加学习讨论，集会游行，革命大批判，等等。这样做，有利于改造他，能够针对他的活思想，及时地、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工作。同时，他在火热的斗争中，可以直接感受到广大革命群众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和决心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指引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这样就可以帮助他更深刻地认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促使他更快地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在革今大批判中，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奋起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热情感染着他，教育着他，把他也带到了斗争的第一线，站起来和大叛徒刘少奇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整党中，他从广大党员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斗私批修的发言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加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当场要群众和他一起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批判。在反对苏修新沙皇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示威游行中，他学习广大群众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国的革命战斗精神，声讨苏修的滔天罪行，批判自己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在熟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逐渐提高了觉悟，深深感到毛主席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没有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办事，没有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深深认识到，我要是不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就要被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代所唾弃。我只有继续革命，彻底革命，才能重新做人！”

（新华社 1969 年 5 月 31 日讯，载 6 月 1 日《人民日报》）

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在八三四一部队驻厂宣传队帮助下认真落实干部政策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在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反复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动广大工人群众以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对于那些犯了严重错误而不是不可救药的人，对于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不是死不改悔的人，做耐心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厂以后，就着手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他们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认真做到“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及时解放、大胆使用犯了错误而又有了觉悟的干部，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被解放的干部，有的被结合到厂革命委员会，当了副主任、委员，有的被结合到连队革命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当了连长、指导员，有的干部还被选为党委委员、常委和副书记。最近，他们乘“九大”的浩荡东风，进一步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解放了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原总厂党委书记，犯有严重错误的原总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原总厂副厂长。到目前为止，中层以上干部除一人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尚未搞清暂未解放外，其余全部获得解放，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他们在解放这三个干部的工作中，取得了经验。

坚持“拉过来” 反对“推过去”

这三个干部，文化大革命前，都比较积极地执行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执行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都比较严重。他们在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后，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存在着抵触情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部分群众产生了“帮没有信心，拉没有决心”的思想情绪。还有的人认为，针织总厂该解放的干部绝大部分解放了，剩下三几个人，留个“小尾巴”，也算不了什么问题。

厂革命委员会和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真分析研究了这些问题，认识到：这些干部长期得不到解放，关键在于领导上没有把工作做深做细，没有把毛主席干部政策真正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帮助教育也不够。对这三个干部是坚持“拉过来”还是“推过去”呢？他们组织全厂革命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同时大讲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启发工人群众以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以最积极的态度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又发动群众对这三个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识到这三个干部虽然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且错误都比较严重，但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帮助和教育过来的。拿原总厂党委书记来说，他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不是叛徒、特务或其他反革命分子；他虽然和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旧纺织局的代理人关系密切，但不是黑线人物，没有参与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他在工作中虽然积极地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是属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受了“刘毒”影响，而不是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虽然重用了一些坏人，但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重业务，轻政治，不是属于招降纳叛，网罗坏人；他在受到群众的批判后虽然认识比较缓慢，但态度还比较老实，在车间也能积极劳动，并非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经过认真学习和具体分析，广大革命群众提高了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行动，大家都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热情地帮助这三个干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坚持“帮到底” 反对“挂起来”

这三个干部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有的比较快地深刻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是，也有的干部在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思想上出现了反复，一时想通了，一时又想不通。在这个问题上想通了，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想不通。原总厂副厂长就是这样。他在向全厂做了检查后，大多数群众反映他的检查没有触及灵魂，不满意。有些群众尖锐地批评他是“当了干部忘了本，拿着高薪乱训人，出了问题推责任，检查错误不触灵魂”，并且要求他再次作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群众却提出了如果检查仍不深刻，就把他“挂起来”。还有的群众说，这个干部是“老毛病，老检查，老不改，老顽固”，耐心也有个头，总不能等他一辈子，还不如钝镰刀割麦子——拉倒！

针对这些活思想，厂革委会立即组织全厂革命群众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对犯错误的

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等伟大教导，认真讨论了“怎样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思想上的反复？”等问题，并学习兄弟单位的经验，大力开展了“三学、三查”活动：学习《为人民服务》，用“完全”、“彻底”查对解放犯错误干部的责任心；学习《纪念白求恩》，用两个“极端”查对犯错误干部的态度；学习《愚公移山》，用“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查对犯错误干部多做教育工作的决心，进一步提高大家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自觉性。通过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使广大革命群众深刻认识到：做好犯错误干部的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能不能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坚持对犯错误的干部做耐心的、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考验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认识提高后，广大群众对原总厂副厂长积极热情抓紧教育，很多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不怕麻烦，不怕反复，同他一起学习“老三篇”，斗私批修，忆苦思甜，耐心地帮助他从两条路线斗争中找问题，从世界观上找原因，从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终于使他从听不进群众批评变成主动走访征求意见，从委屈埋怨变成口服心服，从不愿意刨根挖底变成自觉地猛触灵魂，从悲观泄气变成决心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他激动地说：“过去，大叛徒刘少奇用‘私’字毒害了我，今天，毛主席的英明政策挽救了我，广大革命群众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今后，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永远和群众在一起，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他再次作了触及灵魂的检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获得解放。

坚持在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 解放 反对“一风吹”

在解放这三个干部的过程中，有的同志还出现过这样一种倾向：“既然够不上敌我矛盾，干脆宣布解放算了！反正他们早晚得解放，省点时间还可以多搞搞其他项目的斗、批、改呢！”许多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说：“解放干部是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是一件严肃认真的大事，怎么能马马虎虎地走过场呢？”针对这种情况，厂革命会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和“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的最新指示，并且发动群众展开热烈讨论，使大家一致认识到：草率解放，“一风吹”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这样做，既是对革命不负责任，也不能使犯错误的干部真正从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有些老工人说得好：“治病要除根，帮人要帮心。对犯错误的干部，只有认真批判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恶痛绝，对自己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真诚悔改，对革命群众的批判心服口服，才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后，工人群众立即主动找这几个犯错误的干部促膝谈心，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畅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英明和正确，有针对性的给他们送毛主席语录，提建议，谈希望，帮助他们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武器，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分析犯错误的环境和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及思想根源，总结自己的历史教训。

原总厂党委书记，自从被群众批斗后，情绪一直很低沉，认为自己是解放不了的，抱着“摘下‘乌纱帽’，戴上工作帽，上班不迟到，下班往回跑”的消极抵触情绪，长期不敢暴露活

思想，怕上“纲”上“线”，检查问题也尽量避重就轻，专等着运动后期处理。针对他的活思想，厂革委会组织全厂革命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和他谈话，并发动全厂群众对其进行热情的、耐心的、细致的教育工作，启发他自觉革命、自我革命，引导他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同时还让他和群众一起参加政治活动，使他逐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决心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九大”闭幕那天，群众让他和全厂革命工人一起参加盛大的庆祝游行。他高举着毛主席语录牌，仰望着毛主席像感动地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广大革命群众还让我和大家一起幸福地庆祝党的‘九大’，我越走越觉得毛主席亲，越走越觉得离毛主席近！”

前些时候，他在全厂大会上作了检查。广大群众一致反映：检查深刻，触及了灵魂。会后，他又高举毛主席画像，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征求意见，沉痛检查自己的错误。短短几天，他走遍了全厂各个单位，征求了几乎所有群众的意见。他每到一处，群众都热情帮助，大家给他送了一千多条毛主席语录，提了六百多条意见和希望。在取得群众谅解得到解放的时候，他激动地感谢党和毛主席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感谢广大革命群众挽救了他，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表示今后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革命到底不回头。

北京针织总厂工人通讯员

驻北京针织总厂联合记者组

（新华社 1969 年 6 月 28 日讯，载 6 月 29 日《人民日报》）

中 国 共 产 党 万 岁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

（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四十八年光辉的战斗历程。

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二十年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我们党又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我们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我党四十八年的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全面的、系统

的总结，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战斗任务。毛主席在“九大”期间所作的极其重要讲话，大会一致通过的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鼓舞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照耀着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各项工作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加强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四十八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三个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坚持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建立农村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不停顿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坚持在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一整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胜利地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历史的经验证明，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革命就胜利，党就发展和壮大；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到挫折，党就遭到损失。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的。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都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继续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要注意，绝不能把自己和党的关系摆错了。

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单位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继续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那些大体已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单位，就要抓紧整党建党和其他的斗、批、改的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建党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

整党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他的黑《修养》，批判他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进一步肃清其余毒。要用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武装我们的党，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我们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有强大的力量粉碎帝、修、反的一切反革命阴谋。但是，我们决不能麻痹。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翻案活动。那种认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可以“歇一歇”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其有害的。

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继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扬毛主席关于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坚持干部参加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不断革命，不断前进。老党员、新党员都要努力改造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对那种不搞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热衷于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对那种居功自傲，停滞不前，图享受、争地位的人，对那种沾染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而还不愿改正的人，对那种玩两面派、搞“小动作”而不去认真、刻苦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要向他们问一声：同志，你是继续革命，还是革命到头了呢？如果坚持继续革命，就要响应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斗倒头脑中的种种资产阶级“私字”，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

在整党建党工作中，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逐步形成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元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才能按照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搞好整党建党工作，才能更好地继续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

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必然规律。整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组织整顿的工作一定要做，也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方法。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当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要认真地把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在这项工作上，要采取积极的、严肃的态度。

毛主席谈到整党工作时指示我们：“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充分相信群众，实行开门整党。要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真正交给党员和群众。党员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要热情帮助党员，通过整党，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要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进行整顿，要做过细的工作，不能粗枝大叶。整团的工作，也要着手进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一步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起来，团结起来，以更加朝气蓬勃的革命的战斗姿态，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民一起，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彻底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

的走狗，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党的“九大”庄严宣布：毛主席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革命人民共同战斗，直到“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9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

(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调查报告值得一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工人阶级，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精兵简政；对原有的规章制度一分为二，保留合理的，改革不合理的，创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注意政策，步骤上积极而稳妥，这些经验可供参考。

北京木材厂是一九五六年由二百多家私营小厂合并起来的，生产木制和钢木结构用具，现有一千五百多人。

这个厂，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教导，在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的帮助下，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起，开展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群众运动，促进了企业管理的革命化，加速了斗、批、改的步伐。革命胜利前进，推动了生产大发展。今年头五个月与一九六六年同期相比，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上缴国家的利润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北郊木材厂正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前进。

抓思想，破要害，立根本

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一开始。这个厂的广大群众对于劳动组织、生产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提出了几百条改革意见，究竟怎么破，怎么立？主要破什么，立什么？许多同志心中无数。有的认为，“大家提什么、就改什么”。革委会和部队支左人员，带着这个问题，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和关于办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明确

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方向。他们认识到，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从根本上。如果东改一条，西改一条，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抓了枝节、丢掉根本。改来改去，跳不出旧框框。

“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是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灵魂。过去，有一个走资派露骨地说：“我们工厂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而他们搞生产有“三不干”：产值低不干，数量少不干，利润小的不干。一句话，就是为钱生产。制度中规定，“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靠钱，保证产品的质量、数量靠钱，鼓励出勤也靠钱。他们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评奖制度，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互相评奖，年年、季季、月月评奖。工人同志在批判中愤怒地说，刘少奇这套黑货，要我们为“私”干活，为“我”争奖，评来评去，就是要把我们工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评掉，把厂的社会主义方向评掉。真是裹着蜜糖的砒霜，比毒蛇还毒！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他们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中，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作为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他们建立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政治工作制度，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制度；同时，彻底批判了过去的单纯技术观点、单纯业务观点，正在逐步建立用革命统帅生产的新的生产管理制度。由于他们狠抓根本不转向，全厂广大革命群众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革命、生产热气腾腾，出现了朝气蓬勃的崭新局面。

这个厂过去的规章制度贯穿了“专家治厂”的路线，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扣、罚。在一本近十万字的《北郊木材厂企业管理制度》中，规定了这个权是这个长的，那个权是那个主任的，就是没有什么权是工人的、工人有的只是被管的权。

办企业依靠谁，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企业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伟大指示，才能保证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前进。他们彻底批判了“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新建立的规章制度中，充分发挥工人的主人翁作用。比如技术管理，过去技术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技术管理制度越来越繁杂，严重地压制工人群众的创新精神。工人搞革新，要经过“五定”（定项目、方案、图纸、金额、效果）“四道关”（技术科审定，财务科算帐，厂长批准，供销科备料），周转很长时间，才能开始试验。其中一道关过不去，就吹台了。工人阶级掌握技术大权后，建立了新的技术管理制度，新产品试制、设备维修、新工艺的制定，都是工人与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进行。各车间普遍建立了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树立为革命搞革新的思想，从生产实际需要着眼，发动全厂革命工人，人人动脑筋，个个找窍门。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厂实现大、小技术革新一百三十余项，其中重大的有十六项。今年一月份，几位老工人把几年前被压制了的双头开榫机这个革新项目，又提了出来，立即得到厂革委会和部队支左人员的大力支持。他们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凭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和多年的实践经验，艰苦奋战三十八

天，终于试制成功，提高功效十倍左右。

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中，厂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有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不动，有的改了，但过两天又恢复了。厂革委会和革命群众分析了这种现象，认为这是由于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必然会引起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公与资产阶级的私的斗争，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不破除旧思想，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破不彻底，即使破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新制度也立不起来，即使立了，也不能巩固。他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教导，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肃清“刘毒”，增强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推动了这一革命运动的胜利前进。工人群众说：“批得越深刻，认识越明确；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破得越彻底，新的制度立得越牢固。”

精 兵 简 政

他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认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必须精兵简政。这个厂，过去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厂部有一处二室七大科，脱产人员达一百三十多人。科室多，人员多，为了互相制约，把人与人、科与科的关系，用一大堆烦琐的规章制度规定下来。有一个科的规章制度里，这样写着：“科长因事外出，一切事务由副科长负责；如副科长外出，一切事务由正科长负责。”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有的同志概括了这样几句话：机构层次多，解决问题少；表报手续多，实际有用的少；官僚主义多，深入群众少；繁琐哲学多，工作成效少。革委会成立后，精简了机构，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就失去了作用。没有闲人就没有那么多烦琐的规章制度，同时，只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才能巩固精兵简政的成绩，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现在，只有政工、生产两个组，共二十一人，建立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的革命化的新制度。人少，事多，但解决问题快。比如，过去按旧制度办事，从接受定货到正式投产，往返十四道手续，周转四十五天；破除了“业务旅行”的旧制度后，只需五到十天就可投产。过去许多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生产车间为科室服务，精兵简政后，生产组和行政服务人员经常到车间解决问题，深受工人群众欢迎。

一 分 为 二

这个厂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中，开始有的人认为，过去制定的规章制度统统要不得，主张“沙锅里捣蒜，一锤子砸烂”。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分清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对于修正主义的规章制度，如各种奖金制度，应当废除；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和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需的计划管理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质量检验制度、工艺规程、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必要的劳动纪律等，是不能“砸烂”的。正确的作法是：改革不合理的，保留合理的，创立新的。例如：

计划管理制度是必要的。过去关于编制长期、短期计划和召开生产调度会议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等规定，都是合理的、需要的。但是，以往是少数人订计划、管计划，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他们不是根据生产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补充、调整计划，而是用计划指标去卡生产，严重限制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窝工浪费。现在，厂革委会遵循毛主席关于“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

分的余地”的教导，生产任务交给全厂工人讨论，建立了依靠群众、上下结合订计划的制度。讨论计划时，以革命统帅生产，结合形势，制定措施，落实计划。这样，计划比较符合实际，广大群众明确战斗任务。领导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到处出现共产主义协作的好风尚，全厂形成一个战斗集体。工人同志说：“过去是上面说了算，工人只管干。现在是，计划大家订，措施大家找，生产一块干，任务提前完。”

质量检验制度也是一定要有的，认为可以不要质量检验制度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同志们认为，不断提高工业产品质量，对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有重大意义，改革质量检验制度，一定要保证产品质量精益求精。过去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对工人群众不信任。一本《质量管理制度》五章二十六条近一百款，强调依靠少数检验人员“监督工人”，造成生产工与检验工之间的矛盾。工人同志说，不依靠群众，就是一个工人后面跟上一个检验员，也提高不了质量。现在，他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根据木器生产的特点，保留原来检验制度中的合理部分，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人负责，互相帮助，班长检查，小组讲评和成品入库、出库专人验收”的新的检验制度。在全厂生产大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新制度保证了质量稳步提高。

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

厂革委会认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必须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决不能莽莽撞撞，草率从事。牵涉到全国性的比较重大的问题，要积极向上级提出改革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批准，采取上下结合的办法，试行改革。最近，他们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对某些制度试行了一些改革。比如，经过群众讨论和有关部门同意，试行简化了财会手续，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节省了人力。这些试验的效果，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和总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规定了企业内部、外部的各种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会引起各种关系的变化，涉及到很多政策问题。厂革委会认为，只有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才能处理好这些关系。例如，在改革企业管理制度时，他们认真处理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改革技术管理制度时，他们认真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使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接受再教育，同时，注意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这个厂在斗、批、改中，还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总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当考虑到有利于工人阶级内部的革命团结，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目前，他们正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广大群众，在“九大”精神的鼓舞下，满怀战斗的豪情，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高举革命大团结的旗帜，夺取斗、批、改的最大胜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原载《红旗》杂志 1969年第6、7期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

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消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

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匪行。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同时也要执行毛主席的“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

中央相信，山西两派群众都是要革命的。中央号召山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认真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胜利！

工人阶级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一周年

——欢呼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一周年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工人阶级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光辉节日——“七·二七”一年来到了。

一年前的七月二十七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肩负着“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知识分子成堆的清华大学。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揭开了产业工人大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政治舞台的新纪元。

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一年，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年，是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学说指引下团结战斗的一年，

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文化教育阵地的一年，是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下，团结、教育、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带领他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年！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一九六八年夏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道路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当时，经过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亿万工农兵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迈着雄伟的步伐胜利前进。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怎样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也摆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员工面前。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员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使这个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随后不久，一些知识分子却由于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受了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影响，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使得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个学校和其他一些单位的情况表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单靠知识分子是不能完成的，必须有工人、解放军战士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道路上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对工人阶级发出了向上层建筑领域进军的伟大战斗号令。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伟大的新生事物诞生了！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伟大事件！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高潮到来的一个标志！

这是毛主席的又一伟大战略部署！

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传来，日夜赶印毛主席著作的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命工人，立即学习讨论，准备行动。他们说：“毛主席的指示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我们一定全面落实，坚决执行！”

北京针织总厂的工人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

北京特殊钢厂的工人表示：“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的工人表示：“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工人阶级一条心，心心向着毛主席。首都六十一个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迅速地聚集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连夜研究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

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过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在短短十几个小时内变成了工人阶级惊天动地的伟大的革命行动。七月二十七日上午，首都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高举毛主席的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昂首阔步地向清华大学进军。他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文化教育阵地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清华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奔走相告，连连高呼：“向工人阶级致敬！向解放军致敬！”“毛主席万

岁！万万岁！”

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公然进行破坏活动，妄图把宣传队赶出学校。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竭力维护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工人只管工厂就行了，不要管学校的事。”宣传队员们回答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管好工厂，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工人阶级管好学校，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权力！”

“大老粗没有本事领导知识分子。”宣传队员们回答说：“我们工人阶级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最大的本事！”

“你们是来挖我们墙脚的。”宣传队员们回答：“我们就是要打破你们独霸的一统天下，就是挖你们‘独立王国’的墙脚，山头主义的墙脚。我们挖定了，而且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

斗争是复杂的。进驻清华大学的宣传队面临着“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的复杂情况，一小撮阶级敌人藏在暗处，有些师生暂时还处于受蒙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遵照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胸怀大局，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坚决予以反击；对于广大师生员工，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组成数百支小分队，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分清是非。

他们的行动教育了师生员工，挫败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在最初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站住了脚跟。

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胜利前进的时刻，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宣传队赠送了珍贵礼物——芒果：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宣传队的代表！；

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巨大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宣传队员，深刻地教育了师生员工，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清华大学这个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打破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把他们赶走的阴谋破产了！

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最初几天，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一部分师生离开了学校。这件事情使宣传队又一次认识到：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有一个同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任务。在这场斗争中，工人阶级必须做到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工人阶级及其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为了促使两派群众实现革命大联合，多少个清晨，老工人和师生们一起学习伟大领袖毛

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耐心地启发他们斗私批修。多少个夜晚，老工人和师生们一起批判大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宣传队员把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师生们身上，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使他们一个个醒悟过来。阶级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势不两立的“一对崩”变成了互帮互学的“一对红”，长期分裂的两派革命群众终于联合起来了！

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教导，宣传队坚决团结和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遵照毛主席关于“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的教导，宣传队在师生员工中普遍建立了积极分子队伍，作为自己在领导学校斗、批、改群众运动中的依靠力量。

遵照毛主席关于“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的教导，宣传队对于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和群众，抓紧进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工作。

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教导，宣传队对属于敌我矛盾但能够低头认罪、决心改悔的人，坚持给予重新做人、立功自赎的机会。

有的教师，一度情绪消沉。针对这种情况，宣传队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为武器，通过革命大批判，揭露敌人的阴谋，帮助他们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前途，从此精神振奋，积极投入热火朝天的斗、批、改群众运动。

就这样，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成为积极因素，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同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夺知识分子的战果，雄辩地证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教育知识分子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一小撮阶级敌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他们又从阴沟里放出风来：“你们能占领清华园，但改造不了清华园！”

这种鬼话，反映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复辟的梦想，也从反面使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一步认识到，象清华大学这样的文化教育阵地，十几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是那样深，几乎年来形成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是那样重，要用毛泽东思想把它改造过来，教育大多数知识分子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

毛主席指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宣传队决心把清华大学改造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大多数知识分子教育成工农兵所欢迎的人。”

有一个讲师，是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典型的受害者。长期以来，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搞业务金饭碗，搞政治太危险”的所谓座右铭，发誓要吃一辈子

“技术饭”。因此当宣传队提出要做他的工作时，许多师生认为他是一个难以教育、改造的人。宣传队坚信毛泽东思想能够改造一切。他们帮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他进行阶级教育，引导他自觉地斗私批修、针对他的问题和活思想几十次地找他谈心。这个讲师终于觉悟过来。他说：“过去我以为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是一条最‘保险’的道路；现在我才看清，原来这恰恰是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拖着我走的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危险的道路！”从此，他把“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冲杀在斗、批、改第一线上，不久前被群众评为“五好”战士。

这个讲师的变化，是我国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改造文化教育阵地，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许许多多动人事例之一。

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被资产阶级的“私”字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精神振奋，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为荣，以资本主义的私为耻，努力用“老三篇”指导自己的行动。

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科技书”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积极参加斗、批、改运动，决心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从书本到书本、一事无成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到工厂、农村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和生产任务。

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亲爹娘”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改变了思想感情，争相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去锻炼，被工农兵称为“我们欢迎的人”。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根本，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保证！”这是正在江西波阳湖畔创办教育革命试验农场的广大革命教职员的深切体会。

他们中间的不少教师，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有肩不能挑，有手不能干。今天在我们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领导下，他们变了，在荒芜的湖地上，脚踏污泥，头顶青天，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这里，他们既是先生又是学生，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生平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一排排房屋，开垦了一片片农田。他们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进一步体会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改造人，就是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只有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最近，当大家怀着革命生产双丰收的兴奋心情，开镰收割他们生平第一次亲手种植的早稻时，许多教师感慨地说：“过去、路线错了一切皆错，思想歪了一事无成。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我们知识分子指明了无限光明的前程，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给我们知识分子开拓了广阔天地！”

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清华大学在前进，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在前进，我国第一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全体战士在前进。

一年来，清华大学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但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一伟大教导的指引下，工人、解放军战士互相学习，并肩战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他们没有被敌人吓倒，没有被困难压垮，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被

糖衣炮弹击中，而是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了！

宣传队“四好”标兵连一连，是一个先进的战斗集体。一年来他们牢记毛主席的巨大关怀和殷切期望，牢记毛主席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教导，坚持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导自己队伍内部的革命化建设。他们打了胜仗找差距，赞扬声中更谦虚，全连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这个连队的同志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五个“必须”：第一个，工人阶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通过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领导一切；第二个，由工人变成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宣传队员，地位变了，要领导得好，就必须保持工人阶级本色；第三个，在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要保持工人阶级本色，用毛泽东思想把文化教育阵地改造过来，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第四个，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就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第五个，宣传队要保证自己的领导符合毛泽东思想，保证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各项号令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就必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的一切。

宣传队十二连副连长、“五好”标兵宣传员刘清爽，是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的老工人。他面对着知识分子中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和作风，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伟大教导，坚持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他始终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做到了四个“不变”：工作变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变；职务变了，斗私批修的精神不变；地位变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变；环境变了，艰苦朴素的传统不变。

刘清爽说：“只有自己的工人阶级本色不变，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站稳脚跟不迷航，才能完成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国第一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一年来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都应该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决心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

毛主席的指示鼓舞了宣传队的全体同志，他们决心进一步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新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来。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驻清华大学联合报道组

(新华社 1969 年 7 月 26 日讯，载 7 月 27 日《人民日报》)

抓紧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这种看法对吗？不对。它完全不符合思想战线上的实际情况。这种论调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它只能帮助一小撮阶级敌人麻痹革命的人民，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去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当中，贯穿着革命的大批判。我们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两面派，批判了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批判了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促进了各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当形势正需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批判各种阻碍斗、批、改的反动思想的时候，怎么能够说“大批判搞得差不得”了呢？事实上，尽管一小撮阶级敌人经常变换口号和形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也决不应当停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不破不立，这是革命的真理。不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就不能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已经占领了，如果不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些阵地就有被资产阶级重新夺过去的危险。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为了真正实现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必须抓紧大批判的工作。

革命大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那里？

第一，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要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以及各个文化领域中的流毒，肃清它的影响。三年以来，我们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广泛的大批判，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批判还需要继续向纵深发展。只有把革命大批判搞好了，我们的斗、批、改才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以文学艺术而论，各个方面都还有一批毒草，需要选择其典型者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等等方面，过去党内外的修正主义者曾经散布过大量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这些修正主义的谬论，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批判它，它就会放毒，就会毒害青少年和人民群众。我们的方针就是把毒草化为肥料，通过革命大批判，使人们在各个领域中都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深刻地认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以便在对这些毒草或者对类似的毒草用化了装的另一种形式出现时，广大的革命群众能够及时地识别它们，自觉地批判它们，揭露它们。

这里所说的批判修正主义，包括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批判。对于过去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文化界、思想界、科学界所散布的毒素，必须进一步加以肃清。对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最近一个时期所散布的种种疯狂的侵略言论，必须继续加以揭露，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作为美帝国主义帮凶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面目，进一步看清苏修纸老虎的本质，使人们充分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做好粉碎美帝、苏修侵略的精神准备。

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继续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

必须指出，在少数同志和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是危害革命事业的，是破坏革命团结的，是腐蚀人们革命意志的，要坚决加以克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会引向混淆敌我，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使自己鬼迷心窍；无政府主义会引向一切“以我为核心”，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闹独立王国。我们必须反对这些东西。一切共产党员、革命的人们，都要顾大局，应当坚定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允许把宗派主义即资产阶级派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新老干部都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这些错误的倾向是不会自行消失的。只有在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坚决的、恰如其分的批判之后，它们才会被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要用思想斗争的武器克服错误倾向，达到党内团结和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目的。就是说：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里需要指出：决不允许从宗派主义观点歪曲党的政策、阳奉阴违，各取所需。不论从右的方面或者从“左”的方面歪曲党的政策，都是错误的，要坚决批判。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每个战斗号令，做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一切资本主义势力特别是对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总有一些人，即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失败了，不死心，总想钻空子，煽阴风，点阴火，在他们认为比较薄弱的环节，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或者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或者用种种方式来腐蚀我们的新老干部和青少年；或者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

妖风来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破坏斗、批、改；或者进行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或者利用封建宗教迷信，妄图破坏各民族的团结。所有这些，总的都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在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可以而且应当批判这些资本主义的倾向，使广大革命群众擦亮眼睛，口诛笔伐，使资本主义倾向受到坚决的抑制和揭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不断地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我们坚决实行这一条。证据确凿的坏人闹翻案怎么办？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我们要照此办事，什么地方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企图翻案，我们就发动广大群众用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又一次把它斗倒。

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这就是我们当前革命大批判的任务。总的说来，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任务。为了搞好革命大批判，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注意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群众要进行深入的细致的思想工作，**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要注意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包括各项经济政策。要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也要组织少数人占有充分的材料，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量比较高的文章，以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发展。只要各级领导抓紧了革命的大批判，就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发现、锻炼和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并且在革命大批判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原载 1969 年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命 令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党的“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欣欣向荣，各族革命人民紧密团结，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

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印度反动派也在伺机妄图侵犯我国边境。

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祖国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边疆军民，尤其是担负着直接的责任。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

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

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

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

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窃取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

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

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英明领导和直接指挥下，如果美帝、苏修胆敢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我们就把它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中央相信：具有对敌斗争光荣传统的边疆军民，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祖国边疆建设成为埋葬帝、修、反的阵地。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促进 革命和生产不断发展

——北京针织总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经验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三日)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在驻厂解放军支左人员的帮助下，带领广大革命工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夺得了革命和生产双胜利。在迎接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个厂于九月十日提前全面超额完成今年国家下达的各项生产指标。

三年来，这个厂的革命工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斗、批、改不断深入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革命的统帅下，生产持续跃进，连年来生产直线上升。一九六七年全厂提前二十二天完成了国家计划；一九六八年生产计划比一九六七年提高百分之十三点四，提前七十八天完成了国家计划；今年生产计划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四，提前一百一十二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

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经验有以下几点：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
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认为，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工作有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是第一条。这个工作搞上去了，人就有了觉悟，有了方向，也就有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产量、质量、技术革新都能搞上去。这个厂革委会在驻厂解放军支左人员的帮助下，始终把领导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坚持千忙万忙狠抓根本不转向。他们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革命大批判，经常召开斗私批修讲用会，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

化。广大革命群众自觉地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破私立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随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厂革委会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伟大教导，发动群众开展了“四好连队”运动，坚定不移地走政治建厂道路，并广泛开展了“红哨兵”等活动，全厂上下，建立了工人管理小组，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不断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掀起新高潮。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广大革命群众把忠于毛主席作为一言一行的最高准则，不断锤炼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做到毛主席的书天天读，毛主席的话句句听，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步步紧跟，促进革命和生产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他们豪迈地说：“毛泽东思想照心坎，革命生产挑重担；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着毛主席！”

“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事实正是这样。例如，这个厂的三分厂是一个二百多人的小厂，厂地窄小，设备简陋，任务繁重，困难很多。他们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他们就闻风而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狠抓落实。每落实一项最新指示：斗、批、改就深入一步，生产就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广大革命工人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努力生产。他们说：“人听毛主席的话，机器就听人的话，无限忠于毛主席，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能改天换地创奇迹！”在工作中，他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分夺秒，艰苦奋战，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攻下了一道道难关，在“九大”精神的巨大鼓舞下，提前四个月零十七天完成了今年全年生产计划。又如，这个厂的八连（车间，下同）在厂革委会的领导下，大胆提出了十一个技术革新项目。当时，有些人产生了畏难情绪，认为“大老粗”搞不了复杂机器。连队领导班子针对这种活思想，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教导，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振奋了革命工人的大无畏精神。大家说：“我们搞机器，就是打击帝、修、反，给中国人民争气！”在试制中，他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遇到困难学习“老三篇”，没有资料就到兄弟单位学经验。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取得胜利。这些革新项目现已陆续投入或正准备投入生产。再如，今年七月分，这个厂二分厂的供汽锅炉因为陈积的煤灰堵塞了烟道，影响了正常供汽。按规定只能到冬季停工几天才能进行清除。这次，二连的革命工人，敢想敢干，打破常规，利用星期六班后的时间，打响了战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带头，工人群众争先恐后，在停火几小时以后，就冒着五十多度的高温钻进炉膛，一边战斗，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互相鼓舞，同心协力，勇往直前。他们豪迈地说：“天气热，没有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红心热；炉温高，没有我们的革命干劲高！”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及时保证了充足供汽。

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 狠抓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这个厂革委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在狠抓政治、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同时，狠抓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运用革命大批判这个锐利武器，揭露和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生产

的阴谋活动，批判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进一步肃清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促进了全厂革命工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为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今年七月分，有一个连队的少数群众，面对厂内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天，连里突然发生了一次工艺事故。他们发现有一批棉毛三角裤只烫平了一面就转到包装工序，造成大量返工。连队领导班子抓住这个苗头，发动群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情况，查明真相，原来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故意搞的。革命群众当即把他揪了出来，进行批判斗争。这件事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他们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千万不能只抓生产，忘记了阶级斗争啊！”

阶级敌人妄图通过散布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纪律，破坏社会主义生产，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有一个时期，这个厂有极少数人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遵守革命纪律。针对这种情况，各级领导班子做到“五敢”，即：敢捅“马蜂窝”，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支持正确意见，敢于执行和维护革命纪律，敢于带领革命群众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他们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革命大批判的无比威力，对无政府主义采取列罪状，查危害，挖根源，班班批的方法，把无政府主义批得臭不可闻。在批判斗争过程中，他们时刻注意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闹无政府主义的人，一般的坚持一教育、二帮助、三团结的原则，通过斗私批修，提高觉悟；对个别情节严重而又屡教不改者，发动群众批判他们的错误，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对那些在幕后煽动无政府主义，进行破坏和捣乱的坏人，则坚决打击不留情。二分广三连有一个班，一度因阶级敌人暗中捣鬼，煽动无政府主义，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通过革命大批判，群众提高了觉悟，揪出了阶级敌人，焕发了革命干劲，日产量成倍增长。

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断地提高了革命工人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加强了革命纪律性。工人群众划清了三个界限，即：划清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划清了无产阶级革命纪律和资产阶级奴隶主义的界限；划清了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束缚群众手脚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的界限。他们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不断地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中，坚定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他们的主要做法是：狠抓一个不变，防止两种倾向。“狠抓一个不变”，就是做到千头万绪抓根本，革命的统帅地位永远不变。“防止两种倾向”，就是在生产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在生产上碰到关键问题或薄弱环节需要解决的时候，要防止生产冲击政治的倾向；在政治运动比较紧的情况下，要防止忽视生产的倾向。他们把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用革命大批判去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厂革委会为引导工人群众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发动大家回顾本厂两条路线

斗争的历史，狠批大叛徒刘少奇所推行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专家治厂”、“技术挂帅”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一个时期，厂革委会发现少数同志在对待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上，存在着“说起来明白，做起来糊涂”的现象。针对这种活思想，他们抓住典型事例，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一次，一个连队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和兄弟连队比指标，占用班后政治学习时间，组织突击，抢用了七千个包装塑料袋，给兄弟连队造成了生产上的困难。厂革委会及时抓住这个问题，组织革命工人和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伟大教导，批判了刘少奇的“生产第一”、“锦标主义”等谬论。大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用生产冲击政治，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其结果是抓了生产数字，迷失了政治方向，影响了团结，妨碍了生产。这个连的领导班子认真斗私批修，主动向兄弟连作了自我批评。从此两个连队进一步掀起了革命竞赛热潮，互相帮助，并肩前进，于今年八月十八日，同时提前四个多月完成全年生产任务。革命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吃到了苦头；用革命统帅生产，尝到了甜头。”

厂革委会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中，还要求各级领导班子首先要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在狠抓革命的同时，注意克服不愿多管生产或怕抓生产的错误思想。他们组织各级领导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的教导，把生产提到议事日程上，月月有计划，周周有安排，定期讨论生产中的重大问题，经常检查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领导生产，蹲点调查，解剖“麻雀”，认真总结群众中的先进经验，用典型指导工作，推动工作。工作越做越深入，越做越细致，越做越扎实。广大革命群众赞扬说：“我们的领导班子，抓革命打头阵，促生产有干劲，和群众心连心。”

现在，这个厂在完成今年生产任务以后，正在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着手制订明年的规划。他们决心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引下，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以战斗的姿态，乘胜前进，夺取更大胜利。

北京针织总厂工人通讯员 驻厂联合记者组

(原载1969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 一、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 二、庆祝二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 三、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 四、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伟大胜利！

- 五、向全国各族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敬！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致敬！
- 六、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 七、认真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八、抓紧革命大批判！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 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 十一、备战、备荒、为人民！
- 十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人侵之敌！
- 十三、一定要解放台湾！
- 十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十五、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十六、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
- 十七、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
- 十八、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 十九、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 二十、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北美、大洋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 二十一、向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致敬！
- 二十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 二十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二十四、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 二十五、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 二十六、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万岁！
- 二十七、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二十八、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 二十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9 年 9 月 17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 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 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 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 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 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节录）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的“九大”精神的巨大鼓舞下，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前夕，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九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全校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呼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曲响亮的凯歌，是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辉煌成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谢富治、吴德、吴忠、丁国钰、李钟奇等同志参加了大会，谢富治、吴德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旧北京大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反动堡垒，彻底摧毁旧北京大学的资产阶级专政，由工人阶级把它占领下来，经历了极其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北京大学写的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的巨大鼓舞下，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夺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揭露和批判了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在北大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一九六八年七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一年来，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进驻学校后，使北大的面貌在迅速发生变化。在党的“九大”精神的鼓舞下，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革命的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团结对敌，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工作，许多犯有错误而又有了觉悟的干部及时得到解放。

（新华社 1969 年 10 月 5 日讯，载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二十周年了。

这二十年，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二十年。

毛主席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高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伟大红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已经由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变为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残缺不全、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高速度地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攻克了一系列科学难题，培养了一支革命化的工人阶级队伍和科学技术队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猛发展。整个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技术革新层出不穷，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成批涌现，到处热气腾腾，捷报频传，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我国自己设计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自己设计制造了十二万五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我国石油工业提前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我国氢弹爆炸成功，集中地标志着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新飞跃。

我国工业路上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表明，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无比正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伟大方针。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主席又多次教导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可靠地建立起独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战胜一切敌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力量，更好地支援世界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依靠掠夺殖民地、依靠战败国的赔款和借外债发展起来的，是建筑在千百万劳动人民尸骨上的。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赤裸裸地乞求国际资本主义的投资，一方面打着“经济一体化”和“援助”的旗号，贪婪地掠夺别国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也绝不允许用掠夺的方法，不能也绝不允许用出卖人民利益的方法，来发展工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也只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努力，才能成功。当然，在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完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友好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合作，绝不能代替各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援只有通过本国人民的努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自己不努力，不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本国的建设问题，不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和智慧，而是一味依赖外国援助，建设是搞不好的。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排除学习外国。我们对于外国的坏经验需要研究，引以为戒；对于外国的一切好经验要认真学习，但决不能照抄照搬。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以模仿为满足，就总是抬不起头来，不能放出自己的光彩。我们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独创，为了自力更生。实践已完全证明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猖狂反对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极力推行卖国主义、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一九四九年，当人民革命的大风暴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的财产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手里的时候，刘少奇适应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需要，露骨地叫嚣：“将来帝国主义到中国开矿，开工厂，利益均分，在两利之下，也是可以允许的。”他妄图出卖国家主权，重新引狼入室，让帝国主义继续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同以卖国为荣的蒋介石匪帮所鼓吹的“以利用外资为上策”的卖办论调，同出一辙。直到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工业建设取得了解煌成就，刘少奇还继续叫嚷：“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学不到就买”，“要先仿制”。在刘少奇这个洋奴看来，“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他所说的“学”，就是要我们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把社会主义工业倒退为资本主义工业；他所鼓吹的“仿”，就是要我们亦步亦趋地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永远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牵着鼻子走；他所谓的“买”，就是要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变为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刘少奇这一套谬论，归根到底，就是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这又一次暴露了刘少奇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忠实走狗。

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的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要坚信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破除迷信，打破洋框框，用科学的批判的眼光，对待过去的和外来的事务，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勇于探索新鲜事物。推陈出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工业建设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本保证。

在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前进的。如果我们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人民得到一切或者丧失一切的头等重大问题。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工业化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不搞革命，片面地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质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政权就要改变颜色，经济建设的一切成果，就会被资产阶级吞食，用来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因此，首先必须搞好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只有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和智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二十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每一个伟大成就，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批判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建国初期，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刘少奇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分子，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迈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雄伟步伐。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主席又及时地批判了刘少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罪恶行径，加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接着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促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雄伟的大跃进。

随后，毛主席又一次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配合帝、修、反的反华逆流，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阵阵嚎叫，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和反对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斗争，战胜了由于苏修背信弃义撕毁协定和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推动了工业建设的继续发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象火山爆发一样地迸发出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社会主义革命每一个胜利，都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还需要进一步肃清。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更加广泛地、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我们的头脑。要抓紧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继续批判刘少奇搞的那一套“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等修正主义黑货，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总是十分注意集中、研究、概括和总结群众的智慧、群众的经验、群众的创造。毛主席天才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人民当家做主，为发挥人民群众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指出了最广阔的道路。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这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强大的力量源泉。在工业战线上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他们的彻底革命精神，依靠他们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依靠他们勤劳的双手，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为实现总路线而规定的；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它从各方面，通过各个途径，开辟最广大的阵地，使全体人民群众都有用武之地，使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的坚实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一九五八年，我国工业战线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工业战线上群众运动的滚滚洪流，冲垮了那些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洋教条、老框框、旧秩序。一贯敌视革命群众的工贼刘少奇，害怕群众运动冲破他们设下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罗网，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刘少奇一伙制定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企图用一条条绳索，把工人群众的手脚紧紧捆住，扼杀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

毛主席曾经痛斥那些反对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指导。放弃指导的尾巴主义是不对的。这种指导，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做群众的小学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我们要彻底批判刘少奇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工人阶级，正在工业战线上开展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形势越来越好。工业战线上的各级干部，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中去，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坚持合理的、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要在广大群众生气勃勃的实践中，用毛泽东思想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及时发现新的思想、新的创造、新的经验，加以总结，把已经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把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后来，毛主席又进一步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毛主席指引的工业化道路，其实质就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充分调动我国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力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发展了，生产资料得到优先增长，才能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为农业的技术改造、为轻工业和重工业本身的发展，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少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后果是，人民不满意，重工业也不会真正搞好，反而被轻工业和农业拖住了后腿。另一种办法，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就能生产大量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工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原料，为工业产品特别是重工业产品开辟广阔的市场，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这两大劳动阶级的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工人阶级没有农民同盟军，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使重工业得到更快地发展，就可以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加快农业技术改造的步伐，促进农业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对工业的支援，使工农联盟不断巩固和加强。

毛主席指引的工业化道路，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力地调动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加速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高涨。

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订计划、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处处想到农业、想到农民。要妥善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还要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积极地、扎实地、卓有成效地做好支援农业的工作，逐步用先进的技术把农业装备起来，实现农业机械化。

目前，有些单位存在着“支援农业吃亏”的思想，认为生产农产品产值低、利润少，搞修修补配，没有前途，这种思想是和毛主席的教导相违背的，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残余，是刘少奇“利润挂帅”的流毒。工业支援农业是一件光荣、艰巨的工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搞工业，不能只在工业上打圈圈，要牢固地树立起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大工业要这样，中、小工业更要这样。每个县都要积极地建立起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建立起为农业服务的工业网，为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备战、备荒、为人民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工业建设的根本目的。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当前，在世界人民革命洪流的猛烈冲击下，处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都在疯狂扩军备战，矛头直指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对于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在进行工业建设的时候，必须要有敌情观念和战备观念，要有纵深的配备和战略部署，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使全国工业部署逐步平衡起来，有一个合理的布局。在加速经济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防建设。

就一个地区、一个省市来说，也应从备战出发，遵照毛主席关于地区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的指示，注意工业的合理布局和适当的综合发展，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工业生产就近协作，提高工业产品就地配套的能力。并且注意做到平时和战时相结合，民用和军用相结合。如果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我们就有许多可靠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基地，有更宽广的回旋余地，做到各自为战，坚不可摧，消灭敌人，取得胜利。

发展内地工业，还可以进一步调动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业落后的状况，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

发展内地工业是主要的，但必须注意沿海工业的建设，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力量和技术力量，就可以为发展内地工业提供更先进的技术装备，培养更多的技术力量，积累更多的资金，促进内地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当前，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日子都很不好过，他们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如同旭日东升，欣欣向荣，日益繁荣昌盛。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朝气蓬勃。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正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阔步前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更有力地支援世界革命而英勇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 1969年第10期)

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在全国人民欢庆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各族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敬！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致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你们问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诞生，就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我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十年来，全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把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二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胜利地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颠覆阴谋和破坏活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为亿万人民所掌握，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反帝反修的一个强大政治力量。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新贡献，开拓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道路。全国人民从长期的斗争中得出一个真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

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现在，我们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要抓紧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掀起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

同志们！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把我们的国防力量建设得更加强大。

二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空前孤立。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他们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实行扩军备战，并且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我国历来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

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警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国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将是你们的坟墓！

我们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派人侵老挝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五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9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

上海革命大批判专栏发挥出强大战斗力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

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上海市的革命大批判专栏越办越多，越办越好，在推动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斗、批、改深入发展的伟大斗争中，显示着越来越强大的战斗力。

现在，在上海市不论是有成千上万人的大工厂、大学校，或者是只有几十人、上百人的工厂、小学、机关和商店，到处都可以看到革命大批判专栏。在街头和里弄，在外滩、人民广场、工业展览馆都出现了许多成片的革命大批判专栏阵地。这些专栏内容深刻，观点鲜明，文锋犀利，图文并茂，生动活泼，锋芒所向，直指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以及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成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革命大批判专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三年来，它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和《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发表以后，上海市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一个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革命大批判新高潮，革命大批判专栏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这些大批判专栏，同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的大批判专栏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大批判的火力网，向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和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

紧密结合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这是上海革命大批判专栏的一个鲜明的特色。现在，上海工交、财贸系统正在蓬勃兴起经济领域斗、批、改的新高潮，有关经济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成了革命大批判专栏最突出的内容。上海工人阶级从斗争中深刻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一切剥削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政治上失败之后，还会从经济上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因此，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经济领域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持久的革命大批判。他们在革命大批判专栏中，摆出大量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狠批“生产第一”、“物质挂帅”、“专家治厂”、“技术挂帅”、“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上海国棉十七厂最近在外滩刊出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工人写的《彻底批判修字号“生产第一”》和《控诉“物质刺激”对我们的毒害》等批判文章，联系本厂的斗争实际，用鲜明对比的事实，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少奇贩卖的“生产第一”、“物质刺激”等黑货，是“一包裹着糖衣的砒霜”，妄图毒害我们工人的灵魂，使我们工人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好让他在中国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梦。

许多单位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在革命大批判专栏中，深刻地揭露了帝、修、反的侵略本质，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的“投降主义”和“活命哲学”，同时介绍了大批英雄人物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的光辉事迹，热烈赞扬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教育广大群众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彻底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紧密结合本单位斗批改的实际开展大批判，这是上海革命大批判专栏的又一个特色。上层建筑各部门举办的革命大批判专栏，都普遍把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本系统、本单位以及在社会上的流毒作为主要内容。他们选择了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历史、新闻、出版等这些方面的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典型作品，用毛泽东思想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批判。通过批判，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使广大革命人民擦亮了眼睛，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一些大学的大批判专栏，还刊登了一些受毒较深的演员和教师等写的控诉文章。他们以亲身的经历，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文艺和教育理论对自己的毒害。这些文章，现身说法，既批判修正主义，又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既提高自己的思想，又教育广大群众。

上海的革命大批判专栏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起来的。随着革命大批判专栏的不断发展，上海正在逐步形成一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队伍，从天真活泼的小红兵到满头白发的老工人，都成了革命大批判的闯将。全市各个区、县、局，现在都建立了专门的大批判领导小组，指定专人负责革命大批判专栏。革命委员会定期进行研究和交流经验。许多工厂、学校还成立了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占有充分材料，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以便为自己的专栏写出比较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质量较高的文章，不断提高革命大批判专栏的水平。华东师范大学一个由红卫兵和一些教师组成的大批判小组，一年多来，紧密结合学校阶级斗争的实际，写出了六十多篇革命大批判文章，成了这个学校革命大批判战线的一支红色突击队。

现在，上海革命大批判专栏已经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效武器，它有力地促进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各条战线斗、批、改的深入发

展。上海炼油厂的广大革命工人，同一机部热工仪表研究所的革命技术人员一道，共同试验成功用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炼油生产，实现了炼油工业技术的新飞跃。他们在试验这一新技术的过程中，为了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连续三次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展开了深入的批判，出了三次革命大批判专栏，大大加速了试验的进度。闸北区烽火街道在今年六月以来，陆续举办了九块革命大批判专栏，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光辉指示，狠批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使毛主席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光辉指示越来越深入人心，促使街道大批知识青年意气风发地走上了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据新华社上海 1969 年 11 月 2 日电，载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认真 落实党的对敌斗争政策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工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子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的教导和“给出路”的政策，在驻厂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认真落实了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不仅把长期隐藏在工人和干部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清查了出来，而且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改造那些原来属于敌人营垒，今天已向人民缴械投降了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二七工厂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以后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正式开始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军宣队和广大革命工人一起，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的教导，认为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一方面要依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打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分清敌我，划清阶级阵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从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出发，用毛泽东思想把从敌人营垒中投降过来的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他们认为，这样做好处很多：（一）把敌人营垒中的多数人改造过来，敌人的队伍缩小了，我们的队伍扩大了，就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二）阶级敌人也有妻儿老小和亲戚朋友，改造他们一个，就能团结争取他们一家人或几家人；（三）他们中不少人在工厂多年，一般都有些技术，虽然有的技术并不怎么高明，改造过来，可以增加一分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用适当的方法改造反动阶级的分子，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战略思想，是无产阶

级的光荣历史任务。它不仅可以分化瓦解敌人，有力地推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符合当前对敌斗争的需要，同时也符合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有利于消灭反动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二七工厂的革委会和革命群众，在军宣队帮助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了阶级敌人的情况，既看到敌人的反动和顽固，也看到了他们的矛盾和虚弱。大家一致认识到，阶级敌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中的多数是可以改造成为新人的。特别是经过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人民力量无比强大，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巩固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和改造敌人阵营中的愿意悔罪自新的分子，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就二七工厂清查出来的阶级敌人和有各种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来分析，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以外，多数是属于裹胁分子，解放后一般都已停止活动，只是由于种种顾虑，没有坦白交代。因此，只要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党的“给出路”的政策，是可以把这些人争取改造过来的。

经过这样反复学习分析，明确了改造阶级敌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大家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一些原来认为“阶级敌人不过一小撮，改造不改造没大关系”，以及担心阶级敌人能不能改造好的同志，也改变了看法。他们豪迈地说：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不仅有责任有能力把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清查出来，而且也有责任有能力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化”过来，“化”到人民方面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因此，二七工厂革命群众在军宣队的帮助下，在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就注意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了对阶级敌人的改造工作，并且尽可能地扩大坦白面，为扩大改造面创造有利条件。他们认为，阶级敌人对自己的反动身份和罪行，由长期隐瞒到坦白交代，是初步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他们对清理对象不是单纯地清他们的反动身份和罪行，而且也清他们的反动思想，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促使他们同自己的反动思想决裂。即使是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确凿证据的阶级敌人，也不轻易采取向他们亮出证据、群众揪斗的办法，而是采用政策攻心，“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让他们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对于那些受反动思想影响较深，态度比较顽固的阶级敌人，则发动群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判斗争，促使他们的思想向好的方面转化。对极少数死心塌地的继续作恶的阶级敌人，在掌握确凿证据以后，则坚决揪出，从严惩处，打击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充分发挥毛主席的政策的威力，这个厂还采取树立“宽严样板”的办法，先后召开了七次宽严大会，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掀起对敌斗争的新高潮。每一次宽严大会以后，都有阶级敌人向人民缴械投降，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厂前一时期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绝大多数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革命群众帮助下自己坦白交代的，不少人还有揭发检举，立功赎罪的表现。革命群众根据他们的罪恶大小，情节轻重，悔改表现，及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

但是，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二七工厂的革命群众和支持左解放军，在斗争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改造阶级敌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经过前

一时期大量的教育工作，大部分清理对象对自己的罪行虽有一定认识，立场开始转变，但是这种认识和转变只是初步的，要他们成为新人，还必须对他们继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把对阶级敌人的改造工作，一直贯穿于对敌斗争的始终。在大多数清理对象定案处理以后，仍然把这项工作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根据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改造方法：对于属于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放在人民内部进行教育，给他们享受人民应享的政治权利，并在群众帮助下，通过各种方式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立场。对于极少数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人，在剥夺他们一切政治权利的情况下，采取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办法，让他们在群众监督下在适当的岗位上劳动，同时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有关政策，参加有利于改造他们的对敌斗争会、批判会、忆苦思甜会等，接受多方面的教育，并由群众定期给他们讲评，肯定和鼓励他们的进步，揭发批判他们中间继续作恶的坏人。

一年来，二七工厂这种对阶级敌人的改造工作，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一些受到从宽处理的人，非常感激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挽救，一再表示要和反动思想、反动立场彻底决裂，把对党、对人民的两条心永远变成一条心，用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他们带着立功赎罪的心情在工作中规规矩矩，并且积极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向尚未交代问题的人宣传党的政策。极少数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阶级敌人，一般也都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有几个改造成绩明显，悔改较好的人，已经适时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敌人的阵营，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

广大革命工人在改造阶级敌人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路线斗争觉悟和政策水平。开始时，这个厂有个别工人对改造阶级敌人的政策不理解，认为这样做是否太宽了？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宽和严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对阶级敌人的严，主要应该是思想批判从严，用毛泽东思想去消灭他们的反动思想；对投降缴械的阶级敌人组织处理从宽，其目的也就是为了把敌人阵营中的多数人分化出来，改变他们的反动思想，为最后消灭反动阶级创造条件。因此，许多老工人都带头到清理对象家里，几十次地找他们谈话，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帮助他们办好家庭学习班。对一些不老实的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革命群众也都了如指掌，及时批斗，加强了对他们的管制和教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二七工厂的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支左人员认识到，改造阶级敌人的过程，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一直存在着改造和反改造的激烈斗争。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阶级敌人总是在窥测风向，还会出来用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因此，决不能丧失革命警惕，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地进行这场斗争。

（原载 1969 年 12 月 8 日《人民日报》）

北京新华印刷厂整党建党调查报告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北京新华印刷厂整党建党领导小组，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在驻厂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建立了支部，今年五月份成立了新的党委会，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纯洁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一、从思想整顿入手，普遍提高党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北京新华印刷厂在整党建党开始以后，首先组织了有革命干部党员、优秀工人党员、军宣队中的党员参加的三结合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在军宣队的帮助下，整党建党领导小组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教导，明确了整党建党的首要任务是以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为标准，以斗私批修为纲，对党员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把整党建党的过程看成是提高每个党员继续革命自觉性的过程；看成是增强党性，进一步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过程；看成是普遍提高党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

明确了整党建党的目的和意义以后，这个厂的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先广泛深入地发动全厂广大党员和非党群众积极投入整党建党运动，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彻底批判违反毛泽东思想、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

开始，有的党员错误地把这次整党建党理解成单是“开除几个，吸收几个，劝退几个，处分几个”的问题，忽视了思想上的整顿。还有个别群众错误地认为“整党是党员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及时抓住这些活思想，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端正态度，使党员和非党群众积极地投入整党建党运动。广大党员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的教导，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用毛泽东思想对照自己，检查自己，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认真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积极主动地去征求别人的意见。有一位党员曾经先后找了七十五个非党群众谈心，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既密切了党群关系，又加深了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广大非党革命群众，也积极地投入了运动，把参加整党建党运动看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看成是毛主席给自己的权利。他们积极参加会议，参加评

论，帮助了党员，锻炼了自己，更加深了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

通过认真的思想整顿和过细的群众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厂的广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很快得到了提高，广大党员边整边改，朝气蓬勃，革命干劲倍增，全厂出现了一个“党员自觉革命，群众热情评论，人人学习毛主席著作，个个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二、在“清除废料”的同时， 加强对犯错误党员的教育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清除废料”的教导，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发动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展开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流毒，清算阶级敌人在党内犯下的滔天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

北京新华印刷厂在整党建党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如何正确对待一些过去曾经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党员同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开始，个别党员和非党群众不能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有的甚至主张把这些同志都劝退出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在军宣队的帮助下，专门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统一政策，统一认识，做过细的工作，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的教导，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认真分析犯错误党员同志的情况，强调对党员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再教育，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犯过错误的党员同志，加强对党员的再教育。比如这个厂的原代理厂长，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入党以后又长期没有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较严重的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经过群众的批判教育和帮助，特别是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决心改正，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义比较好。大家分析了他的全部历史和错误根源，觉得象这样的同志，应该留在党内。这个厂还有一个党员同志，长期以来受刘少奇黑《修养》的毒害较深，缺乏革命朝气，在政治上有些死气沉沉，没有起到一个党员应起的模范作用。但是在整党建党运动中，通过自觉革命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教育，使他对过去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检查了那种“江山有了，生活好了，革命可以松宽松宽”的错误思想。他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埋头苦干，起到了党员应有的作用，大家认为，犯错误改了就好，这样的同志可以留在党内。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证明，绝大多数犯过错误的党员同志，只要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用毛泽东思想去帮助他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最后他们是能够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但是，对于少数犯了严重错误，应该给予处分的党员，则酌情给予适当处分。

三、积极慎重吸收新鲜血液，健全党的组织，实现一元化领导

在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的基础上，这个厂的党组织本着积极慎重的原则，及时吸收那些具备了党员条件的群众入党，同时把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选拔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里工作，认真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的指示，有力地促使了这个厂的党组织更加朝气蓬勃。

北京新华印刷厂整党建党以来，全厂很多同志纷纷提出申请入党。面对这一大好形势，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积极地“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他们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申请入党的同志认真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不断端正入党动机，同时，开展对刘少奇所鼓吹的“入党做官论”等黑“六论”的革命大批判，分期分批，严格按照党员标准，成熟一个，吸收一个。有一个女工，她出身贫苦，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一九五二年开始，曾经多次提出入党申请。由于她对走资派过去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多次作过斗争，所以走资派认为这个人“爱提意见”，是个“刺头”，一直不吸收她入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位女工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积极投入了运动，和大家一起造了厂内走资派的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并且敢于同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和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次整党建党运动中被吸收入党，选入支部领导班子，给党增加了新鲜血液。

在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基本结束之后，各车间就继续通过全体党员和群众充分酝酿，最后由党员选举出了支部的领导班子。在此基础上，进行反复酝酿协商，最后经党员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会。他们认为党委的建立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比较巩固；（二）进行过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阶级阵线清楚；（三）建立了支部，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四）已经形成领导核心。

新的党委成立以后，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处理好和厂革委会的关系，也就是如何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实现一元化的领导。他们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首先确定了党委会和革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认为实现一元化领导必须做到下面几点：（一）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一条是实现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是一元化领导的灵魂，党委会、革委会都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二）革委会成员大多数是党委会成员，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就是党委会的办事机构，党委会不另设办事机构；（三）革委会必须执行党委会的决议；（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使党组织真正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通过整党建党运动，北京新华印刷厂在新的党委统一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各级领导班子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指挥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

（原载1969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着重思想整顿 多做教育工作

——清华大学在整党建党工作中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党员头脑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指引下，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清华大学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取得了经验。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清华大学整党建党工作的主要经验是：以毛主席这一伟大的整党建党纲领统帅整党建党的全过程，始终坚持首先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不断地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党员头脑，深入开展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引导党员在广泛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风浪中，斗私批修，集中解决阻碍继续革命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党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贯穿于整党建党的全过程

清华大学广大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利用他们篡夺的领导权，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取消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造成清华大学党组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党员经受了考验，提高了觉悟，同时，也暴露出有些党员存在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缺乏继续革命的觉悟。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便在不断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深入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转入了整党建党工作。今年年初成立了由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中的优秀党员组成的整党建党领导小组，领导这次整党建党工作。

清华大学整党建党工作开始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着眼于思想上的整顿，还是着眼于组织上的整顿？整党建党领导小组认为，首先着眼于什么，这是整党建党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表现。有的人主张：“这次整党就是吐一批，挂一批，剩下几个批一批。”针对这种单纯强调从组织上整顿的思想，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引导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深刻认识这次整党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党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使党组织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整党建党工作伟大意义认识的基础上，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教导，自始至终坚决反复学习、坚决贯彻毛主

席的五十字的整党建党纲领，对广大党员进行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再教育，使整党建党的过程成为大破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立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过程，成为广大党员斗私批修实现思想上“吐故纳新”的过程。

“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在思想整顿中，整党建党领导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充分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正确处理了以下几个关系：（1）为要使知识分子党员实现思想上的“吐故纳新”；一方面强调必须到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另一方面，强调“革命要靠自己”，党员要实现思想革命化，最根本的还是要有自觉革命的精神，要扫除思想上的障碍，自觉地斗私批修。（2）在如何组织群众“参加评论”的问题上，一方面强调党员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不断端正态度，对革命群众提的意见要不计较分寸、态度、方式和场合，充分相信群众；另一方面，又不断教育群众对党员不要否定一切，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3）为要使整党建党运动成为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一方面对党员进行继续革命的再教育；另一方面，又使群众在“参加评论”时也受到教育，自觉地用无产阶级党性来要求自己，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由于正确处理了这几个关系，调动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思想整顿的过程中，使得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普遍地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从根本上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对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的抵抗力，保证清华大学党组织能够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引导党员集中解决阻碍继续革命的主要问题

清华大学多数知识分子党员，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长期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他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根据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清华大学整党建党领导小组认为，思想整顿和建设，必须针对每一个党员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具体表现，反复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引导他们以毛主席的五十字的整党建党纲领为标准，集中力量解决世界观中那些阻碍他们继续革命的主要问题。

在所谓的“工程师摇篮”的旧清华，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业务、轻政治，“读书做官”、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发动群众深入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黑“六论”，引导党员认清刘少奇鼓吹“业务党”的实质，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按照刘少奇所鼓吹的道路走下去，就必然迷失方向，最终背叛党的事业，是极其危险的。有个教师党员，文化大革命前是所谓的“万里挑一”的“万字号”“业务尖子”，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鼓吹的“政治上我把住关，业务上你好好干”的反革命谬论毒害下，他一心追求成名成家，还根据所谓的“政治业务分工论”，说什么“人家掌舵我划船”。在革命大批判中，他狠批了刘少奇“业务党”的反动实质，认识到自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痛心地说：“我划的船就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贼船；我过去划船的方向，就是向一个资产阶级专家的方向滑去。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挽救了

我，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新的生命。我今后一定要念念不忘毛主席的‘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教导，认真总结犯错误的经验教训，用毛主席的五十字的建党纲领严格要求自己，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经过斗私批修，他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变化。过去是“业务业务”不离口，现在是革命宝书不离手；过去是一心追求成名成家，现在是废寝忘食为革命。群众反映说：“整党前后，他好象是两个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和后期，清华大学一部分知识分子暴露出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一度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经过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提高了广大革命师生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但是，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错误思想并未完全克服。整党建党中，领导小组发动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深入批判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特别是引导党员用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危害和反动的阶级根源。那些受错误思想影响的党员，经过斗私批修，深刻认识到要做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就必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的一切，不断改造世界观，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这样，引导广大党员解决阻碍他们继续革命的主要问题，使他们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中，进一步划清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界限，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群众反映说：“这样的思想整顿，抓住了特点，击中了要害，触及了灵魂。”

使组织上“吐故纳新”的过程成为 思想上“吐故纳新”的继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在整党建党工作进入组织整顿的阶段时，清华大学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发动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提高党内外广大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引导大家首先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清除出党，从组织上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又要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一般群众组织加以区别，既要对那些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党员，劝其退党，又要耐心地帮助犯错误的党员（其中包括少数犯了严重错误必须给予适当处分的党员）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以从思想上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坚持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辅；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犯错误的党员，要着重于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再教育，能不处分的就不给予处分。这样，组织处理工作不是简单地处分一批人，而是广大党员思想上“吐故纳新”的发展和深入，使组织整顿的过程成为思想整顿的继续。

这个学校的原校党委第一副书记，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犯了走资派错误。宣传队进校后，经过揭发、批判和教育，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在这次整党中能自觉

地斗私批修，经党内外群众的充分讨论，决定留在党内，并继续帮助他总结教训，明确前进方向。这样做，鼓起了他改正错误、继续革命的勇气和决心，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华大学在普遍建立了新的党支部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以积极、严肃的态度进行“纳新”工作，接收了一批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增加了党的新鲜血液。在组织上的“纳新”过程中，他们坚持首先是思想上的“纳新”，把“纳新”的过程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和新党章的过程，引导申请入党的同志批判“入党做官论”，肃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端正入党动机。这样，就使党内外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毛主席建党路线的教育，每一次接收新党员的支部大会，都开成了生动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会。

清华大学广大党员在整党建党以后，思想上的“吐故纳新”并没有结束。他们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战斗的成果要用战斗来保卫！”许多党支部成立后的第一次组织生活会，就是认真讨论如何巩固和发展整党建党所取得的思想革命化的成果，作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实现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决定。革命在继续，清华大学在前进。

(原载 1969 年 12 月 17 日《人民日报》)

坚持无产阶级党性认真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加快斗批改步伐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带领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大加快了斗、批、改的步伐，使北京大学面貌焕然一新，正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阔步前进。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今年三月，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学，他们和原驻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联合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工作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北京大学斗、批、改群众运动。今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伟大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驻北京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真学习，坚决照办，引导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团结一致，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以势如破竹之势，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取得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团建等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近又掀起了教育革命的新高潮，革命师生意气风发地背起行装，走出校门，决心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北京大学出现的革命大好形势，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狠抓各级领导对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态度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北京大学的经验说明，狠抓各级领导成员对待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态度，是落实政策的关键。驻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的教导，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集中了群众的意见。宣传队深深感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违背党的政策，就不能实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宣传队各级领导同志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统一了认识和行动，把有没有落实无产阶级政策的高度自觉性，看作是能不能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标志。他们狠抓自身思想革命化，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紧工作，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扎实实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在斗、批、改的各个阶段，他们经常举办有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明确了三个问题：一、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无产阶级政策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二、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三、各级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要下苦功夫带头学好政策，提高政策水平，做落实政策的模范。

由于狠抓了各级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这就大大地加深了各级领导成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提高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他们一面认真学习政策，一面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遇到干扰和阻力时，他们强调要打消依赖思想，增强主动精神，去掉“怕”字，换了“敢”字，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落实政策的决心大了，办法也多了。“老大难”问题也不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如何区分错误性质，正确地对待这些人，在一部分领导和群众中一度认识不明确。宣传队的同志分头到系里去。办起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让群众自己搞清事实真相，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群众说：“一些人犯错误是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毒，不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觉悟，把他们拉过来，就是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奸计。”于是，广大革命群众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歧视，不排挤，不打击，而是热情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使他们改正错误，积极投入到斗、批、改运动中来。

把落实政策变为广大革命群众的自觉行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驻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运用学习班、讲用会、谈心活动等各种形式，让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宣传队不但原原本本把政策交给群众，而且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任务出发，向群众讲清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和怎样去落实无产阶级政策，使广大革命群众自觉地以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解放全人类的胸怀，主动地学政策，讲政策，克服各种困难去做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党的

各项政策落实得既快又好。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革命不彻底性曾经有所表现，往往是今天想通了的问题，明天又变了。宣传队不怕麻烦，不怕反复，一面耐心等待，一面及时抓住活思想，积极引导，对他们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帮助他们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克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整党中，宣传队引导广大党员和非党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对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党员既不以感情代替政策，轻易“吐故”，又不降低标准，放弃原则，敷衍了事。这样做的结果，教育了党员，也教育了党外群众。

坚持无产阶级党性，排除对落实政策的干扰

为了做到坚决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宣传队坚持革命，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充分发动群众，运用革命大批判的武器，不断同阶级敌人的破坏作斗争，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斗争，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坚决落实政策不走样。特别是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在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中，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进行干扰，搞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的人，也从中干扰。宣传队对于这些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总是及时揭穿它，引导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它。

如在落实对待两派群众组织的政策中，遇到了资产阶级派性的严重干扰，有人宣扬“北大特殊”，有人自称“一贯正确”，也有人提出一堆“难题”，叫宣传队表态，逼对方认错。不论资产阶级派性怎样干扰，宣传队始终坚持三条原则：凡是拥护毛主席，符合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就坚决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就同他们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严肃批判，耐心帮助，使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凡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就和革命群众一起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同时，根据情况，区别对待，给予出路。

宣传队为保证“三条原则”的落实，做到“一碗水端平”，还坚持做到了“四个不”，即：（一）不带框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毛泽东思想鉴别是非，不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和干扰。（二）不回避矛盾。放手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不怕反复。（三）不搞折中。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符合多少就肯定多少，违背多少就否定和纠正多少。不怕压也不受捧。（四）不当“裁判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当，不轻易表态。宣传队坚持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无产阶级党性，来教育群众，武装群众，引导群众揭露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本质。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中，尖锐地指出：那种强调自己“一贯正确”，搞“以我为核心”的人，实质上就是要由一部分群众去压迫另一部分群众，完全违背毛主席关于“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的教导，其结果必然是分裂革命队伍，保护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通过革命大批判，广大革命群众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分清了是非界限。大家指出，团结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继续革命的需要；而资产阶级派性恰恰适应了阶级敌人分裂革命队伍，瓦解无

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样，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两派群众很快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抓落实政策的样板，加快斗批改步伐

抓典型，树样板，是北京大学落实党的政策，加快斗、批、改步伐的一个重要方法。宣传队为了及时抓住代表运动前进方向的苗头，过细地做工作，一发现先进典型，就热情扶持，积极帮助，大力推广。如在落实对待两派群众组织政策中，树立了许多两派群众结成“一对红”、“一串红”的典型。他们有效地运用讲用会的形式，大力宣扬先进典型的先进思想，这样很快形成了一批积极分子队伍。有了一批积极分子，就争取了另外一批，逐步团结了大多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也树立了讲政策、用政策的积极分子典型以及体现政策的“宽严样板”。在对敌斗争中，中文系贴出了许多革命大字报，批判阶级敌人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向阶级敌人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队及时抓住这个典型在全校推广，使广大革命群众从思想上明确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敌我，划清阶级阵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把反革命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最终地消灭反动阶级。宣传队引导大家认识到党的“给出路”的政策，是我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处理革命与反革命关系的基本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在全校掀起了“三讲三批”的高潮，即：大讲历史发展的总趋向，狠批阶级敌人的幻想；在政治上使他们对反动派绝望；大讲“给出路”的政策，狠批阶级敌人的错误态度，打消阶级敌人对党的政策的种种顾虑，给他们指明出路；大讲唯物辩证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狠批阶级敌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揭露他们的各种欺骗手法和侥幸过关心理，促使他们向好的方面转化。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迫使敌人营垒里的许多人走上坦白从宽的道路，彻底孤立了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

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埋头苦干，扎实地做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了广大群众，促使知识分子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个人第一、争名争利、理论脱离实际和言行不一的坏作风，以及“学而优则仕”、“知识私有”、“知识即权力”等等谬论，也受到了有力的批判。广大知识分子决心冲破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在宣传队和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帮助下，主动地起来进行自我批判，争取做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当前蓬勃开展的教育革命中，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遵照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教育要革命”的伟大领导，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思想革命化，决心建设一支经得起各种斗争考验的革命化的知识分子队伍，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 1969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

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在首都普遍开花结果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驻北京针织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带领这些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各个阶段，创造了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现在，这些经验正在首都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和街道普遍开花结果，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地向前发展。

首都广大军民赞扬说，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越学习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心越明、眼越亮，办法越多，越学越想学。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在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人民解放军领导部门，积极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广大革命群众和支左人员认真学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全市先后参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报告会和交流经验现场会的，在百万人次以上。各区、县，各系统，都普遍举办了学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的学习班、讲用会和经验交流会，树立本地区、本部门学得好的典型。许多单位的革命群众带着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反复学习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大大加快了斗、批、改的前进步伐。

首都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支左人员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学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最根本的是学习他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革命精神。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和支左人员以六厂二校为榜样，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带着斗争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使斗、批、改工作取得节节胜利。全市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的单位，反复对照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总结检查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巩固和发展战斗成果。按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要求，大多数单位，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正在抓紧整党建党等项工作。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的工作在积极进行，全市已先后有两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受到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工人的欢迎。

蓬蓬勃勃的斗、批、改群众运动，促进了生产、工作和战备。在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首都工人阶级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竞赛，革命和生产都取得很大成绩，已有大批工厂提前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郊区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掀起了农田水利冬修高潮，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

首都各条战线以六厂二校为榜样，结合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北京煤炭工业系统的一些单位，组织革命群众开展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革命大批判，增强了大家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推动了革命、生产的迅速发展。整个煤炭系统已提前二十二天完成了今年全年煤炭生产任务。

北京市各级革委会和解放军支左部队，向六厂二校学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习他们在一切工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坚持对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单位运用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引导群众用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大联合，增强了革命团结，为斗、批、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第二轻工业机械厂两派群众一度严重对立，成为“老大难”单位。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这里后，以六厂二校为榜样，坚决按照“三条原则”、“九个一样”办事，做到“一碗水端平”。他们引导群众斗私批修，自己教育自己。这样，使两派群众消除了隔阂，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抓革命，促生产。驻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运用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正确解决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首都广大军民学习六厂二校经验，深刻领会和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从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北京航空学院等单位认真学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进经验，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他们积极引导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对那些与工农结合得好，并有所发明创造的知识分子，及时地给予鼓励和表扬。这样，使广大知识分子认清了前进的方向，积极地投入了教育革命的行列。

毛主席教导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北京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学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严肃地批判他们的错误，同时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地解放他们。目前，许多单位应解放的干部已经全部解放，不少干部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首都各级革委会和解放军支左人员还努力学习六厂二校各级领导班子实现思想革命化的经验，用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头脑，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北京机床电器厂革委会学习北京化工三厂革委会开门整风的经验，多次进行开门整风，克服一些同志在成绩面前一度滋长的骄傲情绪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各单位都把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作为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一项根本措施来抓，使干部永远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新华社 1969 年 12 月 20 日讯，载 12 月 21 日《人民日报》)

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过去的十年，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公开论战，激烈搏斗，取得伟大胜利的十年；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蓬勃发展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新的条件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英雄的越南人民的铁拳，把美帝国主义打得焦头烂额。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越来越广阔地鼓舞着亚、非、拉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堤坝，一块一块地塌了下来。漫天的革命烽火已经燃烧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震撼西方的财政金融危机，日益严重、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病入膏肓。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爬上世界资本主义霸主地位的美帝国主义，没有过多久就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它扩军备战，到处侵略，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把一根根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被全世界人民越勒越紧了。自称世界“最富有”的美国，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越来越贫困和饥饿。美国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反对垄断资本集团的斗争和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使美国反动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一任任的白宫主子，找不出一付挽救美帝国主义衰落的灵丹妙药。曾经吹嘘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的华尔街老板们，无可奈何地哀叹美国进入了“困难的年代”。美帝国主义的急剧没落，突出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上极其深刻的、新的总危机。

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苏修叛徒集团加速走向彻底破产。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跳梁小丑赫鲁晓夫，曾几何时，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渣滓。他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之流，更是一代不

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重重危机。他们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侵略扩张，彻底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激起了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不过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它既不能挽救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覆灭，也不能挽救它自己的灭亡。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垂死的新殖民主义的变种而已。

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相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更加巩固、更加繁荣、更加壮大，更加朝气蓬勃。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党，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展开的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从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上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更大胜利准备了条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辟了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大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七亿人民中空前大普及。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深远历史影响，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当代反帝反修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成为世界革命的希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的革命力量壮大了，阶级阵线分明了。世界基本矛盾的新发展，必然要继续引起革命。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的年代。不管美帝、苏修怎样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势力范围，不管它们施展多少阴谋诡计，发动什么样的侵略战争，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它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军队，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一定不会辜负世界人民寄予我们的希望。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当前，斗、批、改的群众运动，正在各条战线深入发展。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在进一步全面落实。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新事物到处出现。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同斗、批、改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政治领域中按照党的政策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步骤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要把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卫生等方面的革命坚持下去，深入下去，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毛主席在“九大”期间一再指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地、深入细致地、积极而又慎重地做好斗、批、改的各项工作。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建设我们的党，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在整党建党中，自始至终都要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认真地学习新党章，对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认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学说的教育，进行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教育，批判各种右的或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要正确地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毛主席的指示和新党章的各项规定对照自己，彻底改造世界观。

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各级领导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指示，使运动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深入地、持久地向前发展。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就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落实到每一个省、每一个县、每一个基层单位、每一项事业。要注意调查研究经济工作中各项政策性的问题。订计划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毛主席最近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毛主席这个伟大指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远见，向全世界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全世界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全中国人民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作好充分准备。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各级领导机关要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精兵简政，以适应战备的需要。要巩固和完善各级革命委员会，继续加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要加强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继续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要更进一步提高，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面落实四好，加强战斗力，随时准备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立新功。

同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外交关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敢于侵犯我国，我们就坚决把他们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1970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沿着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前进

(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

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九大”的指引下，整党建党运动正在深入地向前发展。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这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战备的根本大事，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进行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

毛主席这五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是对我们党几十年建党经验最科学的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伟大贡献。它明确规定了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指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是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是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朝气蓬勃的党。它从阶级基础、先进思想、群众路线、阶级斗争和党内生活五个基本方面，对我们党的性质和领导作用作了深刻的概括。

按照毛主席“五十字”大纲整党建党，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必然要阴谋破坏。我们决不能因为整党是解决党内问题而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在我们队伍内部也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斗争的实质，就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斗争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也就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建设党，还是按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

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整党建党工作沿着毛主席建党路线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组织实现的，是通过党组织率领广大革命群众执行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生动体现。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

开门整党，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员和群众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既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又要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反对来自右的和“左”的两个方面的干扰。

右的干扰，反对整党中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说什么：“整党是党内的事，群众无权干

涉!”这种把党的领导和党的群众路线对立起来的论调，决不是真正要加强党的领导，而是反映了少数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的心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群众落后论”余毒未肃清的表现。按着这种思想办事，就会听不到革命群众中的好意见，使整党建党脱离群众，把党的领导架空起来。

一些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领导。他们说：“我们老造反派最革命最先进，整党建党得由我们来领导，以我们为基础。”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应当领导一切。我们的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了全党，清除了坏人，锻炼了党员，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更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我们一些同志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贡献，就自命为“最革命最先进”，这反映了他们不能正确看待自己，十分缺乏自我改造精神。还有的同志，不切实际地极力夸大原来群众组织的作用，摆错了同党的关系，要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同党争夺领导权，这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表现。以他们为“基础”来改造党，这就是要把党组织由无产阶级先锋队降低到群众组织的水平。

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思潮，实际上都是要按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毛主席早就英明地指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建设党，就必须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的：“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就是要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学习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学习新党章，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黑《修养》、黑“六论”，批判各种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划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界限。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必须通过思想整顿和建设，使党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强堡垒，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要反复强调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无产阶级党性，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没有这种科学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性就是阶级性，科学性就是理论性，组织纪律性就是战斗性。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衡量一切，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原则，搞好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否则，就会被资产阶级派性所左右，把整党建党引到歪路上去。

为了搞好思想整顿和建设，我们要对党的队伍和党员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作具体的分析。要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两种偏向。

肯定一切的同志认为，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党员都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没有必要再搞思想整顿了。他们没有看到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并没有肃清，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经常在侵蚀我们的党。我们应当帮助这些同志摆脱“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的影响，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

否定一切的同志，只看到党员的缺点错误的一面，揪住不放，无限上纲。对这些同志如果对我们不善于引导的话，就不利于帮助党员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焕发蓬勃的战斗精神。

我们二七厂，在开展学习、大批判和阶级教育的基础上，反对了这两种倾向，提高党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狠抓了党员斗私批修这个重要环节。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党员斗私和群众帮助，党员的自觉革命是主要的。我们要求党员正确对待群众，做到征求意见要诚心，接受意见要虚心，改正错误有决心。所谓“诚心”就是要有诚恳的自我批评，不是敷衍过关；“虚心”就是要让群众把话说完，真正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进来；“决心”就是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改正错误。由于党员做到了这“三心”，群众深受感动，在帮助党员时，也做到了提意见时热心，帮助时有耐心，对党员改正错误有信心。正如一位老工人说的：“三心换三心，外因促内因，共同干革命，党群一条心。”这样，就达到了两个团结，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

党员斗私，我们要求要抓要害、触灵魂，路线斗争上找问题，世界观上找根源，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行动上见效果。反对“道理一大篇，实际不沾边”的空谈，反对“帽大檐宽遮住脸，挡住风雨好过关”的过关思想，也反对“你提我斗，针尖不漏”地摆“豆腐账”。在群众对党员评论时，我们积极引导群众用正确的态度帮助党员，要注意看大节，看主流，看发展；原则问题不让步，枝节问题不纠缠，相同观点不迁就，不同观点不刁难。有的工人说：我们决不当“检票员”，把住关卡；要当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积极促进。

这次整党，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地、主动地进行斗私批修，欢迎群众评论。如果一定要说这是“过关”的话，那就是过社会主义革命“关”，而这一“关”则是人人都必须过的。

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建设党，在思想整顿和建设的基础上，还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进行组织整顿和建设。既要反对“大吐大纳”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不吐不纳”的保守倾向，更要反对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搞“吐疏纳亲”的错误倾向，反对这三种倾向，才能在组织整顿和建设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和纯洁性。

必须看到，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经过教育，大都是可以改正的。需要“吐故”的只是极少数。遵照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大多数的一贯思想，应当使绝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经过斗私批修，群众评论，过组织生活。然后依靠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搞好吐故纳新。

“吐故”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敌我界限；也要区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不能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不论按敌我矛盾处理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都必须坚决清除出党。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都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团结教育他们。对经过耐心教育和做过细的工作，仍不够党员条件的人，也不能留在党内。对少数问题严重的，应酌情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不加分析，一律处分是不对的；不讲原则，对一些人的错误“一风吹”，也是错误的。对于少数政治历史问题一时搞不清楚，以及犯有严重错误一时得不到群众谅解的，不能草率处理，可

以暂时“挂”起来，然后积极进行工作，有步骤地加以解决。总之，在进行组织处理时，必须“取慎重态度”，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防止偏宽偏严两种错误倾向。

在我们二七厂一部分党员和群众中，对被吐对象，曾出现过“一吐了之”的简单化的想法。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有利于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这一思想出发，只要不是专政对象，就让他们参加整党学习班，党员和群众一样地热心帮助他们，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对“吐故”的认识。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是好的。他们深受感动，表示：“为了党的纯洁，把自己清除出党是完全应该的。今后，要好好改造自己，永远跟党走。”对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尚未交代的，我们也让他们参加整党学习班，进一步开展政策攻心，再一次给他们走坦白从宽道路的机会，把整党和清队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清队成果。有人说：这样做是右倾。这是不正确的。他们不懂得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没有看到这样做，既坚持了原则，该“吐故”的坚决“吐故”；又更好地体现了毛主席关于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的思想和对敌斗争的策略思想。

“纳新”必须严格按照新党章的规定，积极、严肃地进行。对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特别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要积极吸收他们入党。一时条件还不具备的，要积极培养，鼓励他们创造条件。采取冷淡的态度是不对的，降低标准吸收进来也是不对的。对一般群众是这样，对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也是这样。

我们要帮助一些同志克服“造反有功，入党有份”、“当了革委会领导成员理应入党”和“要发展党员就得一派一个”的错误思想。这些思想都是不符合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实际上都是要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当了领导就得入党，这种“做官入党论”，不过是刘少奇“入党做官论”的翻版。“一派一个”，在原来的两派中间搞平衡，那不就把我们党变成派别的联合组织了吗！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严格按照新党章关于党员条件的规定办事，不能“怕”字当头，不能强调“工作需要”，“照顾关系”和“便于领导”，把不具备条件的人发展到党内来。

在组织整顿和建设中，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是极其重要的。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正如群众所说的是“权中之权”。只有把党权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才能巩固整党建党的胜利成果，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充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把优秀的共产党员选拔到领导班子里来。对于新的领导班子，仍应继续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实现思想革命化，使它更充分地发挥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整党建党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抓紧抓好，使我们党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加强战备，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反对帝、修、反的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 1970年第1期)

清华大学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节录）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校革命委员会，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教导，带领广大革命师生，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革命大批判的许多重要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精神，认真总结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经验，进一步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深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校革命委员会在领导学校斗、批、改的斗争中，深刻体会到，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大批判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各种右的或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大学。他们结合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新特点和斗、批、改的任务，带领广大革命师生批判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随着革命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革命师生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斗、批、改群众运动不断创造出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

随着阶级斗争和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在跨进伟大的七十年代以后，宣传队和校革委会领导革命师生把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对刘少奇及其在清华大学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在科研和生产中疯狂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批判，对刘少奇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明及其在文艺领域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批判，对学校各学科封、资、修思想体系的批判，以及对哲学、教育、经济、历史等各个文化领域中修正主义的批判，继续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

（新华社 1970 年 2 月 24 日讯，载 2 月 25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 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五日)

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发给你们。这几个报告写的都很好。请你们转发至中央、省、市、自治区管理的直属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革委会负责同志和驻大专院校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要他们仔细地阅读。要求他们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特别是那些老大难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一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是不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今后应当怎样认真搞好斗、批、改，更好地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争取更大的胜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

北大宣传队“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都很好。这是八三四一支左部队进入北大后，对该校斗批改三个阶段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北京市的斗批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送上，请阅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

一九六八年八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大学，热情地宣传毛泽

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制止了武斗，促进两派在组织上实现了按班、系的革命大联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取得了不少成绩，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今年三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为了加快北大斗、批、改步伐，又增加了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乘“九大”的浩荡东风，遵照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宣传队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加强团结，落实政策。全校很快出现了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新局面，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

这一段工作不仅教育了广大群众，也教育了宣传队自己。它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错了就改，才能在斗争中

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宣传队在斗争中能不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是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并且用毛泽东思想把它改造过来的关键问题。

宣传队对前一段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正视它、改正它，还是回避和掩盖起来？原来宣传队中有的同志对前一种做法有顾虑，在走与留的问题上考虑较多：走了，怕回去不好交代；留下，怕没有威信，不好领导。还怕内部互相埋怨，不好工作；怕走回头路，使北大运动更加落后。针对这些活思想，宣传队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教导，从思想上提高觉悟，统一认识。

事实证明，“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问题发生在群众中，根子在领导。因此，必须首先统一军宣队的认识，做好领导的工作。

当时，进驻北大的八三四一部队遵照毛主席“谦虚、谨慎”、“做群众的小学生”的教导，和原驻校四五八七部队宣传队拧成一股绳，不分你我，尊重兄弟部队，学习兄弟部队的长处，共同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政策；既积极参加领导，又不是包办代替；对四五八七部队在前一段工作中的成绩充分肯定，并虚心学习，对缺点错误，经过调查研究，也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提出，热情进行帮助；有不同看法在领导内部谈心，统一认识，并且完全相信兄弟部队能够改正前进中的错误，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四五八七部队对八三四一部队热情欢迎，并看作是对自己的支援；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重视缺点错误，勇于作自我批评。

在组织领导上，两支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四五八七部队的同志继续担任第一把手。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实现一元化的领导。

由于两支部队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因此，对统一整个宣传队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大家认识到：矛盾必须揭露，“夹生饭”要重做。这样看来好象是慢了，但只要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紧工作，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摸着石头过河”，扎实实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可以加快步伐，变消极为积极，变后进为先进。

宣传队统一了认识，遵照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很快掀起了一个“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新高潮。群众一经发动，就提了很多意见，其中也有个别意见

带有资产阶级派性。这时，宣传队有的同志又产生了活思想：怕知识分子翘尾巴、动摇了工人阶级的领导，特别是怕资产阶级派性大发作，再出现大反复、大混乱的局面。因此，对发动群众，总结经验产生动摇。这时，宣传队带着问题共同学习毛主席关于“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的教导，端正对群众的态度，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大家一起深入群众，听取意见。群众诚恳地指出：“宣传队的错误是上跟毛泽东思想不紧，下靠广大革命群众不牢。”这使宣传队受到很大教育。

宣传队通过调查研究，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认真分析了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深深感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犯了错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知错不改，违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破坏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错了就改，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宣传队的同志在学习班里，在大、小讲用会上，谈心得体会，主动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最后，宣传队负责人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总结，高姿态地检查了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这样做，使群众受到很大教育。他们说：“宣传队最忠于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改正错误本身就是对我们一次最好的再教育。”许多群众主动要求在讲用会上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找宣传队的同志谈心、交心。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关系更密切了。

实践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宣传队公开承认错误，结果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说话不是不灵了，而是更有人听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原来宣传队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按照过去我们那种做法，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脱离了群众，结果按下葫芦起来瓢。现在是有了错误就改，压力变成了动力，包袱变成了财富，被动变成了主动。”

二、团结起来，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围绕着校文革问题，在一九六七年先后分成两大派：“新北大公社”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校文革是一九六六年九月，根据“十六条”精神成立的。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组织革命大串连等，曾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运动的中、后期站在“公社”一边，形成了一派掌权。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实行所谓“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采取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的方针，把对立面组织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操纵的保守组织”。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校文革对人民内部既无真正的民主，对反动派又无有效的专政。其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继续分裂的局面，以致发生武斗，搞逼、供、信，严重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

“逼、供、信文革”。后来，虽然在组织上联合了，并且在基层成立了有两派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纠正原来一派掌权的错误，使两派群众仍然没有消除对立情绪。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还是不能落实，斗、批、改不能顺利进行。

为了纠正原先一派掌权的错误，解决两派的对立情绪，宣传队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贯彻“九大”团结的精神，响应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广大群众能够本着坚持革命，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精神、结合北大运动“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的全过程，“认真总结经验”。通过“三忠于”讲用会的方法，强调“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问题刚刚揭开，就遇到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有的说：“北大情况特殊”，“校文革是红色政权，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你们要慎重”，有的就翘尾巴，说自己是“一贯正确”，有的则采取消极态度：等宣传队表态，等头头检查，等对方认错，等等。

不论资产阶级派性怎样干扰，宣传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始终坚持了三条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耐心帮助，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和革命群众一起把它揪出来斗倒斗臭，按照党的政策，区别对待，给予出路。

根据北大的实践，为保证“三条原则”的落实，做到“一碗水端平”，我们按照“四不”的要求去做，即：（一）不带框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毛泽东思想鉴别是非，不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和干扰。（二）不回避矛盾。放手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不怕反复，不怕乱。（三）不搞平衡。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符合多少就肯定多少，违背多少就否定和纠正多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不怕压也不受捧。（四）不当裁判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当，不轻易表态。

由于这些原则是建立在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和相信群众革命自觉性的基础上，是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出发的，所以最终是能够受到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从这一个原则出发，我们狠抓了群众和头头的工作，但关键是做好群众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帮助，一个一个地落实，不怕麻烦，不怕反复。有的人谈话达二、三十次。实践证明，青年人有了错误，一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改正得也快。原先所谓“跳得很高”的“铁杆”、同宣传队和群众顶牛的人，后来有不少成了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积极分子。全校很快形成了三分之一的积极分子队伍。有了第一个三分之一，就团结了第二个三分之一，逐步争取了第三个三分之一。于是形势就大不相同了。

原两派群众在“三忠于”讲用会上争先“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了两大派的功与过。过去“公社”派“铁了心保校文革”和“井冈山”派“砍头也不下山”的人，在讲用会上都首先肯定了对方的成绩，然后批判了本组织的错误。原“公社”派的群众在肯定校文革和“井冈山”成绩的同时，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校文革一派掌权的严重错误。他们说：“一派掌权就是为山头利益掌权，为私字掌权，为个人掌权，是搞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最后，既团结不了群众，更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原“井冈山”派的群众，在充分肯定了校文革在运动初期的功劳和本组织成绩的同时，也严肃地批判了“井

“冈山”中的少数人受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所犯的严重错误。

两派群众起来了，群众觉悟在先、继续前进了，有的头头还迟迟不觉悟。这时，是甩开不管，还是耐心地——帮到底？我们坚持了后一种做法。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又及时肯定他们的进步和过去的成绩，鼓励他们继续革命，带好头。后来在基层单位和全校的“三忠于”讲用会上，原两派头头作了自我批评。校文革的负责人承认了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因此，又促进了群众的革命大团结。

一派掌权的历史教训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群众：一派掌权的实质是由一部分群众去压迫另一部分群众，完全违背毛主席关于“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的教导，其结果必定分裂革命队伍，保护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一派掌权的错误必须承认，必须纠正，否则，永远也过不了关；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改良的办法，凑合的办法是绝然行不通的。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是为了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借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而另立山头搞分裂，也是错误的，它不仅不能纠正错误，团结对敌，反而只会继续加剧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给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三、落实政策，才能团结群众的大多数

一派掌权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对立面群众组织里的许多人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去年宣传队进校后，从十月至今年二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有的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问题也被牵连进去，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有的被当成“同伙”和“知情人”打击了，有的毕业后还给转去了所谓“反革命”材料。所以有的同志说：“打击了一批，牵扯了一串，压制了一片”，使很多人背上了包袱。如原“井冈山”派的一个骨干支队，原来对立面组织就想搞他们，宣传队进校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这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把这个别人的问题上纲，逐个进行审查，最后在这个六十多人的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冲击了二十多人。在干部中揪所谓“黑班底”时，干部参加了一派有的就被说成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没参加的有的就被说成是“第三势力”，搞得干部无所适从。有的人有历史问题已经搞清并有了正确结论，也要老账新算。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加剧了原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

造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领会不够，主观上想抓反革命，但打击面宽了；有的是受了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正象有的同志说的：“过去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有的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硬把对方的一些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怎样解决扩大化问题呢？宣传队不是采取开个大会宣布平反的简单办法，而是把毛主席关于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思想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解决问题。具体做法是：

1、宣传队不包办代替，充分发动群众，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按照事物的原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解决扩大化问题。各单位办起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问题让群众自己去分析，专案材料的水分让群众自己除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让群众自己去区别，疙瘩让群众自己去解开。事实上扩大化的问题主要是在原两派群众中搞的，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团结同志。正象有的同志说的：“犯错误是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毒，不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肃清流毒把他拉过来，就是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计。用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扩大化问题，才能纠错纠得好，斗私斗得深；消毒消得净，对敌搞得准。”

2、宣传队主动承担错误，不在群众中追查个人责任。纠正扩大化问题时，原来搞专案的同志有的怕整到自己头上。但宣传队的同志主动承担责任，没有把一部分群众的包袱放到另一部分群众身上，这样双方都很高兴。他们说：“宣传队勇于承担责任，不追查我们的责任，反倒觉得自己有责任。”因此主动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过去给一部分毕业生带走的或寄给工作单位和原籍的所谓“反革命”材料，逐个追回，予以澄清。

3、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里特别注意做好搞专案和被整的人的思想工作。通过开讲用会和谈心的办法，使双方认识各自的问题，同群众共同来落实党的政策。在讲用会上大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争着作自我批评，当众烧毁所谓“反革命”材料，当场结成“一对红”。在解决一个曾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青年助教问题的讲用会上，专案人员首先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派性，检查了在扩大化问题上的错误。这个助教听了很受感动，也在会上“斗私、批修”，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当场和原来几个搞专案的同志结成了“一串红”。宣传队根据群众的要求，宣布将这个助教的全部专案材料当场烧毁，全场热烈鼓掌，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过去被说成这个助教的“同伙”和受到牵连的共二十四人也卸下了“千斤包袱”。

4、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纠正扩大化的时候，防止“一风吹”。在给误伤的群众平反时，防止真正的阶级敌人乘机滑过去。不要把一说成万，也不能把一说成零，有错误还要检查。注意将那些青年学生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犯了错误，受了批评，消极不满，说了些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同那些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的坏人区别开来；把那些历史上有罪行，但已经有了正确结论并有改悔表现的人，同那些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坏人区别开来。对犯思想错误的人要重在教育；对于那些历史上有了正确结论，没有新的罪行的人不再“老帐新算”。

由于解决了扩大化问题，群众受到了教育，个个心情舒畅。大家说：政策不落实，就没有团结；落实了政策，就团结了群众的大多数，孤立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四、狠抓根本，才能把小资产阶级思想

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工人阶级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砂子”，就是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因此，在发动群众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宣传队因势利导，组织师生员工活学活用“老五篇”，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

首先，引导群众联系三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从分析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固性人

手，找出改造世界观的规律性的东西。

革命群众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时指出：北大长年来在封、资、修教育路线的毒害下，知识分子中间历来存在着文人相轻、争名争利、个人第一、无政府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的两面派作风，以及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认真批判和克服，又“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这就是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资产阶级派性纠纷上。这些人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分析形势，指导运动，因此，“一会一个想法，一会一个面孔，一会一个行动”。同时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给资产阶级派性这个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披上合法的外衣，掩盖了私字的本质。许多群众说：“有了派性不得了。有眼睛看不清革命的大方向，有耳朵听不进毛主席的话，有鼻子嗅不出香和臭，有两腿走不上革命的轨道。”最后，大家认识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顽固，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宣传队从师生员工这个基本分析出发，既看到“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又相信“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同时，教育师生员工既要看到“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又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加速世界观的转变。

宣传队紧紧抓住世界观的转变这个根本问题，针对知识分子中间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的致命弱点，狠抓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大立理论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革命学风。

通过学习，使群众认识到：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要害是首先脱离了革自己的命。许多人联系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时，说：由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他们的权的时候，放弃了自我革命，没有吸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此，在运动中、后期，自己的地位起了变化以后，在掌权、用权，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便暴露了世界观上的弱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犯了错误。现在，革命，也要革自己的命，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开展思想斗争，对自己“一分为二”，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把三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变成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认识提高了，尝到了甜头，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群众中便成为一种风尚。广大群众以自我批评为主，并把它看作是为革命做了一件好事。有的说：过去作自我批评感到痛苦，现在感到痛快；过去感到是压力，现在感到是动力。

宣传队在狠抓学风的同时，还加强对师生员工的阶级教育、唯物辩证法和革命纪律的教育，大大加速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

当前，在全校出现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高潮。大家共同的决心是：“一言一行让毛主席高兴，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放心。”过去那些想走，等着走，急着走的人，现在是坚决与私字斗，继续革命，跟毛主席走；过去那些“听赞扬的话，讲派性的话，行动起来不象话”的人，现在是“听毛主席的话，讲团结的话，行动起来革命化”；过去那些认为自己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的知识分子，现在决心要做“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新教育制度的探索者，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者”。革命师生员工在大批判和对敌斗争中，在教育革命的实践和夏收劳动中，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广大群众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从来没有这样深，理论联系实际从来没有这样好，自我批评的姿态从来没有这样高，团结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浓，

革命的斗志从来没有这样旺，心情从来没有这样舒畅。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

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

北大两大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以后，于七月上旬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九月二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五十一个反动组织；在现有四千七百一十一名教职员中，清出叛徒三人，特务五十五人（其中潜伏特务十七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人（内含学生一人），地、富、坏分子十四人，共一百零二人，其中大部分人已定案处理；给十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澄清三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

师生员工反映，这次清队真正体现了毛主席关于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的伟大教导。一位老教授说：“清出的这些人的反动立场，不可谓不顽固，手法不可谓不狡猾，隐藏得不可谓不深，但毛主席的政策这颗精神原子弹一经发生威力，敌人的营垒就土崩瓦解了。”一个曾经在“监改大院”当“看守”的学生说：“那时揪出近千人，关起来好几百，又打，又骂，搞逼、供、信，搞了半年多，最后一个也没有落实。这次清队，虽然做的是上次的‘夹生饭’，却用党的政策把敌人震出来了。”

这次清队，我们就是遵照毛主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在清队中加强了对清理对象的教育和改造。

一、讲明历史的总趋向，在政治上使敌人对反动派绝望。

解放二十年，阶级敌人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多数人对蒋匪帮的幻想已经破灭，但仍有不少人对蒋匪和帝、修、反抱有幻想，妄图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多数人虽然幻想破灭，但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们一遇到气候，就要兴风作浪。

我们深入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大讲历史的潮流，“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规律。大讲大好革命形势。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科学和军事力量上，将新旧中国进行历史的对比，让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使其认识到“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从政治上、理论上制服他们，压倒他们，使他们真正感到大势已去，不变也得变，对反动派绝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才会逐渐老实起来，向人民靠拢。

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就从根本上分化瓦解了敌人的营垒。清队以来有十七个潜伏特务就是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法律系教授赵理海在解放前夕亲自接受匪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的指示潜伏下来，准备蒋匪反攻时，从内部应变。解放后长期搜集我国的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这次清队他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他说：“过去我对美蒋反动派有幻想，我等了二十年，但历史已经给我作了回答，现在我决不做违反历史潮流的事，我心悦诚服地向无产阶级投降，走历史必由之路。”

二、讲明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

给阶级敌人堵死一条反动之路，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给他指明一条光明的出路。“给出路”的政策是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处理革命与反革命关系的一个基本政策。有的人对反动派虽然绝望了，但还没有决心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们不相信党的政策。宣传队遵照毛主席“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的教导，反复向他们讲明，我们的政策是改造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统统消灭；是要他们向反动思想决裂，“把废物变为有用之物”，而不是单纯从组织上一清了之，还要经过一清二批和改造之后，尽可能地运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立足于“拉”字，最大限度地扩大坦白面，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不揪不点，而是充分利用材料去开展政策攻心战，有效地宣传党的政策，促使他们自己坦白交代，为扩大教育面和扩大改造面打下基础。事实上，敌人动摇之时，就是头脑里革命与反革命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候，政策攻心战，就是要使他们象林副主席所说的“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有的群众为了促使一个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曾找他谈了六十多次话，批判他的顽固态度，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最后使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激动地说：“国民党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毛主席胸怀博大，明知是坏人，还要拉一把，这一点就使我认清了人心背向的根本原因。”一位老教授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从未见过这么耐心地向有问题的人讲政策，劝他们交代问题，这只有以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边大力宣传政策，一边具体落实政策。敌人坦白交代了之后，及时进行定案处理。在定案处理中，对于主动坦白交代了的人，大都不戴“帽子”，这些人都有家属，还有一批沾亲带故的人。一戴“帽子”，一家人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跟他有联系的人、亲戚朋友脸上也无光彩。即是要戴“帽子”，也是极个别的顽固分子。从这样一个认识出发，在一个多月之内，连续召开了四次落实政策大会，从宽处理了三十六人，从严处理了四人。就是从严的几个人，也向他们讲明：“帽子”能戴也能摘，但关键要认罪服罪，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使他们也有个奔头。由于不失时机地兑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对敌人和有各种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触动很大。有一个从台湾派遣来的特务分子，主动投案，交代了罪行，并检举了十几名同伙。

实践证明：这些人的问题搞清了，这本身就是严。群众认识了他们，并将其放在群众当中，“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这样有利于教育和改造这些人。

三、宣传唯物论辩证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清理对象绝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反动立场所决定，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特别是解放二十年隐瞒下来，这次清队还想蒙混过关。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解放后虽然隐瞒了自己的历史罪行，但多数已停止了反革命活动。二十年后，一经揭露，便感到“人格”、“面子”过不去，见不得人。

针对这一特点，宣传队反复宣传毛主席历来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教导，和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以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观点。使他们认识到：（一）罪行是客观存在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企图掩盖是自欺欺人，到头来还得清，迟清不如早清。（二）罪恶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竹筒倒豆子”，向人民靠拢，就会受到欢迎，顽抗下去罪上加罪，就要受到无产阶级的严厉制裁。（三）罪行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也可以在历史上消灭，这就是将功赎罪，重新做人。对有历史罪行的人，我党始终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其问题总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它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重在现实表现。但时至今日，仍不悔改，不坦白交代，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四）清的根本目的是同反动阶级的思想决裂，将破坏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这个转变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必须靠自己一清二批。（五）辩证法就是革命的、批判的、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回避斗争是不行的。清理对象或者经过七斗八斗，把问题斗出来，变好了，或者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由于深入宣传了毛主席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教导，有力地武装了群众，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阶级敌人，使他们逐步抛弃侥幸过关的心理，加速了向好的方面转化。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直至六八年还与同伙订立攻守同盟，自以为得计，但在革命群众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检举了同案人。他说：“砍的总没有旋的圆，过去层层设防，掩盖罪恶，但有一个不可掩盖的疮疤：罪行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西语系讲师赵琏过去生怕丢了“面子”，不肯交代解放前参加中统的罪行，这次交代了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剥去伪装，揭露真相，重新做人，把自己的名字跟‘同志’这个光荣的称号连在一起，不仅是最大的面子，而且是最大的荣誉。”

四、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对清理对象的改造。

遵照毛主席关于“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的教导，在一些清理对象定案处理之后，一方面继续深挖隐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另一方面大力改造已经作过处理的人。

对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阶级敌人，除了极个别的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依法逮捕以外，都把他们放在群众当中，进行监督改造，继续清算批判他们的罪行，并且根据他们的活思想，不断指明出路。同时，经过群众路线，给接受群众监督、表现好的十三名右派分子和四名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这就使那些专政的对象看到了具体的出路，“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对于从宽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这是大多数），一方面看到他们的坦白交代表明了同反动派的决裂；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坦白交代了，并不等于阶级意识也变过来了，他们只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因此，必须抓紧对他们的改造，“不然他们还是有可能走回头路，走自己的老路”，又变回去了。

事实上，那些人被从宽处理、不戴“帽子”以后，有的或者觉得“无冠一身轻”，“一块石头落了地”，放弃了自我改造，或者感到“自愧形胜，与众不同，低人一等”，想“用一技之长混日子”，他们大都还处在消极状态，没有转化为积极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宣传队一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加强改造，对自己的问题继续进行批判，二是发动群众继续进行帮助教育。除了组织一些忆苦会，参观阶级教育展览等活动外，还专门办学习班（包括家庭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老三篇”等光辉著作。通过学习，使他

们认识到：从宽处理之后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加速改造，抬起头来干革命；一是消沉下去，低着头混日子。坚持走前一条路，路子越走越宽，顽固走后一条路，就有重新跌入反革命泥坑的危险。他们说：阻碍自己继续改造、轻装前进的种种包袱，是“旧我的影子”，是“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因此，普遍订了改造计划，并一致表示：要加速改造，加速革命，加速前进，三步并作一步走，奋起直追，迅速赶上革命群众的前进步伐。不少人还提出要求到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将进一步发动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随时警惕，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工作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

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

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在大联合、清队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党建党。通过整党建党，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和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进一步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二十四个新建立的基层党支部，充分显示了新的领导班子朝气蓬勃的战斗堡垒作用。全校出现了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正以临战姿态深入开展斗、批、改，掀起了教育革命的新高潮。

一、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学习、

大批判，实行开门整党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的教导，整党一开始，宣传队就放手发动党内外群众，以革命的方法实行开门整党。

由于过去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党员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党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在一些党员中存在着害怕开门整党，在一些党外群众中存在着“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宣传队及时组织师生员工反复学习毛主席“五十字”大纲和“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的伟大教导，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学习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使党员和群众认识到：开门整党还是关门整党，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根本区别。要继续革命，就要开门整党，而且要彻底敞开大门，一开到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的重大革命措施。大家把整党

建党同进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同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联系起来；同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文化教育阵地联系起来；同人人需要改造，彻底摧毁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联系起来。广大群众说：“关心整党，就是关心革命，关心政权。毛主席给了我们权力，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通过大学习，大大焕发了党内外群众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除了敌对分子以外，人人都参加了整党建党工作。全校立即掀起了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高潮。

广大党员和群众愤怒控诉和声讨了大叛徒刘少奇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刘仁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彭珮云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大学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他们在“要发展业务上起作用的党员”、“名人”“专家”“权威”入党，可以先接受后审查”的口号下，把特务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入党内；他们“先专后红”、“越专越红”的口号下，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使不少师生走上了白专道路，有的蜕化变质，甚至投敌叛国，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有一个系就出了一百多个右派分子；他们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业务水平低”为借口，排挤调干生、复员转业军人和工农出身的学生。由于极力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致使党员队伍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严重不纯。有的党员在“阶级斗争熄灭论”、“业务党”、“读书做官论”的毒害下，追求所谓“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一个系的党支部，党员忙于埋头搞业务，不问政治，不愿意搞党的工作，致使这个党支部完全瘫痪，等等。

北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师生员工。广大党员和群众遵循毛主席“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的教导，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革命的大批判。在大批判中，密切联系北大的实际，联系自己所中的毒，掀起了“火线”整党的新高潮。党员和党员干部在大批判中狠抓要害，猛触灵魂，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有的当时就被群众通过过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干部“两步并成一步走”，既获得解放，同时又通过过了组织生活。

化学系有个讲师，愤怒地控诉和批判刘少奇鼓吹的黑“六论”，检查自己被“阶级斗争熄灭论”蒙住了眼睛，被“读书做官论”牵着鼻子，为了研究论文中的一条“曲线”，不愿参加国防科研的错误。当场把留苏时得的副博士证撕得粉碎，决心同修正主义思想决裂，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大批判中，党内外群众紧密联系运动的后期在一部分党员和群众中出现的所谓“政治危险论”、“读书无用论”、“文科危险论”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东语系原总支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消极情绪，经群众帮助，解放后结合到系革委会，但是工作不大胆，有三怕：怕管严了，说自己要官腔；怕管宽了，说自己争权；怕管错了，说自己复旧。因此，给自己“约法三章”：出头露面的事不干；“得罪”群众的事不干；单独表态的事不干。他在群众性大学习、大批判的高潮中，狠批了“入党做官论”。他说：“过去当官做老爷，运动中受了冲击，就走向了‘当干部危险’的另一个极端。这‘三怕’、‘三章’背后潜伏着黑‘六论’的阴魂，隐藏着一个万恶的‘私’字”。现在被选进新的支部委员会，担任支部副书记，在教育革命中，积极出主意，大胆抓支部的思想工作，受到群众的好评。

在大学习、大批判中，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本单位的党员逐个加以分析，针对不同问题赠送毛主席语录。有的为了帮助党员斗私批修，连续谈话达几十次。有的还同党员结成“一对红”、“一串红”，开展“一帮一”的活动。许多群众在大学习、大批判中，一方面对党员进行继续革命的再教育，另一方面又主动把自己摆进去，在“参加

评论”中受教育，用新党章作标准，自觉地用无产阶级党性要求自己，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说：“少参加一回整党，对自己都是很大损失。”

实践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党外群众参加整党，不仅帮助教育了党员，也深深地教育了自己，大家从一些党员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同党员共同学习，共同批判，共同提高，共同受到了一次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再教育。

二、提倡斗争哲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过去北大在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下，党内生活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这种风气反映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则是“你好我也好，大家通过就拉倒”。对此，宣传队发动群众进行了充分地揭露和批判，把那种“睁只眼，闭只眼，免得冒风险；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的好人主义批臭。使大家认识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没有斗争的哲学，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就不能“清除废料”，在思想上实现“吐故纳新”，就不能焕发党内外群众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首先要求党员要有积极的自我革命精神。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党员没有自我革命精神，不能象林副主席所指出的“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结果还是不能搞好在思想上的整顿。开始有的党员在斗私批修时出现“认罪式”的检查，或者罗列一大堆现象，不分主次，“算豆腐账”的现象，有的群众提出什么意见，就检查什么，因此，群众总是通不过。特别是少数错误严重、态度又比较消极的党员，群众有些气，有的说：对“照‘五十字’和新党章，这些人都不够条件，干脆吐故算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一方面帮助教育党员提高革命的自觉性，正确对待群众，抓住要害，触及灵魂；另一方面引导群众对党员要做全面地、历史地分析，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使是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也要一分为二，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革命队伍内部同志间的辩证关系。既要看到这些人犯有严重错误，又要看到他们绝大多数在本质上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社会主义的；既要看到这些人长年来受修正主义毒害比较深，又要看到在三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的锻炼，特别是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以后的现实表现；既要看到他们离“五十字”和新党章的要求有差距，又要相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经过帮助教育，用“五十字”武装头脑，是能够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的。因此，既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轻易“吐故”，又不能降低标准，放弃原则，敷衍了事。

生物系有一个讲师，在“业务党”的毒害下，一心想成名成家，不问政治，埋头钻研业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但是白天批判他，晚上在家里继续研究写论文。在整党中，有的人主张把他挂起来，或吐故算了。大家遵照毛主席“分清是非关系，可以教育人，可以团结全党。党内有争论，有批评，有斗争，这是必要的。……甚至采取一点斗争，这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是为了帮助人家”的教导，对他的问题一方面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热情地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这个讲师在大、小会上检查了五次，宣

传队和党内外群众先后找他谈了八次话，使他在思想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最后，他亮出了“有本事可以出人头地”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不久，被通过过了组织生活。

还有的党员有资产阶级派性，在斗私批修时，检查得“好”，一旦被通过过了组织生活，马上“老病复发”，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和革命群众再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让他回到学习班斗私批修，直到真正触及灵魂，改正了错误，才重新过组织生活。

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中，我们首先引导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坚决清除出党，从组织上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非党群众加以区别，一方面对那些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不够条件，不起作用的党员，劝其退党；另一方面耐心地帮助犯了错误的党员（其中包括少数犯了严重错误必须给予处分的党员）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以从思想上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

坚持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辅，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

由于党内外群众掌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原则，注意政策，“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使党员和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有的同志说：“这次整党，批评是尖锐的，态度是诚恳的，帮助是热情的，心情是舒畅的。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么深刻的党内思想斗争。”

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整党建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把社会主义革命持续不断地推向前进的伟大战略措施。通过整党建党，要提高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在整党中央，不仅使那些有错误的党员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重要的是从中总结经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变成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那种认为“检查了，通过了，没事了”的思想，是决不会把错误和挫折变为继续革命的动力的。实践证明：认真总结经验，是对党员更加深刻的路线斗争的再教育。

在总结经验中，大家还指出：知识分子党员中，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多，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入党的，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比较深，其要害问题是爱谁、恨谁、跟谁走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数力系有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被称为“四副”的人，即留苏副博士、副教授、副总支书记、副系主任。由于她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她还认为自己辛苦苦十七年，“反正否定不了”。这次整党中央，她联系自己入党前后的历史，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觉悟。因此，在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关键时刻，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为资产阶级培养了接班人。她在谈到自己的教训时说：“自己入了党就认为政治方向完全解决了，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忘记了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的烙印；忘记了知识分子身上革命不彻底的弱点；忘记了十几年来所中的毒。虽然组织上入了党，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今后要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就要从世界观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

在总结经验时，宣传队还遵照毛主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引导党员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联系我们党内四十八年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解放后二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联系三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联系今后还要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并且经常以五个方面考验和检查自己：(1) 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看自己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2) 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看自己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的方向；(3)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看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4) 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看仅仅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还是同时又把自己经常当作革命的对象；(5) 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看只是把自己管好，还是坚持起到“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作用。广大党员说：“这次整党，真正整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整出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是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继续革命的起点。”

在整党建党中，按照新党章的规定，经过群众路线，正确地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同时，按照新党章规定，在基层建立了新的党支部。实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学校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中的优秀党员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领导班子中，宣传队占百分之三十九，新成份包括纳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十三。以老带新，以新促老，使支部领导既富有领导工作经验，又具有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形成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支部建立后，继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狠抓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不断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学习新党章，经常召开有党外群众参加评论的讲用会和生活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锻炼和考验新的领导班子和党员的作用。结合形势、任务，采取小整风的方法，集中解决领导班子和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使其经常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党组织能够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 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

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毛泽东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稿的批改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删去的内容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许多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有

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列宁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增写的内 容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

从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康生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 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

同志们：

有些问题想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次会议开得还好。之所以好，首先就是纪登奎同志、郭玉峰同志以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未开会前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调查工作，研究工作，所以心里有底了，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六厂二校做过典型的实践工作，这方面对我们的会议有很大的帮助，纪登奎同志与其他同志亲自到六厂二校去调查过、接触过。此外，也有同志们的努力，各地方交换的经验很多。

所以，这方面应当说，学习了主席著作，学习了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学习了六厂二校的经验，交换了各地方的经验，讨论了文件，思想上、理论上有所提高。

有些政策问题大家也交换了意见。政策问题，各地方是不平衡的。就是一个单位，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也是不平衡的。

所以，任何经验，必须结合具体的单位，具体的地区、具体的环境来运用，不能硬套。有些问题咱们在会议上觉得可以了，但是在实践中间感到还存在着问题。对一个问题，总是象毛主席所讲的，实践，理论，再实践，不断的提高，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发展。

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地方的负责同志要抓这件事，但是负责同志抓的不够，这个批评完全对。

刚才我在汽车上又回想了一下，在全国解放以后，叛徒刘少奇、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我是没有去过的。人家不大高兴我去，我也不太高兴去。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时候赫鲁晓夫还没有上台，矛盾还没有暴露。所谓解决，也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差不多，一般的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这个党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做组织工作的人，总是常常不做思想工作，常常把思想工作同组织工作割裂开。这一点，我自己是有经验的。一九二八年我做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我又在中央组织部做工作。我本身就是这样，做组织工作忙于组织事务，不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工作。这件事不只是我，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的，当然不包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毛主席做过党的组织工作。

由于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习惯，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两个问题，使我深刻地想了很久很久。

一个问题，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过去我就没有想过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总是觉得组织上入了党，大概思想上也就入了党，否则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呢？这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四个第一，思想工作同政治工作有关系。但是，做政治工作的人有时不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你们读毛选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这件事对我也有相当大的启发，平常想，谁没有一点主观主义呢，怎么还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从前了解党性不纯就是不服从纪律，不好好工作，说怪话，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等，这是大家懂得的，但是，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首要表现，我就没有想过。

所以，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把建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提高到思想工作方面去了、提高到政治方面去了，一直提高到哲学世界观方面去了。

主席的整风报告发表几十年了，但是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不注意或者不十分注意思想工作，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没有完全实行的。当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过去的整风，毛泽东思想直接为广大群众所学习、所掌握、所运用，那比以前还是大大的提高了，但是并不说已经完全解决了。

拿现在的全国整党工作来看，根据同志们的报告，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事实，这是同志们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整个的整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全国整党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的问题不少，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从思想上了解整党工作抓的还不够。

譬如说，从你们的文件中间来看，全党真正的学习党章，报纸上解释党章，党的刊物上介绍党章的文章，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从材料中间看，广东抓的比较紧，党章通过一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加以注意了。但是，从文章的本身来看，解释党章本身的很少，主要是讲的体会。

全国积极的拥护毛主席的整党“五十字”方针，在会议上大家都充分的讲了。但是，“五十字”方针到底怎样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是很深入的。我看你们简报上讲“五十字”方针的讨论也是各式各样的意见，这很好嘛！大家交换意见嘛！但是，由此可见，思想方面，解释工作方面，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总而言之，提出一个问题，各地方整党头一条只是说要思想整党，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思想工作到底怎样做？并不是那样很具体。

譬如说，毛主席的“五十字”方针，各地方也好，在我们的会议上也好，大家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拥护这个问题，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嘛！大家知道，一九六七年十月青海省的同志提出来，他们那里是不是可以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主席在这个电报请示上作了批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发生的问题，对整党建党作了高度的概括。全国全党的同志注意它，学习它，研究它，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方针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强调得好象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只是从“五十字”方针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方针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这一点昨天陈伯达同志讲了，事先我们也交换了意见，不能把整个党的历史、把整个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五十字”方针截然割裂，同志们学习、理解“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我们“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纲的第四段，记载了这样的文字：“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无论在民主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间，也无论在国际斗争中间，都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样的，是在同阶级敌人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同志们回顾一下，在民主革命中间、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开始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以后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然后同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然后又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道路问题上进行了斗争，将来五卷出版的时候，更可以看的清楚了，然后又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作斗争，在农业问题上同邓子恢作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彭德怀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后同以刘少奇为首的叛徒集团作斗争，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也是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更加前进、更加巩固、更加团结、更加提高的过程，所以我们能够战胜阶级

敌人，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取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包括组织上的建党的思想在内，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割裂开，似乎除了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因为党领导一切，毛主席语录的三十三个部分，起码大多数是关于建党的问题，哪里只有“五十字”的方针呢！如果把“五十字”方针同整个党的历史，同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割裂开，那就不会了解到“五十字”的建党方针，如果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就不会真正的了解毛主席的建党思想。

你们不是常拿《毛主席语录》吗？你们打开语录看一看，第一部分是讲共产党，第二部分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第十部分是讲党委领导，第十一部分是讲群众路线，第十二部分是讲政治工作，第十六部分是讲教育和训练，第十七部分是讲为人民服务，第十九部分是讲革命英雄主义，第二十三部分是讲调查研究，第二十四部分是讲纠正错误思想，第二十五部分是讲团结，第二十七部分是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十八部分是讲共产党员，第二十九部分是讲干部、第三十三部分是讲学习，这些部分直接讲到党的问题，其它部分也涉及到党的问题。

所以不要把“五十字”方针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指导整党建党工作的同志，必须全部去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方面。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没有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不怪同志们。

另一方面，大家很重视“五十字”整党方针，但是到底“五十字”包含那些问题、怎样认识、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这个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六厂工校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讲过一下。我说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我也给同志们讲过，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共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向中央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不是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的这么五十个字：“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的。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了一些问题，毛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概括成“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但是，这个高度的概括，我刚才讲了，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我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一方面，不应当割断历史；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到底包括那些内容。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这样一个先锋队的党，它必须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它是先进的部队。这一点在“五十字”中间没有明确提出。有的同志说，到底那个为重点，大概他还没有完全看懂。基本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句话，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很清楚，我们整党首先要从思想上整党，就

是这个意思。“五十字”方针虽然没有讲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武装，但是毛主席用先锋队组织表达了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没有写，但是如果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什么先进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一点也反映了我们在党的工作方面不重视思想性的问题，不着重思想第一。大家很清楚，没有毛泽东思想，很多东西都没有嘛！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长期的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战胜一切修正主义以及“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也不可能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

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思想入党。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这是讲的什么呢？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可以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这种先进分子必须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就是你们讲的“三忠于”、“四无限”，这种先进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进行阶级斗争，敢于英勇的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特别是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我们的阶级基础。

在整党中间，有些地方不是犯了错误吗？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的问题。在座的同志你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各式各样的那些所谓造反派领导整党的问题。有些领导同志、老共产党员也一时糊涂，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

同志们要问，我们整党不是要实行群众路线吗？又说实行群众路线，又说不要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这如何理解呢？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路线、党的路线，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群众的尾巴，极“左”思潮的人可以走到否认党的领导，所有这些思想在整党中间都应该肃清。大家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是产生了一个“二月逆流”吗！“二月逆流”时，谭震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发谬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只讲群众路线不要党的领导，他说这叫形而上学。可笑得很，他大概也不晓得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把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二月逆流”的干将们否定了党的领导，当时我们反驳谭震林你把毛主席摆在那里去了？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我们揭露他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党组织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个辩证关系。要领导群众，就要依靠群众。所以，我们的整党是开门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所以，要进一步理解怎样叫作“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不是群众领导党，而是党领导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广大群众才能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没有先进的队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阶级基础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怎么进行阶级斗争呢？即是进行了也是要失败的。古巴的格瓦拉不是说他在那时进行阶级斗争吗，结果怎样呢？我刚才讲的这一条，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

灭论”和黑《修养》讲的。黑《修养》只是讲“修养”，不进行阶级斗争，党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一个“朝气蓬勃”，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作“驯服工具”。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先进分子入党，有了广大革命群众，一方面领导他们、一方面又要向他们学习，依靠他们去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党就成为一个先锋队组织。这样的党，在苏联来说就是列宁的党，在中国来说就是毛泽东的党。

所以，对“五十字”的理解，一方面不要割断联系，另一方面不要当作笼统的一个口号，要有具体的分析，具体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指示是一个整体，伯达同志昨天晚上不是念了毛主席一九三七年给陕北公学的题词吗，毛主席在题词中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里也是讲的“先锋队”，关于“先锋队”的问题，毛主席也不只是一九六七年才提出来的。毛主席接着说：“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可以和它联系起来。

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也可以和接班人五条联系起来。接班人头一条，就是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五十字”方针所说的先进分子；第二条，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五十字”方针里面所说的阶级斗争；第三条，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甚至要团结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就是讲怎样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啊！第四条、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这就是生动活泼嘛！

所有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的方针、路线，不能不求甚解。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我说，大家重视“五十字”方针是对的。但是，第一，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不要割断历史；第二，不要不求甚解，当作口号，要作具体分析；另外，要下一点工夫，我们的思想才能统一起来。这是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了，由于我们工作做的不够，所以各地方也好，我们这次会议也好，对于党章的学习重视不够。比如，我刚才说了，现在报纸上解释党章的文章，都是一些体会感想等等。对于党章本身的解释，我们没有作，红旗杂志也没有作，你们也没有作，在会议上也没有专门讨论。党章总纲中很多问题需要解释，比如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什么说这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这是马克思列宁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学习具体政策是对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要因为注意具体政策而放松了对于整个党章的学习。

最近，苏联修正主义在《共产党人》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的批判，诬蔑我们的党章，这说明我们的党章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

所以在党章的问题上，我们同党内外隐藏的敌人，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斗争。是拥护党章，还是反对党章，还是对党章表示漠不关心，这都是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首先指示我们，要动员基层

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修改党章过去都是领导机关搞，这一次毛主席说要动员基层的党员参加修改党章，并做了一个示范，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这个通知发下去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就展开了。全国上下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外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且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改草案。中央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起草了一份。据我知道，组织部起草了一份，中央办公厅起草了一份，党校起草了一份，各省市综合了一下下面的意见，送到中央来的一共一百二十六份。从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发出指示到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整整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从下而上来修改党章，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敢于打破迷信，敢于修改党章，敢于负责，有的还搞的不错。应当说现在的党章，一方面是根据了毛主席的指示原则。另一方面也集中了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集体智慧。总而言之，整个的过程是经过了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几次反复讨论，一九六八年集中到十二中全会各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根据十二中全会的意见写成了党章草案，然后再发下去讨论，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以前，又在下面充分的进行了讨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到中央来，然后中央吸收一些好的意见，经过修改，作为党章（草案）提到“九大”。“九大”各小组又充分地进行了讨论，四月十四日才最后通过。

这样通过修改党章，就实现了广泛的有领导的党内的民主，这种民主生活，可以说在党内以及在外国党中间是没有过的，这实际上是最民主的。

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党章，把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对党的责任心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开动脑筋，反对刘少奇“八大”搞的那个党章，共同拟了新的党章，新党章把“八大”的六十几条变成十二条。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说要通俗易懂。这个党章有毛主席的指示，有广大群众的智慧。在我们修改中间，参照了马克思起草的第一个党章——共产党法规，也参照了列宁一九零三年起草的那一个党章。我们去掉了形式的繁琐的东西，把精华吸收到我们的党章里面来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党章呢？我没有和同志们正式交换意见，但是我觉得“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七大”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革命的指针。

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在一个时候，有一种错误说法，说“七大”的党章是叛徒刘少奇搞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时有一个修改党章的委员会，名义上是刘少奇作头子，但是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写在党章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是反对王明的修正主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反对彭德怀投降主义，反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中间反映到党章修改委员会里面，写上了毛主席的思想。刘少奇招摇撞骗，说是他起草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然同志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的时候有毛泽东思想取消了。在当时延安整风那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情况下，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是全党的要求，叛徒刘少奇不能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是一到进城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他同一些叛徒们，对毛泽东思想就更加抵触了。毛泽东思想是要逐渐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他们就用许多借口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

“九大”的新党章首先一条，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也表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七大”写上了，“八大”取消了，“九大”再写上，不仅写上了，而且通过总纲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概括。

同志们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总纲的第一段就是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这个党是干什么的呢？第二段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段：“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说的阶级基础。（注：有的人记的是：这是说的党的组织。）

第四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比“七大”的时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大大的提高了。

第五段：“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六段：“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的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顺序是党的性质、党的目的、党的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基础、党的领袖，最后讲我们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觉得，“九大”的党章，对于主席的理论、思想的概括是比较好的。第八段是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拿我本人来讲，过去并不是那么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讲，叫做“一个过渡阶段”。大家知道所谓“过渡阶段”在一种意义上讲，它是从一个社会发展到另一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两个阶段之间，都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说，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氏族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说是“过渡阶段”。但是过去人们不了解，所谓“过渡阶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一个过渡。不晓得同志们是怎样想的，老同志们你们想想，过去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总是比较短吧！列宁讲过，就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你们去翻一翻《国家与革命》，总是觉得阶段比较短，很快可以到共产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一个时候说，他们已经进到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修正主义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总觉得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范畴。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他的理论和实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所谓“历史阶段”是历史范畴的阶段，就象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间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一个叫“相当长”，一个叫“历史阶段”，这里面起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纠正了一种混乱思想。共产党员总是希望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但是主席经常讲，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几十年而是一百年到几百年。所以，这句话值得同

志们好好想一想。

下面接着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完全解决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当权的党，现在不是那么迫切，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弄清楚，甚至于不赞成。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你们找一找过去那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们过去的“土改大纲”，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是从经济上、从剥削地位上划分嘛！主要从经济范畴上划分阶级这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还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的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那就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苏联为什么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那个时候说现代修正主义的威胁，还不那么明显，昨天晚上你们听了总理的讲话就可以知道了。的确存在着这么个危险。换句话说，存在着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你们开了一个月的会，这句话不一定完全都弄清楚了。你们提出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不是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九大”谈过，实际上所谓不断革命就是继续革命。这是翻译名词不同。

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呢？这个问题就大了，马克思讲过不断革命论，列宁讲过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讲过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中国的瞿秋白、陈独秀也讲过不断革命论。党章上所讲的“只能靠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里面包括几个含义，我简单说一下。所谓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讲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大家看到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上的名词运用不同，就发生疑问，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一个名词，两种翻译方法。大家不必在这上面多费时间了。这两个词为什么不统一呢？因为在马列主义史上经常用的是不断革命这个名词，所以主席同意用这个名词。

关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一八五零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以及马克思在《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篇文章上，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问题。所谓不断革命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列宁在一九零五年《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不断革命同毛主席讲的问题，有所不同。马克思、列宁讲的不断革命有个共同特点，都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应该不断的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讲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要继续革命，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展的。历史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讲一下在党章上怎样去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发展。这里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准确的说，应当是“这些矛盾只能靠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毛主席很谦虚，勾掉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这几个字。要了解为什么说毛主席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不是讲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而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个阶段。所以，这方面是个很重大的发展。这是一条，还有一条，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文字上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与马克思、列宁所讲的阶段不同；第二，毛主席讲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

这方面同志们可以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文件中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但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社会阶段，反映了物质的变化。不应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意思就是不能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否定不断革命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阶段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所以，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是真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要继续革命，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党章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不但是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而且找到了革命的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们说党章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明确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明确规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章的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党章上讲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彻底地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现在苏修特别攻击我们这一点，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部队的同志在整党中间特别要深刻的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党章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从刚才我讲到的那些问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很短的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的问题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过去马列主义书籍上都没有或讲的很少，只有毛主席解决了。在苏联，托洛茨基也歪曲过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呢？他的理论就是不断革农民的命，反对工农联盟，认为无产阶级对农民还要专政，这同马克思、列宁所讲的不断革命是根本对立的，是反革命的。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曾经一个时期宣传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也否定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否定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节分子瞿秋白，曾经利用“左”的面目，提出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讲的“一次革命论”。他否定革命阶段论，毛主席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统一论者，“左”倾冒险主义者瞿秋白就主张一次革命不

分阶段，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混在一起。他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搞了“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从陈独秀到叛徒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你们熟悉的叛徒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就是所谓要大大的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停顿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列宁所批评的停顿在民主革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叛徒刘少奇恰恰就是这样东西。所以，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最后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有伟大的功绩，我们党章上规定这一点，这是我们党章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党章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党章的第三特点。

第四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党章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的政治目的，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明确的规定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明确的提出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整党建党，整顿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任务。这里特别提到，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一点，在我们觉得是应当写的，苏修觉得是大坏事，戳痛了他。反对苏修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反修，如果不反修就违犯党章。所以他们现在很恼火，又不敢明确的讲。今年四月十三日苏修《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与叛徒王明有关系。这篇文章首先说，对我们的“九大”他不能熟视无睹，他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把反对修正主义写在我们党章上，他还能熟视无睹！他攻击我们党章说，中国共产党半世纪以来还没有个党纲。我们历来认为，我们的总纲基本上代替了我们的党纲，但是我们党没有这样一个修正主义党纲，没有象苏修“二十大”那样的党纲。他说，党纲是要规定党的性质，是要明确的有科学根据的阐明党争取什么和为什么而斗争。现在我们才懂得，原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党纲规定了他的“全民党”这样的性质，他虽然现在不敢讲，但是从这一篇文章证明，他还是要按照这个性质来指导他的党。他的党纲规定是“全民国家”要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然后说，我们有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了，现在才开“九大”。的确我们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根据我们的党章规定五年开一次，那么五六年就要开“八大”，六一年就要开“九大”，六六年就要开“十大”，那么我们现在拖了两次，好象这样不符合党章规定。我们同兄弟党的同志说，假如六一年开“九大”，那个时候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发现，我们就要同叛徒一道开“九大”；六六年要开“十大”，刘少奇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进行，我们还要继续同叛徒集团一道开，而且可能选出他们作中央委员。我说，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把这些叛徒清出去后晚点开好，还是同叛徒一道早点开好？他们说，还是晚开好，开代表大会，要看用什么思想来开代表大会，不是时间的迟早，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党章来做。

然后他又攻击我们说，我们这个党章是残缺不全的。从篇幅上看，比我们“八大”党章起码短一半，这恰恰是我们党章的好处。毛主席讲，要使工人、农民都看得明白，要通俗易懂。

他们说我们的党章反对苏修。可是这些叛徒也软弱的很，我们的党章，明确的提出来，

反对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不敢引用我们的全文，他只说，我们党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把“苏修为首”的几字去掉了。下边他自己又解释说，按照中国的解释，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说的苏联。我们党章上说，要同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问我们，那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是谁呢？他们诬蔑这些人都是变节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把一些“健康力量”都吐掉了。他们所谓的“健康力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叛徒。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他们的叛徒。所以，他们再三的讲，我们把他当做了头号敌人，把反对苏修从党章上固定下来。这说明苏修是惧怕我们这个党章的，惧怕我们的党章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而我们党章上写这个东西，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必须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反修搞在一一道，就是说反帝必须反修。这是党章的第四个特点，明确了我们当前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斗任务。

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党章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这是根据毛主席说的，要简明扼要，适合于工农兵劳动群众的要求，要去掉形式主义东西，去掉繁琐的条文，突出政治。所以，新党章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世界上第一个党章就是《共产党法規》突出政治的长处。《共产党法規》是突出政治的，这是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在它的党章上，头一条即明确的提出来要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我们的党章，也吸收了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的长处。这个党章是一九零五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到一个组织中去工作，党不是一个俱乐部，党员必须是做工作的。这个党章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不是以后那样发展到一百几十条。我们的新党章吸收了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所制定的党章的长处，同时也吸收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的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章比较简明扼要的长处，避免那些繁琐条文。同志们可以看到，包括了“五十字”方针，在总纲上；也包含了接班人五条，写在第二章上。所以，党章基本上概括了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时，也把我们从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整党建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通过党章记载下来了。我们现在整党，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搞坏了，而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胜利的基础上把我们的党整得更好，继续前进！使我们的党成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党，成了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党。这不仅对我们党而且对世界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赞成伯达同志的提议，要好好的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五十字”方针和新党章好好地来一次学习。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同志们还提出了青年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章里已有规定，青年团还是要的。但青年团现在还没有进行工作，个别地开始了。军队原来是有的，而且军队青年团的工作起很大的作用。青年团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军队的同志提出好的意见来。

发挥青年团的作用还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咱们这次会议没有办法议论，经验总结得太少了。恐怕你们回到各个地方，要总结一些经验，要交流经验，去摸点典型，调查研究，弄点材料、把材料弄好，把经验搞好了，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团章还未改，这个方针定了就容易了。青年人很有积极性，发动每一个青年人来修改团章嘛。

总而言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同志们提出来的整党建党工作也要实行毛主席那一条，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从斗、批、改来说，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共产党，什么

事情都办不成。部队也有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汽车司机同志，到了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工作。我还有个警卫员同志到了北大哲学系，平时看这个同志政治也不那么高，有点散漫的样子，他现在告诉我说，他还领导哲学系呢！不但领导哲学系，北京不是有个鼎鼎大名的冯友兰哲学教授、资产阶级权威吗？他还领导冯友兰学习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的确不但把刘少奇叛徒集团清除出去，而且使新的干部得到锻炼，涌现出来。所以，这方面应当感谢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毛泽东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资本主义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民众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

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原载 1970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 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两个报告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和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的两个报告，写得很好。这两个工厂整党建党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参考。请你们把这两个报告及其附件，同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月十五日批示“照发”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至县团级党的负责同志参考，并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和讨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很好，送上，请阅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

整党建党情况报告

我们在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的新形势下，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针，以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为纲领，从去年七月至十一月进行了整党建党。在整党中始终把思想整顿和建设放在首位。通过整党，普遍提高了党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党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手里，党内出现了团结统一、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在全厂进一步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这次整党建党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四个问题：

一、加强党的领导，狠抓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七厂整党建党工作中，自始至终地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斗争的实质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斗争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也就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建设党，还是按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初，八三四一支部进厂以前，曾进行过整党。当时大叛徒刘少奇在二七厂的代理人，秉承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的黑指示，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搞关门整党，只恢复组织，不进行思想整顿，支部领导成员大都是原班人马，混进了不少坏人，使那次整党失败了。在这次整党中，他们仍不甘心，继续向党和革命群众猖狂反扑。甚至有人公开为其翻案。部分人思想上还没有肃清他们所散布的修正主义影响，说什么：“整党就是党内的事，群众参加就成了全民党了”。“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还搞什么思想整顿”。

一些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极力夸大他们个人和群众组织的“功劳”，散布“党员落后论”。他们说：“我们是从白色恐怖里冲杀出来的，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党员都是火车皮，造反派才是火车头。”“二七厂的党员都‘修’了，整党得由我们来领导”。甚至极端错误地说：“没有党的组织，照样可以干革命”。

针对以上右的和极“左”的两种错误倾向，我们发动广大党内外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狠批大叛徒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以及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在二七厂散布的极“左”思潮。联系前次整党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彻底清算大叛徒刘少奇在二七厂的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罪行。通过批判斗争，使广大党内外群众认识到来自右的方面的反动思潮，是反对整党中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来自极“左”方面的反动思潮，是借口“群众路线”，否定党的领导。他们都把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质上都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妄图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我们紧紧抓住整党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思想整顿和建设，划清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界限。使整党建党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沿着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前进。

二、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

这次整党，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的教导，自始至终地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

我们采取了由党员、群众直接提名、反复进行民主讨论的方法，产生了厂与车间的整党领导小组，吸收群众代表列席，负责整党领导工作。根据工厂生产紧张、学习时间短的情况，各车间都分期分批地开办了脱产的党员学习班，吸收群众代表参加。为了使学习班和班组整党学习结合起来，在车间群众学习时间，学习班的人回到原班组参加学习。不仅党员之间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互相评论，而且要认真听取群众对党员的评论。党员抱着征求意见要诚心，接受意见要虚心，改正错误有决心的态度，利用假日、业余时间，登门走访，开

展谈心活动，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到群众中接受教育。群众为党员的这种态度所感动，在帮助党员时，也做到了提意见要热心，帮助时要耐心，对党员改正错误有信心。有的群众还主动给党员搜集意见，送“宝”上门，正如一个老工人所说的：“三心换三心，外因促内因，共同干革命，党群一条心。”

经过大学习、大批判和群众帮助，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党员自觉主动地进行斗私。做到了抓要害，触灵魂，从路线上找问题，世界观上挖根源，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从行动上看效果。群众帮助党员，注意了看大节，看主流，看发展，做到了原则问题不让步，枝节问题不纠缠，相同观点不迁就，不同观点不刁难。有的老工人说：“我们不当‘检票员’只把住关口；要当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积极促进。”党员先在学习班斗私，再回到本班组斗私，听取群众意见。少数错误严重或影响面比较大的党员，还要在车间范围进行斗私。斗私以后，整党领导小组根据评论情况，决定恢复党的生活或暂缓过党的生活或进行其他组织处理。

党员斗私批修，斗出了觉悟，斗出了干劲，斗出了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斗出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机车车间一个工人党员，过去政治衰退，不务正业，人称“打兔子队长”；现在一心为革命，冒着危险抢修机车，当了生产突击队长。由原来被劝退的对象，成了受人称赞的好党员。

通过开门整党，群众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有的说：“上次整党关上门，这次整党大开门，党员斗私找上门，这真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

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搞好吐故纳新

在整党建党开始，我们对全厂一千六百多名党员状况作了基本分析。二七厂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过去国民党在这里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特务机构。当时参加国民党的，有些是不得不参加，是“挂名党员”；有些是比较负些责任的；也有少数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解放前，这个厂我地下党支部的十几名党员，也叛变投敌，参加了国民党等反动组织。解放后，由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重用坏人，使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坏人钻进党内，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领导岗位，造成二七厂党组织严重不纯。但是，尽管如此，二七厂的党员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有百分之五左右；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其他坏人有百分之十左右。根据这个基本分析，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团结和依靠多数的一贯思想，使绝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经过斗私批修、群众评论、党内通过过组织生活，建立新的党支部，然后在党支部领导下，依靠他们和广大革命群众解决少数人的问题。

在组织处理工作中，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的要求和新党章的规定，对党员组织处理，把它作为对党员和群众继续进行增强党性教育的过程，作为思想整顿和思想建设的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觉悟的先进标准，认真掌握两个区别：第一，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敌我界限。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人，一律清除出党。敌我矛盾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一般也要清除出党。第二，区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都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团结教育他们。

少数问题严重的，酌情给予适当的处分。错误性质严重，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不能留在党内。死气沉沉的党员，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劝其退党。（关于党员组织处理的一些例子附后）

遵照毛主席“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和“要过细地做工作”的教导，我们在对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发动党内外群众广泛讨论，充分地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查证落实，然后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做到问题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防止了偏宽、偏严两种错误倾向。

对被“吐”对象，我们从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只要不是专政对象，都让他们参加整党学习班，党员和群众一样地热心帮助他们，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对“吐故”的认识，使他们深受感动，表示：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把自己清除出党是完全应该的，决心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这样，他们虽然被吐故了，但并不伤害感情，多数人还能为革命做些工作。

对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尚未交代或尚未交代清楚的党员，也让他们参加整党学习，进一步展开政策攻心，再一次给他们走坦白从宽道路的机会。这样做，使几十个过去一直拒不交代问题的人，交代了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如原政治部一个副主任交代了他隐瞒二十多年的中统等六种反动身份。发展了清队成果。

对于少数政治历史问题一时搞不清楚以及犯有严重错误、一时得不到群众谅解的党员，则暂时挂起来。然后积极进行工作，有步骤地解决和处理。

在纳新工作中，我们采取了积极、严肃的态度，在深入学习毛主席五十个字建党纲领的基础上，按照新党章的规定，经过个人申请、党员和群众反复讨论，首先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树立样板，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在纳新时，有些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提出“造反有功，入党有份”，认为“当了革委会成员，就理应入党”，还有的说：“要发展党员就得一派一个”，甚至有的人看到自己入不了党，便组织本派的人连夜赶写入党申请书，企图在党内安插代言人。这些人妄想以资产阶级派性来改造党，把党变成派别的联合组织。我们坚决批判了这种“做官入党论”、“造反派当然入党论”和在纳新问题上搞平衡的错误思想。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凡是具备党员条件的就吸收入党；条件不够的，就积极培养；严防少数抱有个人或派别目的的投机分子混到党内来。

四、建立坚强的党支部， 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

经过四个月的整党建党工作，二七厂的车间党支部已全部建立，厂党委会正在筹建。为了建立一个好的支部领导班子，我们掌握了以下三条：

第一，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党支部，不能操之过急，草率从事。条件是：经过思想整顿党员确实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党性；绝大多数党员已经过组织生活；党群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在整党中，已逐步形成了领导核心。

第二，在建立党支部的过程中，狠抓阶级斗争，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狠批资产阶级派性。要求广大党员，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不要为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打算；要为

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着想，不要为资产阶级派性争权；要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标准，不要以个人恩怨作尺子。把党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手里。

第三，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经过几上几下，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确定候选人名单，在党内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新的支部领导班子，一般是军、干、党员群众相结合和新老相结合，新干部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工人党员，也有这次“纳新”的党员。

新的党支部建立后，我们仍然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抓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开办了学习班，学习了新党章和有关党的建设问题，进一步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武装头脑，认清党权的重要，丢掉怕字，换成敢字，当好带头人。有的党员干部检查了过去“宁出几身汗，什么‘长’也不干，少犯错误不得罪人，吃他几天松心饭”的错误思想，积极工作，勇于负责，成为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

领导班子把请群众参加评论形成制度，定期同行政干部一起召开有群众参加的民主生活会，运用小整风的方法，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支委会成员一律不脱产，又劳动又工作，坚持做到“三不脱离”。

在领导班子内部提倡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认真遵循三条政治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坚决支持；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批评、教育；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坚决斗争。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始终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同时，加强对党员进行新党章的教育，有计划地上好党课。不断提高党员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革命委员会

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

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光辉建党纲领指引下，上海国棉十七厂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开始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为了加强对整党工作的领导，在一九六八年初步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了组织整顿，建立了党的总支和支部，发展了新党员，去年六月建立了厂党委。

我们厂有八千六百三十二名职工，其中党员一千零四十八名，经过整党，广大党员更加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全厂革命职工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一）充分发动群众，在斗争中整党建党

按照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整党建党，如同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几个阶段一样，是不可能风平浪静的，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有来自右的和极“左”的社会思潮

的干扰。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整党建党。

整党初期，尽管我们通过修改党章的工作，在党内外进行了关于党的建设的教育，但是，正当全厂大办毛泽东思想整党学习班，启发广大党员自觉斗私批修，逐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煽动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到处散布极“左”思潮、说什么国棉十七厂的党员除了少数党员“老造反”以外，都是“老保”，没有一个好的，把党员说得一无是处。还说什么党组织一恢复，“老造反”又要受到压制。我们发动党内外群众，狠批了这些错误论调，粉碎了阶级敌人破坏整党的阴谋。党内外群众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懂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占领导地位，我们的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好的。这样，党员的斗私批修和恢复组织生活，才继续顺利进行。

斗争最激烈的是一九六八年十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转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我们厂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头伸得很长，拼命想钻到党内来，笼统地提出“老造反都可以入党”。当这种错误思想受到批判以后，又煽起了“反复旧”的歪风，把新建立的党支部说成是“旧机器贴上新标签”，攻击党组织“排挤老造反”。他们还大造舆论，争夺整党建党的领导权。

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我们根据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举办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建党学习班，大学毛主席的建党路线，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具体分析我们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摆事实，讲道理，揭露了阶级敌人破坏建党的阴谋，对一些有错误思想的人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通过大学习、大批判，使大家清醒地看到，某些人打着极“左”的旗帜，好象最关心“老造反”，最关心新党员的政治质量了，其实他们是重弹“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党员”的老机会主义调子，把党员的标准降低到一般造反派战士的水平，而且挑动某些暂时不能入党或没有人党条件的人的感情，煽动他们闹事。一定要警惕有人借“反复旧”为名，挑拨党群关系，破坏整党建党工作。通过学习和批判，党内外群众受到了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群众、领袖学说的教育，一场极为深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党内外广大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煞住了这股歪风，排除了干扰，捍卫了毛主席的建党路线。

在整党中，同样也有来自右的思潮的干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们在筹建新党委时，党内外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小撮阶级敌人恨得要死。有些人企图对旧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要把旧党委某些错误十分严重的人拉到新党委里来。新党委建立后没有几天，我们接连收到四封匿名信，攻击新党委，攻击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新党委的建立，是斗争在新形势下的开始，而不是斗争的结束。我们立即发动党内外群众狠批右倾翻案妖风，揪出了写反动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党内外同志进一步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的观念，推动了整党建党工作。

（二）整党中始终狠抓思想整顿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通过前几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单纯的“罢官革命”，或者急于从组织上吐故纳新，都是不行的。我们首先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了思想整顿。以后，在组织整顿和建设时，也把思想教育放在首要地位，使思想整顿

贯穿于整党建党的全过程。

整党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一定要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党员，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吐故纳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否则，即使在组织上清除了一小撮坏人，整党仍然没有搞好。

我们针对我们厂的特点，抓住党员思想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教育。

一、对广大党员进行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我们厂是一个老厂，日本人、国民党、封建地主统治这个厂几十年。党员中百分之九十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上的老工人。他们在旧社会都有一本苦大仇深的血泪史，从心底里热爱毛主席和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部分党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员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一度站错了队。“一月革命”以后，一些党员晓得自己错了，但他们不知道自己错在那里；有一些党员受了一些冲击，存在着怨气、泄气、不服气。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普遍举办了整党学习班，组织党员大学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我们运用“四个对照”的办法，对党员进行教育，这就是：看毛主席是怎样教导的，刘少奇是怎样放毒的，本单位走资派是怎样贯彻的，自己是怎样想和怎样做的。我们还启发党员忆旧社会的苦，比新社会的甜，忆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的苦，比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伟大。通过忆苦思甜的教育，激发了广大党员的阶级感情，控诉了旧社会，控诉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自己的毒害，揭露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划清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更加认识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搞不得了，不搞就要人头落地，就要吃“二遍苦”。这样，广大党员真正提高了觉悟，丢掉了“三气”，把仇恨集中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以实际行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广大党员主动到群众中去斗私批修，改善了党群关系。

二、对广大党员进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育和党的根本任务的教育。有些党员过去在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下，阶级斗争观念淡薄，“生产党”的流毒很深，埋头生产，不问政治，错误地认为“对付国外敌人有解放军，对付国内敌人有公安局，对付厂内敌人有保卫科，自己搞好生产就行了”。有些党员怕这怕那，不敢斗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党员大学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狠批“生产党”的流毒，批判厂内走资派推行的“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可以入党，就是好党员”的谬论。通过学习和批判，许多党员深有体会地说：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搞阶级斗争，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如果只顾“棉花纱头”，不搞阶级斗争，就会“亡党掉头”。他们提高觉悟以后，纷纷丢掉“怕”字，换上“敢”字，纷纷杀向阶级斗争第一线，在对敌斗争中，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妖风和批判右的和极“左”的反动思潮中，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对广大党员进行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和新党章的教育，使每个党员思想上牢固地树立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九大”胜利召开以后，我们组织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九大”的重要讲话。

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对广大党员更加深入地进行继续革命的教育，进行增强党的观念、加强无产阶级党性的教育，启发每个党员按照新党章的规定要求自己。我们狠狠抓住斗私批修这个重要环节，要求党员自觉革命，找出阻碍继续革命的绊脚石。同时，我们发动群众对党员进行评论，要求群众对党员热情帮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一个党员女工，入党时比较好，但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只想到自己的孩子和小家庭，“上班落在后头，下班走在前头，开会坐在边头”。在党组织和群众的耐心帮助下，她狠斗了私心，终于有了转变，含着眼泪说：“我从小做工，今天怎么忘本了！我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到底，做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从此，她革命站在前头，生产积极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牢记心头。群众说她现在变了一个人，从死气沉沉变得朝气蓬勃，成为全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通过新党章学习，广大党员把自己的工作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立足工厂，胸怀世界，出现了不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用新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全厂党员和党小组，开展了争做“六个模范”和“四个队”的运动。每个党员都要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遵守革命纪律的模范、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和联系群众的模范。每个党小组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阶级斗争的先锋队、生产斗争的战斗队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队。在毛主席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广大党员带领群众把车间当战场，豪迈地提出了“多织一匹布就是多剥帝修反一层皮，多纺一支纱就是多抽帝修反一根筋”的口号，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去年年终评比，全厂有三百六十多名党员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三）搞好吐故纳新，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搞好组织上的整顿和建设，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说明，我们厂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仅是极少数。全厂开除和劝退了四十一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九二。受党纪处分的十名，还有少数党员因问题没有搞清，暂时“挂”着。

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我们根据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建党这一认识，首先狠抓大学习、大批判、大辩论，特别是抓紧关于“反复旧”那场大辩论的经验教训，发动党内外群众认真学习新党章，讨论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入党为了什么，以达到明确标准，端正入党动机的目的，使大家都懂得发展新党员必须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我们开头发展的新党员，是经过全厂上上下下多次讨论过的，全厂群众十分认真。经过热烈的争论，一致认为，为了正确掌握党员标准，必须注意几个“正确对待”：

一、正确对待“老造反”。我们厂的“老造反”比较多，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作了不少工作，很多人积极要求入党。但是，“老造反”中有各式各样的人，要进行阶级分析。发展新党员，要坚持共产党员的条件。要积极吸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要看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勇于斗争的大节；但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决不能姑息、迁就。要对他们严格要求，耐心帮助。有的“老造反”，夺权以后犯了比较

严重的错误，群众意见比较大，目前入党还不够条件，就需要教育和考察一个时候再说。有的人虽是“老造反”，但是问题比较复杂或者有严重问题，那就不能入党，或者需要较长期的考察和审查。

二、正确对待“站错队”的同志。要遵循毛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看他们的一贯表现，特别是要看他们站过来以后的表现。只要符合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条件，就不要因为一度站错过队而不吸收入党。

三、正确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我们认为，要全面贯彻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这些同志要热情关怀，严格要求，给予更多的锻炼机会，鼓励他们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

对已经参加厂革委会工作的非党造反派战士，一时还不够入党条件的，不能因为他们是头头，而降低党员标准。要热情地帮助和教育他们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对照自己，改造自己。党委会的成员在工作中遇事要多同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新党员入党，是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继续革命的开始。为了使他们继续革命的脚步不停下来，对这些新入党的同志必须加强教育，加强党的观念的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新党章的各项规定，时刻按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对照自己，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为了适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需要，在整党建党中一定要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我们提出了四个条件：一，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比较巩固；二，通过清队，阶级阵线基本清楚；三，整党取得了成就，党员普遍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密切了党群关系；四，在斗争中已经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党员骨干。根据上述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不成熟的帮助创造条件。

我们发动党内外群众充分酝酿，民主协商，然后由党内选举产生各级党组织。在建立的过程中，我们注意了选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优秀共产党员担任党的各级领导工作。

通过整顿，全厂三十一个支部、七个总支和厂党委，共有委员一百七十二名，其中新的占百分之六十九。在三十八个支部和总支书记中，有二十八名是新干部。经过整顿，大多数支部是有朝气、有战斗力的。

厂党委建立后，我们组织党委和革委会成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教导和新党章规定的基层组织的五项主要任务，对照旧党委执行的错误路线、错误作风、错误方法，明确了党委的任务就是要抓根本，抓方向，抓政策，抓党的建设，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半年多来，我们主要抓了以下三条：

一、举旗抓纲。领导党员和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内外群众，进一步加强战备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发动党内外群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党要管党。党委建立以后，及时举办了支部书记、委员学习班，首先抓好头头的思想

想革命化。同时，厂党委还抓了两个比较先进的党支部，在全厂树立样板，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发挥了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抓好党委领导班子自身的革命化。厂党委成立后，规定了三条根本性的措施：第一，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制度。第二，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第三，党委定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有问题、有分歧摆到桌面上来。

党委成立后，全厂重大问题由党委讨论决定，革委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委的决定。同时要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革委会可以根据党委的决议，对全厂革命、生产作出具体安排，并负责处理党务以外的日常工作。为了更好地在思想上组织上实行一元化领导，我们通过调整，做到了党委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革委会成员，革委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也都是党委委员。党委成立以后，没有另设办事机构，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就是党委的办事机构。

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

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九周年

(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在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中，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进中，在整党建党运动继续深入地发展的时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九周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育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风暴中，经历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取得了武装群众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战斗历程，表明她无愧为工人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的领导核心，无愧为当代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以社会帝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突出队。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

什么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这就是毛主席阐明的、“九大”新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

第一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思想问题，政治方向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是靠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成长起来的。新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要学，老党员也要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认真地学，刻苦地学，学了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要革命，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活学活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敢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同“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敢于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第二条，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共产党人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就要搞阶级斗争，就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为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些人嘴上也说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为了他那个小山头、小团体，为了他自己。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进领导班子，更不能当第一把手。

第三条，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要团结大多数人，要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有无产阶级的宽阔胸怀，而不应当气量狭小。要识大体，看大局。要懂得“人是可以改变的。”“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第四条，有事同群众商量。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这就是说，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和群众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干部更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并从三分之一入手，搞好面上的工作。许多事情我们不懂，群众提出来了，就要向他们学习，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

第五条，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员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才能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毛主席说：“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象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共产党员在整党当中和整党以后，都要敞开思想大门，欢迎群众评论。一个人有了错误，肯作自我批评，又请人家批评，改了过来，就是好同志。

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这五条，归结起来，一个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努力争取从思想上完全入党。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用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严格要求自己，才称得起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样的先进分子越多，我们的党组织就越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九大”光辉指引下，我们的党空前地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我们的党在大踏步前进。经过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党必将锻炼得更加强大、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

让我们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新党章，认

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党学说，用整党建党的伟大成就，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迎接党的五十周年。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原载 1970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

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

（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纷纷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安家落户，踊跃地走上了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新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迈步前进，茁壮成长。

前一个时期，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在安置、教育和管理下乡知识青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总结经验，巩固成绩，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去农村的各项指示，进一步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充分认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意义，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途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相结合，不是单纯安置劳动力的临时措施，而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抓紧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决不能忽视和放松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要抓紧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要积极组织和推动下乡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要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培养和教育下乡知识青年，帮助他们解决立场、观点、感情的问题，把立足点彻底地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要在下乡知识青年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要根据知识青年的特点，把思想工作做深做细。既要发动广大贫下中农言传身教，又要启发知识青年自觉地接受再教育；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善于引

导；既要狠抓活思想，又要妥善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下乡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经常地抓，反复地抓，不能认为已经差不多了，不能只抓一阵子。

毛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凡是有知识青年落户的社队、农场、生产部队，都要注意调动下乡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教育中放手使用，在使用中坚持教育，让这支生力军在彻底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要支持他们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对我们要合理安排劳动，注意劳动安全。劳动分配要贯彻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关心、爱护青年，大力提倡晚婚。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贫下中农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好老师，一切有革命志气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应当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革命一辈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中，必须狠抓阶级斗争。要坚决地打击一小撮拉拢、腐蚀、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要有力地抵制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侵袭和影响，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

为了搞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省、地、县要有专门班子抓，社、队要有专人管。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亲自动手。要认真总结和及时推广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教育知识青年、社队领导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要抓好典型，树立标兵，带动一般。面上的工作，一年要认真地抓几次。城乡之间，有关部门之间，应当密切配合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目前，有些地区采取由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落户的做法，效果很好。这些干部，一面自己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面协助社、队加强对知识青年的领导，既促进了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又带动了知识青年的革命化。这个经验，各地可以推广。

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在认真搞好斗、批、改，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深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抓紧抓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上海理工大学教育革命 座谈会纪要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闹墙。只要

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他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有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政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

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道：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道：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道：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道：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

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出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道：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件事：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拼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三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学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〇”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〇”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〇”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〇”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〇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拼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三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

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

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原载《红旗》杂志 1970 年第 8 期)

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

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心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

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持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

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二，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

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一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然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

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旧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三、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查阅有关国内外的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内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查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是“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

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来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 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蠹。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的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

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用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加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

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须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掌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

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所、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

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程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

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农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

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所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敏锐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原载 197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附) 一个毁灭教育的黑纲领

——评大毒草《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光明日报》编者按：清华大学继推翻迟群一伙制造的“反复辟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两大冤案，揭露《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假报告之后，最近又批判了迟群一伙炮制的黑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些批判，对于教育战线分清路线是非和理论是非很有帮助，使得批判“两个估计”的斗争深入了一步。

清华大学揭露和批判的这些事件，在教育界流毒很广。它们虽然出笼的时间有先有后，但都是“两个估计”反动思想的具体反映。不把这些阴谋揭露出来，不把这些谬论批透，批判“两个估计”的斗争就无法深入。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打着革命的旗号，干了大量反革命勾当，设置了许多禁区。谁要敢碰一碰，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毛主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使有些同志至今仍心有余悸，以致有些地区、有些学校，有各自的大大小小的禁区没有打开，使得“两个估计”还残存着一些藏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

反动的“两个估计”虽然出笼于一九七一年，实际上林彪、“四人帮”早就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权力，大造舆论，强制推行，整整搞了十年。其流毒和影响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消除的。肃清一个反动阶级的影响，比打倒这个阶级要困难百倍。认真地肃清其影响，就必须象清华大学这样做，联系实际，进行批判。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四人帮”的男女两个黑干将从清华大学连续抛出了两株大毒草：一株是一九六九年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假报告，另一株就是一九七〇年第八期《红旗》杂志刊登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简称《创办》)。这两篇黑文实际上为“两个估计”定下了基调。

《创办》的出笼，有陈伯达、“四人帮”的直接插手。在炮制过程中，迟群曾多次将文稿送陈伯达、姚文元审改。《创办》出笼后，张春桥、姚文元又亲自出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对《创办》大事吹捧叫卖。《创办》和那个座谈会的“纪要”一起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各报刊又竞相转载，在国内外流毒之深，对教育战线干扰之大，甚于那个假报告。它是林彪、“四人帮”毁灭教育的黑纲领。“四人帮”在高等教育战线的种种倒行逆施，盖源于此。今天，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非彻底批判《创办》，肃清其流毒不可。

一个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的假经验

“四人帮”、迟群之流，是一伙靠招摇撞骗起家的政治流氓。他们手中没有真理。他们的文章、讲话、经验、报告，是以歪曲捏造、弄虚作假为基础的。一九六九年的那个假报告，据复查、其中作为立论依据的十几个典型事例，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一九七〇年的《创办》，名为“经验”，却同样也是按照“四人帮”的政治需要凭空捏造出来的。

他们吹牛皮，说大话，脸不红，心不跳。炮制《创办》的时候，清华还没有正式招生，只搞了几个下厂的教改小分队和学制不到一年的短训班，到《创办》发表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招生的第一届学员，也还只有一小部分刚刚入学。实践还少，而经验却已“创办”出来了，还摆出一副“最懂无产阶级教育”的面孔，推销他们的经验，吹嘘什么“使学生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过去大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等等。《创办》说：是迟群他们“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稍为了解一点情况的人都清楚，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是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运动的产物。当时，清华水利系接受敬爱的周总理亲自交办的任务，承担了密云水库的设计，以密云水库工程为基地，把教学、科研、生产结合起来，完成了设计任务，促进了教学、科研的发展和学校的建设，培养了又红又专的人才。在这个基础上，还成立了由学校和水电部共同领导的清华大学水电设计院，承担国家任务，设计了十几座大中型水库。对于水利系和其他各系方面的经验，学校党委曾经作为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运动的主要经验之一加以总结，明确提出了“建设教学、科研、生产三联基地”的要求。这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红旗》杂志上是有案可查的。可是，《创办》剽窃别人成果，公然宣称是迟群他们“创办”的新体制。这完全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术！

《创办》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为装潢门面，掩盖真相而写的。迟群一伙明明是大骂水利系的实验是“在大楼里搞自来水游戏”，把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运动中充实发展起来的一个三结合基地“彻底砸烂”了，可是在《创办》里却大讲建立三结合基地，加强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他们明明是把广大知识分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残酷迫害，可是《创办》却冠冕堂皇地说什么“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还大言不惭，吹嘘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了”政策界限。他们就是这样阴一套，阳一套，用最堂皇的革命词句来掩盖自己最卑劣的反革命行径。

《创办》与一九六九年的那个假报告一起，集中地暴露出“四人帮”假左真右反革命路线的本质。他们从自己的反革命需要出发，用大量虚假的材料，采取两面派手法，制造假报告、假经验，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然后又假冒毛主席、党中央的名义，欺骗广大群众，强制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谁要反对他们这一套，就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必须彻底揭露批判他们这种阴险毒辣的两面派手法。有的同志对这样做有些担心，理由是为了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能讲“四人帮”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实际上却决不是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而只能是容忍“四人帮”给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抹黑，容忍他们的余毒继续毒害干部和群众，容忍他们设置的“禁区”继续禁锢人们的头

脑。我们认为，“四人帮”、迟群一伙干了这么多罪恶勾当，又是打着“清华经验”的招牌，清华大学的革命同志义不容辞，应该起来揭露批判他们，这是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应尽的革命义务。也只有结合本单位的实际，狠批林彪、“四人帮”，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和假经验、假报告，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一个反映“四人帮”教育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创办》一发表，就被“四人帮”奉为“教育革命”的圣经，强制推行，不得违犯。以后迟群一伙在教育战线上推行的那一套，虽然有些花样翻新，但其基本点，在《创办》中都有了。这就是：

第一，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歪曲成为个别工人“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鼓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为了“管大学”、“改造大学”，否定了十七年行之有效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其目的和实际效果，就是少数“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自封为“工人阶级代表”，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旗号下，篡夺了学校领导权，建立起法西斯统治。

第二，把阶级斗争为纲歪曲成阶级斗争就是一切，一切都是阶级斗争。他们反对“又红又专”的方向，混淆学术问题、世界观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反革命的政治冲击业务，破坏教育革命，随心所欲地把他们要打倒的一切宣布为封、资、修，任意大砍大杀，搞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与《创办》同时发表的《座谈纪要》中，姚文元有一段话：“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抓大批判……，画龙点睛，突出了他们的基本思想。他们讲的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实际上就是张春桥的那个‘全面专政’的反革命谬论。后来他们提出所谓‘学校首先要办成政治大学’，‘只办一个斗走资派的专业’，‘能抓走资派就给九十九分’等等，这种谬论的反革命实质就更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第三，歪曲教育和生产的关系，提出所谓“厂带专业”，否定以教学为中心，鼓吹以生产为中心，搞生产又以产值为中心。就在《创办》发表之后，迟群不顾广大干部、群众反对，硬要在清华筹建一个年产上千辆汽车的汽车厂。结果，学校人员膨胀，机构臃肿，许多实验室由于改为生产车间而遭破坏，汽车生产搞不好，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也给搞得乱七八糟，几个月后，被迫下马。而其恶劣影响，许多方面至今没有消除。

第四，歪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鼓吹“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批判数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等等，实际就是完全否认理论的作用。他们解散了基础课教研组，取消了基础理论课程，以后更提出批判所谓“老三段”，完全打乱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顺序，在教学中实行干啥学啥，以干代学；学生一入学，什么课程都没学的时候，就要“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

第五，鼓吹所谓“开门办学”、“厂校挂钩”，强调到了荒谬的地步，否定课堂教学的必要性。他们把教师、学生赶出校门，谁回校上课就被斥为“复辟”。以后，迟群一伙又进一步利用“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搞成插手外地，“开门抓走资派”，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六，在师生关系上，只片面地讲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否认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挑拨师生关系，制造师生对立。他们解散了教研组，把教师分到各教学班上，教学计划

的安排、教师思想改造的计划等，都要经学生讨论通过，监督执行。难怪有人说，学校成了“班办大学”。

第七，歪曲毛主席关于培养目标的指示，只讲普及，不讲提高，鼓吹“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把大学的水平降低到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

这一套黑货，集中地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就是要“彻底砸烂”在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下，由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创办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学，妄图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倒退到穴居野人的时代去。《创办》给教育战线带来的是一场大灾难。流毒所至，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直线下降，实验室关门，基础课解散，教学、科研、生产的有机联系全被打乱，知识分子更是遭了殃。尤其严重的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是非混淆，好坏不分，而且形成了一个多年来不准碰、不准摸的禁区，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彻底批判这套货色，我们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就不能迈开大步前进，学校工作的整顿也终将成为一句空话。今天，是解放思想，打开禁区，还《创办》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把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不得人心。《创办》从开始炮制的时候就受到广大群众的反对。文章初稿拿到群众中，许多同志就对其中的一些谬论表示不同意。迟群一伙只得搬出姚文元来进行压制，说此文姚文元已经看过，你们不要再顶了。《创办》公开发表以后，更不断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在实践中，大家越来越看清《创办》的危害，不断提出不同意见，并在行动上加以抵制。广大学员在经过几次“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以后，也感到上了当，对《创办》那一套产生了怀疑、不满，纷纷要求补上基础课程。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意见，针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混乱，对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广大师生热烈拥护。面对群众的抵制、反对，迟群一伙实行了法西斯的高压政策。谁要抵制、反对《创办》那一套，就给谁扣上“走老路”、“复辟”的帽子。一九七三年，他们在清华发起了一个“反右倾复辟回潮”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广大革命干部、群众，把坚决拥护和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反对《创办》，反对“两个估计”的广大干部、群众，打成“复辟势力”，把一位校党委副书记打成“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残酷迫害。但是，真理是镇压不下去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

在反对《创办》的斗争中，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是一个代表。《创办》发表的时候，他还处于被关押审查的地位，但他看了《创办》，当时就在上面作了许多批注，连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的座谈会的“纪要”，他也作了批注，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观点。不久，这位党委书记回到清华。迟群派人问他看过《创办》没有？他坦然拿出这本作了批注的《红旗》杂志，并说，这些批注就是自己的真实思想。后来他被安排在铸工车间劳动，又在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根据清华大学十多年的实践，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针对迟群一伙在培养目标、教学和生产的关系、校办工厂的办厂方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荒谬观点和做法，公开地、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迟群不敢正面交锋，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使他长期不能得到解放。

这位党委书记在批注和意见里针对《创办》对十七年的全盘否定，指出：清华大学建成了试验化工厂，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设计的“密云水库是甲级工程”，“过去也有总结实践经验的教材”。原有教师“有些是长期三脱离，有些不是。不能一概而论。”“过去就有许多受工人、农民欢迎的知识分子，不能只看消极面。”他还批评了《创办》“拒绝承认五八年教育革命的实践”。

这位党委书记强调了要注意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的区别、文科和理工科的区别。他批评了“厂带专业”，指出高等学校既要努力赶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就不能把学校教学和科学实验方面的广度和深度，限制在校办工厂的范围以内，学校所要求的三结合，应当是以学为主、以办学为轴心的三结合。他还明确指出：“清华大学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是强调了政治上的共同要求的情况下，对特殊性的要求有所忽视，即忽视了红和专的正确结合。对于‘专’，没有提出明白的、确定的要求，甚至回避这个问题，不敢正视这个问题，生怕一提出对于教学质量的应有的严格要求，就将被视为‘穿新鞋走老路’，上纲上线。”

在批注中，他尖锐地提出：“首先提出三结合基地的是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先当兵，后当官，还是天然领导者？”“未入门就能将高等数学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一年时间就达到了专业培养要求吗？是实践，还是推论？”“初中程度加上半年，就超过了过去的大學？”这些批注，都是对《创办》吹牛皮、说假话的邦风的有力抨击。

这位党委书记的意见，反映和代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想法，虽然受到“四人帮”、迟群一伙的压制、打击、封锁和批判，但却不胫而走，得到广泛的支持。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来了一封封表示支持的信件，人心向背是十分清楚了。

围绕着《创办》的斗争，给予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是坚持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还是利用片言只语，设置禁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人们的思想？这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同志，在“四人帮”横行，个人受打击、迫害的情况下，藐视“四人帮”及他们设置的禁区，坚持向“四人帮”、迟群一伙进行斗争，胸襟坦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用实际行动保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卫了党的路线、原则，也保卫了人民的利益。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些同志所以能为真理而斗争，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们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表现了革命者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可是，时至今日，“四人帮”已经垮台近两年，有人却还余毒未消，继续维护“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禁区”，虎视眈眈，这也不许批，那也不许碰。有的同志则心有余悸，怕这怕那，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大大发扬彻底唯物主义精神。

去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翻了反动的“两个估计”，砸碎了套在教育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精神枷锁，极大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三战役的开展。但是，问题并不是就此完全解决了。要彻底肃清流毒，还必须联系实际，对“两个估计”进行深入的批判。批判一九六九年迟群一伙炮制的假报告和《创办》，就是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再接再厉，努力作战，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夺取全胜！

(原载 1978年9月20日《光明日报》)

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四)

任 群

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提出，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新党章，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

“九大”新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是毛主席关于建党整党学说的重要内容。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对于深刻理解、贯彻执行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极为重要；对于搞好整党建党运动，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极为重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将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总是把党的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整党建党运动的实践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是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党每一次大规模地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都极大地推动了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

毛主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一九二六年，毛主席在反对当时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光辉著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解决了党在领导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首要问题。一九二八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党的组织问题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写了古田会议的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把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作为执行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提出了纠正的方法。毛主席这一光辉著作，是我们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

古田会议决议的光辉思想，极大地提高了党内外同志对党的政治路线、党内斗争、党的思想教育等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的认识，对加强党对红军和群众运动的领导，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仍在不断地学习这一光辉著作。

一九三一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宗派集团，窃踞了党中央的领导。这一伙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中国革命实际的狂妄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破坏古田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使党和红军遭到重大的损失。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

的统治，把党的路线重新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这样，就使我们党能够领导红军克服重重困难，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地到达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

毛主席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毛主席及时指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由“左”倾关门主义转变为右倾投降主义，号召我们：“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毛主席同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即实际上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伟大的哲学著作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在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机会主义的同时，深刻地阐明了党内矛盾的学说。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提出了处理党内思想斗争的原则，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毛主席还极其深刻地指出，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把教育党员和干部，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毛主席并且具体指明了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应有的性格和作风，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

同年，毛主席给陕北公学的题词，把上述思想再次强调地提出来：“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毛主席这些伟大教导，和以后写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光辉著作，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这和毛主席阐明的、“九大”新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是完全一致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在我们党内站得住的，就是按照毛主席这些教导去做的人，凡是违背毛主席这些教导的，都站不住。

党员的教育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改造世界观，从思想上完全入党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极其深刻地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毛主席说：“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的新中国，一九四二年，毛主席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毛主席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这样，就要进一步从思想上总结过去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经验，在全党范围内肃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

整风运动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解决党内矛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学习运动。毛主席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指出，主观主义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主席说：“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主席为这次运动制定了“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著名的原则。毛主席向全党提出的“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的任务，极大地促进了全党作风的转变。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的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成为我们党最宝贵的革命传统。毛主席这些关于整风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对我们党的建设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延安整风运动，系统地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陈独秀、王明以及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叛徒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外展开了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这就扫除了党内那些歪风邪气，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极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党的面貌，使我们党空前地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了党内前所未有的大团结。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踏步前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胜利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建设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新的问题。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苏联篡党、篡政、篡军，把列宁、斯大林的党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党、社会帝国主义的党、法西斯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就给国际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防止修正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新的历史任务。毛主席同一小撮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同我们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能够不变质、无产阶级国家能够不变色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根本的问题。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前夜，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告诫全党要学会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部伟大著作，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主席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革命，指明了政治方向。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

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如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我们共产党员要终生坚持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要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公开于群众，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场大革命，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亿万群众，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还指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毛主席这些重要指示，是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党的强大思想武器。

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风暴中，经受了锻炼，普遍提高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党大大纯洁了、巩固了、提高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坚强地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紧密地团结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

四十九年来，我们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经历了武装群众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证明，按照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去做，党就壮大，就发展，革命就胜利，就前进；背离了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党就受到损失，革命就受到挫折。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党的建设上完全地巩固下来、发展下去，我们新老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应该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毛主席从历史上到现在关于党的问题的整个学说。特别是担负整党建党领导工作的同志，更要带头学好用好。把毛主席建党学说割裂开来，不求甚解，是不对的。

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是同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就是要使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能担负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学习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要发挥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我们的学习，要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联系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特别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当前党的建设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在学习中，要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修养》、黑“六论”和叛徒哲学的余毒。这样，才能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不断建设我们的党。脱离实际，回避矛盾，放弃思想斗争，是同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背道而驰的，是学风不正、党性不强的表现，必须注意克服。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从建立开始，就不断地进行整党和建党工作，以后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对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的学习不能停顿，要反复学，反复用。在不断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关于党的学说的过程中，我们的党一定能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原载 1970 年 7 月 24 日《人民日报》)

我 的 一 点 意 见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毛 泽 东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无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于九月六日胜利闭幕。

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共二百五十五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

九届二中全会认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八年丰收，今年也丰收在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很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蓬勃展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整个经济战线形势很好。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庄严号召下，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战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全会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提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不断获得新胜利。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不怕威胁、不受欺骗，继续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欧洲、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蓬勃勃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美帝国主义

和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在世界上日益孤立，陷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与此相反，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取得新胜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全会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这种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全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会号召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加强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 1970 年 9 月 10 日《人民日报》)

农业学大寨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本报发表了一篇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这个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短短三年时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平均亩产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昔阳，从一个大寨大队发展成为一个大寨式的县。这个变化反映出我国农业生产新的高涨。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竭力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进行干扰，破坏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动着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目前，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县县有大寨的生动局面。有许许多多的大队、公社，有不少的县和地区，甚至有的省、市都跨过了《纲要》。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今年又是丰收在望。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形势呵！

为了更快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寨式的先进大队，满足于部分县、地区和几个省、市跨过了《纲要》，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昔阳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以比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

学大寨学什么？这是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一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句话，就是要象大寨大队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是大寨经验最根本的一条。

大寨的贫下中农说得好：“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第一条。”他们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学得活，用得好。他们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头脑，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用“老三篇”作为镜子，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们狠抓阶级斗争，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坚持不懈地同阶级敌人斗，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斗，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广大群众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有了毛泽东思想，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吃苦的革命精神也有了，创造性也有了，就可以创造出一百个办法、一千个办法、一万个办法。有了毛泽东思想，人的精神面貌变了，土地也就变了，产量也就变了。大寨是这样，昔阳也是这样。学大寨，只要象昔阳那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群众，就一定能迅速改变面貌。

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学大寨首先要学这一条。至于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学大寨，不学第一位的东西，只学第二位的东西，不学根本，只学表面，肯定是学不好的。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别人的某些具体做法，还有可能“学歪了”。只有正确地解决学什么的问题，才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落实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保证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大寨贫下中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他们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战天斗地，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建设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国家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是自力更生学大寨，还是靠天、靠地、靠国家，反映着农业生产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早就指出：“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象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方针，在干部和群众中牢牢地扎根。

怎样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这是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什么有的社、队学大寨学得好？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彻底批判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坚决反对了资本主义倾向，有力地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深入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混入党内的坏人，保证了社、队领导权真正掌握在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手中。为什么有的社、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开展不起来？说来说去，还是因为那里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领导核心。各地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验的要点。

要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开，就需要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一级领导班子来一个革命化。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于有一个很大的干劲。要象大寨的贫下中农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树雄心，立壮志，敢于改天换地。胸无大志，无所作为；守旧摊派，不创新业；怕苦、怕累、怕困难；屈服于自然界的压力，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必须将这种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

各级领导要进行扎实细致的工作。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抓好本地区学习大寨的先进样板。以这些先进单位为基点，先抓好三分之一，再及其余。毛主席倡导的这种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的领导路线，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沿着这条路线认真做下去，就一定能够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

学大寨，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迅速推开，是在农业战线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搞好斗、批、改，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都要加强对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领导。农业战线的同志们，努力呵，用实际行动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让大寨之花开遍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

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年的光辉节日来到了。

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致敬！向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和海外侨胞致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过去的一年，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胜利的路线指引下，大踏步前进，在各条战线上都不断取得新胜利。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继续深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热气腾腾，一片兴旺。我国的国防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在这个光辉的节日，让我们祝贺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伟大成就，祝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的伟大成就，祝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祝贺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在加强战备、巩固国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国际上，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正如毛主席今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庄严声明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反美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和扩大。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非常孤立，日子很不好过。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要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分析事物的矛盾，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我们要继续抓紧革命大批判，扫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

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继续推向前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

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基础而努力奋斗。

我们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我们要继续加强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建设，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北美和欧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要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70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

继续革命 乘胜前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二十一年了。今天，全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的豪情，热烈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共同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万寿无疆！

过去的一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的一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胜利的一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亿万革命群众抓紧革命大批判，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

主义路线的余毒，广泛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正在广大的工矿、公社、学校、机关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一个一个地逐步地落实，革命的新事物不断涌现。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促进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一九七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正在胜利实现，从一九六六年開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胜利完成。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上锻炼成长。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战备。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朝气蓬勃。

在毛主席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指引下，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我国人民，进一步加强了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战斗团结。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团结对敌，把美帝及其走狗，打得焦头烂额。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不断高涨。英勇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支持下，正在同美帝操纵的约旦反动军事当局浴血奋战，坚持反对美帝和以色列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欧洲、大洋洲，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更大规模地更深入地发展起来，震撼着整个旧世界。人民的觉悟在斗争的风暴中不断提高。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在全世界越来越孤立。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各项任务，提出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这次会议的公报和各项决定，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正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决心以实际行动，响应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中，得到现在这样的普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宝贵的收获。我们应当继续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紧密地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认真学习，认真用，更好地落实毛主席每一项指示，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高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首先是担负着领导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更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毛主席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

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现在，广大共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的学习运动，生气勃勃，热气腾腾。各级领导干部要加紧自己的学习，带领群众前进，真正把我们伟大的国家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越来越多的同志，能够更好地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正确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做好工作。

我们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要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要看到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存在一个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各级领导要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着眼，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群众在斗、批、改中创造的许多好经验，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总结、提高，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特别要注意研究各项政策性的问题，抓好典型，以点带面。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战线的斗争为纲，把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新胜利，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要继续加强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的建设，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性教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把广大党员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加强党对各条战线的一元化领导。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在前头，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我们要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原载 1970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

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方向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九日)

商业部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社会主义商业，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商业工作制定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商业指明了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办商业的根本问题，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疯狂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把我国商业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商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激烈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上：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是“流通决定生产”，“利润挂帅”；

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还是剥夺农民，破坏工农联盟；

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

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实行群众监督，还是取消党的领导，实行“单线领导”，“条条专政”，“业务第一”，“靠资本家办店”。

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地战胜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商业战线更加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要更高地举起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商业路线的余毒，把商业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 商业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就英明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是商业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伟大领袖主席一贯的光辉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地阐明了生产与流通之间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总方针，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社会主义商业前进的道路。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贯反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伟大方针，大肆鼓吹“流通决定生产”的谬论，妄图从流通领域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生产是基础，没有生产，就没有流通。只有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才能不断扩大，市场才能日益繁荣。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

易举。离开了生产，商业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社会主义商业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生产出发，大力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工作才能越做越好，刘少奇鼓吹“流通决定生产”的谬论，是单纯从流通出发，以市场为中心，妄图用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和支配生产。他要商业部门去压生产部门，一手拿“刀子”，一手拿“鞭子”，多了“砍”，少了“赶”，用市场卡生产，压建设，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刘少奇是个地道的“利润迷”。什么“流通决定生产”，说穿了，就是为了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经营商业的唯一目的，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在那里，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利润的信条。市场供求情况的变化，经营利润的大小，指挥着资本的流向。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生产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我们的原则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社会主义商业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刘少奇就是要社会主义商业象资本主义商业那样，“怎么利润多就怎么办”。“怎么利润多就怎么办”，必然是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破坏市场供应；必然是掺杂使假，短尺少秤，以次顶好，损害群众利益；必然会刺激和影响生产部门盲目追求利润，冲击国家计划；必然导致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兴风作浪，挖社会主义墙脚。一句话，按照刘少奇的“利润挂帅”办事，社会主义商业必然蜕变为资本主义商业。

“利润挂帅”必须彻底批判。但是，这绝不是说社会主义商业不要利润。商业部门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勤俭办商店”的伟大教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改善经营管理，扩大商品流通，加强经济核算，降低费用，减少损耗，取得合理的利润，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那种不要利润、不要计算成本、不要经济核算的观点，是错误的。

“流通决定生产”的谬论破产了，但它的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我们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单纯的商业观点。他们就商品分配商品，消极平衡，既怕多又怕少，盲目地一时喊多一时喊少，轻率地让生产部门一时加班突击，一时减产停产。这是“流通决定生产”余毒的表现。这些同志不懂得，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在市场上，某些商品一时出现的多或少，是事物矛盾规律在商品供求关系上的反映。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七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总是要大发展的。我们应当从生产出发，用积极态度从事综合平衡，当促进派，全面安排好市场，做到城乡兼顾，平时和战时兼顾，丰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兼顾。决不能单纯从流通出发，消极平衡，当退缩派。某些商品一时少了，应当积极增加生产，合理调拨分配；某些商品一时多了，应当积极收购，扩大销售，增加储备，只有十分必要，才能通过计划适当调整生产。当然，我们反对“单纯商业观点”，绝不是说商业对工农业生产只能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我们的商业工作做得好，就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做得不好，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我们必须做好商业工作，充分利用商业部门联系面广的特点，主动向生产部门反映市场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同生产部门共同研究、衔接生产和购销计划，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互相促进。那种认为商业工作对生产无能为力，那种不积极促进生产的发展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而那种不管需要多少，有无使用价值，“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想法和做法，也是错误的。

国内市场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

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如何对待农民？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帮助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剥夺农民，破坏集体经济，把农民引向资本主义邪路？这是商业战线上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商品生产要大发展，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社会主义商业应当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既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剥夺农民的反动政策。他恶毒地要商业部门“卡住农民的脖子”，“向农民多打点主意”，妄图瓦解集体经济，破坏工农联盟。

农民是工业市场的主体；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盟主要通过商业环节来实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市场问题上的斗争主要是争夺农民的斗争。这就是说，国内市场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

毛主席明确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然也是国内市场的基础。工业的发展，市场的繁荣，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没有发达的农业，就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就不能为工业提供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就不能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当然，“**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必须有强大工业的支援。但是，从根本上说，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能够腾出多少劳动力，能够吸收多少工业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事实证明，那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就更快，市场就更繁荣。这是一个规律。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目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般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商品交换，是现阶段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农业同工业的经济联系形式，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经济结合的主要形式。对于农民，只能交换，不能剥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国家对农副产品的需要，除少量农业税以外，绝大部分是通过商品交换取得的。列宁说过：“**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商业，贯彻执行稳定物价的政策；工业品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采取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逐步缩小剪刀差，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活跃了城乡经济，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基础。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卡住农民的脖子”，胡说什么“不等价，农民也愿意”，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破坏农业生产，破坏农村这个广阔的市场。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农业，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工业，“卡”了农民，也就“卡”了工人。一句话，就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破坏了工农联盟。刘少奇这一套货色，实际上是当年托洛茨基提出的“用剥削农民经济

的办法来建设工业”的反动谬论的再版。

列宁指出：“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盟，主要是通过商业环节来实现。农业支援工业，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商业是联结工业同农业、生产同消费的桥梁。在现阶段，工业生产的支农产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以及各种生活用品，是通过商业供应给农民的；农业生产的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也是通过商业收购上来，供应给工业及城市，发挥商业的桥梁作用，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保障城乡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而且是密切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所必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巩固工农联盟始终是商业工作的一个根本任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市场问题上的斗争，主要是争夺农民的斗争。这场斗争，同整个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积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商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从流通领域切断了资产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城乡经济联系，促进了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而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又为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的巩固和扩大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刘少奇要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总是企图让资本主义占领农村市场阵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他大肆鼓吹“贸易自由”，妄图为发展富农经济铺平道路。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又刮起大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黑风，妄图为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刘少奇的所谓“贸易自由”、“自由市场”，是彻头彻尾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实行自由贸易就是恢复资本主义”。

国内市场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绝不单纯是商品买卖的经济问题，而首先是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政治问题。商品交换关系是阶级关系。商品交换之中有政治。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注意在商品交换中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就必然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

社会主义商业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新型商业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分水岭。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大肆鼓吹“全民服务论”，妄图改变社会主义商业的性质。

“为全民服务”，多么漂亮的名词！世界上那有“为全民服务”的商业？！在阶级社会中，商业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商业，也根本不会有超阶级的服务。工农兵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时代的主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社会主义商业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政治方向，否则，社会主义商业就会变，变成资本主义商业。刘少奇的“全民服务论”，抹杀了社会主义商业的阶级性，剥去“全民服务论”的外衣，就露出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的原形。

社会主义商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新型商业。经营品种、服务项目、购销形式、营业时间、网点设置，手续制度，服务态度等方面，都要时时想

着工农兵，处处方便工农兵，事事为着工农兵。

刘少奇竭力宣扬资产阶级的“百色齐全”，要社会主义商业经营封、资、修等乌七八糟的东西，去满足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的需要。当这一套遭到抵制时，他就无耻地污蔑社会主义商业“花色品种劣于资本主义”。难道工农兵需要这样的“百色齐全”吗？我们不仅不要，而且要坚决把它摒弃，决不让带有封、资、修毒素的东西进入社会主义市场，腐蚀人民群众的灵魂。我们要积极经营经济实惠，朴素大方，耐穿耐用，花色品种多样化，为工农兵所喜爱的商品；同时，还要大力开展修理服务业务，满足工农兵的需要。我们提倡面向工农兵，提倡大众化，绝不是降低服务质量的简单化；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百色齐全”，提倡无产阶级的丰富多彩。

刘少奇在服务态度上大作文章，胡说什么资产阶级“在接待顾客的态度上，就比我们国营商店的服务人员好”，标榜资产阶级的服务态度是“好东西”。什么“好东西”？资产阶级的服务态度，是点头哈腰，花言巧语，衣帽取人，为资本主义商业的合法欺诈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决不能把资产阶级这一套“接收下来”，更不能把社会主义商业办成瞧不起工农兵的“官商化”字号。社会主义商业的服务态度，应当是“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服务态度的好坏、服务质量的高低，决不是一般的业务问题，而是关系到工农联盟，关系到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政治问题。那种轻视商业工作，认为“商业工作是侍侯人的，低人一等，没有出息”的思想；那种不是从方便工农兵出发，而是从方便自己出发，随意减少花色品种、减少服务项目，缩短营业时间的做法；那种对工农兵群众不是热情接待，有时甚至盛气凌人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应当看到，商业工作是光荣的革命工作，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的消费和生活的消费）。应当看到，任何社会都有分工，都有生老病死，社会主义应该也一样，只是服务对象不同了，服务态度应更好、服务质量应更高才对。

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最根本的是要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感情问题，也就是要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改造世界观，要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的“五·七”道路，与工农兵相结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狠抓阶级感情问题，从立场上来一个根本转变。感情的变化是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标志。对工农兵有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才能端正对工农兵的态度，想工农兵之所想，急工农兵之所急。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人员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阶级斗争的战斗员，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是 社会主义商业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

搞好社会主义商业，主要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是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是使商业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使社会主义商业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公然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单线领导”，“条条专政”，叫嚷“不要怕地方党委”，“地方无权干涉”，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业务第一”；反对群众监督，

鼓吹“靠资本家办店”，其目的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掌握商业领导权，变社会主义商业为资本主义商业。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商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服从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目前特别要注意加强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对商业的领导，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商业才能正确处理工商、农商之间的关系，密切和群众的联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刘少奇用“单线领导”、“条条专政”取代党的领导，就是要篡夺商业领导权。这就是要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社会主义商业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狠抓阶级斗争，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当前，正在开展的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就是一场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刘少奇鼓吹“业务第一”，是要商业人员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糊涂人。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业务都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所谓“业务第一”，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社会主义商业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不是单纯做买卖。社会主义商业人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不是资本主义的买卖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不能抵制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就会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

商业工作管钱管物，经常接触社会上的各种人，各种思想都会反映到柜台上，三尺柜台有阶级斗争。我们要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商业人员，认真整顿、建设商业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搞好思想革命化，特别是领导班子的革命化，使商业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商业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认真地接受群众监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贫下中农管理了农村商业，工农群众监督管理了城市商业。这是商业战线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靠资本家办店”的黄粱美梦。

工农群众监督管理城乡商业就是好！工农群众监督管理商业，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抓阶级斗争，提高商业工作人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抓服务方向，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抓政策思想教育，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改进商业工作起了显著作用。

工农群众监督管理商业，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商业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商业战线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普遍开展起来，已经开展的单位要总结经验，坚持下去，不断提高。

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使商业工作永远沿着社会主义航道胜利前进！

(原载 1970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批阅。

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当前，毛主席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正在变为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为了使高级干部的学习搞得更好一些，特通知如下：

(一) 要进一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这里讲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员、地方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的同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比过去更加重大的责任，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 读什么书？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一九六四年中央曾经选定三十本书，作为高级干部的学习书目。最近，毛主席指示，“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以下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主席著作：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 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 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
- 四、恩格斯：反杜林论（选读）
- 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
- 六、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

毛主席五本著作：

- 一、实践论
- 二、矛盾论
-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三) 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和集体讨论相结合。

学习时间，首先靠自己挤，坚持天天读。可以规定共同的学习日，每周不少于两次。

可以成立学习领导小组或者学习委员会，负责学习的规划、检查、总结和交流经验。

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应进行讨论，并将落实的情况报告中央。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三)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谎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〇年59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 各单位应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

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并请你们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五) 对陈伯达的问题，外间有一些猜测，敌人也在探听消息。传达时请你们注意保密。有关文件不准翻印、抄传，听传达的同志不准记录，不准传播。

各地传达情况和反映，望及时报告中央。

毛主席关于中国共产党陆军 三十八军委员会检举揭发陈伯达 反党罪行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已经主席审阅)

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主席：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主席：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主席：可讨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现在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主席：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主席：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主席：说有所进行，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主席：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罗，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主席：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主席：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主席：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么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主席：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萬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一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主席：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主席：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主席：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主席：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主席：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主席：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主席：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

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主席：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主席：那个拉提摩尔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主席：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主席：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主席：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 Island（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主席：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嘛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斯：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主席：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主席：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主席：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主席：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 (法律和秩序) 吗？他是喜欢那个 law (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 (秩序) 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主席：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主席：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好~~；树立瞿秋白，不

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主席：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主席：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好嘛，你这样搞，我赞成。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主席：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主席：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主席：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主席：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主席：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

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主席：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主席：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主席：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主席：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主席：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姆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主席：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么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元。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摘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元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这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主席：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

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主席：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主席：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主席：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这三次大斗争，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由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幕后导演，由叛徒杨献珍一个一个挑起的。这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搏斗，是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哲学战线上的反映。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早就指出：在全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提出要继续革命，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进一步制定了在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与此相反，刘少奇公然对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拼命宣扬“剥削有功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全国解放后，他又打着“唯生产力论”的破旗，抛出了一个所谓“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明目张胆地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亲自跑到他和杨献珍所控制的马列学院兜售这套黑货。

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刻，叛徒杨献珍按照刘少奇的旨意，精心炮制出一个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挑起了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斗争。

杨献珍宣称：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二者“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

很显然，杨献珍的这套反动谬论，一笔抹杀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否认了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妄图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全面地搞阶级合作、阶级投降。这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我国永远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

“综合经济基础论”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挖一挖它的老根，无非就是几十年来国内外新老修正主义者奉为至宝的那个“唯生产力论”，按照“唯生产力论”，中国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就只能听任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不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搞社会主义。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恰恰是这种“唯生产力论”的变种。

杨献珍的这套反动谬论一出笼，当然受到了无产阶级的迎头痛击。杨献珍不甘心失败，一九五五年，他又进一步炮制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更加系统地宣扬“综合经济基础论”。他为了取得主子的支持，将这篇黑文送给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公然为杨献珍撑腰打气，说“你的意见是对的”，私人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基础的一部分”。

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批判了刘少奇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指出了它的反动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实现。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不仅在理论上遭到破产，而且也被革命的实践所彻底粉碎。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日益土崩瓦解，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局面，建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

革命和建设的迅猛发展，吓昏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脑。刘少奇、彭德怀一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诬蔑我们党“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时，杨献珍这个小丑以为时机已到，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一个“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在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杨献珍武断地宣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胡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不是一个意思；并且采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劣手法，企图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对立起来，说什么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物论是拿反映论来解决的，唯心论是拿同一性来解决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普遍规律。矛盾的同一性即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也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了思维与存在这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这样，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没有普遍意义了。

杨献珍竭力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实际上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联系，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对立起来，陷入了二元论，并由二元论滚到了主观唯心论。事实正是如此。他反对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抓住革命群众运动的非本质的和支流的东西无限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抹杀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竟然把他反革命的主观感觉当作客观现实，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有辩证同一性，归根到底，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反对用毛泽东思想能动地改造世界，就是要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蒙蔽群众，要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改造世界。杨献珍的这种反动理论，正是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理论“根据”。杨献珍宣传这种反动理论由来已久，并且十分猖狂。他从一九五五年起，就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宣传这种反动理论。一九五七年公然提出要把反对他这个反动理论，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妄图把坚持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观点的人，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他炮制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大毒草，诬蔑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科学诊断是“主观唯心主义”，并且令其同伙写文章宣传他的反动理论。同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了杨献珍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但是杨献珍竟狗胆包天，进行对抗。十一月，他在讲课时疯狂咒骂主张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随后，在叛徒彭真、安子文之流的支持下，他又纠集其一伙，紧密配合刘少奇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进行了多次反扑，疯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有力反击下，他们的阴谋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一九六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精辟地阐明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伟大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批判了刘少奇、杨献珍一伙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斗争作了最科学的总结。

三

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尽管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但是他们还要进行垂死挣扎。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又指使杨献珍炮制出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紧密配合帝、修、反的猖狂反华活动，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指引下，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内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际上同苏修展开了公开论战。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笼，正是适应了帝、修、反及其走狗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的需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最精辟、最简明、最深刻的概括，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发展。

承认一分为二，就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侵略和颠覆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是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却鼓吹什么“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同一就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这种反动谬论，企图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论。它的要害，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合在一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它就是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基础”。

为了推销这种反动理论，杨献珍之流公开叫嚷什么“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攻击一分为二是什么“打人的哲学”，鼓动他们的一伙“多写文章，宣传‘合二而一’”。这一伙反动家伙赤膊上阵，公开对抗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但是反动派的猖狂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合二而一论”一出笼，立即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群众的毁灭性打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斗争，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合二而一”的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实质，宣判了反动“合二而一论”的死刑。

四

哲学战线上的这三次大斗争说明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不能把哲学斗争简单地看作是“学术之争”。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拼命攻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散布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就是妄图动摇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哲学基

础，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正是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路线斗争的最科学、最正确的总结。因此，我们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必须结合党的历史，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才能领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精髓，真正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到手。

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还告诉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人们维护和执行什么路线，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决定的。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所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世界观的根源来说，是由他们的叛徒的世界观决定的。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决定的。我们要自觉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学会辨别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否则，就要成为糊涂人，盲目的人，甚至就要成为假马克思主义的俘虏，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殉葬品。

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以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光辉胜利而告终，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所散布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合二而一论”等反动哲学的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我们要对他们的反动哲学谬论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批臭，让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永远照亮我们胜利前进的航程。

（原载 1970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一年元旦社论

伟大的七十年代第一年过去了。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中，在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中，迎来了战斗的一九七一年。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

世界处在革命的大变动的过程中。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美帝国主义以及社会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侵略、压迫和控制，推动着亿万人起来革命。我们看到：各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反对本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紧密汇合；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北美、大洋洲的革命群众

运动，互相呼应；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美国人民反对尼克松反动统治的斗争，联成一气。越来越多的小国，敢于拿起枪杆子，坚持战斗，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侵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继续开展。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日本人民反对冲绳美军基地的斗争，有新的发展。

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进攻，正在受着更大的锻炼。几内亚共和国击退了美葡殖民者的人侵，胜利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推动了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统治和颠覆的斗争。被美帝视为“后院”的拉丁美洲各国，正在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海权进行着不屈的斗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连绵不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失败，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促进了美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不断高涨，使美帝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许多的中、小国家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越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波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革命斗争，使哥穆尔卡跟着赫鲁晓夫、诺沃提尼之后倒了台。社会帝国主义在东欧的殖民统治陷入深刻的危机。这件事不仅说明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一步破产，而且说明修正主义统治的脆弱性。

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反帝反修的斗争中并肩前进。我们同越南劳动党、朝鲜劳动党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紧密团结、互相支援。我们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团结，同世界革命人民的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正在斗争中进一步联合起来，充满信心地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站在一个行列。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做越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越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从实力地位出发，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人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我们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向他们学习，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为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而共同奋斗到底。

过去的一年，我国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形势越来越好的重要标志，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地结合起来。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各条战线的斗、批、改运动，正在健康地深入发展。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农业连续九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出现新的高涨。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越来越巩固。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越来越旺盛。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叛徒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引导党和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毛主席在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且教导我们：对于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毛主席说：“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党校。”“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坚决执行这条路线，我们就能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胜利。有了毛主席，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新中国，才有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的今天。这个历史经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一天也不能忘记。

一九七一年，将是我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的年。我们将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今年，我们要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作为干部学习的主要课题，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的前进。全党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党的高级干部更要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带领广大群众更好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今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我们要在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紧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一步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把斗、批、改工作做得更深入、更扎实。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紧“一打三反”运动，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要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做好整顿建团工作，开好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继续抓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今年，是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毛主席教导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时期。我们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努力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各地党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

今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继续贯彻执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要全面地按照四好的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革化、战斗化建设。要搞好民兵建设，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全国军民要“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
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并指出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

我们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通思想，提高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希望你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中，适时地向中央写出这样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

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泽东

一月八日

林彪批示

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林彪

八日

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 “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军委、总政治部：

经过学习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林副主席“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社论，许多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各单位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召开各种会议、四好总评等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军区“三代会”又进一步作了贯彻，并结合学习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克服骄傲自满问题的报告》。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把骄傲自满上升到路线上来认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待自己，在灵魂深处挖骄傲自满的根子，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

我们在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如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好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历史上有战功，工作有成绩，就自以为“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单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批判“一贯正确”的形而上学思想，摆自己的成长史。有的说：在战争年代虽然打过仗，流过血，但也不是每一仗都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受过处分，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阴谋看得不清，或跟着办了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毛主席在各个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并非都是自觉地紧跟、坚决照办的。通过这一回忆，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深受教育。认识到：“一贯正确”的本身已经是不正确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

“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十六军党委先后两次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一分为二，查骄傲自满，破“一贯正确”，决心把骄傲自满搞得臭臭的，让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头脑中树得牢牢的。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允许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有的单位例举了有的老干部不注意思想改造，“眼睛长在头顶上，尾巴翘在天上”，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走资派的事例，说：有了官气，就会发展骄气，丢掉革命朝气；就会由革命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阻力，由依靠群众转化为脱离群众，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化为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迟早总会被淘汰”。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战争年代经过‘火线’锻炼，文化大革命经过‘路线’考验，就凭这些资本，也可以再过半辈子”。因此，学习不刻苦、作风不深入、工作无创造，靠吃“老本”过日子。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中较普遍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的放下“战功”与“新功”的两个包袱。二〇三师副师长杨育才，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曾产生过有“资本”的念头。学习中，他深有体会的说：成绩、进步、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将来。职务提升了、不见得思想觉悟就提高了；资格老了，不是革命到头了；荣誉多了，不是为人民服务到顶了。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在紧跟毛主席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中，为人民立新功。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毛主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目前，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克服骄傲自满问题上，发展还很不平衡，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作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学习元旦社论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领导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论述，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同时，通过新年、春节和野营拉练的机会，在全区部队进行一次以反对骄傲自满、虚心向地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拥政爱民教育。对三支两军人员普遍进行一次整训，反骄破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指示。

济南军区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

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最近，有一批省、市相继隆重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其它省、市、自治区也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党委。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这对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更好地动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继续完成“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党清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提高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富有战斗力。在这样的基础上，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召开的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的新党风，具有鲜明的新特点。

这些地方的党代表大会，突出地抓了思想建设。召开代表大会的过程，就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就是密切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觉性的过程。

这些地方的党代表大会，认真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从代表的产生，到新党委的选举，都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充分酝酿，反复协商。出席代表方面之广，特别是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党员代表比例之大，是历次党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

这些地方的党代表大会选举的新党委，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特别可喜的是，许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老干部，更加生气勃勃地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一批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进入党的领导班子。

这些新特点，有力地表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断有新的发展。毛主席的建党思想，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一系列指示，正在全党进一步落实。我们的党组织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建设成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主席教导我们：“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各地新党委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搞好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把各项工作做好。要根据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伟大指示，在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在代表大会以后，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胜利前进。

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那种以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就没有什么路线斗争的想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应该看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阶级

斗争的长期性。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深入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余毒。

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要有正确的作风。培养好的作风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新的胜利的形势下，各级党组织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应当坚决实行，并使之代代相传。为了进一步发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我们要实行开门整风，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把作风问题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特征。骄傲自满，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我们一定不要沾染这种资产阶级作风的灰尘。

要解决路线的问题，作风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地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这样，才能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作风，什么是资产阶级作风。全党的学习抓紧了，认真学习，并且坚持下去，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我们的党就会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更加团结，我们的步伐就会更加整齐，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更加兴旺。

让我们进一步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用新的胜利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亮、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

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照 发

毛泽东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

在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到会的会议上，首先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会议的指示：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宣读后，到会的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了坚决拥护、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

为使各地和中央各领导单位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能对毛主席的极其重要的指示有深刻的理解，并联系到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阴谋活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特将毛主席的指示全文，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和执行。

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

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塔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围，一概都是对的。”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就是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示。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了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 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十七)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上的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下边划了短线；增加的地方，在下边打了加重号）：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问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官本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

思想。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人民，大造官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坚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央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 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 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二十一)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设，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人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

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七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二十四）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已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

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宣增至五百万。”

(三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三十一)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 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¹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三月十五日九时

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

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那里去了。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在最后一页批示

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¹ “这个词”是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象毛主席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也好，白色恐怖、特务横行也好，叛徒、内奸的阴谋破坏也好，都没有能够把中国共产党消灭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已经发展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改造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路线不正确，即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取得政权。但是，正确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林彪同志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正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引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直到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時候，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贯彻执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完成“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

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是党的事业继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谁否认它，或者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否认，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究竟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列宁根据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必须看到你们那里的特点，你们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列宁强调说，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显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谈不到夺取政权，就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作了正确的问答。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主席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样四个历史阶段。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二十八年，才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问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具体分析。明确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又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主席特别重视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的问题，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就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

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认为中

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叫嚷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污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他根本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放弃了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工农群众起来了，他唯恐吓坏了资产阶级。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刘少奇竟然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广大群众手无寸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后来，陈独秀坚持托洛茨基反动立场，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取消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挽救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正确的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八七”会议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一九二八年四月，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游击战争都先后有了发展。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很快又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二八年初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现过陈独秀取消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以及其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的倾向，但是，主要是这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危害极大，教训极深。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露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实际上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如同其他“左”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不懂。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他们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整个

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实行许多“左”的政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路线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近来又转化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夺了毛主席的权。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到处推行他的错误路线。结果，使我们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全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丢掉了革命根据地，使工农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王明“以我为核心”，自封“百分之百”正确，原来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遵义会议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一方面军组成了北上抗日支队，进军陕北，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接着，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候，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我们党的力量、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路线正确，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大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胜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但是，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反映在党内，就是我们党同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叛徒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王明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军队，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这样，王明又回到了一九二七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路线上去了。这个时期，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他表面上反对王明路线，拥护毛主席正确路线，把自己吹嘘成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把他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实际上，他早已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在白区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错误路线。他抛出的黑《修养》，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学习什么孔孟之道，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宣扬的也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个时期出现的所谓“国防文学”、“国防哲学”，实际上就是卖国文学、投降哲学。它是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也是刘少奇白区工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告诫全党：“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主席重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

问题，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是，王明抗拒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报告和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驳斥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规定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全会通过了毛主席的报告和结论。后来，毛主席又在《论政策》等著作中，反复地教育全党，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由于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又纠正了在同国民党作斗争时出现的“左”的倾向，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党战胜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紧紧地掌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从党创立的初期就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毛主席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对全党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四十年代初期，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党中央抓住了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个极好的时机，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揭露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收获很大。在整风中，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全党干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党的“七大”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鼓舞了全国亿万人民愚公移山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已经扩大到一亿人口。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决心发动反革命内战。我们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这时，刘少奇抛出了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刘少奇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

实行改组。”刘少奇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当官，同美蒋反动派“合作建国”。这条路线，是陈独秀、王明路线的继续，是美共叛徒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毛主席坚决地反对了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主席又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是针锋相对。他们要谈判，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部署了击破蒋军进犯的作战准备，又亲自到重庆谈判，揭穿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毛主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率领全国人民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并且按照全国革命进展的不同情况，规定了土地改革、整党建党、整军建军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党发布了适合全国农民愿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纠正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去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右倾错误，又纠正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土改、整党中，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搬石头”、搞扎根串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等等形形“左”实右的路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和蒋介石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海上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埋葬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明确地指明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二十八年的英勇奋斗，只是朝着最终目的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二步的开始。

我们辽阔的国土是逐步解放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军队，一边打仗，一边发动群众，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摧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政权，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我们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在三年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三年，在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毛主席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坚定的，又是逐步前进的。对农业，经过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给予估产定息，实行赎买政策。有些害急性病的人，觉得这种办法不过瘾，过渡的时间太长了，最好一个早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左”的倾向经过教育较快地克服了。

社会主义革命是埋葬资本主义的斗争，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欢呼，也遭到刘少奇一伙的猖狂破坏。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结成了反党联盟，妄图分裂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阴谋被党中央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背着中央，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到处鼓吹“剥削有功”论。五十年代初，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就是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这个口号，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纲领性质的错误。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大砍合作社的右倾错误，批判了他们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和发展富农经济的谬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农、下中农实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全国五亿农民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由于无产阶级占领了广大农村阵地，工人农民两头一夹攻，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逼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改造。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手工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大变动中，工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发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刘少奇一伙的答案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说要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到来的时候，他们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搬出这一套，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照他们的说法，解决了所有制问题，阶级斗争就熄灭了，不需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了。只要抓生产就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太“先进”了，不适合中国今天的需要，应当退回去，应当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一伙还背着毛主席，把这些黑货塞进了“八大”的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

毛主席当时就指出“八大”决议中刘少奇一伙塞进的这些话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

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毛主席指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主席用战无不胜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彻底地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党。

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地用新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列宁故乡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严重事件的出现，极其深刻地教育我们：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彻底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人们只要看一看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历史，就会明白：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当然要比历史上那些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要更加激烈，更加曲折。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利用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精神准备，复辟了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坏事，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它教育了苏联人民，教育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资产阶级在苏联的复辟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苏联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一定会战胜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走列宁、斯大林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胜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辩论的问题，主要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这场大辩论，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我，分清了是非，孤立了资产阶级右派，驳斥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谬论，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了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突出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这条总路线，确定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工业、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全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

局面。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和建设迅速前进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一伙改变了手法。他们先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否定商品生产，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保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采取具体措施，把群众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跳了出来，又从右的方面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地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接着，刘少奇也不断地从右的方面攻击党的总路线。他们一伙极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撕合同、撤专家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否认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党的总路线能够而且已经开始战胜了困难，他们公开地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支援要少）的对内对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已经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是打着白旗反红旗了。

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猖狂，并不表示他们有力量，而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使他们惊慌失措。历史经验证明，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政治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相互呼应的。刘少奇一伙，以为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猖狂反华，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是从来不怕困难的。帝、修、反的封锁、禁运、武装侵略、内部颠覆，都无损于中国人民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造社会。被孤立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帝、修、反，包括他们的走狗刘少奇一伙。

一九六二年九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现在已经写进我们党章的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还指出：“凡是要求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林彪同志主持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展。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党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进攻，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登上了文艺舞台。同时，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无产阶级进行猖狂反扑，反对毛主席明确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针，以形“左”实右的手段，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这时”了，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反对文艺革命，反对批判资产阶级。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刘少奇一伙在一九六六年抛出“二月提纲”相对抗。斗争的反复进一步暴露了刘少奇是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号召全党要警惕“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这个《通知》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了《炮打司令

部》的大字报，正式揭开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盖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多同志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当着广大群众起来了，又分成两派，甚至发生武斗，一时似乎天下大乱。有人问：刘少奇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权力，毛主席下命令罢他们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实践证明，罢官的办法用过多次，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次革命不单是为了罢几个人的官，而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刘少奇不但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才能够清除出刘少奇叛徒集团，才能使亿万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受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取得把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的经验。所谓乱，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他们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破坏捣乱。但是，他们只能暂时地欺骗一些人。广大群众带着《毛主席语录》参加辩论，逐步地学会了识别好人和坏人，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学会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样，全国变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广大群众在大风大浪里学到了他们平时学不到的东西。所以，这种乱，终究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军事训练），为人民立了新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从创立的那天起，就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有四十多年的群众工作经验。因此，他们能够很快地同群众打成一片，能够推动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较快的发展，并且使我们的军队得到了新的锻炼。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诞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军、干、群和老、中、青两个三结合。整顿后的各级党委的成员，不但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中年和青年一代。这就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更加朝气勃勃。正象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因此，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这篇文章就不再详细论述。

“九大”以来，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发展，证明了“九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所确定的任务和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各条战线斗、批、改的任务，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进行斗、批、改的任务还很艰巨。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还需要我们长期奋斗。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

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回顾我们党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战斗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我们党就前进，就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完整的总结。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毛主席所总结的我党的历史经验中，那一些是今天应当特别引起全党注意和学习的呢？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总是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坚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正确地提出党的路线和政策，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以及其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其思想特征的。他们都曾从右的和“左”的方面，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反对和歪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进行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反对理论同实践的统一。他们也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孔，但是，这是为了吓唬和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而他们自己从来也不想照马克思主义办事，从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便必然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要求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也就必然要在革命实践中遭到破产。我们有一些同志在一段时期内所以不能辨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从主观原因来说，也是因为或者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或者虽然也读一点，但是不能够用毛泽东同志无数次强调的这个根本思想原则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历史经验非常深刻，一切新老共产党员都要牢牢记住。

当前，我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正在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学习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干部的学习运动同广大群众的学习运动相结合，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效果，我们应当长期坚持下去。在看书学习中，必须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带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看书学习。这就是要把读书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

把学习历史经验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批判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到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主席领导全党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辩论，更是对全党进行了极其深刻极其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是当代疯狂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继续揭露和批判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并且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是我们党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全党同志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批判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

(二) 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加强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使党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去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

对于极少数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特务，对于里通外国的内奸，必须彻底揭露。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要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隐藏党内几十年终于被揭露出来，王明终于逃到外国当了“百分之百”的汉奸特务，就是例子。

对于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必须采取另一种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主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个方针，指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毛泽东同志这个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既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论。我们要学习在各种不同历史条件下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三) 必须力戒骄傲。对于一个取得伟大胜利的党，一个掌握了政权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一个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担负着国际主义伟大义务的党，这点特别重要。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是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

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四)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我们还没有察觉而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成为主要倾向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注意反对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倾向。当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联合破裂，革命转变到武装斗争为主时，毛泽东同志注意反对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倾向。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预见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号召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每当我们对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成为主要倾向时，毛主席总是重申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提醒我们要谨慎，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防止和克服违反政策的“左”的倾向。而当资产阶级向我们发起进攻，或我们党在前进中遇到暂时困难，或集中力量纠正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时，毛主席总是提醒我们要坚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区别主流和支流，不要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提防公开的、暗藏的敌人的破坏和反扑，反对和克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右的倾向。当某种倾向已经形成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的历史关头，毛主席总是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我们稳稳地把住了航向。

(五)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把是否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毛主席尖锐地批驳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类假马克思主义者诬蔑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动观点，也不断地批判和纠正了党内的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毛主席反复教导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遇事同群众商量。要办好五·七干校。要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防止重犯脱离群众的错误。同那种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人物相反，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并用毛泽东思想坚持不懈地教育群众，克服错误倾向，提高人民的觉悟。

毛主席历来关心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各民族在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斗争中结成的兄弟关系，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六)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要在党内外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

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没有集中，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意志，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但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此，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反对说假话，提倡说真话。把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要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民主作风，经常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是，我们的民主，无论军队或地方，都是为着巩固集中、加强纪律和提高战斗力，而不是相反。各级党委都要建立和健全党委制，加强一元化领导，防止分散主义，防止多中心即无中心，要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七) 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主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破坏，发展壮大了我们自己的军队，成为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只要有阶级存在，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宁。今天，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实行霸权政治，妄图瓜分世界。日本军国主义也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因此，我们决不可忽视他们侵略和颠覆我们祖国的危险。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一天也不要忘记准备打仗，一定要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陆军，而且需要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我们不但需要强大的正规军，还需要大办民兵。这样，任何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国，都会被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八)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毛主席一直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正确处理本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的奋斗中，始终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得到各个友好国家和友好团体的支持，得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兄弟组织的支持。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同他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永远感谢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不但同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人民，同亚、非、拉各国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美国、苏联、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完全一致的。今天，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所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一方面领导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搞好，一方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各国人民在一起，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斗争，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政治而斗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斗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比较穷、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还很少。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但是，就是再过几十年，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我们也决不可以有傲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党沙文主义。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我们应当学习各国革命人民的长处，永远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

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成千成万的烈士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不论还有多少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

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同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相比，全世界的革命形势空前大好。帝、修、反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

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 《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

(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四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人民画报》第七、八两期合刊和《解放军画报》第七、八两期合刊，将从八月一日起陆续发行。

画报的扉页上印着毛主席在党的“九大”期间发出的伟大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两本画报的照片全部用彩色印刷，生动地纪录了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以及我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在共同战斗中的伟大团结。

这期画报突出地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两本画报的封面都刊登了一九三六年毛主席在陕北的历史照片。当时正是毛主席率领红军经过万水千山，战胜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后到达陕北。毛主席在陕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回顾这段战斗的历程，更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有了毛主席，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新中国，才有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的今天。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在“团结·友谊·战斗”的标题下，画报刊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同志，会见马列主义兄弟党的领导同志、友好国家和地区的负责人以及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的二十八张照片。

本期画报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标题，发表了峻岭同志的摄影艺术作品。这些照

片，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军工农兵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突出地赞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牢记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教导，不断加强部队革命化、战斗化建设，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的革命英雄气概。

李进同志十年前拍摄的照片《庐山仙人洞》，也染印成彩色在本期画报重新发表。

这两本画报，还刊登了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许多照片。

(原载 1971 年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

“电子中心论”批判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

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六十年代初期，电子技术的新成就，电子工业作为一个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打着发展新技术、关心电子工业的幌子，炮制了一个“电子中心论”，拼命鼓吹“中国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他们编造了一套“电子神话”，鼓吹什么抓住了电子工业和电子技术，“不仅是国防工业，而且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都带动起来。”他们耸人听闻地提出，“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工业的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现代化电子技术的迅速普及”，将“使我国成为第一流新电子化，第一个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最强国。”他们力图使人们相信，电子技术是万能的，抓住了电子工业就有了一切。

这个“电子中心论”，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必须予以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电子中心论”是反对“以钢为纲”

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方针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为了推行“电子中心论”，挖空心思地炮制了一系列“论据”。他们提出，由于电子工业是什么先导工业，应用广泛，技术先进，所以要以电子为中心。

他们把电子工业故意说成是“带动全局的关键性的东西”，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先导，是起带头作用的主要矛盾方面，似乎只要抓住了电子工业，就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他们宣称，电子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它的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阶段”，因此，就应以电子为中心。他们鼓吹什么电子技术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因而要“从这里开始迅速发展我们的工业技术”。

电子工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特点，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不能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使生产资料比消费资料优先增长，而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又必须比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必须狠抓基础工业，特别是为制造各种机器设备提供原材料的钢铁工业。毛主席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提出了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客观规律。钢铁工业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有了钢铁，就可以造机器，什么都好办了。我国工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其中也包括电子工业），都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然而起带头作用的，起纲领作用的，只能是钢铁工业。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钢铁工业促上去，才能尽快地发展各种机械制造工业，尽快地改变我国工业的落后状况，才能有力地支援农业，支援国防，也才能有电子工业的发展。当前，我国机械制造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钢铁工业，而不是电子工业，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可以带动一切。“以钢为纲”，全面发展，是我国工业发展唯一正确的方针。那些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鼓吹“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阴谋目的，就是妄图破坏以钢为纲，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确，电子技术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电子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对其他工业部门有着广泛的应用性，它在实现我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电子工业不仅有它广泛应用性的一面，而且还有它对原材料工业的广泛依赖性的另一面。电子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品种以千计，规格以万计；对金属板材、线材以及稀有金属等，又有特薄、特细、特纯等特殊要求。电子工业的发展，有赖于冶金、电力、煤、石油等基础工业的发展。这就是说，电子工业的发展，有赖于国家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有赖于原材料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先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材料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从根本上决定着电子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仅仅抓住电子工业广泛应用性的一面，就大肆鼓吹“电子中心论”，胡说“抓住电子工业这个环节，来带动、促进整个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包括冶金、采矿、化工、炼油、动力、地质勘探以及许多轻工业）”，这是故意夸大电子工业的广泛应用性、抹煞电子工业的广泛依赖性。

电子技术是现代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建设的新技术之一。它与原子技术、喷气技术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标志。但是，先进和尖端是一回事，基础和中心又是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国家发展工业，首先要从基础工业开始，而不是看那一部门技术先进。这是因为，基础工业是提供原材料的，只有基础工业发展了，其他工业才能够上去。相反，不抓基础工业，不首先搞原材料工业，就是搞“无米之炊”，那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大发展，电子工业尽管先进，也成了“空中楼阁”。而且，如果那一部门技术先进，就以那一部门为中心，那么技术先进的工业部门，都要成为中心，那就是多中心即无中心，必然要乱套，使整个工业失去基础。同时，所谓“先进”，也是比较而言，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电子技术发展也有赖于其他先进技术的发展，孤立地提出发展电子技术而撇开其他技术，也是荒谬的。

我国工业的发展是“以钢为纲”，还是以“电子为中心”，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决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工业发展的方向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电子工业作为一个加工

工业的部门，它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可以起辅助、配合和促进作用，但不可能起中心和带头作用。“电子中心论”把电子工业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反对大力发展钢铁工业，其目的就是要使我国工业陷于“无米之炊”的困境，使我国工业不能尽快地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体系，从而从根本上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也就破坏了电子工业本身的发展。

“电子中心论”是“技术中心论”的新变种

多年来，刘少奇一伙竭力推行“技术中心论”，鼓吹“技术第一”，胡说什么“唯一的一条出路是靠技术，搞技术革命”。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把人们引上埋头技术、不问政治的邪路上去。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为了鼓吹他们那一套“技术中心论”，打着发展新技术的幌子，利用人们对电子技术新成就和电子工业这一新兴工业部门的注意，编造了一大套“电子神话”，竭力夸大电子技术的作用。他们象一个“电子拜物教”的传教士，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说：谁突出电子技术，谁就能由落后变为先进，谁就能战胜资本主义；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找出一条发展新技术的具体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要用电子技术带动一切，以电子为中心。“电子中心论”不过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技术中心论”的新变种。

我们历来重视新技术的作用，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要重视新技术。电子技术正在作为一门新技术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技术第一”，不搞阶级斗争，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谈不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谈不上使电子技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多快好省地发展。正如列宁所说的：“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所谓电子技术带动一切的“技术中心论”，是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马克思早就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哲学的贫困》）机器、工具、技术等等，只是一种可能的生产力，它是由人创造的，并且只有通过人，由人来掌握，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精辟的语言，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所谓电子技术带动一切的“技术中心论”，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动力论。”马克思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总是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来带动、促进生产和技术革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十七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但它的广泛应用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变革以后。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是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进行的。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都是经过不同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使电子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就只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狠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断揭露和打击一小撮阶级

敌人的破坏活动，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撇开这些根本问题，单纯地讲生产技术的发展，讲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电子工业本身的发展，完全证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强大动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更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出现新的跃进。电子工业这几年的大发展，也正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批判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推行的“条条专政”、“洋奴哲学”、“技术第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后才取得的。反之，按照“电子中心论”的道路走下去，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技术作为发展生产的动力，不仅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相反，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正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拼命鼓吹“电子中心论”的要害所在。

揭穿政治骗子的阴谋大力发展电子工业

伟大的列宁曾经指出，修正主义“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怎么办？》）

“电子中心论”在理论上是一窍不通的，刘少奇一伙抛出这一谬论，充分暴露了他们政治骗子的真面目。这个听起来似乎很新颖的“电子中心论”，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而是从外国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那里剽窃来的。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找到了电子工业是“先导工业”，可以引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理论根据”；又从另一个国家的刊物上找到了“把电子工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它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的实施方案。于是，他们就如获至宝，如法炮制了一个“电子中心论”，到处招摇撞骗。这就充分暴露了这伙政治骗子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搬来“电子中心论”的目的，不过是要我们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罢了。

刘少奇一伙在自然科学上，把自己装扮成“权威”，到处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他们抓什么就叫喊什么为“中心”，一会儿说“电子技术为中心”，一会儿又说“化学工业与电子工业并提”；一会儿说“以发展造船工业带动上海的机械制造工业”，一会儿又说机械工业是“首脑”。颠三倒四，前后矛盾。

电子工业担负着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服务，为我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电子中心论”，是为了使我国的工业，其中包括电子工业，更好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不重视发展电子工业的思想是错误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电子工业提出了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电子工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电子工业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但是，我国电子工业还是薄弱的，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电子工业战线广大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技术人员，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政治挂帅，深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努力发展电子技术，迅速改变我国电子工业的落后状况，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 1971 年 8 月 12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

中央同意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现发给你们，望各级党委认真讨论执行。

(此件发至公社党委，大、中、小学党委或党支部)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四月十五日到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的同志和一百九十八所高等院校（包括军队系统院校）的代表，共六百三十一人。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批修整风。与会同志怀着极大的愤慨，揭发、批判了刘少奇一伙滔天罪行，批判了他们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学习了马、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长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总结了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次会议，着重对大学教育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经验，也初步讨论了中小学教育革命的若干问题。

同志们一致认为，这次会开得好。进一步分清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会议将有力地推动教育革命胜利发展。

(一)

会议分析了当前教育战线的形势。一致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他们长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教育战线上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的现象。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教育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新的光辉指示，亲自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斗、批、改，为教育革命树立了样板。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各地工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清队，整党建党，使斗、批、改的群

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大学开始招生，出现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新局面。原有干部和教师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得到程度不同的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成长。全国各地广大群众沿着《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学校，积累了许多生动活泼的经验。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思想已经在全党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心坎里生根。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会议认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得来不易。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

长期以来，在教育战线上，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教育战线领导权的斗争。这个斗争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毛主席不但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而且制定了一整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并且亲自领导了教育战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许多重大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并且提出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战线的任务。解放初期，遵照毛主席关于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的指示，对旧学校进行了一些改革，办了一些抗大的式的学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毛主席发动对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适、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的批判，在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一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刘少奇一伙，在教育方面，提出学校应当“基本照旧”，就是说不要触动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又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妄图把中国的教育制度变成封、资、修的混合物，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光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批驳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规定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胜利，使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势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号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冲破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压迫和破坏，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他们诬蔑这场革命是“乱、糟、偏”，疯狂地反攻倒算。一九六一年，又通过制定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教育革命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并且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刘少奇一伙竭力封锁、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到处推行资产阶级的“两种教育制度”，妄图继续霸占住教育阵地，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历史事实证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次抵制和斗争，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甚至有的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在教育战线上，这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严重现象，引起了全国广大工农兵的强烈不满。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曲折的。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教职工奋起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了旧教育制度的反，夺了走资派的权。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极力煽动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疯狂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操纵“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插手学校，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造成了学校长期“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严重局面。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工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为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阵地的领导权，用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改造教育阵地创造了条件。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十二年的斗争充分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力量，他们就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成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使教育战线的形势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但是，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谁如果不认识这一点，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就不可能坚持地百折不回地把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二)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就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

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会议认为，造成这个新部队要靠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共同努力。但是，应当指出，搞好教育革命，办好大学，使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得到学习提高的机会，是造成这个新部队的一个重要条件。应当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去深刻地认识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性，正确处理教育革命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在当前教育革命斗、批、改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这是无产阶级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彻底摧毁剥削阶级教育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建立一个思想上、组织上革命化的党委领导班子。现在，有些学校领导班子很不健全，应当加强，特别要注意配备得力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些干部缺乏办学经验，又受到资产阶级散布的教育工作“危险”论的毒害，因而不敢大胆领导，这是不对的。没有经验可以从实践中取得经验。无产阶级不能巩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是真正的危险。只要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又能坚持走群众路线，遇事同群众商量，谦虚谨慎，多做调查研究，抓好典型，不断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逐步学会领导学校工作。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长期留下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政治作用。校、系两级领导班子要有宣传队员参加。革委会是党委领导下的权力机构，实行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要继续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充分发挥学校原有革命干部的作用，并大力培养新干部。要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

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要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贯彻两个“决议”，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用毛泽东思想建校育人。

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宣传队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旺盛的革命意志，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应当汲取无产阶级派到文教战线去的人，在不长的时间内被资产阶级腐蚀的许多历史教训。要克服“临时”观点，树立牢固占领、彻底改造教育阵地的决心。宣传队员轮换不要频繁。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要相对稳定，对这一部分人的调动，要经地方上级党委批准。各省、市、自治区要加强对宣传队的统一领导、管理，派出单位要保证宣传队员的质量和一定数量，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和生活。

二、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毛主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七·二一”指示中又指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各地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指示的这条道路，是彻底破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群众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教育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政治统帅业务，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要坚持以

学为主的原则，上好政治课和社会主义文化课，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要把学文和兼学别样结合起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工农兵学员在学习过程中仍要参加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要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反对单纯学理论和轻视理论学习的两种偏向。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继承抗大的革命传统。

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统筹规划，组织好厂（社）校挂钩，使学校与社会互相促进。校办工厂（农林院校的农场）应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合教学和科研，以小型为主，既有一定批量生产，又要搞研究试制。防止贪大求全、片面追求科研生产指标的倾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把校办工厂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配备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人，并认真解决劳保福利等问题。要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开展科学的研究。

遵照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学校要加强战备教育，组织师生学军、进行野营训练，开展民兵活动。发展体育运动。

各地遵照《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已陆续创建了一些厂办工人大学，遵照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指示信中关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的教导，在农村创建了一批“五·七”大学或“五·七”学校。这些学校已经多、快、好、省地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人材，受到群众欢迎。各省、市、自治区要抓好典型，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同时要大力办好各种业余教育。

三、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阵地过去被剥削阶级长期垄断，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它的传统势力十分顽固。它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旧体系。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这些旧思想，总是以新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阻碍教育革命的深入。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教导，深入持久地批判资产阶级。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展批修整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结合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些反动谬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等等就是它的突出表现。在各个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中，这些谬论更是普遍。这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武器把它彻底摧毁，才能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要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克服那种认为革命大批判搞得“差不多”的思想和“走过场”、“一阵风”的错误倾向。领导要亲自动手，调查研究，紧跟国内外阶级斗争新形势，密切结合教育革命实践，联系师生的思想实际，有计划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要批判右的和极“左”的反动思潮。要重视对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批判要深入，就要进一步学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善于对事物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四、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是创建社会主义学校的重要任务。

工农兵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要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吸收工农兵参加教学活

动，主要是就地聘请。要从工厂、农村、部队选调一批工农兵和同工农兵结合较好的革命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也可以选留工农兵毕业生担任教师。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积极支持选送教师的工作。

对原有教师队伍要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因此，必须继续抓紧对原有教师的再教育，引导他们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着重解决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防止只使用不改造和只讲改造不敢使用的两种倾向。要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原有教师队伍中凡属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都应重在教育，加以团结和任用。凡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就要严格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在使用中继续考察、教育和改造。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对顽固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坚决予以揭露，批倒批臭，作为反面教员，教育群众。对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则应根据党的政策适当处置。

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他们在教育革命的实践中暴露出一些旧思想是正常现象，“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要耐心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继续大胆实践。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科学中的的是非问题，要通过讨论和实践去解决。在教育革命中要提倡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允许不同方案的试验和比较。

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强调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左”的倾向；在强调团结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

要创造条件，让原有教师分期分批到工厂、农村、部队，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尽快地适应教育革命的要求。年老体弱的，可分配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需要退职、退休的，应根据国务院规定妥善安置。

五、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工农兵学员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要坚决地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员和教员都要执行毛主席指示，“**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是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的主动性、创造性，还是把学员当敌人那样管起来？是培养一批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培养一批书呆子？这决不是小事。教学方法不改革，一批生动活泼的工农子弟仍然有学用脱节或者啥也没真正学会、身体搞垮了的危险。因此，必须废止注入式，采用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法。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教师应发讲义或讲授提纲，提倡自学。

根据初步的经验，大专院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选拔工农兵学员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坚决反动草率

从事和“走后门”。五年以上工龄的工人、或者学制在一年左右的进修班、短训班学员，学习期间工资照发，其他学员发生活费，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原单位给以适当补助。

大学学制暂以二或三年试行，进修班为一年左右。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国家统一分配，待遇由国家另行规定。

六、教材要彻底改革。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积极编写新教材。应当深入实际，学习和总结工农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丰富实践经验发明创造，使教材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大破唯心论、形而上学，坚持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教材内容要少而精，要便于学员自学。

对原有教材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分析、批判、改造，推陈出新。适当选编一些反面材料，供批判用。要办好图书馆。

对改革教材的工作，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群众路线，有工农兵参加。教材由各地编写和交流。

七、高等院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战备的需要，经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对全国原有高等院校（不包括艺术院校）提出了调整方案，会后继续试行。要逐步改变院校布局不合理状况，撤消专业要慎重。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原部属院校下放后，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学校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地方把学校办好，既要反对“条条专政”，又不要撒手不管。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八、会议就中小学教育革命中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认为我国中小学教育革命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

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必须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要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保证上文化课的时间，打好基础。要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课程和作业不应太重，生产劳动要安排适当，社会活动也不要搞得过多。

要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原有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教师任务过重的单位，应适当增加公办教师的指标和民办教师的数量。要选调优秀的工农兵担任教师。借调作其他工作的教师应调回。要清除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对道德败坏、不宜留校的人，要坚决调出另作处理。

“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城市要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和街道办学。民办公助的学校和民办教师，国家补助应是主要的。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费要相应增加。今后，国家专拨一定数量的经费，以保证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各级计划、财政、教育部门应共同协商，提出分配方案下发，不得挪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困难地区，要特别注意加以帮助。

“学制要缩短”。中小学学制，暂不统一规定，各地可以继续按当地情况进行试验。

九、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是我国普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认

真办好。

十、军队院校的教育革命，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三)

教育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大、中、小学学生占我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用毛泽东思想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当前教育革命的斗、批、改，许多问题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解决。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教育战线的工作。“省、地、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要把教育革命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切实地抓好典型，总结经验，解决教育战线上出现的路线和政策问题。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各条战线，特别是有关部门都要经常关心和支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同志们坚定地相信，不管还要克服多少困难，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一定会完全实现。大家信心百倍，鼓足干劲，决心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 “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人民日报》记者

张春桥、姚文元在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炮制了许多黑货，其中最恶毒的是所谓“两个估计”。“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胡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还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把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反革命“估计”，流毒全国，必须批判。最近，在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对“四人帮”炮制这“两个估计”的阴谋进行了揭发批判，现在将同志们初步揭发的材料加以综合介绍，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继续深入揭发。

否定教育战线成就蓄谋已久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和姚文元伙同林彪，疯狂地向教育战线进攻。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全盘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攻击十七年是“彻头彻尾地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竭力丑化、打击知识分子。一九六九年六月，张春桥、姚文元就在上海组织人马，精心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纲要》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伟

大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使上海市中、小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在原华东师大第六次党代会上，解释“四人帮”一伙所谓“彻头彻尾”的谬论时，说：“我们理解彻头彻尾地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指在我们这条战线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前，自始至终占着统治地位，也就是从头到尾”，“要改变路线，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权”。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炮制的这些反革命黑货，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张春桥对此十分恼火。同年十二月下旬，他在上海市党代会代表学习班上，气势汹汹地质问：“至于十七年，我们哪里占领过？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我们也未占领。什么红线、黑线，无非是想得出‘我是比较好的’的结论，这是为个人辩护，但这种思想代表了相当的势力”，“不要说‘彻头彻尾’，说百分之九十九好不好！”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一九七一年初，张春桥一伙预感到即将召开的教育会议，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和对知识分子如何估计这两个问题，“会引起争论”。于是，他们进行了阴谋策划。据教育部一些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张春桥同他们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进行了一次谈话，为炮制“两个估计”定下了调子。那个余党对张春桥说：十七年的问题，“上海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张春桥说，这条战线“有它的特殊性，与工农业战线不同，还有什么争论的！”张春桥授意那个余党：“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

谈到教师队伍问题时，张春桥恶狠狠地说：“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那个余党给张春桥出谋划策，叫嚷什么：“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要想办法展开讨论一下，对知识分子要在批判、斗争、改造、教改的实践中使用他们。要拿出反面教员来批判，不敢教的先批了再教”；“如何在使用中改造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上海较突出，有的年纪大了，光养着不行，过于重用他们又翘尾巴，不批判放毒，一批判就躺倒”。“四人帮”一伙对知识分子又是要“批判”，又是要“斗争”，又是要“枪毙”，真是杀气腾腾。

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那个余党的上述黑话，带到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成了他们一伙炮制“两个估计”的“指导思想”。

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

就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黑干将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出所谓“两个估计”。

第一个估计，原稿上写道：“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已经是很恶毒的了。张春桥在七月二十日的改稿上，竟又加上了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黑话。张春桥打着回顾教育战线斗争历史的幌子，全盘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早就基本肯定的高教“六十条”，更不顾会议期间周总理关于对高教“六十条”要作分析的指示，授意迟群等人写道：“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这里面的“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他妄图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词句，把人们引到全盘否定十七年的邪路上去。

第二个估计，原稿上是这样写的：“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但是，他们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要经过痛苦的磨炼”。张春桥把“解放以来，特别是”几个字删掉，把“显著的进步”改成“不同程度的进步”，加上了“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经张春桥这样一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前，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显著进步都不见了。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毛主席说，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周总理针对“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打击广大知识分子的阴谋，一再强调：要肯定毛主席的红线是照耀教育阵地的，要肯定广大师生是拥护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能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周总理明确指出：教师、学生大多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个问题要回答，不然拿下去就不能起动员作用。要看到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老共产党员也要改造嘛！“四人帮”无视毛主席、周总理的这些重要指示，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炮制出根本错误的“两个估计”，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的主导地位，一笔抹煞了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学生和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辛勤劳动取得的成绩，严重挫伤了几百万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这是“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滔天罪行，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的卑鄙决定了手段的卑鄙

“四人帮”一伙为篡夺这次教育会议的领导权，挖空了心思。据揭发，迟群公开扬言：科教组不要过去高教部和教育部的人，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这次会议名曰教育会议，但会议领导成员和工作机构中，却没有原高教部和教育部的一个人。会议领导小组十二名成员中，“四人帮”的余党、亲信、黑干将几乎占了一半。出席会议的六百三十一代表，文化大革命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只是沾过教育工作的边的，仅占三分之一，其中担任过省一级厅（局）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的，不过五十来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情况。尽管这样，大多数代表在“四人帮”一伙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中，还是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许多代表认为：在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应该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代表们说：党中央历次文件，包括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教育工作基本上都是肯定的。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春节谈话中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周总理在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包括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教育工作也是肯定的。解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适应的。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乱扣帽子。迟群污蔑这些同志“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质问这些同志“到底是哪条路线上的人”，狂叫“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清华大学一位老同志，对高教“六十条”产生的背景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竟被他们指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会上，一些军宣队的同志提出，十七年各条战线都是红线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也不能例外。

迟群听了，气急败坏地说：“他们懂什么？这些意见是那些穿灰衣服的人（指原有的教育工作者）让他们讲的”。迟群一伙对不合自己口味的意见，即使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发表的，也是不听的。一次，一位负责同志提出，把普通大学同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学校写在一起，会造成普通大学的概念不清楚。这位负责同志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受到“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一个亲信的攻击，给扣上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帽子。迟群指桑骂槐地攻击了这位负责同志，并当众表扬了那个亲信。

会议筹备期间，“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或者亲自出马，或者唆使亲信，到处搜集污蔑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材料。会议开始以后，他们借口“大批判开路”，把这些材料抛出来，打棍子，扣帽子，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摆出一副“传经”的架势，嚣张地说：“我们的稿子都是经市委（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点了头的，不能随便改，上海发言，少而精，放一炮就要打响”。这个余党秉承张、姚的旨意，第一个抛出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的黑货。“四人帮”还以“联系实际”为名，鼓吹解剖所谓“封、资、修大染缸”的学校，把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同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混为一谈，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有的省因为找不出“四人帮”一伙所需要的所谓由“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学校领导权”的那种“典型”，会议“简报”就不反映他们讨论的情况。会议期间，“四人帮”安插亲信和打手，收集情报，秘密串连，大搞特务活动。“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几乎每天晚上把他们指派的几个所谓联络员纠集起来，分析有关省、市、自治区的动态，经常向王洪文汇报，听取“指示”。王洪文还亲自到会议驻地探望，为他们的余党出谋划策，撑腰打气。在“四人帮”一伙的把持下，这次会议造成一个对十七年、对知识分子只许说坏话，不许说一句公道话的局面。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完全背叛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败坏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这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同志们说，十七年的教育，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教育工作中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在某些地区或单位确实存在，甚至还比较严重。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刘少奇的每一次干扰、破坏，都为毛主席、党中央所察觉，及时发出指示，给以清算和纠正；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生员工，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前进的，红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就，其罪恶目的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流毒全国 必须批判

一九七一年的教育会议结束后，斗争继续进行。据揭发，“四人帮”的死党、余党回去以后，严密封锁、拒不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要指示，而争相吹捧他们的主子。在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肉麻地说：会议文件修改十几次都没有定稿，是张春桥、文元亲自动手加工，才定下来的。他们到处宣扬，哪些段落是张春桥加上去的，哪些文字是姚文元修改的。相反，他们对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两次重要讲话，只字不提。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的广大教师才知道周总理在这次会议上有过重要讲话。在辽宁，“四人帮”的那个死党及其亲信，也无耻地吹捧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在他们的聒噪声中，“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成为镇压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两根大棒。“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动不动就抡起这两根

大棒

大棒吓唬人，叫嚷什么：教育仍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教育”。他把教育战线上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出现的问题，一古脑儿安在广大教师头上，污蔑这是“教师坚持资产阶级偏见和消极怠工造成的”，千方百计地要把抵制和反对他们的教师置于死地而后快。他狂热地炮制黑经验，树立黑典型，把教育革命完全纳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轨道。臭名昭著的以“同十七年对着干”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朝农经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就是他卖命推行“四人帮”所谓“两个估计”的产物。这些年来，“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破坏，造成了教育严重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状况，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教育战线成了受“四人帮”破坏最厉害的“重灾区”。

同志们指出，深揭猛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第三个战役已经开始了。各条战线都在开足马力快上，挽起袖子大干。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教育战线必须彻底查清“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这个政治大阴谋，把教育战线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纠正过来。对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一伙炮制的“两个估计”，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原载 1977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报》)

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相继隆重地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继续完成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保证。这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对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新党委的建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各级党委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率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整党建党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指引我们不断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经过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更加朝气蓬勃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最初几个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这时，党组织的整顿问题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按照什么标准整顿和建设我们的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全党坚持这个方向，不断肃清黑《修养》、黑“六论”的修正主义余毒，同各种降低党的水平、模糊党的性质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毛主席把整党列为整个斗、批、改伟大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毛主席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规律，从理论上武装了广大党员，更加自觉地运用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正确地进行吐故纳新的工作。

毛主席还指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各地党组织遵照毛主席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坚持群众路线，实行开门整党，把每一个支部的整顿和建设，每一个党员的教育和审查，都置于广大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之下。这种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的方法，保证了党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的质量，更加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各地认真学习新党章，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九届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谈到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基层同志时，毛主席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毛主席在胜利的形势下再一次给全党敲了警钟：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指示。全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开展批修整风，学习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骄破满，把某些作风不正之处转入正规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带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加强调查研究，收到很大的成效。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正在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主席这一系列指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回顾整党建党运动的发展，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党内矛盾的辩证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才能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进一步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革命党。

这次整党运动，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一小撮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被清除出党。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参加了党的行列。各级党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既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有中年和青年一代的优秀党员，还有来自工农和基层干部中的新生力量。我们的党提高了质量，扩大了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富有战斗力。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党，建立了新党委，党内就没有矛盾，就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情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长期存在的。我们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当作一项长期任务，经常抓、反复抓、认真抓好，使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更好地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各级新党委建立了，要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新党章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是毛主席多次强调的党的重大组织原则问题。每个党员、每个部门都要增强党的观念，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能搞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党委要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整顿建团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组织的整顿和领导。各地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要按照新党章对基层党组织的五项要求，继续抓好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新党委成立后，一个首要的问题，仍然是用什么思想作指导，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划清真假马列主义的界限，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自己要“一分为二”，敢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要发扬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执行和研究党的政策，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各级党委要搞“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要继续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加强党的团结。主要领导干部要有无产阶级的宽阔胸怀，“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要发挥革命老干部的骨干作用，热情培养新生力量，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允许他们改正错误，鼓励他们将功补过。一切新老干部，都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当前，国内外的形势越来越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团体，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党将在本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①，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②，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③。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

①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

② 指林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③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¹，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²，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³！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⁴，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⁵，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

¹ 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

²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

³ 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会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⁴ 即毛主席《我们一点意见》一文。

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要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

1.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逃出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林彪陈伯达分裂我党、我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立即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年来，经过在党内传达、揭露、批判陈伯达，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开始的华北会议、毛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华北会议的两次批示和北京军区的改组，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批示，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关于反对骄傲自满的批示，二月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批示，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全党的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收到显著效果。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被大量揭露。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空前加强，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美帝、苏修内外交困，十分孤立。在这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林彪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完全破产。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象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是多么孤立。这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四

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证明，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陈独秀从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堕落为托派，王明从坚持错误路线而堕落为汉奸卖国贼。林彪也是如此。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教育。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的主张。“九大”前夕，他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且也为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几十年来，直到这次叛变投敌以前，毛主席总是对他耐心教育，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口是心非，耍两面派，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解放军，自绝于中国人民。

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注：本件第一步应先印送和传达到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如无常委即传达给各单位领导机构正副职人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党、政机关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中一道听取传达和讨论。如有其中有不适宜听传达和讨论的，可由各单位领导机构决定除外，并报中央备案。

〔附〕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

在记者的案头，有几幅记录着林彪一伙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照片。

一架摔得残骸遍地的三叉戟飞机，尾部留着“256”机号，这是林彪座机的标号。飞机残骸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裸露的尸体：

一具脸孔瘦削的男尸，脑袋光秃，左腿摔断，他是林彪。

一具女尸，左臂摔断，她是林彪的老婆叶群。

另一具男尸，腰系手枪。据当年我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报告，他们曾在这具尸体附近发现印有林立果姓名、年龄的工作证。经过鉴定，他就是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

林彪一伙谋害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之后，仓惶叛国出逃，折戟沉沙，暴尸于异国荒野，实在是历史的绝妙安排。

(一)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曾经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及其一伙是怎样策划阴谋，又是怎样以自取灭亡告终的，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人。

追溯一些往事，我们就会发现林彪一伙为发动反革命政变，早已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还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叶群就勾结江青，采用极为卑劣的手段，第一个捏造材料诬陷、迫害当时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林彪、叶群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吴、李、邱当即向林彪表“忠心”。一九六八年黄永胜来北京后，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吴、李、邱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还勾结陈伯达作为他的“军师”。他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伙，多方串连，网罗一批死党，为他篡权服务。

——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林彪、叶群就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从中研究搞反革命政变的伎俩。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令，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宣称：“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在林彪的指使下，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到处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宣扬什么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光辉的助手”。黄、吴、李、邱还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篡夺最高权力、建立法西斯王朝大造舆论。

林彪及其死党，就是这样在十年动乱的最初几年里，表面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而背地里却在千方百计地阴谋夺权。这一切，当时善良的人们是想都不会想到的。

一九七〇年八月下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认为夺权时机已经成熟，就亲自出马，带领他的死党，向全会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不顾毛主席早就多次提出，并得到党中央同意的关于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和要求，利用他们的地位，抛开会议原定的议程，抢先发难。八月二十三日全会开幕，林彪第一个抢着在会上讲话，别有用心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八月二十四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统一的口径，同时在几个小组会议上发起“攻势”。当时的情况，就象毛主席形容的那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的这场“攻势”，是反革命夺权性质的严重事态，其目的就是要为林彪抢夺国家主席的职位。林彪的这一阴谋，在庐山会议前的一九七〇年七月叶群和吴法宪密谈中就讲得明明白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党中央很快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八月二十五日毛主席为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陈伯达在全会上散布的一些谬论，并找林彪谈话。周恩来同志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出检查。会议前一段留守北京的黄永胜刚上山不久，见势不妙，赶忙销毁了他早已按林彪的旨意准备好上庐山“开炮”的讲话稿。

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的这场反革命抢班夺权丑剧，只有两天半的寿命，就此告终。

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脸色苍白的林彪，在山间别墅里成天耷拉着光禿的脑袋。疯狂一时的叶群哭丧着脸，一筹莫展。林立果气急败坏地骂着：“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但是，林彪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在山上就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九月七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庐山。黄、吴、李、邱一起下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行，并由叶群导演，把林彪拥坐中间，在飞机上合影。既是留念，又是言志。林立果亲自开着汽车，在去庐山仙人洞的路上对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和七三五〇部队政委陈励耘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二)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来到苏州的一所别墅，开始秘密策划血腥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林立果一九六七年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第二年，吴法宪自己作介绍人把林立果发展入党。第三年，即一九六九年，二十五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宣布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空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敢怒不敢言，但背地却流传一首打油诗以表示心中的愤怒。打油诗说：“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又加了一句：“五年见阎王”。林立果青云直上，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便在空军里纠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为“调研小组”。后来他们观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所谓“联合舰队”就由此得名。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烟雾腾腾。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在这里同“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和李伟信（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密谋制订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

当时林立果分析形势时说：“现在首长（指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住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并向他们说：“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还对于新野说：“这件事我和首长已谈过，就由你先写。”

经过一阵密谋，他们又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问题。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两天后，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认为“B—52……对我们不放心”，提出

“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纪要》强调“不管准备和没准备，也要破釜沉舟”把毛主席杀害。确定的谋杀手段是：“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纪要》阴谋“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纪要》还要求发扬法西斯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象蒋介石的反革命训词那样，“不成功便成仁”。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原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〇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江腾蛟几年前因为反军乱军被解除职务，现在林彪却给了他以特殊的恩宠。在林立果召开这次密会前夕，他以去上海治病为名，戴上大口罩，乘坐吴法宪给他派的一架专机离京。一到上海机场，就被秘密送进了上海新华路的一幢楼房里。

这次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在会上说：“现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次会议确定了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江腾蛟被封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宣告成立，这伙法西斯分子就走进餐厅，碰杯祝酒。林立果得意忘形地说：“我们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三国四方’会议。”江腾蛟说：“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语音未落，发出一阵歇斯底的狂笑。

从此，林彪一伙为准备反革命政变而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步步加紧：

在上海，林立果指使王维国秘密组织名为“教导队”，实际上是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敢死队”，他们整天在新华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广州，林立果指使广州民航局政委米家农组织“战斗小分队”，多次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且制定了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使用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向。

以北京为基点的秘密通信网也组织起来。为了建立秘密通信网，林彪一伙盗窃了大量通信装备器材，私调了几十对专线。

在北戴河，他们秘密修建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九月初，林彪一伙派出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原民航总局政委）、王维国、陈励耘等十多名死党，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阴谋活动。

林彪一伙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部署。乌云滚滚，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就要开始了。

（三）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乘坐的专车从北京开出，跨过黄河、长江，向祖国

南方驶去。

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到达武汉，停留了十天。他在这里先后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据当时在毛主席身边的同志介绍，毛主席着重谈了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毛主席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毛主席还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毛主席还特别交待，他的谈话内容，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毛主席在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长沙的时候，毛主席当着大家的面，直截了当地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丁、刘二人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九月三日，毛主席从南昌到了杭州。一些曾经多次接待过他的工作人员，纷纷前来看望，向他谈了一些情况。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在杭州同当地的负责人谈话的情况，同在其他地方的情况迥然不同。他特别讨嫌那个鬼鬼祟祟的陈励耘。毛主席面对面地查问了陈励耘的经历，并问：“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狼狈不堪，答非所问。

杭州的景色依然那般秀丽动人，可毛主席却在这里闯进了“虎穴”！林彪的死党、“三国四方会议”上确定镇守一方的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着“警卫”毛主席住所的工作。

这时，林彪一伙正在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南巡路线，窃取他在各地的谈话内容，以便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选择时机。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深夜，一条电话线在传递着两个死党的通话。北京的于新野正在向广州的顾同舟（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探听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并随即密报叶群、林立果。顾同舟还把毛主席的谈话整理成一份记录稿，让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乘飞机到北京，交给“联合舰队”。

九月六日凌晨六时许，武汉东湖宾馆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那是从北京专程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正在听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密报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完后，急得团团转。当天他一返回北京，就把刘丰密报的内容告知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拿起保密电话机，又将这一情报立即传给了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黄永胜和顾同舟的密报后，心慌意乱，深夜策划，下决心乘毛主席还在各地巡视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这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毛主席正在杭州。

接着来的六天是惊心动魄的六天，一天比一天紧张。

九月七日，林彪指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电话机与黄永胜通话，随后，黄又同李作鹏通了话。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写下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与此同时，叶群也密封了一个亲启件给黄永胜。

当晚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件，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星夜

飞回北京，并让王飞将密件亲自送给黄永胜。十一时三十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北京西郊机场他们的秘密据点，同江腾蛟、李伟信一伙死党，筹划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林立果在向这些同伙传达林彪手令的时候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接着，林立果向江腾蛟命令道：“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周宇驰插言道：“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

江腾蛟当场表示：“坚决干！”

林立果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指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周宇驰随声附和着。

“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林立果问江腾蛟。

“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江腾蛟回答。

周宇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九月八日这一天，黄永胜、吴法宪多次同叶群通过电话密切联系。

九月九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来到空军学院，向“联合舰队”成员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接着他拿出林彪的手令给他们传阅，并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

这天下午，林立果等一伙法西斯分子在西郊机场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江腾蛟在会上提出，如果毛主席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周宇驰问江腾蛟。

“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江腾蛟回答着。

接着，他又献策：“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他部队。”

“现在来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吧。”周宇驰说。

江腾蛟提出：“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九月九日这一天，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过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高级接触”。半夜，当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通话时，还发生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同叶群通话的事，大大为难了电话总机的值班同志。黄永胜拿起电话同叶群一谈就是九十分钟，吴法宪等得不耐烦，几次催促。吴法宪同叶群通完电话后，即向死党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下命令：“叶主任（指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月十日，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

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机场资料，为他们以后叛国外逃作准备。

同一天，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由林立果、周宇驰交给王飞，要王飞伺机送给黄永胜。那封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所谓“有事”者，亦即他们搞武装政变发难之时，或危急之际也。

九月十日这天，叶群、黄永胜之间继续通过保密电话密谈，共达五次之多，其中通话最长的一次竟达一百三十五分钟。

从九月六日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里，林彪、叶群指挥林立果一伙在“联合舰队”的魔窟里，就是这样密谋策划着一场罪恶的武装政变的实施计划。

这五天里，毛主席仍在杭州的住所。九月八日午夜，大家刚吃完夜餐，毛主席突然叫过身边的同志，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车趁夜转移。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主席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且交代，不要陈励耘等送行。这一切是那么突如其来，使得陈励耘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三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这时在北京的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

“摊牌”的时刻快要到了。林立果一伙按照“常规”推算，估计毛主席总得在上海停几天。但是，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了。

九月十日晚，毛主席到上海后，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他要身边的同志往南京打电话，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十一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有人就领着他乘汽车直驶毛主席的专列。”

由林彪一伙安排在上海动手杀害毛主席的王维国，这时没有被允许上车。他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中午，毛主席叫许世友同志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王维国也被一同拉走了。

九月十一日下午，毛主席的专车在江南原野上奔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林立果一伙正进一步密谋策划杀害毛主席的具体措施。林立果说：“首长”的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指在上海地区谋害毛主席），接着搞北京。他问关光烈（驻河南某部政委），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嘴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

林立果以命令的口气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他（指江腾蛟）的指挥。”

“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火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关光烈回答。

“用飞机送，就说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林立果说。“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苏州附近的）硕放炸火车。”江腾蛟还提出，这个“任务”交给空军××师，由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去执行。

当晚八时，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鲁珉继续在西郊机场策划。“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指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林立果杀气腾腾地说着。

江腾蛟在一旁打气说：“我是歼七，老鲁是歼八”。

周宇驰补充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话音未落，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密报毛主席“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了上海。”

这时已是九月十一日晚上十点多钟。毛主席的专车早已驶过苏州车站，安然地跨过硕放铁桥。

“主席，前面是蚌埠，停不停？”毛主席身边的同志问。

“不停。”

“济南快到了，停不停？”

“不停。”

“快到天津了，停不停？”

“不停。”

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北京。快到丰台了，毛主席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并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专列最后驶进北京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黄昏。

(四)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象一声炸雷，把林彪一伙从武装政变的迷梦中震醒过来。连续六个昼夜苦心策划的阴谋顿时化为泡影。这帮家伙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林立果嚎啕大哭：“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在北戴河莲花石九十六号别墅里，林彪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不吭一声，叶群如丧考妣的哭声传入窗外服务人员的耳际。

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大势已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林彪、叶群决定带着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东山再起”。

九月十二日上午，林立果在北京同北戴河通了电话，接受了林彪安排的南逃新任务。下午，他就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召集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具体策划南逃方案。此时，林立果急于要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同林彪、叶群会面。他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对同伙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同你们谈谈。”室内空气顿时就象凝固起来了。

周宇驰压低嗓门向同伙们传达了林彪的南逃计划。“情况紧张，（毛主席）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明天到广州谈话……。”

“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

“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会议结束后，这伙亡命之徒立即按照这一方案分头行动：

王飞回到空军大院的一间密室，同党羽具体拟定跟随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南逃的人员名单，并确定组成几个小组保护黄、吴、李、邱安全登机南逃。密谋还在进行；他们

就从仓库取来三十支五九式手枪和二千发子弹，还有两支冲锋枪、二百发冲锋枪子弹。

周宇驰同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八架飞机，并在下午派256号三叉戟专机送林立果回山海关机场，把这架飞机留在那里供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晚上，周宇驰又召集死党们开会，宣布：“明天（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黄、吴、李、邱明天早上七点到八点起飞，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一小撮准备跟随林彪南逃的死党，手忙脚乱地捆装着他们窃取的党和国家的大量机密文件以及胶卷、录音带和外币。

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登上林彪的专机。当晚八时许，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林立果等不及北戴河派车来接，便自己开着机场的一辆吉普车，直奔北戴河林彪住地。

莲花石九十六号别墅，表面上似乎一切依旧，大厅里还在放映电影。但是在紧闭的房间里，气氛却很紧张：那是林彪和叶群在低声密谈些什么，后来又加进了林立果；那是叶群在收拾文件，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一旁，两眼通红。

晚上十时许，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得悉：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飞机叛逃，时间在明天（十三日）早上六点，目的地是广州……，可能要叛国，黄、吴、李、邱同他们是一伙，预定明天早上从北京同时起飞。

警卫部队立即报告北京。

这时，首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上十时三十分，总理的秘书走近他身旁，悄声说：中央警卫局来电话，说有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总理拿起电话机，听对方报告着。他浓眉紧蹙，当即向对方说：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随后，总理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同去的有哪些人？”接着又告诉吴法宪：“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接了电话之后，即按照胡萍编造的一个假情况，向总理报告，说什么那是一架刚改装好的三叉戟飞机进行夜航试飞，到山海关机场后，发动机出了故障，飞机不能回来。

总理立刻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胡萍一面采取说谎的办法拒绝执行总理的命令，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立刻给北戴河去电话，告诉林立果早打主意，并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打电话，统一关于飞机“出故障”的口径。

林彪、叶群得知总理在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顿时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叶群在晚上十一点二十二分故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林副主席想动一动。”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总理问。

“空中动。”叶群答。

“你那里是否有飞机？”

“没有。”

事实上，林彪的256号专机当时正停在山海关机场，而且几天以前他们还调去了一架伊尔-14，为什么叶群还要撒谎说没有飞机？这就一下子露出了马脚。

山海关机场当时归海军管理，总理立刻打电话给李作鹏：“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

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但是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却将总理的指示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这天晚上，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情况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总理进进出出不知多少次，福建厅的会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

(五)

南逃阴谋已经败露。林彪、叶群、林立果更加显得六神无主。他们现在什么都输光了，预感到末日将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保健员、公务员都打发去看电影，关上客厅的门，进行最后一次密谋。

九月十二日深夜十一点多钟，林彪决定改南逃为北叛，立即飞苏联伊尔库茨克，投敌叛国。

匆忙中，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周宇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十一点四十分，在别墅里值勤的警卫战士用电话向警卫大队队部报告：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警卫部队的干部，一齐从大队部跑了出来。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高级防弹红旗轿车，打开前灯，高速驶来。里面除林彪外，还坐着叶群、林立果等。汽车驶近大队部门口，警卫战士们示意要车停下。叶群在车上大嚷：“警卫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冲！”车子急速地闯了过去。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分别坐上轿车、吉普车尾随追去。

林彪一伙乘坐的轿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穿过海边大桥，很快就超越了在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两卡车警卫部队，往山海关机场逃窜。车子一直开到三叉戟飞机前，未等停稳，林彪一伙就仓惶跳下来。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他们不等架上客机梯子，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一个紧跟着一个往上爬。林彪的秃脑袋几乎顶着叶群的高跟鞋。他们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上飞机，也没等关上机舱门，就要飞机急速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在机场奉命关闭了夜航灯和没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一片漆黑中于九月十三日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十三日零点二十分，当林彪的专机准备强行起飞时，机场负责人三次打电话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不下令采取阻止起飞的紧急措施。

“林彪坐飞机跑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向北京报告。那是十三日零点三十二分。

“林彪的飞机向北飞去！”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报告总理。

周总理发出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雷达，密切跟踪着林彪的飞机。随时向总理报告飞机的方位和飞行角度。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总理说。

“能听到。”调度人员回答。

“我要对潘景寅（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总理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那就请你向 256 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
“他不回答。”调度人员报告总理。

飞机来了一个狡猾的动作，改变方向，往西飞往内蒙古西部。但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往北直飞。

“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萤光屏上消失了。”调度人员报告。这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

林彪叛国投敌了！周总理把电话机一摔，立即驱车前往中南海毛主席住所报告。毛主席气愤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凌晨三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向总理报告：“雷达搜索，发现一架直升飞机起飞了！”这一突然发生的新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出逃命令，就通知江腾蛟、王飞、鲁珉等一伙赶紧撕毁南逃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他自己伙同于新野、李伟信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借口，窜到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了一架“直—5”直升飞机，携带林彪一伙盗窃的大量机密文件和美钞向北飞去。周宇驰用枪口对着驾驶员陈修文，强迫他直飞乌兰巴托。陈修文发现他们要叛国出逃时，沉着机智地骗过了敌人，把飞机又飞回到北京郊区的上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降落。陈修文同志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周宇驰感到末日来临，开枪杀害了陈修文。

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当地军民，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爬出机舱，不辨东西地狼狈奔逃。解放军驻京部队和民兵、社员，把他们逼进了一块庄稼地里。周宇驰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他对两个魂不附体的同伙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的话，我们都自己死。”后来三人商定由周宇驰喊口号，一起开枪自杀。于是这三个反革命分子就地躺倒，只听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着：“一、二、三！”砰、砰，两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自毙；李伟信向空中放了一枪，最后被当地军民擒获。

东方开始微露晨曦，大会堂东大厅内的灯光似乎也显出倦意。可是，周总理却还在不知疲倦地操劳着。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值班的服务员和秘书劝总理暂时休息一下，总理严肃地说：“现在怎么能休息呢？”

十三日这一天，从一早开始，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总理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一一打了电话，向大家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

一切都已安排停当。周总理已经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这时已是九月十四日的中午。总理躺了下来，好久才入睡。下午二时，电话铃声又响了。“我是外交部。我们刚接到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要立刻送给总理。”当外交部把电报送来时，秘书踌躇了：“好不容易让总理休息下来，怎能忍心把他叫醒。不叫醒吧，又可能耽误大事。”他在总理卧室前徘徊着，最后还是轻轻地走到总理床边，叫醒了总理。总理听说是我驻蒙古使馆发来了电报，连忙起来，叫秘书赶快念给他听。当总理听到林彪所乘的 256 号三叉戟飞机十三日凌晨二点三十分在蒙古

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总理接过电报，就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我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赶到林彪飞机坠毁的现场观察，只见飞机摔得粉碎，遍地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飞机残骸的四周。一大片野草被烧焦。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的尸体，被抛在离飞机残骸十多米处，横七竖八地倒在茫茫荒野上。叶群的一只高跟鞋，以及林彪一伙携带的六支五九式手枪、一支冲锋枪，也都在飞机残骸附近。

林彪、叶群摔死后，黄、吴、李、邱惶惶然如坐针毡，翻箱倒柜，销毁了他们同林彪、叶群等的来往信件、笔记本、电话记录、照片等罪证。黄永胜因烧材料数量很大，竟把一个大陶瓷缸烧裂了。他们既不揭发林彪、叶群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中央鉴于他们毫无悔改之意，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要他们交代问题。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他们的罪行长期没有得到清算。今天，他们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新华社记者 刘回年 赵崎 徐心华 周慈林 杨金洲

(原载 1980 年 11 月 24 日《人民日报》)

〔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

——视察林彪机毁人亡现场和对外交涉

许文益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 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及其老婆、儿子等九人全部摔死。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遗臭万年的下场。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外电称这是“中国的政治之谜”。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我出任驻蒙大使刚刚二十多天。然而，历史却使我有幸成为林彪机毁人亡的见证人。我遵照国内指示，在使馆同志的协助下，视察了现场，处理了善后事宜，并同蒙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虽已过去 16 个春秋，但它至今仍经常萦绕脑际，犹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现在就让我依次将我所经历的事实记述如下。

蒙古副外长紧急约见

1971 年 8 月 20 日，我乘坐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24 日向蒙古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递交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气氛友好，诸事顺利。

9 月 14 日上午 8 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 8 时 30

分会见大使。我尚未拜会这位副部长，事先也无预约，时间又这么仓促，显然有紧急事情。我稍加思索，即找来使馆的几位负责干部商量，大家都觉得可能发生了意外事件。时间匆匆，我只好抱着先听对方谈、然后相机行事的态度前往，在翻译刘振鲁同志的陪同下，驱车直奔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条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接着便话题一转，他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他紧接着说，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他又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大使知道，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接着他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我国国境。我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我们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我冷静地听着，思索着如何回答。他马上又转缓口气说：我第一次和您正式见面，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遗憾的。希望大使能转告中国政府，并希望你们在最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

额的发言一结束，我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感谢他通知这件事情。我说，“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我以提问的口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接着我明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我说，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上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紧接着我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数天了，但只发现九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至于乘员尸体处理，我们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他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我答：“可以这样理解。”额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的。我祝贺大使同志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相信你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努力，并作出贡献。祝大使和您全家都好。”

在我告辞的时候，额说：“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当机立断启用专线电话

回到使馆已是9点半钟。我立即召集使馆的领导干部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我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儿，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

好，电报不能及时发出，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这样紧急的事，怎能耽搁？大家心如火燎，都瞪着眼睛盯着我。我虽然表面冷静，但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急中生智。这时我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这种专线电话是 50 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我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当机立断。我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办公室的小贾同志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却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我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况报告，要求使用专线电话。经部同意，专线电话终于接通，于当日中午 12 时 20 分报回了飞机失事事件。

后来听说，14 日上午，在外交部的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 12 时尚未结束。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同志。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事情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

14 日中午 12 时左右，正当我们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使馆原决定派孙一先同志带两个助手去现场，我留宿等待国内指示。在蒙方催问时，我又考虑去现场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以前，不能冒昧行动。于是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请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两小时后，蒙方又来电话催询，我们便直言相告，称正在等待国内指示。蒙方也不再催了。

下午 6 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要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视察。我顿感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肩上的责任十分重大。此时蒙古外交部已下班，我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额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 8 时半，地点仍在他的办公室。我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 日凌晨 2 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同我们去现场视察，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听完后要我澄清：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认为是“正式答复”。我回答可以这样认为。他又追问是否是“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我警觉起来。我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我理解不是最后答复。他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我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我无法答复，并反问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使馆。他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

额对使馆未能及时派人赴现场有点抱怨。称飞机失事已有 50 多个小时，等你们赶赴现

场大概要 60 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你们不会就此提出更多的问题。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他说，现在大使亲自前往现场，更有全权解决尸体掩埋的问题了。我问他，蒙方有无可能将尸体火化，让我们把骨灰带回去？他表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他要我们等候飞机起飞消息，作好明天赴现场的准备。

我回到使馆后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示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送回国。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

机毁人亡的现场惨象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使馆，飞机半小时后起飞去温都尔汗。我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早已准备停当，等待出发。我随身带一手提箱，除装有盥洗用具外，还有一架照相机和一个收音机，临上车离馆前，吕子波参赛把一件夹大衣塞到我手里。蒙古大草原的秋天，昼夜夜凉，这件夹大衣后来使我免受了冷冻之苦。我们急奔机场，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吉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一些航空、法律、法医等方面的专家和新闻摄影记者，已经等候在一架伊尔14飞机旁。我们的飞机2时45分起飞，航程300公里，一小时后即抵达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的一个简易机场。肯特省一位副省长和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寒暄几句后，大家匆匆忙忙改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向目的地进发。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方抵达现场。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的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部半。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我环顾了一下现场，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我们在蒙方人员的陪同下，由北向南进行察看。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糟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我们把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

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掉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躯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我们对现场的初步看法是：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2.飞机是由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时失去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但不知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景使我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我告诫自己处理善后事宜需谨慎小心，多加斟酌。

按蒙古习俗埋葬遗体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我表示同意。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我穿着夹大衣还感到有些凉意。看到挖墓穴的战士都穿着单衣，十分辛苦，我便让孙一先同志拿来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以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我们都下榻在克鲁伦旅馆，洗完脸便到楼下餐厅用饭。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友好合作，我们拿来几瓶汾酒和一些罐头，双方人员边吃边谈，气氛相当活跃。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晚饭后再商量。我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时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双方又商量第二天的安葬事宜。我提出三项建议：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上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我们，我们写个收条。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散席时已是子夜时分，我们正准备就寝，蒙方要求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文件包括现场调查纪要、尸体检查情况纪要和死者安葬纪要三部分内容。谈判直至凌晨3时（谈判部分见后面）。

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我嘱咐大家要利用光照好的有利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多拍一些照片，作为物证，并拼制一张现场图，送国内研究鉴定。

上午10时，我们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再次到达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我们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对我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因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我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放入墓穴后，我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谈是在大轿车上举行的。主要是谈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我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埋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同志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放在坟顶，蒙方接受了。一切安排妥当后，我和孙、沈、王四人还在幕前三鞠躬，以示哀悼。后来每想起此事，便觉得当时的举动十分可笑。但当时我们身居异国，不知真相，也只能如此。相信人们也不会指责我吧。

“军”、“民”之争的紧张谈判

前面已经提到，在视察现场后，蒙古方面便提出要签署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双方连夜进行谈判，商定了文件的范围，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在安葬遗体时，双方就《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简称《安葬纪要》）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安葬遗体后，我们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我们都感到精疲力竭，真想好好睡一觉。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简称《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我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二同志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这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我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讨论纪要时态度就比较僵硬。他们虽然不再称我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成是“为军事目的服务”，抓住“军事”二字不放，想在政治上置我于被动不利地位。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精神，坚持是我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争取谈成。实在谈不成，就回乌兰巴托再谈。拿定主意后，我的思想便松弛下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文件翻译出来已是17日凌晨一时，我们立即研究讨论，准备了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我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条件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合作，表示谢意。接着我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10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以下三点：

1. 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2. 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

国民航”字样的机翼，提议加上在飞机头部东面 20 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物后，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 256 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方提交的《安葬纪要》，我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 256 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上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我发言后，蒙方建议休会 10 分钟。10 分钟过后，蒙方人员迟迟不来复会。在等待时，我收到外电报道，称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我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可能与这架失事飞机有关，这更使我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这时沈庆沂同志发现，蒙方人员到邮电局去了，可能是向其上级请示。我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在这里，要赶快回使馆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情况，听取国内指示。我让孙一先同志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 22 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上午 10 时 15 分复会。桑加上校答复我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是逐条驳回。对第一点，他说，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民航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对第二点，他认为，“如果把在飞机头部东面 20 余米处有‘民航’二字的机翼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对第三点，他说：“因为死者外穿军装，所以他们是军事人员这一段还应保留下来”。高陶布司长看到局面有点僵，便出来缓和气氛说：“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大使的工作很忙。大使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思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我表示这个问题商谈了两三次，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相信，通过实事求是的、相互谅解的友好协商，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接着我又着重讲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于 9 月 14 日晚 8 时半，根据政府指示，就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原因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他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这一点应在纪要中写上。第二，失事飞机很明显写着“中国民航 256 号”字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们提出这一点应当写进纪要。

下午 3 时 20 分，双方继续进行会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不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安葬纪要》。高陶布首先说，关于大使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接上级通知，希望尽快把《安葬纪要》完成，我们便一起回去。我表示同意，并说服对方要正视现实，把失事的中国民航 256 号飞机具体讲清楚。至于飞机上的人员，我们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把这两种人都写进去。桑加接着发言，表示可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 1-E 飞机”，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256 号三叉戟 1-E 飞机”。但仍坚持机上人员是军事人员。我随即表示，这一修改同我们的主张接近了一步，但仍希望写明是中国民航飞机，飞机上既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我解释说，那个女的就不是军事人员，现场有她的一双白皮鞋。高陶布争辩说，虽然机翼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但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民航飞机。失事人员带的证件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至于那双白皮鞋，也没有穿在那个妇女的脚上，不一定是属于她的。我说，256 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正象有的国家民航由军人管理一样，不能因此就说不是民航。这个问题大的方面都已解决，何必在

次要问题上争执。孙一先插话说，我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的。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假如蒙古的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他国便以此来否认这是蒙古的民航飞机，你们能同意吗？我接着说，况且现场的那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说明他不是现役军人。高陶布又打断我的话说，他的皮夹克里面有军服，腰带也是军人腰带。我解释说，我国青年人喜欢穿军装，扎军人腰带，不能以此作为军人的证据。桑加有点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我说，如果你们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桑加便以现场有手枪为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我对此进行了反驳，并表示我们不怕承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要尊重事实。双方唇枪舌剑有些紧张。高陶布又宣布休会五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稿子还可以修改。桑加接着宣读他们修改后的《安葬纪要》序言：“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Ⅰ—E型喷气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我认为把“军事人员”改为“公民”有进步，但仍称是军人驾机，未写上“中国民航”这四个关键的字，感到这样争论下去解决不了问题，遂提议回乌兰巴托再谈。高陶布看到难以说服我们签字，便亮出了他们的底牌。他说，为了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我们单方面在文件上签字。桑加补充说，我们签字时，欢迎中国同志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孙一先回敬说，你们单方面签字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场。为避免把关系弄僵，我建议大家不要着急，回乌兰巴托还要谈，《现场调查纪要》谈通了，《安葬纪要》自然而然可获解决，事情就可圆满结束。高陶布拒绝了我的最后建议，表示他们马上就要单方面签字。我表示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并对此表示遗憾。一场夜以继日的紧张谈判不欢而散。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回馆后，得知国内已多次催问有关情况。我马上通过专线电话向外交部简报了现场情况。外交部决定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我们虽然都已疲惫不堪，但得知国内急待了解飞机失事详情，便振作精神，连夜赶写出飞机失事、现场视察、安葬尸体和会谈情况四个报告，并决定孙一先同志带上有关材料，回国汇报。孙一先9月20日登上中苏国际列车，21日下午3时抵达北京。当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走上去迎接他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张望，寻找接他的亲友。更使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当天深夜至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同他一起吃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

索要遗体与发布消息的交涉

再说我从现场返回乌兰巴托后，一连几天未见蒙方动静。9月22日下午3时半，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紧急约见我，称他奉政府之命，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之前，就失事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空一事，作出正式解释。我回答说，我9月14日已奉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他说，那是不够的。为了不使我们之间发生不适宜的情况，要求你们在9月25日前，用书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对方口气比较强硬，根本不再提继续会谈的事。我感到事情又有变故。

9月23日凌晨，国内指示我立即约见蒙古副外长，奉政府指示表示：第一，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

难者遗物等方面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第二，应死难者家属的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将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方面将现场搜集的死难者遗物交还我方。

当时蒙古副外长都不在，我便紧急约见策伦朝达勒司长，转达了国内指示。策听后说将报告上级。两天后，我又约见策，询问蒙方对我国所提要求的答复。他表示尚未得到政府指示，并说今天已是 25 日，中国政府还未就中国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作出正式解释，对此只能表示遗憾。他还进一步提出，既然遇难人员的身份已经清楚，希望中方将他们的姓名、年龄、职务和照片提供蒙方。他最后说：蒙古政府只有在研究中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后，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予以答复。如果你们拖延答复，会不会产生不适宜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从策的强硬谈话中，我感到事态又有变化，这与飞机失事以来国际上的传闻不无关系。

国庆将临，使馆正在做各种准备工作，我也赶着进行中断了的拜会活动。9月 29 日下午 3 时半，策伦朝达勒又以要事相约。他对中国政府迄未就飞机失事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表示遗憾，并称此事已在蒙古人民中间引起各种传说和议论，所以蒙古政府决定发表一条简短消息，以说明事实真相。我当即指出，对蒙古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作了两次说明。希望在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不要做出与此相违背的事情。策强调不是发表政府声明，只是发表一条一般的消息。

当日下午 5 时，蒙古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题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 9 月 13 日凌晨 1 时 55 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 2 时 25 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在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9月 30 日，蒙古各报纸和外语广播中都报道了这条消息。

蒙古方面在我国国庆前夕发表这条消息，对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显然会产生不利影响。但从各方面分析，蒙古当局似无意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蒙方在国庆前专门举行了庆祝我国国庆的电影酒会，还为我安排了几场主要拜会。蒙方出席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的领导人比上年多，规格也高。我根据国内指示，借蒙古副外长云登出席我招待会之机，就蒙方发表的飞机失事消息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向他表示了遗憾。他只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一事件告诉群众，所以发表了一个一般消息。”他表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到一定时候会给予答复。

国庆前后，中共中央关于林彪仓惶外逃、叛党叛国、机毁人亡的文件逐级下达，公诸群众。所谓的“中国政治之谜”已真相大白。我奉命停止向蒙方交涉，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特殊使命。

飞机失事的原因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外界猜测纷纷，流言四起。有的称飞机是被导弹击落，有的说飞机上发生过搏斗，等等。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据蒙方提供的气象资料称，9月 13 日凌晨 2 时，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上空无风沙，无雾，只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

为 50 公里。这就是说，飞机失事地点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从而可以排除飞机因自然气象而失事的可能性。

使馆在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是这样分析的：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1972 年 5 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什么说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降落呢？首先，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飞机本来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逃窜，而降落方向却是掉头由北向南。降落场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条件较好。其次，飞行员作了野外降落的准备。从机翼残骸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这种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旋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这说明驾驶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 30 米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机上掉下的第一批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再次，机上人员似都做了降落的准备。每具尸体腕上都无表，脚上没有鞋子，这是迫降前为避免冲撞扭伤而作的准备。

飞机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首先是降落的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大。从残骸照片看，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小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驶员完成，但该机因仓惶逃窜，未上副驾驶员。其次，三叉戟飞机是下单翼飞机，这种结构不利于野外降落，它的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在未放起落架着陆时，极易形成机翼、机腹同时着地，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从飞机残骸照片和步测示意图看，左翼尖和中发动机喷口撞在一起，距飞机着陆点仅 160 米，整个机翼也在 180 米处折断。再次，降落地虽是地势较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残骸散布面积约 800 米，宽为 50 米至 200 米，呈狭长梯形。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着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飞机被迫在野外降落的主要原因是燃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根据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在坠毁前，油箱中只剩下 2·5 吨左右的燃料，而其中一部分油还抽不上来，不能使用。这么点油在低空飞行时，最多还能再飞 20 多分钟。加之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断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这也促使他不得不作野外降落。当时，飞机距温都尔汗只有 70 公里，如果飞行员知道飞机的位置，去温都尔汗降落的油是够的。

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首先，地面有飞机滑行痕迹。其次，飞机残骸散布面呈狭长带状。若是空中爆炸，散布面就大多了，碎片可散落在距爆炸地点 10 公里以外。再次，若是空中起火，燃料会很快在空中燃烧撒掉，不会形成地面大面积集中燃烧。

该机也不是被击落的。飞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 40 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

是否象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

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的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九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几具尸体头部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

(原载《世界知识》1988年第1—2期)

(附) 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

伊 白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唐〕杜牧

突如其来约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驻蒙大使馆，人们刚吃过早饭还没有上班，蒙古外交部打来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八时约见许文益大使。外交约见一般提前一天，至少半天，而今天的约见这样急促，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那几年也是少见的。发生了什么事？刚到任不久的许大使，是一位沉着持重的人，外交经验丰富，但遇到这种异乎寻常的约见，也不由得心中嘀咕起来。他急忙找使馆党委委员共同研究，大家都感到来得突然，如果两国间不发生大事，不会有这样紧急的约见，然而，却找不出“大事”的任何迹象。到会同志设想了各种可能，最坏的估计是中蒙边境上发生了什么冲突。八点钟刚过，许大使和随员沈庆沂同志匆匆登车而去。大家抱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我根据自己在蒙工作近六年的经验，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中蒙关系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经历了一个紧张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依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为转移的。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中苏重开边界谈判以后，中蒙关系才略有缓和。一九七一年六月，我国派出了缺席四年半的驻蒙古大使，采取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许大使到了乌兰巴托，蒙方也表示了一些改善关系的愿望。我国外交部和驻蒙使馆也都希望把绷紧的弦松一松，逐步解决两国关系中冻结日久的问题。因而，前几年惯用的“紧急约见”、“强烈抗议”一类外交方式就很少见了。

许大使去蒙古外交部只用了四十多分钟，回来后立即召开了全体外交官会议。在会上，他说明了蒙方紧急约见，是对九月十三日凌晨我国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在蒙古肯特省温都尔汗附近提出抗议，机上九人全部死亡；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提出要派人去看望现场，弄清情况，蒙方表示同意，而且强调越快越好，说天气尚暖怕尸体腐烂。到会同志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蒙古纵深呢？这是一架什么飞机？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即可判断，它既不是一架歼击机也不是一架轰炸机。有的同志分析，可能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漆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工作（当时的外国报刊上，有此类献策之论，认为是掩护自己，挑拨中苏冲突的方式之一）。但是，哪有载这么多成员

的侦察机呢？为什么蒙方要强调是军用飞机？蒙古人想做什么文章？……会议最后决定：（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我带两位翻译同志去察看现场，国内同意后立即动身；（三）关于派人去现场问题，立刻通知蒙古外交部。

上午十点多钟，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大使馆派三人去现场，并说专机已在准备，下午即可动身。但是，这时使馆向国内发的电报还没有发出。使馆没有专设电台，怕发电报要通过蒙古邮电局的国际有线电报，线路时好时坏，加上对方办事效率不高，特急电报也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发到北京。为了争取时间，费尽一番周折，启用了封停两年的一条长途电话专线，把密码电报直接传送到我国外交部。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两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因为我们的电报拖了许久才发出，尚未接到国内指示不能行动，就以去的人没有准备好为由搪塞蒙方。他们催了几次，大约明白我们在等待国内指示，三点钟以后也就不再催问了。

整个使馆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内指示。下午六点多钟，指示电报来了，要许大使立即约见蒙副外长，说明九月十三日凌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迷失航向误入蒙占领空坠毁，向蒙方正式表示遗憾；同时指示许大使，亲自带人去温都尔汗视察现场，所见情况尽快向国内报告，死难者尸体就地火化，骨灰送回国内。

晚八时正，许大使紧急约见了蒙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按国内指示向蒙方表示了遗憾，提出亲自带人去现场视察，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的态度格外温和，答应对许大使视察现场大力协助，连上午的抗议也没有重复一下。

在使馆里，我们紧张地进行视察现场的准备，一直工作到深夜。临睡时，我在院子里散步，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夜是宁静和冷清的，天空布满星斗，虽然还是初秋，但院子里的草已基本枯黄，最低气温降到了五摄氏度左右。我裹紧大衣走着，脑海里仍然思绪翻滚。为什么我国的民航机飞到蒙古来了？是什么样的民航机？它迷航的偏差为什么这样大？死掉的九个人都是什么人？明天见到这些死难者该怎么办？这架飞机会不会是被打下来的？……抱着这么一团捉摸不定的疑问，回到宿舍睡了不到个小时。

第二天（九月十五日）一上班，使馆就打电话问蒙古外交部，什么时候可以动身。蒙外交部起初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地区气象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我们每隔半小时催问一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这套话。其实蒙古的秋天非常晴朗，万里无云，蒙古朋友常常以此自豪地比拟他们的民族性格。“当地不能接受飞机降落”，显然是借口，昨天还催我们动身，今天却一直推脱，蒙古外交部在搞什么名堂？

飞往温都尔汗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午一点多钟，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讲，温都尔汗地区气象转好，专机两点钟起飞。许大使和我、随员沈庆沂、蒙文译员王中远同志，急忙动身去乌兰巴托西南郊民航机场。这个机场离乌市中心十七公里，是五十年代中期扩建的，跑道长约两千五百米，可以起降伊尔18和安12等大型螺旋桨飞机，但不能起降大型喷气式飞机。

一到机场，就明白了蒙方为什么一再推延答复动身时间，原来他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以外交部领事司长高陶布、边防和内务军参谋长图旺扎布上校为首，有外交部的人、边防和内务军事局的人，还有什么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通社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人员，总共三十多人。蒙外交部亚洲司一秘吉尔斯德，向我们一一介绍了在场的主要

人员，随即分乘两架伊尔 14 飞机先后起飞。古尔斯德中国话说得很好，他是五十年代初从中国内蒙古地区移居蒙古的，先在国立大学读书，毕业后进入蒙古外交部。

飞机起飞后即将航向转向正东，目的地是邻接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航程三百多公里。在第一架飞机上，只有我们四人和蒙古外交部的几个人，双方都不讲话，气氛显得沉闷。许大使似陷于沉思，小沈、小王在打瞌睡。我从舷窗向外看去，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乌兰巴托市以南的山区，博格多汗山高踞在图拉河边，它的周围是一道道东西走向的起伏山岭，来自中蒙边界的铁路，从东边山谷中蜿蜒伸向乌市中心车站，然后又穿过市区往北通向蒙苏边界。从地形上看，这片山区是乌兰巴托非常好的天然屏障。山上密密层层的松林，因天气转冷而开始发黑。树都长在山的北坡，南坡只有已经枯黄的绵延不绝的草丛。这是由于博格多汗海拔三千七百多米，挡住了来自北冰洋经过西伯利亚吹来的湿润空气，山北坡宜于树木生长，而乌兰巴托也因之较蒙境内同纬度地区雨雪稍多，气候不那么十分干燥。

飞机很快飞到了乌市东南的那来赫煤矿区上空，我看到矿区东南方向有一外国空军基地，驻有约一个师的歼击轰炸航空兵。大约三千五百米长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组成的矩形机场，成东南——西北走向躺在略微倾斜的草原上，滑行道边静静地停着一排排喷气式歼击机，沿着滑行道的外缘，一串串机窝历历可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场的全貌。我突然想到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中国民航飞机，会不会是这里的歼击机打下来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片幻景：浩瀚的蒙古戈壁草原上空，飞着一架迷失航向的中国民航飞机，几架歼击机追逐着它、迫它着陆，它倔强地挣扎着摆正航向，企图飞回祖国，突然响起一阵机关炮，中国民航飞机带着一团烈火，无望地坠落下去，……啊，我猛然联想到，这不正是蒙古外交部强调是“军用飞机”的原因吗？

这时，我们乘坐的伊尔 14 已越过中央省东部的丘陵和山区，进入肯特省南部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平展展象一个金黄色的瓷盘，一堆堆白色的蒙古包，象是面粉撒在盘子上的疏疏落落的斑点。这么大而平坦不下八十公里宽阔的草原，是我来蒙六年走过不少省分所没有见过的。地面上的草已变得枯黄，更显出草原上的寂寥。我努力寻找着防空导弹一类的军事目标，然而，除了草地上压出的无数条天然公路蜿蜒伸展、蚂蚁般游荡着的畜群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下午三时许，飞机在温都尔汗机场降落。这完全是一个简易机场，跑道是在草原上压出来的，上面似乎铺了一层红粘土压实，加上飞机起降磨擦，显得硬光光的。机场上没有指挥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一处平房旁边一根高高的杆子上，挂着有气无力的风标筒。肯特省的副省长和另外几个人，在飞机旁迎接许大使，双方寒暄几句后，高陶布司长直截了当地对许大使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七十公里，趁天色尚早可以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市休息。正在说话的时候，第二架飞机已经降落。接着，我们换乘两部嘎斯—69 吉普车，分别由高陶布司长和古尔斯德—秘陪同，其他人乘坐一辆大轿车，离开机场绕过温都尔汗市区，往东北方向驶去。

起初，沙土公路沿着克鲁伦河延伸。这条在大小地图上无不标出的克鲁伦河，原来是一条比北京西郊的运河还要窄的小河，有些河段河中块块沙渚把水劈成股股细流，河床才显得宽阔一些。河岸稀稀疏疏点缀着一些低矮柳树和若干灌木丛，它们还没有完全变黄，显得草原上有点生气。同车的古尔斯德似乎看出我对蒙古东部这条名河的失望情绪，告诉我说这条河很长，大大超过乌兰巴托附近的图拉河，夏天涨水很厉害，河床宽度有三、五百米，雨一

过水就落平，有些河段可以徒步。

汽车沿平坦的克鲁伦河岸行驶约一个小时，进入一片丘陵起伏的草原，时而可看到三、四十米高的石头山。难怪蒙古人好吹嘘肯特省的丰饶，这丘陵间的草场又高又壮，有些地方深可没腰。由此联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统帅的部落之所以迅速壮大，不正是这肥美的草原提供了营养吗？我问古尔斯德：“这里离成吉思汗的老家不远了吧？”他说：“是的，就在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肯特县，那里的草场比这一带还要肥美。”

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得很厉害，向东北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道。这里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轮压得枯草吱吱作响。在小道的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往上的慢坡，蒙古司机抬头呶呶嘴巴咕噜了一句，小王同志告诉我：“已经到现场了。”我紧张地注视着右前方，果然，随着汽车往上爬坡，逐渐看到坡顶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边缘上站岗。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它迎着夕照，上面的五星红旗依然艳丽夺目，汽车开到慢坡上面，凄惨的景象一下子全部展现在面前，无庸争辩，这确实是一架失事的中国飞机。

飞机，堆堆残骸

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的象是人工铺成，南北长三千多米，东西宽约八百来。北端是一座二十多米高的小山，南头是几个大约十多米高的土丘，东边是一连串五到十米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慢坡，连着我们来的小路。草长得茂盛，齐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原来地面全是沙土，只是因为草根盘结，人们走过才不致陷足。古尔斯德告诉说：“这块地方牧民叫它苏布拉嘎盆地，属于南边二十公里的伊德尔莫格县管辖，西北约十公里有一个著名的萤石矿——贝尔赫。”

从这块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堆堆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靠近焦土南部，散布着一些白点，陪同人员讲，那是盖着白单子的机上人员尸体。根据飞机炸碎的程序推断，我想尸体大概都已变成了看不出人形的焦骨。

我们从现场的北端看起，蒙方人员簇拥着我们，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图旺扎布参谋长建议许大使先看看飞机擦地着陆的痕迹。我为了躲开蒙方的摄影机，以便能够自由拍照，便和许大使分手，同小王同志沿着烧焦草地的中轴线往前走。飞机的小碎片零零散散，越来越多。我拣到一张英文单页的《注意事项》，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不是普通的民航机，而是一架专机。但由于“文革”期间不在国内，不了解这类专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走了二、三百米，逐渐看到机身的大块碎片，其中一个起落架连根炸断，带着没有烧坏的轮子平躺在那里。还有一块弧形的机身，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连着摔碎的舷窗斜卧在焦土上。有三排座椅烧得只剩下铁架，横七竖八地堆在三个地方。再往南走二百米，就看到了机舱内部的饰物，最突出的是一扇门，从合叶连结处炸下来，没有一点着火的痕迹，门上钉着几个中文塑料刻字“非请莫入”。有一个细漂布被套，半折半展，白白的一点也没有弄脏。有一床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三个英文字母（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的缩写）。离盖着白布单的尸体不远了，许大使和小沈同志及大部分蒙方陪同人员走得较快，古尔斯德正在指着尸体给他讲解。我和小王同志边走边拍照，落到了后面。我们看到了几只散落的鞋子，有两只是磨压底半高腰黄色翻皮

鞋，一只烧得拧成麻花状，另一只完好无损，黑色鞋带还系在上面；有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鞋面镂有带花纹的小孔，式样新颖，做工精细，一看就是舶来品，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就象那白漂布被套一样，连点黑灰也没粘上。

陪同的蒙古人，把我们引到一堆什物跟前，这是收集起来堆放的。有驾驶人员用的三个图囊，一个全烧焦了，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打开看看，图都没有了，只剩下几只黑铅笔和红兰铅笔插在一边。我问地图哪里去了？陪同人员摇摇头不说话。接着看到一堆手枪，有几支枪把儿烧焦，里面露出子弹梭子，大多数完好无损，我数了数总共八支，每支枪身上都有“五九式”字样。小王同志一一把枪号登记下来。还有一只微型冲锋枪，样式很别致，比制式冲锋枪小得多，没有烧过的痕迹。子弹堆在一起，统统是“五九式”手枪子弹，我注意翻找，没有发现任何空弹壳。这时，小王同志拿起一本小册子，红色塑料皮大部分烧焦了，看不出书名，但文字部分只烧了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最末尾是括号里“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内文讲我国空军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了国际水平，其型号和数据……我把这几页可能涉及到国防机密的内容拍照下来，心想这样小册子为什么蒙方没有拿走？蒙方陪同人员从什物堆里拣出一个出入证，是嵌在塑料夹中两张背靠背的临时性出入证，一面是空军大院正门的，一面是空军大院侧门的，没有贴持有人照片，但填写着他的姓名：林立果，男，廿四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按年岁及住空军大院推断，估计是机组的一名成员。我顺手拣起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前面几页有用铅笔写的零零散散一些字，象是随想随记的，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它的意思。

看完这堆什物，我们转向被炸掉的机尾。飞机在天上飞，机尾不过是一小部分，现在却是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那里足有三层楼房高。是从发动机的进气口处炸断的，但只剩下一个发动机与尾部连结，另外两个发动机甩得老远，其中一个粉碎了，一个的进气口环被炸掉，抛在一旁。机尾没有着火，截断处露出一大堆各色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块碎片垂在外面，随风摇曳。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有些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沙里，支撑着斜卧的整个尾身。垂直舵前竖板上，漆着五星红旗，旗的下方有机号：256。

这时，许大使已走到南端的机头位置，小沈同志招手示意我们快些过去。我同小王同志急忙奔向蒙着白单子的死难者尸体。这些尸体散作三堆，陪同人员一一把盖布揭掉，我一眼望去不觉十分惊异，这和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残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尸体。我来不及细看，匆忙照了几张相，就同小王继续朝前走，到机头部位与许大使会合。这时已近下午六时，因属高纬度地区，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辉洒在这片烧焦的草地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的尸体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心中格外凄凉。

机头部位距盆地最南端的土丘六百多米。停在机场上或起飞时那种昂然雄姿完全不见了，只有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件、电线、管道和灰烬。其中倒卧着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框架，看来是镶嵌各种仪表的架子。机头两边不远处各有一个机翼，右边的炸成三段，左边的只是边缘破裂。两个翼上都有周总理题的“中国民航”四个大字。当民航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人们从地面可以仰望到这几个大字，它们是在机翼的下面，为什么现在跑到翼面上了呢？我问蒙方陪同人员，两个机翼是否移动过位置，他们说现场物品除小件收拢起来，大件没有任何搬动。我察看也未发现移动的痕迹。那个左边的完整的机翼翼根处，有一个大洞

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证据吗？翼根厚度五十厘米上下，我登上去仔细察看，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四十多厘米，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进一步探察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上开口的大洞。我从各个角度拍了这个洞的照片，蒙方陪同人员很注意我的举动。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起落架上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边二百来米的草丛中。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逐渐灰暗下来。高陶布司长询问，对死难者尸体怎么处理，强调已搁置三天怕会腐烂，而且个个裸体暴尸令人不忍。许大使根据国内指示，要求对死难者火葬。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习俗，即使勉强举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无火葬条件。双方商量决定，对死难者就地土葬。埋葬地点，我方意见是在失事现场边缘的土包上，以资纪念。蒙方意见，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应选一风水好的地方。高陶布领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划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当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他随即让图旺扎布上校调部队来连夜挖坑。此时已到晚上八点多钟，气温降到二摄氏度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冻得人们发抖。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蒙古士兵，他们还都穿着夏季军装，冻得瑟缩不已。我们送给他们两瓶二锅头，他们见到有这样的好酒，立即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开始干活了。

我们夜深九点多才离开苏布拉嘎盆地，回到温都尔汗已经近夜半了。晚饭后稍事休息，凌晨一时，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天色微明毫无结果，只就第二天——九月十六日的活动达成协议：为死难者举行安葬，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尸体，赤身暴露

九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我们从温都尔汗再次来到苏布拉嘎盆地。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秋气显得更为浓重。

我们首先登上了盆地北端的小山，往南俯瞰整个失事现场。远远望去，那堆烧成灰烬的机头，偏置于现场中轴线的左边，它的后面南北一条直线上，散布着三堆死难者的尸体。机尾被远远地抛到了机头右后方，靠近烧焦草地的边缘。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的一瞬间甩开来的，但是，它们并不处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经昨天的步量，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最近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五十来米，甩得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西北的斜线，与三堆尸体正南正北那条直线，大约成四十度的夹角。在这大夹角的范围内，散布着被炸碎的机身内部的部件及饰物，在这个夹角范围以外，则是机身大块碎片及零零星星的中小碎片和小物品。

我们下了小山向南走约一千五百米，来到盆地中央，察看昨夜许大使要我仔细研究的飞机着陆痕迹。这里没有着火，整齐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地，长约二十九米宽约三米。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S”形的曲线。在这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边十米左右，有一道平行的浅沟，深十至十五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草，继续前行三十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迹象表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掉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擦肚皮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平衡，右翼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擦压草地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

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炸的？这些问题不禁萦绕在脑际。我一面走一面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已来到死难者尸体跟前。

这些死难者，除两个剩有上衣外，其余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仰卧暴露令人不忍卒睹。他们裸露的躯体都已僵硬，面孔一般都烧黑焦，皮肤暗红肿胀，象是爆炒过度的大虾，亮晶晶的宛如蜡人一般。由于不知他们姓氏名谁，我们由北向南把这些尸体编为一至九号，以便区别。我们仔细地察看了每具尸体，并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

第一堆三具尸体，他们之间相距二至三米。一号尸体仰卧，圆脸，面部扁平，缺乏棱角，面皮烧黑，两眼紧闭；上身的布军装只烧掉下边衣角，第一、二个扣子扣着，下面敞开，右衣襟压在身下；侧翻后从衣襟口袋里，掏出一本《语录》，其中夹着几张二寸照片和一些底版，有的照片背景为大海，人物有男有女，全是军人，还有一个纸片，上面记了许多电话号码，其中一处还注明了“三座门”。二号尸体衣服全都烧光，赤身露体，仰面朝天，头发没有完全烧光，眉稍浓，已烧焦、眼半阖，变成一条黑缝，脸长圆，颊丰满，鼻子较高，嘴微张；右臂斜放，手心向上，指尖烧焦，有的露出白骨，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右腿伸展，膝盖略弯，左腿蜷屈，踝部搭在右小腿上；此人看来比较年青，肢体匀称，肩阔臂圆，生殖器较大。三号尸体受伤很重，脑壳从鼻根向上裂开，脑浆已被烧干，面皮全被烧焦；身躯壮实裸露，略向右倾，身下压着几块烧剩的军装碎片；右腿骨折，两个脚板均被烧焦。

第二堆四具尸体，与第一堆的距离十多米，他们参差错置，不在一条直线上。其中第四号尸体是穿着皮夹克的驾驶员，与五号尸体间距很近不到两米；趴伏在地，裤子烧得光光的，但皮夹克只是下边缘有点焦痕；头顶焦发丛中有一处血迹，翻过身来，面部全被摔烂，血浆粘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很高；拉开皮夹克的上兜，发现一把拴着短链的钥匙，按人们的习惯，这似乎是家门钥匙。第五号尸体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都比生前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似乎缩得更厉害一些，看去象个孩子，全身衣服烧光，受伤较重，左腿胫骨炸断，下端刺破皮肤露在外面，右臂从根部骨折，扭压在身下；生前似为秃头，看不到烧焦的头发，头皮烧裂几道，露出灰白色的脑壳；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瘦削，棱角明显；眼睛烧凹深陷，与烧焦的浓眉糊成一团，鼻子较大，鼻尖烧焦，露出两个朝天的黑洞，嘴圆张，门牙已掉，舌头烧黑；这个尸体的轮廓看起来眼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六号尸体离五号稍远，大约四米左右，他受伤最轻，裸身仰卧，面部略微烧黑，右臂平伸，臂弯上部有处皮肤绽裂，左臂下垂，左手掌心向下，五指散开作抓地状；胸部有几大片皮肤焦黑，仔细看却不是皮肤烧焦，而象是渗进一块块柏油，其他尸体也有这种现象，但面积没有这么大；将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其便溺约半分钟，证明尸体膀胱和尿道都没有损伤。七号尸体同样赤身露体，方脸，面部烧黑，腰间手枪皮带及枪套没有烧掉，他左手直垂按地，右手侧按枪套，象要拔枪射击，两腿一蹬一弯，似乎想站起来。

第三堆两具尸体，离第二堆尸体约二十米。其中第八号尸体个头大身体壮，长圆脸，生前似为短发，头皮有些焦裂；全身皮肤裸露肿胀程度比别的更厉害一些，两腿弯曲，两脚蹬地，膝盖朝上，两手上升，两掌抓空，似乎死前非常痛苦而努力挣扎。九号尸体是唯一的一具女尸，右手垂放体侧，左手斜伸，手心朝上，指尖有些烧黑，安详仰卧，头略向左偏，象是睡熟；面部没有烧黑，只是左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烧歪，露出几个白牙齿；头发没有烧光，不仅头顶剩有烧卷的稀疏黄发，脑后还压着一堆没有着火的黑

发；衣服基本烧光，只是脖子和胸前缠着没有烧尽的白色丝质背心，乳房较平，两腿微屈，膝盖外翻，脚成八字形，阴户塌陷，阴道脱垂；将其翻过来，背上皮肤白晰，有皱纹，看来这位“空中小组”已不太年轻。她离烧毁的机头只有八米，奇怪的是为什么烧得这么轻，身下压的枯草仍然黄黄如新。

这些尸体的姿态各异，从直观中推测，飞机着火爆炸时，有些人当场炸死摔死，有的则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识，至少七号和八号是这样，他们似乎均在无情的草地大火中挣扎，但由于燃烧加窒息，最后仍然逃不脱死神的摆布。他们的衣服，除一号、四号犹存上衣外，其他全都烧光，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六号尸体胸前柏油状物质，据说也是的确良军装燃烧所致。为什么每具尸体都红肿如蜡人呢？事后我请教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烧死的人往往伴随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泛红；如果人死而皮肤未焦，内脏未坏，放置时间稍长，就形成皮层水肿，变得亮晶晶的，象是蜡塑的人；当然，这与气温也有关系，天热很快腐烂就很少这种现象了。

我们注意到，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没戴手表，询问蒙方陪同人员，据讲在草地上拣到九块手表，个别烧坏，大部完好，有的还较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具具尸体脚板都是光光的，按说有人穿着结带子的皮鞋，可能烧坏，但不容易甩掉。后来一位内行的同志告诉我，飞机迫降擦肚皮着陆时，冲撞扭曲很厉害，机上乘客必须事先把身上的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鞋也要脱掉，这不仅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因为飞机落地，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人们下滑时一般都要光脚，免得硬底鞋一旦被绊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们察看一具具尸体的时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尸体旁边放了一口白茬棺木。这些棺木是蒙方连夜赶做的。中午十二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尸体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八号尸体身躯高大而两手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士兵移棺下葬。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间留有二十厘米的空隙。按蒙古的新习俗，应在每具棺木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由于时间短促来不及准备，遂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窄幅长条黑布。为此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图旺扎布参谋长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同志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开始铲土封埋。因堆坟要一两个小时，蒙方邀我们到大轿车上继续昨夜的会谈。

下午三时许，坟已高高堆起。图旺扎布参谋长建议，按蒙古风俗，坟堆上应放死者生前爱物。可是，九个人合葬一家，得找一件他们共同喜欢的东西呀。小沈出主意，把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的机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说那个东西太大不易搬动。小王说不如把从机尾上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搬来。许大使同意后，蒙古士兵用汽车拉来放到坟顶上，一眼望去明晃晃的，这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十分显著的标志。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同向死难者致哀，三鞠躬。蒙方人员统统避开走远，我急忙拦住蒙通社一位记者，让他用我的相机拍下这一场面。事后看来，蒙方对死难者身分同样缺乏足够的估计，失掉了拍摄这一对他们很有宣传价值的镜头，明白真象以后，他们肯定要后悔的。

将近下午四时，现场一切处理完毕。我同小王又驱车绕现场转了一周，补拍了一些镜头。我为自己五十年代就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豪，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3型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七个胶卷二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记录片该有多么大的价值！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尽管汽车颠簸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了。

彻夜的会谈

在温都尔汗，我们住在肯特省政府招待所。这个城市居民有一万余人，半定居半游牧，建筑物是平房加蒙古包，象我国内蒙牧区一个旗的中心。招待所是新建的，屋里摆着捷克斯洛伐克高级家具，铺着苏联化纤地毯，生活器皿也较讲究；但是，墙壁和地板凹凸不平，门窗也关不严实，冷风从手指宽的缝子一个劲地往屋里吹。吃的主要是羊肉，做得半生不熟，膻味很大，令人难以下咽。

我们同蒙方的会谈已进行过两轮。第一轮是九月十五日午夜，首次视察现场回来。第二轮是十六日午后，在现场安葬死难者的间隙。第一轮会谈时，蒙方高陶布司长首先讲述了九月十三日凌晨现场附近居民所见。他说，该日凌晨两点半左右，贝尔赫萤石矿值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随即发现东南方远处有一片大火，他连忙把人们唤醒，分乘两辆卡车奔赴火场，因为按蒙古政府规定，无论谁发现草场着火，都必须立刻设法扑灭，否则要受处罚。工人们抵达时火势尚猛，透过火墙看到了遇难的飞机，他们一面灭火一面派人向温都尔汗报告。过了一会儿，伊德尔莫格的牧民们也来了，一齐协力把火扑灭，这时才看到了躺着的九具尸体。省里来人时天已快亮了，立即调公安部队看守现场，并报告乌兰巴托。

许大使问：“附近居民是否听到飞机轰鸣声？是否看到空中着火的物体？”高陶布回答：“都没有看到。”“死难者是否还有别的遗物？”“还有几个手提包和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已收藏好，待双方会谈后移交。”接着，高陶布把话转入正题，说：“我方认为这是一架军用飞机，入侵了蒙古领土，自行坠毁。我方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许大使表示，对于蒙方扑灭大火，保护现场，安排我们进行视察。我们感谢。这架中国民航飞机，迷失航向误入蒙古领空，坠毁在蒙古领土上，我方已表示了遗憾。但是，蒙方把它说成是军用飞机，说成是入侵，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机翼上明明写着“中国民航”四个大字，这是有目共睹的。于是，双方就飞机的性质展开了争辩，一直到天明，没有谈出什么结果。

第二轮会谈，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讨论立碑问题，双方商定回乌兰巴托后，由中国大使馆负责刻一石碑，双方派代表来现场竖立，目前可暂由蒙方立一木牌。木牌怎么写发生了争论，我方意见是：中国失事民航飞机九位死难者之墓。蒙方坚决不同意写“民航”二字，也不同意写“九位”，甚至说：“要写飞机性质，得写上‘军用’二字”。最后，因要举行致哀仪式，我们不得不同意木牌写成：“中国失事飞机死难者之墓”。

九月十六日，我们在现场善后处理完毕，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六点多钟。古尔斯德送来蒙方起草的《会谈纪要》稿子。顾不上劳累和饥饿，小沈、小王紧张地把稿子翻译出来，然后，抓紧时间开会进行研究。稿子第一段，叙述双方人员及视察现场经过；中间一段强调共同认为：涂有中国民航字样的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在肯特省温都尔汗附近的苏布拉嘎盆地自行坠毁；最后一段讲善后处理。稿子的要害是，中国军用飞机侵蒙古自行坠毁。经过第一轮会谈的激烈争辩，蒙方仍想把他们的说法强加于我们，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由于我们对国内的电报深信不疑，自然认为这完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空中小姐”看去年岁大了一些，估计是专机的需要。当时，我们每人脑子里虽然都有些问

号，但是谁也没有讲出来。小王同志看到林立果的出入证，曾联想到是否“林副统帅”的儿子，因为他在北大上学时，知道这个林立果“文革”开始时辍学离开北大。但是，他没有讲出来，怕讲错了担不起责任。

讨论中，大家集中研究第三轮会谈的对策，决定在暂不追究飞机坠毁原因的前提下，争取达成协议，写出可以接受的《会谈纪要》，以便把死难者的遗物接收过来（视察开始前蒙方提出，现场物品只看不取，死难者遗物待双方会谈结束后移交，我方同意）。

晚饭后休息了一会儿，开始第三轮会谈时又近午夜。许大使对蒙方起草的稿子进行了评论，提出了我方质询的问题和修改意见，然后说：“中国民航飞机是否自行坠毁，我方保留进行研究提出论断的权利。至于蒙方硬是把这架飞机说成是军用飞机，完全不顾事实，我表示不能理解。而且，这架飞机是由于迷航误入了蒙古领空，说它入侵也是不能接受的。”

古尔斯德抢着说：“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这是一架军用飞机，第一它是军人驾驶的，第二它是军人乘坐的，第三……”

我插话质问他：“蒙古的民航飞机，也是军人驾驶的，能说它不是民航飞机吗？”

“那不一样，你们这架飞机上面坐的都是军人。”

“不，他们都是机组人员，你不要以为穿绿军装的都是军人，现在北京中小学生都喜欢穿军装。而且，你应当注意到现场那双白色女皮鞋，这证明那位女的是空中小姐，中国女人是不会穿这种鞋的。”

“我们手中还有机上人员的领章帽徽，可以证明……”，古尔斯德没有说完，话被高陶布司长打断，他说：“我建议《纪要》上这句话改写为‘乘坐中国军人的中国民航飞机’，‘入侵’改为‘进入’可以不可以？”

许大使说：“各国的民航飞机都是不限乘客身分的，什么人都可以坐，它仍不失为民航飞机。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挂上一个‘军’字呢？”

接着，又争论下去，古尔斯德的态度比高陶布更为强硬，这时已近天明，高陶布建议休息十五分钟，然后继续谈。我们回到住所等了很久，也不见蒙方通知复会。天色已经大亮，小沈外出解手（室内无卫生间）时观察到，蒙方人员进了邮电局，估计是向乌兰巴托打电话请示。

许大使同我研究，认为蒙方难以改变其固执态度，继续谈下去，我们被缠在温都尔汗，不能尽早回乌兰巴托向国内报告，我们得赶快离开。蒙方人员从邮电局回来，通知复会。许大使在会上向高陶布司长表示，中国国庆节快到了，他要今天回到乌兰巴托料理馆务，这个会谈建议移到乌市去，如果一定要在这里继续谈，我们可以留下两个同志。高陶布表示惋惜，说这次视察现场，双方合作很好，为什么不能共同签署一个《纪要》呢？许大使问蒙方是否全部接受中方的修改意见？古尔斯德抢着说：“我方的稿子不能改动，中方不签字，我们单方面签字。”我有点气愤地说：“你们那个稿子，我们决不签字。你们单方面签字是无效的。对你们这种作法我们表示遗憾。”会谈不欢而散。吃早饭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早饭后，高陶布告诉许大使，乌兰巴托方面同意双方人员全部回乌市，以后在乌市继续会谈。

九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许，我们来到温都尔汗机场登上原机，那位接待我们的副省长到场送行。飞机飞上蔚蓝的秋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顿扫几天以来缺眠的疲劳。回头向东北望去，苏布拉嘎一带埋在一抹尘雾之中，那九个死难者，将永远留在那里、做异国他乡之鬼了。后来，一九七二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观看林彪在毛家湾的住所。林彪卧室墙上贴了不少他们一家人相互酬答的题词，其中有一条是林彪在叶群生日时题的，套用

戏剧《关汉卿》中的两句诗而改动了一个字：“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这使我马上联想到苏布拉嘎盆地的荒草孤坟，感到历史如此铁面无情，他们当年的誓言，竟变成了应验无误的谶语。

紧 急 回 国

九月十七日中午，我们回到了乌兰巴托。在使馆党委会上作了汇报之后，我就起草现场视察的报告，电报国内。

翌日上午，接到国内指示，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汇报，搭乘飞机，越快越好，使馆党委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但是，中蒙之间的航线早已停航，乘飞机得从乌兰巴托飞到苏联的伊尔库次克，改乘星期天（二十日）从莫斯科飞北京的中国民航回国。而中蒙苏之间的国际联运列车，星期天早上经乌兰巴托南下，行驶大约三十一个小时，星期一（二十一日）下午即可到达北京。经请示国内同意，决定乘火车回国。我周详地作了汇报的准备，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回国探亲的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公司（援蒙搞建筑项目，一九六六年底工程陷于停顿）的一位蒙族翻译同志与我同行。

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到处是一片深秋萧瑟景象。我看到铁路两旁的外国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无论是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为五十公里）的后勤基地，还是巴彦（离乌市一百多公里）、乔依尔（离乌市二百五十公里）的军用机场，气氛都显得异常。傍晚，到了边境重镇赛音山德，看到更多的外国军队、以及相当数量的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我嘱咐同行的翻译同志提高警惕，预防不测，最重要的是把回国汇报的资料保管好，绝对不能出差错。夜间九时四十分抵达蒙古边境车站——扎门乌德。车站上蒙古士兵站岗巡逻人数大增，往常带班的尉官已换成校级军官。但是，登车检查的边防军官和海关人员，态度都相当友好，做做例行公事就下车了。

深夜十一时十三分，列车抵达我国边境车站——二连。边防检查站的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亲切热情地接至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一反往常那样对蒙古境内情况问长问短，只是随便闲聊。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讲：“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难怪乎蒙古境内外军活动异常，难道这同失事飞机有什么联系？

列车从二连开出是凌晨一时四十九分。到了国内心情放松，便纳头熟睡。清晨六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吵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的集宁车站，我掀起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为什么国内也这么紧张呢？

九月廿一日下午三时半，国际列车抵达北京站。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和一位秘书，他说是特意来接我，让我把拍摄的胶卷交给秘书同志，去外交部招待所下榻。我说明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蒙族翻译同志，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让他回家了。车站上，人们熙熙攘攘，一派正常生活景象，看不到有什么异样。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浩同志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既没有说谁找，也没说在哪里汇报，他就同秘书走了。我环顾了一下室内，是布置比较讲究的两间套房，是大使级的下榻之处。晚饭后，洗了个澡，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汇报材料，稍微改动

了一下汇报提纲。估计是向外交部领导汇报，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准备完已十点多钟，和衣躺下正朦胧入睡。突然，有人敲门，看看表是十一时半。进来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瘦、精神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命令式的口吻：“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递给我，我装入文件皮包跟她登车而去。

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而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象蒙古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朦胧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向周总理汇报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王海容同志向他们作了说明，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王海容同志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他背向门厅站着，正向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交待事情。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已转过身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旁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让我坐在他身旁的藤编沙发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作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同志，副部长韩念龙同志，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同志。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浩同志，总理随即转向符浩更严厉地问了一篇。符浩同志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总理说：“那也不行，飞机摔掉了他总知道吧，派人把他找回来！”批评符浩同志：“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你过去不是也当过兵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总理的严厉态度，使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急促地跳起来，暗想今晚要“砸”了，汇报可能过不了关，因而愈加感到紧张。总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后来知道当时林彪的余党，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捉，中央对这些人的能量有多大不够了解，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九月十四日，驻蒙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在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边防站把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总理得知后，立即要这个干部所在的机关将其隔离，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二十六人谁也不许扩散。

我坐在那里口渴地直抿嘴唇，总理看出我的紧张心情，温和地说：“喝茶嘛，这是很好的龙井茶，多喝一点。”还一再打桌铃让服务员给我添茶。总理服下护士送来的药片以后，开始象谈家常一样，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参加革命时间、工作经历，一一亲自记在纸上；当听说我一九四八年就来到中央机关，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的紧张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注视着总理。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多次见过总理，但坐在他的身边直接汇报还是第一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总理穿着一身灰白色中山装，相当多的头发已

经花白了，面庞也不象过去那么丰腴，而是比较清瘦白晰，几小块老人斑显得较为突出，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不时注视着我，象是要透过我的话把脑袋里的思维抓住。他手背上的老人斑似乎更多一些，右手放在膝上时，可以看得出有些轻微颤抖。由此证实了一个传说，一九六七年，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在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下夺了外交大权，总理怎么说也不听，被气出心脏病来。

总理问过我个人情况以后，要我开始汇报。首先，我汇报蒙方对失事飞机事件的态度和我方交涉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我说：“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素图。”说着就跟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看。我指着标出的小红圈，讲明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次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说在图的右下角。“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图上的位置。总理用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划，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这绝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这时已是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同志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象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加上穿得很整齐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象塑在座位上的泥胎。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精神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知道，他从九月十二日下午，一直到十四日下午接到驻蒙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还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并对李耀文同志讲：“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叠放着。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是二十二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精神异常专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个一个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其中有几张照片他看了之后，眉毛一挑，头微微一偏，象是一种比较欣赏和满意的动作，我当时想这难道是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吗？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外一叠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倾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出来，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辨不太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其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问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回来？我说视察现场前，双方达成协议，现场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后一并移交。总理的口吻严厉而带焦躁，批评说：“对国家机密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应当誓死去保卫嘛！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看到国家机密处于危险之中，应该不应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我屏息地听着，感到汗颜和后悔，我干嘛那么机械地遵守双方的协议呢？问题在于我没有这个警惕性，没意识到机上人员中可能有叛徒，而在现场的文字材料方面下功夫。等到总理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继续讲这个小册子，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象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他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叠上。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凌晨三点多钟。总理对着外交部几位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我心里想，能在总理身边再多呆一会儿该多么好啊。看到总理还要同在座的人讨论什么，我就退出厅来。王海容同志带我在厅旁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鸡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这时，才感到真的累了，饿了。吃了夜宵，王海容同志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会议纪要》稿子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送给了毛主席。

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同志亲自起草给驻蒙使馆的指示电。李耀文同志把我叫过去参加。电报的大意是，指示许大使约见蒙副外长，讲明九月十三日凌晨，中国民航飞机三叉戟 256 号，迷失航向误入蒙古领空，自行坠毁，再次向蒙方表示遗憾；同时向蒙方交涉，中国政府打算派专机到温都尔汗，把九具死难者尸体运回北京。电报起草好，韩念龙同志重回厅内呈批。李耀文同志要警卫派车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

关于运回死难者尸体，后来听说未能交涉成功。蒙方已从国际传闻中揣测到其中有大人物，于是提出了苛刻条件：中方必须澄清机上人员的准确身分，提供姓名、年龄、职业，然后才能考虑运回尸体的要求。这样的条件，我国政府怎能答应呢？

执行总理的指示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到外交部办公大楼内见李耀文同志，请示下一步干些什么。李耀文同志是解放军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政治工作者，抗战后期就已经是山东军区某旅的政委，一九五五年实行军衔制时，是抗战时期干部被授少将军衔的三名出色人物之一。他非常平易近人，也是胶东人，一口家乡话使人尤感亲切，在他面前我毫无拘束之感。李耀文同志对我说，“凌晨你回招待所之后，总理又把我叫进去，问你还在不在，听说你已经走了，总理感到惋惜，要我转告你，关于那个‘讲用小册子’的批评过头了，表示歉意。”我听了总理这句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我对李耀文同志讲，这怪我没一开始就说清楚，总理的批评，关于

保卫国家机密的话，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李耀文同志对我说，今后几天的工作就是洗印照片，问我会不会操作，我说暗室技术懂一些。他让秘书把我带到管国外文件收发的小孙同志那里，让她协助我洗印照片。小孙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工作相当熟练，而且认真细致，昨夜递送总理的照片就是她洗印的，质量很好，每张放大为12寸，仍然非常清晰。从这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二十七日，我几乎每天都要在暗室里工作半天以上，根据李耀文同志的要求，一批一批地把照片洗印好送到他办公室，他同我一起在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上说明。有时我图快，字写得潦草，他就提醒我这是送给上面看的，字要写端正。

李耀文同志还跟我说，关于失事飞机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事情没有办完也不能回家，可以打个电话让家里放心，但不能离开外交部招待所。这实际上是一种暂时的“隔离”，他说得那么委婉体贴，令人乐于接受。那位蒙族翻译同志在九月二十一日半夜，正甜蜜地进入梦乡，被外交部派人找回来，家里人和邻居都感到惊慌，不知他出了什么乱子。他在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三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一再埋怨我连累了他。我笑着问他：“那我受了谁的连累，也照样不能回家？”二十五日上午，外交部的秘书通知他可以回家，他一溜烟地跑掉了。然而，我住到什么时候呢？二十八日起上面就不再要照片了，没有事干实在闷得慌。李耀文同志象是猜到我的心思，要秘书通知我，可以到招待所周围走走，但不能走远，以便有事随时叫到。

九月三十日上午，李耀文同志让秘书通知我，专门洗印一批失事飞机的照片。晚饭后，秘书又通知我，十一时半在招待所门口等着，有人来接。我高兴地暗忖着，说不定又可以见到总理了。

秋夜的风已越来越凉了，我披着呢大衣也不感到热。一辆黑色轿车按时来到招待所门前，司机说明是接我，我上车一看只我一个人，正在纳闷，车已沿着西长安街驶向西单。不久，在西城一个胡同里的朱红大门前停下，司机下车按了一下门铃，李耀文同志从里面走出来，手中拿着我白天送给他的装有失事飞机照片的纸袋。他上车后悄声地说：“我们到总理那里去。”深夜十二点，大街上一个人，一辆车也见不到，大概人们都为准备国庆节而疲劳地睡熟了。车开得飞快，穿过府右街到了中南海西北门，门卫问明身份放我们进去，转了个弯来到总理住处的外院，停在一辆奔驰牌汽车后面。李耀文同志叮嘱我在车上等，有事时再来叫我，然后下车走去。我环顾了一下，总理的内院灯光明亮，外院却比较暗淡，但是看得出大门里面和外墙根下，整整齐齐排着一列战士，每隔两三米一个人，一直延伸到远处暗影里，他们全副武装扶枪危坐在背包上，象是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马上意识到“一级战备”并未过去，在北京是“外松内紧”。

我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靠在后排座背上睡着了。司机说一声“来了”把我惊醒。李耀文与另外一个同志走过来，我急忙下车，他介绍说：“这是杨政委。”我上前握手，看得出是向总理汇报时见过的杨德中同志，我已知道他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政委，分头登车后，李耀文同志对司机讲：“跟上前面的车，去西郊机场。”杨德中同志的奔驰牌车开得很快，车速至少八、九十公里，我们坐的轿车有点跟不上，我暗暗地感到遗憾，没能再见到总理。

凌晨两点半左右，来到西郊机场办公区的一座主楼前，楼内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已经等在楼前。经杨德中同志介绍，得知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一位是空司的副参谋长，一位是空军西郊机场师政委。走进楼内坐定，在场的人都贯注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穿便衣的，他们似乎有些诧异。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里，觉察得出一种不知所措的气氛。

杨德中同志说：“讲讲吧。”那位副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大意是：九月十二日傍晚，“256号”起飞去山海关机场。机上油未装满，按规定转场飞行情况下只保持十吨油。“三叉戟”载油量二十二吨，续航力五小时（其中包括一个小时的保留时间），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256号”飞山海关，虽然只有半小时，但起飞用油较多，大约共耗三吨油。从山海关起飞前临时加油数量不详，就是说，“256号”十三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起飞时，油量顶多十吨左右。到蒙古温都尔汗一千一百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上空绕了一个圈，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耗油量八至九吨。这样计算，“256号”坠毁时，机上还有油一至二吨。“256号”进入蒙古上空，蒙境内雷达站没有特殊反应，只有一部蒙古雷达向乌兰巴托报告，上空发现一目标瞬间消逝，乌兰巴托要它继续监视，随后就关机了。

杨德中同志要我讲讲“256号”在现场迫降的情况，那位副参谋长听说飞机是擦肚皮着陆后起火爆炸的，显得有些出乎意外，插话说：“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擦肚皮下来，难度是比较高的；驾驶员是师副政委潘景寅，这人驾驶技术比较好，一九七〇年从巴基斯坦买这批三叉戟飞机，是他带队接回来的。”他听完我的讲述后，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说“飞机迫降时速度比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接着他又补充说：“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

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乘车到机场停机坪。各种照明灯都打开了，坪上如同白昼。远远看去，一排十几架飞机，整整齐齐停在那里，每架都盖了苫布，而且周围放了拒马，有至少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荷枪巡逻。我们来到靠近中间的一架飞机前，杨德中同志命令掀掉机罩，一架完整的“三叉戟”出现在面前，机号是“252”；副参谋长说这是与“256号”同批买回来的姊妹机，然后循着机头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特别指出油箱的位置。我问是否可以进到机舱看看，他说不行，已经打了铅封。来到机翼下面，一看就恍然大悟，“中国民航”四个大字朝下，“256号”翼根那个大洞自然是朝地而不是朝天了，这就确证它在爆炸前不但飘了起来，而且在空中翻了身，右翼到了左边，而左翼到了右边。我向李耀文同志说明了这个“发现”，四人就一同来到右翼下面，我指出了那个洞的位置，副参谋长讲：“这里正好是一个检查孔，是检查电线和油路用的；里面是一个油箱，要不要让机械士打开看看？”李耀文同志说算了，因为事情已经十分明白，“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最后，我们走到机尾，它高高耸立着，五星红旗在夜空中仍很鲜艳，可是它的姊妹“256号”的机尾，却永远斜卧在异域沙砾上。

离开西郊机场返城时，已经十月一日凌晨五时。李耀文同志直接回家，杨德中同志去人大会堂，让我与他乘车同行。他在车上对我问长问短，完全是谈家常式的，既亲切又热情。车开过西长安街中南海门口，看到从人大会堂开出一辆红旗轿车迎面而来。司机跟杨德中同志说：“总理回家了。”啊，总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洒水汽车已沿长安大街忙碌起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的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迎着晨曦盛开。第二十二个国庆日来到了。

揭开飞机坠毁之谜

国庆节两天假期过得颇不寂寞，我的爱人带着孩子前来招待所看我，驻蒙使馆前后回国的同志也来叙谈。他们有的人问我究竟回来干什么，怎么被“隔离”起来。我开玩笑地说：“烛

影斧声，千秋疑案”。的确是，两周来，许多现象扑朔迷离，思想认识虽有所前进，但总觉这个谜还很深，难以猜透。我这个人好联想，但却想不出个明确结论。

十月三日下午，接电话通知，四时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我到礼堂时已黑压压坐满了人，我插入前几排办公厅的干部中间就坐。韩念龙副部长宣读中共中央（一九七一）第五十七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涨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文件时间是九月十八日，正是我们从温都尔汗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发了现场视察电报的第二天。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失事现场那九具尸体，晃来晃去，使我一阵阵头晕恶心，对五十七号文件后面几段话几乎没听进什么。传达报告结束后，回到办公厅，王海容同志正好在那里，问我：“这会儿清楚了吧？”我回答：“清楚了，完全没有想到。”她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明天可以回家了。”我又去见李耀文同志，他说：“本来十七级以上干部是国庆节前听传达的，我们从工作考虑，让你晚一些知道。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你把照片、胶卷和书面资料清理一下，移交给秘书，明天派车送你回家。”我当即去把经手的一切东西清理好，作了移交，然后返回招待所。

夜里，久久不能成眠，从九月十四日到十月一日凌晨，从飞机失事现场到回国汇报，从周总理的笑容笑貌到西郊机场看“三叉戟”，象过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晃过来，又晃过去。已经到了半夜还是睡不着，我索性爬起来，站到阳台上吹吹风。风很凉，有点象苏布拉嘎盆地那种肃杀秋风，我紧紧裹住大衣。

新修的前三门宽阔马路空空荡荡，阒寂无人。头脑在凉风中逐渐冷却，我把这二十天的印象联缀起来，感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谜终于彻底揭开了：……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全家仓惶出逃，乘“三叉戟”256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次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以东，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上空，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256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二十分钟）；看来决心是林彪亲自下的，根据现场尸体位置判断，林彪当时可能坐在驾驶员潘景寅的旁边；迫降前他们作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鞋，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的死亡的命运。果然，飞机擦地着火，而且空飘翻身，无法打开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瞬间飞机爆炸，机身裂成碎片，人被抛向高空；恰巧草地枯黄，一燃即火势凶猛，有的人即使摔昏而未死定，也逃不脱草地大火的焚烧和一氧化碳中毒。

俗语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假设，“256号”寻觅降落场，把盘旋半径扩大到七十公里以上，就飞到了平展展的温都尔汗大草原上空，很容易找到那个硬地面的简易机场；假设，飞机落地不翻身，他们几秒钟之内就可放下救生充气滑梯滑到地面，在飞机爆炸前逃离；假设，迫降场没有那么高的枯草，或者象我国关内九月，草绿而不黄，即使飞机爆炸，有的人摔昏后还可能复活；假设，林彪等人活下来，结果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假设，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叛徒们受到了理所当然的惩罚。

我不禁仰望满天星斗的夜空，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主宰吗？难道无垠的苍天真有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吗？我不禁笑自己怎么迷信起来，我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记得五十年代学哲学时，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条原理，总觉得不好理

解，后来在工作实践中懂得了一些，但也并未参透。今天，这不是找到了最清楚不过的答案吗？林彪一伙死得如此偶然，也死得如此合乎逻辑！

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苏布拉嘎焦上上那些赤裸裸的尸体。在中国历史上，历代不乏大的叛徒和卖国贼，他们无不一一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供后人警骂和诅咒。但他们的下场都很少有林彪死得这么惨，葬身于异国他乡之域，暴尸三日于光天化日之下。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是，谁想到去年出了个陈伯达，今天又出了个林彪，我们的党怎么这样多灾多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怎么就没看透林彪呢？……我忽然想到周总理看林彪等人尸体照片时的表情，那不是“欣赏和满意”，而是“宽慰和庆幸”，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庆幸。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地作出了“三叉戟 256 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这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是高度政治睿智的结晶，使一个国际事件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惊涛骇浪中，“林彪外逃”事件该算一桩大事吧，但在他的主持处置下，国内什么动乱也没发生，人们照常生活、作息。再过两个星期，美国的基辛格就要二次来华了，在北京他会看到什么呢？美国记者也许会写：中国象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人民生活一切如常……

第二天，十月四日上午，我带着彻夜未眠的困倦，和需待重新思考的一些疑团，结束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离开了正义路口的外交部招待所。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前夕完稿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第三次修改定稿

作者附记

我完成了回国汇报任务之后，有关飞机失事现场的一切资料，均按规定办理了移交；留下的仅有脑海中的记忆。一九七九年曾一度想把它写出来，但因工作无暇而未果。现在，十五个年头过去了，不少细节淡忘了，记忆甚至出现舛错谬误，有点不敢提笔。不久前，受到一些老战友的鼓励，他们说当代的历史应该当代人自己来写，不要统统留给后人。于是，我鼓足勇气，匆匆写出了初稿。之后，几经修改，仍难满意，而《万象》编辑部频催发稿。虽说文责自负，但心中总觉不踏实。因此，恳切期待此文发表后，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有关同志的指正。

(原载《万象》1987年第1期)

〔附〕 “九·一三”事件补遗

符 浩

近些年来，关于林彪叛逃的文章，已在海内外报刊上多有登载，已使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昭之于世。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心潮起伏，我的思绪总是萦绕于 16 年前 9 月中旬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大概是自建国后我睡眠最少的时

候，也是工作最紧张的时候。

我由于工作的关系，对“机毁人亡”后的情况可谓略知一二，谨记述如下，或可有助于补阙。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的工作，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交涉或应对方案。

13日上午，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书记、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感，不象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的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做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它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姬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篇。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蒙古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倾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对蒙古方面的外交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夜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四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

知道有一架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报告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当时，我是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总理的指示分三点：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我站起来准备马上去落实总理的指示时，韩念龙同志又匆匆进来，我知道姬鹏飞同志约他来是商量起草给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这一指示于下午3点30分发出。

我把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同志找来，和他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王××专门译办来往电报，并要王立即搬到离我办公室较近的房间工作。

下午5点58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口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王良恩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等候。我们来不及寒暄，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象已等了一会。”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哈哈笑道：“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幅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然壁上新换一副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之笔，神充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乔公听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诉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志查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我们都太兴奋了，这两天也都太紧张了，本应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赏玩太炎这幅字，好象使我们都松弛了许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幅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公听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他：“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乔公刚把“改诗”用铅笔誊出，电话铃声响了，是部值班室来的，又接到使馆报告了。我急忙告辞准备直接去办公室，临出门时，他说：“本应把半瓶茅台给你带去，不过你今晚就要

酩酊大醉了。我这里有包速溶咖啡，给你带上，你会发现它的妙用。”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4人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视察。

9月16日晚11时30分，我批发了一份文件催问视察情况和现场停留一天的原因。

9月17日晚8点半，使馆报告，大使等4人已于晚7时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志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有关材料回来，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一时，接使馆报告，决定派孙一先等秘书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部，并当面汇报。

9月19日晚使馆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车离乌兰巴托回国。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我和秘书王万慧同志早已到车站等候。孙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同车到达，一下车我们就迎了上去。孙、贺两人和我们打招呼后，就东张西望。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是专程来接他们的。

正在找来接站的人。王万慧同志把孙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声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招待所。”随后又告诉贺喜同志，他可以回家住，关于我国一架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

来到外交部招待所，进到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孙一先同志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交给我，我马上要王万慧同志先把这些东西带回部，把文件交给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同志妥为保管，胶卷交给正在待命的孙秀娟同志冲洗。然后，我对孙一先同志说：是周总理要我来车站接他的。并告诉他飞机坠毁，情况很复杂，要绝对保密。并向他交代了几条注意事项：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第四，随时准备汇报，并将一个电话号码和外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的名字写给他，如果有事可与他联系。

晚上，11时许，我和姬鹏飞、韩念龙等同志来到大会堂福建厅，总理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我们尽量在离他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研究有关的问题。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同志被领了进来。总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过头来问我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还没等我讲完有关贺喜同志的情况，他一听说贺已回家，便面色一沉，那双著名的浓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我的话：“你当过兵吗？”霎时间，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立即回答说：“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

约一个半小时后，服务员请我到隔壁房间接部值班室的电话，说已按我的交代把贺喜同志从酣睡中叫醒，并已送进招待所住下，待孙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转告注意事项。这时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每逢我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对我在工作中的教诲和批评时，这件事的印象总是那么深刻，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好象发生在昨天。说来奇怪，在我遇到困难，在感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时，耳边常想起总理用十分严厉的语调问我：“你当过兵吗？”

孙一先汇报完情况，我看了眼手表，已是22日凌晨2时多。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总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按经验我知道会还要接着开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邝任农同志到了，紧跟着是吴法宪。总理把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

交给杨德中同志，并说，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又对我说：“你也参加。”

杨德中同志和我来到东大厅，公安部长李震、北空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我根据孙一先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说明。然后大家就分析、讨论了起来，最后一致认为李际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李的看法是：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来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唯一的处理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原因，例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迫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杨德中同志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赞同这个办法。我又建议，最好把孙一先同志也带去。

早霞4点多，杨德中同志又回去向总理汇报分析结果。我走出大会堂北门，天色微明，回头望去，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总理仍在工作。

9月24日上午，我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看到成群的学生仍在为庆祝“十一”排练队列，一切照旧。按照总理的指示，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当车子从东单向北拐去时，我听到有广播车的声音，忙问司机同志：“在干什么？”他好象明白我的心思，把车子靠在马路旁停下，并摇落车窗，声音十分清楚响亮：“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对他说：“我们走吧。”

9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在向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我做为代表团的成员，离总理坐得很近，灯光下，我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我们告别总理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我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厅里只有总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摆手示意让我坐下，他好象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务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动提问。总理终于开口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他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到：“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告诉他一个人。

9月29日，我们辗转抵达巴黎。当晚，我就前往我驻法大使官邸。与黄镇大使说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他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显然，他对我带来的信息，非常兴奋激动，我们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他突然一拍我的肩膀，提高嗓子对我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回到房间里，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他告诉我，这瓶酒他已珍藏多年，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个屋子里扩散，我发现这酒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

这是我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

(原载《炎黄子孙》1988年创刊号)

(附) 扭曲的虹

张 宁

1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自从我被恶浪抛上政治峰巅，又在瞬息之间被卷入浊流漩涡之后，我惊恐惶然，在扑朔迷离的、政治与权力相互厮杀的刀光剑影中，无法辨别那些谁是真理谁是谬误。

从那以后，我就希望寻找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屋。尽管我更名换姓，隐匿在不为人知的旮旯，但终究还是难以摆脱纷繁的大千世界的骚扰。

有位朋友对我坎坷的命运深表同情，他介绍我结识了一位老教授，那是位学识渊博，极具传奇性的老学者，他对骨相学有着惊人的造诣。当时，他已八十高寿，这位可以未卜先知的老人，将我引进他的书斋。

那是一间陈设典雅古朴，溢满檀香的厢房，红木雕花的书橱几架上，堆满了线装书籍，袅袅青烟与和煦的阳光相互缠绕。

老教授征得我同意后，开始为我做骨骼抚摸，我与他对面而坐，他是从头部颅骨开始摸起的，摸完后，老教授长嘘一声：“姑娘啊，你很可惜，你的两个耳朵长颠倒了。”

我听了不解其意，心想，我的耳朵不是长得挺端正吗？

老教授知我茫然，平声静气地道出了我心中的疑虑——在我十五六岁时，出现过一次机遇，在海外将享受荣华富贵。在我二十岁时，曾遇龙虎凤三魁聚首，平地一声炸雷，遗憾未能冲上去，否则我将是“中国第一夫人”。

老教授为了这句关键结论，双手颤抖着，在我眉峰中间仔细地抚摸了很久。

我钦佩他，因为，在我的身上确实发生过这段荒唐的史实。也正是我经历的这段历史，摧毁了本来应该由我自己编织在蓝天上的彩虹。

十多年前，社会上广为流传有关林立果选美的种种文章，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尽管有那么一点似是而非的影子，但与我所经历的客观事实，毕竟有很大出入。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所经历的事件，已在历史档案馆中，落上了厚厚的尘埃。

我就这样在沉默中，度过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我接待了不少来访的作家、新闻记者，他们都是极其聪明的，想方设法寻找可以打开我心灵之窗的媒介。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始终保持着我的沉默，因为，在某种时候，这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好的自卫方法。我相信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严肃与公正，不论我开口与不开口。“即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人知”。

去年春季，我在深圳香蜜湖度假村，有位朋友给我拿来几本海外出版的杂志，上面刊登了有关我的经历的文章。那些杂志完全是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无聊读物，如果眼泪能冲刷掉我承受的耻辱和痛苦，我将长年以泪洗面。

这十五年来，我完全凭借一种超越感情的毅力，才能支持将生命延续至今，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样的精神控制法，时时刻刻都在侵害着自己——从心灵到肉体。

我终于病倒了，身体虚弱到极点，在我那座远离市区的郊外小屋里，我接待了几位朋友，把自己的故事讲了出来。

2

在万木葱茏的紫金山脚，有座颇有名气的小学校，一流的校舍，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学器具，南京军区校级以上军官，才有资格将子女送去念书。学校实行寄宿制，每到周末，学校门口就热闹空前，各家的小汽车，把孩子接回家，那一辆接一辆的轿车，鸣奏着嘹亮的喇叭，那阵势俨然象举行什么高级会议。

一九五七年，我在卫岗小学念二年级。和许许多多的同学相比较，自己是很不幸的，因为，每逢周末，总是由妈妈来接我们，然后，去军区总医院，陪伴我久病的爸爸。

记得在父亲弥留之际，军区司、政、后的领导常围集在病榻周围。当时，妈妈半跪着，伏在病床边，在爸爸耳边轻轻地呼唤：“老张，你睁开眼看看，看看小宁……”

父亲吃力地抬起他那只军人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对司令员说：“首长，孩子们幼小，我走了以后，孩子们就托给各位了，请你们照顾，小宁长大，希望她学医，将来能给人民治病……”

父亲在他有为之年终于抱憾去了，我刻骨铭心地忘不了那张苍白的脸庞，以及眼角挂着的人生最后一滴惜别的泪。

3

父亲去世之后，我继续在卫岗小学念书。只是到星期天，我不再被妈妈带到医院，而是沿着紫金山下弯弯曲曲的小路，回到座落在郊外那幢小别墅中，看到父亲那幅镶了黑框的遗像，心中那股失去爸爸的悲哀又萦绕在我小小的心灵上。

军区司令员的夫人常来看望妈妈，每次来都要带些礼物给我们。她送我的童话小人书《红舞鞋》，我特别喜爱，那个只要一穿上红舞鞋，就永不停歇跳舞的小姑娘，我不知为她的遭遇流过多少眼泪，后来，竟影响着我的前途和职业。

我十岁那年穿上了军装，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开始了专业舞蹈演员的生涯。

对我进行训练的老师名叫李首珠，她在芭蕾艺术方面曾受过苏联白俄罗斯派的严格训练。

我在李首珠老师以及董哨老师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训练下，在六四年全军大会演中崭露头角。由于我优异的舞蹈条件和正规的舞蹈训练，以及典雅优美的气质形象，已为当时舞蹈界注目，承蒙有人过奖，夸我是“新星”。

其实，谁也不会想到，我刚刚降临人世时是一个浑身长满黑毛的丑丫头。因此，母亲没有给我起名字，只随便地叫我“小毛猴”。父亲戏称我为“小妖精”，直到三岁，我连一句简单的话也讲不周全。

也许是上帝赐福于母亲的仁慈，在我过完三岁生日后，身上的黑毛却出人意外地脱落了。不久，我这个丑毛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个雪白漂亮的小天使，就象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小天鹅一样。

作为一名舞蹈演员，我是知道自己得天独厚的。有关舞蹈家曾将我优异的舞蹈条件做为一项专门课题加以研究。一九六二年，李首珠老师曾带我们去上海芭蕾舞学校观摩学习。上

海芭蕾舞学校是我国舞蹈艺术界的权威，他们愿意用同等学历中的五个优秀学员，与前线歌舞团换我。李首珠教师认为，上海芭蕾舞学校条件优越，更能适应我的发展；她从中国舞蹈事业大局考虑，把这个情况向前线歌舞团的领导作了汇报。但是，歌舞团和军区文化部领导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我们也需要高水平的演员。

司令员得知我已学习舞蹈，生气地责怪母亲为什么违背父亲的遗愿。母亲有口难言，因为当时是支持让我学医的。

这位少林寺出家的司令员，性情耿直，十分讲究老朋友之间的感情，他叫母亲立刻通知我停止训练，准备转入军医学校学习。

然而，我经过两年的艺术熏陶，脚尖已磨炼出厚茧，我的四肢已可随心所欲的用舞蹈艺术为人民服务，并且，我对舞蹈艺术的理解，早已不再是当初那种朦胧的认识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完全有希望，有潜力摘取艺术桂冠。

我的问题被提到相当高层次领导的议事日程上，军区文化部会同前线歌舞团，经过反复研究，取得统一意见上报军区首长：前线歌舞团自建国以来培养出的第一批演员中的尖子演员，不能改弦易辙。

一九六四年春，我军将在北京举行建国以来，也是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军文艺会演。

为了在这次大会演中取得荣誉，各个文艺单位都加紧准备工作，前线歌舞团当然也不例外，从演员阵容到准备参赛节目，都由军区文化部领导亲自负责。

会演比赛的成绩，果然不负军区首长的期望“不拿个班长也得拿个班副”，我团成绩名列前茅，扛了许多大奖状回来。在会演期间的联欢会上，已故的罗瑞卿大将喜爱地把我叫到他身边问长问短；李先念副主席也过来问我家乡是哪里的。贺龙元帅风趣地说我，“你这小姑娘腰怎么这样软。有没有腰啊。”当他们得知我是老红军烈士的子女时，更加疼爱。

4

全军文艺会演结束不久，全团又赴北京，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演出。

演出后，我们回到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点名要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随同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国。当年是印度尼西亚成立45周年纪念日，亚非地区各国首脑都带本国一流水平的文艺团体赴印尼表示庆贺，我们团能被指名随同两位总理代表国家的艺术团体出访演出，是十分光荣的。

5

从飞机舷窗朝下看，一片湛蓝的大海是那么温柔可爱，星星点点的岛屿象一颗颗绿宝石在闪闪发光。这就是风光旖旎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

这是我们出访的第一站，也是我差点被“绑架”的地方！

亚热带的丛林使我迷恋，异族的风土民情使我新奇，但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一位身份神秘的年轻人不断出现在我周围！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南亚人，中等的个头，魁梧的身材，明亮的眼睛。

他以陪同的身份，随我们团到各个城市访问。他神态轩昂，热情而有教养。

有一天，他带着一位华侨来到我身边，让华侨充当翻译，用汉语邀请我随他游览市容。

我们出访人员有严格的纪律，不经领导允许，是绝对不准私自外出的。我婉言谢绝了他。

那位华侨用西亚语向他翻译了我的话。他明亮的眸中闪现着失望的阴影，他礼貌地一欠身，深表遗憾地离开了。

印尼总统苏加诺在总统府接见我们时，在那豪华的大厅中，我又看到了那位青年人。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一副军人打扮，红色的贝雷帽，绿呢的将校服。我心里纳闷：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后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他是苏加诺总统的公子。

主人将我安排在这位公子旁边，他不断殷勤地为我拿水果点心，还一面打着手势，一边通过翻译，热情地询问我对他祖国的印象。

我怀疑他的身份后，不自觉地设起了一道防线，只是礼节性地答他几句话。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我们下榻的宾馆。他为我带来了一束白丁香花，并亲自将花插在我床前的花瓶中。

我们在印尼约四十天，访问了七、八个城市，他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我们，只要有机会，他总是往我手中塞一朵鲜艳的小花。他已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国话，讲得最流利的就是：“张宁，我爱你！”

那时我只是个十五周岁的少女，对爱情没有切身感受，只是朦朦胧胧地一知半解。就象每个少女都有一个玫瑰色的爱情之梦一样，我也有自己的爱情之梦，但我绝对想不到一个异国总统的公子会进入我的梦。虽然我对他感到新奇，但是每当他偷空向我传递爱情信息时，我仍然羞涩地低头不语。他那明亮的眼中总是闪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灼灼逼人，我知道那是在等我的信息反馈。可我不能打开心灵的窗户，因为我恋着自己的朋友，亲人，更恋着我自己的祖国。

由于他的身份，我们的纪律，他不可能总是在我身边。有时候，我发现他站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长久地注视我。更多的时候，他却被众多的本国的花枝招展的女子团团围住，但他的脸上却看不出由衷的微笑，只显现出一种高级沙龙中玩世不恭的应酬神态。我当时还小，还不能充分体察他炽热的胸怀和他难言的苦恼，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喜欢我。

但是，他却不得不承受我的沉默和冷漠。

爱情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和命运，它可以使做出违背常理之事，也可以使人原谅违背常理之事……。

以他堂堂总统公子的身份，以他显赫的陆军少校地位，以他潇洒英俊的外貌，在印度尼西亚他要找什么样的女子找不到？也许是越容易到手的越没有味道，以至他对那些竞相斗艳的女子不屑一顾，反而对我进行了更猛烈的追求，以至准备用“绑架”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

令人难忘的访问演出结束了。更令人难忘的“绑架”活剧却拉开了帷幕。

汽车驶向印尼首都雅加达机场。我们尚未下车就有一大群送行的人围了上来。整个场面显得既热闹又混乱。

我刚走下轿车，几个华侨就过分热情地围住了我，嘴里胡乱地说着：“呵，你真年轻，真漂亮！”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表示感谢他们的赞美。可是他们仍然围着我，似乎不让我动弹。而且他们热情的笑脸上总有一种奇怪的神色，有的人还不时偷空向四周窥探着。我也向四周察

看，见我们团的同志的周围总有一群热情的华侨，而外围较远的地方有一些装着神情淡漠的彪形大汉在闲荡，但他们眼角的余光却不断地注视着我。

我感到奇怪，直觉告诉我，这儿有一种特别的气氛，似乎在进行着一桩不可告人的秘密活动。

我想甩开这群华侨，向自己人走去。

就在这时，机场贵宾休息室门打开了，从天而降的苏公子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向我走来。

他微笑地同我招呼，通过华侨用汉语邀请我看别致华丽的机场大厅。没容我表态，他们簇拥着我向他们预定的方位走去，我不由自主地随着他们走去。慢慢地，他们把我引向大厅的一个侧门，那儿停着一辆小轿车。

随团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是个十分机警干练的同志，他一见机场的阵势，就预感到可能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立刻带领几位老演员迅速地挤进包围我的人群，冷静地、不失礼貌地和他们周旋。

苏公子一见这架势，知道自己的“绑架”计划失败了。他怀着惜惜离别之情，取出一柄精制的银刀，一条白色的丝巾，珍重地放在我的手上，用生硬的汉语充满感情地说：“张宁，你，纪念！”

我不知所措地接过来。有一位华侨告诉我，银刀和丝巾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象征纯洁高尚矢志不移的爱情信物。

我望着他棕色的、透着复杂感情的脸庞，顿时语塞，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触，竟连“谢谢”都未说出来。

飞机马达轰鸣着，猛地窜上高空。我从舷窗看到他伫立在停机坪上，茫然地向空中挥着手。

不久，我们在柬埔寨听到印度尼西亚政变排华的消息，据说总统部队死了不少人，而苏公子是总统宫禁卫军官，是否遇难，不得而知。我心中默默地祈祷着，为他，为我在印尼见到的所有善良热情的人们，愿上帝宽恕、保护他们。

6

出访东南亚和东欧四国回来后，当时国内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便和歌舞团团长何仿一起，到安徽大别山，参加农村社教。

我的任务是给村子里的青年搞政治辅导。一天傍晚，我准备回山顶休息。我沿着山涧小路慢慢地走着。这条小路的右面有一座古老的荒冢，墓地边缘野草丛生，我问村里人，为什么不平掉它。他们说，这座荒冢从祖辈起安在这里，谁也不知道它的年代。没有人愿也没有人敢去平它。

小路的左边，是一条清莹的小溪，溪水顺坡而下，终年不绝。村里人日常饮用的水，都从这条小溪中提取。

我刚刚接近荒冢，猛地发现路上横着一个黑乎乎的异物，有碗口那么粗。起初，我以为是一段烂木头，可是，当我踮起脚尖的那一瞬间，我全身不由地一阵颤栗，那黑色异物身体上，有着比大拇指指甲还要大的鳞片！

这是一条巨大的黑蟒蛇！

那蟒蛇静静地伏在地上，两端埋藏在杂草中，不知哪是头，哪是尾。

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我想起父亲向我讲述过，他在长征途中重伤掉队，经过原始森林中差点被蟒蛇吞食；而我却又要葬身于黑蟒腹中！

我绝望地抬起头，看见小溪一侧的山坡上，有位老乡在家门前吃晚饭，可我又不敢大声呼喊，害怕激怒那条蟒蛇。于是，我便象水兵打旗语一般，急切地向老乡比划着。

那位老乡从我急切的动作中，断定出我碰上了意外，他忙丢下饭碗，拿上锄头飞跑过来。

等我低头再看时，那条大蟒蛇竟然悄然无声地无影无踪了。

由于这场惊骇，第二天，我突然无缘无故地发起高烧，体温达40.1℃。四肢不停的抽筋，胃里翻腾得连胆汁都呕吐出来了，化验一切正常，什么药都缓解不了，就这样持续了几天。

奇怪的是，就在准备送我去合肥急救时，高烧却神奇般的降了下来。

那天清早，我吃了一些稀饭。太阳升起来后，我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小溪边洗漱，神志似乎清醒了许多。当我揩干脸上的水，再朝水中看时，溪水中突然出现成群的蛇，那些蛇四处游弋着，就连岸上的草丛中，石板下，也蜷曲着一团团花花绿绿的蛇。

我惊吓得大叫起来，赶紧跑回去。

一年多以后，即1968年我便断断续续开始在夜间做起了可怕的蛇梦——

一条黑色巨蟒，死死地纠缠着我，无论我逃向空中、水里、陆地，总也摆脱不了。我只好拼命地逃，在我精疲力竭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片湖泊拦住我的去路。我坐在湖堤上大哭，哭着哭着，碧波万顷的湖面上，出现了一片绿色的树叶，那树叶随着风儿向岸边飘来，变为一叶小舟，我便跳上这叶小舟，飘入万重波浪的湖泊深处。湖心有一座小岛，岛上生长着参天古树，可总是可望不可及，梦到此就结束。

这个梦，我不知重复过多少遍，每次的情景几乎都一模一样，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才彻底消失。

这个梦是生活中的预先征兆吗？

在事件后许多年，为我看骨相的老教授，曾推测出我“9·13”这段经历。我把遇蟒梦蟒的事说与他听，他说，古话讲，龟蛇坐龙廷，蟒是龙的化身，龙附身于你，这正与你的遭遇相吻合。虽然现实与梦兆同样荒唐，可也巧合的新奇。我无法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亲眼目睹的怪异现象，从小到大，我遇到的怪事至少也可以为《聊斋志异》增加几篇故事。

7

一九六八年，文革运动经过初期大动乱后，各个派系开始了大联合，歌舞团终于恢复了演员的基本功训练。我也从家中走了出来。在这之前，因为感情上抵触打砸抢及揪斗老干部的所谓造反行动，更由于自己的形象，恐在动乱中遭到不测，母亲便将我严实地藏在家中。

做为一名舞蹈演员，我深知基本功的重要性，尽管批判了白专道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全部的前途，必须建立在艺术事业上。

有一天，我正在练功房练功，团部文书通知我去团部。

副团长和两位陌生的空军干部在办公室里等着我。当时，我们女演员喜欢戏称空军为“大叔”。

那天天气很冷，我只穿着一条丝綢练习功裤，冷得直跺脚。
副团长问我团支部活动的情况，我对他说：“我们团支部开会的记录，不是给你了吗？”
副团长和那两位空军大叔交换了一下眼色，便让我回去了。
第二天，我又被叫到团部，团政委和副团长通知我，暂时停止业务训练，协助领导搞一些内查外调工作。

“为什么停止我训练？”我满脸不悦地问。

政委说：“让你搞内查外调，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一种培养方式。”

我说：“你们不能让别人去吗？”

政委说：“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何况这是暂时的安排。”

我不好再申辩了。副团长将已准备好的火车票和介绍信交给我，说：“你先去一趟上海。”

到了上海，我住在延安饭店。一天下午，来了两位女军人，其中一位年龄大约在四十五岁上下，胖高个子，她的肤色十分白净，穿的军装也很考究，一看就知道此人身份非同一般；另一位是年轻的。

胖高个问我，从哪里来，是什么单位的，来上海有什么事。我一一回答了她后，胖高个又与我谈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便起身告辞了。

回宁后，我发现自己的宿舍写字台下的一张照片不翼而飞。有人告诉我，照片是政委拿去的，在我去上海的那段时间，省军区副司令兼省革委会副主任蒋科到团里来了一趟，和蒋科同来的，还有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当时，胡敏问政委，团里有没有一个叫张宁的舞蹈演员。政委告诉胡敏，张宁已去上海了。于是，胡敏从歌舞团资料室拿走了我的部分舞台剧照。

我是老政委看着长大的，多年来，他就象对自己儿女一样关心我，爱护我，所以，我对政委也怀有敬重之情。

可是，他为什么要拿我的照片呢？这令我非常蹊跷。

我问政委这是怎么回事。他先是一愣，随即解释道：“你父亲有位老战友，十多年没有见到你了，让我带张像片给他去看看。”这件事就这么搪塞过去了。

有一天，全体女演员都集中在队部开会，蒋科领着一帮陌生人走进来。

大家见蒋科驾到，顿时拘谨起来。他却毫不介意，随便、亲切地与几位老演员说话。蒋科身材魁梧，皮肤黑红，讲起话来嗓音很浓。歌舞团政委有重点地依次询问女演员，并点名要各人站起来回答。

我低着头，坐在紧靠墙壁的最后一排，想躲过这令人发窘的提问。“小张宁，你站起来讲讲！”我终于没有躲过。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看着蒋科，我想起父亲临终托孤时，他是在场的。

蒋科见我不肯站起来，也不生气，同政委和那群不明身份的人说笑着，说我这么大，还不好意思。

一九六九年初，刚刚过完元旦，前线歌舞团领导又安排我去北京“外调”。当时，我对这莫名其妙的“外调”十分厌恶，就借口身体不好，请求组织上另派他人。

歌舞团副团长解释说：“这回去北京，任务很重要，并且有一位江苏省革委会的同志和你

一起同行。”我推脱不掉，只好进京。

革委会的那位同志身材矮小，皮肤很黄，象有什么心事似的，一路上什么话也不说，那双眯缝着眼睛，老是凝视着车窗外空空荡荡的田野。

到了北京，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把我们送到东交民巷空军司令部招待所。我们被安排在招待所的主楼，那是一幢二层小楼，内部装饰朴素舒适，铺着鹅黄色地毯，房内有暖气、沙发等设施。

我一个人单独住在二楼上面，那位省革委会的人则住在楼下，好象他是我此行的保驾。

晚上，我刚刚吃完饭，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带着她的秘书吴瑞云来了。胡敏长得很富态，皮肤白净，性格开朗，爱说笑。一见面，她欣喜地上下打量我，热情地与我寒暄。

“张宁啊，你不用客气，”胡敏摇着手说，“到了北京，等于到了家里。”

对她热情的光顾，我是不好意思的。

第二天上午，一辆高级轿车驶入招待所，当时，我正在窗户前看树枝上的积雪。小轿车停下后，守候在门厅的女服务员，马上跑上前去拉开车门。只见几位雍容大方、气宇轩昂的贵妇人，从轿车里慢慢走下来，她们在胡敏的带领下，径直来到我的房间。

一进门，胡敏便大声地说：“张宁啊，总长夫人来看望你啦！”

我真不理解，我这个普通的文艺女兵，竟然在一夜之间，引起这些贵夫人的竞相重视。我想，不论她们的长相、穿着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她们每个人身上都透着权力的威严。矜持与傲慢在这样的场合虽然不适用，但那种因长期受着特权生活的影响，形成的一种特殊气质，是这些当年延安土窑洞里走出来的带着浓厚乡土气的女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

吴法宪夫人等，把我围在中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着我，并当着我的面，议论起我的头发如何黑亮柔软，皮肤如何白净，五官如何耐看，找不出毛病，双手是多么纤细……

我自知自己的长相挺美，也经常被长辈们夸奖，那些慈爱的语言，我听的已习以为常。但此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正作为一件待贡品让她们评论着。

我不理解她们为什么会这样，眼前仿佛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歌舞团领导派我来北京，难道就是供她们评头论足的吗？难道这些无聊的寒暄，就是重要的“外调”内容吗？

当天下午，又有一批陌生人来访。与总长夫人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七八个来访者全是男性。这些人似乎都很随便，小客厅里坐不下，他们就挤在门口，嘻嘻哈哈地说笑着，立即让气氛显得轻松一些。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竟是林办的秘书班子，受叶群之命，以男性的审美标准，从各个角度对我进行实际观察。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男青年，始终保持着沉默，他坐在我斜对面一张沙发上，毫无表情地望着我。

我觉得此人很奇怪，便仔细看了他几眼。他的眉毛粗而浓，眼窝有些下陷，鼻梁挺直。我总好似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就是回忆不起来。

过了一会，楼下的女服务员送来一大盘柑桔，当我把一个很大的柑桔递到他面前时，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才慢慢地接了过去。他将柑桔皮剥开，撕下一小片，放在嘴边轻轻吮吸一下桔汁，就将桔片扔掉了。

我对他那种冷冰冰的表情，斜视人的眼神，吃水果的方法十分反感。我自己吃水果也是比较讲究的，但从来没有见过，象他这样浪费食物的。

第二天，这位浓眉高鼻梁的男青年又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军人。这一次来，他仍然沉默不语，靠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斜视着我与女军人的谈话。

女军人问我熟悉不熟悉中共党史，又问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何时何地召开的，有哪些人出席了会议。

她问了一个我从不关心的政治问题，我想了好一会，红着脸回答她说：“党的一大是在瓦窑堡召开的吧？”

两人一听，不由得笑起来。女军人让我今后一定要多掌握一些党的历史知识。我心中暗暗好笑，我是搞艺术的，让我多掌握一些艺术史还差不多。

过了片刻，女军人又摸着我的发辫，对男青年说：“你看她的头发多好！”

男青年听了后，笨拙地凑到我跟前看了看，嘴里“嗯”了一声。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竟然脸发红，象女孩子害羞似的，又退回到他的位子上去了。

他俩离开后，服务员好奇地问我姓什么，从哪儿来的。我一一作了回答。

“那么你一定是张春桥的女儿了！”一位小服务员十分自信地问道。

“你一定认识刚才那两个人罗？”我冷静地反问了一句。

“怎么，你和他们不认识？”小服务员惊讶地望着我，摇着头说，“你肯定在骗我。”

“真的，我确实不认识那两个人。”我轻声地说。

小服务员见我脸上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想了一下，说：“那男的叫李果，女的叫李改，是姐弟俩。”

小服务员说完，就跑开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回味着这番话，心中很不是滋味。这种门当户对的人际观念，在小服务员的心中竟也是如此根深蒂固。

我意识到，来北京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外调”，这里面肯定有某种特殊的目的，这个目的我难以猜出，但我知道自己正置身于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中。

晚上，胡敏又来了，她邀请我去人民大会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一天接待了好几批人，虽然我很疲劳，但我仍然比较乐意去看演出，因为，看样板团的演出，在当时机会难得。到北京来前，自己曾有耳闻，“前线”也准备排这个舞剧，我可以趁此机会，先观摩一下。

演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刚刚坐下来，侧面的门厅就打开了，从里面走出许多中央首长。江青和叶群并肩而行，当她们经过我身边时，我发现叶群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中场休息时，胡敏提议去休息一下，吃些夜宵。我不饿，便推辞说不去了，可胡敏拉着我的手，硬要我陪陪她，我推辞不过，只好随她走进一间休息室。

我们刚进去，黄永胜和吴法宪也进来了。黄永胜指着我问胡敏：“这个姑娘是哪儿来的？”

胡敏笑着将我拉到黄永胜面前，说：“总长，她就是南京前线歌舞团的张宁，怎么样，小姑娘长得美不美啊？”

黄永胜哈哈大笑起来，他的身材很魁梧，笑起来声音十分洪亮：“嗯，确实长得很好，不过，光长得好还不够，还要不断学习，努力进步才行。小张宁，你说对不对？”

这时，李作鹏也来了，胡敏又把我向他介绍了一番。

过了一会，胡敏又把我带到另外一间大厅，大厅的正面，悬挂着一幅巨大的贝雕画。胡敏叫我讲讲这幅画的意境。我对艺术作品的理解，绝不会象党史那样浅薄，就在我把画的意境讲给胡敏听的时候，叶群走了过来。

我们搞文艺工作的，经常有机会接触各级首长，按礼节，在一般场合，首长如不与你打

招呼，你就不必主动问候，出于习惯和对叶群的礼貌，我便向旁边让了让。

叶群见我没有理睬她，神色不悦地看了胡敏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便走了出去。

就因为我没有主动上前恭维叶群，她便认为我对她没有感情，将来会增强林立果对抗她的势力，构成新的威胁。于是生出种种理由，干扰林立果的选择。

9

经过多人多次对我的观察后，林立衡和林立果把情况告诉了林彪，并获得林彪的支持。

叶群得知林彪支持林立果消息后，立即召集林办秘书们，要每个人发表对我的看法。哪知，林办人员一致认为，我不但长得好，气质也与众不同。叶群听后十分不悦。要他们说到底好在什么地方。那帮惯于舞文弄墨而对女色并无研究的秀才们，一个个张着嘴，憋了半天，还是一句话：“张宁不一般。”

叶群的鼻孔轻轻地哼了一声，说：“叫你们去不是玩的，张宁的视力有毛病，你们一个也没有看出来吗？”

林办的秘书们见叶群言语有贬，便不敢言语。在他们来说，选哪个都无关紧要，只是不要惹事上身。

“这个张宁对我们林家没有感情，”叶群说，“我在人民大会堂碰见她，她竟然连个招呼也不打！你们和老虎（林立果）说一声，希望他认真考虑一下。”

一天，叶群和林立果站在一排仕女图前，叶群自言自语说给立果听：“没有一个长得象画上的人。”林立果当时低着头，冷冷地回了一句：“照片和画上的美人不等于现实中的美人。”叶群不高兴地白了林立果一眼，没有吭声。

有一天，胡敏请我到她家去吃饭。那天，我喝了几口酒，屋内的暖气温度又高，我的额前沁出了一层细汗。胡敏的小女儿京京，一个当时才十二岁的小姑娘关切地问：“姐姐，你可是觉得热？”

“是的，是有点热？”我说。

小京京说：“姐姐，我领你去脱衣服去。”

于是，我跟着胡敏的女儿，走进邱会作的卧室。那间卧室并不大，除了一张床，还有一张写字台，外间是个小小的起居间，摆着一张大沙发。我脱下毛衣后，猛然间，看到写字台上的镜框中放着一张林彪的合家照。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因为，那张照片上的两个青年男女，正是引起我好奇，而无法证实的人。

人的行为无论多么神秘，总有疏忽大意暴露天机之时，就象遮天蔽日的阴霾，迟早会云消雾散一样。

回到餐桌上，胡敏问她女儿，带我去哪儿了。小京京告诉她，去爸爸卧室了。

胡敏听了，顿时流露出一丝极不易察觉的不安，但很快又恢复了镇静，从容不迫地举起酒杯。

回到东交民巷招待所，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灯也没有开。我望着冷冷的月亮，缓缓飘逸的流云，听着寒夜里瑟瑟的风声，回想着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但总理不出头绪来。

平静了两天。

在回南京前的一天上午，我到大栅栏，准备买些东西带回去送给我的朋友。

天空飘着细细的雨丝，我独自慢慢地走着，任凭那雨水浸湿着衣服。

忽听有人叫唤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林办秘书郭连凯。他指着不远处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小汽车，说：“张宁，立果要和你谈谈。”

这时，只见林立果从车内走下来，他的一只手扶在车门上，看了我一会儿，才急促地走了过来。

“这就要走了吗？”他握住我的手问道。这是他第一次开口与我说话。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这时，郭连凯已返回伏尔加小汽车。林立果和我并肩而行。

“下次到北京，你来找我。我一定陪你玩玩。”林立果的声音很低沉，并略显沙哑。

我踩着潮湿的马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我清楚地知道，我和他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点，再说，我心理上有一种强大的压力，和他在一起，我是无力承受的。

“你好象很忧郁？”林立果又问。

我抬起头，犹豫地看着他，不知怎么回答他才合适。我心里想：我再也不想到北京来了，就是来也绝不会找他，我们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距离，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我能这样对他说吗？不能！我沉默着。

林立果站住了，他转过身来，站在我面前。他两道浓眉紧紧地拧在一起，非常近地盯着我。见我还是不回答，他反变得尴尬了。僵持了一会，他突然伸出手，轻轻地说了声：“再见。”便跳上了跟随在后面的小汽车。

伏尔加小汽车猛地向前飞驰而去，渐渐消失在蒙蒙细雨中。

哦，北京，你已不再是我昔日向往的圣地了！

10

后来我才知道，此事起始于一九六八年春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驱车前往毛家湾林彪寓所，给林彪和叶群拜年。

林彪抱病接见之后，叶群设宴款待了这批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新春伊始，气候晴朗，和煦的阳光照耀着院中洁白如玉的积雪，衬托得腊梅分外妩媚。

叶群将酒席安排在紧靠花园的正厅里，这样，可以透过西德进口的紫外线玻璃窗，一面把酒叙怀，一面可以欣赏庭院中淡雅清濯景致。

席间，叶群讲她为首长生了豆豆和老虎，自己长期以来忙于工作和照顾首长，无暇顾及孩子。如今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她这个当母亲的却没有精力操这份心，还请诸位多多关心。

那时，林家的政治势力已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叶群讲了这番话，谁不心领神会呢？谁心里都明白，能为林家儿女找到称心如意的对象，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稳如磐石的靠山。人之常情，加上权势之争，一个简单的物色对象的小事竟演变成轰动全国的“选美”事件。

吴法宪当即介绍了几个熟悉的适龄青年。叶群听后，连连摇头，说：“吴司令啊，你介绍的这些小鬼，都是中央干部子女，首长肯定不会满意。我和首长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对首长的脾气最了解了，最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只要根正苗红，长相说得过去就可以了。”

从那以后，黄、吴、李、邱等人，便各自通过种种途径，想方设法为林家儿女婚姻大事

奔波忙碌起来。

中国平民百姓，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通常也有个择偶标准、也有一定的挑选范围。然而，拥有极权势力的人物，互不通气地进行着同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其影响，其波及面是极为可观的。

其实，叶群在说那番话前，林立衡已有了自己的对象。叶群对女儿的意中人极为不满意，始终竭力反对。身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办主任的叶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疑虑心理，她相当嫉妒儿女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实力，叶群采取控制儿女的手段，既不让他们常与林彪接触，又限制他姐弟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以林彪、林立衡和林立果为三点的三角形，而叶群自己则处于三点中间，起着中间环节的作用。待儿女成熟，她又想通过儿女的婚姻控制这对儿女。

叶群曾陪同林彪赴苏联疗养，当时，苏方邀请叶群在莫斯科华语广播电台当播音员。那时，叶群正值豆蔻年华，长得娇小妩媚，她不仅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且还喜欢写诗，曾翻译两本苏联著名诗人的作品，她的音色甜润、待人接物热情而不失风度，莫斯科新闻界人士，给她起了个雅致的绰号——喇叭花。

林彪与叶群结婚后，在爱情生活上十分贫乏。她在怀林立衡时，有一次故意跟林彪撒娇，要林彪倒碗水给她喝，但林彪却冷冰冰地说：“你想喝水就自己倒！”

随着林彪地位不断上升，叶群的地位也直线上升，官至政治局委员。她干脆将无法获得的情欲，转为极端的权欲。她知道林彪极其珍惜这对儿女，要控制林彪，讨林彪的欢心，必须牢牢地控制林立衡和林立果，把他们做为手中的筹码，利用家庭的关系，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自从林立衡林立果姐弟俩离开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担任《空军报》副主编，一个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以后，姐弟俩实际上已成了空军的太上皇，尤其是林立果，根本不买叶群的帐，连林彪了解部队基层的政治思想情况，以及军队基层关键性实质性的问题，一般都从儿女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为此，叶群是十分不安的。

林立衡原先有过恋人，是空军保卫部的一名干部，叶群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林立衡脸型长得象林彪，其他部分酷似叶群，属于娇巧型女性。她身体较差，在北大念书期间，曾因身体有病，中途缓学了一年。

林彪不沾烟酒，平时喜欢吃炒黄豆，遂给林立衡取小名为“豆豆”。

一天，正在病中的林立衡，被叶群叫去，满面怒色的叶群，狠狠地盯着女儿，良久也不说一句话。

林立衡是很畏惧母亲的，她从叶群的表情中，已感到事情不妙，于是，上前想安慰几句，缓和一下这种气氛。

她刚走到母亲身边，叶群便猛地站起来，一掌掴过去，莫名其妙地骂道：“你这个没心肝的东西，把你培养这么大，竟然目中无人了，哼！你别作梦想称心！”

林立衡没有防备叶群的辱骂殴打，她忍住心中的愤慨和悲伤，回到自己房间，将整瓶的安眠药吞下肚去。

幸亏林家的老保姆王淑媛老太太发现了，她连忙喊来家庭保健医生，立即送林立衡去三〇一医院急救，才免于一死。

象类似这样被叶群欺凌毒打，逼得林立衡走自杀道路已发生过多次：一次是她和林立果反对公开选美，叶群不敢对林立果怎么样，便将气统统泄在林立衡身上；另一次，立衡抗议叶群对林彪采取欺骗封锁政策。

保姆王淑媛是位早年丧夫的孤老太婆，她一手将林家一对儿女带大，所以，在林家有一定地位。叶群很少给孩子母爱，母子之间没有感情，林立衡和林立果自懂事后，从来没有喊过叶群一声妈妈，不与叶群谈心，反而与王淑媛谈一些心里话。

身为一个母亲，叶群这种失落感是极重的，竟责怪王老太太，夺去了她自己亲生骨肉的感情。王淑媛挨了骂。也只是忍气吞声，因为她已经老了，还想靠林家替她料理风烛残年后的事哩！

自从王淑媛发现叶群虐待林立衡，心中万般焦虑，以她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可能见到林彪报告实情的，即使偶尔见到林彪，她也不敢讲出实情。她常常象个幽灵，飘忽在豆豆的周围，以防叶群加害。林立衡几次自杀，也都亏了她才及时挽救过来，幸免一死。

王淑媛把林立衡服药自杀的情况告诉了叶群，气还没消的叶群，咬牙切齿地大叫：“让她去死，我才不怕她用死来威胁呢！”但心中又害怕林彪知道此事不饶她，严令林办所有人，不得将立衡自杀情况让林彪知道，而林立衡为了父亲的身体，也从不在林彪面前谈自己的委屈与痛苦。直到林立衡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后，才把自己恋爱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很支持她的自由恋爱。

叶群得知林立衡获得林彪的支持后，表面上不再干涉，而在暗地采取了果断行动。她通知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给林立衡的男朋友做体检，结果，三〇一医院的诊断书上，注出他有性病，已达四个“+”号。叶群拿着已做了手脚的诊断书面见林彪，诽谤说性病患者，怎么可以和豆豆结婚呢？

不久，空军一纸调令，把那无辜的保卫干部，调往西北某原子弹试验基地。

事后不久，黄永胜的夫人项慧芳，在广州军区总院找了张青霖，张是位工人家庭出生的医科大学毕业生。林立衡不敢违背母意，又担心她无止境地选下去，在社会上影响太坏，只好勉强同意和张青霖建立恋爱关系。

张青霖身高一米八〇，长得十分精神，他除了本职医务工作外，还写得一笔好字，对水墨丹青也颇有功底。林立衡同意和他建立恋爱关系后，他便被调到北京，就这样决定了他一生的婚姻命运。叶群授意有关部门，安排张青霖担任了某医学研究单位的领导工作。

叶群实现干预控制女儿婚姻的第一步后，便集中精力，开始了第二步骤，对付比较棘手的林立果了。

11

回南京后，我向歌舞团政委汇报工作，我把经过告诉政委后，问他，派我去北京不是“外调”吗？为什么自始至终也不安排工作呢？政委解释说：“工作已另有安排，见到立衡、立果，不要大惊小怪，是首长关心部队文艺工作，下来了解基层情况的。你不要随便讲出去。”

政委是做思想工作的，他知道自己的话空洞，但他还是重复着自己说惯了的空洞语言。

我觉得自己就象一只漂泊的小舟，返回宁静的港湾。每到夜晚，我就和战友们一起，做着少女们的游戏，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然而，这绝非是林家选美之事已偃旗息鼓，而恰恰是急风暴雨来临前的寂静。

就在我享受着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人生甜蜜时，林立果和叶群在关于我的问题上，已发生了矛盾。实质上是母子俩控制与反控制，明朗尖锐化了。林立果扬言，如果叶群再阻挠调张宁来京，他准备自己到南京来找。叶群又气又恼，但又怕林立果冒然造次，一面恫吓

他：“你敢去，让老和尚（指军区司令员）知道，把你扣起来！”一面赶紧下令，扩大选人范围。

不久，从重庆找到一位长像与我比较相似的姑娘，用来顶替我。哪知，林立果很不满意，胡敏只好把她介绍给三〇一医院院长的大儿子，但是，他家不要，最终还是把人家退了回去。

林立果为对抗叶群的控制，避开吴法宪和他夫人，自己也在空军势力范围内组织选人。名谓选人，实际借此培植自己的亲信和政治势力。

叶群和林立果就这样对峙了三个多月，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叶群自知，如此僵持下去，不但拉拢不了林立果，搞不好，儿子还会造娘老子的反。她权衡利弊，最后采取了妥协的办法。

六九年五月初，我又奇怪地连续高烧，在南京军区总院做了几次检查，也找不到病因。医院通知我，准备住院彻底检查。

从北京归来这段时期，巨蟒常常出现在梦中，巨蟒缠身的恐惧情形，常常使我惊惧从梦中吓醒。

一天清晨，阳光很好，我用军大衣裹着虚弱的病体，在大院里摘了几朵玫瑰花，插在床前的花瓶中，玫瑰花香散溢着整个小屋。刚刚躺在床上，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歌舞团副政委。

“你马上准备一下、上午九时去北京。”副政委站在门口说。

“为什么又要我去北京？”我急切地大声问道。

“不是我们，而是上面下达的任务。”副政委无可奈何地说。

“我身体有病，高烧不退。你们知道我马上就要住医院……”我说不下去了，从我进歌舞团，领导一向宠爱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曲和冷漠，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你不要哭了，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个人不能给你任何答复。”说完，他转身走了。

就在我不知所措之际，我的一个朋友来了。他双手抱着一个大西瓜，兴冲冲地说：“张宁，你瞧，我买了一个西瓜，刚上市的。”见我靠在床上流泪，他愣了。

他知道我有病，一连几天，跑了好多地方，总算如愿买到一个西瓜，想给我降降温。望着他热汗涔涔的脸，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委屈，伤心的泪水象决堤一般往下淌。

他听说领导又要我去北京，气呼呼地放下西瓜，拉着我就往团部去。他要找领导评理，还管不管别人死活。可是现实中哪有道理给他讲呢？

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客观地把我所遇到的事情，告诉他，尽管实质性的内幕难以令人揣摸透，我还是幼稚地遵照组织原则，没有向我亲近的人泄露一点消息，此时此刻更是难以说得明白。

我是一个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这是一条铁的纪律，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歌舞团大院门口，一辆伏尔加小汽车在等着我。车上坐着胡敏的秘书吴瑞云。

小汽车没有直接去机场，而是开到南空司令部，在飞机楼前停下。我走进这座外型酷似一架飞机的建筑，胡敏已等候在那儿了。

我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也不说。胡敏见状，走过来，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说：“张宁，你好象情绪不大好，为什么啊？”

我鼻子一酸，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告诉胡敏，自己正在发烧，马上就要住院治疗，没想到领导上还硬要我去北京。

胡敏听我这么一说，立刻吩咐保健医生，给我注射了一针丙种球蛋白。

“胡主任，这次去北京究竟有什么事？”我问。

“你放心好啦。到了北京，我就带你去三〇一医院，给你彻底检查一下，北京医疗条件好多啦。”胡敏对我去北京的任务避而不谈。

这时，蒋科和歌舞团政委走了进来，胡敏本想做一番介绍，蒋科却摆着手，说：“不必啦，我和她父母都熟悉，我是看着她长大的。”

我说：“蒋叔叔，能不能让我回家一趟，和妈妈打个招呼？”

“这个你用不着担心，”蒋科说，“你走后，我会把你去北京的事，转告你母亲的。”

而事实上，蒋科并没有遵守诺言。我离开南京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始终不见我回家，便找到歌舞团，政委避实就虚地告诉她，说我又去北京“外调”了。

在这段时间，林家为儿女物色对象的消息在上层已有所传闻，引出一些军政界要人送儿女上门的轶闻。树大招风的喻语有道理。而清白无辜的我，置身在非常复杂敏感的政治关系网中，无法根据自己的意志回避躲藏。

我有个同学，长相酷似她位居极品的父亲，富有军人气质，但缺乏女性魅力。林立果随叶群到苏州，她母亲立即携她赶往苏州。林立果发现她们已到大门，急忙跳窗夺路而逃，自己驾驶汽车从苏州直抵上海。我的这位同学——华东地区赫赫显名的女公子，遭到林立果的冷遇，气得她拍着桌子大发雷霆：“他老虎有什么了不起，仗着老子是副统帅，目中就无人了！”

有位夫人知道林立果选中我的消息，也模仿毛泽东掺沙子的做法，在我身上做起文章来。

一天，夫人派车把我接到她家中。在那里，我见到了名噪一时的江苏省造反派头面人物、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曾邦元。曾邦元当时是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候补委员，省学联主席。他那时刚刚二十七岁，头上竟已开始谢顶，脑门很宽阔，很有点少年老成的味儿。

夫人把我和曾邦元互相介绍一番后，我称呼曾邦元一声“叔叔”。

夫人一听，连忙一叠声地说：“怎么能喊‘叔叔’呢？，他才比你大十岁，应该喊曾大哥才对嘛。”

曾邦元显得非常尴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但他不愧是搞政治的，很快就镇定下来。曾邦元性格沉静，在人多的场合不喜多话，外表谦恭和，眼睛看人时总是微微地眯着，说一口浓重的家乡语。

时隔不久，那位夫人为促进三派大联合，在华东饭店设宴，请了江苏“八二七”派，“红总派”，“促联派”，三派头头聚餐。曾邦元让他的那帮弟兄们暗地观察我，为他提参考意见。那天，曾邦元很兴奋，只要有人给他敬酒，他一概来者不拒。

一天夜里，大约在凌晨三点钟，我正在梦中，一阵门铃声把我惊醒。保姆穿上衣服，跑过花园，打开院门一看，竟然是曾邦元。

他说，为了培养自己的胆略和气质，经常在夜间翻越紫金山。他在树林中转了大半夜，想到我家来坐坐。

曾邦元深夜来访，我们全家人只好起来，陪他一直坐到天亮。从那以后，曾邦元经常登门造访。他很健谈，知识面广。我家里人总是客气地陪着他，因他毕竟是那位贵夫人介绍的关系。

曾邦元多次地说，他夜间独自登山，是受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青年时代，常与蔡和森一起，带着煮蚕豆，攀上山顶静坐，磨练坚韧意志。

后来，蒋科问曾邦元，是不是在和张宁谈恋爱。曾邦元既没承认，也没否认。蒋科笑着暗示他：“小老弟，张宁上头已有主了，你要明智些。”

曾邦元是个绝顶精明的人，他完全领会蒋科所暗示的份量。从此以后，他便放弃了对我的追求，再也没有来找我。

那位夫人知道此事后，立即电告叶群，说我在南京已经有恋爱对象，叶群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查问胡敏，胡敏十分恼火，针锋相对地揭了那位夫人的底。林立果更是紧张，急忙安排人，在南京暗中把我控制起来。而蒋科也并没有睡觉，他把那位夫人的全部所为都禀告了叶群。这是南京方面的权威性报告，叶群再无他疑，自此，对那位夫人持续不断报来的有关我的消息，采取了谨慎和防范的态度。

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次到北京，是安排住在邱会作家。第二天，胡敏就陪我去三〇一总院，经过系统的检查，仍然查不出我发烧的原因。

在两个星期的住院期间，我曾两次向胡敏提出出院的要求。胡敏见我态度坚决，只好答应为我请示一下。

在中国，有些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滑稽，一个普通的文艺女兵，她的行动竟然劳驾堂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这一切，就因为这个文艺女兵模样长得漂亮些，而这漂亮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儿子所欣赏。于是，她就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就可以让身居要职者，心甘情愿地为她效劳。

上帝啊，对我真是太优厚了！

一天上午，保健护士通知我做胸透。她们把我领进X光室，把门紧紧地关严。

X光室被暗红的灯光笼罩着，人影映在墙壁上，显得异常恐怖。我脱掉外衣，站到胸透机前。

“请把身上的毛衣和衬衣也脱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为什么要这样？”我惘然至极地问。我知道X线完全可以穿透衣服的，这是每个人都懂得的常识。

“为了减低放射性元素的渗透，便于我们细致地检查，请你协助我们，把衣服脱掉。”还是刚才那个男人的声音。

只好听命，脱下毛衣和衬衫，只穿着胸衣和内裤，就象上芭蕾课的装束那样，十分难堪地接受了这不同寻常的胸透检查。亮灯后，又检查我裸露在外的四肢，看身体肌肤有无缺陷。

当天下午，三〇一医院写出了诊断报告，我无任何疾病，只是体质较弱，可以出院休养。

胡敏得知我身体并无病迹，欣喜地出了长长一口气，亲自把我从医院接回家。

她家客厅里，新添了一大束名贵的法国的玫瑰。我问小京京：“这花是哪儿来的？”

“叶妈妈送的！”小京京骄傲地说，“这束玫瑰花是法国总统蓬皮杜送给叶妈妈的，叶妈妈说，我妈妈这些天辛苦了，用这束花表示点心意。”

我轻轻地抚摸着那洁白如玉的花朵，嗅着那浓郁的馨香，心中不由涌起同病相怜之情，我似乎觉得，自己就和这玫瑰花一样，虽有丽质，但却是断了根的，只能供别人欣赏而已。

几天后，我向胡敏提出工作的要求，胡敏却讲，我现在主要任务不是工作，而是要养好身体。

凡是经过“文革”的人，至今不会忘记当时狂热的政治崇拜，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能够平步青云踏进林家大门，在当时是受许多人羡慕的。我为什么蒙此厚爱反而苦恼呢？这与我成长的环境是分不开的，虽然我幼年丧父，失去了十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自从参军以后，长期受到上至中央首长、下到军区首长以及歌舞团领导的多方宠爱，再加上我所具备的优越的舞蹈条件及典雅气质，使我的人生之路铺满了鲜花。我的一切需求，都可以在自己的基础上获得，无需求助他人，更无需去钻营。世界对于我来说，就象生活在美妙的童话中。我的精神世界离现实生活太远，稚嫩的象朵花，无心伤害别人，也无力保护自己。

当我知道自己是以美色而受到林家青睐后，我真不敢相信，在一片马列主义声浪中，竟会有这样典型的封建主义糟粕死灰复燃。其实见怪不怪，在一片“万岁”声中，中国的一切都被颠倒了。我的自尊和不满，占据了我的全部灵魂。他们丝毫不尊重我的家庭，不尊重我的人格，我就象被软禁起来的囚犯，连封家信也不许写，我若到了花谢香残之时，其地位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幼稚可笑的反抗，当时我只有十八岁，又能有什么经验和能力来反抗呢？只是凭着自己的防御本能，来保护着自己罢了。

一天清晨，我在院里散步，只见小竹林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军人，他的眼睛挺大，白皙的皮肤衬托着适中的身材，此人我在早些天见过，是邱会作的警卫参谋，名叫江水。

江水原是中央警卫团派给邱会作的警卫员，文革初期，邱会作被造反派秘密关押在地下室，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硬是靠江水偷送食物充饥，才保住一条性命。邱会作重新工作后，便提升江水当了警卫参谋，并且内定为总后保卫部副部长。

江水沿着卵石小径走到我面前，看了我一会，轻声问道：“你就是南京的张宁吧？”

我看着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江水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的苦恼，静静地考虑了片刻后，又问：“张宁，你知道你来北京做什么吗？”

我心想，你们当警卫的，机敏得犹如猎鹰，什么事也休想瞒住他们。

江水见我不说话，诡秘地笑了笑，说：“这里不久前也住过另外两个姑娘，不过，她们不象你，整天开心得很，吃得下睡得着，可惜好景不长，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在我之前有两位姑娘作为重点被安排在胡敏家，不到一月体重增加。叶群对胡敏说：“按你家伙食标准她们就这样发胖，我们的条件更好，年纪轻轻，胖得象冬瓜怎么行？”

江水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不过你千万不要象林黛玉似的，真要是病倒了，自己痛苦一辈子，你最好要尽快适应目前这种环境才对。”

江水正欲再讲些什么的时候，邱会作从门厅走了出来，邱会作每天晚上外出办公，早上回来，这已是他的多年的老习惯。江水赶紧跑过去，陪着他做清晨散步运动。

我心中对江水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我最苦恼、最孤独、最失望的时候，给了我一种特殊的安慰和鼓励。

第二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忽听走廊上传来一阵低低的脚步声，我知道是江水回来了，便悄悄地打开房门，站在走廊上。

江水见我站在那里，估计到我一定有什么事想找他，便一个闪身，来到我的卧室内。

我连忙也跟了进去，并迅速反身关上房门后，问道：“江水，你一定知道我到北京来做什么吧？”

他想了一下，说：“有点数，但究竟是干什么，我也不一定说得……”

“请你把真情告诉我吧。”我对他说。

江水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后，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说：“你要知道，‘老虎’会吃人的。我劝你还是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完全听得出来江水话中的意思，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这我早已就听说过了，然而，我对他的这番好意，只能报之一笑。一只关在牢笼中的小羔羊，其命运还属于自己吗？

经过和江水的那次谈话，我的心中尽管很悲观失望，但仍然凭着自己的可怜的力量，和胡敏他们闹开了“绝食”。胡敏家的伙食虽然并不十分丰盛，但从营养学方面讲，搭配得很好。我因搞舞蹈专业保持体形，长期食素，固定饭量，一点油腥也不沾，此时的心情又不

好，食欲就更差，每天仅吃一些从院中采摘来的野苋菜和香椿，主食每顿吃一两，所以，身体越来越糟糕。

胡敏为此很是焦急，因为林家嫌我瘦弱，胡敏常常责怪我，再不增加营养，恢复体质，就会影响我的前途，并说什么我是属于苗条体形，再瘦下去就不好看了。

我当然知道胡敏讲的“前途”意味着什么，我丝毫不想希望有这个光明的前途，最好是有道万丈悬崖，永远隔断这条通往深渊的魔道。

13

一天深夜，胡敏把我和她的女儿小京京喊起来。

“张宁，你抓紧时间梳洗一下，马上带你去首长俱乐部玩玩。”胡敏显得很兴奋。

我一面揉着困倦的眼睛，一面说：“胡主任，我实在是累了，今天就不去了吧！”

胡敏笑着说：“哎，去那里玩玩，散散心嘛。”

我不好再说什么，匆匆穿好衣服后，便随胡敏以及她的女儿小京京，驱车前往林彪寓所毛家湾。

毛家湾座落在中南海后面，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别墅庭院，内有花园、以及地下车库，单建筑面积就达两千八百平方米。

汽车驶入毛家湾大院后，我看院内停有十多辆豪华卧车。起初，我以为中央首长正在此处开会，后来才知道，林家总共拥有十六辆小汽车，林彪和叶群每担任一个职务，就配备一辆小车，另外，还有几辆是外国元首送的。

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甫，把我们引入一间大客厅。李文甫是个五十来岁，干瘪瘦弱的老头儿，他从解放初期就担任了这个职务，对林彪的一切行动负全部责任。

大客厅的四周，挂着墨绿色的帷幔，地上铺着紫红色的地毯，帷幔前是墨绿色沙发，中间有一张墨绿色乒乓球桌。

他说：“你们先打打乒乓球吧。”

小京京一听说可以打乒乓球，顿时来了精神，拿起一只球拍塞到我手中，说：“姐姐，来，我们打一局！”

我想，反正闲坐着也无聊，便与小京京打起球来。几个回合打下来，我猛然发现帷幔后有人影在晃动，仔细一看是林彪。我以为他到俱乐部来走走，与我无关，便仍然打我的乒乓球。

这时，林彪的马列秘书李春生拿来一盒纪念章，他指着一排用贝壳雕成的领袖像，说：“这是海防前线战士送的，你仔细看看。”

李春生说着，拧亮了高擎在手中的一盏台灯，强烈的光线，刺得我眼睛发胀。我不知道李春生给我看领袖像目的。其实，在帷幔的后面，此时林家的各色人物正在翘足观望，毛家湾的主人，对于将来加入的新成员，怎可不极为慎重地加以鉴别呢？这就象为我做胸透检查时，借故让我脱掉遮体的衣服那样，而现在是在强烈的灯光下再次故伎重演罢了。

从毛家湾回来后，天色已经微明。我迷迷糊糊地睡了整整一个上午，才醒过来。

下午，林立果开着汽车来到邱会作家，见我睡意仍然未消，打趣地说：“我就知道你准定要睡一上午，你的体质太弱，要加强营养和锻炼，别再服用安眠药。意志要坚强，学会控制自己。我每天晚上十点休息，再大的事情也放得下，思想上筑一道长堤，第二天就能精力充

沛的工作。”

胡敏在一旁敲着边鼓说：“张宁，‘老虎’可是难得有此雅兴，你就陪他一道玩玩吧。”说完，便让出了起居间，留下我们俩。

我知道林立果来是为了联络我们之间的感情，可是，我就是没有话题与他聊，老是沉默着。林立果问我为什么总是不开口说话？我说：“听你讲。”林立果一听我这么说，反而愣住了，因为，他自己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俩就这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默默地坐了好一阵。

晚上，胡敏安排我们去看杂技演出。

我们刚到剧场，演出就开始了。林立果坐在我边上，他根本无心看演出，侧着头打量着我，弄得我心里忐忑不安。下意识地把身体往另一边挪了一下。

林立果见状，先是一怔，随即又无所谓地笑了笑，指着舞台侧面的字幕，问：“你看，字幕上写的是什么？能不能看清？”

我点点头。

“那你念给我听听，可以吗？”林立果说。

字幕上写的是：请××到后台去找我。但由于心情紧张，我把“找我”念成了“找找”。

林立果听了后，噗嗤一声笑起来：“你的眼睛是有点近视。”

许多职业演员，由于被舞台灯光照射，都有散光而引起的轻度近视的职业病。叶群为此，挑剔过我这个毛病。他说：“张宁是个近视眼，将来怎么能代表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参与世界性的政治活动呢？”

我不奢望这种非分。林立果让我戴眼镜，我便在军装口袋里取出眼镜，戴在眼睛上。

林立果看了一下，说：“你戴眼镜也很好看。”

演出结束后，林立果把我送回胡敏家，晚餐后，胡敏提议玩玩扑克牌。林立果见我不置可否，还是沉默，便起身告辞了。我听到他在门口上车时，小声地交待胡敏：“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早上，胡敏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坐在办公桌前，阴沉着脸，冷冷地看了我好一会，才让我在她对面坐下来。

“你不是一直要求工作吗？”胡敏说，“总后准备成立一个文工团，调你来北京，就是要你负责物色一些演员，可你一直闹思想情绪，张宁，不是我要批评你……”

一听说调我来北京，是负责招收演员，我积郁在心中的愁云，顷刻间便被这阵风吹散了。我说：“胡阿姨，你要批评只管讲，我还以为，是哪个……哪个……”我的脸嫣然一红，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你呀，到北京这么些日子，我才第一次看见你的笑脸！”

第二天，我就坐上了西行的列车。第一站到太原。与我同行的还有胡敏的秘书吴瑞云，以及总后门诊部的一位小护士，她是专门派在出差期间陪伴照顾我的。

驻防太原的××军领导，对总后成立文工团非常重视，专门开了个规模很大的座谈会，军师级干部统统到会，表示尽全力给予配合。

在太原物色了一个星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们便往西安市，在西安的几个学校和文艺单位我发现了好几位有培养前途的姑娘。但吴瑞云看了之后，表示不行。我说：“这次招收演员，业务上明确由我负责，而你只管政治审查。”

吴瑞云却说，那几位姑娘条件是不错，但脸模太一般化了。

我感到十分纳闷，舞蹈演员关键在于专业条件和身材，至于脸模，经过化妆是可以弥补

的，并且，这些女孩子都挺漂亮，根本不象吴瑞云说的太一般。

一天晚上，我去找吴瑞云，准备再与他据理力争一番。上楼后，见房门半敞开着，只听吴瑞云说：“没有一个长得象张宁。”

无意中灌进我耳鼓的这句话，使我的心犹如被钢针猛扎狠狠“原来，胡敏派我来物色演员是假，而以我为基本原型，继续扩大选美是真”我恨自己太愚蠢、太天真了，轻易地上了胡敏的圈套，干起了坑害其他善良无辜姑娘之事”

“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证实了我的猜测。那次西北之行，叶群、林立果有两种目的：第一，摸清张宁的准确态度；第二，根据我的形象气质，另外物色几个温顺些的姑娘。

第二天，吴瑞云察觉到我情绪反常，就把我叫去，给我大讲“楚王爱蜂腰”的历史典故。我听后正色对他说：“请你转告胡主任，我本人无力胜任她的重托，我要回家去！”

“可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嘛。”吴瑞云见我态度坚决，便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

“吴秘书，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回北京，把我的要求转告胡主任。”

“张宁，你不要感情用事嘛！”他双手一摊，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我又气又急，脸上感到阵阵热辣，“你如果真不打电话，那我就自己走，我身上有钱，足够买车票回南京！”

他见我的脸色胀得通红，半开玩笑地说：“你跑，就用绳子把你捆起来！”

“你敢！”我积都已久的怨气乘机发泄了出来，“你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自己长得不好，还到处挑选人家，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他见我真发了脾气，生怕事态扩大，弄出什么意外来，自己不好向胡敏交待，只好拨通了北京电话。

胡敏在电话中指示他：稳住张宁，先放她回南京。把临潼选的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带回北京。

离开西安的时候，吴瑞云有意安排那位从临潼选来的姑娘，与我见了面。那姑娘长得清丽秀美，两只眼睛惊讶而羞涩地看着我。吴秘书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想有意引起我的妒忌之情，借此报复我对他的不恭。可是，这不但没有对我产生丝毫刺激，反而使我对她倍加同情。我知道她为什么去北京，等候着她的将是什么，而她却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近那黑暗的深渊。

雨哗哗地倾天而降。我像个获释的女囚，拎着行李来到火车站，当列车嘶鸣着，缓缓地启动时，我望着车窗外蒙蒙的雨帘，禁不住眼泪楚楚而涌。

我这漂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孤零零的小舟，终于要回到港湾了！

14

回到南京后的第二天，还未容我喘口气向领导汇报外调执行任务的情况，蒋科来到前线歌舞团，把我狠狠地克了一通。

“听说，你在北京不安心工作，还闹情绪？”蒋科背着双手，望着窗外问道。

“我，我只不过……”我刚想解释，他猛地转过身子，手指敲着桌子说：“只不过什么？！邱部长和胡主任对你很有意见！你能够到北京，到首长身边工作，是南京军区和江苏人民的光荣，多少人想去还去不了哩！”

我低着头，一声不吭，用沉默来对抗，用沉默表示内心的不满和愤慨。

“你呀，太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期望了！你去北京，上面对你抱很大希望，你知道不知道？”蒋科说着，又转过身去，沉思了片刻后，说：“你可以走了，回去以后，不准泄露北京的事，这是国家机密，泄露出去要严肃处理，就连你母亲也不要告诉！”

从蒋科那儿出来后，顿时感到全身异常的轻松，我自以为绑在我身上的桎梏已经解去，上面再也不会麻烦我了。那个临潼小姑娘比我长得好，可以顶替我的位置。

歌舞团的战友们，听说我从北京回来了，都跑来问我去北京做什么了。我说，总后要成立文工团，请我去帮忙物色演员。大家听说是这么回事，都不由地松了口气。因为歌舞团上上下下早有传闻，说张宁此次北京之行，是爬着云梯上青云。

在经历了这场“变故”（如果也能称之为变故的话）之后，我的心境是难以名状的。我急于摆脱那种境状，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还有一个早已萌动在我心底的隐秘，其实这在团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爱上了团里的一位演奏员。他是一个极为平常、普通的人，家庭出身贫寒。对此亲朋好友不理解，团里也有不少非议。尽管压力很大，但我没有改变初衷，向他奉献着一个少女纯真的恋情。此行北京，别人怎么看，我都可以不在乎，唯恐他在感情上受不了，谁知，正在我急切地想见他的时候，团领导决定他转业。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焦急万分，我责问歌舞团政委，“他是艺术院校毕业生，目前团里只有他这一支双簧管，业务上急需的人，为什么要他转业？”

政委转弯抹角地暗示说，要他转业，并非歌舞团的意思。越听他往下说，我的心越感到收缩抽搐的厉害。我精神好紧张恐惧的官能症的病根，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谁能知道我这难以言喻的痛苦呢？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对手是谁，而又无法求助任何外界帮助。这样的潜在政治高压，足以在精神上、肉体上彻底摧毁一个人！惧怕、迷惘、心理上的逆反，从十九岁那一年就紧紧与我缠绕相随，从精神上慢慢地吞噬着我。

我明白在他的转业问题上，明摆着存在着一种交易。牺牲他还是牺牲我，并不是问题的焦点，我知道自己再也逃不出这个极权的圈子。在选人的问题上，他们看不上的人，任你多大政治权势也休想钻营进去，被他们看上的人，任你费尽心思也休想逃脱他们的控制，并非个人意志能决定的。我对政委说：“如果他转业，我也一定要转业离开！”

政委仔细地想了一下，说：“胡主任来电话，叫我做你的工作，我说，你这孩子不好说话，张宁啊，你让我为难哟！”

“政委，你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你……难道就……一点也不……不……不同情我们吗……”我哽咽着，眼眶中满是泪水。

“张宁，你别这样嘛，”政委见状，忙说：“假如领导上同意他留下来，你必须答应组织上的三条意见。”

“你说吧，政委。”我明知是一种交换，但还是一面抽噎，一面点着头。

政委语调沉缓地说：“第一，不准继续和他谈恋爱；第二，不许和他再有任何接触；第三，相互之间不许谈北京之行内容。”政委停了一下，又说：“如果这三条你可以做到，上面的工作，由我去做。”

我惶恐不解地问他：“这是为什么呀！”

政委说：“张宁，你已经长大了，你是烈士子女，从小在部队长大，党培养你那么多年，阶级立场要鲜明，这是政治问题。千万不要糊涂。有许多问题我也说不明白，但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在与他的关系上，你要认真考虑，

我这个当政委的，呵，不，是当叔叔的，只能对你讲到这一步了……”

当天夜晚，我们相约来到小红山脚下。那天，天空阴霾，没有月光，没有星星，只有瑟瑟的凉风，吹过山谷，不断地发出沉重阴森的松涛吼声。

他的神色也和这夜空一般，显得十分沮丧。

在一株古老的大树下，我们站住了，彼此相峙而立。

“张宁，你也许已经知道了，领导上通知我做好转业的准备。”过了片刻，他终于打破这痛苦的沉默。

“我已经听说了。”我轻轻地答道。

“在团里将近十年，业务上正趋于成熟，可是，唉，完了，今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心中惶然的命……”他的声音抖颤，语无伦次。

“我已找过政委，跟他谈了你的事，政委基本上答应，可以考虑留下来……”

他痛苦地摇着头，说：“这不可能，不可能了……”

“有可能的。”我心情沉重地握着他的手，说：“据我所知，宣布你转业的原因，大概和我有点关系。”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他木然不解地望着我。

“你就不要再问了。”我迎着他的目光，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就可以留下来。”

他迷惘地问：“什么条件？”

我努力地镇定了一下情绪，把政委的意思，如实地告诉了他。

“不！不！”他愤愤地大声吼叫着，痛苦地将头顶在树干上，发着狠说，“在事业和爱情上，我宁可不要事业，也要获得爱情！”

他的脸部肌肉不断痉挛着，一脸痛苦。那是一种男子汉的痛苦，一种预感到自己能力达不到、无法挽回的痛苦！

我无声地抽泣着，说：“你别难受，别难受呀！我喜欢你，但我更希望你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你怎么不想一下，又要事业，又要爱情呢？我们可以秘密地爱，只要不被他们发现……”

一滴温热的泪珠滴在我的脸颊上，他拥吻着我，透过那颤栗的身体，我凄楚地感到，我劝他的话全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从那之后，我们的接触被监视得很紧，我们表面上断绝了往来，相互之间把感情藏在心里。不久，林彪的保健医生王××在蒋科的陪同下，专程来歌舞团看望我，对我的睡眠、饮食提出了许多要求，希望我养好身体，增加体重。

在北京方面，胡敏与叶群为选人之事，频繁电话往来。江水出于关心，从未放弃警惕，他利用工作之便，常常跑到机要总机室，和电话员闲聊，甚至，代替那些麻痹大意的电话员值班，最后终于被他偷听到叶群和胡敏的电话。胡敏告诉叶群，她又在四川找到一个女孩，头发像张宁，并同时酝酿正式下调令，强行调我到北京的计划。

江水十万火急地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千万不可放松警惕，北京方面没有放弃我。

我真诚地感激他，心里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情。我想，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

在南京方面，由于我一直不能够把去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我的男友，他从不可理解，终于变成了责怪，认为我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对他不忠诚，甚至赌气硬要我解释清楚。

他这么做，大大地伤了我的心。尽管我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却又不能向他做任何解释。因为，告诉他真情，就等于害了他，谁都不难知道，在那个年代，政治上的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微妙尺度，谁也难以把握。为了不把他牵连进来，我硬着心肠不再理

他，我坚信，总有一天，事情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为了有效的控制我，防止发生其他追求者出现在我身边，上级以清查“5·16”为借口，调全团去远郊，与外界隔离，断绝一切通信往来。同时对我采取更严谨的防范措施。

中央军委办公厅在一九七〇年八月，正式下达调令，调我去北京。

邱会作的警卫参谋江水，获知这个绝密消息后，立即向邱会作请了探亲假，谎称他河南老家的父母亲有病，盼望孩儿能回去看看。邱会作仍然被他这位忠臣蒙在鼓里，而敏感的胡敏表面上不动声色，满口答应了江水回家探亲，却在暗地中派人进行跟踪。

江水买了到南京的火车票，急匆匆地赶来，准备把情况告诉我，以便做好应急准备。但是，他这位专职保卫干部，邱会作的救命恩人，作梦也没想到，自己早已落入胡敏设下的圈套。江水刚刚走出南京站，一辆北京吉普车，已“恭候”他多时了。

江水被带到军区第二招行所，被好好“招待”了一番。面对现实，江水破釜沉舟，坚持要求面见我。但政治部和前线歌舞团对我的行踪封锁很严。第三天，他便被押送回北京，不久，被定为泄露中央机密的现行反革命，遣送贵州秘密关押起来。

江水被迫害之后，邱会作和胡敏一面向叶群检讨，一面指示南京方面，迅速调我进京。

一天，政委把我叫去，才进门，政委迎头就打我一个措手不及，问：“你知道江水是什么人吗？”

我心头一紧说：“知道，他是邱会作的警卫参谋。”我真担心江水为了我受到连累。

政委气得直摇头：“你真糊涂哟！他是现行反革命！”

政委的话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暗想那位白皮肤、大眼睛的小伙子，怎么变成现行反革命了呢？

于是，政委把江水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行讲了一通，而江水到南京来的情况，对我却避而不谈，实行封锁，并正式通知我，准备调北京工作。

我听到这个决定，就愣住了。我恍然大悟，江水已为我遭受到政治上的重大迫害。我失声痛哭起来。我内心下决心，再见到林立果，一定要把他错误纠正过来。

过了两天，我把自己一头乌黑发亮的受林立果欣赏的长发剪去，留着齐耳跟的短发，只差毁容了。政委吃惊地问我为什么剪头发！我毫不掩饰地对他说：“我真想剃发修行。”政委生气地训斥“真是胡闹！”

我又要走了……

那天，一辆吉普车把我、还有妈妈送到火车站。月台上人流如潮，我独自依在一根水泥柱上，茫然地看着四周，耳边回响着蒋科的训斥：你任性胡闹，把上面的全盘计划都打乱了，这次去，一定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再不知好歹，就要严肃处理你！不要为了自己的个人问题，让全家替你背政治黑锅！

送行的只有歌舞团的老公务员鲁师傅。事后，我才知道，为了调我，北京与南京闹得很不愉快。北京下调令，南京不放人，北京那位夫人硬调，南京这位夫人硬卡，你们要张宁，我偏不给！南北拉锯，一个是第二夫人，另一个是华东地区的女太上皇。最后，叶群亮出林彪，扬言要向首长汇报，南京这位夫人才不得不同意放我。这么敏感的利害关系，谁敢出头露面来为我送行呢？

当我含着眼泪心情沉重地慢慢地跨上蓝色的列车，命运便从这个时刻，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火车嘶鸣着，那沉闷的吼叫，回旋在蒙蒙的雨雾中，是那么凄楚，仿佛是一支生死别离

的哀歌。

呵，妈妈！女儿要走了，今后，当您思念女儿时，就朝着北方，朝着天空，喊几声“宁子”吧……

15

第三次到北京，胡敏把我接到七机部东郊招待所。她一再关照我，为了安全起见，不要随便外出，如有什么事，一定要先打电话通知她，同意之后，方可行动。

招待所的环境优雅，房内设施清净舒适，但我却象重新回到牢狱的女囚，感到羁绊缠身。

胡敏说：“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对你很关心，专门研究了你的情况，叶主任说，中央首长的夫人，大都是搞过医务工作的，鲁迅的夫人也是学医的，因此，建议你改行学医。”

我苦笑一笑，说：“胡主任，我父亲临终时，就留下希望我学医的遗愿，现在既然组织上这么考虑，那我就学医吧。”

胡敏接着又说：“老虎对你很有感情，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姑娘，他都不中意，唯独迷上你了！”

“可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太大，没有一点感情基础呀！”我忧心忡忡地说。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胡敏说，“叶主任已为你选好了两处学习的地方，一是北京三〇一医院，一是石家庄军医学校，去什么地方，由你自己决定。”

我已是笼中之鸟，身不由己，既然可以学医，不如先学着，这样至少可以拖一段时间，我考虑了片刻，说：“感谢首长对我的关心，那我就去石家庄军医学校吧。”

胡敏一下就看穿了我的心事，笑着说：“你呀，真是太鬼了”石家庄那么远，我也不好照顾，依我看，你就在三〇一医院吧，人在北京，跑起来也方便些，也便于和老虎培养感情。”

我知道胡敏这种劝说就是软性命令，便不再申辩什么了。几天之后，我就搬到三〇一医院，住在一幢工字型的小楼里，胡敏又专门为我配了一名保健医生。

三〇一医院办的医训班，总共十多人，大多是有多年临床经验但没有学历的医务人员，这其中包括刘伯承的儿媳妇等一些人。

第一个星期天，院长金乃川把我请到他家，详细询问了我的饮食、睡眠、以及学习情况。我当时虽然和医训班的人同一伙食标准，但另外配了保健药，那些药品绝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据保健医生讲，这些药品当时是非常昂贵的，这种待遇是政治局委员享受的。

金乃川又问了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情况后，告诉我说，林立果等一下要来看我。

一听说林立果要来，我的心不由地又紧缩起来。

不一会，一辆天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高速驶进大院，在门厅前嘎然而停，只见林立果和空军办公室主任周宇驰跳下车来。

金乃川见林立果来了，忙迎了出来，恭敬礼貌地伸出手。

林立果伸出一只手，与金乃川握了握，略做寒暄之后，便大步走进了客厅。

门轻轻地关上了，客厅里只有我和林立果。

我端坐在沙发上，极力使自己保持镇静，而他却靠在窗前，一动不动地望着，观察着我外形上的变化。

客厅里的大摆钟，在嚓嚓地跳动，似乎在嘲讽这令人难堪的气氛。

这样沉默了好一会，林立果终于打破了僵局，说：“张宁，为什么我和你每次见面，你总是没有话讲？难道说，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的头发为什么剪掉？”

我不置可否地保持着沉默。

林立果似乎已预料到我的反应会是这样，便从口袋里取出一架微型照相机，说：“算了，不谈这些吧！来，我给你拍几张照片。”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的摄影技术还凑合，拍出来的相片保证让你满意。”

他一面说，一面把我拉到窗前，自己退到客厅的中间。见我脸上毫无表情，说：笑一点嘛，你这么板着脸，好象我在欺负你似的。”

近一年没见面，我发现林立果变了，言谈举止不象原来那么腼腆含蓄。

我只好勉强笑了一下，于是，他揿下了相机的快门。

“我看，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林立果收好相机说。

“去哪儿？”我问。

“到周宇驰家去，你看怎么样？”他见我没有表示反对，便将周宇驰喊了进来，说，“宇驰兄，我们一起上你家玩玩，你看怎么样？”

周宇驰和林立果的关系非同一般，在空军内部，只有周宇驰敢和林立果称兄道弟。周宇驰考虑了一下，说：“我看最好还是请示一下叶主任为好。”

林立果听了后，满脸不悦地往沙发上一靠，说：“好吧，省得她又要犯疑心病，这样吧，你马上打个电话给叶主任。”

于是，周宇驰拨了个电话到毛家湾，叶群在电话里同意带我到周宇驰那儿去。

从金乃川家出来后，由林立果开车，他一面驾车高速行驶，一面拧开车内的音响。一阵节奏迅速，旋律疯狂的音乐，充溢在小卧车内。

“你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亲爱的文艺战士。”林立果开着玩笑问，想调节气氛。

“我不知道。”我说，“这种音乐，从来也没有听到过。”

“这就是美国的摇滚乐，风靡当今全世界！”他揿着喇叭，说，“这么好的音乐，竟然不允许传入中国，咱们那位文艺旗手，简直是个下里巴人，荒唐！”

周宇驰拍了一下林立果的肩膀：“老弟，言语不要太过分，注意些影响。”

“过分？”林立果鼻孔哼了哼，“总有那么一天，我要让那个旗手知道我的厉害，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音乐存在！中国，太夜郎自大啦！”

汽车开入一座大院，在一幢灰色小楼房前停下。那是一幢二层楼，楼下是车库，一个小战士持枪守卫在人口处。

周宇驰把我们带到二楼一间小客厅，便退了出去，并且将门反锁上。

这里的环境十分幽静，幽静得令人可怕，我好象置身与世隔绝的宇宙飞船，心中卜卜地不安。

林立果托起我的手，商量地说：“张宁，你看我们结婚怎么样？”

“不！”我惘然地望着他，“不，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再说，我刚到医训班学习就结婚，恐怕影响不好，反正学二年就结束了。再等些时候吧。”我用堂而皇之的理由自卫着。

林立果显得很失望，松开握住我的手，仰面靠在沙发上，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张宁，你不了解我，不理解我，我都不怪你，我们确实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你为什么要故意人为地将这距离扩大，而不是缩小呢？”

我无言对答。

“你要知道，人是有感情的，老是这样下去，我是有点受不了。我尊重你的感情，才屡次同意你返回南京的要求，叶主任想另找其他姑娘替代你，可是，偏偏我心中的天平，始终偏爱着你。尽管别的姑娘也很漂亮，但言谈举止、修养气质与你相差甚远，怎么也激发不了我的真情。唯独你，使我久久地难以忘怀！叶主任对我控制得也很紧，什么事都要向她汇报，连我的汽车上都装有传呼机，到哪里她都呼叫，我的行动瞒不了她。我很少有时间呆在北京，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和你好好谈谈，你为什么总也不开口说一句话呢？”

一缕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微闭着，浓密的双眉紧锁着。

“你希望谈些什么呢？”我细声地问。

“当然是关于我们俩的事。”林立果语气忧愁地说：“你也一定知道，为了我的婚姻问题，叶主任确实花了不少脑筋，这其中，也有不少人心甘情愿地鞍前马后地效力，图些什么？当然，家里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本身的态度。”

“我只觉得自己……”我鼻子发酸，两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我的委屈和忧郁他一眼就看出，他很尴尬，但又不能不继续谈下去。

“尽管你的态度，使叶主任很反感，但她还是迁就了你。”林立果做了个深呼吸，又说，“这完全是由我对你的态度始终如一，所以，我以为你的顾虑是不需要的，关于这一点，你今后一定可以得到证实。”

“可你总要给我一段时间吧！”我说。

林立果笑了一下，说：“那当然可以，我这个人从不勉强别人的感情，因为，我知道感情这个东西，虽无形，却很珍贵。我自己，还有我姐姐对叶主任，就根本没有感情。从我懂事到现在，姐姐和我从来没叫过叶主任一声妈妈。”

我听着他诉说自己的不幸，心里却想着江水的下落和处境，我突然提了一个冒犯他的问题：“你们把江水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林立果尴尬地沉默了一会，支吾地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不过，我可以帮助你过问解决一下。”林立果盯视我一下，反击地问道，“听说，你和江苏的曾邦元谈过恋爱？”

我摇了摇头，说：“没有的事。”

林立果诡秘地笑笑：“江苏有我的耳目，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他说着，从沙发边拿起一瓶汽水，将瓶盖打开后递给我。

我摇着头说：“我从来不喝冷饮料。”

他赌气似的一口将整瓶汽水灌下了肚。

这时，我才发现，客厅里每一只沙发旁边，都放着一箱汽水，而且都是进口的。

他将身体挪得离我很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我紧张极了，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

“你好象很热？”他轻轻地问。

我说：“是的，有些热。”

“那你就把衣服脱掉吧。”林立果体贴地说着，就欲为我解衣扣。我不意识地将身体避让开，他愣了一下，慢慢地把放在我肩上的手收回去了。

这时，周宇驰进来了，他说，午饭已经准备好了，请我们下楼用餐。林立果望着周宇驰，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跟着周宇驰走下楼来。

餐桌上摆了中西两份食品，林立果吃西餐，除了面包和苏联进口的鱼子酱外，其它什么

菜也不吃。

饭后，周宇驰又抱来一个西瓜，他刚要用刀剖开，被林立果挡住了：“宇驰兄，帮忙弄盆热水来。”

周宇驰望望我，又望望林立果，不解地站在那儿发愣。

“我自己从来不喝开水，人家张宁从来不吃冷东西。”林立果友善地用拳头击了一下周宇驰的肩膀：“只好有劳你，把西瓜用热水泡一下，谁让你是主人呢？”

午饭后，我们三人返回楼上，周宇驰拿出许多相机、电话、录相机、报话机等摆了一桌子，夸耀说这都是林副部长的杰作。说他是天才。林立果不动声色地望着我，因为我不懂这些，所以，仍然平平淡淡，无任何新奇之意。林立果朝周宇驰摆摆手，周宇驰下楼去了。因为紧张，我的胃疼病又犯了，坐立不安，冷汗沁满额头，林立果慌忙扶我进卧室，躺在床上，自己跑下楼冲了一碗热桔汁端上楼蹲在床边上喂我，我突然觉得他如果围上肚兜，带着白帽很象一个厨师，心头一乐，胃痉挛竟好了一半。我们又回到客厅坐下，相对无语。周宇驰又上楼来伏在林立果的耳朵边，低声说：“时间不早了，回去太迟，叶主任要不放心的。”

林立果想了一下，站起身来说：“好吧，张宁，我送你回去。”

临上车时，我又一次回过头，仔细看了一下这幢地处偏僻，充满神秘色彩的灰色小楼，问周宇驰：“怎么没有看见你家里人啊？”

周宇驰和林立果交换了一下眼色，同时笑了起来。

16

从那以后，差不多每隔一两天，林家就要用车把我接到毛家湾。每次去，都要看一两部电影，内容大多是外国的战争片。看了这些电影，我夜里睡不好觉，脸色显得很憔悴。林立果知道这个情况后，再看电影时，便换了欧洲故事片。

毛家湾有一个家庭放映室，大约八十平方米，放影设备是从西德进口的，光源十分柔和，一点不损伤眼睛。

与林立果接触的次数多了，我对他的品行也有了大概了解，由于他没有再提那令人难堪的婚事。同时，他也比较尊重我的人格和感情，所以，彼此反而渐渐消除了陌生感。

有一天，叶群又把我接到毛家湾看电影，那天，来的人很多，有空军的一帮要员，胡敏和她的大儿媳妇，另外还有林办的几位工作人员。

叶群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放映前提议大家活跃一下气氛。空军那帮人带头起哄，要林立果先出节目。

林立果坐在沙发上，斜着眼睛不动声色地望着大家。

叶群见状，很不高兴，说：“大家请你出节目，你就出一个，不要扫了大家的兴。”

林立果轻蔑地哼了一声，说：“宇驰兄，你替我代劳吧。”

周宇驰害怕林立果再让叶群下不了台，就给大家讲了个怕老婆的故事。他很有表情地划着：“有个凶婆娘把男人打到床下，众人来劝，让他爬出来，那汉子正色道，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大家哈哈笑一通。

周宇驰讲完后，请胡敏接着说。胡敏也不推辞，站起来说：“宇驰讲男人怕老婆，我讲山西人爱吃醋，有一回，我去山西，满街都是醋味，就连火车都带醋酸味。”

叶群笑着问：“火车怎么会有醋味？”

胡敏嘟哝起嘴，模仿火车“丝——滁——丝——滁——”的声音，很象山西人讲“吃醋”的口音。

大家被她逗得咯咯直笑。这时，林立果忽然提议，让邱会作的大儿媳妇出一个节目。她当时正怀孕，腆着隆起的大肚子。林立果点她出节目，显然是要出她的洋相。他俩过去是同学，很熟悉。

哪知她非常大方，爽快地站起来，一只手捏住鼻子，一只手放在隆起的肚皮上，模仿起吉他歌手的样子，她边弹边跳，那捏着鼻子发出的嗡声，还真象吉他琴声。

她诙谐而幽默的表演，赢得了一片掌声，叶群笑得最开心，不住用手帕擦着泪水。

她走到林立果面前，说：“林部长，咱们是门外汉瞎凑热闹，还是请张宁来一个吧。”

我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林立果，好象在这个场合，他成了我的保护人。

林立果面无表情地将视线投向叶群，全场顿时噤若寒蝉，叶群佯装不知，对我说：“大家让你出个节目，千万别拂了大家的心意。”

林立果神情冷冷地看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们母子之间争夺利益，把我夹在中间，真要把我撕成两半了，我不知道靠哪一边才能缓和他们的矛盾。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矛盾性质也不是我能够缓解得了的，我只不过是件可怜的牺牲品。我害怕他们母子为我一个节目又搞得不愉快，便偷工减料地跳了一段新疆舞，总算应付过去了。

叶群让我在她身边坐下，连声说：“很好，很好，到底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跳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这时，工作人员端来一盘水果，叶群有意拉拢的说：“张宁，你也是这里的主人，就由你来招待大家吧。”

我端过水果盘子，依次分发。当我把一个苹果递给林立果时，他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道：“你跳得很好，比在舞台上演出还棒。”

我奇怪地问：“你看过我的演出？”

林立果解释说：“我是看的剧照，从你们歌舞团资料室调来的。”

那天放了一部法国故事片，片名叫《宫廷爱神》，讲拿破仑的妹妹，如何借以姿色，利用政治联姻，帮助拿破仑巩固地位。电影中有不少镜头暴露得很厉害，但演员的表演相当出色。这部片子起初是江青看的，江青认为很好，就推荐给叶群。

叶群对我说：“资本主义国家拍电影，是属于商业性质的，总要有些裸露镜头，我们主要是看政治背景，研究人家的表演艺术。”

一天，林办通知金院长，说首长要接见他和政委。金院长非常高兴，换了套簇新的军装，拖着我一起去了毛家湾。

李文甫把金院长等人带到客厅，刚坐下，叶群就来了，她叫金院长他们先等候在那里，把我带到了林彪的客厅。那间客厅里放着三张紫红沙发，地毯和窗帘也是红的，一张巨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

林彪正襟危坐在沙发上。叶群把我带到他面前，说：“首长啊，张宁来看你啦！”

面对这位声名显赫的副统帅，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我不知怎么，觉得他很可怜。他简直就象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我这么纤弱的人，一伸手就能推倒他，他比我还差没有气力。”

我轻轻地说了声：“首长好！”

林彪看了我几秒钟后，幅度极小地欠了欠身体，嘴上露出一丝极其不易察觉的笑容。

叶群又说：“首长，总院的人来了。”

林彪听了后，双手撑住沙发的扶手，吃力地站起来，叶群连忙上前一步，托住了他的手臂。

金院长和政委一见林彪，霍地站起身，向他敬了个军礼。

林彪和金院长等人握了握手，说：“坐下吧。”

金院长仍然站着，直到等林彪坐稳后，自己才小心翼翼地坐下。

“最近部队医疗系统建设搞得怎么样啊？”林彪问。

“按照主席和副主席的指示，正在加紧建设。”金院长答道。

“嗯，很好。你再把张宁的学习情况说一下。”林彪说。

金院长便将医训班以及我的学习情况扼要地汇报给林彪。叶群听后，在一旁插话，说：“张宁有些课程可以免修，例如解剖学，她学了也用不上，给她增加外语，将来不光要搞中国革命，还要搞世界革命嘛。”

金院长听了连连称是。

接见时间大约只有十分钟，林彪就返回自己客厅。因为，他的身体相当虚弱，林彪怕见风，更怕见水。他每天的伙食也很特别，一日三餐只吃由各种杂交面配制的稀糊糊。为了给林彪做身体运动，安装了一匹电动马，只须按一下调节开关，就可以模拟真马跑动的颠簸。

林彪每天工作时间，一般在四十分钟左右，上午二十分钟，下午二十分钟。林办秘书，把每天的文件筛选归类，再把关键性的内容，扼要讲给他听。而每天绝大部分时间，他则闭目静坐在沙发上。

林彪接见了金院长后，我的身份在三〇一医院不胫而走，想保密也保不住，仿佛我已是位可以手眼通天的人物。

可是，又有谁理解我内心的痛苦呢？白天，我在世人面前矜持缄默，而在夜深人静之际，泪水总是冲开感情闸门，倾泻在我那受伤的心扉上。

有一天，林立果的情绪十分反常，老讲他和叶群向来谈不到一起，并说叶群最近对他控制得越来越紧，为了摆脱控制，他准备外出一段时间，我如果有事，可以和他单线联系，最好是写信，不要打电话，因为叶群极有可能监听电话内容。

后来，我真给他写了一封信。

立果：

不知你是否已到了外地？这封信会转到你手中。我的学习比较紧张，吃饭尚可，只是睡眠仍然靠安眠药，恐怕是缺乏毅力，不能调理自己。你说你与叶主任在我的问题上有矛盾，我劝你还是应该听从叶主任的意见，不要为了我影响到她为国家的精力，这样我就有罪了。在婚姻选择上，你有充分的自由，而我却没有。我很希望能有机会让我回家去看看。……

这是一封不讨喜的信。

林立果没有答复我。

九月六日的傍晚，我独自在三〇一医院里散步。北京的秋天，气候宜人，我顺着林荫小道慢慢走着。医训班尚未开学，自从林彪八月初去北戴河，林立果已有较长时间没来找我，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比较安静。

一会儿，保健医生匆匆跑来，说金院长叫我去一趟，有急事。我来到金院长家，他一见到我就说：“张宁，你立刻准备一下，林立衡请你去做客。”

我问：“她请我到哪儿去？”

“当然是好地方罗，”金院长说，“她请你去北戴河。”

这时，电话铃响起，金院长拿起听筒一听，是胡敏打来的，便把听筒递给我。胡敏说：“你这次去北戴河，我不能陪你一块去了，你把钱和粮票带上，首长在生活上一向是很注意影响的。”

她的声音很弱，而且不断地咳嗽。我问：“可以不去吗？”

“怎么可以不去呢？立衡考虑你暑假没能回家，一个人怪寂寞的，才请你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时间，老虎也在那里，你要和他多接触，不接触怎么能培养感情呢？两个星期以后还回北京学习。”胡敏说完后，就挂上了电话。

我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后，毛家湾已派车来了。到了林彪寓所，林立衡告诉我，由于天气不好，今天就不走了。

林立衡很憔悴，长期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身体一直不好。她待人非常诚恳，衣着打扮也很朴素，看起来就象一名普通女兵。

我离开毛家湾以后，林立衡对王淑媛感叹地说：“可惜了这么好的青年，叶主任和林立果是在害她。”

第二天一大早，林立衡和我，还有张清霖，一同乘林彪的专机飞往北戴河。在飞机上，林立衡搂着我的肩，悄悄地问：“喂，张宁，你看张清霖怎么样？”

张清霖坐在我斜对面，正凝视着舷窗外的云彩。我说：“他长得非常英俊。”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可惜，是叶主任帮我找的。”停了片刻，又笑起来：“真有意思，老百姓都反对父母包办子女婚姻，叶主任却积极地干。”

我问道：“你喜欢他吗？”

“你看呢？”林立衡望着我，反问道。

我说：“你肯定喜欢。”

林立衡说：“他很忠厚，人品也不错，只是在感情上，还需要慢慢培养。”说到这儿，她笑了笑：“我不象老虎，一见到你就被你迷住了，他说：非你不要，他还真认起真来了。”

我说：“可是，我对立果至今也产生不了爱情。”

“总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她说着，慢慢闭上眼睛。

我望着那浓密的白云，好象那云层就是迷障，隔开了我和林立果的感情，我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量钻出这云层。

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我们又同乘一辆吉姆小轿车直驱北戴河。山海关离北戴河四十公里，出了机场，便看见了起伏的山峦。

公路两侧风景十分优美，半小时之后，轿车拐入一条谧静的水泥路，沿着山脚下的松树林飞驰。我揿下车窗的升降机开关，车窗便降了下来，一阵潮湿而清新的海风迎面扑来，随着这风，还隐约可辨山谷中的松涛和海涛深沉雄浑的声响。

不一会，小轿车在一幢红瓦黄墙的别墅前停下。林立衡说，这是北戴河五十七号楼，我们就住这里。

这是一幢法国式建筑，依山傍海，站在阳台上，就可观赏到迷人的海滩和一望无垠的大海。林立衡和张清霖住在楼东面，我则住在楼西面，外面是值班护士和警卫。

与五十七号楼遥遥相对望的是九十一号楼，叶群就住在那里。

刚刚休息片刻，林立果就来了，他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似乎有点尴尬。他没有提信的事，好象他根本就没有收到似的。

一个多月没见，他胖了，晒黑了。

这时，林立衡过来了。他松开我的手，说：“豆豆，主任吩咐，你们一到，就去她那里。”

“知道了。”林立衡脸色不悦地说：“主任对我们真是关怀备至，稍有分别，就惦记在心里。”

林立果苦笑，领着众人出了楼，来到了九十一号楼。叶群见儿女们前来拜见，好象很高兴，连声说：“见到你们都出双入对的，我这个做妈妈的也就放心多了。”她说着又拉起我的手说：“张宁啊，你在北戴河好好玩玩，过一星期，再陪首长一起飞大连，国庆前返回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叶群的客厅里挂了许多名家字画，正墙上方是一幅世界地图，书橱上排列着许多书籍，和一个地球仪，窗前置放着一张睡榻。

九十一号楼是一幢工字型楼房，正面临海，而楼房其它部分，则处在凹形的山坳中，汽车库也隐蔽在自动起降的地下室。林彪住东面，叶群住西面，各有一套办公设备和秘书，内外勤和警卫，互不干扰。每见林彪，必先经李文甫通报。

走进客厅，只见林彪正独自坐在一张大沙发上，还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姿式。

叶群眉眼溢喜地说：“首长啊，孩子们看你来啦！”

林彪抬了抬手，把大家叫了过去，问：“什么时候到的？”

林立衡答道：“爸爸，刚刚到的。”

林彪说：“这里的环境很安静，你们年纪轻，可以去海中游泳游泳。”

叶群说：“首长，这你就不用操心啦，孩子们有的是兴趣。”

林彪笑笑，指着我对叶群说：“这孩子不爱说话。”

见林立衡、林立果叫他爸爸，这种场合与前几次见林彪不同，我不能跟着模仿，我只好上前一步问候林彪，“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是那时期政治宗教的口头禅，如果见到毛泽东，一定会呼万岁的。

林彪听我这么说，摆着手：“今后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不要讲这个。人吃五谷，哪会永远健康呢？”

叶群解释道：“首长是很谦虚的，他不愿搞个人崇拜。”

林彪问叶群：“你身体怎么样啊？”

叶群忙回答：“首长放心，我身体很好，每天坚持打太极拳。”叶群打太极拳，心情好时，慢慢打，心情不好，鬼划符一般，几分钟就完了，很多姿势做不到位，象打猴拳，不知练些啥。

林彪又问我：“你现在还吃安眠药吗？”

我说：“现在仍然靠安眠药睡觉。”

林彪说：“这样不好，年轻人应该自然睡眠。”

叶群问林彪：“你对这两个孩子满意不满意呀？”（指张清霖和我）林彪拍着手说：“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

据工作人员说，这一天是林彪到北戴河以来，最高兴的一天，话最多的一天。

从林彪处回到五十七号楼，已近中午。空军保卫部的杨森处长，正在客厅里等候着林立衡。

杨森是个东北大汉，长着满脸横肉，体魄剽悍，他和我们在一起吃午餐、饭后，我回自己卧室，林立衡又被林立果叫去谈了一下午的话，回来后，情绪很不好，把自己和张清霖封闭在屋里，不见任何人，杨森充当把门神，在客厅警卫。

当时，亿万中国人民，都无比自豪地把毛泽东和林彪美誉为亲密战友。然而，这两位中国首脑，在许多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处于面和心不和的状态。叶群乃是善于心计的女人，她周旋于毛泽东、江青和林彪之间，竭尽一切努力，为自己捞资本。林彪对此也无可奈何。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办主任的叶群，深知自己一旦失宠于副统帅，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周旋过程中，她违背林彪意志做了些什么事，是绝对不敢让林彪知道的。戎马一生的林彪，竟象严重的忧郁症患者，整天闭目闷声不响，连最亲近的人都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经过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所代表的军事集团开始走下坡路。林彪更是讳莫如深。

北戴河的松林青翠欲滴，北戴河的鲜花艳丽如锦，北戴河的海水沁人心扉，但是，就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中，在悠哉游哉的海浪下，却隐藏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

这飓风，令世界为之震惊！

九月八号上午，叶群把我叫到九十一号楼。我去的时候，她正在做发。叶群对自己的头发特别精心保养，在人民大会堂、以及北戴河，都有专门为她服务的美发人员。

叶群见我进来，便让我在她身边坐下，象一个老婆婆对刚过门的儿媳那样，一个劲装做体恤，问我夜里睡得可好，食欲怎样，等等。

不一会，她烫好了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西装，拉着我的手，说：“走，我带你见首长去。”

“张宁啊，”叶群边走边说：“首长身体不好，胡子也不敢替他刮，怕他感冒。你们这次来，首长挺高兴，过两天去大连，带上你们三个。”

叶群走进林彪办公室轻声说：“首长啊，张宁来看你了！”

林彪的面色比昨天显得好一些，他让我在他身边坐下后，问：“你是搞文艺工作的，对文艺理论有没有研究？”

我的心怦怦直跳，因为，这是林彪第一次直接和我谈工作问题。我说：“了解一些，但很不全面。”

林彪说：“你应该认真研究文艺理论，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高屋建瓴地对文艺理论和方针，提出自己的见解。”

叶群解释道：“首长对你很关心。过两天去大连，你也陪首长去，……”

林彪面无表情，叶群看着林彪的脸色，不住地没话找话，林彪不理睬她，微微闭上了双眼。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一直认为，林彪和叶群的关系是很好的。这种场面好似民间夫妇闹不和，而他们的地位，是意味着政治的，太不可思议了，就象江青讲，她与毛泽东是政治夫妻一样，这种人绝不会在柴米油盐以及对方偷情这类的小事上，吵闹翻脸的。

一会儿，林彪睁开眼睛，拍了拍叶群的肩膀，说：“你有空也要读些书，不要做贫嘴饶舌的妇人。”

叶群很不自然地避让了一下。

叶群似乎发现我注意到她刚才的动作，我想，她一定是后悔让我陪她上林彪办公室，林彪给她难堪，叫她下不了台。她便说：“张宁，首长有些累了，你先回到我那里去，我等一下就来。”

过了一会，叶群回来了，她说：“首长身体不好，想睡觉，我刚刚给他做了按摩，还哼了段小曲给他听。”她停了一下，又说：“张宁，北戴河这地方不比毛家湾，复杂得很，你在这儿不要多听、多问、多说。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八日下午，叶群叫内勤传林立果和我过去，然后，开着美国总统尼克松送给林彪的卡达莱克牌小轿车，沿着海滨公路转了一大圈。

叶群半仰在小车沙发上，两只脚毫无顾忌地翘在司机驾驶席靠背上。

林立果面色严肃，目光阴沉地考虑着什么问题。

海水起伏着，涌向金灿灿的沙滩，那高悬的太阳，在拂拂的海风下，失去了灼热的威严，只将那满天的红光，与蓝色的海水形成色调鲜明的对比。

小轿车中速奔驰着。叶群问：“你准备得怎么样啦？”

“嗯。”林立果点了点头，语调沉闷地说：“已准备就绪了。”

“嗯”——叶群调子拖得长长的，缓慢地点了一下头，眼角一直瞟着林立果。

“回九十一号楼。”叶群命令司机。

走进客厅，叶群进卧室休息，林立果在叶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把我拉到他身边，问：“张宁，你这次到北戴河，带的衣服够不够？”

“够了，”我说：“反正过几天就要回北京的。”

林立果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把房间钥匙给我，我给你拿些衣服来。”

“不，不用了，”我说，“大连的气候和北戴河的不是差不多吗？”

“你怎么一点也不明白我的意思呢？”他轻轻地捋了一下我的头发：“你箱子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如果，万一……北京被占领，那些东西不要可以吗？”

我大吃一惊，怔怔地望着他，问：“是不是苏联要进攻？”

林立果默默地望着我，欲言又止。沉默片刻，好似下了很大决心，眼睛盯住我，一句一句地说：“最近，中央内部斗争很激烈，也很尖锐，叶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要下降！”

“搞叶主任不就是搞首长吗？首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主席知道不知道。”

林立果的眼神和面部表情有一种奇怪的变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怎么回答我。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表情异常冷峻地看着我，说：“知道一些。”

我一听说主席知道，便不加思考地说：“那还担心什么，只要主席知道了，任何人搞政变都是不可能的。”

听我这么一说，他着魔似的站了起来，因为我的手被他握着，我也不自觉地跟着站起来，他眼神既镇定又带着一种忧郁。他凝视着我，突然张开两臂将我拥抱着怀里，两只手捧住我的脸，狂吻不止。我惊骇的将脸抵在他的肩上，防止他继续疯狂下去。这是他自认识我以来第一次无约束的冲动。

我们又回坐到沙发上，他的两只胳膊撑在膝盖上，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犹豫着，好似下很大的决心，断断续续地说：“万一，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不要讲……我走以后，周围关系很复杂，你一定要谨慎，……叶主任问你我们谈什么，你什么都不要告诉她。注意休息，养好身子，我三四天后回来。”

这时，叶群走了进来，见状，先是一愣，说：“你赶紧准备一下吧。”

林立果松开我的手，仔细地看了我片刻，默然无语地站在原地，冷冰冰、漠漠然，我真不明白他们母子又搞什么名堂，既然我是客人身份，还是回避的好，我转身走了出去。我再也想不到，此时林家已将我内定为他们的未婚儿媳了。

晚上叶群传林立衡、张清霖、和我上去看影片《日出》，结束后，叶群单独留下我陪她。我问叶群：“立果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要三四天吧。”叶群说：“立果下午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关系复杂，不想将自己牵扯进去，就搪塞了几句，叶群神色不悦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又转着话题套了我半天，见仍然套不出话来，便放我回去休息。

九月九日下午，林立衡和张清霖约我一同去山海关，参观了天下第一关。

阵阵海涛，汹涌澎湃着，永无止境地冲击着黑色的礁石，那溅起的浪花，跌回大海后，形成了漂浮的泡沫，使人们感到窒息，感到不安。

林立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纵观五千年中国历史，无论夏商周秦汉，还是三晋南北隋，唐宋元明清，大凡君臣无猜，乃国泰民安，基业坚如磐石；反之，君臣互忌，江山必毁于旦夕，唉，中国啊，中国，你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封建桎梏，真正走向民主啊！”

她的双眉紧紧拧在一起，好象内心深处，有一股烈焰在燃烧。

从山海关城楼下上来，我们去友谊商店转了一圈。林立衡说，这次到北戴河来，没有给林彪和叶群带东西，建议买些礼物带回去。

“我给首长买，”林立衡说：“你给主任买，你看怎么样？”

我给谁买还不是一样，挑选了一下，我花十四元钱，买了一只南亚鸟的标本，林立衡买了一个玩具机动兵。

回到北戴河，我把南亚鸟送给叶群，她很是开心，放在手上端详了半天，说：“走，把礼物给首长看看。”

来到林彪办公室，叶群就喜形于色地说：“首长啊，孩子们给你带礼物来了！”

林彪微笑地注视着我们。

林立衡便将玩具机动兵上足发条，然后放在地毯上。林彪见机动兵不停地模拟射击，投弹，开心地笑起来，林立衡把机动兵放在他的脚下，好让他更仔细地观看。

叶群见林彪兴致极高，便提议照一张全家照。于是，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霖和我，拍了三张合影。一张是：林彪、叶群、张清霖、林立衡；一张是：林彪、叶群和我；一张是大家合照。林立果已去北京，没有他。叶群嘱咐，抓紧时间送回北京冲印。

晚上，叶群把我带到她的卧室，她拿出一本像册，说：“张宁，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接过像册，打开一看，是林家的历史照片，当我翻到林立果的相片时，叶群笑着问：“张宁，老虎有没有欺负你，你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啦？”

“我们很少见面，相互间的关系，仍然和当初一样。”我说。

“那么，他没有跟你说什么吗？”

“没有。”我谨慎地答道。

叶群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她阴沉着脸，盯着我看了好一会，才又转为和颜悦色地说：“老虎如果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替你做主。”叶群见套不出我的话，就转过话题说：“老虎工作很忙，但他是喜欢你的，感情这个东西，是要长期培养的，我和首长谈恋爱时，可没有你们自由，总有两个大兵跟着。首长比我大的多，对我要求很严格。老虎对你比对我这个母亲有感情，给你倒水，给你搬沙发，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啦！”

她唠唠叨叨地说着，丝毫也不管我是否感兴趣，她说：“为了你，立果跟我没少闹意见。我也难呀，不少人送子女上门，我又不好得罪人家，就说，儿女大了，婚姻由不得父母做主啦！胡敏为了你得罪不少人，将来可别忘了她呀。你身边带着父亲的照片吗？拿给我看看。”我拿出来给她，她揿铃叫内勤进来吩咐说：“马上送回北京放大几张送来。”内勤走后，她解释说：“以后你回去的机会很少，想家了就看看父亲的照片吧，你认我做妈妈吧，……你的衣服带的太少，立果来电话要你拿衣服、你把钥匙交给他们，每天有飞机来，送东西很方便……”

她越说越兴奋，而我却困得眼皮发粘。

深夜二点，叶群的两个内勤进来了。她脱下衣服，穿一套白色睡衣，平躺在沙发榻上。柔和的灯光，照射着她的肌肤，她的身段娇巧而优美，胸部十分饱满。内勤开始给她做全身按摩，从脚趾到大腿，从腰到脖颈。她双眼微闭，十分舒服的享受着。

半小时之后，内勤将她托坐起来。叶群说：“张宁，你也来按摩一下吧，很舒服的。”

我困乏地说：“不用，不用，我不习惯的。”

叶群见我神色难堪，也就不再劝说。她坐在沙发榻上，搂住我的腰，在我脸上吻了几下，说：“张宁，从今以后，你就喊我妈妈吧。”

19

九月十日，晨曦显露的时候，我回到五十七号楼。经过这一夜的折腾，我已精疲力竭。换上睡衣，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这一觉一直睡到中午，我才醒过来。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音。淡淡的花香，从窗外飘来，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

为了摆脱烦躁和寂寞，我私自要了一辆值班汽车，带了随身护士，来到海滨浴场。

一下车，就看见几位警卫军人围着一位穿着泳装的老太太。警卫人员告诉我，她是朱总夫人康克清。

康克清问我：“姑娘，你是南京前线歌舞团的张宁吧？”

我奇怪地反问：“您怎么知道的？”

她笑了笑了，说：“叶主任都对我讲了呀。”

我问：“朱总身体可好？”

“朱总现在脑子不行了，总要睡觉。”康克清说：“姑娘，你可下海游泳？”

我说：“不了，我不下海，想去各处转转。”

“那也好，去玩吧，姑娘。”康克清说着，慢慢地向海滩走去。

小护士告诉我，前不久陈毅总理和夫人张茜也在这里。我很遗憾未能见到他们。回想在三〇一医院的时候，有天傍晚散步，与陈老总迎面相遇，我正想去问候他，却被警卫员隔开了。我真想告诉他，是他在解放初期打老虎运动中指示下属把我这个未满四岁的被关锁在地下室饿了两天的孩子救出来的，当时他是华东第一任司令员，当时父亲遭错误冲击，波及到无辜的孩子，母亲去向他求救。他给予我们一家很大的关怀。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飞黄腾达”之日，陈老总竟在危难中生活，历史的谬误竟这样残酷无情地毁灭了两代人。

我和护士沿着海滩走了一段路，攀上海边的悬崖。那里有一幢灰色平房。警卫人员告诉我，这是林立果试验水陆两用汽车的临时驻地。

九月十一号，我醒得很早，去海边看过日出，回来约林立衡用早餐，但被空军保卫处长杨森拦住了。杨森说，林立衡从今天起，不接待任何人，一日三餐，全部由值班人员送到她室内。

林立衡将自己封闭后，叶群显得十分不安，但她还要拿十分可笑的理由搪塞我。她说：“你不要去找她，她与张清霖谈得正热火呢，你常去，她会吃醋的。”为了防止我不请示的外出，她说道：“你不要跟秘书、外勤、警卫接触，立果知道了，他要吃醋的啦！”

一切迹象都让人费解，让人不可思议！

北戴河的景色是那么宜人那么宁静；

北戴河的主人是那么焦急！

九月十二号傍晚，我在阳台上远远看见一辆黑色伏尔加小汽车飞驰而来，从那娴熟的驾车技术中，我马上明白，林立果回来了。

当伏尔加小轿车接近五十七号楼时，有所减速，林立果隔着玻璃窗，向我看了一下，又加速朝前冲去。

不知为什么，自从和林立果分手后，这几天来，他那忧郁的表情，莫名其妙的沮丧情绪老是在我脑海中出现。虽然我努力克制告诫自己，不要去想不知所以然的事情，可那幻觉中的身影仍然那么清晰，那么顽固。

晚上，叶群打电话把我和林立衡、张清霖叫到九十一号楼。

大厅内放着一大束五彩缤纷的塑料花，制作精巧，简直可以乱真。

过了片刻，林立衡、张清霖走了进来。林立衡面色蜡黄，神色憔悴，身上穿了一套簇新的军装。她走到我面前，凄然一笑，说：“主任安排我和张清霖今天定婚。”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林立衡为什么在今天突然宣布定婚，要知道，一个女人订婚，是仅次于出嫁的大事，她怎么就这么简单，这么草率地决定了呢？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说：“真是太意外，太突然了！我连一点准备也没有。”

“不要紧的，”林立衡握住我的手：“好妹妹，祝贺我吧。”她的声音很轻，语调有些颤抖。

我惶然地望着她，望着她那凄然的脸。

这时，林立果大步匆匆地走进来。他送了一束塑料花和两支钢笔给林立衡和张清霖。我发现，当他将钢笔放在林立衡手中时，林立衡的身体微微痉挛了一下。此时此刻林立衡是怎么想的，我相信终有一天她会将自己真实准确的感受，大白于天下的。

随后，大家到放映室看电影。那天放了两部片子，一部是《假少爷》，另一部是《甜蜜蜜》。刚开始的时候，放映室里的人还比较多，可是过了一会，我突然发现，人不知啥时都走光了，只有林办秘书李春生还在看电影。

我感到情况异常，起身走出放映室，刚出大门，就听见林立衡对林彪的内勤小陈、小张说：“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偷听到首长和林立果谈话的内容。”

我吓了一跳，悄悄地躲在暗处。

小陈似乎十分为难，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

林立衡见状，急切地说：“你们快去想办法，一定要快！”

“万一出了事，你千万要替我说清楚啊！”小陈的声音瑟瑟颤抖：“首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小陈，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些了，你快去，快去！”林立衡使劲推了一下小陈。

小陈又望了一眼林立衡，一闪身，走进通往林彪客厅的走廊。大约过了两分钟左右，小陈手中托着一只茶水盘返回来了，见到林立衡就说：“首长正在淌眼泪呢！”

“什么？！”林立衡一把抓住小陈的手：“你快些讲，首长和林立果讲了什么？！”

小陈说：“我端了茶水进去时，叶主任和副部长蹲在首长的脚前，说话声音很轻，听不清楚：我见首长一面流泪，一面说……”小陈一双大眼睛犹豫地看着林立衡，欲言又止。

“快讲，说什么？”

“首长好象说、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副部长发觉我，把我推出来，后面的话没听见。”

林立衡猛地松开小陈的手，小陈手中的盘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下。林立衡来不及再顾小陈，匆匆地走了。

当我回到放映室时，刚才离开的人，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我才坐到座位上，电灯一下亮了起来。只见叶群急急忙忙小跑着来到放映室，她的神色十分紧张，一面走一面说：“大家看电影，看电影吧，首长要你们早些做好准备，明天去大连。”

大家异样地沉默着，因为在这之前，林立衡已发动了所有的林办秘书、内外勤警卫，通知他们叶群、林立果可能要劫持首长，让大家提高警惕保护首长，唯独隐瞒我一人。事后林立衡才告诉我，回避我完全是误会，因为见林立果、叶群频繁的接触我，以为我是他们的人，派来监视她的，所以来当情况紧急时，她闭门不见我。我被莫名其妙地夹在当中，竟不知道双方在进行一场殊死的争夺战。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彪计划在九月中旬飞往大连，在没有任何迹象表露之前，大家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因此，直到叶群走出放映室，大家仍然在看电影。

过了一会，林立果和叶群跑了进来。叶群的帽子歪斜地扣在脑袋上，林立果军衣的风纪扣也敞开着，脸上流着汗水。叶群连连摇摆着手说：“快，你们赶快回去准备一下，等一会就来接你们。”

林立衡沉着地问：“这么急，要到哪儿去呀？”

林立果紧盯着他姐姐，脸色异常阴沉，一句话也不说。

叶群说：“首长性子急，马上就要走，陪着首长去大连。”

说着把我往背后一挡，与林立衡隔开来，我大惑不解地看着他们，林立衡似乎悟到了我不知情，对叶群说：“那张宁呢！”叶群猛一愣，“噢！她也跟你们一起回去准备。”我回头望了一下林立果，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回到五十七号楼，林立衡立即与张清霖回到他们的住处，我则回卧室整理东西。过了一会，林立衡来到我的卧室，她说：“首长办公室刚才来电话，通知今天不走了。”

我问林立衡：“首长行动怎么这么紧急？”

她审视了我一会，很温和地说：“你先睡吧，明天什么时候走，再通知你。”说着，林立衡看着我吞下安眠药，将门关上退了出去。

服下安眠药，上床几分钟后，我渐渐迷糊起来，正在这时，张清霖又来了，他确认我已在药性控制以后，便熄了电灯，并且拉下总电闸，将门反关后走了。

五十七号楼的西半楼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我梦幻般地听见一辆汽车在院内紧急停住，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经过起居间直奔我的卧室，一个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

他是林立果。

屋内一片漆黑，鬼使神差的我竟然毫无声息，没有吭声。

林立果匆匆推门一看，立刻又跑出卧室，随着引擎声响，汽车又飓风般地开走了。

八三四一警卫部队的奔跑声、口令声，汽车的奔驰声，象梦幻一样飘飘忽忽地过去了，我迷迷糊糊地想，林彪动一下身，保卫工作这么大动干戈呀。

夜空黑沉沉的，远处隐隐可听飞机起飞的声音，在那隆隆的声响中，我沉沉地睡去了。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开导我说：“姑娘，你是不幸中之万幸呀，如果时间来得及，温都尔汗将多一具女尸！”

21

九月十三号清晨，我苏醒过来，头痛得要命，身体也感到阵阵酸痛，大概是大剂量安眠药留下的反应。

晨雾中，不断传来飞机起飞降落的隆隆声。

北戴河的海面，此时一定又是一轮朝阳，从天边升起来了吧？一定的，我的心里默默地猜想。

当和煦的阳光洒入我的卧室，我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到外面山坡上散散步。可是，我刚刚走出别墅，便被士兵拦住了。再朝四周看看，公路上，别墅前，树林里，到处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战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来到餐厅。只见大师傅们都坐在草地上晒太阳，而餐桌上，却没有任何精美的食物。我走到叶群的厨师面前，说：“我肚子饿了，做点吃的吧。”

那位大师傅没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目光漠然，好一会，他才站起来，到厨房为我煎了两只荷包蛋。

中午，空军保卫处长杨森来到我的卧室，把我所有常用的药物全部收缴了。

我说：“我每天都要吃安眠药的。”

杨森说：“你要吃安眠药，可以跟值班护士要。”

我在屋里整整睡了一天，直到傍晚，才下楼来。西斜的落日，将火红的余晖，覆盖在院中高大的橡树上，给那已经发黄的橡树叶，蒙上一层黄灿灿的光泽。我实在是太无聊，悄悄地对值班护士说：“去弄一条绳子来。”

护士一听，吓得立刻把杨森喊来。杨森不放心地反复询问我要绳子干什么。

我被他问得不耐烦，心想，你给就给，不给就拉倒，老是刨根问底做什么嘛！我跟杨森说：“你们让我回北京继续学习吧。”

杨森说：“回去是可以的，但要等一些时候。”

杨森走后，值班护士又悄悄地问我，要绳子究竟做什么。我很奇怪地说：“玩荡秋千呀！”

小护士听罢松了口气说：“吓死人了，我还以为你想自杀呢！”

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死呢？我自语着。

当天夜里，天气突然转冷，我冻着瑟瑟发抖。第二天，我找到八三四一警卫师师长张少池，再一次提出要回北京。张少池说：“耐心等着吧。我也没有办法。天气转冷，我想办法给你匀一条被子来。”

北戴河犹如《红楼梦》中大观园被抄似的，许多人进进出出，唯独见不到林家任何人。直到第七天上午，五十七号楼的院内，来了一大帮人，我一看，原来是林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各自拿着长竹竿，围在橡树下，打起树上的橡果子。

我跑出来，问林办文史秘书张展和军事秘书倪煜，这些天都到哪儿去了，可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我又问叶群的内勤孙中堂，我想，他肯定知道情况。孙中堂一边打橡果子，一边说：“你没有事也帮着打果子吧，咱们卖了钱买棋玩。”

第十天，全体林办人员被押送回北京，我背着小挎包走出五十七号楼，一眼看见了李文甫。这个跟随林彪鞍前马后几十年的老保卫干部，双目红肿，颤颤微微地站在队伍末尾。我们四目相对，他很激动，很快又镇静下来，目光移向别处。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手臂竟然负了伤，用纱布绷带吊在胸前。

我第四次来到北京。

到了毛家湾，那里早已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我与林办人员从侧面一个小门被带进大院。这扇门我从来没有走过。

过了一会，军委办公厅负责人王良恩进来了，他是我们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老主任，原来就熟悉我。他拍了拍我的肩，对大家说：“你们都还年轻啊，以后还是有发展前途的嘛！”接着，王良恩对大家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当他念到飞机坠毁于温都尔汗时，我的脑袋轰然而炸，眼前一团黑。

王良恩下面再念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清了。全体林办人员都颓然无语，大厅里死一般沉寂。我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受到这重大事件的牵连，将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完凶多吉少的前程。

自从我知道了“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后，犹如跌入了黑暗的地狱，看不见一丝亮光，听到的都是鬼泣般的嚎叫。生的欲望彻底泯灭，只有死的念头充满整个灵魂，统治着全部意识。当然，我绝不是追随林立果而去，做林家的殉葬品。我只感到，自己已没有必要存在于人世间了，而应该安静地长眠在泥土中，永远不受大千世界的骚扰。

趁人们松懈警惕，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简单地洗梳了一番，在心中轻轻地喊了一声“妈妈”，便一头撞到房门的铁柄上。

无数颗小星星，在深邃的黑暗的世界里闪烁，头顶上那温热的，粘乎乎的鲜血，恰似一条凌空而泻的瀑布，我的生命将随着这条瀑布的枯竭而终止。

就在我一步步走近死亡的深渊，将要看见上帝那慈祥的面孔时，王淑缓回来了。她见到这场面，惊吓地嚎叫起来。

在医护人员的救护下，我又从死神那儿回来了。我憎恨上帝，为什么不肯收留我这无辜的灵魂，而又一次将我推回纷繁的大千世界来。

人们一批一批地进来看望我，给我安慰与鼓励。

李文甫站在我的床边，伸出一双骨瘦如柴的手，默默地替我掖好被子。

十一月十号，林办人员从毛家湾转移到北京西山亚洲青年疗养院，继续办学习班。

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从亚洲青年疗养院，转移到北京大兴县一个劳改农场。农场四面设置了铁丝网和岗哨，我们除了养猪种菜，主要在果园里劳动。在铁丝网的那一边，是一个

刑事犯劳改农场，许多剃着光头的囚犯，常常隔着铁丝网，好奇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怎么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海陆空民大杂烩？

七四年中秋夜，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中我是一只小花牛，被关在屋子里，想逃却逃不掉，一个军人进来给我添饲料，那饲料是许多嫩蚕豆。我瞅准机会跑了出来，沿着田野拼命地狂奔，不一会儿，我又来到那片碧波荡漾的湖边，后有追兵，前有湖水，我绝望的坐在湖边大哭起来。这时，一片绿叶从水上飘来，我又象从前那样跳上绿叶，一阵风将我送上湖中小岛。这是我数次同类梦中第一次登上这个可望不可及的小岛，岛上参天古树深处，有座断垣残壁的破庙，遍布着荒芜的野草，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和尚，正端坐在蒲团上，我奇怪地问他：“你是谁？”

连问数声，老和尚才回答：“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来问我我是谁？”和尚接着又喃喃念道：“踏雪而来兮，乘风而归兮，……历经世间万种情，天涯此处生。”

我听了和尚的话，似有所悟，嚎啕痛哭，刚欲再问，那和尚已化为轻云，飘入无垠的天空。

这时，追兵拥来，任凭我哭泣喊叫，连拖带拉地把我抓回去。醒来却是南柯一梦，枕巾已被泪水浸透。仔细一想，我是属牛的，正是腊月降雪时所生，默思自己的遭遇，竟啜泣到天明。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对我们这些人做了批示：林办工作人员责任较轻，不易久留学习班，另行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我终于获得了自由。

在“九·一三”事件中对我的结论是这样的：

张宁，女，二十三岁，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演员。张宁是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中的对象。在“9·13”事件中，张宁同志属受骗受害的青年。根据主席批示精神，另行分配工作。

于是我第五次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总政招待所。那里的一切，还是和我少女时代留在记忆中的一样，每一条小路，每一株树木，仍然是那么熟悉如初。风风雨雨的七年，印烙在脑海中的往事，就象昨天刚刚发生似的，只是这一夜之间我已由一个少女，变成了近似老态的妇人。

我怀念我的童年，怀念我的艺术生活，怀念我的妈妈，那个含辛茹苦把我抚养长大的母亲，在这一事件中，由于我的牵连，她遭到世俗愚昧的诽谤伤害，至今精神上还留着不能痊愈的伤痕。

不久，我终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从一九六九年初第一次进京，到一九七五年秋，在这短短的七年中，已是“五进五出”北京了。回首往事，真是一场人间恶梦。我是不幸者，可这不幸中又有着万幸。

愿我们这个社会再也不要上演那些可悲的小剧目了。

胡存廉 那杰 孙建宁整理

(原载《东方纪事》1988年第3期)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

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当前全国形势很好。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中央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知，九月二十八日又发出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全党全军地、师以上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拥护中央通知和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全党全军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几个被林彪及其死党控制很严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一旦了解事实真相，也同样投入了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热潮。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以后，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组织也开始对黄、吴、李、邱揭发批判。以上事实又一次证明，经过五十年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全党全军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分裂我党我军的反革命阴谋的。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无损于我党我军一根毫毛，反而促进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中央在审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查出了大量物证人证，进一步说明：林彪叛党叛国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斗争的继续。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拖了七个月，黄、吴、叶、李、邱才勉强写了“检讨”。毛主席当时曾明确批示，他们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林彪则长期称病，对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文件，林彪看也不看，连“完全同意主席批示”这样几个字，也要秘书摹仿他的字体代写，对毛主席和党的事业充满仇恨，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现已查明：林彪不但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小撮死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准备反革命叛乱。今年八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沿途对各地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希望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重申了惩前毖后，治

· 病救人的方针。同时，中央决定在今年国庆节前后召开党的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不顾毛主席长时期的教育和二中全会以来的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梦想同无产阶级司令部再一次进行较量。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决定实行两项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一）谋害毛主席。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炸掉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他们具体策划了炸车的时间、地点、代号、武器、方法，指定了具体执行人员。他们还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下手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并且察看了中央同志住所的地形，画了地图。林彪妄图在实现这一罪恶计划以后，立即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这项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包括林彪的手令，林彪死党画的地图，已被中央查获。林彪指定的杀人凶手已向中央交代。（二）另立中央。林彪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林彪策划这一阴谋的手令，外逃人员的编组名单，已被中央查获。参加阴谋策划的有关人员已向中央交代。以上第一项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未能得逞。林彪遂于九月十二日私调飞机，准备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实行第二项阴谋。但是，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惊慌失措，加上林立衡向中央作了揭发，他感到阴谋暴露，就提前几小时，带着妻子、儿子及少数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黄、吴、李、邱在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未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代，中央等待十天之久，眼见他们活动频繁，毁灭罪证，遂于九月二十四日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如果林彪叛党叛国集团的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革命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青年，就要受到残酷屠杀，亿万群众就要吃二遍苦。然而，这仅仅是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痴心妄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坚强团结和高度警惕，已经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使全世界的帝、修、反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三、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传达的文件是：中发[1971]57号、61号、62号、64号文件，和本通知。具体步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应争取早日传达，再逐步深入地进行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时，应抓住重点，着重揭发“九大”以来林彪陈伯达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的阴谋活动，以便早日将林彪及其死党的全部罪行彻底查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中央准备在十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各单位要预作准备，具体做法中央另行通知。在传达和讨论中，要加强对重点单位的领导，严格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作深入细致的工作。随着揭发批判的逐步深入，把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同认真学习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中央相信：在一年来批陈整风的基础上，只要各级党委认真领导，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四、目前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全党全军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应坚决打击。中央重申：要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得向没有听传达的传播。

五、各级党委传达讨论情况，逐级密封上报，特别重要紧急情况可以直送中央专案组处理。

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驱逐蒋帮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联合国大会十月二十五日晚结束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辩论并进行表决。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在表决上述提案之前，美国和日本佐藤反动政府进行了绝望的挣扎，要求联合国大会首先表决它们联合炮制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即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集团是一个所谓“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表决的结果，大会以五十九票反对、五十五票赞成（包括蒋帮一票）、十五票弃权，否决了这个所谓“重要问题”提案。这两项提案表决的结果，使美、日合谋炮制的另一项提案，即“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了废案。

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国家的提案被通过和美、日提案被否决的时候，会场上都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是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顽固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阴谋的破产，给了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分割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的阴谋以沉重打击。它反映了世界上人心的向背和时代的潮流。说明除了美、日一小撮反动派外，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次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是从十月十八日开始的。经过一周的辩论，约八十个会员国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的情况清楚表明：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越来越不得人心，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国际正义的国家强烈反对美国及其一小撮追随者继续玩弄花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立即归还给七亿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把非法窃据这一席位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在发言中竭力为他们合伙炮制的两项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进行鼓吹、辩解。但是他们的欺骗宣传和荒谬论点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有力揭露和驳斥。这些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美、日炮制的这两项提案的实质，都是为了在联合国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

国”，以便长期分割中国领土、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省，因此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严正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的论调都是非法的、荒谬的、根本不能成立的。

面对着这一不利的局势，美国和日本的代表象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奔走，对别国施加压力并进行欺骗拉拢活动。直到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路透社）。但美日反动派的这一手法以五十三票赞成（包括蒋帮一票）、五十六票反对、十九票弃权被大会拒绝了。接着，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又以五十一票赞成（包括蒋帮一票）、五十九票反对、十五票弃权被大会否决。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热烈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对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笑、歌唱、欢呼”，“还有一些人跳起舞来”。

这时，“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布什又跳上讲台，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立即驱逐蒋帮代表出联合国的一节。在代表们的反对声中，经过大会主席马利克的裁决，布什的这一企图也遭到挫败。眼见大势已去，无法再赖下去，蒋帮的所谓“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并随即领着他手下那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接着提付表决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这时大会会场上再次响起了一片热烈欢呼声。

据美国通讯社报道，对于美国在联合国遭到的这样一次“最惨重的失败”，美国政府人士“感到吃惊”和“表示极为失望”。布什在表决结束后发表谈话，对于这一表决结果“感到悲伤”。他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我感到极为失望”。但是，连他也不能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二十多年来，美国要尽种种阴谋，顽固地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结果却落得不断失败和日益孤立。在五十年代，美国操纵表决机器，蛮横无理地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搁置一边。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对美国这种“拖延讨论”的手法的时候，美国从一九六一年起，又操纵表决机器，硬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说成是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但是，在去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出现了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逐蒋帮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提案的多数，美国的阴谋眼看要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伙同日本，在今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又炮制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和一个“双重代表权”提案，把它们长期策划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公开端了出来。

据西方报刊报道，为了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罗杰斯和布什大肆活动，在联合国内外和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二百多次；美国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贿赂或露骨的威胁；美国某些参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二国的提案，美国将削减给联合国的经费，以此进行要挟。日本也加派要员参加它的联合国代表团，配合美国大肆进行拉票活动。但是美国和日本尽管使出了各种手法并费尽了一切心机，它们的旨在分裂中国神圣领土，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阴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识破，并遭到严重的挫败。

中国人民和主持国际正义的世界各国人民、各友好国家通过长期的共同斗争，取得了在联合国内挫败美、日反动派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这一重大胜利。但是，美、日反动派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它们还在继续加紧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独立”等罪恶阴谋。中国人民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彻底打败美、日反动派的这些阴谋而继续斗争。

(新华社 1971 年 10 月 26 日讯，载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 提案全文和联合国大会表决结果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十月二十五日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国家联合向大家提出的提案。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提案全文如下：

“联合国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这项提案通过以后立即成为联合国大会的正式决议。

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的七十六个会员国是：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不丹、博茨瓦纳、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喀麦隆、加拿大、锡兰、智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肯尼亚、科威特、老挝、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勒窝内、新加坡、索马里、苏丹、瑞典、叙利亚、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联、英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

投票反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的有美国、日本等。

在这之前，大会还以五十九票反对、五十五票赞成（包括蒋帮一票）、十五票弃权的结果，否决了美国和日本佐藤政府合谋炮制的“重要问题”提案。投票反对美、日这项提案的五十九个会员国是：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不丹、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喀麦隆、加拿大、锡兰、智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肯尼亚、科威特、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尼泊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秘鲁、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勒窝内、新加坡、索马里、苏丹、瑞典、叙利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乌克兰、苏联、英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

大会在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提案和否决了美、日上述提案后，美、日的另一项提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得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又保留蒋介石集团代表权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即被大会自动否决。

（新华社 1971年10月26日讯，载10月27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出的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来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提案国政府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一切友好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结果，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大势，同时，也说明一两个超级大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操纵联合国和国际事务的蛮横作法，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这是当前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是这一潮流的表现。

但是，美日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继续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疯狂推行“台湾独立”的阴谋，妄图继续制造“一中一台”，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中国”。他们一方面唆使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继续赖在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内不走，另一方面甚至妄想让蒋介石集团以所谓“台湾独立”的名义重新挤进联合国。这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绝不容许他们的阴谋得逞。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正义决议，必须迅速得到全面的实现，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必须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通通驱逐出去。

侵略和干涉是同联合国宪章不相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中国永远不做欺负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新华社 1971 年 10 月 29 日讯，载 10 月 30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 《“571 工程”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

这个反革命纲领，颠倒污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历史，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共反华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自己的力量。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踏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他们策划的反革命政变阴谋，终于彻底失败了。

现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全文及原件影印本编号发给你们，供你们阅读研究。

(附) “571 工程”纪要^①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 (一) 可能性
- (二) 必要性
- (三) 基本条件
- (四) 时机
- (五) 力量
- (六) 口号和纲领
- (七) 实施要点
- (八) 政策和策略
- (九) 保密和纪律

可 能 性

△9·2后^②，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
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 (1)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 (2) 夺权正在进行。
- (3)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 (4)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 (5)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 (6) 他们“故计（伎）重演”。
- (7) 改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 (8)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

① 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用铅笔编了页码。原本页码编到第二十四页，但缺第八页。从原本记载的情况看，第七页已记完一个问题，第九页是另起一个问题，文意是连贯的。文中标有重点者，是原本中删去的句、段。明显的错别字，改在〔 〕内。

② 据李伟信交代，是指九届二中全会以后。

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①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军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 要 性、必 然 性

B—52^② 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

① “舰队”、“联合舰队”是林彪一伙组织的反革命别动队的代号。

② 据参与反革命政变的罪犯交代，是林彪一伙反革命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称。

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 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 军心不 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 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 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 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① 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 B—52 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②、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③ 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① 指党中央负责同志

② 一种武器的代号。

③ 指王维国、陈勋耘、江腾蛟、下同。

借苏力量拊（拊）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①。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① 林彪一伙要把我国置于苏修核武器的“保护伞”之下，也就是要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①

秘密的

上海小组^②负责。

新华一师。

教导队^③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

沪、

杭、

蜀、

穗、

(3)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 01 工程）^④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主要军械库

(4) 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 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① 王维国是上海市警卫处处长

② 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建立的反革命特务组织

③ 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组织的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其中绝大多数是受欺骗和蒙蔽的战士。新华一师是教导队的驻地。

④ 指林立果为搞反革命政变专门设计制造的一种收发报机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①。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1) 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界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 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 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 策 和 策 略

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 B—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打着 B—52 旗号来打击 B—52 力量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① 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 B—52 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 B—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 密、纪 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①。不成功便成仁^②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① 江田岛是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这个学校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学生。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法西斯武士道精神。

② 蒋介石对他的部属进行法西斯教育的反革命训词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的范围和办法与中发〔1971〕68号文件相同。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

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继续。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十年来，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被打倒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总是用武装的或者“和平的”手段，力图消灭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主席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就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个反党集团的出现，正是国内国际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林陈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但是，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是反动派，代表没落的腐朽的帝国主义和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陈反党集团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只能是痴心妄想。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除了一害。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这对于帝、修、反是最大的一次打击。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下面是中央专案组根据已经查实的物证、人证，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主要讲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九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前后的斗争情况。其他材料将陆续整理。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命周宇驰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林陈反党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政变，是有国际背景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七月中旬，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窜到中蒙边境活动。他在李雪峰、郑维山的陪同下，到处接见前线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他的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

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九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七百九十六篇。

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一)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主席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三月十七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同志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四月十一日，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仍然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主席再任国家主席。四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报告。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是，林彪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林彪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叶群对吴法宪讲：“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假的，林彪要步刘少奇的后尘想当国家主席是真的，这就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

接着，林彪的同伙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他把持的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搞了一个反映他们反革命路线的“宪法修改草案”，伺机向党进攻。

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陈伯达、叶群一唱一和，对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同意的宪法修改草案，恶意中伤。他们形“左”实右地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胡说什么宪法修改草案没有写备战，想方设法对修改宪法的工作，进行破坏和捣乱。

六月中旬至七月下旬，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

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八月四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等人狂热地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吴法宪还公然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

以由立果同志指挥。”这样，吴法宪就在林彪的指使下，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八月十三日，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吴法宪在陈伯达的怂恿和支持下，违背毛主席在修改党章时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借口“天才”问题，制造事端，向中央领导同志发动进攻。同时，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情况，进行密商。修改宪法小组散会后，陈伯达又要吴法宪到陈的家里，密谈到次日凌晨。陈、吴密商后，黄、吴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说，你这次干得好。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进攻。他们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布置姜思毅^①等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准备向党进攻的弹药。八月二十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带着他们准备好的反党炮弹上了庐山。

(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召开的，是在党的“九大”路线不断取得胜利，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国际上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次会议，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开始，到九月六日结束，共开了十五天。

八月二十二日，即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规定了这次会议的方针，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八月二十三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康生同志在会上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说明了对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宪法意见采纳的情况。

林陈反党集团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和规定的会议方针。他们认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部署，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的常委会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继八月二十二日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之后，在这次讲话中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纲领，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叫嚷：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观点。他的讲话，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向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林彪讲话后，叶群、吴法宪等人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叶群特别嘱咐陈、吴、李、邱在小组会上要含着眼泪发言，宣讲语录，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在当晚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

^① 总政治部前宣传部长。

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明天听林彪讲话录音，蓄意改变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面连夜加工炮制称天才的材料，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条文；一面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①、王维国^②、陈励耘^③等人谈话，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要他们讲设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了布置。

同时，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当时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黑指示。黄永胜按照林彪的讲话口径，授意他的心腹宋城^④替他起草向党进攻的讲话稿。黄讲了起草讲话稿的要点：（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

八月二十四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陈伯达在发言时，使出造谣和诡辩的反革命伎俩，大肆鼓吹林彪提出的“天才”的反党纲领，疯狂叫嚣要设国家主席，十分凶狠毒辣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给叶群定了发言口径，叫叶群“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叶群在会上气势汹汹，大讲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问题。她还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表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感情”。她声嘶力竭地叫喊：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当晚，林彪把他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稿送给陈伯达整理和修改。陈伯达在整理时，吹捧“林彪的讲话很好”，“林彪是个天才”。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制造了许多谎言，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五大谎言。

（1）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恶毒地说：“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这完全是造谣中伤。早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且发表过声明。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到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先后书面和口头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第一次，是毛主席三月八日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第二次，是毛主席四月中旬关于“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要”的批示。第三次，是毛主席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学孙权。毛主席用三国历史故事，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第四次，是在七月中央召开的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议期间，毛主席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在九届二

① 国防科委原代主任

② 空军原政委

③ 在五军原政委

④ 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原第二处长

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谈过这个问题，对林彪、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林彪口头上讲，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他对毛主席的六次指示，半句也不听，顽固地坚持他们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目的就是他自己要当国家主席。

(2) 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都知道，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毛主席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的三个副词^①。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根据全会一些同志的意见，向毛主席报告说，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主席指示，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八届十二中全会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写这三个副词，宪法修改草案也没有写这三个副词。林陈反党集团以“天才”问题作借口，大做文章，要翻“九大”的案，目的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3) 他们造谣说，新宪法是他们长期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这是无耻的捏造。事实是，在中央政治局历次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在一九七〇年七月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时候，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八月十二日修改宪法小组根据康生同志的意见，综合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建议，将这句话写在草案的序言里。八月十三日，经过修改宪法小组讨论，由序言移至总纲第二条。八月十四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任何争论就通过了。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一口，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用心何其毒也。

(4) 他们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卑劣的谎言。毛主席的谦虚，决不是“谦谦君子”，而是实事求是。他们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说成是“谦谦君子”，不讲毛主席的高度原则性，这种说法的本身，就是贬低毛主席。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5) 他们造谣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事实证明，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林陈反党集团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在庐山会议上刮起一阵反革命妖风，恶毒攻击和污蔑中央某些负责同志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揪出来”，“千刀万剐”、“斗倒斗臭”，等等。实质上，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八月二十五日，陈伯达通过李雪峰炮制的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抢先出笼。这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林彪听后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兴高采烈，神气十足。李作鹏拿着这号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吴法宪马上找小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要参照这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并亲自规定要用那些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邱会作提出要

^① 指“天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把他的发言单独出简报。林彪一伙自以为得计，认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有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他们反革命气焰嚣张一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发动进攻的时候，空军“三代会”把这个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互相配合。林彪、叶群还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通过林立果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指挥他们向党进攻。林彪、林立果还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在林彪一伙向党发动进攻的同时，叶群亲自布置：“保卫工作要加强，要注意安全”。

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

但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八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刹住了林陈反党集团煽起的反革命妖风，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谎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指出，“天才”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还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谎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主席批判了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①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那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①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政变》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被揭露以后，林彪竭力掩盖他的反党罪行，并为他的几员黑干将开脱罪责，说什么“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火”。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给林彪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不过那里面有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的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妄图掩盖林彪一伙分裂党的罪恶阴谋。黄永胜上山后，见势不妙，销毁了他早已准备好了的反党讲话稿。叶群作贼心虚。不交出她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的她的发言记录。邱会作一再提出要从中央会议记录中剪掉他的发言记录。陈伯达、吴法宪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假检讨。林立果气急败坏地对林彪的秘书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与此同时，林彪、叶群复制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录音，吴、叶、李、邱指使秘书抄存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叶群还私自抄存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林彪派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对王、陈说：“首长（指林彪）知道你们受损失，很难过”，“看来这个斗争还长。”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要继续同无产阶级司令部斗下去。

(三)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本着“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甩石头（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和对三十八军、济南军区报告等批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掺沙子（派负责同志参加军委办事组）三项办法，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毛主席一系列的教导，使全党全军干部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但是，林陈反党集团却不顾毛主席的教育和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评了吴法宪及其同伙，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主席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这里说的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毛主席还驳斥了吴法宪在检讨中提到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

贬低毛泽东思想”，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当吴法宪说到，陈伯达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时，毛主席批示：“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毛主席还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这里说的其他宣讲员，是指炮制和宣讲“天才”材料而拒不检讨的那几个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重要批示。当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什么“路线性”错误时，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问题时，毛主席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毛主席驳斥了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主席批评叶群及其同伙“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处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针对林彪在建军路线上的错误倾向，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野营拉练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同时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三十八军党委批陈报告的批示中，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黄永胜、李作鹏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他们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什么：“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压制揭露陈伯达，害怕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姚文元同志的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在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

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军委召开座谈会。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他们批陈，要他们做检讨。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不仅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且利用会议简报，大肆吹嘘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以此来对抗中央，欺骗同志。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主席、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揭露了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指出了李雪峰、郑维山在政治上所犯的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宣布了中央关于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等同志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决定。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一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对计划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黄、吴、叶、李、邱，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他们所管辖的部门，拒不传达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说到“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时，毛主席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黄永胜、吴法宪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接连几次给在苏州的林彪、叶群打电话，密谋对策。军委办事组在讨论毛主席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时，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①无产阶级引用这首诗，是表示要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黄永胜在讨论毛主席对他们批评的时候念了这首诗，是蓄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造无产阶级的反。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窜到杭州和上海，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作了重要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对毛主席关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指示，林彪怕的要命。他顽固地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

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对黄、吴、叶、李、邱作了多次个别谈话，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教育和挽救。但是，他们拖了七个月才勉强写出的“检讨”，仍然不批陈，同陈伯达划不清界限。毛主席为了帮助他们，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他们的检讨上加了这样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同时，毛主席在他们的检讨上明确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① 见《唐诗选》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一个同志的检讨上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批示，中央给军委直属单位发了六十份。黄永胜竟擅自扣发毛主席的批示，只发出七份，并限定极少数人传阅后立即收回。他们竭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紧紧地捂住盖子，就怕揭。

为了打破林彪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九七一年四月，毛主席、党中央派负责同志参加军委办事组，实行“掺沙子”的办法。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总结讲话。在讲话中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他们一面作假检讨，应付中央，而背地里却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的指挥下，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开黑会，要“加快、提前”实行他们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制定的《“5·71工程”纪要》^①反革命纲领，穷凶极恶地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

胜利的一九七一年过去了。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我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跨进了战斗的一九七二年。

当世界进入七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的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

过去的一年，整个世界激烈动荡。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特别是美帝、苏修同包括它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更尖锐了，更扩大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激起亚非拉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侵略和反侵略、革命和反革命的局部战争连绵不绝。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修正主义集团日趋瓦解。各国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各种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改组。今日世界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在这种局面下，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更加深入。从帝国主义

① 林彪及其死党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

的战略后方到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革命斗争蓬勃高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伟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统治。

美帝国主义的处境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困难。它推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不断遭到挫败。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的斗争的发展，美国人民革命群众运动的兴起，全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高涨，大大地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由于美国同日本、西欧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它们之间转嫁危机、争夺市场和原料基地的搏斗愈演愈烈，美国遇到了战后二十六年来最严重的挑战。这些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步美帝国主义的后尘，打着种种骗人的幌子到处伸手。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压迫苏联各族人民的同时，竭力控制和剥削所谓“大家庭”中其他国家的人民，并且拼命向世界各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绞索套到自己脖子上。过去一年中，苏修勾结美帝搞核交易，签订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协定，在许多国家搞颠覆活动，威协巴尔干，破坏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特别是悍然支持印度反动派武装侵略巴基斯坦的可耻行径，使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痛斥，陷于越来越孤立的境地。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幕后交易，就可以任意摆布别国命运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日益加强，一切受到两个超级大国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既突破了美国政府的阻挠，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又违背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意志，以一百零四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决议。中小国家在联合国里能够联合起来发挥这样令人鼓舞的作用，正义的呼声能够这样占上风，美苏两霸陷于这样孤立，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联合国发生的变化，是国际形势大好的一个生动反映。

但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总是要拼命挣扎、继续捣乱。一年来活生生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它们的日子越是不好过，就越要进行疯狂的侵略、干涉和颠覆，甚至不择手段地挑起新的侵略战争。因此，各国人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地总结经验，加强团结，增强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争取新的胜利。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人民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友谊进一步发展，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并肩前进。我们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战斗团结更加巩固，同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紧密配合，同阿拉伯人民、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互相支持。一年来，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断发展，同许多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更加增进，我国又同十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充分说明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所有这一切，鼓舞着我们信心百倍地为继续

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而努力奋斗。

过去的一年，是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全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看书学习、反骄破满、批修整风，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推向深入，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广大干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逐步形成了风气，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的帝、修、反，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深入进行，激发了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一九七一年，我们胜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战斗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农业连续十年丰收，粮食生产在受灾比较重的情况下，比大丰收的一九七〇年又有增长，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工业生产持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钢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八，达到两千一百万吨，标志着整个工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基本建设进展较快。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家和人民的储备进一步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也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有某些提高。人民解放军建设得更加强大，我国国防空前巩固。

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年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下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发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执行党的“九大”提出的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作为重要内容。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历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要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搞好革命大批判，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历史的斗争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什么是摆脱或削弱党的领导。毛主席历来主张光明正大。刘少奇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是极端孤立的，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只能靠玩弄阴谋诡计，造谣诬蔑。我们坚持光明正大，就能识别和抵制那种反党反人民的阴风，不断增强党的团结。毛主席指出“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必将提

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推动各项工作前进。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和斗、批、改任务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的目标，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抓住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深入下去。斗、批、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存在薄弱的环节和单位，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要分析情况，总结经验，研究政策，全面规划，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

要继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委会和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党的原则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并做好工、农、青、妇、知识分子等各个方面的群众工作。党组织要坚持群众路线，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经常注意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共产党员要坚持原则，敢于同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毛主席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促进各条战线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抓紧军政训练，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要加强民兵建设。要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全国军民要认真学习国际形势和党的对外路线和政策，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坚决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切侵略、颠覆的阴谋。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对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台湾省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所谓“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或类似的阴谋。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相信，这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的成就是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我们要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面对着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加刻苦地学习，更加努力地工作，用新的胜利，争取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月)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一月十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在国家元首办公厅代理主任凯密陪同下，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

追悼会会场中央，悬挂着陈毅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陈毅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献的花圈，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康生、朱德、何香凝等献的花圈。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献了花圈。

会场里还摆着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党、政、军一些领导机关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震、王宏坤、王树声、王辉球、王�新亭、邓颖超、刘伟、刘贤权、华国锋、陈士榘、李强、李震、李富春、吴德、张才千、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鼎丞、张翼翔、苏静、肖劲光、余秋里、耿飚、曹里怀、曾山、彭绍辉、粟裕、蔡畅、滕海清、方毅、吴忠、张令彬、杨俊生、赵启民、唐亮、郭玉峰、黄文明、黄作珍、黄志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等方面的负责人陈继德、田维新、张贤约、封水顺、周希汉、吴信泉、姚国民、李家益、李真、胡奇才、宋维栻、罗华生、周世忠、粟在山、阎揆要、贺光华、宋时轮、刘忠、董超、张云龙、郭鹏、陈正湘、王诤；

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对外友协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王良恩、张耀祠、杨德中、任允中、

申健、冯铉、杨玉衡、刘宏贤、张香山、姬鹏飞、李耀文、乔冠华、韩念龙、马文波、王海容、陈德和、白相国、吴德峰、肖友明、彭林、史子才、谷广善、潘友宏、孙晓风、刘洪章、谢北一、刘湘屏、吴庆彤、刘建功、郑屏年、武葆华、王俊卿、刘同新、解力夫、王国权、丁西林、李梦华、康克清、林佳楣、于立群；

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

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李明扬。

陈毅同志的生前友好也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共一千五百多人。

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朱德、刘伯承、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华国锋、吴德，以及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前往医院向陈毅同志的遗体告别。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治秋、赵朴初等。

陈毅同志病重住院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

(新华社 1972 年 1 月 10 日讯，载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的悼词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

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新华社 1972 年 1 月 10 日讯，载 1 月 11 日《人民日报》)

〔附〕霜重色愈浓

——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同志

董怀周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领导权从一开始就被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所篡夺和掌握。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千载难逢的时机，通过种种阴谋，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凌驾于全党之上，爬上了权力的高峰。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对中国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这个历史的大教训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年代里，中国人民被抛入了血海，多少人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反革命”，多少人被投入监狱，遭受百般折磨，又有多少人惨死在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之中。但这也正说明了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反抗和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带领中国人民与各种各样的凶恶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四人帮”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他们又一次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挺身而出，横眉冷对，同林彪、“四人帮”作了英勇的不调和的斗争，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表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革命者的气节和胆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同志就是一棵在大雪中挺立的青松，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位代表。

文化大革命刚发动的时候，陈毅同志是衷心赞同的，他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也要求身边的同志和自己的子女这样作。一次，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儿子回家，当他得知七机部正开群众大会时，便催促儿子赶快回去参加大会。他说：你应积极参加群众运动，不要自己跑回来，应参加大家的斗争。但他同时告诫他们要注意党的政策，要实事求是，要特别谨慎。例如对七机部党委，对工作组，都要有分析；有错就批判，但不能随便上纲。运动初期，华东某省委书记来找他，向他诉苦。他劝这位省委书记，接近群众，采纳正确意见。他自己，则以一贯的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号召同志们给他提意见，并保证不打击报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四人帮”操纵下的文化大革命越来越走上了邪路。眼见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和损失，陈毅同志忧心如焚。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的担心，认为这样搞下去很危险。毛泽东同志告诉他：再搞三个月，就可以收了。但林彪、“四人帮”哪里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愈来愈暴露了其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嘴脸，日益把中国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陈毅同志忍无可忍，又以他一贯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爽直，大胆地、尖锐地发表不同意见，对林彪、“四人帮”发出了强烈的抗

争。陈毅同志也正因为如此，才被林彪、“四人帮”诬为“逆流”、“右派”，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但陈毅同志临危不惧，毫不动摇，照讲不误。他说：我讲话也是顽强地表现自己，顽固而顽强地表现我的思想。我也是代表一种思潮。我一九五四年到六四年都没有表现出来，这次我跳出来了。这时候不讲，再等何时呢？我要不讲的话，我这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铜板也不值。大字报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准备一切后果由我负责。你说我罪行滔天，说我“刽子手”，说我“新反扑”，我已经无所谓了。有人劝我少讲话，可是我还要讲，别人不愿讲，我也要讲。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党负责，不能做怕死鬼，不能怕冒风险。今天，我们重读陈毅同志的这一番话，他那种为了党的事业置个人的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崇高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一九三六年冬，陈毅同志在梅山被围，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写下了有名的《梅岭三章》，表现了他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是一个革命者气壮山河的宣言。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白色恐怖，陈毅同志的这些话语，不正是一个革命者又一次气壮山河的宣言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言行，闪耀着灿烂的光彩，至今仍在教育和感动着我们每一个同志。事实终于证明，陈毅同志那些被说成是“黑话”的话，是多么正确，多么有预见性啊！正如陈毅同志自己说的：我的话不是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它们是陈毅同志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真实记录。

林彪、“四人帮”为了攫取权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最拿手的就是靠喊“万岁”，靠表现“最忠”，来伪装自己，骗取信任。他们正是靠了这些为历来奸贼所惯用的伎俩和秘诀爬上了高位，掌握了大权，炙手可热，不可一世。

一九五九年，林彪窃取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从此他挖空心思，终日盘算如何表现得“最忠”，如何把“万岁”喊得最响。他打着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割裂、肢解毛泽东思想，搞了那本语录。正如林彪自己说的，这真是“一本万利”，“一通百通”，从此他不断花样翻新，更加疯狂地搞现代迷信，把毛泽东同志神化、偶像化，把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绝对化，破坏毛泽东同志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篡改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本质。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夕，搞现代迷信还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事，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付诸实践了。“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忠字歌；“天天读”，“雷打不动”；“讲用会”，“大赞大颂”；“红化”，“红海洋”；宝像，宝书，宝书台；“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好不容易打翻了的封建专制和迷信，现在又改头换面，风靡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疯狂地残害着中国人民。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中国。

文化大革命前夕，陈毅同志就发表过一系列言论，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作了正确的评价。一九六五年七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讲道：领袖终究是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主要靠集体，靠党，靠大家。他还说：我们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毛泽东同志。表明了他对领袖的科学态度。至于对毛泽东思想，陈毅同志更是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但又不全是毛主席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个人的思想是庸俗的。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发展，马列主义在发展，一个在发展中的学说，总不会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毛泽东思想还要继续接受考验，继续丰富，继续提高。有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但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否则就可以不动脑筋了。陈毅同志教育许多同

志：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会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这些话，说得何等的好！何等正确！它们是对林彪大搞宗教迷信的有力批驳和否定。然而这些话在文化大革命中统统被诬为“黑话”！

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同志坚持他的正确观点，而且鲜明地无所畏惧地表现了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一次讲话中说：毛主席过去在长沙第一师范当学生，他有什么？还是一个普通学生？不依靠党，他能胜利呀？他没有党，再有天才也没有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毅同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师生见面，他针对大家动不动就喊万岁的作法，说道：我们这些人，每天都见毛主席，有时天天见，也一见就喊口号、鼓掌吗？同年十二月六日；他在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有些上台表演也先向毛主席像鞠躬，这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几乎每天见毛主席，最近有时一天见二三次，也来这一套？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那股令人作呕的庸俗风气作了反复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外交部红卫兵成立大会上，给陈毅同志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有人建议让他当司令，陈毅同志当即说：我这个人不搞个人迷信。又说：对个人盲目崇拜，就是一种自由主义。在同年六月的一次讲话中，陈毅同志还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人们叫毛主席万岁，一个人是不能活一万岁的，但人民可以活一万岁。这些闪耀着唯物主义光彩的语言，难道不是对林彪搞的封建主义的“四个伟大”、“四个无限”以及所谓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最直接最公开的挑战吗？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甚嚣尘上的时候，任何科学地评价领袖都会遭到当年哥白尼在宗教裁判所所遭到的命运。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陈毅同志正是这样一个同志。

陈毅同志向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林彪自我吹嘘一贯“最忠最忠”，举得“最高最高”，学得“最好最好”，用得“最活最活”，跟得“最紧最紧”的时候，陈毅同志却严格解剖自己。在会见群众时，他好几次都坦然地讲道：“我不是一贯拥护毛主席的，如果说一贯拥护，这是撒谎。我过去几次反对过毛主席，但比来比去，还是毛主席对，我决定跟毛主席走。”这说明，陈毅同志是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正确，才决定跟毛泽东同志走的，决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种奴隶式的盲从；而且他跟的是真理，而不是那个个人。这种跟，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陈毅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是很尊敬很热爱的，他曾多次诚恳地讲过，毛泽东同志是他的先生。但他并不因此就断定在今后漫长的征途中，在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上不会同毛泽东同志发生任何分歧。这不是很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陈毅同志也敢于和林彪、“四人帮”的宗教宣传针锋相对。我们不会忘记，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现代迷信甚嚣尘上的时候，人们一张口就要先念“最高指示”，写文章一下笔也要先写“最高指示”，甚至打电话、买东西问价钱都得先说一句“最高指示”，谁“最高指示”背得多，谁就最忠，反之，就是不忠的表现。这些做法折磨着广大群众，群众处在一种不敢言的痛苦之中。陈毅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公开讲：我这个人不是遇事都把毛主席的话讲在前头，我认为只要思想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就行了。当时，上面下达文件，干部写汇报，写检查，前面总要先写几段语录。陈毅同志看后说：现在搞个公文，前面都加毛主席语录。第一次还看看语录，公文多了，我根本不看语录，谁拿到公文都着急看里面的内容！还说：这是框框，写了没用，光浪费纸。他一再告诫人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要空喊口号。教育青年人：我最近在广州看到一些人，在自行车上挂了一个

牌，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这太庸俗化了，我们不要学习这个。还尖锐地指出：‘学习语录最容易断章取义。’

有一段时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影响，红卫兵竟要求外国驻华使馆的人出去也要带语录、带毛选，要求外国开来的火车也如此。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陈毅同志批评道：去给人家送语录，强迫人家带语录，这样不行。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否则，外国人会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我们有的留学生在国外也学国内的样子，到处念语录，给人家戴纪念章。六六年十二月，陈毅同志接见了他们，指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是毫无经验的毛孩子不懂事的人干的。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在外事工作中刮起的极左妖风。在另外一次讲话中，陈毅同志更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外交人员也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衣，脖子上挂毛主席语录牌，手持毛主席语录，那岂不是像个牧师吗？

陈毅同志坚持用科学态度对待领袖、对待毛泽东思想，同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迷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

林彪、“四人帮”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广大的革命老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心病”，所以必欲去之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大造反革命舆论，危言耸听地宣扬党、政、军、文化、教育各界都“混入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咬牙切齿地叫嚷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林彪还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五一八”讲话，大讲所谓“政变经”，制造随时都会发生推翻党中央、毛主席的政变的假象，为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老干部制造口实。他还居心险恶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整干部的运动，立即把广大干部抛进挨整的地位。他还公然把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篡改为三条，前两条就是所谓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如何。谁不象他们那样搞现代迷信，谁就被他们诬为“不忠”，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他们手里这两根狼牙棒不知打杀了多少好干部。“四人帮”比林彪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毅同志在世时，他们那个反动透顶的政治纲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虽然还未正式出笼，但他们实际上已是这样干的了。他们倒转专政矛头，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全面专政”，特别把打击目标指向在中央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林彪、“四人帮”所结成的神圣同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我们党的许多老干部，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杀掉，却惨死在这些内奸的魔爪下，连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同志这样革命几十年，为人民立下汗马功劳的党的高级干部竟也不能幸免于难。

面对这种情况，陈毅同志怒不可遏，挺身而出，向林彪、“四人帮”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陈毅同志在同所谓“控诉驻外使馆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的代表谈话时，愤怒指出：现在的大字报越写越多，字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同志怎么成了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又说：“打倒大土匪贺龙”，贺龙同志怎么成了大土匪？这是中央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人家不会说你们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人？人家骂共产党是过河拆桥！陈毅同志还曾与谭震林、李先念同志到李富春同志的住处，面对林彪、“四人帮”在上海煽起的“夺权”黑风很快漫及全国所造成的混乱情况，十分义愤地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

师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师，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陈毅同志警告说：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陶铸同志被林彪、“四人帮”突然袭击，点名打倒了。这是怎么回事？陈毅同志与谭震林、李先念同志去向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同志也不清楚，回答说：不知道，没有讨论。以后陈毅同志在看大字报时，碰见已失去自由的陶铸同志，他向陶铸同志点头致意，温暖和鼓舞了处在险恶环境中的战友的心。

林彪、“四人帮”心狠手辣，为了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到处鼓吹除了首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几个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反对，都可以炮轰。这一下，全国几乎所有的干部都遭了殃，到处是一片打倒声。武斗，戴高帽，弯腰，下跪，游街示众，挂黑牌成了刮遍全国的一股黑风。正如陈毅同志所指出的：使人伤心啊！成千成万的干部被糟蹋了，搞得好苦！动不动就下跪，发泄私愤，揪住不放。一次检查不老实，二次检查不深刻，三次检查要花招，四次检查又有阴谋，五次检查蒙混过关，没有触及灵魂，检查死了也不解决问题。陈毅同志坚决地说：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又气愤地问道：现在毛主席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我们相信谁？就只这几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还大声疾呼道：反右的时候，搞过头了，世世代代结冤仇，这有什么好处呀？文化大革命这个搞法，受打击的人更多了，不得了啊，怎么不想一想！向林彪、“四人帮”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和其他许多老干部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同志本人也不断遭到攻击和诬蔑，而且因为他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断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此更加激怒了他们，对他的迫害也更加疯狂。但陈毅同志的骨头是硬的。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陈毅同志在机场说：前几天，我到了外交部，开大会，就是要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什么外交部长？我革命四十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在此前三天，即二月九日，他还讲过：什么都承认，讲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靠不住，是假承认，这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还说：把我这个桥拆掉不行！在另一次讲话中又说：有人要揪我，就是北京三百五十个学校，全国一二万个学校都来揪我，我也不怕，看看我陈毅到底是人是鬼？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也被批斗，陈毅同志质问道：把我老婆拉到大街上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这一切，都不能看成是陈毅同志对个人遭遇的不满。他的命运和广大革命老干部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在林彪、“四人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谁敢为“牛鬼蛇神”打抱不平是十分危险的，随时都会大祸临头。陈毅同志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他不怕。他说：我很坚决，我要这样讲，因为看到同志被斗，我的血管就紧张了。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又说：那么多老干部自杀，他们这都是为什么？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就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陈毅同志不顾个人得失，不怕被说成“反对文化大革命”，不怕当“保皇派”，尽其力量，努力保护干部。当时还在对外经委当主任的方毅同志，就受到陈毅同志的多方保护。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陈毅同志在谈到方毅同志时讲道：方毅同志在国民党时期坐了七年牢，受过电刑，是个好同志。解放后工作兢兢业业，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尊敬。当他知道方毅同志正发心脏病，却被斗得死去活来时大发脾气，说：对这样好的同志，你们为什么这样斗？二月十七日，对外经委的一些人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报告，指责方毅同志在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毅同志非常生气，指出这些指责毫无道理。三月十四日，陈毅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对外经委群众代表时，再次指出方毅同志是好干部，要求很快解放他，并明确指出这是对外经委的当前任务，说把方毅同志解放出来，对外经委的工作就走向一个新阶段。第二天，方毅同志作检查，陈毅同志亲自参加，宣布解放方毅同志。外交部的刘新权同志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当工作组组长，批判工作组时，被揪住不放，反复批斗。陈毅同志也多次保护他。六六年八月四日陈毅同志说：你们给刘新权戴高帽子，我亲自出来迎接他，请他吃饭。八月十三日又说：刘新权同志是老红军，革命几十年，我相信他有革命精神。外办的张彦同志，因在对外文委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工作组组长，也被揪住不放。六六年八月十七日，陈毅同志接见群众代表时指出：张彦有错误，但无权把他整死。这个同志工作三十多年了，总做了些好事，怎么能两个月犯了错误就给他一条绝路呢？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要帮助他改正错误。对外文委的副主任宋一平同志，曾长期担任武汉市委文教书记，运动中被揪回武汉。陈毅同志知道后很着急，安排人接二连三给武汉方面打电话，催促把宋一平同志送回北京。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陈毅同志在中南海接见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时说：楚图南这个人比较好，没有民主人士的自由主义，是比较正派的，是个很好的同志，至少是个二类干部。外文局某负责同志被打成“三反分子”，斗得半死，陈毅同志十分关心他，六七年三月一日打电话通知外文局，批准让他休息十天。当时，外事口的许多干部都受过陈毅同志的保护。因此有人说他是保皇派。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陈毅同志说：有人说我保，我就保，我保了刘新权、张彦、李昌、张闻天……以后他又说我保护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党的利益。那么多干部过不了关，对党不利。

在保护干部时，陈毅同志十分注意作群众的思想工作。在一次与群众谈话时，陈毅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道：在座的有很多干部子弟，如果你们爸爸妈妈也给这样斗，你们会怎样呢？在座的也有工农子弟，他们为工农打天下，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你们也无动于衷啊？陈毅同志教育他们：你们要主动地帮助这些老同志，使他们情绪不抵触，三十几年的老干部全炮轰掉，对党不利。对老同志要切实帮助，不要指责，要诱导。还说：你们也有缺点，你们也不是百分之百符合毛泽东思想，我还叫你们亲爱的同志；回国人员、大使、参赞也要革命，都是革命同志。当时，许多大使、参赞的生活问题也被拿来无限上纲，陈毅同志说：当大使买外国货究竟犯了什么罪？只要是薪水买的，就没有罪。教育群众：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们也可能当大使、参赞，把你们的生活问题也拿来上纲，怎么行呢？有些群众组织受极左思潮煽动，动不动就指责干部是牛鬼蛇神，给许多老干部戴了很多帽子。陈毅同志批评他们说：有的大字报写什么“罪魁祸首”、“刽子手”、“罪恶滔天”等，这不是解决问题，是在追求惊心动魄。还说：这些大字报水平不高，写大字报的人对他朝夕相处的领导动不动就用“黑话”、“毒草”之类的词句，这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不要主观上追求这个东西，否则就要犯大错误。又说：都是四十、三十几年，最短也是二十四、五年的老同志，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困难，几十顶帽子戴上了，要给他们取下来。就是对走资派，也要经群众讨论，征求他本人意见，不能压服，完全是说服，群众同意，他自己同意，然后从宽处理。有的群众组织动不动就抄干部的家，抓人，陈毅同志讲：这对我们不利。主要是打通思想，靠自觉，训一顿是没有用的，愈宽大愈能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即使是真正的反革命，也要交公安局处

理。还针对有的群众组织动不动就要把干部打倒的错误作法，陈毅同志说：也许人家讲，给共产党做三、四十年的工作，一犯错误，你们就把他整掉。干了三、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哇！还问道：将来你们掌了权，当了干部，群众拿这一套来对付你们，你们作何感想？陈毅同志还特别讲过这样一件事来教育大家：有个同志是旧北京市委的人，发电报要他回国参加运动时，明确说明要他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对他是考验，结果他回来了，路上未出事。就凭这一点也要给他说几句好话，给他重新作人的机会。共产党不要辜负人，他为党工作几十年，有贡献。陈毅同志的这些教诲，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对待干部的指导思想。如果文化大革命能按陈毅同志所说的这样对待干部，那将避免多少损失，少造成多少冤案啊！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猖狂的时候，陈毅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当然不可能得到采纳，但陈毅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林彪、“四人帮”这伙法西斯匪徒作了坚决的斗争，声讨了他们处心积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滔天罪行。现在，当历史已经作出结论的时候，人们更加敬佩陈毅同志为真理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

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许多人还没有识破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的真面目。特别是天真烂漫、生活阅历浅、没有斗争经验的青年，更容易受他们的煽动和欺骗，有些人在他们的唆使下，还曾干了不少错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透过他们的乔装打扮，看出了他们狰狞的魔鬼嘴脸，起来与他们斗争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参加者中，就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便是很好的证明。

陈毅同志有几十年的斗争经历，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是经过多次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假马列主义的政治骗子有很高的识别能力。再加上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知道林彪等人的底细，因此能较早、较深地看出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以及那个“理论权威”的鬼蜮伎俩，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凡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就窃据了党中央唯一副主席的要职，以后又在党章中法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被他那一伙抬轿子、吹喇叭的人捧到了天上。尤其丑态百出的是，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篡改历史，硬说南昌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林彪，而林彪竟还跟随毛泽东同志到过安源，组织和领导了安源的工人运动！在那个充满荒唐可笑、自欺欺人的一片乌烟瘴气中，谁还能说，谁还敢说林彪半个不字！

但是陈毅同志竟“不知好歹”，公然说林彪过去是他的部下，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林彪那张威严的不可一世的奸贼脸上戳了一下。这些可激怒了林彪的一些走狗，给陈毅同志加上了“极力贬低和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以后陈毅同志又多次讲道：嘴里讲革命讲得厉害的人不一定是真正革命的，真正搞革命的要做实际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伯达这个沉渣也泛了起来，左飘右荡，很出了一阵子风头。他明是一个大叛徒，却被封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明明是假马列的政治骗子，却给戴上“我们杰出的理论家”的桂冠，攫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大权，威风不可一世。但陈毅同志不买他的帐。早在陈伯达在对外文委进行反革命活动时，陈毅同志就注意他的动向，曾把他在对外文委支持和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打成“黑帮”的言行整理成材

料，打印送中央，态度明确地指出：陈伯达就是不对吆。不管是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对外文委撤离工作组，大会上，陈伯达叫嚷有人把他打成了反革命黑后台，并回过头来，要坐在后面的陈毅同志证明，他是不是反革命黑后台。陈毅同志故意不回答他的话，却用很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听不懂你的话吆！陈伯达想借陈毅同志之口洗刷自己，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到了同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揭露陈伯达说：有些人、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知道我们的艰难困苦，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那就行，不照他的意思办，那就是黑帮。陈毅同志当然不会照他的意思办，因此遭到了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坏蛋的陷害和打击，这正是陈毅同志的光荣。

陈伯达、江青，还有那个“理论权威”控制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利用自己的权力，为非作歹，为所欲为，谁要稍有不同意见，便立即被诬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陈毅同志对这伙坏蛋，进行了多方面的猛烈的抨击。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陈毅同志在外交部党委扩大会会议上说：“有人躲在背后，叫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他还说，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他们是少年得志，放肆狂妄、以势压人，这种人我才不相信能成什么事！多次警告他们不要太猖狂，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六七年二月十四日，陈毅同志在接见外事口的群众代表时说：有些人想权越大越好，权大方便，权小就感到味道不足。还曾说过：天天讲人家犯错误，犯方向性错误，自己却在那里犯悲剧。这些无不是对林彪、“四人帮”那帮野心家、阴谋家的揭露。运动初期，没有一个干部不犯“错误”，唯独这帮野心家、阴谋家“一贯正确”。有的同志想不通，陈毅同志讽刺地说：我们不能要求人家也做自我批评，让他们保持一贯正确，洁白无瑕好喽！还挖苦戚本禹说：戚本禹是个“左派”，他的话当然是正确的呀！但并不是每句都正确呀！还曾痛斥过关锋：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还在桌子下面爬呢！不要不知天高地厚！警告他太猖狂没有好下场！结果不久，关锋就垮台了，应了陈毅同志的话。在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躲在幕后，操纵青年学生胡冲乱闹的时候，陈毅同志曾有过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学生娃娃拉下马。谁都可以听出，陈毅同志所说的“学生娃娃”，是指谁，因此这句话为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万分忌恨，曾反复批判。

在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到处煽动大轰大嗡，大乱特乱，弄得人无宁日，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的时候，陈毅同志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在这里大胆地说，这种斗争方式，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诬蔑外交部是“卖国部”，执行了所谓“三降一灭”路线，陈毅同志则在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开宣称：外交部基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陈毅同志在六六年八月四日说：不要什么都怀疑，打破一切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能打破吗？他们诬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是“大毒草”，陈毅同志在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强烈谴责了他们：八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是中央通过的，现在也成了毒草，这是给我们伟大的党脸上抹黑。我一直在场，我要说话。他们以“破四旧”揪“牛鬼蛇神”为名，鼓动青年娃娃到处查封，抄家，陈毅同志说：红卫兵跑出来查封，这里也封，那里也封，搞得共产党毫无保障。还说：家里有古洋东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要跟着娃娃去闹。还反问道：现在有人把洋书也封起来，如果外国也闹革命，出现了红卫兵，毛主席著作就是洋书，也要封起来吗？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也影响到对外工作中，有人竟要在外事工作中提倡造反有理，反对温良恭俭让。陈毅同志批驳道：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内容是造反有理？国王会欢迎造反？在外交上能够不温良恭俭让吗？念语录、送纪念章能搞革命？靠不住。针对我国有些留学生在国外给人家送毛著，鼓动人家

造反，陈毅同志明确指示：不准乱搞！人家拿一本毛主席的书，回去就失业。还是搞一般友好，假使外国人在中国搞反革命宣传，我们也不同意。林彪、“四人帮”为了把全国彻底搞乱，搞了什么“大串联”，陈毅同志指责说这是包办代替，是犯方向路线错误，并且说道：跑到大街上瞎逛逛，这也是革命么？林彪、“四人帮”为了搞垮我们的党，一方面到处鼓动“造反”，另方面胡说党团员都是保皇派，加以压制和打击。陈毅同志问道：怎么说党团员都是黑帮？保皇派？他直截了当地说：极左派比保守派更容易坏事，派极左派到国外使馆工作还不如派保守派去。又说：做外交工作还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做，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去做，胡闹胡写大字报的人没有什么用处。组织性是政治觉悟的最高表现。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林彪、陈伯达还有那个“理论权威”一手导演了《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的闹剧，打出了搞乱全国的一颗黑色信号。第二天，陈毅同志就尖锐指出：《人民日报》不该登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也不对，登了报，叫人家看这个领导烂了，那个领导也烂了，这不是拆毛主席的台吗？陈毅同志还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的罪行，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明确指出：国家有没有前途看经济。以后又多次讲道：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生产是大道理；劝导群众：你们回去要狠狠抓生产，狠狠抓革命。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在接见对外经委群众代表时再次强调：业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业务停下来，还焦虑地指出：害怕抓生产，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几乎在一切方面，陈毅同志都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作了尖锐的斗争。有的同志，包括陈毅同志的亲人都劝他少说，但陈毅同志表示：我是共产党员，说了我应说的话，我没有什么可懊悔的。六七年二月，他还说：现在看起来，我以前讲的话过早，不合时宜，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还要恢复我的发言权，还是要讲话。陈毅同志就是这样不屈不挠地斗争着。

在坚决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作斗争时，陈毅同志也十分注意作群众的思想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他讲道：我要积极站出来讲话，讲政策。我到第二外国语学院去讲了话，不同意他们戴高帽，学生斗学生，引起很大不满，说我和稀泥，搞折中。但我有主张，我立场坚定还要讲，顶多罢官，开除党籍。明天我到外交部还要讲，要采取同样的态度。这一年的十月十三日，陈毅同志对部队同志讲话，说：我们完全欢迎你们搞路线斗争，而且十分必要，但是不要跟着他们乱搞。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林彪、“四人帮”之流。有些青年人听信林彪、“四人帮”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陈毅同志说：怀疑也要有根据，有事实，不要什么都怀疑。并且在六七年二月四日更进一步讲道：我要当左派也很容易，领头冲某个国家大使馆就行。我也曾设想，要是运动初期支持群众或许好些，牺牲些干部，换个左派的称号，但我不干。过分和过左的行动，终究有一天要向人家道歉的。当时，有些人特别热衷于整理别人的言论，动不动抛出来，陈毅同志对他们讲：现在讲一句话，你们记下来，搞得人不敢说话，不敢暴露思想。问他们：要是别人对你们也这样，你们怎么想呢？

针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在群众中制造两派，挑动内战，然后从中渔利的阴谋，陈毅同志特别注意消除两派分歧，努力促成两派群众团结。他多次明确表示：我不倾向这一派，也不倾向那一派，我只倾向团结。我不能站在多数派一边打击少数派，也不能站在少数派一边打击多数派。他循循善诱地教育大家：不要伤害同志的感情，不要冲动，伤了感情，怒目而视，吹胡子瞪眼睛，这没有好处，人家记你一辈子，一遇到机会就复仇。还教育青年人，人家搞了你们一些黑材料，有什么了不起？青年人要学得胸怀宽阔，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要为了小小一点事情不能忍耐，一触即跳，眼睛里卡不下一点点小灰尘，这个人不能成大

器。也不要参加到派性的斗争中去，这没有什么好处。当时，先是一部分同志挨了整，后来翻过来了，又要整别人。陈毅同志问他们：你们挨了整，讲起来痛哭流涕，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整人呢？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在中央，我是挨斗出名的，也斗过别人。我斗别人时，就想我被斗时的情形，我在被斗时，就想我斗别人时的情形。这样斗的方式就慎重些了。一九六六年八月，陈毅同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师生们见面，还讲了他当年在南方打游击时的一个故事。他讲道，有一次，他到某游击队去传达中央的指示，这支游击队因为与外界隔绝的时间较久，对他有怀疑，他一再说明，对方还是不相信，竟把他吊起来。陈毅同志说：这个游击队队长现在还在，也是一位领导同志，我们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要两派群众消除误会，团结起来。不久，陈毅同志与陶铸同志在政法干校礼堂参加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们的大会，他再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有人因此攻击陈毅同志是“和稀泥”，陈毅同志回答：有人说我是折中主义，和稀泥，有时候我和稀泥也很有成绩，和稀泥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陈毅同志疾恶如仇，对危害人民的事情，何曾和稀泥？但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在两派群众之间，就必须和稀泥。这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所说的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求大同存小异，是完全一致的；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居心险恶地把革命群众人为地分成两派，封这一派是革命的，把另一派打成保守的，挑拨两派的关系，甚至唆使和支持一派去砸烂另一派，蛊惑人心地说对于修正主义就应该这样，两者之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在给两派群众做工作时，陈毅同志多次提到毛泽东同志，拿毛泽东同志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说：毛主席是个挨斗最多的人，受的委屈，受的冤枉，受的不平的待遇，数他最多。他被撤职，宣布是机会主义，打入冷宫送后方休养，鬼都不上门，根本没有人去拜访他，什么人都不敢接近他。等他一上台，所有的同志都言归于好，也不让人家道歉。陈毅同志还拿自己作例子，说：我过去几次反对过毛主席，但他还重用我，称赞毛泽东同志不是狭隘的个人报复主义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使两派消除隔阂，团结对敌，陈毅同志真是苦口婆心，费尽了心力。可惜当时许多青年人并不十分理解陈毅同志的教诲，没有很好听从陈毅同志的劝告，现在回过头来看陈毅同志的话，是多么深刻、多么正确呀！

但是，对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权迷心窍、品质恶劣、不惜踩着别人一心向上爬的野心家，陈毅同志决不客气。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陈毅同志到机场迎接外宾，外宾来到之前，他对那些所谓“造反派”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他们不去造帝国主义的反，造苏修的反，专造我们的反！我是什么？我是反革命？当时一个“造反派”问他：报道此次迎接外宾的人名时，“造反派”可不可以上报？陈毅同志回答：这样的造反派上报，我根本不同意。那个“造反派”挑衅地说：我这不是请示你吗！陈毅同志生气地说：请示，不敢当！不斗就感谢你们了！当面请示，背后还不骂我的祖宗，典型的两面派！随即对在场的某老干部说：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交班不能交给赫鲁晓夫。四天以后又说：这样要我们交权，我们很寒心，我们不敢交，我们不放心哪！还曾一语道破地说过：有的人想把我整了，他可以立大功，当副部长，这是个夺权斗争。有的“造反派”夺权后，对干部和另一派群众实行专政，随便整人，以势压人，陈毅同志指出他们搞左了，伤了很多人，这怎么给你掌权，你掌了权还有得！这些话，不仅是对那些权迷心窍的人的鞭挞，更重要的是对唆使他们的林彪、“四人帮”这伙野心家的有力抨击。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各以自己的特点和不同方式，同林彪、“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他们象中流砥柱，面对着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黑风恶浪挺

立，前进，使人民觉得；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鼓舞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这中间，陈毅同志光明磊落，仗义执言，敢说敢为，不留情面，尤其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很快就被剥夺了权力，他的正确意见实际上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但他的斗争精神却感召着我们。这种精神在以后的斗争中，也将发生明显的影响。一九六七年二月，陈毅同志曾说过：事实证明，我去年说的许多话没有错，现在看来还得按我说的话做，如果早按我说的做，不会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历史不是已经作了结论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毅同志就说过：文化大革命可能搞好，也可能搞坏，文化大革命前途如何很难说。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再回头来看陈毅同志的这几句话，必然会有更深的感受。

四

由于陈毅同志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因而更加激怒了他们。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利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声势，利用群众一下子还识不破他们的真面目，对陈毅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安排下，陈毅同志作了检查，对自己的缺点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群众十分满意，周总理也给了充分的肯定，委托陈毅同志负责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还说以后他就要更多地转向其他部门了，表示了对陈毅同志的信任。反革命两面派陈伯达，迫于形势，当时也只好表示肯定，还说什么一个老同志能够这样，值得学习，等等。但事隔不久，他就露出了真面目，自食其言，收回了他的话。林彪、陈伯达、江青之流，暗地怂恿和唆使某些群众组织发难，重新掀起炮打陈毅同志的高潮。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他们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高喊打倒所谓“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掀起了一股反革命妖风。三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指示去掉陈毅同志的镜头。到四月份，北京的街头到处刷上了“炮轰陈毅”、“火烧陈毅”等大标语，紧接着，陈毅同志便被取消了领导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本来日渐进入正轨的外事口的运动又动荡和混乱起来了。这一年的五一节，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等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就窜到北师大，向谭厚兰等煽动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吆！”还说：“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吆！”反对陈毅同志的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编造谎言，说这个时期有一股所谓的“二月逆流”，而且还是我们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党事件”，陈毅同志就是这股“逆流”的黑干将。事实是，包括陈毅同志在内的我们党的一部分老同志，眼见得在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下，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好端端的马列主义政党，将被这一小撮坏蛋葬送掉。他们忧心如焚，怒火中烧。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再也忍无可忍，勇敢地站出来，大义凛然，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直到面对面地痛斥他们的胡作非为。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由周总理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以及有关同志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革命和生产的问题。陈毅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当然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谭震林同志就张春桥假借群众之手，迫害陈丕显同志，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多次指示，拒不放陈丕显同志来京的事，质问张春桥，揭露了张春桥的鬼蜮行为。他愤怒地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

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同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穿衣服，拿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不要走！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进行的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在此前三天，即二月十三日的碰头会上，同样进行过一场交锋。叶剑英同志对着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同志也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领导军队吗？”几位老帅还曾就军队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林彪进行过面对面的辩论。在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的一次军委常委会上，陈毅同志等几个老帅一致的意见是，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中央军委据此向部队发出了指示，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联。但林彪利用他窃取的权力，主持召开了另一次军委常委会，横蛮地提出要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包括陈毅同志在内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辩论：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经过斗争，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并搞了八条命令，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找了叶剑英、陈毅等同志，详细进行研究，认为八条很好，批准照发，以稳定军队。但林彪一伙公然对抗，冲击军队的事，不断发生。听到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被盗窃时，叶剑英同志在京西宾馆激怒地用拳头敲着桌子，警告想要搞垮军队的野心家说，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同志一把掀掉跟前的桌子，愤怒地说：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以上几个回合的斗争，打到了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痛处，他们恼羞成怒，说这是什么“大闹怀仁堂”，诬之为“二月逆流”，在全国展开了反革命的反击和围剿。除了参加在怀仁堂对林彪、“四人帮”面对面的斗争外，陈毅同志在另一次会议上还说过：赫鲁晓夫反对别人整人，但上台后，整别人更厉害。还说：我们考察一个人，不能看他的花言巧语，要看他的实际。他们都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将来真正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可能正是他们！在当时，谁竟敢提不同意见，对林彪稍不恭敬，谁就是反革命。林彪的老婆叶群就当着陈毅同志的面说：“你这是反对林彪。”其实，陈毅同志讲这些话时还不专指林彪，不过是从规律性上揭露了一些人的面目罢了。但这些却进一步触怒了林彪、“四人帮”，说陈毅同志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加紧了对陈毅同志的诬陷和迫害。他们把怀仁堂的斗争情况捅给他们操纵的群众组织，编造出陈毅同志“黑话”一百例，广为散发，鼓噪着一片“打倒陈毅”的叫嚣声。与此同时，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林彪、陈伯达一伙对李富春、陈毅等同志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其中数那个“理论权威”和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叫嚣得最凶。他们恶毒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六七年三月十八日，陈毅同志回到家里，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四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伙反动家伙，受到批判！”到了这一年的七月，在林彪、

陈伯达、“四人帮”的暗示、支持下，外事口出现了所谓“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戚本禹和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几次来到现场指导，叫嚷这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当时已完全把陈毅同志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来打了。八月七日，伙同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在武汉血腥镇压了革命群众后回到北京不久的王力，接见了所谓“揪陈大军”的代表，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不但要把陈毅同志置之死地，而且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总理。八月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批判陈毅同志大会，大会进行中，一小撮人无视周总理的指示，撕毁原来达成的不喊“打倒陈毅”的口号的协议，搞突然袭击，公然从二楼挂下“打倒陈毅”的巨幅标语，还有少数人，甚至要窜上主席台揪斗陈毅同志。他们还从监狱里弄来一个反革命分子对陈毅同志进行“控诉批判”，叫陈毅同志向这个反革命分子低头认罪。周总理指示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愤然离开了会场。而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却无动于衷，实际是默许和支持少数人的胡作非为。

陈毅同志曾经说过：我的问题也和文化大革命一样，要有反复，但我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党会做出正确结论。陈毅同志的相信没有错。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怀陈毅同志。当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四人帮”就妄图对陈毅同志下毒手，借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工作组攻击和反对陈毅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但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无视毛主席的指示，仍然对陈毅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叛徒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同志“要搞政变”。那个“理论权威”马上接着说，“我对徐向前、陈毅也有意见”，诬陷老帅们“要搞政变”，妄图把老帅们一网打尽，以解他们心头之恨。敬爱的周总理对陈毅同志关怀备至。在危险关头，宁肯自己冲在前面，也要保护陈毅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一次会上，有人公然对抗周总理的指示，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站在灼人的阳光下，坚持不进会场，直到他们灰溜溜地把标语摘下，才同意开会。八月十五日，人民大会堂再次召开万人批斗大会。那个公检法负责人操纵大会，一心要搞臭陈毅同志。周总理质问他道：“搞臭了陈毅同志谁来当外交部长？你来当外交部长？”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又一次批斗大会召开的前夕，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的周总理，又遭到一伙人的长时间围攻，以致心脏病复发。周总理坚持给他们做工作。大部分人都听总理的话，一小撮人还借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淫威，有恃无恐，继续胡闹，扬言要冲击会场，拦截汽车，绑架陈毅同志。周总理万分气愤地警告他们：“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还有一次，陈毅同志在外交部参加会议，一些人突然冲进去，会开不成了，同志们让陈毅同志在保密室里暂避，外面有警卫把守，然后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派车来接。有人竟给汽车轮胎放了气。八月十一日的大会，周总理担心路上有人拦截，提前一天让陈毅同志到人民大会堂住下等着。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下，陈毅同志才没有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毒手。

但林彪、“四人帮”杀人之心不死。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把陈毅等六个老同志分割开来，每人成立一个专门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陈毅等同志带着病弱的身体出席会议，有时连请假写“检查”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稍事休息。紧接着，他们又对陈毅等几个老帅进行精神折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通过所谓疏散，对老帅们实行“围而待歼”。被批斗的几位老帅，一家老小全都分散各地，不能互相通信。陈毅同志先被弄到南口机车车辆厂进行“调查”，以后又被疏散到石家庄“蹲点”，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党的“九大”召开前，林

彪、“四人帮”精心制定了一个推选代表的标准，把是否跟着他们干和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作为主要条件。按照这个标准，陈毅同志这样忠于党、忠于人民、敢于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人反而选不上。陈毅同志愤怒地说：按这个标准，我就当不了代表。他们竟恶狠狠地说：“你可以当右派的代表”，肆无忌惮地对陈毅同志进行侮辱。还故意把陈毅同志放在“四人帮”的老巢上海选区，而且作为文化方面的代表蒙受羞辱。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一次万人大会上，居心险恶地攻击陈毅同志说：“有人吹他会打仗，其实他只会下棋，打打扑克，写几句歪诗，是常败将军。”他们还以办学习班为名，发给代表们人手一册私整的陈毅同志的黑材料，要代表们到北京后，“立场坚定地和政治局的老同志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放肆地当面攻击谩骂陈毅同志，这种卑劣行径曾受到周总理的痛斥。以后陈毅同志两次参加中央会议都被编在华东组，始终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他们一帮子小兄弟围斗的主要目标，会场上喧嚣着无休止的辱骂，扣过来的是一顶又一顶重得可怕的大帽子。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四人帮”反对和攻击陈毅同志的手段更加卑鄙。周而复同志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充分肯定了陈毅同志领导上海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成绩，小说中有几十处提到“陈市长”。这如同肉中刺，眼中钉，使“四人帮”浑身不舒服。经过密谋策划，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恶风黑浪，在一个月内，被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就连发五整版的批判黑文。他们之意不在评书，而在反党，借机攻击陈毅同志，否定他在上海执行的正确路线，诬蔑他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攻击他执行的无产阶级统战政策是什么“阶级调和”、“右倾投降”、“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等等，为他们篡党夺权鸣锣开道。张春桥说要“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其目的即在于此。以后，上海有一个叫桑伟川的工人，反对他们这种鬼蜮行径，勇敢地站出来，写文章和他们争论，他们竟如临大敌。张春桥叫嚷要“抓住桑伟川这个活靶子不放”，继续大作文章，恶毒攻击、诬陷陈毅同志，并把桑伟川同志投进监狱。

一九七〇年，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陈毅同志因在石家庄“蹲点”的关系，被编到华北小组，正好碰上大野心家陈伯达。陈伯达在小组会上搞突然袭击，贼喊捉贼，煽动说有野心家、阴谋家要否定毛泽东思想，不承认毛主席是天才，甚至要搞政变。有人就当面指着陈毅同志说：这就是你。陈毅同志又一次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围攻。九届二中全会后，以批判陈伯达为主要内容的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这一运动的锋芒直指林彪反党集团，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四人帮”。他们心惊胆颤，串连一起，彼此呼应，狼狈为奸、竭力扭转批陈整风的方向。他们玩弄的一个颠倒黑白的毒计，就是继续对陈毅同志实行陷害，放出一股所谓“二陈合流”的谣风，竟然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同志与陈伯达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还煞有介事地在陈伯达的罪状上加了一条“与‘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结起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云云，借刀杀人。张茜同志在机关里听到风声，气愤极了。陈毅同志得知后，动处之泰然，并劝张茜同志，用不着为这种事生气。他说：我们党内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造成这样一种风气，进行批评可以不要事实作根据。那些大讲“二陈合流”的人，恰恰就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起哄十分卖力的人，他们何时能有一点自我批评呢？还说：毛主席把意见讲得很清楚，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陈毅同志在石家庄“蹲点”时，就经常感到腹部疼痛，但由于政治上处于受迫害的境地，得不到及时的认真的诊断和治疗。一九七〇年冬回到北京，到三〇一医院治疗，本已说好住院，但临时却说没床位，叫在家里等着。原来是林彪的一个死党，一个人就占了五个单元的病房。有人就陈毅同志治病的事情示他，他说：“他要来，我就走”，一直拖了许多时候。

后来这个死党走了，陈毅同志才住进去，但也没有查出病因。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大痛难忍，才再次赶到医院，仓促中以急性阑尾炎的诊断动大手术，手术进行中才发现是直肠癌造成的肠梗阻。开始，医生把真实的病情向陈毅同志隐瞒着，但为了治疗的需要，后来还是讲明了。陈毅同志听罢，笑着对医生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除，再长出来再切除，没有什么了不起，表现了对这种可怕疾病的蔑视。

不久，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是对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的一件大事。林彪反党集团以守为攻，一面由几员大将登台作假检讨，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陈毅同志因做抗癌治疗，向会议请假。林彪的几员大将求之不得，乘机扣发全部会议文件，对陈毅同志封锁消息。但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陈毅同志感觉到斗争正在深入。他相信林彪反党集团的最后败亡为期不远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武装叛乱的阴谋败露，林彪带着几个死党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罕的沙漠里。二十日左右，陈毅同志听到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正式通知，他当即提议在场的同志为我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胜利举杯祝贺，并郑重地向党中央建议：要追究林彪在中央和各地的死党，要彻底批判他们那条谋国害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当时陈毅同志心潮起伏，联想到许多问题，与张茜同志一起讨论“九·一三”事件给予我们党的深刻教训。他翻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的《放言五首》，要张茜同志全文抄录下来，并交给子女们阅读。其中一首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对于人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林彪一类骗子有很大帮助。

为了揭露林彪，这一年十月，党中央决定召开有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当时，陈毅同志癌症加重，但精神仍旧十分振作，一直保持着那种奋不顾身、十分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旺盛的斗志。他带病参加战斗，投身到批判林彪的斗争中去。在老同志座谈会上，他作过两次长篇发言，集中揭露在我们军队初创时期，即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到开辟中央苏区这一段林彪所犯的错误。在林彪猖狂时期，这一段历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曾经当过逃兵的林彪，被打扮成“壮志坚信马列”的英雄。为了证明林彪是天生的“圣人”，他们从头开始伪造历史。陈毅同志愤怒地斥责他们：伪造历史就是犯罪，无情地揭穿了林彪的老底。会后，陈毅同志又认真修改自己的发言稿。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陈毅同志又一次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正当党和人民需要老一辈革命家贡献丰富经验继续战斗的时候，陈毅同志的病情却迅速恶化。这一年的十一月二日，他突然呕吐，以后就基本上不能吃东西了。他想亲自动手把自己的发言稿整理出来，终因病情恶化而未能如愿。进入一九七二年，陈毅同志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一月四日，叶剑英同志去医院看望他。他好象有很多话要说，但却没有力气讲出来，只听见他吐出这样一些不连贯的词句：“党中央”、“红军”、“一直向前，战胜敌人”。陈毅同志临终还挂念着自己敬爱的党、亲爱的军队，还充满了对战斗生活的向往，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我们敬爱的陈毅同志与世长辞。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深为悲痛。毛泽东同志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向张茜同志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勉励他们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总理致悼词。但当时还在台上的丧尽天良的“四人帮”一伙，不但不肯推倒他们加在陈毅同志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辞，而且还对陈毅同志的悼词施加影响。据说在最初的悼词中，“四人帮”要“功过全提”。本来，任何人都有功有过，世界上从事没有一个完

人。问题是，“四人帮”想通过所谓全面评价，进行继续诬陷、否定陈毅同志。只是因为周总理的坚决斗争，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陈毅同志曾多次说过：“终知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光荣”。知陈毅同志者周总理也，因此悼词中有“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样朴实的也是崇高的评价，概括了陈毅同志一生所走过的光辉道路。中国人民为失去了陈毅同志这样为自己利益奋战了一生的好同志万分悲痛，纷纷写信给张茜同志，对陈毅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张茜同志及其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人民的悼念是对陈毅同志的最高的赞誉。广大上海人民则群起谴责“四人帮”对陈毅同志的诬蔑，并纷纷要求追悼和纪念陈毅同志。大工贼王洪文知道后，竟然恶狠狠地叫嚣：“上海有一股为陈毅翻案的歪风”，指令其党羽爪牙进行镇压。以后他们还说，一九七二年复辟年，其开始就是一月六日，不但把矛头指向陈毅同志，而且指向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

批判林彪时，一贯和林彪打得火热、狼狈为奸的“四人帮”一伙，却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反林的英雄，好象林彪恨的是他们，而他们是一贯反对林彪的。那个寡廉鲜耻的江青就多次这样标榜过。这又是一个以假乱真的标本。陈毅同志曾针对这一点对子女说：还记得“二陈合流”那股谣风吗？当时是有人借批判陈伯达大捞政治资本，现在批判林彪，他们又捞了一把。斗争很复杂，也许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看清楚。你们是可以盼到分晓的。陈毅同志的预见没有错。他逝世后不到五年，“四人帮”这一伙便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人民和历史终于作出了铁的结论：林彪、“四人帮”这伙利令智昏的丑类，他们越是诬陷陈毅同志，人民群众对陈毅同志越是尊敬和爱戴；他们越是向陈毅同志喷吐污秽，陈毅同志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越是光辉。陈毅同志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不过是一堆臭狗屎；陈毅同志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他们不过是牛蹄坑里的一团尿水。他们喷向陈毅同志的污秽，最后全部掉下来，恰恰淋在了他们自己头上。陈毅同志将流芳百世，他们却要遗臭万年。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陈毅同志写了一首《题西山红叶》的诗，其中有这样四句：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这首诗，不正是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同志的写照吗？寒霜愈重，愈显出红叶的娇美；陈毅同志的英雄本色，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和黑风恶浪中更加充分显示出来。

(选自《回忆陈毅》)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 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组织传达讨论的工作，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现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党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一月底改组了北京军区。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挖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

林彪一伙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死不改悔。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接着又从上海去杭州，找他们的同伙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①从杭州回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已在上海的

^① 空军党委办公室（即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同）原副处长

李伟信^①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林立果要立即把周宇驰^②从北京叫来商量，并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

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③、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④，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⑤，开了一整夜。据陈励耘交代，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

根据缴获的于新野的工作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一伙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⑥、于新野等，在四月二十三日晚开了一个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问题。据李伟信交代：于新野对他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林彪、叶群要搞“571”，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⑦、程洪珍^⑧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二）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各地方、各部队、各单位的揭发及案犯的交代，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一、建立反革命的政变的组织和据点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林彪、叶群继续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据缴获的程洪珍的工作日记记载：

① 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

② 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

③ 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

④ 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

⑤ 所谓“三国”，是指王、陈、周；“四方”，指江、王、陈、周。

⑥ 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

⑦ 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

⑧ 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

这次会议，“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从这些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量的通信、电台、窃听、录像、录音、照相、警报器等进行特务活动的器材装备，大量的枪支弹药，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

二、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一伙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四出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林彪一伙到处进行反革命宣传，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他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现在的斗争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有人要夺林副主席的权”，“林彪不当国防部长，就完全架空了”。他们说：“要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这是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反革命谬论，是林彪提出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的继续和发展，更加露骨地暴露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他们狂热地吹捧林彪，到处散布黄永胜、李作鹏、刘锦平^①等人炮制的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周赤萍^②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在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再版三百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他们叫嚣《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没有突出林彪的“功绩”，他们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的党史材料和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大肆吹捧林彪。林彪一九六九年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词中说：“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要翻历史的案。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诗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同时，林彪一伙利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空军某部现场会议，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林彪一伙胡吹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的接班人”，林立果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继续反对“九大”路线，反对毛主席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拒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林彪一伙坚持“天才”的反党纲领，顽固地认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林彪一伙到处大讲“天才”，胡说什么“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不承认天才，“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的混合”，“极左派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他们鼓吹“应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继续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叫嚣“我们要承认天才，学习天才，宣传天才，保护天才”，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舆论准备。

三、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

① 民航总局原政委

② 福州军区原政委

林彪、叶群、黄、吴、李、邱一伙，采用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像，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欺骗和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九月初，林彪一伙派出了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王飞①、胡萍②、鲁珉③、李伟信等，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

四、秘密建立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专案”

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秘密的“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叶、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五、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一伙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由王维国组织了名为教导队、实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林彪一伙根据《“571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搞到了一批武器装备，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六、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彪一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秘密地组织了所谓“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特务组织。林立果通过米家农④组织的“战斗小分队”，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林彪一伙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这种“战斗小分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他们是是可以教育好的。

七、秘密组织情报网，进行特务情报活动

林彪一伙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

①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

②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

③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

④ 广州民航局原政委

报”的反革命计划，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他们使用打进去拉出来、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想方设法探听毛主席的行动路线。

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①、王璞^②、顾同舟^③、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为他们“站岗放哨”，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

他们还大量地搜集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从北京、广州等地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手抄的这种情报。

八、为反革命政变建立通信网

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拟定的准备“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制电信通信装备。林彪一伙大量盗用通信装备器材，私调几十对专线，以北京为基点，组织秘密通信网。他们还试制了代号为“01工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林立果要求这种收发报机，通信速度快，保密性能好，体积小，便于伪装，要求能在市内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在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使用。

九、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坦克、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林彪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指使其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飞行训练和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先后十次去某坦克部队秘密学习驾驶坦克。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十、窃窃航行资料，为叛国投敌作准备

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察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指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政变。林彪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的反革命“联合舰队”迅速地沉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了，而毛主席率领的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他们鼓吹的“江田岛精神”，不但仓惶逃命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不实行，一小撮死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实行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受林彪一伙欺骗和蒙

^① 武汉军区原政委

^② 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

^③ 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

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在觉醒起来，反戈一击，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分子，大多数正在向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同它的作者们一道，已经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它如同一切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林彪及其一伙怎样要两面派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不知道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彻底地揭露了林彪及其一伙的伪装，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林彪这个口口声声称着“高举”、“紧跟”，“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

《“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时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用“独裁者”、“暴君”这种胡言乱语，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咒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①。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咒骂列宁是“独裁者”^②。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曾经咒骂斯大林是“专制君王”^③。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又疯狂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④、“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⑤。林彪和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阴谋家、叛徒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一模一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由于他们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体系所决定的。

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这种攻击和谩骂，毛主席早就痛斥过。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八七页。

②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共产主义》第三十四页。

③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四〇页。

④ 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⑤ 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

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破除迷信》的重要讲话。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场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样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我国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是极端狂妄，又极端虚弱的。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指出：“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林彪一伙正是按照这条规律办事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一伙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团结，林彪一伙要分裂；我们要光明正大，林彪一伙要搞阴谋诡计。总之，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轮。其结果，就只能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曾经指出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林彪及其一伙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在《“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个反革命文件。通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逐条逐段的批判，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并且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大大激发我国人民战斗的意志，坚决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中美联合公报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美双方二十七日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公报全文如下：

联合公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尼克松总统于二月二十一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

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新华社上海 1972 年 2 月 27 日电，载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

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三十年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反复强调了这一方针，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严肃地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党坚持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促进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在当前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斗、批、改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于落实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有着重要意义。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分清是非，目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二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努力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进步。

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犯了错误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毛主席指出：“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定，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要提倡顾全大局。”对犯错误的同志的处理，要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要关怀他们，教育他们，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就要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都要在革命实践中努力学习，**斗私、批修**，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我们应当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同志，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真学习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排除“左”、“右”干扰，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我党历次两条路线斗争证明，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得到广大干部和党员衷心拥护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是我们党不断巩固、兴旺、发展，革命事业不断前进和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我们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说明了毛主席正确方针的巨大威力。只要我们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方针，就可以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中，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

目前，高等学校一九七二年春季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一九七〇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各级领导对招生工作一般比较重视，注意发动群众，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较好地完成了招生任务，促进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发展。

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

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为了反对特殊化，纠正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现通知如下：

(一) 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方法上要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选送学员的地区和单位，要把中央有关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本地区、本单位的选送名额原原本本告诉群众，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推荐选拔；审批机关要了解群众评议和推荐的情况；学校要认真进行复审，有关领导机关和选送单位要给以支持。

(二) 各有关领导部门、选送学员的单位和招生的学校，要按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招生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应及时向当地有关党、政、军领导机关反映。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三) 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都要按招生条件办事，即：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本通知发到县、团和各高等学校。通知内容要向选送学员的基层单位的干部和群众传达。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 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 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 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 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二年七月)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谎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貫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人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

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应钦办的东路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〇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

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炭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邮中复的父亲邹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去，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

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〇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

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¹⁾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

把周培源⁽²⁾同志来信⁽³⁾和我的批评及你们批件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注：

- (1) 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给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批语。
- (2) 周培源：一九〇二年生，江苏宜兴人，物理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 (3)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同志对周培源同志谈话中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除。七月二十日，周培源同志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现在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一九六三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三十二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三十二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的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他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 培 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毛泽东对邓小平八月三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握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

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附〕 在江西的日子里

毛 毛

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辛酸，使人激愤，也从思考中得到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通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文革”的狂流冲得漂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下乡接受“改造”，只有我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一人留在北京。所以我的父母仅带上祖母，三人于10月20日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越被“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半个中国，直到江西。由于长期关押，他们对外面的政治形势发展所知无几，对这“一号通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尚不清楚。但能脱离在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重新与家人相见，无疑是令人高兴的。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一位省军区的“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之类。几天后，他们就被送到了以后一直居住了三年多的地方。那是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里面。从南昌坐20分钟汽车到望城岗，从步校大门进去，是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沿着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围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之内还有一圈竹篱。圆形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红砖小楼，原为步校校长所住。楼前四株月桂，楼后有一小小的柴房。楼上是两间卧房和一间起居室，楼下有厨房、饭厅。另外几间则由派来监管的人员居住。这个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现在偌大一个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堂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阑人寂之时，远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三位老人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活。三人中的壮劳力是时年65岁的父亲，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母亲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200左右，但她不顾头晕病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母亲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父亲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200余岁，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我的祖母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解放前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练了她那坚强的性格。解放后，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文革”以后，她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被扫地出门，从家里撵了出来。她毅然担起全家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重担。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到江西之后，她更是做饭、洗衣，努力替我父母分担忧愁。她一字不识，但一辈子生活际遇的坎

坷，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在那几年中，她能和父母一样地保持那种平和远视的乐观气质，使这个新家格外得到了镇定与生气。

生活刚刚安顿下来，冬天已然来临。南方的冬季，又无防寒设备，冷起来室内常常结冰。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甚至整日卧床不起。这是一个多么难过的寒冷阴暗的冬天！但三位老人齐心努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对付寒冷，父亲居然每日用冷水擦身。我想，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才能战胜严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土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含苞待放。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荫遮路。雪白的栀子花沿路皆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小院子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湿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乎特别招人喜爱、善体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使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1971年在父母的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种拿人不当人的日子里，象他这样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残疾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他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无权享受大学生的待遇，自然没有工资。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哥的情形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哥哥总算回到了父母身边。三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副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

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人，一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宣队进驻北大，被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个班的工作。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象我哥哥这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一家人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小人，他们就象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象王师傅这样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我的父母到江西后不久，在他们自己的申请下，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工厂离我们的住处仅20分钟的路。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厂劳动半天。父亲作的是锻工。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做过锻工，虽然时隔多年，他干起活来还是那样的认真、熟练。母亲则是做拆洗线圈的工作。父亲当时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日上工都由人特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两位老人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感动了工人们。工人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共同的劳动生活使他们对他产生了同情。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与我父母之间的情谊愈加亲密起来。工人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药等生活用品，还帮我们磨米粉。父母上工的路上有一段十分泥泞。父亲已是年近七十的人，难免步履不稳，有一次滑倒摔了一跤。工人们知道了，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还有一次，那是我弟弟第一次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探亲。一家人团聚真是高兴了一场。不久假期已满，那天早上下小雨，送走了弟弟之后，父母亲照常上工。弟弟的走，无疑使父亲十分难受。上工后不久，父亲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了。工人们看到后，立即扶他躺下，拿自己的糖冲水给他喝，又照料着用拖拉机把父亲送回家中。三年之中，我父母虽是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改造，但工人同志们却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爱护。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了父母体魄；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从工人同志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在这几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值得记忆的是，就是在这个工厂里，父亲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在江西那种被软禁的环境里，政治消息极其闭塞。

1971年10月1日，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国庆活动，当时我们就感到十分诧异。11月5日，突然通知我父母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在家中等待父母时，因不知是福是祸，真是急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时分，父母二人回来了。因监视的人在场，他们什么也没说。母亲把我拉到厨房，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又无法发问。直等监视的人吃饭去了，我们全家才聚到一起，听母亲讲述文件内容。父亲显得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父亲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林彪的自我灭亡，在历尽劫难的“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对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无疑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自此以后，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林彪在江西的爪牙程世清倒台后，新省委白栋材、黄知真同志探望了父亲，撤换了态度恶劣的原监管人员。于是我们的生活气氛变得轻松了一些。不久，中央根据我父亲的请求，同意我哥哥回京治病。我送哥哥回京之时，适逢1972年“五一”节前。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王震同志叫我去。在此以前，我虽从未有幸见过王老，但久仰“胡子叔叔”的大名。当我到北太平庄他的住地时，只见一位削瘦的老人急步迎了出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十分热情地问“爸爸好吗？”当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胡子叔叔详细地问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胡子叔叔还留我在他家吃饭住宿。自“文革”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1972年底，我的父母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父亲的老秘书，从20岁起便追随我父亲、“文革”中受尽了磨难，当时正在江西干校劳动的王瑞林同志获准随行同往。父亲一行游历了井冈山，凭吊了革命遗迹，重访了瑞金等地。在赣南的行程中，还参观了闻名中外的瓷艺之都——景德镇。可惜，景德镇瓷厂竟为林彪、程世清一伙改成了制造什么“水陆两用车”的工厂！车未造出，精美的瓷芯却几乎破坏殆尽。他们参观的时候，瓷厂的工人们正在努力恢复瓷器生产。工人们热情地欢迎父亲一行，并送给他四个特制的花瓶。我的父母十分珍爱这凝结了工人同志们心意的礼品。这四个美丽的瓷瓶，随着我父亲经历了第三次政治起落之后，现在还摆在我的办公室内。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1973年2月，中央通知我父亲回北京。在江西度过了整整三年多的时光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人于2月20日乘火车启程，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去江西之时，只有孤零零三位老人。离开江西时，竟有祖孙四代近十口人了。我们全家人对这曾经羁旅三年之地，对那红砖楼房的小院，对江西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充满怀念之情。

车速飞快，汽笛长鸣，北来的寒风已然拂面。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那更加激烈

的、震撼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政治动荡，就要揭幕了。

(原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卷)

〔附〕 邓小平在 1969——1972 (节录)

表之伴

“一号命令”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多。林彪凭着他在战场上几十年的厮杀，对形势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敏感。他清楚，被打倒的老帅，被打倒的中央领导干部，是倒而不僵，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他的极大的威胁。他想到要尽快掌握最高权力，就必须利用一个更有利他的形势。于是乘毛泽东外出之机，签署了一个“一号命令”，借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名，全军处于随时出击的一级战斗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三天内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安徽、江苏、云南等省，由当地省军区负责监护。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政治迫害，名曰“战备疏散”，实际上是把他们放在林彪自己控制的省份进行各种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以达到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

中南海。邓小平家中。

当“一号命令”下达到的时候，家中只有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培根三位老人。五个子女，下放的下放到边远山区，被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尚在医院之中。仓促中被撵出北京，真是“风萧萧兮秋水寒，此去京城兮何日还！”邓小平心中翻动着苦涩的波涛。国家陷入灾难的动乱，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其命运真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任风雨飘摇。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引起他的惊恐。革命历程的风雨已经给了他艰苦的磨难。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受的第一次残酷打击，自己被发配到敌我交界的边远地区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当时与自己同时受迫害的毛泽覃、古柏同志在不久后的岁月中，留在江西，死于敌手。自己作为幸存者，作为执行毛泽东路线而被迫害的幸存者，今天，因为抵触这场文化大革命，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仓促中，命运之舟又将漂向何方？在五十年代，他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令海内外人士震惊的壮举，历史没有嘉奖他的远见，而遭到批判；在文革之初，他派出的工作组，旨在纠正“文革”的极左倾向，因而又受到空前的打击。在首都乃至全国，打倒他的标语铺天盖地，打倒他的口号的声浪山崩海啸。人们坚信“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教导具有真理的价值，这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肃清党内象他这样的人吗？年青人对他的敌视，正是可以被人利用的武器。此刻离开京城到一个暴乱随时可以降临的省份去，看来命运的小船已不为他自己掌握。在历史中某一特定的时刻，一位能指挥百万雄师的统帅，可能不如一个狱卒更能掌握自己。这些历史的风云，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啼笑皆非的故事。

此刻，有一双巨手在与邪恶的势力作顽强的抗争，这就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

当总理知道林彪的“一号命令”后，异常气愤，他一眼就看穿了“一号命令”的真实意图。他一方面巧妙地将“一号命令”的真实用意告诉毛泽东，一方面冒着风险，以合法的身份给各

地打电话，提醒他们要保护这一批老干部。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总理给江西打了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长途电话。接话人是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总理知道，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曾写过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用程世清后来的话来说，这是买了一张上林彪贼船的船票。这足以说明他是紧跟林彪的，如不打招呼，有可能对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同志施加种种迫害，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即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铃又响了。

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听筒，知道这是来自北京中南海的长途电话。马上，耳机传来熟悉的声音：“喂，你是程世清政委吗？”

程惠远听到这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一猜便知道是周恩来总理。

“总理，我不是程世清政委。”程惠远报告说。

“我是周恩来，你是谁呀？”

程惠远确认是周总理后，报告说：“我叫程惠远，是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程政委下乡去了。”

周总理又问：“杨栋梁司令员哪里去了？”杨栋梁当时是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副主任、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

程惠远又答道：“杨司令员也下乡去了，他们常下乡，常在下面跑。”

总理听了，笑着说道：“那好。”

接着，总理又问：“你担任什么职务？”

“总理，我担任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回答。

总理停了一下又问：“程惠远同志，你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这是个很细致的问话。

“我不是地方干部，是军队干部。”程惠远很敏感地回答。

总理仍不放心地问：“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起从济南部队调去的呀？”

程惠远赶紧回答：“我不是，是从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调来的。”

总理听说程惠远是从北京中央军委调去的，如释重负地说：“很好，很好！”

总理停了一下严肃地说：“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黄先当时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向程世清同志报告。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点，接触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总理又问江西有无暖气，总理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不习惯，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饭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儿要很好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核心领导小组要帮助他们。”

程惠远听到这里，深为总理对老干部的细致关怀所感动，也感悟到总理为什么要详细地问他的履历，这是一种怎样的信赖啊。

总理在讲完这件事后，接着又说：“第二件事大概汪东兴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已告诉你们了，你知道不知道？”

程惠远报告道：“没有，不知道。”

总理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动力，也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向他汇报一下，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汪东兴同志打个电话再定下来。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总理讲到这里，十分客气地说：“你们江西的工作不错么，毛主席不是今年到过你们那里么？对你们的工作也很满意。”

程惠远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总理，我们的工作差得很远，跟中央的要求还很远，比兄弟省差距还很大。”

周总理最后勉励程惠远：“那当然还要好好努力，不过你们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最后，周总理又不放心地重复地加重语气说：“你向程世清政委报告一下，要研究一个具体意见。”

程惠远连连表示：“总理，我这就向程政委报告。”

总理见对方表示认真安排，这才放心地把电话放下。

透过长长的电话线，在线的另一端，站着一位怎样的智者啊，他日理万机、彻夜不眠，为着祖国的兴亡，为着人民的冷暖，一颗心被纷纭的世事缠绕着。

接到周总理的电话后

程惠远接罢周总理的长途电话，不敢丝毫的怠慢，立即把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分别送文道宏（当时为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副主任、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先、陈昌奉（当时为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保卫部长）看完后，接着安排了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就乘一辆吉普车直接向紧靠安徽边界的婺源县奔驰而去。

婺源位于江西的东北部，距离南昌有三百五十多公里，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时速计算，需八个多小时才能到。程惠远带着总理急切的叮嘱，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婺源。汽车在公路上颠簸着，这公路也象其它受破坏的事物一样，无人保养。车行至景德镇时，已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程惠远在招待所稍事漱洗，用过晚餐，极度的疲劳，使他和衣睡着了。

“叮铃……”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服务员的睡梦，电话是江西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打来的，指名要程惠远接。程惠远接过听筒一听，是中央军委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脑子一下高度紧张起来，立即驱散了疲劳。

这是一个与周总理电话精神完全相反的电话，电话指示，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在江西接受监督劳动，不日即到江西。

程惠远放下电话，穿好衣服，叫醒司机，发动马达，连夜向婺源继续前进。当东方呈现鱼肚白时，吉普车才开进了婺源县委招待所。程惠远叩开程世清住房的门，向他汇报了昨天上午八时周总理给他来电话的情况以及午夜在景德镇接到中央军委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的内容。

程世清听了程惠远的汇报，仔细看过周总理打来的电话记录后，陷入长长的思考。程世清是一个执行林彪意志颇为卖力的人物，来江西之后在全国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就是在南昌的中心，仿照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外形和规模，调动江西所有的人力物力，仅以一百天的时间，平地立起一座高大建筑，其外形和质地足以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媲美，取名“万岁馆”，即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馆。他曾听信一些人的意见，“创造性”地在“伟大的会师”

的油画上，把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加以突出，肉麻地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此刻，他心里正在急速地盘算：总理的电话十分具体，明确指示照顾这三位同志。而林彪的“一号命令”旨在暗示他对这三位老同志进行迫害。他想到陈云、王震仍是中共中央委员，至于邓小平同志，虽然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但中央尚未开除他的党籍；又慑于总理的威望，所以作了如下指示，由程惠远记录后向总理汇报。

程世清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三人先安排住滨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汇报与介绍，然后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具体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去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三个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一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作了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1. 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2. 陈云、王震同志确定来江西前，我们想派人去接他们是否可以？”

程世清讲完后，又看了程惠远的记录，确认无误后，便吩咐程惠远吃过早饭立即驱车返南昌，连夜向总理汇报江西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的意见，看看总理还有什么新的指示。

十月十九日，程惠远又驱车启程，于下午七时返回省革委办公大楼。吃完晚饭，正好八时半，用机要电话直接总理办公室，将程世清的意见向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程惠远这位抗战干部，操一口河南口音，对工作是十分负责的。他根据程世清的面谕，和省革委保卫部部长陈昌奉作了具体研究。根据总理的指示，决定将程世清关于把邓小平安置在赣州的意见撤回，并从实际出发考虑：（一）将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厂子附近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少将的房子，又名“将军楼”；（二）陈云住在南昌市青云谱江西省军区干部休养所，选择就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调查研究；（三）王震安排在东乡红星垦殖场招待所住，并在该场蹲点调查研究。

历史使命赋予了一个小厂

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位于南昌市西边望城岗的省庄村，从南昌市乘车经过八一大桥，一直往西走，约莫八公里。这是一个百来人的小厂，工厂前身只不过是新建县的一个小小的拖拉机站，后来发展成以修理拖拉机为主的厂子，生产比较正常。该厂座落在望城岗乡省庄村的中间，与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现为南京军区南昌陆军学校）毗连，相距约二华里路。这里是一片红壤丘陵，长着稀稀拉拉的松树，几幢大小不一的厂房突兀地立在一个小山岗上。三个月前，国营江西蚕桑场从省农垦厅下放归新建县管理，这个场的党委书记罗朋是一位抗战干部，从公安部下放到江西，因受文革的冲击，经过批斗、学习、再教育的程序，便分配到这个百人小厂当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不知名的小厂，却与一位伟大的人物联系着。

总理电话指示后的第三天下午，陈昌奉和程惠远坐了一辆吉普车专程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径直走进厂党支部书记罗朋的办公室，简要地询问了一下厂里的工人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后，开门见山地提出：“罗朋，你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省革委经过研究决定把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厂里来完成。”

罗朋一听，神经一下高度紧张，询问道：“什么重要任务？”

陈昌奉曾经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罗朋：“什么任务？讲出来大家都会知道，中央决定把党内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放到江西劳动，改造世界观。省革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你们厂，你们厂里的具体任务有三：一、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范围是进了厂区，由你们厂里负责，主要由你负责，如果在厂里出了事，首先唯你是问，出了厂区，由外勤人员负责。”

陈昌奉深知安全的重要，所以分配任务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他盯着罗朋进一步补充说：“为什么，因为邓小平不但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在国外有影响。同时，怕造反派揪斗他，怕坏人把他弄掉、弄死。如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你的脑袋。总之，毛主席、党中央什么时候要他这个人，我们什么时候交得出。二、是由你们厂安排一点适当的劳动，每天干三四个小时。三、对于如何看待问题，中央对他未作什么决定，至于称呼，既不叫同志，又不叫名字，就叫一个姓，叫老邓。”最后，陈昌奉特别强调：“关于安全问题，不管什么人都不能和他接近，只有省革委保卫部派出的随身人员才能接近他。学校红卫兵、外单位造反派更不能接近他。邓小平在此劳动，你厂工人知道就行了，不能告诉家属，要保密。有什么事，直接到保卫部找我陈昌奉。”

陈昌奉和程惠远向罗朋简单交待任务后，便驱车离开了。

罗朋听了陈昌奉的布置，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任务不但重而且复杂。回想自己从广州不畏艰险投奔延安，从一般干部一直担任到公安部的副局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放江西。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受到冲击，人间甘苦已经尝尽。如今，在这偏安一隅的小厂，又要负责接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同时又是过去的老首长，真是感慨万端。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晨，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夫妇同继母夏培根三人的汽车，从中南海向首都机场风驰电掣般行驶着。没有任何人送行，子女一个也不在身边。难道就这般凄凉地离开中南海吗？卓琳心头笼罩着孤独凄凉，她频频地回首，希望出现一个奇迹，能看见一个自己的儿女前来送行。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可奇迹一直没有出现。

汽车在急速地向机场奔驰着。印入卓琳眼帘的是一张张“打倒”“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刘邓永世不得翻身的巨幅标语。可悲可叹，在这凄凉的离别时分，送行的不是亲人友人，而是这铺满北京的大标语，仿佛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被无边的标语糊满了。

邓小平胸中翻动着汹涌的波涛，但看上去仍然沉着、镇静、坚毅。卓琳和夏培根由于夜里整理衣物，打捆装箱，几乎彻夜未眠，天亮时才和衣闭了一下眼睛，显得疲惫和憔悴。

飞机起飞了。

升空，一声声引擎的轰鸣，把邓小平从漩涡的中心牵向激流和浪潮。他坐在靠窗口的位置上，双目炯炯，看着北京渐渐远去。他心里有许多话要说，由于有两个护送他们去江西的解放军军官坐在不远的位置上，不便开言。

卓琳同继母夏培根两人坐在一起絮絮细语，她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老二胖胖。去年五月，正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邓朴方，被“乱世狂女”聂元梓操纵的红卫兵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狂热冲昏了头脑的年轻人干完他们严惩走资派儿子的游戏后便扬长而去。幸有一位工人师傅在逆境中挺身而出，伸出了救死扶伤之手，把昏迷中的邓朴方送进了医院。年仅二十四岁的邓朴方便开始了残疾人的生活。大凡父母，总是把更多的爱献给不幸的子女，卓琳一想起病卧在301医院的儿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心如刀割，愁泪涟涟。此番匆匆离京，连告别一声都不可能。这场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多少人间的爱！老大邓林在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不知是否仍在被迫没完没了地交待父亲的所谓“罪行”。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受父亲株连尚未未成年便下放到边远的安徽、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法写一封。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啊！

邓小平此刻似乎没有陷在撩人的儿女情长之中。他稳如泰山地闭目沉思，考虑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破坏力如此之大的运动？他不理解，需要深一步地考虑，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十亿人民的大事。

南昌到了。

飞机在南昌市郊向塘机场安全着陆。汽车拖着舷梯靠近了机舱。

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培根三人在两位解放军的护卫下，稳步从机舱走下了舷梯。

身穿解放军军装的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早已恭候在场，见邓小平一家走下飞机，便把小汽车开到舷梯旁，同北京来的解放军讲了几句话，请邓小平一家上汽车。这时的南昌大街小巷还残留着造反派搞武斗的痕迹，“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和“打倒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标语依稀可见。

小车从向塘经莲塘驶进南昌市，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停下。秘书将邓小平一行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装着行李的汽车随后也开到了军区招待所的门口。

邓小平夫妇在这个招待所住了三天。

有天晚饭后，邓小平顺着军区招待所院内的塘边散步，不料引起了住在招待所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们的注意。“怎么，邓小平来这里了呀！”“快来看。”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省军区。一位省军区的“负责人”对他们（指邓小平夫妇）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警告他们不要随意外出（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

黄文华接到命令，开始了他的管理秘书工作。他在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的陪同下，来到省军区招待所二楼和邓小平夫妇见面。

赵子昌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一切生产劳动、学习材料、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负责。”

邓小平望了望这个陌生的军人，没有任何表情。

黄文华第一次看清，这位号称“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人，沉默中有一种令人猜不透的力量。

黄文华请邓小平上车。

邓小平说声“好”，便随着黄文华走下楼，动作很迅速。

黄文华告诉卓琳，东西可以装在卡车上。

卓琳回答说：“我们东西很少，飞机把全家的财产都带来了。”说着一只手提了个皮箱便上了车。

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培根三人坐在后面，黄文华坐在前面的司机旁边。

汽车驶出军区招待所进入八一大道。这条马路在当时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这种气魄曾引起了中央的争议，争议归争议，当年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就有着搞建设敢说敢干的魄力，

硬是修了这么一条宽阔的大道，而且还扩建了一座八一桥。

邓小平在车上打量着这么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被大字报标语装饰着，自己的姓名不是倒着写，便是打着红叉。谁能想到邵式平精心改造的这条大道，今日成了这般光景。

汽车出八一大道驶上八一大桥。黄文华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八一大桥，桥下是赣江，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住的地方距离这里约有八公里。”

邓小平听了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这条江，三十多年前，他同红军一道，跨过这条江。他更欣赏鄱阳湖，这是中国第一大湖泊，她的胸怀是那么宽阔，容得下长江的奔流。

汽车经长凌，行驶六七公里后来到望城岗。因此处地势略高，可看见南昌城的轮廓，由此得名。在望城岗的旁边便是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此地原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旧中正大学的校址。这个步兵学校的校长许光友少将，原在省里支左。程世清来后，便调走了，他的住房被人称为“将军楼”。邓小平一家乘坐的车在军校的大门前停了下来。黄文华跳下车，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短短交涉后，汽车开进学校。一位战士仿佛看见车里坐着的是邓小平，还没等他看清，小车已经进入了绿树环抱的校园。顺着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步校办公大楼，沿着红壤夹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圈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树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树内还有一个竹篱，是一处幽静怡人的地方。清洁的水泥路面，不见枯叶，路边是修剪得很整齐的绿树和草坪，校舍掩映在绿树丛中，红墙绿瓦时隐时现，蜂鸣鸟语，自得其所。

卓琳见了这般景象，心中略为舒展。

进了“将军楼”的院子，邓小平一家下了车。他们开始打量这幢新居。这是一栋两层楼房，楼下除大厅之外，两边只有两个单间。院子是用篱笆围起来的，院内种满了梧桐和各种花草，同城市的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要不是带有监禁的意思，真可以教人喜欢上这个地方。

邓小平夫妇到达“将军楼”已是夜幕降临，按照赵子昌、黄文华的安排，他们夫妇和继母夏培根三人住右边楼上三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为会客室，继母住在靠卫生间的后屋。他们三人的年龄加起来超过两百岁，在这困难的时候，自己动手，团结一致，从汽车上搬下行李，又从楼下搬到楼上，铺好床铺。忙了一个时辰，约莫到晚上十点钟光景，才基本上就绪。这时大伙饿得不行，黄文华便跑到炮团食堂买回十几个馒头，又煮了一大碗蛋汤，累了一天的人们就这样马马虎虎地吃了一顿晚餐，然后各自休息了。

管理秘书兼警卫黄文华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黄文华的房间装有一部电话，可以随时同校外联系，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报告江西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真正起到了严密监视的作用。黄文华的左侧前面的房间是解放军战士贺福柱卧房。小战士贺福柱是专门负责帮助邓小平夫妇到望城岗买菜的，由于邓小平夫妇的特殊身份，上街是不准许的。“按照监管规定，邓小平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见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后来邓朴方来了，就住在楼下左侧的后间，尔后来的邓榕、邓质方、邓楠、邓林均住在二楼。

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近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望城岗，这汪洋中的小船，将给沉沦苦海的邓小平一家以怎样的安慰呢？

艰难起步的新生活

邓小平一家经过一夜的休息，迎来了监禁生活的第一个黎明。

这天一早，曙光初照，邓小平为院内欢唱的小鸟所唤醒。他珍惜这充满活力的早晨，尽管仍很疲倦，还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披衣走出楼房。院内空气湿润，楼前四株月桂散发出阵阵清香，花朵在晨光中摇曳，小鸟在树枝上快活地飞来飞去，蝉儿耐不得寂寞，一声声鸣唱着。邓小平舒动筋骨，迈开大步，在庭院散起步来。园子毕竟太小，小平同志想到外面走走，走到院门，见外面还有两名解放军站岗。解放军战士见状，警惕地看着他，身后传来“不准出去”的声音。邓小平心中一震，这才清楚，此刻他是被监护着，抬头看看鸟儿在自由地飞进飞出，真是人不如鸟自由。也罢，他索性在院内走个痛快。

早餐仍是馒头、稀饭。

早饭后，卓琳随同黄华开车到长凌镇和望城岗公社购买油盐柴米。

这一次共买了几十斤面粉、五十斤晚稻米、四斤油，接着又到街上买了几百斤干柴和一些青菜、萝卜、大蒜，满载而归了。

医疗问题，除了指定由炮团卫生队队长看病外，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見到新建县人民医院开些常用药来，免得经常到医院去。黄华问邓小平：“要些什么药？”

邓小平说：“我没有病，主要是睡眠不好，可弄点眠尔通、非那根之类的药品，辅助睡眠。”接着又说：“卓琳病多，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病，可弄些这方面的药贮备。”

黄华一一记下，心中不免警惕起来，邓小平如果将安眠药一齐吃了，那我如何交待？

黄华心里有事，便驱车来到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请示程惠远。

黄华见到程惠远，深表不安地说：“程主任，老邓要用安眠药，我不放心，万一想不开，吃多了怎么办？”

程惠远觉得黄考虑问题是仔细的，低头考虑了一番后说：“邓小平来江西劳动，提出要吃安眠药，可以给他吃，不过要每晚上送一次，每次按规定吃几片，不可超过份量，具体剂量遵医嘱。”

黄华提出一个不放心的问题“我每天送一次，汇积起来，也怕出问题。”

程惠远顺着黄华的思路一想：“你每次送去，要看到邓小平在临睡前用开水吞完后再下楼。”

新来的“工人老师傅”

邓小平住进“将军楼”后，花了四五天时间安排家务，一切大体就绪，生活开始正常了。每天，小战士贺福柱到望城岗买青菜、大蒜、韭菜、辣椒等蔬菜。邓小平的继母夏培根每天在厨房做饭、炒菜，搞的饭菜完全是四川口味，一家人吃的可口满意。

有一天，邓小平找到黄华说：“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汪东兴找我谈过，让我来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现在来了几天了，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黄华看见邓小平的家还未完全安排好，已经够疲劳的了，再说卓琳身体也不大好，因此，他很客气地回答邓小平说：“至于劳动嘛，这几天不要急，先把家务安排好了再说吧。”

邓小平回答：“家务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反正东西不多。”黄华见邓小平要提前去厂里劳动，自己的好心似乎并没有为对方所接受，便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如果明天不下

雨，明天就去劳动，你看行不行？”

“行！行！”邓小平连连回答。接着又进一步问道：“明天什么时候去？”

黄文华心想老邓组织观念还挺强，考虑一下回答道，“明天上午八点钟吧。”黄文华说到这里向邓小平说明：“工人是七点半钟进车间，我们就八点钟吧。”

邓小平连连说：“行，那行。”

十一月九日上午八时半，邓小平和卓琳两人都穿上了黄文华给他们特制的蓝纱卡工装，里面套了两件毛衣，脚穿黄色军用力士鞋，完全象两位老工人师傅，不注意的话，谁也不会发现他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

邓小平夫妇在黄文华的警卫下，从“将军楼”出发，经过红壤夹着石子的山坡往下走，绕过步兵学校的办公大楼，再沿着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走出步兵学校大门，便是通往南昌市的公路，约莫走两公里再向左拐两百米，然后进入厂区，来到位于厂房大门右侧的党支部办公室。黄文华把邓小平、卓琳介绍给罗朋。罗朋一愣，赶忙起身，眼前两位“老师傅”不就是自己二十多年前的首长吗？

罗朋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素来尊敬。早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从延安调东北工作时，走到太行山区不幸病倒了，留在太行山，参加打上党战役后，任过高树勋被俘军官队的政治教官，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教育科长，聆听过邓小平政委的报告，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政委讲的几句话。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是我们转变的开始，从太行山下到邯郸，今后我们要打大仗了。人家说我们是山精妖怪，因此，我们军队作风要注意，用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的谣言。”二十多年前的邓小平是和刘伯承司令一起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精力充沛，和蔼可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脑海。今天他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来到自己所在的厂子里劳动，真是不可思议的现实。这场运动冲击了多少人，自己的遭遇同党和国家遭受的损失相比又能算什么呢？想到邓小平就在自己的面前，想到自己的境遇，同病相怜，又不敢出格，因为邓小平是被人监护着的。

还是黄文华打破沉默，向邓小平夫妇介绍道：“这就是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同志。”邓小平走上前和罗朋握了握手。

罗朋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热情地招呼邓小平夫妇坐，倒茶递烟，简单地介绍了厂里的情况。罗朋说：“这是一个小厂子，只有八十多人，任务是修理农机配件，生产还蛮好的，工人干劲蛮大。”罗朋讲到这里手指了指对面的一间空房子说：“这间房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俩用，将来劳动累了，或者遇到不舒服的时候，就到这间房子休息一下，我就住在斜对面，有什么事可以及时联系。”

邓小平看了看那间空房间，对罗朋的安排表示满意，微笑着说：“好！”

邓小平又问：“这里有没有红卫兵？”

罗朋回答：“我们这里没有红卫兵，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份的工人。”

接着，罗朋和黄文华带着邓小平夫妇走出办公室，向车间走去。车间工人看见罗朋和一位解放军陪着两位老师傅走进车间，有的眼尖，认出其中一位老师傅便是邓小平。由于事先有纪律，不许同邓小平接触，工人中在暗暗地传递着一个信息：“邓小平来了！”

邓小平来了，引起了工人群众极大的关心。过去，他们仅仅从电影、图片、报纸上见过邓小平，当年的邓小平总是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出席重大的会议，会见外宾，发表重要讲话，制定重大国策。在这个小厂中，人们很少有机会外出，更是难以有人上北京，他们把亲眼见到邓小平这样的大人物，视为人生的一大幸事。人们仔细地用目

光研究邓小平，想从他的身上看出他不凡之处。邓小平修着整齐的短发，一双有神的眼睛，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身材不高，腰挺直，穿的是同工人一样的蓝纱卡工作服，普普通通之中蕴含着一种天然气质。工人排长陶端培见邓小平夫妇来了，赶忙放下手中的活，用棉纱擦擦手中的污油，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来。罗朋介绍说：“这是陶排长，是车间的总负责。”当时，厂里实行军事建制，车间主任称为排长，生产组长称为班长。邓小平同陶排长握了握手。

工人师傅们纷纷围了上来，那温暖信任的目光融化着邓小平心中的寒冰。

“就叫我老邓”

作为监管人员的黄文华，同邓小平一家一起生活好几天了。他却为一件敏感的事犯愁，这就是不知如何称呼邓小平同志，总是“喂”、“喂”，找不到主语。

一天，邓小平从楼上走下来，主动对黄文华说：“你今后就叫我老邓，不要叫别的，这样还自然。”

“老邓”，这是一个可以多重理解的称呼。首先是个最普通的称呼，在中国，任何一位上年纪的老人都可以被叫“老张”、“老王”的称呼，也可当作一种尊敬的称呼。再说“老邓”又是个中性称呼，既不算敌人也不作为同志，含含糊糊，正好适用。于是“老邓”这个称呼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修理车间叫开了，这称呼从工人师傅的口中叫出，自有一种尊敬爱护的意思。以后，有几位工人同邓小平熟悉了，敬慕之情油然而生，干脆就叫“老头”。这称呼叫来，简直象一家人，这在当时的气氛中，确要有一种敢冒风险的精神。邓小平同志便在这一声声“老邓”的称呼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之中。

给邓小平夫妇安排什么样的劳动呢？陶端培搓着那双粗糙的大手，拘谨地对邓小平说：“我们修理车间有四个班，其中三个是修理班，一个是电工班。我们根据厂里的安排，先分配您在张瑞龙这个班，清洗可能冷些，您先试试看，不行我们再研究。”邓小平略略点了点头，二话不说，立即开始了清洗零件的劳动。他迅速卷起袖子，把要清洗的零件放进盆子里泡着，一个一个认真地清洗起来。

陶端培回头望了一眼卓琳，正好卓琳和程红杏、卢凤秀等女工在谈话，他连忙插嘴：“卓琳同志，您和卢凤秀、程红杏已经认识了，那好啊，反正我们这里就这几个女工，就分配您在电工班，和她俩在一起好了，现在主要的生产任务是修理马达上的电线。”

卓琳听了，高兴地牵着程、卢两人的手，朝她们的工作地点走去。

约莫有半个钟头，邓小平感到双腿麻木，蹲久了直不起身来。陶端培见此情况，心中深感愧疚，老人家不宜久蹲，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他扶起邓小平。这是一位多么坚强的老人啊，明明支持不住，竟不吭一声，要不是看见他脸色发白，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陶端培扶起邓小平，让他在一張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待他气色转缓，便以征询的口吻说：“老邓”，他听黄文华介绍邓小平时称“老邓”，也跟着这么叫。“你的眼睛怎么样？”

邓小平连忙说：“行，还行！”

陶端培照顾邓小平，准备安排一些看看图纸的活计。陶端培一听邓小平眼睛还好，不由高兴地问：“老邓，你看图纸行吗？以后只要看看图纸就行了。”

邓小平听了为难地说：“看图纸恐怕不行，线太细，看不清楚。”

陶端培听了心中有点失望，他又想到一个活计：“老邓，让你锉锉零件怎么样？”

邓小平一听非常满意，对陶端培表示：“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

陶端培听了，赶忙去准备工作台、工具柜。不一会儿，一架工作台、一个工具柜准备停当，各种锉具齐备，陶端培来请邓小平试试。

这架工作台安排在车间的一角，较为安静，干扰少，又便于安全保卫。

邓小平看了看工作台、工具柜以及各种锉具，感到一种亲切之感。他心里对这些锉具说：“老伙计，又见面了，隔了四十多年啦！”他安置好一个零件，熟练地拿起一把锉刀，有板有眼地锉了起来。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邓小平仅仅几下招式，就把陶端培折服了。说起来，这个厂还没有谁有这么两下子，起码有四五级工的水平。

陶端培饶有兴趣地观看邓小平的锉工技术，为他的认真神态、标准的姿式所吸引，禁不住问了一声：“老邓，你的锉刀活蛮结棍，真有功夫。”

邓小平听不懂陶瑞培讲的“蛮结棍”是什么意思，忙把耳朵侧过来问：“你讲啥子呀？”

陶端培高兴地说：“老邓，我们新建县人讲蛮结棍就是说蛮不错的意思，我是讲你的钳工手艺很好。”

邓小平笑笑，一个久违的记忆浮现在他眼前。在他十六岁那年，从重庆的一所专科学校随九十二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十六岁的他，身材瘦小，显得有点羸弱，要不是头脑机灵，肯定是难以适应的。来到巴黎首先是勤工，只有解决生存问题，才能谈学习。他先在雷诺公司的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火车头上当司炉。为了挣得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他要竭尽全力地干。要拼体力他显然不行，只有从巧字上面做文章。凭着他的机灵，在技艺上比别人成熟快，活计比别人干得巧。就是这样，使得四十余年后的他仍然熟练地操起锉刀，干得有板有眼。

卓琳是个开朗而活泼的人，不一会，就同几位年龄比她小一倍的小妹妹搞熟了。她的活是拆线圈，可以坐着干。几位小妹也把提高革命警惕之类的话忘到脑后去了，她们首先不是对人与人的斗争感兴趣。在她们人生初旅的时刻该有多少事要懂得啊，在她们的面前，卓琳是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大姐，她们怎么会放过这讨教的机会呢。她们的心灵纯洁如水，才不管什么“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她们还要聊个够。从人民大会堂的宴会问到异国风情，从中南海问到唐人街，卓琳很久没有这么畅快了。她在轻松地谈笑着，而邓小平在认真地锉着。

从这天起，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邓小平小道”

邓小平、卓琳每天从南昌步校驻地到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都是从大门进厂的，这样要绕一个大弯，多走里把路，而且又是在公路上走，势必招引注意，不太安全。

罗朋作为厂里第一把手，解放战争时期又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对邓小平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但在那种时刻，只能以特殊的方式表示自己对老首长的感情。他考虑到邓小平年纪已经六十五岁了，文化大革命遭到如此大的冲击，心情肯定不愉快，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在大路上遇到一些无理取闹的人，胡搅蛮缠，势必给邓小平以更大的刺激。所以最好能避一避。在自己厂区做到这点是有把握的，要是在厂区外就难做到。罗朋，这位老警卫战士，考虑到唯一的途径是缩短邓小平同志上下班的路程。他亲自和车间主任陶端培等到车间旁边的围墙仔细观察。他找着梯子爬上围墙的顶端，极目远望，只见邓小平居住的将军楼与车间的劳动地点遥相呼应，如能从围墙上开一道小门，沿着山坡从田间小道行走约莫两华里便可

直达车间。这样便做到了不接触外人，又减少了路程，的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工人们也极为赞成，只是提出雨天可能路滑不好走。罗朋同意工人的看法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黄文华。黄文华考虑这样一来可以加强保护，减轻自己的负担，二可以缩短路程，便爽快地答应了。

罗朋和陶端培等选择了开门的地点后，便同工人们拆开篱笆，开了个小门，做好了门架，门上配了锁，自己带着钥匙可以自动开和关，不需专人负责，这样方便邓小平夫妇进出。罗朋又亲自画线定点，从围墙西侧的山坡上修了一条小道，直通步校的大门。他们挥锄平地，铲除荆棘，垒好乱石，加宽田垄，修好田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劳动，终于把这条小路修平了。罗朋和陶端培等人从围墙试走两次，约莫十五分钟左右，便可抵达终点。

从此，邓小平和卓琳每天上午来厂里劳动就不再绕弯子从工厂大门口走了。中午十一时半下班后也是从车间开的这个小门直接回家休息。以后不管天晴下雨，也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炎，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中午十一点半，总可以看到邓小平夫妇天晴时戴着草帽，下雨时撑着雨伞，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地走在这条小道上。他们经过这条小路时很少言语，或低头沉思，或极目远视。千百次的足迹，坚实的脚步踏平了这条小路。

工人们称这条小路为“邓小平小道”。

一天中午下班时，邓小平走在小路上不慎绊了脚，跌了一跤，黄文华尚未赶来得及扶一把，他老人家便自己爬起来，拍去身上的泥巴，倔强地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第二天，车间的工人很敏感地发现邓小平同志没来上班，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后来工人们才知他在小道上摔了一跤，跌得不轻。陶端培知道后，马上带领工人把小路又修了一遍，尤其对不平的地段进行平整，他们不希望那不幸的老人再有什么不幸降临。

父 母 的 心

林彪的“一号命令”，把许多受迫害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仓促间撵出北京城。当邓小平一家三人被送上飞机，飞往南昌时，卓琳同志作为孩子的母亲，含着泪眼频频回首。她惦记的不是中南海的旧居，而是自己的骨肉，那成年的与未成年的，都来不及告别一声就分离了。这残忍的隔离，把母与子、母与女的思念拉得那么长，牵得那么远。而作为父亲的邓小平心中也有万般痛楚，只不过他是在强忍着。

邓小平对子女的思念很快就被一次谈话所印证了。

邓小平住进“将军楼”后的第二天下午，主动向黄文华提出了一个要求。

邓小平说：“我来时，汪东兴同志同我谈过，同自己的亲属可以通信……”邓小平讲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补充说：“还有第四、第五个孩子，我来南昌时未见面，第四个孩子（作者按：指在陕西插队的邓榕，小名毛毛）原约定十二月到北京来会面……其他的都见到了面，现在可以不来。”

邓小平对黄文华讲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第四个孩子原约定十二月来北京会面的，但是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却根据“一号命令”的安排离开了北京。邓榕从一下放便再也没见上父母一面，而且邓榕又是个女孩子，远在陕西省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劳动。邓小平希望把小女儿邓榕原定十二月在北京的会面，改为在南昌。

“说温情主义嘛有点，自己的孩子有点想，可能是落后思想……”邓小平以略带自我批评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谈话。言简意赅，明白人一听便能悟出话的含意。

黄文华听完邓小平的陈述和请求，十分理解这种牵挂孩子的慈父心情。天下父母，岂有不关心自己孩子的，人之常情嘛。邓小平提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是常理之中的事。想到这里，黄文华连连说：“你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不算落后思想。”黄文华又老老实实告诉邓小平：“这种事情我不能作主，我一定很快向省委核心领导小组反映，争取尽快解决。”

第二天上午，黄文华搭车来到江西省革委，向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汇报了邓小平希望女儿邓榕来南昌会面的请求，程惠远一一作了记录，答应向中央办公厅请示后，很快答复邓小平夫妇。

答复迟迟没有下来，已经到了十二月五日，该是邓榕从陕西到北京的时候了。卓琳急得没有办法，这天上午，卓琳以母亲的身份和心情对黄文华倾述了自己对子女的思念。她首先想到大女儿邓林。邓林大学毕业了，却迟迟不分配工作，又在挨造反派的整，没完没了地交待，应该让她到母亲身边来，用母爱安慰一下她那颗受伤的心。

卓琳对黄文华说：“最好邓林十二月底能来南昌。她主要是受我们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站错了队，别的问题没有，她很老实，对毛主席一直很信仰的……去年因闹派性，把她关起来了，一直关到今年三月才放出来……”

卓琳停了一下又补充说：“这个女孩感情比较重。”谈了邓林又谈到邓榕。卓琳说：“邓榕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很大刺激，她年纪轻，是个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在学校读书时，政治上很积极，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我们被打倒了，她受的刺激就大了。”

卓琳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她（指邓林）这个学校只有一百多人，文化大革命她是个目标。过去北京大学一万多学生，连职工家属近两万人，这个学校一开始就有军代表，可能军代表不得力，也是多进多出，后来也是毛主席派了八三四一部队代表去，很快就转过来了。”

卓琳接过邓小平的话说：“听邓林说，每次去新的军代表，都要找她谈一次话，叫她写一次交代，真是交待得没有个完。”卓琳在讲这番话时心情是很沉重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黄文华得到了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的答复，于是正式通知邓小平夫妇：“子女可以来这里，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不出证明联系。”

卓琳听了，心中一阵酸痛。子女可以来当然令她高兴，高兴也是会心酸的，但一想到江西省革委不出证明联系，孩子怎么来呀，想到这点，不禁哭道：“她们和我们分开的时候都很突然，组织上也没有通知我们，因为在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孩子们受我们的影响，在运动中受了很大的刺激和打击……”

卓琳讲到这里，真是声泪俱下。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红卫兵，对邓小平夫妇及其子女进行了疯狂的冲击和迫害，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对邓小平的子女在学校轮番批斗、游街、戴高帽子，进行人身攻击，不仅使他们精神受到严重摧残，而且在肉体上受到了极大折磨。这些孩子都很聪明好学，本可以健康成长，成为祖国有用的人才，然而不幸受父母牵连，横遭打击，有什么比父母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因他们的影响而受折磨更痛苦的呢？卓琳泪如雨下，邓小平默默无言，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儿女痛苦，这是普天下父母亲都能理解的痛苦……

一件小事

邓小平进厂劳动几天了，情况怎么样？罗朋心中不踏实。邓小平在车间劳动，担任监管的解放军黄文华，就坐在车间的门口监护着，他不允许别人随便同邓小平接近。罗朋感到，非常时期，人心隔肚皮，自己同敏感人物的接近，很容易被指控为一条新的罪状。命运把几十年前的老首长推到自己面前，自己有责任照顾好他。然而，斗争的残酷现实警告他，凡事小心，不可大意。自己到这个厂时间不长，人们的真实面目尚难看清，不能贸然行事。于是他把车间党支部委员陶端培叫来，对车间的情况详细地询问了一番。

罗朋是位老公安干部，有着很高的警惕性。他对陶端培指示：“邓小平在你们车间劳动，你要把车间工人思想工作做好，把工作环境搞好，如果稀稀拉拉，无组织无纪律，那就给老邓造成不好影响。”

罗朋讲到这里强调指出：“对老邓的安全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出事，上班下班以后，把门窗检查一遍，防止坏人放定时炸弹。如果老邓在车间出了事，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党的影响问题。现在国际上有点动荡，一定要提高警惕，老邓工作的地方更要提高警惕。如果台湾知道邓小平在我们厂里劳动，就会搞破坏的，所以特别要注意才对。”

陶端培听了罗朋的指示，为领导的细心和警惕性所佩服，他没想到这事同国际动荡，同台湾也能联系上。他也听懂了罗朋想说又没说出来的潜台词，他表示：“根据厂党支部的布置，我早已作了妥善安排，车间工人思想工作，我一定会做好，保证不出现散漫现象。老邓进了车间就是我的事，出了问题一切由我负责，我在行动上有我的准备。根据上级布置对老邓表面上不能太热，但工作要做得细很细。”

罗朋听得十分注意，不由得身子往前靠了靠。

陶端培接着汇报：“我的准备是：每天上午比邓小平早到车间二十分钟，把他的工作台抹干净，同时把他坐的椅子转动一下，窗户检查一遍。”陶端培想到罗朋提到定时炸弹，电影中的恐怖镜头浮现在他眼前，但他并无惧色。他说：“要检查一遍有没有定时炸弹，如果有什么事，那我就先死。”

罗朋听了，心里感到一种满意。他满意这样的回答，但仍不忘自己的担心：“这个时候捣乱是不犯法的，所谓无法无天。”

这话让陶端培听了，心里感觉出领导对自己仍没完全放心，便继续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坏人做了坏事，我就先受害先死。邓下班走了以后，我把肩沫子收拾一下，哪个窗户破了一角我都会知道的。”

陶端培说，为了保证邓小平劳动的安全，他们还在斜对车间左侧的墙边砌了一些砖，特设一个小便池，距邓小平的工作台只有六十米，朝着望城岗的方向。

罗朋听到工人们特地为邓小平修个便池，心中一亮，他眼前这位朴素衣着的陶端培形象倏地高大起来。他想，真正能为革命挑担子的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只有他们能无私无畏地伸出同情之手，去安抚一位受迫害的长者。罗朋正是从这样的一件小事中感受到工人师傅的美好心灵，寻找到精神的支柱。他详细地询问了修小便池的过程。

陶端培说：“邓小平同志开始上厕所解小便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我们车间不放心，便由我和修理班长张瑞龙两人保镖，送他前去小便。等他小便完又护送他回车间，邓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象押犯人似的。邓表情非常严肃，又不讲话。我们感到邓每次小便，我们在

后面跟来跟去，十分别扭，不跟在后面嘛，又怕有人遇到邓小平，乱呼打倒的口号，或者行刺，那么责任就大了。因此，我决定在车间门旁靠望城岗的方向修一个小便池。小便池修好后，我带邓小平同志去看，并说：“今后解小便再不要走那么远的路了”，邓小平同志看后很高兴地说：“麻烦你们。”

也许这是邓小平在文革以来受到的最亲切的对待，也许这是邓小平从心灵上认识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工人群众的开始。

由于修理车间距食堂不远，紧靠车间墙边的小便池修好后，食堂里的工人也来小便，有的不自觉，甚至在小便池里解大便，搞得很脏，邓小平解小便时一不注意，就会踩到。陶端培和张瑞龙发现这个情况便每人每天提水冲洗，保证小便池的清洁卫生。

罗朋听后，连连点头，称赞陶端培的工作做得周到，做得好，他从心底钦佩这些平凡朴素的工人。他心里也在算计，该做些什么事，象工人师傅那样给老首长一点关怀呢？

邓小平同志也在感激工人们，工人们给他做的一件件小事，正在温暖着他受伤的身心。

邓小平同志刚来厂里劳动时，态度十分严肃，不讲一句话。过了几天，他感到这里不是冬天，而是一个温暖的春天，与北京的地冻三尺，寒风凛冽气候，与北京整天的高音喇叭发出震耳欲聋的“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及红卫兵造反时的越轨行为相比，完全两样。他感到从党支部书记、车间排长、班长到每一个工人，对他都是和颜悦色的。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敌对情绪，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什么恶意。工人们时刻关心着他，处处想着他，事事给他方便。当他锉螺丝锉了个把钟头，陶端培便会走过来说：“老邓，累了吧，休息一下吧！”

邓小平听到工人师傅的问候，停下手中的活，转过脸微笑着说：“谢谢，不累。”

快下班的时候，工人张瑞龙自动地给他送来半桶热水，请他洗手：“老邓，快下班了，洗手吧！”

邓小平接过热水，用肥皂洗净双手，惬意地在热水中泡泡。他知道，只有很细心的人才会给他热水泡手，一来洗的干净，二来可以消乏。邓小平感受着这些细小的情谊，他逐渐看到一扇扇向他敞开的心灵窗户，那是美好的信任。他对工人们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临别时微笑着对工人们说声：“明天见。”说完便和卓琳一起轻松地离开车间，在解放军的护卫下返回住所。

最 好 的 锉 工

邓小平同志在厂里的工作起先是修理轮子和螺丝，是先用手锯锯断，再用锉子修平，这有相当大的劳动强度。每当他干起活来，总要吸引工人们的注意。人们并不是注意他头上戴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而是欣赏他居然象老师傅一样，干起活来，有板有眼，招式式稳而不乱，这正象邓小平处理各种事务的习惯一样，有条不紊。

工人中开始窃窃私语，老邓真是有两下子，又会打仗，又会管理国家，又能当工人，象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里，真是太可惜了。他们在用自己的直观观察来改变强加在邓小平身上的污迹，在他们朴素的观念中，邓小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敌人，什么“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的锉工技艺，也在工人的帮助下日臻成熟，他生疏了几十年的把式开始熟练起来。

有一次，车间分配邓小平修理安源型拖拉机的花键轴。这根花键轴，上面分了六瓣，有套子，不标准，老对不上，加上没有间隙，老变型，邓小平锉了好久，累得满头大汗，还是

对不上。

工人梁永刚见状，马上走过来，仔细地观察，他发现每个花键轴有个眼，便告诉老邓：“这是有一个眼的。”于是他锉了一个给老邓看，结果套上去，试了一下，对上去了。邓小平仔细地捉摸着。

梁永刚师傅说：“老邓，你顺着这个方向锉就行。”

邓小平恍然大悟，高兴地说：“还是熟能生巧。”说着按梁永刚的办法去锉，以后就顺利得多了，锉的速度也快多了。不久安源型拖拉机的花键轴越堆越高了，梁永刚便为邓小平领了箱子，专门装锉好了的花键轴。邓小平隔三天就能锉好一根。装满了一箱，梁永刚就帮着他把加工好的花键轴抬到仓库里去，邓小平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微微地笑了。

以后，车间又分配邓小平加工哨子槽和齿轮。开始，邓小平感到吃力，锉一会上用毛巾擦擦额头上的汗水。锉了一些日子，技术就越来越熟练了，成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旁边的工人看见邓小平的熟练操作，连连称赞：“老邓，你锉得蛮快，你是我们车间最好的钳工。”

邓小平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一年到头，不请病假，不请事假，总是按时到厂，按时上班，从不间断，从不无故缺勤。每天上班时，在家里喝足了开水，抽完了一支烟，便踏着“邓小平小道”和卓琳一起来到厂里，一踏进车间的大门，见到工人同志第一句话就是：“工人同志们你们早！”到工作台时，便脱去上衣，挽起袖子，立即聚精会神地干活。干活时，不讲话，总是直着腰，钉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以标准的姿势来回地锉着零件。他看上去是那么认真，那么全神贯注。看似十分单调的劳动，可他干起来却总有滋有味，毫不厌倦。经他加工的零件，没有出过废次品。每当干到十一点二十分左右时，他便抬头望望挂在墙上的大钟，如没有到下班时间，便继续地干活，到了十一时半，便立即穿好衣服，扣好扣子，放好工具，锁上铜门，和工人同志讲一声“明天见”，便踏上“邓小平小道”，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回家去。

首次长谈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根据上面的指示，要邓小平对一个月来的劳动和学习写出心得体会。黄文华及时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回答说：可以，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说完便走开了。这是给邓小平造成的第一次不愉快。第二年夏天，邓小平夫妇来赣已八个月，黄文华与邓小平谈了一次心。这次谈心完全是奉命行事，上面要黄文华怎么干，他就必须执行。于是，开始问问邓小平劳动习惯否，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对这段时期的工作有什么批评意见等等。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一面吸着香烟，一面不动声色地静心听取黄文华的自白。然后，考虑了一下，十分随和地说：“很好嘛，你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邓小平接着严肃地告诉黄文华：“我们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住下去。

邓小平讲了上述两点意见，心情也显得轻松多了，话题又转到孩子们身上来了。孩子们一直和他命运相关，使他念念不忘。

邓小平感慨地说：“……生活是很单调的，想写信给中央能否让两个小孩靠近我们，现在看来不行了，就算了。”邓小平讲到这里，又惆怅地说出心里话，“娃娃们不在身边，有点想他们。”

邓小平讲着讲着，对黄文华微微一笑：“你还没有到年龄，到了我们这么大的年龄也会有

感觉。”

邓小平环顾了房里空荡荡的一切，回味了平日的清淡生活后指出：“生活上，供给改变以后（指北京“中办”由原来的工资降为生活费），已慢慢适应了，节约点就是嘛！过去喝茶，现在不喝了嘛，过去烟酒茶一个月要一百多元呢。”

邓小平继续他没有讲完的话说道：“娃娃们还要给他们一点，两个小的插队离开我们，连油都吃不上，大孩子邓林身体不好，要吃点药。她还没有分配工作，原说是今年分配，现在看来又不行了，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她是个艺术单位，特殊，我看这些人不好分配，没人要了……老三（邓楠）分配了工作，现在在公社革命委员会帮助办‘烟鬼子’训练班。我自己还有两个妹妹，也想给她们通通信。”

黄文华静静地听着，仿佛看见一面敞开的窗户，透出丝丝光彩。原来感觉尽是神秘，现在看来却是那么亲切感人，那么容易理解。

卓琳听邓小平要与他两个妹妹通信，连忙插话说：“我也有两个姐姐，我们姐妹三个都是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参加革命的，所以感情一直很好，在北京时来往比较多。他的（指邓小平）两个妹妹也来往比较多，关系都比较密切。”

邓小平等卓琳插完话后，又十分感慨地说：“这儿生活很单调，不过比北京多了三样，一是有个工厂去参加劳动，也好；二是院内搞些菜地；三是可以做饭。总之接触的范围很小，其它感觉就没有了。”邓小平讲这些，似乎是在与黄文华谈家常，又好象是来江西八个月的一次全面思想坦露。

对于今后，邓小平对黄文华表示：“我现在主要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活动活动也舒服，再是看看书。”

对于将来的出路如何？邓小平说道：“今后是不是能干点什么？干什么？完全听党中央的，由中央安排，当然罗，你们（指黄文华）也必须听党中央的罗。”

邓小平最后对于厂里给他的照顾作了高度评价。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在工厂劳动，领导和工人对我们很好，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我们干的活都难找到。工人问我们在这里还要待多久，我说还不到一年咧，其他的我也不好同他们说什么。”

这是一次长长的谈心，没有半点埋怨，没有半点隐瞒，襟怀坦白，光明磊落。

邓小平讲完自己八个月在学习和劳动中的体会后，十分诚恳地征求黄文华对他的意见。他对黄文华说：“你有什么，就给我们提提嘛。”

邓小平目光炯炯，等待黄文华的回答。

黄文华坦率地对邓小平说：

“老邓，听了你的话，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过去有不少不对的地方，感到对不起你，我要向你学习，决不会做对你们不好的事。”

邓小平听了，站起身来，目送他下楼。

自己垦荒种菜

邓小平到江西的第四个月份，在他一家的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停发全部工资，改发生活费，其余部分由中央办公厅财经处代为保管。邓小平原每月工资为四百零二元，卓琳一百六十五元，合计五百六十五元。从一九七〇年一月起改发生活费，并规定邓的标准为一百二十元，卓琳六十，继母夏培根二十五元，合计二百零五元，一下子降了一半

多。根据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一个人在政治上错误的升级必然同经济上发生某种联系，而经济上制裁又证明着政治问题的升级。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赵子昌同志，接到从中央办公厅发来的这份工资单，心中不禁一怔：从五百多元一下降到二百多元，减了一半多，这意味着什么？赵子昌挂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询问此事。对方回答，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工资由中央办公厅代管，并表示邓小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就可以领。赵子昌听后，心里稍微松了一下。当黄文华领到这份工资单时，也产生了同样的疑虑：老邓的问题是不是由内部转为外部性质？他不知是中央的意思还是江西的意思。卓琳接到这份工资单，心情最为沉重，一方面担心邓小平的问题升级，一方面为经济上的损失而一筹莫展。全家就靠这工资生活，尤其是远在北京半身瘫痪的胖胖，更是需要经济上的照顾，还有远在山西、陕西插队的邓榕、邓质方，在那贫瘠的地方，多么需要父母的帮助；还有老大邓林大学毕业，尚未分配工作，也需要家里寄生活费。

看见卓琳一脸愁容，黄文华也有些着急，这一家子的情况他也清楚，在卓琳的询问下，他专程跑了一趟南昌，请示赵子昌。赵向他转达了中央办公厅的意思。黄文华听了，知道并不是政治问题的升级，也就放心了许多。因为他看来，政治问题是顶要紧的。他把这个意思转告给卓琳后，卓琳也轻松了许多。而邓小平就象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似的，毫无表情，不为所动，如同一尊雕像，以不变的心绪对付社会上的万千变化。

从这以后，邓小平一家的生活水准明显降低了。

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牌；爱喝的酒降级了，改喝普通米酒。有时甚至自己酿酒。

有一次，卓琳对很熟悉的女工程师红杏说：“你能不能搞到好酒药？”

程红杏说：“行。”于是帮卓琳买来上海酒药。

卓琳悄悄地对程红杏说：“老头爱喝米酒。”程红杏又问：“糯米有吗？”卓琳摇摇头。

于是程红杏又帮买来糯米，并传授酿酒的要领。不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

此外，邓小平一家的伙食也明显在节减。每天以素菜为主，一个星期只吃一次猪肉。最明显的变化要算是邓小平夫妇开荒。两位老人下班后，利用中午时间在院内两边各开了四块地。干过农活的黄文华看出，邓小平干起开荒种地的活来也很有招式。其实，邓小平早在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时就干过不少农活，为了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他在各县组织春耕生产委员会，并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奔赴生产第一线，扶持贫困户，狠抓春耕生产的落实。他亲自犁田，耘禾，耙田，施肥，最艰苦的时候还以人代牛，拉动犁铧。县委书记的举动，鼓舞了三县人民，他们一鼓作气，夺得了好收成，支援了前线英勇杀敌的红军。艰苦的革命经历给了邓小平应付各种困难的能力，使得他在各种不利局面中都能措置自如。

邓小平夫妇在四块新垦的荒地上，种上了小白菜、西红柿、大蒜、丝瓜、南瓜、辣椒、茄子。每天早晨起来，他们施肥，浇水，除草，两三个月后，四块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来吃了，南瓜开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一次，他情不自禁地喊道：“卓琳呀，快来看，丝瓜又开花罗！”

卓琳正在厨房里忙着，听见邓小平的呼喊忙从厨房里快步走到院子外的菜地上，看见邓小平高兴的神色，不解地问：“老头子，你高兴什么呀？”

“你看，丝瓜开花了，结了小丝瓜罗！”邓小平讲到这里，心里憧憬着，一串串的丝瓜挂

着晶莹的露珠，在晨风中摇荡。

“又要丝瓜吃罗！”邓小平挑起水桶，依次浇灌着每块菜地。

土地是人类最可信赖的朋友，它无言地向你贡献，只要你真心地爱它，它能使你的劳动结出成果，并让你得到远多于此的种种收获。

程世清碰壁

程世清当时在江西可谓实权人物，想起邓小平来江西大半年了，自己也得去“看看”。

一九七〇年五月间，程世清穿了一套将军呢礼服，和省革委保卫部部长陈昌奉一起乘车来到将军楼门口。在炮团政委的陪同下，程世清和陈昌奉先在楼下黄文华房间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水，黄文华简要地汇报了邓小平来这里居住及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的情况。

程世清不等黄文华汇报完，便先开腔：“陈昌奉呀，老邓住在哪呀。”

“老邓住在楼上，和他家属住在一起。”陈昌奉回答。

“什么家属？”程世清不解地问。

陈昌奉马上回答道：“他爱人卓琳，他继母也来了。”

程世清听后，便立即决定：“我们上楼看看去。”说着直接向楼上走去。

以往按惯例，来人要见邓小平，都要经过监管人员黄文华同意，并征得邓小平同意才让上楼。而程世清是江西一号人物，哪管这些规矩，话说之间就上了楼。黄文华赶紧跟上来，抢在程世清前面带路。

邓小平不知道程世清上楼来，也没听清楼下何人说话，所以并没有迎出来。

程世清“嗵嗵”地走到门口，邓小平仍坐在那里没动，黄文华见此情景连忙跨前两步抢先进入房内，对邓小平说：“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程世清政委。这是保卫部部长陈昌奉。”

对于陈昌奉，以前在瑞金沙洲坝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邓小平见过几面，那时他是毛泽东的勤务员，还是个红小鬼。

黄文华介绍后，邓小平才招手叫程世清、陈昌奉坐在对面的木沙发上。

程世清坐定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他认为自己是福州部队政治委员兼江西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是林副统帅的亲信，所以态度很傲慢。程世清眼前的邓小平一副不卑不亢的姿态，使他有些不快。他对邓小平，没有看成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当年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渡江的党的前委书记，而把邓小平看成犯了路线错误，在他管辖的省内劳动改造的“走资派”，是打倒了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所以程世清没有什么称呼，第一句话就是：“你来江西劳动七八个月了，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体会？”

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回敬一句：“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全部情况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

程世清第一句话就自讨没趣，脸上一阵麻辣，马上改换话题，自找台阶，于是讲起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派他来江西主持工作后，三年来的大好形势以及对明年革命委员会一片红表示乐观的态度等等。邓小平听了没有表示态度，但对于江西的工作在全国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心里早就有数。

程世清见邓小平坐在沙发上，如同塑像一样，两眼直视前方，一言不发，心想此行恐怕毫无结果。他很希望能了解和掌握邓小平的思想，以便向中央汇报，想不到第一个回合便

败下阵来，心中气恼，脸上又不便表现，只得转而拉起家常，问道：“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吗？我可以帮助解决，你尽管讲好了。”

邓小平还是不卑不亢地说：“我的意见在昨天的信中已经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向主席汇报了。”说罢，自顾凝思养神，不再答理这不速之客。面对一位坚如磐石的巨大，程世清知道再坐下去自己会更狼狈，便尴尬地望向陈昌奉说：“我们走吧。”

黄文化在楼下看了看手表，程世清从上楼到下楼前后不过十分钟，他下楼灰溜溜地一直朝外走去，门口岗哨挺直身子给他和陈昌奉敬礼，他连手也不挥，便钻进了吉普车。

陈昌奉走近吉普车时又返过身交待黄文化：“门口不要站岗了，改为坐岗。”连陈昌奉也感到，对邓小平的监视太严了。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邓小平到井冈山参观，途中在清江县樟树镇吃饭后，清江县委和武装部负责同志陪邓小平参观江西盐矿时汇报了该县工农业生产的一些数字，邓小平听着，脱口说了一句话：“两年前程世清给我讲过江西形势怎么好，我看完全是吹牛的。”对程世清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以后程世清还到将军楼去过一两次，不过不再谈政治，只谈家常，免得自讨没趣。

晕倒在车间

人生的幸福是各种因素构成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使得同一件事具有不等的意义。邓小平每天除了劳动、散步、听广播、看书报等事情外，与外界很少联系，很少交流，生活在这种单调与封闭的环境中该是多么的寂寞。因此当远在山西的小儿子飞飞（邓质方）从插队的偏远山区赶来探望时，邓小平一家感到无比欣慰。小儿子长壮了，也晒黑了，比原来成熟了，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他坚强的体魄。邓小平夫妇和夏培根老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邓小平来说，儿子的探亲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与外界隔绝多时，儿子可以给他带来他想知道的多种信息。他认真仔细地听儿子讲述，时而高兴，时而忧虑。世事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种不是人的意志可控制的局面，各地都在打派仗，忙着夺权。这对于邓小平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可是能听儿子讲外面的情况，交谈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这就是邓小平此刻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然而幸福的时间太短，仿佛刚刚相见便要分离似的，转眼，儿子已到了归期。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上午，邓小平仍就沿着“邓小平小道”来工厂上班。儿子踏上了归程，家里又剩下一片冷清。做母亲的流着泪，而邓小平却仍然克制着自己，只是心中隐隐作痛。

这天，邓小平在车间里紧张地劳动，两手紧握锉刀，挥动双臂一上一下地来回锉螺丝，仿佛要把心中的痛苦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排除出去。正干得额头沁出汗珠时，突然他眼前发花，并闪着密密麻麻的金光，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这一突然的变化，急坏了车间的工人。当时，罗朋有事外出，车间负责人陶端增、班长程朝栋、工人程红杏、高俊生等一起跑近前来，把邓小平从地上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

卓琳闻讯也连忙跑过来，看见邓小平昏厥的情形，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她对邓小平的病情是了解的，断定是低血糖病复发。卓琳想：小平这种病已经好几年没有发过，一定是儿子的离别给他造成了内心痛苦。想到这里，她心情更难过。

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筹莫展，还是卓琳先冷静下来，用手帕擦擦眼泪，然后用手摸摸

邓小平的额头，看了看瞳孔，见邓小平面色惨白，眼睛失神，便想到一种简单的抢救办法。她朝站在邓小平身边的工人望了一下，看到程红杏站在那里发呆，便喊道：

“小程，你有开水吗？”

程红杏听到卓琳的喊声连忙回答：“有开水。”

“你家有白糖吗？”

“也有。”程红杏机械地回答。

卓琳告诉她，赶快去冲杯白糖水，要快”

程红杏一听，拔腿就往家里跑，幸好家就住在厂区。她跑进家中，翻出盛糖的罐子，洗净一个大茶杯，一下装了半杯白糖，约有二两多，冲成一杯很浓的糖水。小程觉得救人的糖水肯定是越浓越好，冲好后她迅速跑回车间，交给卓琳。

卓琳接过搪瓷茶缸，以感激和信任的目光望了望程红杏，随即把开水喂进邓小平嘴里。在场的工人看着卓琳慢慢地喂着邓小平，焦急自己空有一身力气使不上。邓小平一口气喝完了大半茶缸白糖温开水，渐渐苏醒了过来，感觉也好多了。卓琳见状对大家说道：“小平同志得这种低血糖病已经好久了。”

卓琳追述邓小平的病史说：“小平的身体素质是很好的，但是在苏联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谈判时，一谈就是一天一晚，斗争十分激烈。小平同志很少休息，就是在那时累出了这种病。不过一般地说注意得好是不太会发生的，发病时，只要及时喝上一杯白糖水，很快就会好的，不要紧的，大家放心好了。”

大家见邓小平脸色好多了，也放心了，黄文华连忙劝卓琳送邓小平到医院去开药。卓琳说：“药先不用开，我们送他回家去休息吧。”

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是个小厂，没有小车。到县里借一辆也来不及。陶端培想了个办法，决定亲自用拖拉机头送邓小平回家去。他以歉意的口吻问卓琳：“我开拖拉机送你们回家可以吗？开慢一点，保证不颠簸。”

卓琳果断地回答：“行。”

于是由黄文华和程红杏等扶着邓小平，一步一步地从车间慢慢走近停在院子里的拖拉机，由卓琳陪着坐进驾驶室。这是一部丰收二七型的拖拉机，没有拖斗，只是孤零零的一个拖拉机头，除驾驶员外只能坐两个人，坐三个人就很挤了。等卓琳扶着邓小平在拖拉机后座垫上坐定后，黄文华吩咐陶端培发动马达，慢慢加上油门，开始启动。陶端培是新建县的一位老拖拉机手，驾驶技术高超。他扶正方向盘，脚踩油门，拖拉机顿时“哒、哒、哒”地吼叫起来，迸出一股夹带柴油味的浓烟，缓缓地启动了。黄文华在后面护卫着，跟着拖拉机一路小跑。

邓小平的头斜斜地靠着拖拉机后座的靠背，双目紧闭，显得没有精神。卓琳轻轻地抱着他，生怕拖拉机颠簸会碰着他的头。陶端培小心翼翼地扶着方向盘，慢慢地向前行驶着。拖拉机开出厂区大门，然后向右拐弯朝着望城岗公路前进，两华里的路程足足行驶了二十分钟。拖拉机进入南昌陆军步校大门时，开始向上爬坡。陶端培增加上油门，再拐一个弯，便到了“将军楼”的门口。陶端培立刻从驾驶室跳出来。和黄文华两人打开门，扶着邓小平下来，又一直把他扶上二楼房间休息。卓琳十分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

第二天，卓琳来车间劳动时特地带了一包糖，亲手送给程红杏：“小程，这包糖送还你。多亏了你，谢谢！”

程红杏见卓琳还糖，心里过意不去：“卓琳同志呀，这还用还吗？”

卓琳见程红杏把糖退回来，急得连连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借了东西应该还的。”

程红杏见卓琳还糖态度坚决，于是对车间工人大声说：“老邓病好了呵，大家来吃糖吧！”说着朝每个人的茶缸里舀了一匙糖。

卓琳和大家都高兴极了。

清香的栀子花

当栀子花散出浓郁香味的时候，邓小平一家迎来了下放江西劳动的第一个端午节。

江西人过端午节，讲究吃鹅，吃粽子，吃茶蛋，扎艾条，节日前的一个礼拜，家家就开始动手准备了。

程红杏是卓琳的电工师傅，虽然二十二岁了，还象个小孩子似的，为端午节的到来表示极大的快乐。卓琳也被她的热情所感染，便询问如何准备。程红杏可高兴了，象个东道主似的，大包大揽起来。她要让北京来的客人领略江西的节日风味。卓琳是颇有信心安排好这个节日的，但在如何包粽子的问题上犯了难。黄文华十分乐意帮忙。虽然卓琳是不愿麻烦人的，但是拗不过程红杏的热心肠，答应让程红杏包下买糯米和粽叶的活，并帮助卓琳学会包粽子的手艺。

程红杏兴冲冲地奔向菜市场，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买回上等的粽叶和又白又尖的糯米，高高兴兴地向将军楼走去。

来到将军楼，黄文华很客气地请她先坐坐，他去招呼一声。程红杏他是了解的，天天见面，是卓琳的师傅，和卓琳是很亲热的。他为程红杏倒过茶后，便去叫卓琳。卓琳一见程红杏，一把把她搂住，就象对自己的亲妹妹。程红杏也非常高兴，师徒俩虽然天天在一起，却是很少串门的。带着节日的喜悦聚在一起，是多么难得！

要说包粽子，程红杏的手艺并不高，但她的热情很高，自然要打动卓琳了。淘好糯米，配上赤豆或碱水，用两张粽叶叠成漏斗形，装上糯米，封好口，再用细麻绳使劲捆扎便成。七八个粽子包下来，卓琳同志开窍了，看来包是不难的，就是捆太难，麻绳太细，捆起来线几乎嵌进肉里还是捆不紧。她俩有说有笑。程红杏无所顾忌，手使不上劲便用牙咬，好一付认真的劲头。卓琳在一旁看着，打心眼里喜欢。邓小平同志在菜地里忙完，见程红杏来，微笑着打招呼。卓琳虽然不会包粽子，但对粽子的来历和品种是十分熟悉的。她问程红杏，知不知道粽子的掌故？兴致勃勃的程红杏却从来没有听过。在她的眼里，端午节是个吃的节日，从小就知道在这天，可以吃蛋，吃粽子，小孩带个蛋兜，装着个用红曲染成的小鸡蛋，同小伙伴野啊，闹啊。卓琳说：“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粽子本应丢到汨罗江中的。”程红杏很诧异，粽子不是吃的吗？卓琳对程红杏讲述了屈原的故事。屈原是在国破家亡、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投泊罗江的。楚国人民非常痛惜屈原的死，每逢端午便纷纷朝江中投粽子。人民的感情和愿望总是那么美好。

程红杏听了感叹不已，想到邓小平这样的中央首长，在这个小厂劳动，真是太可惜了。于是，她暗下决心，尽可能地照顾好卓琳夫妇，能做什么便帮做什么。在她的心目中，邓小平一家是和蔼可亲的，值得尊敬又值得同情。程红杏觉得，人生的道路上能遇到卓琳夫妇这样的人，真是自己的幸福。

离开的时候，她随手拿起网袋，卓琳却示意她留下。程红杏以为卓琳还要用，便没在

意。

卓琳将她送出家门，来到院子。当空一轮圆月高悬，四周是淡淡的云彩，晚风吹来一阵阵清香。程红杏心中很惬意，因为这天她为卓琳夫妇做了应该做的事，给他们寂寞的生活带来了节日的气氛。院子里的花香沁人心脾，尤其是在这明朗的月夜，更有醉人的魅力。程红杏禁不住赞叹道：“好香啊！”

卓琳牵着她的手问：“知道是什么香吗？”

程红杏在夜色中搜寻。突然，她发现这阵阵花香是栀子树散发的，高兴地说：“是栀子花。”

卓琳又问：“喜欢吗？”

程红杏点点头。

几天后，程红杏收到一份非同寻常的礼物，这是卓琳送给她的一个亲手串成的花环。一朵朵洁白清新的栀子花被精心地串在一根丝线上。小程捧着这密密的小骨朵，眼睛湿润了。好香好美的花环啊，她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珍贵的礼物。她轻轻抚摸这手工编成的花环，每个花朵都是略略张开的，这是主人精选的花朵；每朵花都是在花茎处用细线串成，这是多么细致的劳动。卓琳眼睛不好，又有高血压，该耗去她多少精力？她把脸轻轻贴在花上，摩挲着。

卓琳见她如此喜欢，也高兴得很。卓琳喜欢她，喜欢她纯朴的心灵，喜欢她助人为乐的天然本性。卓琳把最美的礼物给了她。

卓琳说：“小程师傅，这花好香，你把它挂在床头，很香，很香。”

程红杏真的把它挂在床头。这是装扮她房间最漂亮的礼物。她丈夫熊炜看见，心里很感动，喃喃地对她说：“她（指卓琳）的心是多么的好哇，就像花儿一样纯净洁白。”

清贫与闪光

常言说：是金子就应该闪光。

邓小平夫妇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生产劳动，给了工人同志们哪些闪光的东西呢？

起先，人们对邓小平抱着极大的好奇，都想看看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长着个什么样，接着，人们看清楚了，这位老人，衣着朴素，蓝纱卡的工人服装，俨然像个老师傅。说俨然像个老师傅这不仅因为邓小平同志的衣着朴素，更因为邓小平同志工作态度认真，钳工工艺过硬，尤其是锉刀技术突出，用工人们的话说，是五级师傅，最好的钳工。这位最好的钳工，又是最守纪律的，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炙烤，总是按时上班，从不迟到早退。邓小平同志又是最讲礼貌的工人，他每天一进车间，就亲切地对大伙打招呼：“工人师傅早上好！”每次离开车间，总不忘对工人们说声：“明天见。”这些模范的举动，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就使得工人们对他的好奇，转变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非常友好，从不打扰他。

程红杏是卓琳的师傅，在车间里，就数她同卓琳讲话最多。时间一长，“师徒”俩的感情日笃，话匣一开就是山南海北。程红杏生长在城郊，对许多事物都特别好奇；卓琳年纪大，经历丰富，见多识广，又是热心肠，谈起天来，十分亲切。她俩的活都不重，主要是拆线圈，手上干着，嘴也不闲着，这样劳动，可以劳逸结合。程红杏修理的线圈，每次均有一个铜质的套子，她认为没用，便随手扔掉。卓琳看到，十分珍惜地捡起来，用纱布擦擦，用征询的口气对小程说：“这是铜的，丢了不可惜吗？”

程红杏本想说：“这是没用的。”但一看卓琳那副认真的样子，便忍住了，没说出来。

卓琳又问：“能不能找个什么东西装起来，积少成多？”

程红杏听了，心想：卓琳同志见过那么多大世面，怎么连一个没用的铜坯件也感兴趣。不过，她还是找来了一只纸盒，专门用来装没用的铜件。时间一长，还真积了一大盒，拿去一卖，得了不少钱。为了这事，程红杏光荣地出席了县里举办的勤俭节约模范大会。程红杏高兴地把奖状送给卓琳看，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把当年随手扔掉的铜件攒起来，还能为国家做贡献，还能参加劳模会。为此她从心眼里佩服卓琳同志，毕竟是老革命，就是比我们水平高。

卓琳也十分喜欢这位善良活泼、积极上进的女工，总是从一点一滴上关心她的成长。

程红杏第一次到邓小平家里便吃了一惊。因为她看见邓小平家中竟开着四块菜地，种着各种时令蔬菜，邓小平同志正在菜地里忙碌着，她真不理解，象这样的大干部，还要自己种菜？她听人说，象邓小平这样的干部月工资四五百，够她这样的工人吃大半年的。她当然不知道邓小平同志一家现在只有二百零五元的收入，还要负担五个子女和老人。更叫她惊奇的是邓小平同志对劳动成果的爱惜。程红杏在邓小平家做客，亲眼看到邓小平的继母夏培根要把一碗变了味的菜汤倒掉时，邓小平同志坚持不肯。程红杏凑上去用鼻子嗅嗅，也觉得变了味。邓小平同志微笑着说：“煮开一下，还能吃。”

程红杏确实不解，象这样一碗连普通人家都要倒掉的菜汤，作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邓小平却执意不肯浪费。节约一碗菜汤虽然微不足道，但程红杏从中看到了一个伟大的高尚品格。这件事一直铭记在程红杏心里。“老头真节约，连一碗馊了的菜汤都不肯倒掉。”这句话在工人中流传着，人们在惊讶之余更敬佩这位老人了。

事实上，每个同邓小平家庭接近的工人师傅，都会为邓小平同志节约的事迹所感动，了解这些事不止程红杏一个，邓小平同志一家在江西，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卓琳说，过去在北京邓小平每天要抽两包熊猫牌香烟，一九六九年十月来江西后，改为抽两盒前门的，现在改为一天抽五支，即早上去工厂劳动之前在家抽一支，劳动时集中精力干活，不抽烟，劳动回家后抽一支，晚饭后抽一支，晚上睡觉前抽一支。

刚来江西时，他们全家每星期吃三次荤，一九七〇年一月起，决定平时不吃荤，只有在星期天，孩子们从农村回来了，才加一次餐。平时多吃蔬菜，每天全是吃茄子、青菜、辣椒、丝瓜、苦瓜、南瓜等。开始时是上街买菜，到后来便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鸡下蛋。

邓小平和卓琳每天从工厂劳动回来之后，即脱去外衣，挽起袖子，挥锄开荒，在院子里挖了四块菜地，先后种了青菜、大蒜、葱、黄瓜、丝瓜、苦瓜和玉米。继母夏培根就帮着搓草绳子，搭瓜棚，让丝瓜、苦瓜、南瓜、冬瓜的藤沿着草绳，攀上树干。邓小平夫妇早晨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时，总要看一看菜地，看看自己种的黄瓜、丝瓜、苦瓜、南瓜开了几朵花。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大部分蔬菜就可以摘来吃了。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邓小平夫妇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有一天晚上喂食时，发现有一只母鸡还没有人窝，夫妇俩找了好久，直到深夜才在一棵树蔸下找到。

邓小平节约开支的方法还很多。他自己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他告诉缪发香，做豆瓣酱时尽可能少放油，尽量节省一些。邓小平的洗脸盆底漏了，就用棉球堵起来用，后来到车间劳动时，请陶端曙焊了一下。陶师傅焊好后叫车间的油漆工人

涂了点漆，亲自送到步校邓小平的家里。邓小平接过补好的脸盆，看了看，满意地点点头。

陶师傅不知道邓小平只拿生活费，便对卓琳开玩笑说：“你们两个人的工资每月五百七十多元，脸盆坏了还不买一个。”

卓琳笑着对陶师傅说：“现在修了修还能再用，对付一阵子，到不能再用时，才买新的。”陶师傅听了，心中非常感动。

以后，工人师傅帮邓小平一家修剪刀、补脚盆、脸盆的事，时有传闻，把勤俭节约的精神带给了工人同志。

出于崇敬的心情，保姆缪发香至今记得邓小平每天的食谱。每天菜谱大致如下：

早餐：一小碗糯米酒酿冲鸡蛋，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点点豆瓣酱；中餐：一杯白酒（后来由糯米做的水酒代替），三样素菜：青菜、黄瓜、苦瓜和韭菜等，随时令轮换着吃），一碟豆瓣酱或辣椒酱，两小碗饭；晚餐：一杯白酒（后用水酒代替），三样素菜，两小碗饭。只是星期天才买点荤菜加餐。这个时期，邓小平同志是“基本吃素，饭后散步”，所以身体越来越好。

邓小平同志的清贫生活，给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他和工人在感情上更接近了。

不再服安眠药了

邓小平同志的沉默具有惊人的力量，任何个人与家庭的痛苦，都难以从他坚毅的外表上看到一点痕迹。每当夜深人静，那纷至沓来的不幸与痛苦，便在邓小平夫妇的脑海中猖獗起来，折磨着他们，使他们无法入眠。那一幕幕悲惨的情景，象魔鬼一样牢牢地攫住他们的思绪。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

文化大革命一爆发，邓小平就被推进了灾难的深渊。大字报带着“打倒刘邓陶！”“打倒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等阵阵喧嚣铺天盖地而来。这一张比一张叫得凶的大字报，仿佛要将邓小平吞没。大儿子邓朴方这时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就学，即将毕业。自从邓小平被批判后，邓朴方被聂元梓操纵的红卫兵和学校造反派轮番批斗毒打，在生命的黄金时刻落得个半身残疾，至今还卧病在床。邓小平夫妇离开北京中南海到江西劳动时，因为“一号命令”催得急，还来不及到301医院看望邓朴方一眼，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来得及讲。这是做父母的莫大的心灵创伤。两个最小的孩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下放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插队劳动了。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左得出奇，以为下放得愈远便愈能割断他们与邓小平的联系。因此，二女儿邓楠下放到安徽，三女儿邓榕下放到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小儿子邓质方下放到山西忻县奇村公社奇林大队。贫瘠的山乡，缺水少粮，未及成年的子女将如何度过难关，又是邓小平夫妇放心不下的事。老大邓林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在北京还未分配工作。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把邓小平一家折腾得天各一方。

邓小平由自己家庭的遭遇，又联想起在全国更有许多老百姓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苦不堪言。一个国家不搞经济建设，使整个国家如风雨之舟岌岌可危，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他想不通。长期的批斗，使他精神上受到严重折磨，晚上常常失眠。到江西劳动后，忧国忧民，脑子更静不下来，养成了天天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习惯。他一般是中午睡前服眠尔通二片，晚上睡前加大剂量，服苯巴比妥一片、速可眠一片、眠尔通一片、非那根二片。

卓琳也是这样，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白天的午睡前服利眠灵三片、晚上眠尔通一片，苯巴比妥一片。

黄文华每天都照医嘱和邓小平夫妇的要求按时送药到邓小平夫妇手中。为了确保安全，他一定要看到他们服下才离去。黄文华最头痛的就是送安眠药，每次都不敢大意，生怕出问题，一定要亲眼看着邓小平夫妇服药。这使邓小平夫妇感到不愉快，他自己也很尴尬。他希望这样的“监护”早点结束。

邓小平夫妇到江西僻静的城效居住和劳动一段时间后，精神上反而感到解脱了。这里没有“打倒”“砸烂”之类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也听不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揪斗口号。他们与混乱的外界隔绝了，过的是一种清静的有规律的劳动生活，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加上车间工人对他们都抱着十分友好的态度，上班前为他们抹净工作台，下班前为他们打好洗手的热水。离开车间时，工人们还亲切地说声：“老邓，好走！”充满了纯朴的人情味。邓小平夫妇如同沙漠中的旅人遇到了一片绿洲，如同饥渴的攀登者看到一汪清泉，从心里感受到温暖的情意。他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晚上可以坐下来看书了。睡觉时，脑子里也平静多了。

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邓小平正式向自己挑战，他对黄文华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服安眠药了。”

这场挑战，邓小平同志胜利了。战胜失眠绝非易事，可邓小平凭自己的毅力做到了。

每天上午的车间劳动，下午的种菜，并辅以徒步锻炼，使邓小平的身心健康得到了恢复。这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来的第一个重大收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人民的“铜墙铁壁”

保密，是相对的，但不是绝对的。

尽管处于南昌市郊——新建县西边一角的望城岗公社省庄大队的拖拉机修配厂是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小厂，而且又由于这个小厂的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罗朋再三规定全厂干部到工人，个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准向外界（包括家属在内）泄露邓小平在厂里劳动的事情，谁泄露出去，将受到纪律处分。罗朋还特地派了一个老党员负责看守大门，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来厂接洽工作，只能到厂门口的厂部办公室，不得进入车间，特别是不准进入邓小平夫妇劳动的修理车间，这样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一切不为人所知了。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自从刘少奇同志被“永远开除党籍”以后，传说他和陶铸分别死在河南和安徽。不少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都纷纷打听二号人物邓小平那里去了呢？他们在北京找，在上海找，在全国各地找，最后终于知道被林彪“一号命令”赶到南昌来劳动了，并出现过一些不明不白的人来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询问“邓小平是否在你厂劳动？”的事。

罗朋知道后更加警惕，召集厂保卫小组的同志开会，再次反复强调对邓小平在厂劳动要严守秘密，任何单位任何个人来电话询问这类问题，统统拒绝回答；任何人来找邓小平，不管是什事情，都一律拒绝接见，这点要讲死，算是一条铁的纪律。全厂职工都按厂党支部的决定和罗朋的布置，——严格地执行着，使这块小小的绿洲，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安全岛。

隔了些日子，南昌市有的工厂造反派组织竟开汽车冲进厂里来，扬言一定要见见邓小平，都被看门的老党员拒在大铁门之外，这伙人便大吵大骂起来。罗朋和厂保卫组的同志闻

讯忙从办公室出来劝说，指出没有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和省革委保卫部的介绍信和批示，任何单位的汽车不能冲进厂里来，不能影响厂里的正常生产。有的工厂的群众组织得知原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战斗兵团和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一位头头就是新建县革委副主任，便通过这位副主任和厂里联系见邓小平的问题，这位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搞极“左”，是靠炮打“刘邓陶”起家的，自以为比罗朋的“官大”、“职务高”，于是气势汹汹地拒绝了守门老工人的劝告，强行闯进了厂大门，在厂里东转西看，发现了邓小平在修理车间劳动，立刻闯进车间想去接触邓小平同志。车间主任陶端培和黄文华马上制止，罗朋闻讯赶来劝说，这个老公安工作者理直气壮地质问是否持有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和省革委保卫部的介绍信？讲明要邓小平谈什么问题？这位副主任答不出来。罗朋立即给县委书记李兆培和省保卫部陈昌奉打电话汇报了这件事情。后来，新建县委请示省里同意，给这位擅自闯进厂里企图干扰邓小平正常劳动的副主任以纪律处分。

罗朋以此为例，反复告诫厂保卫小组及看守大门的老工人，一定要继续执行保密保卫措施，不管什么人不经批准都不能进入修配车间，不准任何人干扰邓小平的正常劳动，确保邓小平同志的安全。以后全厂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产程序和保密环境，这样，这个小小工厂的竹篱围墙成了保卫邓小平的铜墙铁壁，任何居心叵测想混进厂里寻找邓小平进行挑衅活动的人，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休想逃出觉悟起来的工人的眼睛，一一被挡在厂大门之外了。

据程世清后来讲，一九七〇年，曾经有重庆、武汉两地造反组织的几十个人，先后来到江西省革委会，声称要把邓小平揪到重庆和武汉回答什么问题。这是十分危险的迫害，程世清不仅未向这两处造反派组织的人说出邓小平所住的地方，还指示工作人员劝说他们回去；对个别胡搅蛮缠的头头们，还派武装人员专门“礼”送回原地，保证了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安全。

当然，江西人民——三千四百多万儿女，对这位曾经在江西这块红色土地上战斗过的、出生入死的邓小平，对这位身经百战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杰出贡献的邓小平是十分热爱和敬重的，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时刻关心着他的安全和命运。

邓小平居住的“将军楼”是竹篱笆围墙，上面攀了一些藤枝绿叶，破破烂烂，竹篱笆后面不到一百米，便是步校一人高的围墙，一翻身就可以进来，不少人想爬进来接触邓小平，有好心的，也不排斥有不法分子。警卫战士白天站岗，晚上放流动哨，时刻警惕着坏人的破坏。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将军楼”的竹篱笆与厂里的竹篱笆围墙保护着邓小平过着宁静的生活，使邓小平在望城岗这个荒漠的地方度过了三年零两个月的危险，困难岁月。

团 圆

邓小平夫妇听到了不幸的消息：被迫致残的老二邓朴方又被医院撵了出来，栖身在北京清河收容所，靠编纸篓维持生计，日子苦不堪言。在那个热衷于“革命”的年代，健康人尚挣扎在半温饱之中，更何况一个下半身完全瘫痪的残疾人？邓朴方在收容所不但无人护理，而且被迫自食其力，生活该多难啊！对子女的牵挂揉碎了邓小平夫妇的心，他们希望把可怜的邓朴方接到身边来亲自照护，也希望下放到各处农村的其他几个子女都能一块回到父母身边团聚。黄文华在平时就深知邓小平同志对儿女的思念之情，也知道邓小平同志感情深沉不轻易表露心迹，因此亲自上南昌向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作了汇报。恰巧这时中央办公厅给江西

省革委副主任文道宏来了长途电话，征求省革委的意见，看能否安排邓朴方，能否派一人直接上北京去接邓朴方。文道宏当晚到将军楼看望邓小平夫妇时转达了这个消息。

这一惊人的喜讯，一扫邓小平同志家中沉郁的空气。四个健康的孩子都要回到自己的身边。他们是火，能融化五年来压抑在心头的寒冰；他们是风，能吹开笼罩在邓小平夫妇生活中的愁云。

首先是老四邓榕（毛毛）于一九七〇年春节前夕从陕西来到南昌，她看见父母亲，老远就跑过来叫爸爸、妈妈，跑着扑向邓小平同志的怀抱。父女久别重逢的高兴心情，难于言表。邓榕的到来，增添了小平夫妇的生活欢乐和愉快心情，在这幢孤零零的“将军楼”里，不时传来邓榕清脆动人的歌声。每当邓小平从厂里劳动回家，未进家门，先闻歌声。

女儿听到父亲上楼的脚步声，便高兴地从房间跑出来迎接，甜甜地亲一亲父亲的额头，小平同志一上午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这是无法替代的天伦之乐。

邓榕是个高中毕业生，在北京读书时，学习成绩优异，性格开朗、聪明活泼，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十分动听，在家里称得上是个百灵鸟。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百灵鸟的歌声便听不见了。邓榕由于爸爸被揪斗，自己下放到陕西富县羊泉公社郭家大队插队。这次欢聚，因还不是正式转点，两个月不到，又要分离了。

当时在一次电话中，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通知黄文华说：“不能让那邓榕长期住在这里，叫她回陕西农村劳动去。”

黄文华作为省军区派来的监管人员，当然要执行上级指示，这回他又要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硬是不通人情地让邓榕再次离开父母。以后邓榕从陕西转到新建县望城公社省庄大队插队。第二年秋，经程世清批准，在省革委教育组组长黄知真的安排下，赵子昌、黄文华多次联系给邓榕办妥手续进了江西医学院读书。

一九七〇年冬天，在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李村大队插队的飞飞来了。飞飞是邓小平的第五个孩子，大名叫邓质方，长得聪明，能干，在北京念中学时就十分喜欢搞无线电。邓小平看见离别两年的小儿子长高了，脸晒黑了，身体结实了，心里充满了喜悦之情。

儿子来的这天晚上，父子俩畅谈到深夜，从劳动的经历到形势的看法。邓质方带来了许多新闻，其中不少是父亲当时无法知道的。父子俩越谈越热火，在邓小平的眼前，飞飞是成熟了的儿子和信使。

邓质方离开父亲，如一只孤雁在外飘零。他要求回到父亲身边，要求去上大学。他是要强的孩子，不肯耽误宝贵的年华，邓小平非常欣赏他爱学习的劲头。经黄文华向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反映，赵子昌同志积极地向中央办公厅请示，首先把他从山西忻县转到新建望城岗公社省庄大队插队。一九七一年秋又经程世清批准，黄知真安排以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职工子弟的名义进了江西工学院。他虽然比同班同学晚进校两个月，但由于具有很好的学习基础，功课很快赶上了进度，不久便遥遥领先，成了学习上的佼佼者。几年后，他又考取了出国留学。

一九七一年元月一日，邓朴方从北京北郊的清河救济院，来到了邓小平身边居住。邓朴方的小名胖胖，长得酷似父亲，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文化大革命被迫致残，外伤性截瘫，大小便失禁，下肢废用性萎缩，完全直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邓小平看见邓朴方这个样子，心中十分难过。要不是受他的牵连，这孩子不会吃这么多苦。

邓林是邓小平的大女儿，家中老大，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画画得不错，因为受到邓小平夫妇的牵连，学校里老是逼她交待父亲的问题，总是交待得没完没了，精神上长期受到折磨。邓林来到父亲身边最晚，直到一九七一年冬天，也就是邓小平从北京来南昌的两年

以后，才得以来赣，这说明邓林这几年在北京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

最令邓小平夫妇高兴的，是邓楠这次竟带来了她的未婚夫。他是个转业军人，名叫张勤，他同下放到黄山脚下的邓楠自由恋爱，在生活上给予邓楠许多照顾。当邓楠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就是邓小平时，张勤并没有避而远之，仍然深深地爱着她。他身材魁梧，一表人才，邓小平见了十分喜欢。在这种年月，有人敢于爱他的女儿，这是对他的很大安慰。

这年冬天，邓小平夫妇为邓楠，张勤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给残疾孩子更多的爱

半身瘫痪的邓朴方转来江西后，住在楼下的一间小房间里。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劳动，只能在下午为他料理生活。

一九六八年三四月间，聂元梓一伙的黑手伸向了邓朴方。他们丧心病狂地突然将邓朴方关押起来，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摧残他。当他被迫害致残后，北大军宣队仍不放过他，将他送到设备条件很差的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那里一间房住十一个残疾人，又没有暖气，一个煤球炉烧不了多久就灭了，床上的被褥很薄，仿佛躺在冰窟里，半夜常常被冻醒。后来才知道，只有在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残疾人，才会被这所救济院收留。邓朴方虽然下肢瘫痪了、但手还是挺灵活、有力的。他咬着牙和别人一块参加了用铁丝编字纸篓的劳动，编一个底一分钱，编一个帮四分钱，每月才能挣到四五元钱。收入虽然是微薄的，劳动却在支撑着他生活的内容。直到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他转到父母身边，才得到了亲人的照顾。

由于邓朴方下肢一直站不起来，整天缩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方便，每天都得为他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培根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做菜已够忙了，而且由于年纪大了，体力也不够，所以每天替邓朴方擦澡的任务都由邓小平夫妇承担。卓琳的体质又差，主要体力活还得由邓小平来做。每次擦澡时还要把朴方从床上搬上搬下，帮他翻身，累得满头大汗。时间长了，邓小平也累得够呛。厂里得知这一情况，知道邓小平护理有困难，便由厂里选了一位身体好、思想进步的中年妇女缪发香，住在邓小平家里，专门担任护理邓朴方的工作，厂里还为邓朴方做了副哑铃，帮助他锻炼身体。

时常萦绕在邓小平心中的是如何在心灵上护理这位创伤最重的儿子。他感到儿子是受自己的牵连而遭此折磨，心里很内疚。作为父亲，他又在用慈祥的爱来医治老二心灵上的创伤。

邓朴方原来是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电子技术的，邓小平时常在考虑怎样让他思想上得到安慰，精神上感到充实，坚定地活下去。有什么好办法安排朴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呢？工作，只有工作才能使人感到存在的价值。如何去寻找这恰当的工作呢？只有向工人求援。

一天上午，在加工零件时对陶端培说：“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陶端培第一次听到邓小平主动向他提出问题，感到十分惊奇。他很想顺着邓小平的询问给予满意的答复，但是，想遍了厂里的种种工作，确实没有电机方面的工种，他很诧异，邓小平怎么向他提这样的问题。莫非钳工工作不过瘾？他失望地回答：“老邓，我们是专门修理拖拉机配件的小厂，压根儿找不出电机方面的活。”

邓小平进一步问道：“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或者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干干？”

陶端培打量着邓小平：“老邓，您打听这些东西干什么？”

邓小平如实地说：“孩子在家里闲着无聊。”邓小平讲到这里，眼睛充满了父爱：“这孩子很

聪明，能在这方面干些活儿就好了。”

陶端璠听到这里，心中十分同情。他想到邓朴方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了一肚子的学问，如今却空有一身本事，不能为国家出力，真是太可惜了。按说，怎么的也得给邓朴方想点办法。邓小平从未求他帮过忙，这件事是对他的信任啊。他心里好不焦急。一时间又想不出办法，急得满头大汗。

停了一会儿，邓小平又试着问：“陶排长，你有没有收音机，叫胖胖修理一下也好，这也使他不至于躺在床上闷得慌。”

陶端璠直率地说：“老邓，不瞒你说，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资收入，小孩有四个，而且又小，读书还要交钱，还有老人，生活很困难，哪有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听了，理解地点点头：“这个我知道。”便不再提这件事，继续挥动双手，干开了他的钳工活。

在“老邓”家作客

“……我们在你们厂的三年劳动学习中和广大工人干部结下了深厚友谊，工人和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感动难忘……”

一九七七年七月，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来信，信中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抒发了邓小平一家对工人师傅的感激之情，这封信是邓榕执笔的，表达的是邓小平一家对工人们的情谊。

这是工人们与邓小平一家深厚友谊的一个印证，这种友谊不会为时间的流逝和地位变迁而冲淡。

邓小平和卓琳在车间劳动的时间愈长，和工人的感情愈深，工人们不仅认识到邓小平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且把他当成良师益友，把他在车间劳动作为厂里的光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多接近他，多照顾他，不要让他累坏了身子，不要在这里遭到什么意外的事情。

由于时间长了，工人们对担任监护邓小平的军队干部黄文华也渐渐熟悉了，这样便创造了去“将军楼”——邓小平家里作客的条件，打破了任何人不许同邓小平单独接触的规定。去邓小平家作客，一方面看望他，看看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工人帮助解决，另一方面同邓小平交流一下思想情况，也把工人们自己的一些情况同邓小平谈谈，使他更加了解工人，了解实际。工人陶端璠、梁永刚、程红杏先后去邓家作了几次客。

梁永刚是进厂不久的新工人，工作台与邓小平的工作台毗邻在一起。陶端璠交待小梁为邓小平及时领劳保用品，把一切杂事（包括领锉刀、打热水等等）担当起来。有一次黄文华请陶端璠为邓小平买两个鸡蛋，陶端璠便让梁永刚晚上送到邓小平家去。梁永刚到了“将军楼”，黄文华赶忙接待，卓琳按价付了蛋钱后，客气地叫小梁坐，并倒开水请他喝。邓小平坐在木椅上看书，见了小梁连忙为他递烟，并说谢谢。

陶端璠先后三次去邓小平家里作客，一次是为邓朴方做了个洗相盒子，第二次给邓小平、卓琳送修补好的脸盆。第三次去时同邓小平作了一次深谈。他告诉邓小平自己过去住在鄱阳湖边，家里人有血吸虫病，他也有。邓小平听了马上说，这种病是个麻烦事，但又说，这种病是可以治的，首先要消灭钉螺和加强粪便管理。邓小平说，血吸虫的虫卵是通过粪便在水中孵化为毛蚴的，所以要加强粪便管理。

陶端璠又讲到了自己的工资问题，他说：“我们孩子多，工资低，生活很困难。”

邓小平沉重地回答：“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这一类的工人都有家有孩子，工资很低，我都知道。”

陶端璠知道邓小平的生活很清贫，便问邓小平一个月吃多少斤米。

邓小平说：“每月吃二十六斤。”

陶端璠觉得定量很低，便问：“够不够？”

邓小平回答说：“够了。我多吃一点菜，什么蔬菜我都想多吃一点。”

陶端璠又问：“您生活上需要什么？”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喜欢吃一点米酒。”

“你会做酒？”陶端璠感兴趣地问。

邓小平介绍他做米酒的办法说：“很简单，很好做。我都是自己做，先煮糯米饭，用缸子装起来，放点白糖，然后加点酒药，密封几天就可以吃。”

陶端璠告诉邓小平：“酒药、糯米，我这里都很容易搞到，你要的时候给我说一声就行。”

邓小平笑着说：“行呀，可以，可以。”

后来，邓榕常来找陶端璠，见面时说声：“陶排长，妈妈要买酒药。”陶端璠买好后，很快就给送去。这些事，程红杏也做了不少。

有一次，专门护理邓朴方的缪发香给陶端璠带来口信说：“卓琳请你买点西瓜，说你买的西瓜很甜。”陶端璠还和车间的工人一起到附近农场帮助卓琳买了一些梨，做梨酒。卓琳看到，心中非常高兴。这些小事，使得邓小平夫妇同工人同志的感情联系得更紧了。

一九七一年夏天，南昌热得象火炉，正好有一天，厂里停电，降温的排风扇也停了。邓小平走进车间劳动时，热得脱掉衣服，只剩下一件圆领汗衫，到处找不到扇子。邓小平问陶端璠：“没有电，电扇停了怎么办？”

陶端璠见邓小平热得直冒汗，连忙去找来一把油纸扇，又倒了一杯凉开水，邓小平接过开水，一饮而尽，满意地说“谢谢！”

陶端璠这才发现今天特别热。往常到邓小平家，很少见他扇扇，热了只是用毛巾揩汗。可见这天确是超高温。

除了工人之外，罗朋也曾到邓小平家作客。

第一次是在这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罗朋带着大儿子罗小朋专门从厂里来“将军楼”看望邓小平夫妇。罗朋在路上想：邓小平是抗日时期自己的老首长，现在中央和省里把他安排在自己这个小厂劳动，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好好地谈谈，在车间劳动时，众目睽睽，也实不方便，被哪一个人密告到省里去说不清楚。他晚上辗转床上，愈想愈睡不着。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和专门监护邓小平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也较熟悉了，想把去“将军楼”的愿望同他说了，黄文华这时对罗朋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戒备，同意他在下午的时间来“将军楼”坐一坐。

罗朋父子俩经过警卫同意，叫开了“将军楼”的大门，黄文华迎了上来。罗朋讲先去看看邓小平同志，再来和黄文华叙谈。

罗朋进到“将军楼”的一楼，朝右转弯，看见邓小平穿了件汗衫，手里拿着扇，正躬腰低头在煽炉子煮饭。因为炉膛里火势不旺，不用扇子煽，火就上不来，还老冒浓烟。邓小平又是用嘴巴吹，又是用扇子煽，好不容易才使炉膛里的火旺了起来。邓小平的额头上沁出了汗水。

罗朋看到邓小平上午在车间紧张劳动，下午又在家里弄饭，心里顿生一种同情之心，他很想为邓小平配备一个保姆，减轻他在家里的劳动。罗朋走近前问候邓小平同志：“老邓，你

在煮饭呀！”

邓小平手拿扇直起腰来，看到罗朋站在厨房门口，连忙打招呼道：“老罗你们来了呀！”

罗朋关切地说：“老邓，你上午在厂里劳动，已经够辛苦劳累的，下午还在家煮饭呀？这些事叫他们干嘛。”

因为卓琳身体不太好，经常患病，继母年事已高，不能光靠她一人处理家务劳动，邓小平劳动结束后还要帮助拣菜、煮饭、洗衣服、拖地板，分担一点家务劳动。他见罗朋第一次来，本想带上二楼客厅坐坐的，可眼下厨房里没有人离不开，怪尴尬的。邓小平说：“是要干一点活！”

罗朋知道邓小平的难处，不便多谈，便简单的询问厂里给邓朴方做的床适用不适用？这时邓朴方从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转来身边治疗护理不久，厂里特地为他做了一张适合他睡觉和锻炼的木板床。邓小平高兴地说：“那张床吗？合适，合适！”

“这是我的儿子，叫罗小朋，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罗朋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听后，望了罗小朋一眼，点点头说：“呵！呵！”

罗朋见邓小平在厨房忙着，不便多打搅，便关心地问邓小平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他可帮助解决。邓小平答道：“太麻烦厂里了，没得什么困难。”

罗朋说着便告辞了：“老邓，您忙吧，注意身体！”

当邓小平同志处于逆境的时候，这些基层干部和工人师傅真诚的关怀和友谊给了他极大的温暖。

“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新建拖拉机修配厂立即进行了传达。邓小平和卓琳以普通职工的身份同工人们一起听了厂领导的传达。那是一天上午，厂里根据新建县委的布置，决定向全厂职工传达关于林彪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的历史材料。传达地点选在职工食堂，这是一个很简陋的食堂，面积不大，约有二百多平方米。邓小平和卓琳坐在全厂一百多个职工的中间，他的椅子两边由陶端瑞和张端龙护卫着。邓小平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双目凝视前方，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工人们坐定后，罗朋和县工业局长肖焕杰一同快步来到会场，坐在职工前面用两张四方桌排成的主席台上，看见职工们密密麻麻地坐在一条条的长木凳上，显得十分拥挤。罗朋发现邓小平端端正正地坐在职工中间，沉着冷静如同塑像一般，心中油然地升起一种敬意。

罗朋以会议主席的身份站起来，向邓小平打了手势：“老邓呀，你耳朵听不清楚，请您和卓琳同志坐到前面来”邓小平见罗朋起身让座，随即点点头，马上站起来和卓琳一起按照罗朋的吩咐，紧靠着罗朋和县工业局长肖焕杰身旁坐着，邓小平身板挺直，两手摆在大腿上，两眼平视，一动不动，与会场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罗朋给邓小平、卓琳各倒了一杯茶，邓小平微笑着望了一下，始终没有喝一口，聚精会神地听文件传达。整整念了两个半小时的中央文件和林彪、陈伯达罪证材料，邓小平没有离开一下座位，也没有同别人交头接耳讲过一句话。当罗朋念到林彪利用 B₅₂ 的力量打走 B₅₂ 的力量时，邓小平只是端坐着，没有任何表示。程红杏清楚地记得，当罗朋传达于新野、周宇驰等人集体自杀时，笑着用手比划，作了个开枪击中额头的姿势，仿佛怕邓小平没听明

白，用个夸张的动作示意邓小平，然而邓小平仍是一动不动，坐得直直的，那种沉着的姿态，令人难忘。

罗朋传达文件结束后，宣布以车间为单位组织讨论，邓小平随同陶端璠等同志一起回到了修理车间、依然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工作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静静地听工人们的讨论，没讲一句话。

卓琳在车间讨论时很活跃。她高兴地对车间主任陶端璠说：“陶排长把文件给我看看。”卓琳从陶端璠手中拿过文件，一边看一边笑。当卓琳翻到一张叶群和李作鹏穿很薄的衣服的照片时说：“叶群年青时作风就很坏……”邓小平严肃地坐在椅子上，只听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调皮话，从不插话，表情十分沉着。陶端璠看见工人们有的站着，有的两人坐一条凳子，七嘴八舌，东拉西扯地随便发言，而邓小平却正襟危坐，觉得很不协调。于是对黄文华说：“是不是请老邓把文件带回去自己看，就不要坐在车间参加工人的讨论了。”黄文华点头同意，便和邓小平、卓琳沿着“邓小平小道”返回住地去了。

尽管邓小平在听传达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巨澜。林彪是少数利用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阴谋家、野心家之一，对这种趁火打劫之徒，邓小平是极端愤恨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不惜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垮，把党的优秀干部往死里整。林彪的自我灭亡，是邓小平心中早已希望的，正如毛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父亲听说林彪自我爆炸后说道：‘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可见邓小平对林彪的深恶痛绝。

为了庆祝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不识时务的监护黄文华上楼干涉说：“明天还要劳动，早点休息呀！”引得邓小平全家非常反感。

秋天里的春天

秋天来了，一九七二年的秋天来了。南雁编着队形，鸣叫着飞向北方。候鸟的迁徙最容易牵动人们的思绪。久违了，北京。

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迎来了它的秋天，这个秋天，收获了什么呢？

林彪反党集团，也曾希望占有这个秋天，可是他们彻底失败了。这个历史性失败，给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线希望。

王震也是被林彪一号命令赶到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场的，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已先期返回北京了。他从江西回北京后，详细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劳动情况，并力荐毛主席早日启用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四日，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到了这封信，根据邓小平一贯表现及现在的态度，根据王震等的力荐，对邓小平的来信迅即作了重要批示。这个指示可以称得上一九七二年中国政治生活的第二个收获。

秋天来了，秋天总是伴着收获。

毛主席指示写道：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第一个为这个批示喝彩的是周恩来总理，这位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搏击的勇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他超人的智慧作着各种方式的斗争，力图把中国的局势引向一个健康的轨道。

只有他，贡献着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贡献都是难能可贵的。现在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林彪一伙算是被打下去了，这个时候应该有新的正气来抵制邪气，单靠他的力量不够的，恰在这时，毛主席的批示给了他希望的所在。凭着他对毛主席的了解，他很明确指示的意义和作用。毛主席评价邓小平的寥寥数字，包含着深刻的内容。

毛主席说：“这些事我过去说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这话确实是发自肺腑，是从内心爱护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过去和现在。这个精神就是起用邓小平的信号，这将给中国政治局势带来重大的转机。这不是一个邓小平的问题，而是一大批有才能的同志要迅速重返岗位的问题。邓小平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周恩来想到这里，脸上露出了笑容。周总理一方面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送印刷厂印制若干份，分别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另一方面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立即调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的身边，协助他的工作，改善他的日常生活。

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开始了新的生机。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对邓小平原信批示精神，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地讨论了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及时地向他转达了中央指示精神。但是什么时候回北京，在未接到通知前，邓小平仍在“将军楼”等着。

告 别

林彪倒台以后，江西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撤销了，新省委书记白栋材、黄知真探望了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一家的生活气氛变得轻松愉快了些。不久，黄知真来到“将军楼”，向邓小平同志转达了中央关于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的通知，邓小平敏感地感到，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的机会就要来了。

这年春节前夕，罗朋接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调令，就任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副校长。临行前，他和夫人年丰一起专程去看望邓小平夫妇。

此前，邓小平夫妇被批准作了一次赣南、赣东北和景德镇参观访问。

邓小平在二楼客厅热情地接待了罗朋、年丰夫妇。邓小平和卓琳在客厅茶几上摆满了南丰桔子，泡了两杯浓浓的四川名茶，并请罗朋吸用过滤嘴的香烟。邓小平夫妇心情很好，连连请罗朋、年丰夫妇吃水果。

罗朋把年丰介绍给邓小平夫妇说：“这是我的爱人年丰同志。”邓小平、卓琳高兴地向前一握手。罗朋一边吸烟、品茶，一面对邓小平讲：“老邓呀，你们俩在厂里劳动三年多，工人评价很高，我工作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请多多批评。”

邓小平听了笑着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麻烦了你们大家。”

罗朋又关心地问邓小平身体如何？

邓小平高兴地说：“我身体很好，比刚来时胖了些！”

邓小平讲到这里站起来，用手扯了扯上衣叫罗朋看：“这套衣服，由于身体比过去胖些了，衣服也显得紧了点。”邓小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出对于他在罗朋领导的那个小工厂

三年多的劳动是满意的。

接着，罗朋告诉邓小平、卓琳，他要调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工作，不久要离开这个厂子。

邓小平听了笑呵呵地说：“去办学呀，是件好事，去吧。”

罗朋猜想邓小平不久也可能返北京，便问：“老邓，听说你很快就回北京了。”

邓小平说：“是的。”

邓小平一面讲，一面叫罗朋、年丰夫妇吃桔子。在他们之间无拘无束的谈笑中，充分体现了三年相处的情谊。

邓小平同志要回北京了！

临别前，邓小平夫妇回忆起三年来工人同志的深情厚意，心中充满感激和难舍之情。邓小平对卓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应该向工人师傅告别。”他让卓琳带着孩子们买了一些糖果、饼干和香烟，送给陶端培、程红杏等师傅和曾照护邓朴方的缪发香阿姨，表示谢意。

卓琳和孩子们到陶端培家时，正好他不在家，去南昌办事了，只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家。陶端培的妻子是个朴素的家庭妇女，见卓琳一行到来，一时手足无措，不知怎样表达欣喜之情。

卓琳同志亲切地说：“这么几年，我们在车间劳动，麻烦了陶排长，买了点东西表示谢意。”卓琳说完从邓榕手里拿了一袋糖果、两斤饼干和一包水果，送到陶端培妻子手里。卓琳接着说：“我们要走了，今天是专门来谢谢的。”

陶端培的妻子高兴地接受了卓琳一家的谢意，连说不敢当。卓琳一行从陶端培家出来，再到电工程红杏的家里，程红杏正好在家。

卓琳见到程红杏，拉着她的手高兴地说：“这几年麻烦了程师傅，教会了我电工技术，这点东西是我给你吃的，表示感谢。”

程红杏不忙去接卓琳的礼物，她觉得收卓琳的礼物太不敢当了，卓琳要回北京了，能来看她就很不简单，怎么能收她的礼物。程红杏太激动了，忘了叫卓琳一行坐下，便去翻开一只陶罐，她要用自制的冻米糖来招待这尊贵的客人。

卓琳落落大方地坐下，同激动的小程聊了一会儿，叮嘱她好好工作，日后来北京，一定来玩。程红杏连连点头答应，说实在，她是多么希望能与卓琳再相处一阵子，分别竟来得这么突然，突然得使她茫然失措，以至卓琳一行要走，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她留卓琳和孩子们喝茶，卓琳说不必客气，她们还要到程良堂家里看望缪发香同志。

卓琳等来到缪发香家里，缪发香夫妇都在家。自从邓小平宣布解放后，他的炊事员从北京来到了望城岗，专门照料邓小平一家。照护邓朴方的缪阿姨便回家来了。这次她看到卓琳和孩子们来看她，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连连请坐，泡茶招待。

卓琳握着缪发香的手说：“这几年我们全家麻烦您了，今天我和孩子们代表老邓来谢谢您。”卓琳接过邓榕递来的香烟说：“这是胖胖专门买给程伯伯的。”

接着邓榕又连忙拿出一包糖塞给缪发香手里说“胖胖今天来不了，这包糖是胖胖买给缪阿姨的。”

缪发香接过邓榕送来的糖，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说：“我做得不够，请原谅。”

卓琳一行，圆满地完成了邓小平的嘱托，把真诚的情谊送到了善良的人家。

那天晚上，陶端培回到家里，听妻子说卓琳和孩子们专门来家告别，并送了礼物，真是激动不

已，他问妻子，卓琳同志是否讲了老邓什么时候走。他妻子是个农村妇女，不大会讲话，忘了问走的具体时间。陶端增想，邓小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大的干部，行动是保密的。他预料到明天就会离开。明天说什么也要送送他们。三年多的友谊非同一般。何况邓小平同志特地让卓琳来告别，此时邓小平一定很忙，即使忙也没有忘掉咱们工人，这是多么宝贵的情意！想到这，他对妻子说：“明早我到老邓家里去一趟。”当晚，他邀了程红杏、缪发香、卢凤秀、张端龙、滕朝波等六七个工人，约定第二天早上去看望邓小平同志，并回赠一点礼物作纪念。这个建议，得到工人们的一致响应，与他们相处三年多的邓小平马上就要离开了，谁不想送送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呢？

第二天一亮，陶端增就带着小孩和程红杏、缪发香、张端龙、卢凤秀、滕朝波等从厂里出发，快步走上公路，向邓小平同志的住处走去。约莫在公路上走了十分钟，离邓小平同志的住处有一段距离，一辆货车便迎面驶来，同他们一行错面而过。陶师傅眼尖，见车上装载的都是行李，便对大家说：“不好，邓小平同志就要走了，大家快快走！”

当大家走到离邓小平同志住处六七十米远的地方，邓小平、卓琳和邓榕等人正从院子里走出来。邓小平打开车门，右脚踏上轿车准备关门时，跟在身后的卓琳听到远处陶端增、程红杏、缪发香的讲话声，她连忙扯住邓小平的衣服说：“慢点开车，工人师傅来了。”

邓小平收住脚，把头从车内探出来，看见工人师傅们向他跑过来，随即下车，走向将军楼，站在门口台阶的左边，同前来看望的工人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进院子到屋内坐。邓小平叫邓榕、邓质方重新摆好桌子，从车上拿下来一个箱子，拿出人们喜爱吃的四川小麻饼、糖果，招待送行的工人同志们。

程红杏擦擦汗，私下对缪发香说：“好险，晚来两分钟，老邓坐的车就开走了，我们就看不到老邓了！”

大家坐定后，陶端增代表来送行的工人说：“老邓同志，听到你要走，厂领导也不知道，我们几个工人先来了。”陶端增讲到这里抱歉地对邓小平、卓琳一家人说：“这么几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

邓小平听了陶端增的话，高兴地说：“很好，很好，我们到工厂来劳动，厂领导还给了一个房间休息。”邓小平接着亲切地讲：“我在厂里三年多了，麻烦了大家，现在要回北京去，我叫卓琳昨天下午带了孩子到厂里，到你们家，表示感谢。”

陶端增问邓小平：“你这次回北京准备住到哪？是不是到原来的地方——中南海去住。”

邓小平回答：“不住中南海。”

陶端增和缪发香等同志对邓小平、卓琳要求道：“你们回北京后，若有机会到江西来，请你们两位再到厂里看看。”

邓小平用感谢的口吻连连说：“会的，会的，厂里干部、工人都很好。”

往往是未见面时有满肚的话要说，一到见面又不知说什么好。陶端增等人怀着歉意对邓小平说：“我们这些工人文化都不高，办事很粗，有很多事未办好，请多原谅。”

邓小平说：“很好！很好！”邓小平看见陶师傅的两个孩子，连忙站起来抓了一把糖塞到孩子们手里，和蔼地笑着说：“吃糖！吃糖！”

缪发香和卢凤秀看到邓小平爽朗的笑容，心里格外高兴，连忙把带来的一些花生和鸡蛋送给邓小平和卓琳，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

卓琳一见这么多礼物，心想这不太麻烦工人师傅了吗？她知道工人们生活还很苦，一点东西来之不易，于是示意他们不必客气，不要麻烦。

这两位女工坚持要把东西送给邓小平夫妇，卓琳实在推辞不过，便亲切地说：“好，鸡蛋

我收下，其它的东西都带回去留给孩子吃。”

陶端培、缪发香、程红杏等见卓琳收下了礼物，心中特别愉快，他们觉得已经来了半个小时，不好再耽误邓小平开车动身的时间，便站起身来，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说：“不打扰了，我们回去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邓小平马上起身，连声说：“好，好。”他和卓琳随即送他们从厅堂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一位一位地握手告别，送走了工人师傅们，然后再上车启程。

汽车刚走六十米，看见工人们在路上走着。邓小平从车窗向工人们招手示意再见。

汽车缓缓地从工人们身旁驰过，没有扬起尘土。

工人们忍不住赶紧几步，再次招手致意。别了，老邓，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再建功勋。

(原载《华人世界》1988年第1期)

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①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周恩来

文裕同志交来二机部四〇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已由郭老、西尧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见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时所说的话。

现在请文裕同志将你们今年四月送给二机部和科学院那份报告转给我一看。西尧同志请朱光亚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研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错，请你们研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日本国政府 联合声明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七二

① 这是周恩来同志给张文裕、朱光亚同志的信。

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 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周恩来(签字)

田中角荣(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日本国外务大臣

姬鹏飞(签字)

大平正芳(签字)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新华社 1972 年 9 月 29 日讯，载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

(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

周培源

两年多来，综合大学理科的革命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革命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旧中国的科学基础异常薄弱，又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右的和形“左”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理科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解决。必须深入路线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才能把理科的教育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理科进一步怎么办？我个人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供大家讨论。

理科的内容，理与工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在教育革命中综合大学理科已建立起来的专业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有研究基本理论的基础数学、理论物理、天文等专业；有技术性很强与生产密切联系着的无线电、半导体器件等专业；也有由于生产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结果，不同学科与学科之间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专业，如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生物化学、地质力学等；原有的专业如光学、磁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也有了新的内容。随着三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理科还会出现一些新的专业。原来的数、理、化、生、地等几门基础科学，也会有新的发展。

理科的专业范围既然这样广泛，怎样能对它有比较明确的理解？我认为关键在于对自然科学理论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关系要有明确的认识。

对自然科学理论的认识，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是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脑子里固有的，自然规律是人创造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还教导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自然科学理论就是人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科学活动中从自然现象内发现的内部联系，即自然现象内部的“是”。人们在掌握了自然规律之后，又运用这些规律去进一步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能动地改造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发展史。

回顾自然科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学科是从生产斗争中直接产生、发展

的。比如，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热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最早是在提高蒸汽机效率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金属和合金的理论是从冶金工业发展出来的。近代的计算数学是在电子计算机发明的影响下，适应国防与工业生产的需要得到发展的。射电天文学是由于雷达技术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天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如在生物学的领域里，细菌是在酿酒工业中发现的。其他如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学、遗传学、人体生理学、解剖学、等等，都是由于农业生产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但是，自然科学中有些重大发现和学科在某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括观察自然现象在内的科学实验，而并不都是因为生产上的直接需要。热力学在自身矛盾的推动下后来发展到统计物理。由于十九世纪的工业发展，特别由于电的利用，在十九世纪末发现了X—射线、天然放射性和电子。从它们的发现到铀裂变原子能的利用的半个多世纪里，物理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太阳系到原子结构与原子核结构，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发展过程。这一阶段物理学发展的主流，在二十世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影响下，基本上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工作，是属于科学内部矛盾的逻辑发展和抽象的范畴，其主要任务并不直接为了解决当时生产上的问题。我国劳动人民从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所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是阳历，而且是安排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农业生产的科学依据。但是阳历的运动学基础，即地球绕太阳运行，这样一个根本的认识，仅仅从农业生产或对天空中恒星和星座的一般观察总结不出来，还必须通过科学实验对行星运动进一步的观察、分析、抽象才能得到。而行星运动在四百多年前也还没有用来直接解决生产问题。

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生产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生产活动。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恩格斯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从行星绕日运动抽象得来的动力学规律，是在地面上进行工农生产的理论依据。根据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规律就能预见到人类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而量子力学又为半导体技术和激光技术在理论上开辟了道路。二十世纪微观物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为社会生产所需要的能源、材料、新技术等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

在教育革命中有人说，“工”是改造世界，“理”是认识世界的。也有人说：“理和工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不要强调理和工的区别”。理和工都依据同样的客观规律担负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理和工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但是，理和工各有自己的具体任务和特点，它们所处理的具体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也不同，因此，理科和工科对人员的培养和要求也应有所区别。“理工不分”的看法，实际上是取消理科，这是十分有害的。

概括地说，理是按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来划分的，如数、理、化、生、地等门基础科学，而每门又分为若干分支学科。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各门学科又相互渗透，从而出现新的边缘学科，如地球物理、生物物理、地质力学，等等。为此，理科的任务在于对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规律进行认识、说明、运用和探讨。工是按生产部门进行分类，如土木、建筑、机械、动力、化工、石油、采矿、冶金、航空、水利、电机、电讯、等等。随着社会生产、国民经济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会不断地提出和扩大新的生产任务。因此，工有工的具体对象、学科和规律性，并以自然科学规律的综合运用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牵涉到几门自然科学学科。生产中既有科学问题，又有经济问题。一项工程技术任务，需要几门有关的自然科学，而一门自然科学，由于客观规律的普遍性，可为多项有关

的工程技术任务服务。理与工的关系，实质上是基础学科与生产任务的关系，彼此相辅相成，但各有侧重。生物学和农、医有类似理和工的辩证关系。工、农、医需用多门自然科学的成果，但对这些学科的研究主要是各门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熟悉与自己学科有关的生产流程和使用要求。

理科的培养目标

综合大学理科的培养目标，就是要使工农兵学员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服务的高度政治觉悟，他们既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必须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具备做科学实验、理论分析、概括和计算工作的能力；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他们能根据获得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分析并予以解决。这里所说的实际问题，既包括当前工农业生产和医药卫生工作中提出的理论问题，也包括适合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科学发展需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只有掌握好自然规律，即深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才能提出自己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解。掌握好自然规律的具体要求是：能够正确理解和解释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并探索新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理科的任务既要培养当前生产所需要的具备自然科学理论训练的工作人员，又要培养为国家今后发展生产、发展科学的理论工作人员。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我国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农业和医务人员，但也需要一定数量的理科工作者，其中包括科学的研究、教学和生产部门的理论工作者。工业产品和工程质量的提高，往往和科学水平有关；科学水平高，产品的质量也高。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科学水平，对工农业生产、医学卫生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就会起很大促进作用。为此，工与理、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

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综合大学理科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是有历史根源的。解放前，旧大学理科的系科设置，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照搬过来的，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所形成的。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照耀下，大批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成长起来。他们同老科学技术专家一起，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改变着旧中国科学技术上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为今后自然科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高等教育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以前理科的教学工作曾严重脱离我国的实际，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专业设置和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也严重脱节。

在理科教育革命中，师生员工到“五·七”干校学习和下厂下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时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在学校原有人员、物力的基础上，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从长远发展的前景出发和考虑到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储备力量，对理科的专业设置进行了改革。新专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老专业也获得了新生与调整。

为了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学校办了工厂与车间。校办工厂是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结合教学基地的一种形式。同时，学校还实行开门办学，与有关生产和科学的研究单位挂钩，结合校外单位的生产、试制新产品和科学的研究进行教学工作，开始改变旧理科严重三脱离的状况，提高了教学质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改造与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是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反革命的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过去实验课的教学工作同样也有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实验内容陈旧落后，和课堂讲授脱节，把对客观现象的观察和量度的训练变成机械操作等等。在教育革命中重视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但有些地方有忽视实验室建设，以校办工厂来替代实验课教学的偏向。这个偏向必须纠正。我们通过生产实践来掌握物质运动的规律性，但是有些客观规律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来掌握。实验课能够起突出学科方面的主要矛盾的作用，并用实验方法来验证理论，使学员掌握理论，为生产提出可靠的数据。而且实验课不仅仅局限在对科学理论的验证，它的主要任务在于训练学员实际动手进行科学实验的能力，其中包括操作仪器，实验设计、分析、判断和处理实验数据，而且为了验证新的科学假设具有设计和制造新仪器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在工农业生产、医疗工作中有很大用处。为此，实验课是培养学员通过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径，决不可忽视。

综合大学理科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1、在专业设置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一些理论性的学科如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专业的联系实际如何认识？问题是对于理论联系实际如何全面理解？理科要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我们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满足当前的需要。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广泛意义来说，普通数学不仅和三大革命运动有联系，而且深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一部分高等数学，则只有在工程技术、物理、化学等科学中得到应用，而对另有一些抽象的数学分支还看不出和生产实际有什么联系。回顾数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数学的有些部门在发展的初期，看不出对当时的具体生产实践有何用处。微积分是在三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数学实践分别在解决行星运动问题和求曲线的切线斜率的科学实验中发明的。但它在今天已经成为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缺少的数学工具。一个自然科学理论有没有应用，或有没有科学意义，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加以判断。有些学科乍看起来与今天的生产实践并无联系，或认为将来可能有需要，但通过实践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当前的急需。而且，自然科学的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某些学科对生产能起重大作用或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但为了掌握和发展这些学科，也必须学习与研究其他有关学科。此外，理论联系实际也要从全面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来理解。十九世纪发现的进化论，给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神创论”以致命的打击。苔藓植物的研究对生产还看不出有多大价值，但苔藓植物的世代交替是植物进化的有力证据。自然科学的任何重大发现都会加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都会对捍卫、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出贡献。因此，对一些比较抽象的目前还没有用上的专业，处理要慎重，不宜急于取消，可以对它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它们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开展科学的研究工作，通过实践探索它们发展的前景。

2、由于自然规律的普遍性，两年多的实践证明，理科的专业设置仍宜按学科而不宜按产品区分，既不能漫无目标，又不能过于狭窄，即既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又要有一定的适应性。问题在于如何解决毕业的学员走上工作岗位后能把工作胜任地担负起来。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这是最根本的。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是为了适应学习新学科、掌握新技术，和继续提高的需要，并对培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起重要作用。由于综合大学理科面向广泛的工作岗位，其中有些单位的专业性比较强。对这类单位所需要的学员，我认为在基础课学完之后，学校可以和它们密切联系，请有关单位协助进行专业课和专门组课的教学工作，而且这部分学员在毕业之后，根据需要与可能分配在这些单位中工作。这样使学用尽可能取得一致，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至于为什么理科在原则上不宜按产品的生产设立专业，亦即不宜“以工代理”或“理向工

靠”？主要是由于产品生产是综合性的，它牵涉到的学科虽多，但每一个有关的学科的面则比较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员不能满足对理科人员需有较广的理论基础的要求。如果有些学校因迫切需要必须在理科中建立少数技术性的专业，也不能一概排除。

3、综合大学理科既建立了校内三结合基地，又和校外生产与科学的研究单位挂钩，是否还要进行另外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成立独立研究机构，培养科学的研究人员？我认为综合大学理科总结广大群众在工农业生产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开展理论性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是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重要措施，是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大学集中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而且有源源不断地进校学习的新生力量。为此，有必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在科学的研究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科学的研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科学的研究使他们获得第一手的、活的知识，并了解到现代科学发展的现状，从而迎头赶上。综合大学的另一优越条件是，集中几门基础科学的人员在一起，而近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是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推动，为此更便于集中有关各方面的力量对某些项目打歼灭战。比如，对当前我国各条战线上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如针刺麻醉、肿瘤防治、遗传育种、地震预报等，以及基本理论问题如天体演化、基本粒子、原子核结构、物质结构、生命起源、分子生物学、仿生学，等等，都可以开展科学的研究工作。一些学校如具备人力、物力的条件，也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成立研究室或所。在整个国家计划中花在基本理论研究上的力量只能给较小的比重，但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4、为了多方面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大学理科可以办短期训练班、进修班、为生产直接服务的计算中心、科学工作站，等等。教育革命的实践证明，短期训练班能使工农学员对某一方面在短期之内提高理论水平，回到工厂或农村之后，就能发挥很大作用。综合大学理科负有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科学水平的双重使命。“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和提高对理科的教学工作都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

综合大学理科的教育革命，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坚决相信理科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指引的航向前进，一定会胜利完成理科教育革命的艰巨任务。

(原载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

〔附〕“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

周培源

多年来，“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权力，大肆破坏教育革命和理论研究工作，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对他们这一罪行，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

光辉著作中，就把科学实验和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一起提为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三年，我曾两次亲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精辟论述。毛主席着重指出：没有科学实验不行。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

敬爱的周总理也十分关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确分析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基础和现状，为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一九五六年，周总理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还不及时的加强对于长远需要的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年，在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期间，在制订了生产中提出的科研任务项目之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提出“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项目。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二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总理指出：“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从旧中国落后、空白的状态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提前完成了。一九七〇年周总理又一次强调，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但是，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周总理的指示没有能够实现。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又一再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据我所知，周总理关于这方面的讲话和书面指示，共有十多次。中国血统的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后，希望我们提倡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周总理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时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就在这时，周总理又对我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其后，我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三点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七月二十三日周总理立即把我的信批给有关同志，要我们“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象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敬爱的周总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国操劳，日理万机，对于他所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竟这样反复叮咛，使得象我这样有幸多次亲自聆听过他的教导的人，每一念及，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四人帮”继承了林彪的衣钵，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又一次成为泡影。不仅如此，“四人帮”还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权力，兴师动众，南北呼应，吹起一阵阵反对周总理的歪风，妄图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根据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北大、清华草拟了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周总理看到以后，十一月八日作了批示：“将北大、清华两个加强基础科学学习的文件，好好按你们两个大学各自的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根据周总理的这个指示，北大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制订规划，交给群众讨论。广大干部、教师和学员，对周总理的指示都是热烈拥护的，纷纷表示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一九七三年三月，学校提出了一个《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报告》。在报告准备期间，“四人帮”的亲信曾来校借故破口大骂，发泄他对周总理关于加强理论工作指示的不满。在“四人帮”掀起的反对加强基础理论的妖雾笼罩下，这个报告所提出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周总理

的多次指示以及广大群众所作的努力，又都烟消云散了。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指示引导下，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提出不同意见进行讨论是符合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掀起了一股反对学习和研究基础理论的妖风，以批判我的文章为名、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这篇文章本来是一九七二年春应《人民日报》之约而写的，并准备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内。同年五月，文章初稿写成后，《人民日报》邀集参加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征求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发表这篇文章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理科的教育革命，有利于活跃教师的思想。但是，篡夺了党的宣传工作领导权的文痞姚文元，却胡说什么参加座谈的人不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人，要征求“权威的意见”。并指令要去上海征求意见。于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在北京并专程到天津、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意见。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把文章扼杀在摇篮内，竟大搞阴谋诡计，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亲信、把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同志事先找来统一反对文章的“口径”。由此可见，姚文元所要的“权威的意见”，就是反对的意见，凡是赞成的，就不算是“权威的意见”。他所希望的是有一个“权威”说这篇文章是“毒草”，那末他就可以借口不登。可是，从各地征求到的意见，除有的同志对文章中有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外，大多数同志还是基本上同意文章的观点。尽管如此，文章的发表一再被拖延。到了八月十五日，姚文元又给他《人民日报》的心腹一条“批示”：“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人民日报》有关部门的同志仍然认为可以发表。但姚文元又给他《人民日报》的心腹打了一个电话，说什么：“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这就暴露了姚文元八月十五日所谓“批示”的虚伪性。文章本来就是准备在“讨论版”内发表的，各抒己见，有什么能不能收场的问题？姚文元还下令把文章转给《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不久，在张、姚的指使下，上海即派人来北大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到处打听：“周培源的文章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张春桥则给上海一家报纸下达了黑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接着，这家报纸盗用一些教员和学员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不指名地对我进行“批判”。我的文章不过是一篇很普通的讨论教育革命的文章，张、姚为什么费尽心机、百般刁难？为什么在文章发表以后在上海的报纸上大兴问罪之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罪恶的矛头实质上还是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四人帮”的两个心腹还利用他们控制的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力量大反周总理。其中的一个在北大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直言不讳地把对我的批判同周总理联系起来，说什么“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指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话），有人就大作文章，翘尾巴了，我们批了他……。”“四人帮”在北大的亲信也在党的会议上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权威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写文章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是阶级斗争的信号。”但是，“四人帮”这样煽风点火，并没有能在北大校园内掀起所谓“批判”的半点风波。于是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的亲信又请出一位学术“权威”，指令他针对我的文章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意见书，并要求对我的文章和这份意见书在北大“进行讨论”。“四人帮”手段之卑劣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相比毫无逊色。由于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他们搞的这件事只得不了了之。

特别恶劣的是一九七三年冬，“四人帮”的亲信在北大、清华借“反右倾回潮”为名，一方

面镇压群众，一方面猖狂反对周总理。他们把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说成是“复旧”、“右的东西抬头”。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加强理论研究所制订的规划，居然受到公开批判；拥护周总理的指示、积极行动的人，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直到去年，他们还指使“梁效”这个反党工具把周总理一些指示断章取义，加以歪曲，编入一个什么言论集中，当作“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真是猖狂之极，反动透顶。

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人材的培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指示，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论点呢？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其一是说“基础理论一向被资产阶级学者吹得神乎其神”，“这是旧教育遗留下来的一种偏见，必须抛弃。”这就是说根本不要什么基础理论；其二是说，要说理论的话，只能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理论”。前一论点是经验主义的，否认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他们所说的实践，只是片面强调生产实际，无视科学实验，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室的建设，以劳动代替实验课。后一种论点是教条主义的，他们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公式，到处乱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教学、生产和科学的研究工作。但是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四人帮”不但全面地修正了马列主义，而且还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修正主义，妄图把人们引上错误的道路。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大大调动了全国人民包括教育和科技战线上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把“四人帮”破坏、干扰教育革命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为党、为人民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努力提高基础理论水平，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勇战斗。

(原载 1977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

我国对外关系和同各国人民的 友好往来又有很大发展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我国的对外关系今年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越来越多，地区越来越广泛。那种妄图孤立、包围中国的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我国同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革命团结，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战斗友谊，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

作关系，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我们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较大的发展。今年，我国已先后同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希腊、圭亚那、多哥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加纳恢复了外交关系，同英国和荷兰的外交代表机构都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今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两国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进行了认真、坦率和有益的会谈。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了。最近，日本田中总理大臣应邀访华，双方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决定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府代表顺利结束了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谢尔外长前来访华，签署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仅今年头九个月，我国就接待了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以及政府代表团等三十多起。

当前，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加强互相往来，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今年来我国访问和我国出访的代表团和各界人士，与去年相比，国家和地区扩大了，来往的次数和人数也大为增加。到九月为止，有来自世界五大洲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五百多起各种代表团和各界人士访问了我国。同期，我国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团和人士，分赴五大洲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仅美国访问我国的各界人士到九月为止就达五百多人。从我国近邻日本前来我国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在同一期间内已达三千七百多人。来我国旅行参观的各国客人，今年头八个月就比去年全年的总人数还多。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体育交流，今年更为活跃。我国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冰球、羽毛球和滑冰、体操等代表团，到九月为止已对亚非拉和其他各大洲的五十二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其中第一次访问的就有十六个国家，包括一些尚未与我国建交、过去民间往来也很少的国家。同一时期，来自五大洲的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体育代表团和人士访问了我国，其中有九个国家的代表团是首次访华的。特别是今年九月亚洲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友好盛会——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为中国人民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作出了新贡献。

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的发展，促进了相互了解和互相学习，加强了友谊和团结。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接触，打开了被关闭二十多年的中美人民往来的大门，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现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小小银球传友谊”，已在世界各地传为佳话。

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利、互相支援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实行经济技术合作。这种互助合作虽然规模还很有限，但是范围在不断扩大，项目逐渐增多，技术要求不断提高。

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目前已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我国建立了贸易关系。今年头九个月里，我国派出了二十四起贸易代表团和代表，访问了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接待了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八十四起经济和贸易代表团以及贸易界人士。我国同二十六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或议定书，贸易额比去年有较大增长。目前，我国远洋船舶通航世界五大洲，到达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在广州举办的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来宾人数之多和来自国家和地区之广泛以及所达成的贸易额，都超过了历届交易会。今年以来，我国在国外举办和参加了一系列

经济贸易展览会，还接待了一些国家在我国举办展览会。这些展览会提供了开展贸易、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和发展友谊的良好机会。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 1972 年 10 月 11 日讯，载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

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 骗子的反革命工具

——学习笔记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

龙 岩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进行了无情的、激烈的斗争，宣告了它的破产。然而，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反对革命，往往还要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兴风作浪，毒害群众。当前，在深入进行批修整风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中，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剖析和批判，清除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流毒，是很必要的。

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很多，但它的基本观点可以用蒲鲁东的一句“名言”来概括：“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忠实誓愿。”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时说得更明白：“他的理想是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理论”，首先是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一切活动从来都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绝对自由”。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里曾经深刻地批驳过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服从任何权威的谬论。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的发展趋势，就是“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所谓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要是没有权威，没有对权威的服从，组织起来就是不可能的。恩格斯特别指出：就是在社会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土地和工厂公有化以后，权威也还是需要的。恩格斯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拿纺纱厂来说，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工序才成为棉纱，另外，蒸汽机要工程师来照管，要技师来进行日常检修。因此，就需要有统一管理和指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

赖下来。”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用民主讨论的方法，但是一经决定以后，就具有权威性，大家都服从。再拿铁路、海轮做例子，也是这样，如果乘客不服从铁路员工的指挥，全船的人不服从船长的指挥，那就要出事故。所以，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总是要有权威，要有对权威的服从。

恩格斯说，“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权威，也没有绝对的自治。“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是违反基本常识的。

无政府主义者这种“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的主张，不仅在生产领域里行不通，在政治领域里也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从追求“绝对自由”出发，把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当作应该打倒的权威。他们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这就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革命的权威和反动的权威之间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但这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革命本身就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无产阶级不是立即废除国家，而是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靠自发的活动，而“不应该承认任何权威的领导机关”。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政党的领导，才能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变成自觉的革命斗争。当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却鼓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取消党对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领导作用，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为资产阶级效劳。

无政府主义鼓吹不要国家，不要政党，不要纪律，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一切政治斗争，不要革命，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出发，脱离阶级的解放而侈谈个人的解放，反对政治斗争而推崇自发性，这实际上就是反对和阻挠无产阶级觉悟起来，组织起来，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去完成推翻和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一窍不通。他们根本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阶级社会的一切现象，不懂得个人的命运取决于阶级的命运。在他们看来，群众并不是划分为阶级，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人的简单的总和。“一切为了个人”，就是他们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列宁曾经尖锐而深刻地指出：“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在上面搞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下面的无政府主义的歪风邪气就会泛滥成灾，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做官当老爷，大搞特殊化，反对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鼓吹“规章制度万能论”，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妄图使群众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恰恰为无政府主义的滋长准备了肥土沃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

度无用论”只嚷要“砸烂一切”。他们这样作，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手法，揭穿了说，就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真的不要任何政府。他们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使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上台。他们只不过是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们一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想，一面又拉山头，结死党，挖空心思地“大树特树”他们一小撮的“绝对权威”，并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以我划线”，妄图对干部和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流毒所及，歪曲和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腐蚀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干部和群众中制造了思想混乱，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泛滥准备了条件。

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今天，要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想，首先就是深入批判他们这些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它的流毒。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尽管刘少奇一类骗子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学会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并揭露刘少奇一类骗子是怎样不断变换反革命的策略，处心积虑地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对自己的腐蚀和影响，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进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觉地消灭自己身上的某些不正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和群众一起肃清无政府主义的余毒。应该肯定，群众中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用学习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他们就会自觉地消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

(原载 1972 年 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

〔附〕 围绕批判极“左”思潮的一场激烈斗争

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 人民日报理论部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而当他们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时候，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这就明确提出了批极“左”的必要性。

“四人帮”和林彪一样，都是反革命两面派，都是用极“左”的面貌来掩盖其极右的实质，

只要撕下他们的“左派”伪装，就会显露出他们的极右原形。因此，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不许批“左”，谁批“左”谁就犯了他们的忌讳。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左”的思潮，所以连无政府主义也不许批，批了就有罪。这里面的曲折和内情，很多读者不知道。一九七二年，围绕着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斗争。

事情的背景

本来，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都不自一九七二年始：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就是以煽动极“左”思潮为手段来进行破坏的，其主要矛头，是对着忠实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在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被粉碎后，根据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在广大群众中，在全国报刊上、曾经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收到了好的效果。

然而，由于当时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们都是“五·一六”的大后台）还在台上，这个批判是不可能彻底的。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暴露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特别告诫我们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要上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林彪的叛国投敌，自我爆炸，进一步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批林整风作了正确的部署。在开始，是着重批《“571工程”纪要》、揭露林彪一伙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同时又指出他们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接着，毛主席又批发了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出林彪是“五·一六”的大后台，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反复强调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反对无政府主义。显然，这对于剥去林彪反党集团的伪装，揭露其反革命极右实质，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个期间，周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包括解放老干部，整顿企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等等。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但也受到了当时还没有暴露的“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的干扰。不论在国内工作中还是外事工作中，这种极“左”的流毒还是严重的。因此，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秋天先后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和科学会议，都把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人民日报和另外几个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并尖锐地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九月，周总理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次提出了批极“左”思潮的问题。

就在周总理八月初的那次讲话以后，过了几天，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别有用心地提出：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人民日报的革命同志看出了这两种意见的针锋相对：周总理刚刚指出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张、姚就慌忙出来“不要过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极“左”思潮是已经批“过头”了，还是没有批透呢？张、姚的这次谈话，在人民日报的革命同志中引起很大的反感，有的公开表示反对，他们决心不听张、姚的一套。根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周总理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理论部编发了署名龙岩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还配了一篇关于介绍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老反革命两面派巴枯宁的小册子的文章和一篇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体会文章，组成一个

版，突出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左”思潮的主题。这个版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见报了。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一九七二年三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说了些什么呢？它主要根据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指出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无政府主义兴风作浪，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其目的是要把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还指出，群众中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只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会自觉地清除林彪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这个问题，必须在批林整风中加以解决。这样的论述有什么错？其他两篇文章，更找不出任何问题。不料这样一篇文章、一块版，却闯下了大祸。

鬼蜮的伎俩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突然登出了一篇所谓工人座谈会纪要，集中火力攻击龙岩的文章，给这篇文章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在上海，他们拿到《文汇情况》，如获至宝，兴冲冲回到北京。姚文元把《文汇情况》批给人民日报“讨论”，装模作样地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说他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张春桥则扬言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啦，觉得受到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真是这样吗？撒谎！

现在已经查明：他们不但看了这篇文章，而且讲了话，作了布置。当时，姚文元看后狠狠地说：“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于是张、姚让原上海市委写作组那个大头目，给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挂长途电话，询问文章的作者和产生背景，等等。当他们了解到真实情况后，觉得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可以一箭双雕，于是密令那个大头目通过文汇报组织一个“工人座谈会”，通过工人的嘴巴把他们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这就是那篇“纪要”出笼的背景。

据曾经参加座谈会的工人同志回忆，他们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只是由于张、姚的授意，才违心地发表了否定的意见。一个工人同志揭发说：“一九七二年十月底左右，我在文汇报社参加读书班。有一天，报社的一位同志拿着龙岩同志的文章来，说是‘康办’（注：上海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地点）传过来，要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这样批无政府主义，究竟好不好？这样对待群众，对待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确不正确？」并说，‘张春桥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他）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然后，我们学习班成员根据这个调子进行议论，并推出我与另一位同志去参加座谈会。座谈会大概在第二天举行，由报社同志主持，调子跟以前听到的差不多，我们几名工厂来的

同志就根据这个调子，各人都作了发言。”很明显，这次座谈会，完全是“四人帮”导演的一出滑稽戏。

这还不够，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报又奉旨出了一期《文汇情况》，列举龙岩文章发表后一些报纸上的正确提法，作为反面论点拿出来示众。

两期《文汇情况》，表明一个观点，就是：无政府主义根本不能批。这一点，当然是人民日报绝大多数同志不能接受的。到底是中央文件算数，还是《文汇情况》算数？张、姚对龙岩文章有意见，为什么自己不说，却假借工人名义？这是搞什么名堂？龙岩文章的背景，张、姚明知道，他们还要这样搞，矛头是指向谁？当时在张、姚完全控制下的报刊，也曾批过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人民日报就不能批？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人选题计划，姚文元明明同意过的，为什么突然翻脸变卦？……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几次讨论会，都讨论不下去。有的同志翻出了中央文件中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要求姚文元明确表示态度。理论部的同志则干脆拒绝讨论。张、姚的意图受到报社许多同志的抵制，贯彻不下去。

这一来，张、姚恼羞成怒，伙同江青，公开跳出来，把龙岩的文章打成毒草，并大肆追究责任，在人民日报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从此以后，“无政府主义”和极“左”就成了批判的禁区。

荒 唐 的 理 由

“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批无政府主义，究竟有什么理由呢？

“四人帮”说，林彪路线是极右，因此就不能批林彪的极“左”。这是根本说不通的。说极右，是指它的实质，但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既有极右的一面，又有极“左”的一面。林彪一伙是反革命两面派，既要躲在阴暗角落里搞反革命政变阴谋，又要在公开场合把自己打扮成“最最最”革命的“左派”。概括起来说，就是假左真右。要揭露他们的极右实质，就特别要戳穿他们的极“左”的假面具。否则，怎么能提高对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力？怎么能防止以后上当受骗？“四人帮”说因为实质是极右就不能批极“左”，这不仅是保护林彪，而且连过去批“五·一六”煽动极“左”思潮的案也要翻了，因为“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也是极右。

“四人帮”又说，林彪不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是批林整风的一项内容。姚文元叫嚷：批判无政府主义“不要和林彪挂起来”。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文汇情况》，公然把“林彪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和“批判无政府主义是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两条，作为反面论点列举出来，引导大家注意。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一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评论，针对龙岩的文章说：“真正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请注意，这里所说的“阶级敌人”，是指社会上的或混入基层单位的阶级敌人，不是指林彪反党集团。所有这些，意思很明白：林彪并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这不是公然为林彪解脱吗？

“四人帮”反对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条理由更为荒唐。他们说，批判无政府主义不是批评，是批群众。江青叫嚷：“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这篇文章，是批林，还是批群众？”张春桥胡说：“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呢？”

这真是闭眼说瞎话！怎么能说，群众中没有无政府主义呢？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

政府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暴露得很明显了。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就指出：“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毛主席在谈到一个工厂分成两派时，又说：“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这难道还说得不清楚吗？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批无政府主义是“转移斗争大方向”，那岂不是说，闹无政府主义才符合他们的大方向吗？

龙岩的文章把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帐记到林彪一伙头上，正是为了避免批群众。文章中说，无政府主义“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就是这个意思。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这是一种极“左”思潮，应该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林彪一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煽动极“左”思潮，目的是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种策略手段。他们不是真的不要政府，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政府。正如龙岩文章所说的，他们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

“四人帮”为什么那样害怕批无政府主义？为什么那样害怕批极“左”？其实原因很简单：“四人帮”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不但极右的实质相同，“左派”的伪装也一脉相承。无论是“打倒一切”的“黑线专政”论，还是鼓吹自发性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论；无论是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还是以“反对管、卡、压”为名，取消规章制度；无论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说明“四人帮”同林彪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因此，“四人帮”深知，如果对无政府主义继续反下去，对极“左”思潮继续反下去，势必会反到他们头上，就是一。其次，通过肃清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流毒，形势会安定，生产会上去，这对他们的篡党夺权，是极为不利的。他们对十月十四日那块版如此咬牙切齿，暴跳如雷，正说明批无政府主义批对了，批极“左”思潮批对了。

龙岩的文章有这样一句话：“尽管刘少奇一类骗子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这句话刺到了“四人帮”的痛处。“四人帮”在报社的那个心腹和帮派体系的成员，抓住这句话大批特批，这恰好表明他们心中有鬼。难道这句话不是说中了吗？“四人帮”不许批无政府主义，正因为他们自己要大搞特搞无政府主义。他们害怕批林彪的“左派”伪装，正因为他们自己还要继承和发展这个伪装。在后来的那几年里，“四人帮”不是变本加厉地煽动极“左”思潮，煽动无政府主义，造成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吗？

“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周总理说得多么对啊！

要 峙 在 夺 权

“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排斥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篡夺人民日报领导权。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委托周总理管人民日报。“四人帮”对这件事又怕又恨，怕的是这件事于他们大大不利，恨的是他们没有把人民日报这个要害阵地夺到手中。当时，“四人帮”虽然在报社安插了一个心腹，但是此人德才兼缺，搞阴谋虽有两手，对业务却一窍不通，念文件别字连篇，作报告笑话百出。这样一个大草包，只因为和张、姚有些老关系，是他们的一条忠实走狗，张、姚就硬要扶他当人民日报第一把手，这自然要引起报社群众的愤怒。张、姚虽然多次示意，希望大家支持这个心腹，报社群众却硬是不买帐。

张、姚看到周总理的担子比过去更重，就采取了毒辣的一手：事无巨细，全往周总理身上推，自己不闻不问，企图把周总理的身体拖垮。这样一来，许多连文理不通的稿子，都送交周总理审阅了。周总理常常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对“四人帮”的那个心腹说：“你们以后不要我再替你们当小学教员好不好？”一九七二年夏天，周总理提出，人民日报在建立正式领导机构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实行集体领导，统管全局”。周总理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青的，不行。”几天之后，周总理催要名单。“四人帮”的那个心腹推托说因病未办。周总理立即驳斥：“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四人帮”那个心腹遭到周总理多次严厉批评，又受到报社绝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地位岌岌可危。

“四人帮”要扶植那个心腹上台，扭转局面，需要找个由头。他们看到，龙岩的文章也好，一块版也好，都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而批极“左”思潮是周总理讲过的，批无政府主义又是当时国务院的几个负责同志讲过的，于是就从这里开刀。江青杀气腾腾地叫嚷：“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还叫嚷说，人民日报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必须镇压。当时许多革命干部向中央写信，表示反对“四人帮”的那个心腹当人民日报第一把手，这也被说成是“邪气”“抢班夺权”的阴谋。于是，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报社进行了一场名曰“批邪”运动的反革命围剿。这场运动的矛头，明的是对下，暗的是对上，——对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四人帮”完全排除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社充满了白色恐怖。对于所谓“邪气”，大会批，小会斗，帽子棍子一齐上，真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四人帮”不是说反无政府主义就是反群众吗？他们却借反“反无政府主义”而大整群众。“四人帮”不是说批无政府主义是扭转大方向吗？他们根本不批林而大搞所谓“批邪”，这才是真正扭转大方向！这就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煽动极“左”的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他们真正要实行的是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行了残酷斗争，才把报社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暂时镇压下去，拼凑了一个以他们的心腹为头子的领导班子。从此，人民日报落入了“四人帮”的掌握之中，变成了“四人帮”的帮报。

“四人帮”恶毒地诬蔑说，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出现了所谓“修正主义回潮”，或“右倾回潮”，而人民日报刊登批极“左”思潮和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就是这种“回潮”的表现之一。他们的攻击矛头，是对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特别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林彪灭亡之后，正是周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林彪和“四人帮”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做法，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被“四人帮”说成是“回潮”。他们口中的“反潮流”，就是反对这个拨乱反正的潮流。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谁批无政府主义，谁就是搞修正主义；谁批极“左”，谁就是极右。

今天，他们设置的禁区被冲破了，这是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一个成果。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深入发展的时候，必须注重揭批他们高唱的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揭批他们用假左伪装掩盖他们极右的实质，特别要注意揭穿他们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我们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追击，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原载 1978 年 3 月 23 日《人民日报》）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①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周恩来

我们小学和中学的学制究竟是十年还是十二年，还没有确定。过去是十二年，是不是要这么长，现在还在研究。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至少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进大学，国家没有这个力量。中学毕业后马上进大学的总是少数，大量的要在生产实践中提高。劳动几年后，有升学机会的当然还可以深造。

① 这是周恩来同志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时的谈话节录。